

L'Apparition du livre

印刷書的誕生

貓頭鷹書房 25

費夫賀、馬爾坦◎著
李鴻志◎譯

台大歷史 秦曼儀【專文推薦】

輔大歷史 王芝芝、科樂印刷 江瑞璋【編輯顧問】

印刷書的誕生

本書是年鑑學派大師費夫賀與馬爾坦的經典之作，自一九五八年於法國出版以來，已成爲西方書籍史與出版史研究人員必讀的基本書目。作者聚焦於一四五〇至一八〇〇年間，活字印刷術發明後的早期圖書史，以嚴謹豐富的史料，深刻地呈現印刷書在歷史上勃興的諸多物質與社會因素，並剖析印刷書爲西方文明帶來的重大影響。

作者簡介

費夫賀 (Lucien Febvre)，一八七八年生於法國南錫，一九五六年辭世。他與布洛克 (Marc Bloch) 共同創辦了年鑑學派的核心刊物，也就是後來的「年鑑：經濟、社會與文明」。如今，費夫賀已是公認的二十世紀史學大師，其法文作品還包括《土地與人類演進》、《命運：馬丁路德傳》、《拉伯雷與十六世紀的不信神問題》、《爲歷史而戰》等。英文著作則有《地理觀的歷史導論》、以及柏克 (Peter Burke) 選編的《歷史新種類：費夫賀選集》。

馬爾坦 (Henri-Jean Martin)，一九二四年生於巴黎，曾任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研究主任。他是富有盛名的印刷史學者，其他作品尚有《十七世紀法國的印刷、權利與人民》與《宗教、專制與閱讀：一五八五到一七一五的法國》。

譯者簡介

李鴻志，高雄市人，政大傳播學院文學士，師大翻譯研究所肄業。譯作有《真誠以待》(麥田)、《高科技就業聖經》(經濟新潮)。

A9413490132
462"

011.2
5554
2005

貓頭鷹書房 25

00232222

印刷書的誕生

L'Apparition du livre

(The Coming of the Book)



[法] 費夫賀、馬爾坦◎著

李鴻志◎譯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圖書館



00232222

QFC 20

貓頭鷹出版社

L'Apparition du livre (English title: The Coming of the Book)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 S.A. - Paris 1958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Owl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貓頭鷹書房 25

ISBN 986-7415-72-8

印刷書的誕生

作者 費夫賀、馬爾坦 (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譯者 李鴻志
編輯顧問 王芝芝、江瑞璋
主編 陳穎青
責任編輯 陳雅華
特約編輯 黃河清、翁淑靜
文字校對 李鳳珠
封面構成 莊士展
版面構成 謝宜欣
行銷企畫 林筑琳、柯若竹、朱佩筠
出版 貓頭鷹出版社
發行人 涂玉雲
社長 陳穎青
總編輯 謝宜英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聯絡地址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
讀者服務 電話：0800-020-299 / 24小時傳真：02-25170999
電子郵件 owl_service@cite.com.tw
貓頭鷹知識網 www.owl.com.tw
郵撥帳號 19833503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
電話：852-25086231 / 傳真：852-25789337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電話：603-90563833 / 傳真：603-90562833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 2005年11月
定價 600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量團購請洽專線
02-23560933轉282

印刷書的誕生 / 費夫賀 (Lucien Febvre)、馬爾坦 (Henri-Jean Martin) 著；李鴻志譯。-- 初版。-- 臺北市：
貓頭鷹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5 [民94]
面：公分。-- (貓頭鷹書房；25)
參考書目：面；含索引
譯自：L'apparition du livre
ISBN 986-7415-72-8 (精裝)

1. 圖書 - 歷史 2. 印刷術 - 歷史

011.2

94017159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 推薦序

《印刷書的誕生》，複數閱讀實踐史的開始

秦曼儀

印記在每一本印刷書上的，不僅有呼應書名的正文，還有一系列出自作者、編輯、書評家、專家的介紹，以及推薦性質的「周邊」文本，如「簡介」(abstract)、「前言」(preface)、「導論」(introduction)、「後記」(postface)等。而翻開一本書的譯本，以中譯本為例，則有學者的「導讀」、翻譯校訂者的「序言」、譯者的「譯後記」等。其實，這樣的一本書，尤其是它的外語譯本，不論書頁邊緣是否留下讀者的塗鴉、眉批，對研究「閱讀實踐史」有興趣的人而言，已經構成了一系列基本的素料。

如果我們把《印刷書的誕生》法文原版《L'Apparition du livre》的閱讀實踐史，從一九五八年在法國出版做為開始，我們會發現到，它至今已經進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此書以法國史學環境為觀察對象，打破了傳統書籍研究的格局，開啓了書籍的社會史研究，而且成為八〇年代以來，印刷品的使用史、出版史、閱讀實踐史，乃至寫作文化史 (history of written culture) 於研究反省時，所必備的智識條件。這個智識反省包括，以書籍在社會裡的文化作用與影響，做為一個全新的問題意識，進而對史料重新閱讀與開發，並構思與驗證新的方法。至於法國以外的地區，它則先後被譯成西班牙文（一九六二年）、英文（一九六二年）、義大利文（一九七七年）及日文

(一九八五年)，直至二〇〇五年以《印刷書的誕生》為名之中文版。中文版除了在知識的傳遞上，讓中文世界的讀者，認識歐洲自十五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末印刷書籍的歷史，更責無旁貸地必須承接起發生在它之前的閱讀實踐史（即上述所勾勒的）。首先可以預期的是，透過中文版的問世，中文讀者將與世界各地閱讀「同一」文本、不同語文版本的讀者社群發生奇妙的連結；其次，中文讀者也將能和書籍史領域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對話。因此，對於《印刷書的誕生》向未來的開展，我們樂觀其成。但為了讓中文讀者有更多的想像空間和思考的基礎，以便創作，我們有必要說明《L'Apparition du livre》出版前，法國研究書籍的學術環境。

事實上，書籍史成為法國史學研究中的一個領域，發展是漸進的。自十九世紀以降的法國，在學院體制上有沙爾特學院 (l'École des Chartes)，該學院相當重視古典語源學 (philologie) 與古文書學 (paleographie) 領域專家的培育，尤其負責培養國家藏書與檔案資料等的專業管理人員 (conservateurs)；在民間則向來有一批書商、藏書家或珍本收藏家等愛書人。這些民間的行家 and 國家培訓的專業圖書人，長久以來投入工作，專門清查、分類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成為國家專有的寫作遺產，他們也最早把書當作物體來研究。然而，這些傳統藏書研究，卻僅封閉性地流通於圈內人士。此外，研究作品雖提供博學式的陳列與描述，卻缺乏問題意識。至於其他傳統學科如文學史、思想史等，雖然有閱讀古典文本的訓練，卻對於載負文本的書籍本身，其物質特性在接收 (reception) 過程產生的作用，完全忽略而不予理會。面對上述傳統藏書研究或學科訓練的局限，在一九五三年，費夫賀 (Lucien Febvre) 決定邀請畢業於沙爾特學院、當時任職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馬爾坦 (Henri-Jean Martin) 共同著作這本《L'Apparition du livre》。而他們的合作

(一如後者在序言所解釋的)，終在一九五六年費夫賀去世後，單獨由馬爾坦負全責完成。

根據二〇〇五年出版的《書籍的百科全書詞典》(Le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第二冊，馬爾坦為「印刷書籍史」此一條目所做的定義和解釋，當中特別說到，《L'Apparition du livre》原本的規畫，應該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各自以「書籍，此商品」、「書籍，此酵素」(Le livre, ce ferment) 為主題。由於五〇年代傳統書籍專業領域的成果（此乃費夫賀所依賴馬爾坦之處），再加上當時已成為法國史學界寵兒的社會經濟史所激發出的問題架構（由費夫賀所構思），使得第一個部分——從「書」這個做為物體的生產材料與技術、製作環境及其樣貌的分析到出版發行，逐步撰寫完成。至於第二個部分的「書籍，此酵素」，應是呈現費夫賀所念茲在茲的「書籍之文化作用以及影響」，卻因缺乏足夠的概念工具，以及費夫賀的辭世，馬爾坦僅能將此部分撰寫成全書八章的最後一章。但這樣的「缺憾」，卻引起後繼者強烈的求知慾望，鼓舞了法國以及其他具有書籍史研究傳統的國家，如英、美、西班牙和義大利等國的歷史學家，在書籍史方面開發豐富的社會文化議題。

也許細心、好奇的讀者會注意到，本序文曾前後兩次重複提到「書籍之文化作用以及影響」。其實，這句話是出自費夫賀為法文原版所寫之序言，之後又不斷地被法國書籍史學家所引述，藉以強調此著作所帶來的革新視野，但它並未在英文版中被「忠實」地翻譯出來（中文譯本也因而闕如）。不過，中譯本書名卻比法文版更「忠實」地反映此書所談的是「印刷書」的歷史！原來，法文「livre」這個字，並不單單指稱具有印刷形式的書籍，而是一種文本的載體，必須根據其後的限定詞如「手搖捲筒的」、「翻頁簿本的」、「手抄的」、「印刷的」、「電子的」來

確定它的物質屬性。因此，如果在面對原文時，翻譯是一種不斷擺盪在「背叛」之威脅與「忠實」之渴望的創作活動，那麼閱讀《印刷書的誕生》，更提供讀者從哲學、文學批評、精神分析等面向思考翻譯的問題時，擴及到關心文本的物質性問題。因為此書讓讀者了解到，文本意義的產生與其閱讀效果的作用，皆與它的物質世界緊緊扣連在一起：從寫作者的文本安排到以書籍的樣貌呈現；從排版、印刷工人對文本的處理到圖書經銷業者的出版策略；從創作的智識環境到檢查制度。這些物質條件與人文環境使「文本」成爲一本「書」，也影響它如何被閱讀。若認識到每一本書都有其歷史，那麼當中文版《印刷書的誕生》付梓之時，不也正開展出屬於它自己的閱讀實踐史！

秦曼儀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與文明研究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爲 Roger Chartier），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爲歐洲十六至十八世紀社會文化史，法國近代書籍史、閱讀實踐史、寫作文化史，西方婦女史，歐美史學理論與方法。

① 爲《印刷書的誕生》之法文書名：FEBVRE, Lucien et MARTIN, Henri-Jean, *L'Apparition du livre*, Avec le concours de Anne Basanoff, Henri-Bernard Maitre, Moché Catane, Marie-Robert Guignard et Marcel Thomas, Paris, Albin Michel, "L'Évolution de l'Humain", 1958.

②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五、十六日，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舉行

「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八世紀／十五世紀—二十世紀）」中法雙邊學術討論會。

網址：www.nlc.gov.cn/tongzhi/seminar/hnm/gaikuang.htm

③ 依據的資料主要來自：夏爾提埃（Roger Chartier）和馬爾坦對合作編著的《法國出版史》（*Histoire de l'édition française*, Paris, Promodis, 4 vol., 1982-1986; réédition, Paris, Fayard/Cercle de la Librairie, 4 vol., 1989-1991）共同寫的「導論」。夏爾提埃為馬爾坦一九九九年再版的《巴黎十七世紀的圖書、權力、社會，一五九八至一七〇一》（*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1701)*,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69, 1999.. 英譯版：*Print, Power, and Peopl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Paris*, Lanham, Scarecrow Press, 1993）所寫的「前言」、標題為〈一本創始者之書〉（“Un livre fondateur”）。巴比耶（Frédéric Barbier）為一九九九年再版的《L'Apparition du livre》所寫的「後記」，標題為〈寫作《印刷書的誕生》〉（“Ecrire L'Apparition du livre”）。最後是《書籍的百科全書詞典》（*Le 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u livre*, Paris, Editions du Cercle de la Librairie），共三冊，前兩冊已分別於二〇〇二年及二〇〇五年相繼出版，由馬爾坦與其門生梅洛（Jean-Dominique Mellot）共同負責「書籍與出版史」領域的編寫。

印刷書的誕生

目次

推薦序 《印刷書的誕生》，複數閱讀實踐史的開始 秦曼儀 5

前言 馬爾坦 17

作者序 費夫賀 18

手抄本 托馬 24

第一章 前奏：紙張傳入歐洲 42

一、紙的進程 43

二、造紙術成長的先決條件：自然的與工業的 46

三、商業因素 51

四、印刷的興起和造紙業的發展 54

第二章 技術問題與解決之道 62

一、木刻版：印刷書的先祖？ 62

二、「發現」印刷方法 67

三、鑄製活字 76

四、排字與打印

五、組版

六、中國的先例

第三章

書的樣貌

一、字體

二、打開書封：書名頁、牌記、印刷鋪印記

三、內文呈現與開本

四、插圖

五、替書穿衣：裝幀形式

第四章

書籍商品

一、成本

二、籌資的問題

第五章

圖書館的小世界

一、印刷師傅

二、老闆

三、從人文主義印刷商到啓蒙時期書商	183
四、作者與版權	203

第六章

書籍地理學

一、印刷匠的旅程	216
二、開業地點	219
三、地理與出版	230
四、印刷征服世界	249

(一) 斯拉夫諸國

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	250
波蘭	253
斯拉夫南境	257
俄羅斯	260
(二) 新大陸	262
(三) 遠東地區	268

第七章

書籍生意經

一、基本資料：每版印量

二、圖書交易的問題

281

三、圖書市集的交易方式

284

四、邁向新的交易方式

296

五、特權與侵權

303

六、檢查制度與禁書

308

第八章

印刷書：變革的推手

312

一、從手抄本到印刷書

312

二、人文主義與印刷書

329

三、印刷書與宗教改革

363

四、印刷和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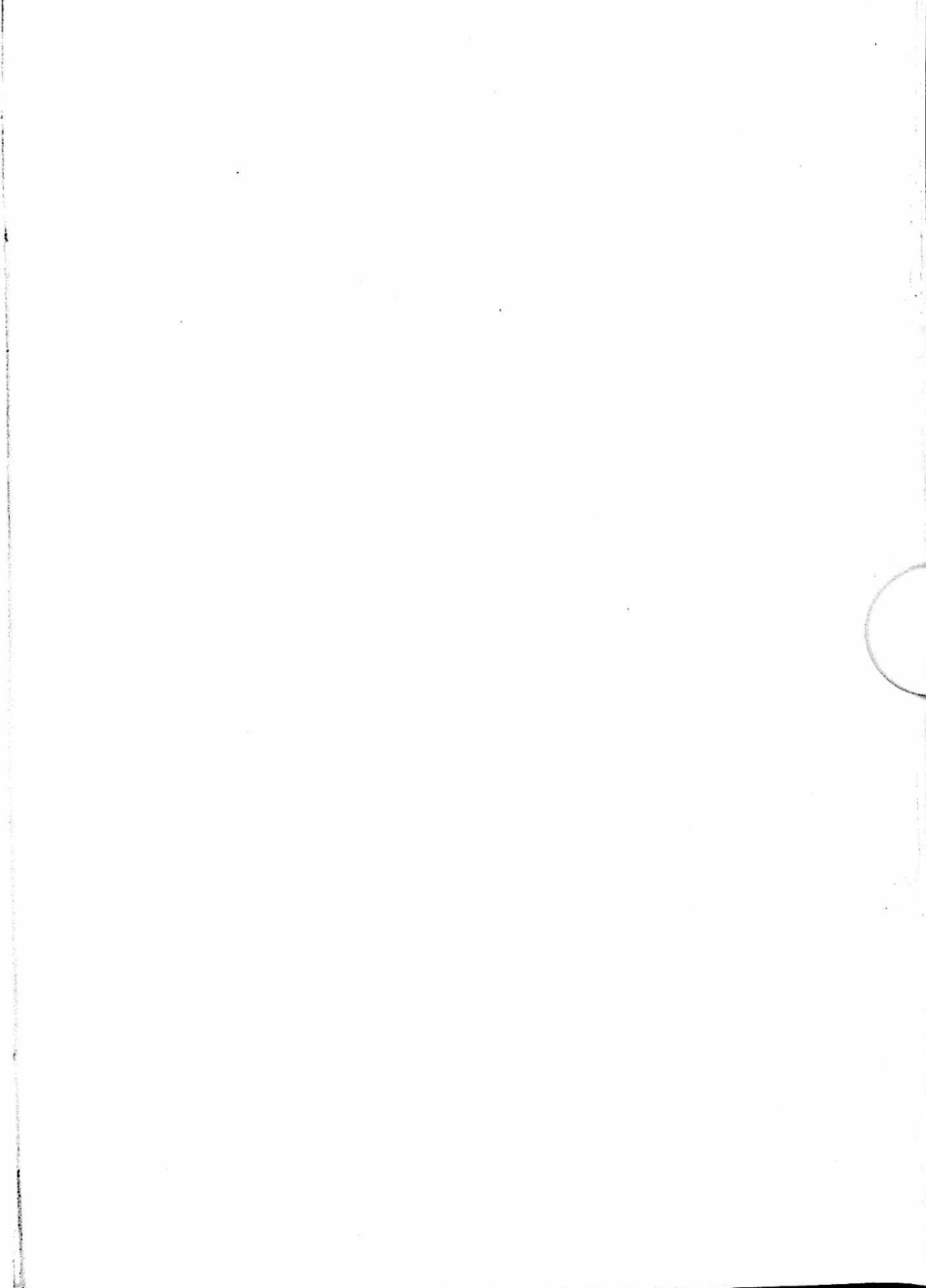
402

注釋

419

索引

449



印刷書的誕生

L'Apparition du livre

(The Coming of the Book)

編輯弁言

書中以楷體呈現的括弧內文字，為譯者與編者所加注解。

本書中文版是根據英文Verso版翻譯：·*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Verso Classics, 10)*. Trans. David Gerard. London: Verso, 1997, reprinted 1998.

翻譯工作進行期間，承蒙輔大歷史系王芝芝老師與科樂印刷江瑞璋先生協助，謹此致謝。另外，書中法文部分感謝賴怡妝、程鳳屏小姐協助；拉丁文與希臘文部分感謝葉偉忠先生協助；並感謝輔大圖書系蘇精老師，針對譯文裡某些名詞翻譯給予編輯的指教。

前言

馬爾坦

一九五三年，費夫賀邀我參與此書編纂。他把著述計畫，和以下的序言內文讓我我知道。我們決定，先由我寄初稿給他，再由他著手修編、補充。一九五五年十月，我將第一、二、四章，與第五章前兩節的手稿寄出，而他也完成校訂，文章始具雛形。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又把第三章、第五章結論，與第六、七章的初稿交出；他在初閱過後，曾口頭表示認可。當時他有意校畢全書，豈料天不從人願，竟逝不逢時，本書的續成，我自然責無旁貸，只是從此少了他的奧援。或云本書由我一人完成，但他的名字，仍應印於書首，畢竟本書發想於他，靈感亦來自他。謹以這種方式，將此書獻給他，聊表敬意與懷念。

一九五七年十月

作者序

費夫賀

一四五〇年前後，一些不尋常的「抄本」出現在西歐的北部地區。雖然其外觀與傳統的手抄本相去不遠，字跡卻是利用印刷機器的技術，以活字「壓印」在紙上，有時也壓在羔犢皮上。印製的過程固然簡單，卻還是令人相當好奇，甚至驚嘆。事實上，這種新一代的書籍，不僅為思想的習慣帶來深遠變化，也令當時最重要的讀者群，即教會與俗世的學者，得享全然不同的工作環境。不多時，這種改變（我們且不以革命稱之）突破了這群早期讀者的象牙塔，並衝擊了其外的世界。今日的研究宗旨，在於探索這種改變與其前因、後果，並指出印刷書如何實踐手抄本不會也不能實現的成就，仔細分析箇中原因。倘若本書不叫做「印刷書的誕生」（法文原版書名 *L'Apparition du livre* 之意為「書籍的出現」），或許「書籍的歷史之用」也算是貼切的書名。

請不要誤會，本書所言或與諸君的認定不同。我們無意編纂或重寫一部印刷史：如果只是將此一課題的基本工作再做一次，重複諸如摩爾帖《印刷術起源與肇始》的研究，也沒有什麼意思。諸君大可這樣認定：本書作者已然通曉書的歷史（至少在今人已知的範圍內是如此），並明白自摩爾帖以降的印刷史研究，難免有些投石問路的意味，且愈早期的作品愈是如此，有時候還頗嫌不足。是以本書並不會冗長地解釋印刷術的發明，也不會重複一些老生常談，討論某個國家在印刷領域的領先地位、某位印刷大師如何比其他同業更形重要、某人在印刷的出現上應居何

功，或是最早的印刷品由來爲何。關心這類問題的任何讀者，如欲跟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已有各種傑出著作可供參考。但，出版一本那樣的書，並不是我們的初衷之一。

相對來說，書籍在西方社會裡，算是後生晚輩。它從十五世紀中葉起，開始爲人類服務，如今則因爲各種新發明基於不同原理紛紛面世，其前景受到威脅，難以預測。究竟它滿足了哪些需求？承擔了怎樣的角色？實現或未能實現的目標有哪些？它誕生於一個充滿變遷與過渡的創新年代；所有現存的文明，都曾歷經這個時期。在書籍問世之前不久，火藥與攜運式槍砲的發明，引發不少動亂；同屬十五世紀人類的工具，火器與帶有和平色彩的印刷機器，蔚爲對比。往後推演數十年，人類對世界的地理認識方才擴張；一四九二年起，偉大的海上探險，帶領歐洲人一窺過往不曾發現的遼闊大陸，而在那之前，十三世紀阿奎那時代所知的世界，範圍並不比二世紀的托勒密大上多少。印刷成果的濫觴，不僅早過地理大發現，也早過地動說的提出。前者積極地發展成全新的空間認知，營造出一種饒富系統的觀點，迎合了西方人近五百年的擴張需求；後者則由波羅的海沿岸一位精通天文學的修士推算而得，爲往後數個世紀裡，令人類早期世界觀自慚形穢的種種發現開啓先河。就這樣，印刷書在當時林林總總的根本變化裡，扮演了它的角色；但這些變化並非全發生於一朝一夕，也並未在一開始即展現累積性的影響。若我們不能領會這些多少受到印刷術影響的、各形各色的創新與發現，焉能了解它們對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人們來說，有什麼意義？

換言之，我們試圖釐清，印刷書所代表的，如何、爲何不單只是技術上巧妙發明的勝利，還進一步成爲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將多位代表性思想家散布於各地的理念，薈萃於一處。它對

研究的重大貢獻，在於將某人研究的成果，直接傳遞予另一位研究者，並以省時、方便，既不費力也不昂貴的方式，將所有領域中最卓絕的創造精神，恆久地融於一爐；如此貢獻，經過十九世紀米歇列的妙筆敘述，愈發令人印象深刻。透過知識的匯聚，書籍彷彿為前述理念帶來新生，為其注入無可匹敵的力量與活力。這些新理念不僅獲致一以貫之的新軸心，並基於同樣理由，得到改革與倡導的強大能量。在極短的時間內，新的概念傳遍了全世界每一個語言不致造成隔閡的角落。書籍創造出思想的新習慣；這些習慣不獨存在於博覽群經者的小圈圈裡，更遠遠地向外延伸，擴及每一個懂得思考的有智之士。簡單地說，我們希望證明，印刷書乃是嫻熟寰宇知識的最有效途徑之一。這也是本書的目標，與我們期許能帶來的新創見。

一如既往，我們必須先解決一個重要的前提問題：本書所述應當如何編排？探討的課題又該如何設限？我們不會根據人為區隔的日期，從事有欠成熟的細部畫分，一如那種用來應付小學生的東西：「所謂中世紀，結束於哪一年哪個月的哪一天？」（或可把這個問句改寫如下：「在中世紀一詞的發明者心中，這個僅僅為了教學方便而存在的抽象智識概念，是在哪一天開始、哪一天告終？」）為避免在相關的爭議上浪費時間，我們建議，應當檢視印刷書在問世之初的三百年間，其影響與實際重要性為何；這段時期始於十五世紀中葉，終於十八世紀末，處於兩次歷史氣候的大變化之間。開頭乃是一個智識、社會與經濟盡皆劇變的新時代，並在歐洲人的心智、態度與行為上，留下深遠的影響；米歇列欣然呼之為文藝復興。而在這段時期的結尾，我們面對的是另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又一個騷亂的年代；在一連串經濟與社會的劇烈變遷中，政治革命迭起，

導致了文化領域的文藝革命，並在浪漫主義的旗幟下，進一步激發新的觀念與情感。最後必須補充的是，這固然是另一個感性的時代，表現在基督教精神的中興（宗教革命），以及追尋社會改革願景的激情（政治革命）之上，我們卻不可或忘：現代工業，在時人所謂的普羅大眾之中，造就出一種階級意識，驅使人們採取行動，並實現自身的需求。

一個時代的結束，意味另一個時代的開啓。菁英社會的式微，就是大眾社會的契機。無可避免地，印刷術也捲入了更進一步的深遠轉變；因應新的需要，服務新的客戶。是以機械化取代了老舊的手動印刷機，而在工匠與技師之間、傳統印刷鋪與現代印刷廠之間，對立油然而生。接下來，一系列的新發明迅速問世，大幅提升了所謂印刷事業的顛覆性。印刷機器逐漸進入一個新的產業，而後很快地發展成書籍產業。印刷廠幾經尋覓，發現一種有別於人力的驅動力。一八〇三年到一八一四年間，柯尼格發明了三種機器，成爲現代印刷廠設備的原型：靠動力運轉的平板印刷機、停輓式印刷機，和二回轉印刷機。而早在一七九一年，裝有自動上墨滾筒的輓式蒸氣印刷機，其原理就已由英國人尼寇森完成構思。這些發明，當然大幅加速了書籍的生產，也爲印刷世界中較晚近的產物——報紙——預先鋪路。講到報紙，則無疑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見證印刷術對廣大讀者吸引力最典型的例子！社會的大幅轉變，造就了前述所有的發明；而這些發明，也回過頭來刺激轉變的進一步發展。

這一整個時期，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持續了四百年之久。我們該如何細分這段歷史？哪些標準，才是我們應該採用的？

倘若這本書寫的是印刷問世之初三百年的歷史，我們就不得不依照印刷科技發展的不同階段，來畫分本書的章節。即便如此，這樣做能不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我也不敢斷言；畢竟，就算令十五世紀的古騰堡死而復生，並造訪路易十六時期的法國印刷廠，他可能也會認為，一七八七年所使用的印刷方法（安布拉斯·迪鐸一世，即迪鐸家族的第二代，幾經嘗試，在那一年裡設計出可以一次完成整張紙印刷的機器），與自己生前在店裡所使用的，差別並不大。只是，一如前面所言，這本書敘述的，並非某項技術的沿革。我們探究的，在於社會上觀念交流的新方式，對歐洲文化帶來何種影響；而歐洲的社會，本質上又是貴族統治的社會，在印刷術發明前後，始終謹守一種長期的文化與傳統，認定學習是某些社會團體獨享的權利。對這類相當具有局限性的團體，我們姑且以前述的菁英稱之，暫不考慮這兩個字在意思上的含糊與籠統。除卻皇親國戚，菁英也包含那些腰纏萬貫、政治地位顯赫，或智識成就斐然的人士。印刷書如何鞏固這些人的統治、促進這些人的活動？它如何保存了十一到十五世紀間，前人所累積的道德、宗教、文藝遺產？它如何形成傳統的連續，將古騰堡時代的人，與希臘、羅馬、早期基督教會等三大古文化連接貫通？反過來說，有時歸屬於文藝復興、有時歸類於人文主義的各種新觀念，在倡導的過程中，書籍扮演的推手角色，究竟有多成功？印刷事業如何服務天主教與新教這兩大教派，甚或是其他的支派？它又如何先後協助不信基督的自由思想論者、理神論者、無神論者，乃至於最後的唯物論者，反擊神啓宗教？此外，哪幾種文學形式，對書籍的散播出力最多？又是哪幾種為其所抗拒？書籍的實質格式，如何協助拉丁文與各地方言對抗，並存活下來？又或者，如何協助各地方言和古老尊貴的拉丁文對壘？凡此種種，不須贅述。像這樣的一本書，絕不輕言認可任何（位

於社會結構的基本框架之內)的區隔，除非這些區隔，能協助解答本書所關切的問題，並增進讀者對問題的理解。

就我們所知，這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沒有前導指出風險何在，歷來亦無人獲致我們想要的結果；這麼一來，在啓程之前，寥置數語實有必要。至少，我們試圖寫出一本讀來不致太枯燥的書，並期盼諸君至少會在閱後認同：我們的結論，脫胎自可信的數據，而我們所探究的，前人並不會在研究中歸納或評估。

手抄本

托馬*

本書所言既是西方世界的印刷演化，或應在進入正題前，簡要回顧手抄本的歷史角色，畢竟它是許多世紀以來，表述觀念的唯一書寫媒介。本文無意細數手抄本的歷史，那得用一整冊書才講得完。此處所言，僅著重於十三世紀中至十五世紀末，手抄本的生產如何因應需求而形成，並指出，到印刷書問世、新階段肇始為止，手抄本試圖滿足的需求究竟有哪些。

長期以來，歷史學家多將西歐的手抄本演化史，區分為兩個時期：即「修院時代」與「俗世時代」。這兩個詞彙通行於學界，知悉相關課題者亦不陌生，唯其精確程度稍嫌不足；即便如此，它們所表述的事實卻是無庸置疑。從羅馬淪亡到十二世紀的七百年光景，修道院與其他相關的教會機構，獨占了書籍的生產，從而獨享書的文化。而這一現象的深遠轉變，確實也是從十二世紀末開始發生。社會與智識上的變遷，明確地反映在大學的創建，與非神職人員的學習發展上；另外，中產階級也在此時出現。這些變化，深刻地影響了當時書籍謄寫、複製與流通的方式。

*本章作者托馬為法國國家圖書館手抄本部門專業管理員。

這篇簡短的研究報告，並不包括修院時代；許多晚近而傑出的手抄本研究，已然對該時期所著墨¹。本文的宗旨，在於闡明新的組織架構，自十三世紀以降，如何盡可能地滿足愈來愈多客戶針對書本提出的新需求？（與此題目相關的許多問題，迄今仍未解決，故此處僅就現存證據所及，加以敘論。）

欲將各地的手抄本生產中心，絲毫不差地條列出來，或者提出某個特定時間裡，某特定地點的產量細節，確是窒礙難行；但我們至少能對十三、十四、十五世紀間，書本是在何種狀況之下製作、傳布，做出相當準確的概述。本文不會摘述手抄本演化歷程中，最為重要的數個特點，而僅就製書人開始採用大宗印刷的新技術之時，既存手抄本的進展與情況，加以描述。

若我們暫時把書本在呈現、裝飾方式的改變擱在一邊，則在俗世時代裡，技術上的進步都是小幅度的。除了有一項革新，不但方便了書本的大量製作，更促使價格降低，在此不得不提，那就是紙的引進。紙並沒有取代羊皮，而是彌補其不足，並讓另一種較不昂貴的書本誕生，使有別於傳統、奢侈的手抄本；唯兩者間的價差有時並沒有想像中大。紙同時也讓書本生產的數目比以前更多。

本書稍後的章節，會對紙張與其發軔於歐洲社會的過程，簡單地介紹，屆時我們當可明白造紙術如何促成印刷的實現。單就手抄本而言，紙張勝過羊皮之處，除了前述的低成本，與產量不受限的可能性之外，再無其他優點；至少理論上是如此。跟羊皮比起來，中世紀的紙不但脆弱，表面較粗糙，滲墨性較差，彩飾師傅（illuminator，以工筆紋繪花樣或細密圖，裝飾頁面或大寫

字母的匠人，與插圖畫師（illustrator有別）的染料也不容易吸附其上。紙張固然有重量較輕的長處，但這個差別也不如想像中大；畢竟，在十三世紀，就已經能做出細緻的薄羊皮，同時期的紙張反而更厚些。舉例來說，當時的小本《聖經》，得力於羊皮師傅與抄寫員的技術合作，實際上比德薩克的現代譯本上下兩冊還輕巧些。不可否認，現在要閱讀當時的手抄本，不但需要好眼力，還得花點時間才能適應其筆跡。但無疑的是，這些小本《聖經》的小巧輕薄，甚至勝過一些較著名的早期《聖經》印刷本；便於攜帶的印刷本《聖經》，得到十六世紀才面世。

雖然紙張的主要優點是低成本，且至十五世紀產量即勝過書寫用皮革，但要拿它跟羊皮、羔犢皮（羊皮 parchment 與羔犢皮 vellum 是兩種不同等級的皮革，後者由幼小的羊、牛皮製成，品質與等級通常較高）確切地比上一比，亦非容易之事。我們手上有許多手抄本，提及當年羔犢皮的價格，也有許多羔犢皮、紙張的採購紀錄。（通常是皇室的紀錄）；但其中的詞彙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未必都清楚。羔犢皮買賣的單位，大致說來有一裏（通常指一打半的全皮）、一打、單塊全皮，或所謂的疊（法文字 carlier，與之後裝訂的單位「帖」是同一個字）；把皮革裁切、摺合，成爲包含六或八張書葉（正反兩頁 [page] 構成一張書葉 [leaf]）的小冊，即成一疊。一旦紀錄中出現「疊」，就無從得知其尺寸，連頁數也難確定，如此自然無法論斷其成本多寡。

十四世紀末的巴黎，書寫用獸皮的價格在十二到二十德涅（查理曼大帝仿造古羅馬銀幣 denarius 制定的貨幣單位）間波動。一塊獸皮的平均面積爲二分之一平方公尺，十到十二塊才夠做成一本二百五十張書葉，每張長二十四公分、寬十六公分的書；這是十四、十五世紀手抄本的典型尺寸。這樣一本書的原料成本，至少十蘇（法國古幣，一蘇可兌十二德涅），至多二十蘇；

這還不包括四到六德涅的處理成本，即將表面鬃毛與其他污漬去除以便書寫所需的工錢。不過這些數字只是個大概，因為獸皮的品質、可得的材料與工具，與成品販售的地區，都會左右價格高低。在巴黎，於北郊聖但尼舉行的蘭迪市集，是羔犢皮交易的重要中心。

我們時常聽說，當時製作一本書，需要犧牲數量驚人的羊隻與犢牛；關於這點，只消簡單地計算，就可以推翻。然而，即便是當今的學界，仍然重複這種舊有的誤解。舉例來說，二十世紀的湯姆森就曾援引一三二四年英國克雷爾伯爵夫人的命令，聲稱製作一本《聖人傳》需要一千塊以上的獸皮。如果用現今一塊獸皮兩便士的價格計算，光是把謄寫用的皮革買齊，就得花費約六英鎊之多。但實際上呢？考察後就會發現，若將《聖人傳》謄寫在二十五公分乘以十六公分的頁面上，每頁文走兩欄，不論是原拉丁文本還是當代翻譯的法文本，都只需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張就可以抄完，頁面總面積不會超過六平方公尺——頂多一打獸皮。

大約在同個年代裡，國庫的紀錄⁴顯示，一刀（二十四或二十五張紙，其定義為「令」的二十分之一）約五十乘三十公分見方的「小張」紙，大概值兩索六德涅（索與德涅皆為法國舊貨幣單位，索的幣值等同前文出現過的「蘇」，一索可兌十二德涅）；如以一張○·一五平方公尺計，價格大約是一德涅半。至於羔犢皮，○·五到○·六平方公尺的一塊皮，包括去毛與其他處理工作，至多索價二十四到二十六德涅。兩者的價差不可謂小，但要說這點已足以令紙張占得上風（一如前人曾經認定的），只怕還差得遠。事實上，十五世紀之前，紙張的優勢似乎仍嫌不足；或者，當時銷售的紙張數量可能不夠多，還無法取代羔犢皮。

不過，羔犢皮的供應在當時是否充足？無論在法國也好、英國也罷，從十四世紀下半到十五

世紀上半，它的價格一直都相當穩定，而書本的製作卻快速增加，似乎證明了該種原料並非稀有的商品。如果對當時的牲口，尤其是羊隻，加以研究，了解其數量是否隨之增加，想必是個有趣的題目。但至少我們知道，三百年後，法國每年約有超過十萬裏、每裏四十塊的羔犢皮出售；當時羔犢皮已不再廣泛爲人所用，僅爲複製法律文件與某些工業用途而生產。

當然，這種種的事實，並不意味沒有了紙，印刷仍可照樣發展。就算一張羔犢皮可以快速地通過印刷機，印一批最小開本的獸皮書，也得花上數百塊的皮革才能印完。較大開本的書，則可能需要上千塊皮。二十世紀的魯波，曾經算過：若把古騰堡《聖經》印在羔犢皮上，需要一百七十塊皮（單頁四十二公分乘六十二公分，共三百四十張）。這麼一來，三十餘本《聖經》印完，就得耗去五千塊皮。同樣一百本印刷在紙上的《聖經》，改用羔犢皮印製，需要一萬五千塊獸皮。由斯觀之，我們不得不驚嘆：在十五與十六世紀，竟出現這麼多印在羔犢皮上的奢侈書籍，雖然其中有不少是小開本的時辰禱書（中世紀極爲盛行的一種個人祈禱用書，內頁裝飾豐富；內容常包含天主教日課經文，以及日曆、禱詞、讚美詩等等）。

俗世時代的修道院，繼續因應著自身的需要，謄寫手抄本，這與修院時代的光景無異。修院團體的規定，每天必須從事數小時的智識工作，抄書則是此間重要的一項。院內的繕寫室，遵循古法組織的作業流程，持續地生產教材與教會儀式用書，直到印刷術令手抄本變成歷史名詞爲止——事實上，在印刷術發明後，修院仍舊以謄寫方式複製彌撒經本、答唱詠與每日頌禱，這樣的情形一直到十六世紀才告終止；這不僅是基於傳統，也是因應需求。這個開展於十三世紀初的

新時代，其最顯著的特徵，在於修院不再是各式書籍的唯一生產者，爾後除了修院自身需要的書本之外，幾乎不再抄書。

從那時起，智識生活的中心，開始移往修院之外；在大學裡，學者、教師、學生，與工匠和技師通力合作，造就了井然有序、活躍非常的製書業。

偶爾，某些特別精於傳承書法與彩飾藝術的修院，也會在君王或貴族的要求下，製作豪華手抄本；比起法國，此一風氣在英國延續較久。豪華手抄本的銷售，原屬修道院的收入來源，但這項服務日後愈發罕見。十五世紀聖艾德蒙莊園的僧侶詩人李德傑算是少數例外；他將自己以英文創作並謄寫的抄本，售予尋常的俗世讀者，直到一四四六年過世方休。

新大學的創建，催生了新的閱讀群眾；這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初，甚至十二世紀末。不可諱言，這群新讀者仍以神職人員為主；但是，只要這些人仍在大學校園內服務，即與自己的學院與母校密不可分，而非從屬於教會團體。

教授需要文本，方能授課，工具書與注疏作品亦不可免。中世紀的教育中，研讀既有權威作品的詮解與評注，至為重要，且在每個學習領域皆然。如此，則必須在手邊備妥相關書籍以方便參閱，而大學也必須設立圖書館供人查詢。只是，既有的文本未必都能獲得；因此大學有必要聘雇專業的抄書師傅，並設立抄書坊，將重要文本迅速而價廉地複製起來。

在校園以外的圖書館，還是經常可以找到罕見、有用的書籍，是以它們的收藏，同樣是大學抄謄的對象。中世紀時，書本的出借已經行之有年；包括修院與神職團體等教會組織，對於捨不得售予新設大學圖書館的非賣品，都願意暫時外借。

口頭授課固然重要，但學生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的參考書。中世紀的教育方法，想必相當程度地鼓勵課堂筆記與熟讀強記，但就算學生在多數情況下，皆以手腦並用的方式吸收課業，基礎的書本仍舊不可或缺。假如他們自己沒空抄書，也沒錢聘人幫忙抄書，他們可以向專業的抄寫員訂書；在各所大學裡，這樣的抄寫員與日俱增。於是乎，在每個大學城裡，都有書記行會（即同業公會）或「書賈」行會成立，成員以神職人員為主，但也常常包括在俗人士：書商（booksellers）多為後者，書記則通常由神職人員擔任。他們同樣納編於大學的職員分支，同享若干優渥待遇，尤其是減免部分稅捐或免除衛哨差役。從十三世紀開始，還陸續享有接受大學法庭審判的特權，即所謂指定受審權。

享有特權的代價，就是這些書商、抄寫員與「書賈」（stationer，此名詞出自古代典籍，由義大利的大學率先恢復使用），必須接受大學的嚴密管轄。他們是學者團體的僕人，受其庇蔭，但不若一般的工匠享有自由、為自己工作。其勞力接受管理的方式，彷彿不時提醒著我們，他們所做的，就是「供人差遣」。

透過眾多文獻，尤其是二二七五、一三〇二、一三一六、一三二三、一三四二等年份的紀錄，我們得以清楚地了解他們的職責究竟為何。他們得先通過初步面試，確認其名聲良好並具專業能力，方獲任職；他們還得完成切結，並在大學主管的面前起誓。一旦獲派，其職責不但嚴格確立，活動也被控制。至於所謂書商，與其說是零售商，倒不如說是書本的保管者。正因手抄本稀有而珍貴，學生與老師們，一代接著一代地轉售這些書本。書商便在這樣的二手書市中派上用場，除了擔任書本原有主人的代銷人、仲介商，不涉其他業務。他必須提出財產擔保，保證自己

的周轉無虞，方能得到任用；此外，何時可買、何時該賣，亦受若干條件限制。他有義務將庫存的書名公告周知，無法冒稱某書匱乏而哄抬價格牟利。其酬勞給付，按固定的佣金比率行之；如果買方是校內學生或教師，一本書的索價不得超過四德涅，就是賣給外人也不能收取六德涅以上。

除了賣書或仲介書籍交易的書商，還有所謂「書賈」；這群人的角色比書商更加複雜，但在德斯特雷神父稍早的出色研究之後，其功能終告明朗。舉凡手抄謄本的「抽頭」機制、「範本」流通的制度，以及將書本拆成不同部分的散裝出借規矩，都得歸功於這位神父，才能讓現在的我們有較為細部的認識¹⁰。

爲了從智識面與經濟面，適切地控管書本的使用，大學的主政者要求，應縝密檢查所有重要著述的文字正確性，不允許任何疏漏或錯誤導致意義上的扭曲。爲確保內文一字不易，並防止抄寫員賺取不合理利益，謄本的複製必須在最佳條件下進行；基於這個目的，各大學設計出一套精巧的制度。出租的手抄本，事前必須經過細心地檢查與校訂；而後，謄本才能照著抄寫，並依固定的税金或「抽頭」來收費。抄謄完成後，原冊，或稱「範本」，即歸還書賈，再借給其他人。採用這個方法，則所有的謄本皆抄自同一原本，當可避免內文的錯誤，更不至於以訛傳訛、愈抄愈離譜。只要研究過古代文本的抄錄傳承，自然明白這麼做的好處。

書賈的責任除了複製抄本，亦得將謄本內文或範本出租，供學生自行抄寫，或交由合格的抄寫員代勞。不過，每次租出的並非一整本書，而是分成數帖，一帖一帖借；這樣一來，就能同時讓許多抄寫員，抄寫同一手抄本的不同部分。每一帖的租金皆由校方公定，書賈不得自行調漲。

此外，他們有義務借給任何有意抄謄的人。至於那些有問題的範本，一經發現即行抽回，不再出借。此許流傳至今的範本，多以較大的筆跡寫成，且因經常使用而破損不堪。也因為這些範本皆遵循統一的標準製作，抄寫員究竟抄寫了多少分量的內文，遂有較可靠的核算依據；這項優點，讓獲准執業的抄寫員，更容易在酬勞上與客戶達成共識。

這套系統，是爲了文本的複製而建立，且一直沿用到中世紀告終。舉例來說，在巴黎，印刷術便是在這樣一個組織的架構內引進，由大學資助、主導。對大學的主事者來說，印刷機不過代表一種便利的新方法，用以複製必需的文本，且比散裝出借制度更能實現迅速、精確的理想。

後文將會提到，巴黎的第一台印刷機，與其說是爲了印刷經院學者的大學基本典籍而設，不如說是爲了大量供應古代作家的經典作品；以純正拉丁文寫作的散文範例，尤其搶手。至於一般的需求，似乎多數仍以散裝出借制度來支應。其實，早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抄謄工坊的發展成熟之前，亞里斯多德的拉丁文作品就已經傳遍歐洲：“時至今日，十三、十四世紀的亞里斯多德作品謄本，仍有超過兩千本流傳下來。如果我們把失傳的謄本也列入考慮，則地位像亞氏這般極爲重要的作家，其作品顯然都能在當時廣爲人知；就算這樣的思想傳播仍嫌緩慢，至少也是效果顯著的。至於記憶力在此間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當時的教書方法如此，記性不得不培養。其實，即便是現在，一個年僅十二歲的回教小孩，都應該有辦法背誦完整篇《可蘭經》；我們只是少見多怪罷了。

話雖如此，要把研究所需的所有書本，統統集合起來，在當時仍是難事。在德佩斯雷籌備翻譯《上帝之城》的過程中，他爲了注釋的編纂，蒐集了至少三十冊手抄本，與兩百多種不同的作

品，藉此盡可能提高其譯本的「重要性」¹²。不過，出自某冊十四世紀手抄本的一條備注，卻見證了過程中找尋某個文本所遭遇的困難：「我付給代筆的抄寫員十四索，給了旅店老闆十德涅；在旅店裡替我找到範本的人，也拿了兩索。」其中，爲了答謝那位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書而通報他的人，所支付的賞金，令人聯想起十四世紀《書之愛》的作者理查·德布里，爲蒐羅書籍而奔波。然而，對於十四、十五世紀治學之人的難處，也沒有必要誇大；這不過是因爲在印刷術普及之前，文稿過於稀有使然。關於十五、十六世紀藏書情況的現存資訊（參見第八章第二節），當令我們對此一情況的改善，有所了解。

在大學採行了新方法，並盡可能地供應所需的「學術」作品之餘，大眾、娛樂性的文學讀物如何生產，仍然是個問題。在十三世紀末葉，一批新的讀者興起，封建社會亦同時歷經緩慢、逐步的改變。中產階級正在成形；他們發展文藝文化的潛力，與既有的貴族、教士相比，並不遜色。舉凡律師、法庭的非神職顧問、政府官員，以及稍後出現的富商、鎮民等，盡皆屬之，且都有閱讀的需要；除了與本業相關的法律、政治、科學書籍，他們還需要文學書、道德論著、浪漫小說與翻譯書。這一類的著述題材，可不是爲了神職人員而寫的；倒是這些書的作者，有時卻是教會成員，且通常以方言寫成。很快地，原創的文學作品（起先多爲韻文，而後出現散文）、過時著作的改寫版本，乃至於拉丁文鉅著與中世紀經典的翻譯本都已經開始生產。要讓這些新書流通，並滿足日漸增長的讀者群所需，則書本生意的重新組織，也就勢在必行了。

所有關於法國文學史的著作，都同意法語在十二世紀時已然通行。但文字作品傳布的方式，

卻又是另外一回事。當時的文學，主要是爲了在聽眾面前朗誦或宣讀而作；畢竟早年的讀者數量不多，不足以支持其他形式的公開發表。在這種條件之下，傳統文學的一大部分還能繼續發展，似乎已令人相當詫異。雖然當代的文化中有許多類似的例證，但我們仍然因爲受到了書寫文化徹底而深刻的影響，頗難想像口語文化要如何代代相傳、歷久不衰。也許，新興於我們這個年代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電影等，更能讓我們體認，觀念與著述的傳遞，不是非透過印刷媒體不可。

十一與十二世紀期間，供人閱讀的文字鮮少以方言寫成，但許多口說的文字作品卻是以方言創作。法拉爾¹³就曾在著作中，有力地描述了吟遊詩人如何在旅程中造訪一座又一座的法國城堡，吟唱、朗誦著詩詞、浪漫故事，與聖人傳略。這些多用韻文寫成，以便背誦；而他們的詩歌，常是自己的創作。諸如作詩者、作歌者等別稱，揭示了這些人身爲文學創作者的角色；在另一方面，所謂的抒情詩人，則隸屬於單一的望族，爲領主及其家族服務，爲他們吟誦詩集裡的作品，或自己寫的詩。早期的文字工作者，在受限的環境中發揮其才學，這點也引發了若干微妙的難題。一般說來，這些作家不可能對自己的作品有任何著作權，除非他們不容別人掠美，不讓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獲悉創作內容。倘若他們選擇藏私，反而無緣得享每位藝術家無不追求的成就感：公開自己的作品，讓愈多人欣賞愈好。這兩個相互衝突的需求，依創作者個人的物質需要而取捨，方能兩全。最佳的解決之道，則是參酌古羅馬作家的做法，找一位贊助人；創作者將作品獻給他，並視需要於詩中奉承這位金主及其家族。找不到贊助人的話，他也可以把詩作跟歌謠，逐字教給其他的吟遊詩人賺取酬金，或把詩本、歌本賣給他們。

一如我們所知，到了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更專門的閱聽眾誕生了；更廣大的一批群眾興起，其中有讀者也有聽眾。此後，創作者不再煩惱如何將作品公諸於世，得以專心創作或彙編他們的詩歌。但最確定的成功途徑，仍是依附於贊助人。只要能說服某位君王、王儲或皇親國戚接受其詩歌禮讚，並奉上豪華版謄本，作詩人不僅有極大機會獲得物質報酬慰其勞苦，更可能欣見一己作品大為風行。時尚風潮，多自上流勃興；鄙賤趨貴，更是古今皆然。如果大眾知悉某個翻譯本，獲得法國國王垂青，甚至是奉其諭旨而譯，則幾乎可以確定，此一譯本必定洛陽紙貴，作者也得應外界要求而提供更多謄本。此時，作家可以聘請一位抄寫員，從原稿另抄一謄本，委其擔任自己的公開發行人。舉例來說¹⁴，十四世紀的薄伽丘就曾將自身近作的豪華版謄本，贈予其友人卡巴坎迪，並在附上的信件中，表示這份謄本完成已久，卻一直在他身邊，只因爲他不知該把作品獻給誰。最後，他將謄本寄贈友人，希望朋友在讀完之後，能讓親戚們一同分享閱讀之樂，再看看能否於海外「出版」。事實上，贊助人的另一項作用，似乎就在促成發行，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薄伽丘在將《論知名女性》題獻給文霞胡莉之餘，曾如此寫道，可爲明證：「若妳認爲拙作尚堪公諸眾人，惠賜勉勵之語，一旦其遠播海外，咸信在妳的庇薦下，必能免於妒忌者輕。」

至於更重視物質利益的作家，自然可以留存一份謄本內文，由此製作更多謄本求售；也有些作者親自綜理所有關乎公開發行之事，蒙斯的渥克林¹⁵即爲一例。有時作者會起用代理人或書商：尚高廉便在譯完十三世紀杜朗的《聖事論》後，將譯本售予書商德特雷伍，授權此君「以自身名義，代表尚高廉先生」轉賣給奧爾林公爵的男僕，好獻給他的主子，時爲一三九五年。這個

譯本乃是二十年前，尚高廉爲查理五世所譯¹⁶。

十四及十五世紀，贊助人制度廣爲流行；至少，用這種方法催生一件新作，不成問題。這解釋了爲何作者的作品初版或餽贈贈本，有時能贏得國王或王子高額の酬賞，但此後製作的贈本，賣得的價錢卻低上許多，就連豪華本也不例外。從當時的經濟觀點來看，初版的問世，意味作者已將著作權行使完畢，即便只製作一部贈本也一樣；至於爾後，作者對作品即不再握有權利。於是乎，在某種程度上，贊助人制度便讓文壇人士得藉搖筆桿來謀生；作家爲此付出的代價，就是不管發表什麼，都不能讓贊助人不悅，而面對日益增加的閱眾，還得同時投其所好¹⁷。尤有甚者，直接依贊助人命令製作書本的情況，也頗爲頻繁。查理五世便是一例，受他獎賞的譯者多達數人。當他基於政治改革的目的，要求諫臣與官員研讀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經濟學》與《倫理學》時，他便命令奧雷姆翻譯這些著作；自一三六九年開始，至一三七二年譯畢¹⁸。

一旦著作完成，並將「初版」獻給贊助人，不論書本是依金主吩咐作成，抑或由對方當成禮物收下，稍後的公開發行，則由抄寫員與書商來安排。這個過程的早期階段，作者至少還能參與；至於兩造通常在何種條件下達成協議，目前尚無清楚解答。相較於上個世紀的吟遊詩人，當時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大的金錢動機來促成自己的作品儘快發行，因爲只要書一出，就不歸他所有了。但反過來說，他也不願意繼續地籍籍無名下去。他必須在這兩個相對的利益之間斟酌、拿捏。

對於大學以外的書本生意，我們所知甚少，但我們知道，大學所任命的書商，還是可以私下跟個別的客戶做買賣，且這種時候不受相同規範的桎梏（我們如此推論，是因爲相關規範對此不

置一詞)。相當確定的是，法國從十二世紀末開始，英國則從十四世紀初開始¹⁹，便存在若干抄書坊，聘雇抄寫員、以當地方言製作書本；這些書本的販售，與今日的印刷書無異。

即便是保有專屬繕寫室的貴族成員，也會利用這種管道購書。像貝瑞公爵，除了經常向他收留、資助的藝術家訂購豪華本書籍外，也會向書商購買同樣高品質的手抄謄本。舉例來說，就我們所知，他曾在二四〇三年，自一位名叫杜蒙鐵²⁰的書商處，購買以散文寫成的《亞瑟王傳奇》手抄本。現存紀錄顯示，這本書不但購自書商處，而且不是在接獲命令之後才製作；這證明了當時雅好豪華本書籍的客戶群，已經龐大到一定程度，書賈即便不確定誰會來買，仍願以可觀的成本（該書售價三百金盾），預先訂製手抄本。客戶的增加帶來需求的成長，並促使抄寫員與相關匠人將生產方式合理化、分工化，以提高產能。

在此之前許久，修院的繕寫室裡，已然發展出某種程度的分工。一部分的僧侶專門抄書，其他的則負責工筆彩飾，各依專長分派妥當。但早期的抄寫員與彩飾師傅仍然並肩作業，工作時經常是不分開的。到了俗世時代，分隔式的工作坊愈來愈普遍，抄寫員同在一個房間裡作業，朱筆師傅（專以朱紅彩墨描繪標題字樣或大寫字母的匠人）可能在另外一間，而彩飾師傅又在別間。這麼一來，清楚可辨的生產線，漸漸產生雛形，參與其事的許多師傅，各自有著特定的任務。

發展至此，其他相關工作所需的原料，也鮮少在抄書坊裡進行加工。國庫紀錄顯示，新購得的羔犢皮，通常尚未經過任何處理，必須經由專業匠人之手，加以打薄、除毛以及漂白。每一項作業的工錢，通常分開來列帳。而在抄寫員謄寫完畢後，朱筆師傅便描上起始字母或章節標題。接下來，可能由另一位專門的工匠，處理必要的大寫字飾，或染色、或添飾、或紋圖。這位匠人

甚至不讀內文，故為避免作業延宕或遲疑，抄寫員會在應該添上首字母的留白處，刻上一個小小的提示字母，也就是所謂的「待飾字母」。這就足以證明，製書乃是分階段完成的。書頁的彩飾工作如須補強，接下來才會進行。關於這項工藝，歷來有不少深度研究；而我們長期以來對這種技藝組織的深刻了解，都得歸功於本書作者馬爾坦的探究²¹。不過，此處我們所解釋的，僅限於當時如何將分階段生產，引進這個領域，一如其他工藝的發展。

彩飾師傅的工作室，與抄寫員是分開的。後者除了抄寫工作，還負責將書本所需的插圖，提示予畫工知悉。抄寫員於空白處寫下的指示，在現存的手抄本上面，大都已經看不見，然而十九世紀的李歐波·德里斯雷²²卻找到了數個例子。這些指示似乎都很簡短——像是「教宗在寶座上」、「兩個僧侶」、「騎馬的女子」等等。然後，由首席畫工率先接手，決定畫中景物與肖像的細節²³。如果這不是什麼甚為昂貴的手抄本，他只消以鉛筆打個大概的草稿，藉此提點他的門生們把圖畫完，也就足夠了；這些門生對繪圖的規矩相當了解，之前亦經過上千次的練習。也就是說，十五世紀初期的彩飾師傅工作室，不僅能製作如「羅昂版」（即分封在羅昂地區的貴族所用者）那般偉大的時辰禱書傑作，也能大量生產平裝書；書中的畫風屬於哪位師傅，大致可以辨識，唯書本本身顯然還是廉價贍本。如果書本所採用的風格，需要特殊手藝的點綴，就算主要的手工完成了，仍然需要交由其他的專門工匠來負責處理底色；具體而言，這部分的工作包括打上金底（可能襯上圓圈或網點，也可能沒有），或是加上棋盤格紋路等。

正因為這種種作業的多樣性與複雜性，製作一冊書所牽涉的驚人工作量，常為史家所強調。

如此觀點當然有它的道理，但我們不宜以偏概全，認為製書盡皆如此。一件極盡華麗的作品，本身就是藝術品，其欣賞價值大過實用功能，且得花上數個月，甚至數年才能完成，價格更是不菲；貝瑞公爵是那個年代裡最重要的愛書人，他的名貴藏書大抵都是如此。可是，許多其他的書，譬如在十四、十五世紀的歐洲，到處都用得著的、不同版本的時辰禱書，無需傲人的財力也能負擔，且書中仍然不乏彩飾與點綴。這些時辰禱書的生意，幾乎都由某些特定的專門工坊所壟斷；更重要的是，這些工坊的分工精巧，省下不少工時，並因此促成了大量製作。法蘭德斯（位於現在的比利時、荷蘭、法國北部沿海一帶）即有這類工作室的存在。透過德萊謝的考證，我們得以知悉彩飾師傅如何替每個主要的宗教節慶（如耶穌誕生日、天使報喜日等），生產出相同、規則的圖樣，而抄寫員則把各教區各自的行事曆分別記下，這麼一來，不同教區的時辰禱書，其內容相同的部分，就能佐以一樣的節慶圖。

彩飾師傅爲了依單一原稿製作出許多份摹本，甚至發展出了最佳流程。根據本書作者馬爾坦的研究，從十四世紀開始，這些工匠採用一種以樹脂爲底的摹圖紙，藉此以單一的「草圖」或底樣，做出一模一樣的摹本。草圖原稿是種彌足珍貴的資源，是以彩飾師傅指控同儕竊占草圖，引發爭吵甚至鬥毆者，時有所聞。此種摹繪方法，並非僅限於時辰禱書的製作。法國國家圖書館裡，編號一一七/一二〇、收錄亞瑟王時代掌故的手抄本，正是從阿森諾爾侯爵圖書館的一份手稿複製而來。兩者的書葉碼（有別於頁碼）、插圖的主題，以及內文爲預留插圖空間而分段的位置，盡皆相同。萊夫亭克在荷蘭的研究結果，由薩瑪蘭於一九五五年的法國歷史學會議上發表之後²⁴，我們始對製書坊採用此法的產能表現，了解更深。萊登大學收藏的一份手抄本，裡面收有

一份作於一四三七年、名爲《八文士集》的作品集，其中便以法蘭德斯語提及，某人曾向製書坊的首席抄寫員訂購書本，且幾乎可以確定買方的身分爲批發書商。這筆訂單要求的謄本爲數甚多，其中包含的文本各不相同，但皆屬文學院用書的一部分：《聖詠集》懺悔七篇兩百本（天主教聖經中的《聖詠集》即基督新教所稱《詩篇》）、卡圖所著《雙行訓》的法蘭德斯譯本兩百本，以及祈禱小書四百本。如此龐大的數量，已堪稱真正的出版。

故從十三世紀中葉起，抄寫員面對與日俱增的需求，不得不改善製作方法；這就使得一些工坊的作業，與近代標準化的量產更加相似。利用散裝出借系統，他們成功地複製大學的教科書，同時也避開了以訛傳訛、重複錯誤的風險。透過大型工作室作業的分工合理化，工匠得以大量製作手冊、初階教科書，與文學書籍（名著翻譯、騎士史詩的散文版、宮廷浪漫故事等）。其中最常見者，莫過於中產階級家庭必備的信仰作品，因爲那是當時普遍的結婚贈禮。成書於一三五六年的《曼德威爾爵士遊記》，甚至在印刷成眾多不同的版本之前，已然廣獲傳抄，現存的兩百五十本手抄本，分別以不同語文抄謄而成：德語、荷語本計七十二本、法語三十七本、英語四十本、拉丁文五十本；至於西語、義語、丹麥語、捷克語、愛爾蘭語的譯本，更不在話下。這些謄本皆流通於十五世紀的早期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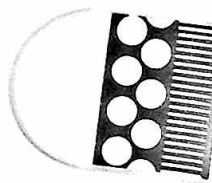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抄寫員與書記的工作，可謂替後來的印刷匠預先鋪了路。第一批印刷品出現的前夕，對書本的需求日見殷切，顯而易見；在新興的社會階級，即商人與中產階級間，尤其如此。十五世紀前半，這些新貴同時也是許多全新技术（鼓風爐即爲一例）的發明者與受惠者。論本

質，印刷術乃是技術發展的成果；其造成的影響和後果，在發展之初，實難預見。本書將於稍後揭示印刷如何誕生，並論及其種種影響——直接的，與始料未及的。

第一章 前奏：紙張傳入歐洲

爲什麼第一本印刷書出現在這個節骨眼上，約當十五世紀的中葉？爲什麼從亞維農到美因茲、從哈倫到史特拉斯堡，每一個地方的人，都爲了以機械方法大量生產手抄本而殫精竭慮？其動機是否純粹基於「知」的需求？可以確知的是，那個時代的學者，即今日我們稱之爲人文主義者的偉大讀者，經常尋覓著圖書館裡稀少、四散的古書謄本。想當然耳，能以低廉成本大量發行謄本的新技術，也是他們的夢想。若少了如此迫切的動機，只怕還研究不出印刷術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當然了，十五世紀之初，許許多多的變化正在孕育，令人不得不更積極地思考，該如何改良手抄本的供給，滿足愈來愈龐大的需求。從大學創立的十三世紀起，新的需求便發展起來，希望能擁更多的手抄本。然而，縱有學術、教育風氣再度鼎盛，手抄本產業卻只有小幅進步：例如散裝出借系統讓珍貴的原始謄本更常流通，而縮寫的應用則提升了抄寫的速度。書本畢竟還是得靠人親手寫成。

以機械大量複製所需的資源，早年並不存在。當時最欠缺的，基本而言，也許是製作活字的技術。要製作出單一的字母（一顆「字粒」），得用金屬的陽文字範，在另一塊質地較軟的金屬塊上，以高精度度敲擊出一個陰文字模，再用此字模澆鑄成型，且字粒須採適當的合金爲原料；凡此種種，說明了這種新技藝爲何是由金匠所研發。不過，若說鑄字遲至十四世紀才開始發展，是



因爲在這之前存在某些技術上的阻力，卻又不符事實。同樣的道理，印刷作業一詞涵蓋的所有流程，諸如組合活字、上油墨、操作印刷機（如果非用機器不可的話）等，若有絕對的需求，理應在古騰堡之前就發展起來。由此可知，當時欠缺的並不是技術，而是印刷的媒介，也就是——紙。

我們所說的印刷「工業」一詞，是在十九世紀初，自動化的機械印刷問世之後，始爲人所用；論其本源，它是一種講求技藝的行業，而且少了「紙」，便無由誕生。如果只能以獸皮當媒介，油墨吸收不充分，活字印刷又有什麼用？更何況在皮革當中，平坦度與柔軟度堪爲印刷機所用的，也只有最昂貴的幼獸皮了。造紙術是在十二世紀，從中國經阿拉伯西傳歐洲，而一直到了十四世紀晚期，紙張才在歐洲廣泛應用；也就是說，如果當時沒有紙張的催生，只怕印刷術也發明不出來。

一、紙的進程

十二世紀時，一種新的「羊皮」，透過商人與阿拉伯國家的交易，在義大利現蹤。當時的紙張，具有與羊皮相當不同的表面特質。它比較脆弱，以碎布爲基本成分，外觀令人聯想起棉帛（曾有好一段時間，歐洲人以爲紙張也是棉製品），而且很容易撕裂開。起初它只被當成劣等的羊皮替代品，後來則開始被廣爲接受，甚至在某些用途上具有優勢：用來書寫不須長期保存的文件、當成信紙，或是暫時記下草稿、公文以供人重瞻。紙張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統治區傳入後，

首先出現在熱納亞；而當地的速記員，除了用它做紀錄，有時甚至直接在老舊阿拉伯手抄本的空白處塗鴉起來。不多時，整網整網的紙張，開始運抵義大利的各個港埠²⁶。許多歐洲國家的總領官署，偶爾也使用這種新的書寫材料；但由於它脆弱、不耐久，統治者禁止用它來頒布諭令。西西里的羅傑便曾於一四五年下詔宣布：先王時代的特許令，凡寫於棉草紙之上者，皆應重贖至羊皮上，並將紙本逕行銷毀。而在一三三一年，神聖羅馬帝國的腓特烈二世，更嚴禁以紙張贖錄公共法案²⁷。縱有禁令如此，紙張的地位依舊確立，而義大利也開始出現紙廠。十四世紀早期，法彼雅諾一帶即有若干造紙業者。此種產業能在當地發展，端賴兩股助力；而這兩股助力同時也是造紙術傳遍西歐的原因。首先是技術性的助力：早在十一世紀或是更早之前，歐洲人便懂得利用槓桿裝置，將磨白的轉動化為反覆的雙向運動；這項技術革新，讓一些早期工業得以突飛猛進。在法彼雅諾，造紙人依此原理，把阿拉伯人用以研磨碎布的石磨換成大木槌，不僅提高產量、降低成本，也提升了紙的品質²⁸。另一股助力則與中世紀末期，亞麻和大麻的種植轉趨普遍，以及亞麻布取代羊毛成為內衣原料有關。在紙張使用漸趨普遍的狀況下，這種變化，讓造紙的破布原料更為便宜，數量也更多。

有了這些利多因素，法彼雅諾的造紙生意愈發蓬勃；到了一三五四年，連法學家巴托魯司都會提及這個位於安科納附近、造紙品質最佳的「知名小鎮」。為了提振品質與產量，這些造紙業者探求更好的生產方式；他們不僅率先以長柄槌取代老式石磨，更以動物膠取代植物膠，藉此改善紙漿的黏著度。在此之前，阿拉伯人使用植物膠，紙張表面遂如棉帛。如今，他們則仔細處理表面，由專門的匠人主持其事。此外，每家造紙廠皆有專屬的浮水印，這種約定俗成且多半具備

象徵性的標誌，係用以識別彼此產品。此類圖印，反映了這種新書寫媒介的因地制宜，與歐洲的慣例相符²⁹。

十四世紀的下半，造紙業者不甘坐困法彼雅諾一地，向弗特里、帕度阿、特雷維索與熱納亞等地擴張。很快地，他們建立起另外兩個造紙中心，分別位於熱納亞附近的利古利亞地區，以及當時隸屬威尼斯共和國的加達湖畔。義大利商人，乃是將紙張傳遍全歐的倡導主力，其中又以倫巴底裔者為最。布里奎在他的力作《浮水印》中指出，一三六二到一三八六年間，雄鷹展翅的浮水印圖案，不僅在義大利很普遍，亦於荷蘭、比利時流通³⁰；另外根據法彼雅諾造紙商迪安布羅裘於一三六五年前後寫下的手札，他一度遠赴法諾、佩魯嘉等地販售自家產品。除了取道托斯卡尼沿海的小港都塔拉摩納前往威尼斯之外，他也曾經由艾格莫何特前往蒙貝利耶。據考證，他在一三六五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將重約一千三百三十三公斤的紙張二十捆，出口至蒙貝利耶。短短三年半的時間內，此君即從塔拉摩納港運出兩百四十捆的紙張，重約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公斤³¹。

到這個時候，紙張開始在各地取代羊皮。十三世紀晚期的法國南部，紙張已然移作官方用途；一二四八年，不僅馬賽的速記員使用紙張，朗格多克的地方部會長官亦然。從一二四三到四八年，普瓦捷伯爵雅豐瑟麾下的官員，用的也是紙；而一二七二到一二七四年間，土魯斯當地關於王室官員的紀錄，同樣以紙張來記載。此後不多時，紙張的使用便在瑞士普遍起來，並逐漸傳往法國北部。在那裡，總理官署的人員，曾於一二四〇年使用一冊紙製的會議記錄本；時至今日，這本簿子仍由巴黎的公共文書局典藏³²。同時，紙張的妙用也傳到了低地諸國（即今日的荷

比盧三國）與德國；相形之下，威尼斯的商業圈子，則早就接納了這種趨勢。

除此之外，部分置身海外、亟欲拓展業務的義大利商人，因為預期紙張的需求將再成長，遂鼓勵老家的造紙能手離開祖國，遠赴異鄉傳授技藝，從而促成造紙術在義大利之外的地方生根。就我們所知，十四世紀左右，即有原始的造紙廠出現在法國特魯瓦區、孔塔弗內森，乃至於巴黎周邊的科爾貝、埃松恩與聖克盧；到十五世紀中，法國在造紙方面已經自給自足，香檳地區更建立起出口紙業³³。至於西班牙、英格蘭、低地諸國、奧地利與德國，則持續使用義大利所出口的紙張，雖然德國與瑞士已經擁有紙廠，但直至印刷術發明之際，德國境內營運中的造紙廠依舊寥寥可數。當時，所有商業重鎮的倉庫，都囤積著義大利的紙，而舊時人們對紙張那種揮之不去的偏見，也早在大約五十年前即告消弭；倒是手抄本，長期以來還是書寫在羔犢皮之上。習慣使然嗎？也許。不過，若以恆久保存為主要考量，經歷長久考驗的書寫材質，總是比較占便宜。熱爾松於一四一五年，以其耐用程度不若羔犢皮為由，反對在紙上抄謄文字，亦是受此考量所影響³⁴。然而那時紙張已在競爭中勝出，像這樣的呼籲，聽來反倒是懷舊意味居多。印製書籍所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之一，至此實現。

二、造紙術成長的先決條件：自然的與工業的

那些成為造紙重鎮、供應印刷需求的地區，所具備的特徵，值得研究。造紙廠的位置對印刷

鋪的設置地點，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印刷的新發明對紙的生意造成什麼樣的刺激，也有探討的必要。但在切入這些課題之前，我們得先確定以下的問題：要設立一家紙廠，必須要有哪些條件？

首先，紙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從十四到十八世紀，造紙流程少有變化；十七世紀末葉，搗筒取代了原本的長柄槌，是此間唯一的主要進展³⁵。紙的原料是破布，乃購自於專門的商人；他們把四處收來的破布攜往紙廠，接受分類。欲製作最高級的紙張，尤其是印刷用紙，白色的薄布是最重要的原料，而且必須與纖維較粗者分開。分類之後，須將破布浸泡；浸泡前先切成小碎塊，再置於地窖或類似的地點，直到濕布發酵。在此一過程中，油膩的物質會排出，纖維質也會逐漸分離出來。然後，這些原料被送往磨坊處理；這些磨坊大都由研磨穀類的水車磨坊改裝而成。在水車帶動的主輪軸上，連接著許多小槓桿，帶動小隻的長柄槌，一上一下地擊打著搗槽內甫經處理的爛碎布。這個預先分解階段所使用的槌子，會裝上釘子或小刀，以利搗碎。

最後，得在水中小心調入適量的肥皂，讓破布於其中繼續分解，製成一定濃稠度的糊狀物，也就是紙漿。接下來，除了把紙漿倒進固定溫度的溫水桶內，還得在桶內放入木質骨架製成的成形器具，其中包覆著銅絲網，能在吸附一層紙漿的同時瀝去水分。之後搖晃濾網，讓紙漿平均分布，直至乾燥為止；紙漿開始乾燥後，再由所謂的「鋪工」把紙漿薄膜剝下，攤平在能進一步吸乾水分的毛毯上，然後再反覆以壓具緊密地擠壓濕紙張與毛毯，並將紙張移往「小間」懸掛房，在空氣中晾乾。由於這樣晾乾後的紙，若直接使用，會吸收過多的墨汁，所以還要在紙張表層抹上塗料，使表面平滑。大功告成之前，紙張會被放在「大間」懸掛房風乾，並接受最終的紋理加工，再以燧石磨光。紙張成品，以二十五張為一刀，二十刀為一令，打包完成即可運往市場。

製作紙張不能沒有水，而且要純淨的水。槌搗的工具以水為動力，紙漿亦須加水來調製。據布里奎的說法，要製作一公斤的紙需要兩千公升的水；另一位名叫夏諾的專家也指出，即便到了今天，一小時製造三百公斤的紙，就得消耗掉二十萬公升的水，平均每公斤耗掉約七百公升³⁶。

符合某些條件的水，才能用來造紙。有些河流含鐵量高、泥沙滿布，或是充斥有機雜質，河水呈現污濁的棕色；坐落在這樣的河畔，紙廠想要造出紙來也不容易。為了汲取清澈純淨的水，造紙業者遂將廠房設在城鎮的上游，以避開水中的各種懸浮物。基於類似的理由，業者通常在大河的較高流域設廠，或選擇其支流的中段。這樣的地點，適合借助水力來作業；靠近源頭的流域，河道狹窄而曲折，便於另鑿一條溝渠（通常是截彎取直而得），或將整條河流直接導向水車也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的造紙業者，將紙廠設在石灰岩地區；今天的造紙業者可不喜歡這種地區的水質。顯然，此種缺陷在當時並沒有那麼重要，只要清水的供應充足，就能彌補劣勢³⁷。

事實上，許多的河流，同時具備了紙廠開設的各種需求。在法國，重要的造紙中心大都位於山區的邊緣：如在奧維涅區的提耶爾、昂貝爾與查瑪里埃，在孚日的聖迪耶與耶比納，而在昂古莫瓦省與香檳平原更是如此。

比水更重要，也更讓所有造紙先驅擔心的問題，乃是破布的供給。要做出像樣的紙，就得弄到大量的舊布條或繩索。正因如此，紙廠自然會設立在城鎮附近，以便尋求纖維材料；有時靠海的紙廠亦得進口之便，像是熱納亞那樣的港埠，就是容易收集破布之地。同理，紙廠開設於亞麻

布的生產中心，亦非巧合，如孚日地區，除了是亞麻布的生產中心之外，更具備了其他的有利條件；而香檳、多菲內地區，則因大麻種植的推廣，使得位於該地區的布爾昆、魯瓦揚區的聖尚、圖廉、朵梅恩與佩魯斯等地，在十八世紀發展出造紙業³⁸。

隨著造紙行業的成長，破布開始明顯不足，因此得到更遠的地方找。這就使得拾荒人（挨家挨戶收取破布與廚餘碎骨者）愈發重要——在十五到十八世紀期間，收集舊衣也成為有利可圖的工作。在一五八八年的孚日，收集者以金錢或別針換取破布，稍後則用陶瓦器換得；這些人替紙廠附近的二手商販工作，而商販負責把破布粗略地分類後再售予紙廠。早期的紙廠，靠的是鄰近地區收來的破布；但到了十六世紀末，來自孚日的破布收集商，還得遠赴梅茲、穆松橋，或是勃艮地挖寶。十六世紀的頭三十年，在另一個造紙區土魯斯，德勞熱耶甚至將破布論噸出售而發跡。當時許多馬車夫也兼差拾荒³⁹。

但相對來看，孚日與土魯斯，只能算是小型的造紙產業中心。在特魯瓦，商人可是載著好幾馬車的破布，前往香檳的各個市集。等到奧維涅的造紙中心興起，品質最佳的碎布從勃艮地出發，藉頌恩河的水路運往里昂，再由等在岸邊的馬車運送。奧維涅的貨運業者，尤其是來自福雷的，有時得大老遠從維萊與尼韋奈，用車把東西運回來⁴⁰。

為了確保供應無虞，並防止破布收集商哄抬價格，造紙業者向政府當局請願，爭取破布收集事業的獨占權。一三六六年，特雷維索的造紙人，便獲威尼斯議會授予此特權；到了一四二四年，又有一個來自法彼雅諾、在熱納亞開業的製造商，取得舊繩索收集的獨占權。在一四五〇年

代，熱納亞的造紙業者，抱怨生意被破布商人控制，試圖告發他們。瑞士的紙廠遍布於巴塞爾地區，當地產業也得到類似的保障：當地政府規定，在破布上市求售的前二十四個小時，只有來自巴塞爾的顧客有權收購。造紙業在德國建立之初，便習慣在每座城鎮中畫分出一個個專區，範圍之內的破布收集權全為該區造紙人所有。一六二二年，布萊梅地區收集到的所有破布，都保留予布萊莫沃德與阿可羅斯特的紙廠，便是一個例子⁴¹。

大抵言之，基本原料的匱乏，在法國發生的稍晚，但情況卻又比其他地方更為嚴重。特魯瓦在十六、十七世紀，造紙業開始衰退，其原因似乎就是破布的嚴重欠缺。一六七四年，曾為路易十四掌理法國財政的柯爾貝爾明知問題嚴重，擔憂造紙業凋敝，卻又無計可施，只好規定造紙業者的大桶裡，必須時時盛滿破布！十八世紀，閱讀跟書寫的需求驟增，供不應求的危機再度浮現。奧維涅省甚至在一七三二和一七三三年，全面禁止破布的出口，匱乏嚴重的程度可見一斑，此外，在一七五四年，該省更規定收集破布的倉庫不得設立於港口附近或邊境地區，比早先的禁令更為嚴格。

到了最後關頭，顯然只有新的解決辦法可以防杜這種長期危機。科學家列奧繆爾於一七一九年向法國科學院建議，用木材造紙，或為可行之道。稍後德國人布魯克曼在一七二七與一七三〇年間，將他所寫的《奇斧神工地底藏》印在木材製成的紙上。一七四一年，法國科學院的成員桂塔爾，開始嘗試用各種材料造紙——棕櫚葉、非洲羽茅草、蘆薈、蕁麻，甚至連桑椹與海草都派上用場；另一方面，英國英格蘭地區的史全吉與德國薩克森地區的夏佛兩人，也依類似原則展開

實驗。蘭哲雷的李歐瑞·德里斯雷，則於一七八六年將維列特侯爵的作品，以石龍尾做成的紙張出版；英國更在一八〇一與一八〇四年之間，試圖將類似的製造過程商業化。不過，這些都只是早期的大膽嘗試。法國大革命期間，消耗的紙張非常驚人（這也是許多古早的法國檔案佚失的原因之一）。等到一八四四年，才由書籍裝訂匠凱勒想出混合木漿與布漿的新方法，並由渥耶特於一八四七年為此法申請專利。此後直至一八六〇年，麥稈、稻草終於成爲確定而普遍的破布代用品，用以量產報紙。

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由於破布依然是造紙的主要原料，造紙業的擴張似乎無法擺脫原料不足的威脅。面對著逐日成長的需求，造紙業者不得不在品質或數量上妥協；十六世紀時，特魯瓦甚至威尼斯就是這樣，而十七與十八世紀的奧維涅與昂古莫瓦亦復如斯。業者被迫使用劣質碎布，也就只能做出劣等紙，客戶在抱怨之餘，另覓紙商。於是新的紙廠便在鄰近消費中心，但過往不會發現的地點建立起來。簡言之，造紙產業的故事，就是遷就原料供給而發展的歷程。

三、商業因素

由於需求持續擴張，從十四到十七世紀，在那些早先與造紙並無關聯的地區，新的廠房一再接地建立；這是因爲原料短缺限制了大型造紙中心的發展。爲確保成品能便利地流通，這些新的心中幾乎清一色位於通商路線的樞紐，可能的話也會儘量靠近大型的消費中心。

開始的時候，擁有雄厚資本與技術優勢的義大利人，再度於此間扮演要角。到了十五世紀晚

期，光靠義大利所生產的紙張，已不足以支應全歐的需求，而且如此笨重的貨品也帶來相當龐大的運輸成本：在送抵法國或德國客戶手中之前，這些紙張得經過三或四次的轉手。除此之外，海外的倫巴底商人，大都願意就近在有利可圖的法國、瑞士與德國，出資贊助當地磨坊改裝成紙廠，並鼓勵造紙能手離開義大利老家，把新技術傳授出去。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三七四年會有佛羅倫斯人在卡本查斯設立小紙廠，還有義大利商人在十五世紀初遊說皮格涅洛的造紙匠跑到亞維農來開業⁴²。有時，其他國家的在地商人，亦會邀請義大利人主其事。以下便是一例：一三九一年，紐倫堡的史特羅莫，除了將葛萊斯穆一間磨穀坊改裝成紙廠，還將廠內的德國工人交給三個義大利人指揮。這三個人分別是迪馬奇歐、他的親手足馬可，以及一名僕從。新產業引起了教會的興趣；一四六六年，盧瑟伊修院的院長德儒佛瓦，准許兩個義大利的皮埃蒙特人在匯流入蘭特內河的布魯秦河畔建廠，並要求他們每年納捐四令紙。昂古萊姆區聖希拉雅一地的分支教會，早在一四五五年之前，業已將自有的磨坊改建、用來造紙⁴³。想當然耳，各家大學亦希望以最低的成本獲得紙張供給，故鼓勵紙廠創建。以巴黎大學為例，就非常歡迎業者在科爾貝、埃松恩，或聖克盧建廠；如果能在特魯瓦一帶造紙更好。

供應巴黎的造紙廠，自有其沿革；時人對這段歷史認識頗多，得歸功於史坦與勒克勒爾⁴⁴的研究。他們證明了，靠近通商路線交叉點的重要消費中心，乃是產業得以勃興的關鍵，一如鄰近特魯瓦的巴黎城。在此且進一步闡述這個典型的例證。十四世紀中葉起，巴黎大學爲了以優勢價格囤儲大量紙張，將特魯瓦與埃松恩一帶的紙廠創設權，賦予勒朋，並允許廠房所有人以大學供應商的身分，免於稅賦與某些義務。一三七六年，在更鄰近法國首府的聖克盧，兩位從事造紙業

的巴黎市民，長期承租了主教的磨坊，並依約在該磨坊製造「紙張與其他有利可圖之商品；唯承租人不得於未來主動或委人研磨穀物或其他農作」。

然而，巴黎人用的紙，主要來自特魯瓦。從很早開始，義大利人便藉著隆河與頌恩河，將紙張運往香檳的市集，再透過塞納河及其支流很快地運抵巴黎、臨海諸城，甚或英格蘭。當時的特魯瓦與法蘭德斯之間，已有經常性的交通往來，而皮迦地種植的大麻與香檳地區一樣富有盛名。有了這些條件，由義大利人出資，在塞納河與支流沿岸建立紙廠，遂變成不足為怪的常事。十五世紀晚期起，香檳開始供應北歐的部分需求。大約七十五年後，戈林也在當地購買紙張；這些紙張與巴黎出版的首批搖籃本古書（搖籃本一詞為拉丁文的 *incunabula*，係指一四五〇年代古騰堡以活字印刷書籍以來，至一五〇〇年之間，在歐洲生產、最古老的印刷書）所用者相同，皆有錨形的浮水印。同樣的印記，也出現在低地諸國的魯汶、台夫特，以及德國美因茲、科隆等地的印刷書裡⁴⁵。

巴黎的造紙匠於一三九八年組織起自己的行會；而在周遭新紙廠環伺的競爭壓力下，特魯瓦與巴黎的造紙人，復於一四一五年要求位於巴黎大學所在地的索邦當局介入，以確保自己的優勢。一四八九年，法王查理八世頒布特許狀，確認了巴黎大學的相關權利，且在院長、學者、校務主管之外，列出其他蒙授此權的人士：這些人包括二十四位書商、四位羊皮匠、十一位造紙匠（巴黎四人，特魯瓦、科爾貝與埃松恩共七人）、兩位彩飾師傅、兩位抄寫員，以及兩位裝訂工。此後許久，「大學法定造紙商」便成了巴黎與特魯瓦的業者覬覦非常的頭銜；畢竟這個貴族名

號，賦予的不只是免稅優待，還包含該大學極力捍衛、不願與外人共享的其他實質特權。

不論在何處，大城鎮的存在，都能刺激紙廠的建立；以印刷鋪林立的里昂為例，倘若這座大城市位於別的地方，只怕鄰近的博若萊不會有這麼多紙廠，奧維涅更可能連一座紙廠都找不著。即便如此，紙張還是常常賣到距產地甚遠的地方，為人所用。法蘭德斯、低地諸國與德國北部，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初，皆曾使用法國香檳區出產的紙張，便是一例；十六、十七世紀，在昂古萊姆製造的紙，則為西班牙、英格蘭、荷蘭與波羅的海諸國所用。除此之外，通商路線的交會之處，也有大型造紙中心出現。如果不是因為特魯瓦通往香檳的市集很方便，就算此地鄰近巴黎、里昂，也未必容得下這麼多的造紙業者；同理，奧維涅的造紙人也不能沒有里昂的市集。此外，紙張是非常笨重的商品，故造紙重鎮若是便於河運，發展也會特別順遂，而鄰近港口者更是得天獨厚。十四世紀時，義大利的造紙商便在威尼斯與熱納亞發跡；十六與十七世紀的昂古萊姆，尤為顯著例證。十五世紀初，英國人占領義大利部分地區，並將紙張透過波爾多運往英格蘭；而後法國發展出本地產業，紙張遂經拉羅謝與波爾多兩地輸出。十七世紀末，在昂古萊姆造紙以品質聞名之際，巴黎的書商反而叫苦連天，這是因為他們必須以陸路進口這些高級紙，負擔的成本高過循水路進口的荷蘭同業⁴⁶。

四、印刷的興起和造紙業的發展

對紙張的需要，不獨來自印刷書的問世，也來自許多新的領域：教育的擴散、商業行為轉趨

複雜、書寫活動倍增，縱使連不從事文字作業的工匠、賣衣郎、菜販、蠟燭商等，也需要紙張。此外，更有一群前所未聞的行業，因紙而誕生：例如幫忙送貨的、製作紙盒、紙牌的、張貼告示的以及其他的一些相關行業。這些不同行業所屬的行會，爲了對紙張的需求而相互競爭，並打過無數的官司，但即便如此，紙張所有權的歸屬問題，也從未被明確界定出來過。

不過，最大宗的客戶，仍是最後才出現的印刷業者。印刷鋪消耗的紙張甚多；一架印刷機，一天可以用掉三令的紙。據保守估計，法國境內的印刷機數量，至十六世紀已達五百到一千架（礙於文獻匱乏，最早期的印刷機總數已不可考）。換句話說，所有紙廠每天供給的紙張總額，必須達到一千五百至三千令，才能維持印刷品的生產；假設這些工坊的產能全開，一年可以製紙四十五萬到九十萬令⁴⁷。在這種情況下，無怪乎古騰堡的某位同行竟擁有一座紙廠⁴⁸；而供應書商的造紙商也因此成爲同行間最富有的一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就算連他們的子女也喜歡上書籍事業，或開始從事印刷工作，也都不足爲奇了。他們會將造紙或賣紙的獲利，轉而投資在書籍印刷上。於是，造紙中心的發展，便爲印刷中心的發展推波助瀾。以下這首詩，是爲了慶祝查理八世造訪特魯瓦市而寫；詩作固然拙劣，但點出了造紙業在當地的重要地位：

特魯瓦的造紙商也是如此：

他們極盡鋪張排場之能事，穿上最華麗的服飾，

騎著雄壯英挺的駿馬，

馬背上披著整潔美觀的裝飾。

為了在場觀禮，他們聽任塞納河水西流，

打開閘門，無暇看管水力轉輪。

有人認為，這首詩的作者是雷貝家族的成員，而且若不是造紙商，就是某位造紙商的親戚。

雷貝一家是一個投身印刷相關產業的典型家族，其不僅以造紙聞名，更孕育出十六、十七世紀時，技術最精熟的一群陽文字範雕刻師與鑄字工匠⁴⁹。

一四〇五年，一位名叫雷貝一世的造紙商，在特魯瓦附近的聖康坦租下一間紙廠。而後其家族事業逐漸擴張，擁有的紙廠也增為好幾間。這家人在奉派為巴黎大學法定造紙商之餘，也繼續銷售自製產品牟利。從一四七〇到一四九〇年間，在巴黎、多蒙德、特魯瓦、坎特伯里、海德堡、迪戎、美因茲、烏特列茲、布魯日、科隆等地，都可以見到他們所生產，清一色以浮水印「B」為記的紙。他們在十六世紀已然致富，十七世紀時更晉升為貴族。雖然雷貝家族有錢有地位，但在較富盛名的子嗣中，仍有一位吉堯姆一世·雷貝，在一五四五到一五五〇年間，親自投入活字排印與陽文字範雕刻的工作，並與侯貝·埃蒂安納合作。他並不懂希伯來文，倒也很快地熟悉了每個字母，刻出一整套活字遊刃有餘；之後他前往巴黎與威尼斯，與聲名遠播的阿爾都斯出版社合作，技藝更上一層樓。回到巴黎，他旋即在聖尚德拉特朗街與聖尚德博韋街的交口，設立自己的活字鑄造廠，掛起字印批發的招牌。除了替埃蒂安納刻希伯來字母，他也為勒魯瓦與巴拉爾刻樂譜。當時巴黎最傑出的鑄字王朝，在他的手中創建；他的兒子吉堯姆二世·雷貝，則於

十七世紀初兼營造紙、鑄字、販書、印刷等事業。

雷貝的例子並非獨一無二。當時與製書相關的諸產業，彼此間多有交會、重疊，許多地方都有造紙商投資印刷事業。早些時候，書籍的銷售成績並不理想，賣出去的紙，常常要等到製成書本、順利售出之後，紙商才能收到貨款；故造紙商時常得融資予印刷商與書商，而有時出版者、書商也會反過來替供貨的紙匠租紙廠。舉例來說，古騰堡的造紙商海爾曼，便在史特拉斯堡擁有紙廠；紙廠先在一五二六年租給了印刷商柯普佛，後來又在一五五〇年租給了另一位印刷商溫德林⁵⁰。在將近一五三五年時，蘇黎世印刷商克里斯多·弗洛蕭爾的兄弟尤斯達許，在蘇黎世租下一間紙廠，他死於一五四九年，此後克里斯多便以自己的名義接管該廠⁵¹。知名的巴塞爾印刷商艾彼柯普，於一五七五到一五八七年間，在隔壁的蒙貝利亞爾郡內，租下位於古瑟雷的紙廠。十七世紀稍晚，土魯斯的印刷商布德氏，亦在市郊經營造紙廠⁵²；此後，劇作家博馬樹則在出版伏爾泰作品之際，在阿契斯與阿卻特兩地買下紙廠。最後，出版巨擘迪鐸家族，也於一七八九年在埃松恩買下數家紙廠；十年過後，第一台連續造紙機，便是在這裡投產，且容後述。

造紙業與製書業，彼此總是有著密切關係；兩者可謂共榮互利、相輔相成。只消針對歐洲不同時期紙廠與印刷廠的分布，稍加比較，就能證明這點。一四七五到一五六〇年，印刷首度風行之際，正是各家紙廠開始林立於歐洲的時候。

為佐證前述說法，我們來比較一下一四七五至一五六〇年間，紙廠的分布情況，尤其是法國的紙廠⁵³。一四七五年，印刷術尚未帶來實質影響，只有幾家紙廠，在洛林、佛朗什孔泰一帶，

以及昂貝爾、培里戈、土魯斯等地開業。當時重要的造紙中心不過兩處：特魯瓦與亞維農。雖然十六世紀初造紙業曾小幅萎縮，但到了一五六〇年，香檳區在這方面的重要性，仍比一四七五年的程度高出三倍。平日的紙廠數目，也在此間增為原來的三倍，更有新紙廠在布列塔尼與諾曼地成立。十七世紀成為極重要造紙據點的昂古萊姆地區，此時的紙業迅速擴張，亦不容小覷。博若萊地區，尤其是奧維涅，因為里昂的眾多印刷鋪及市集近在咫尺，紙廠的增設更受激勵。一步步地，法國在歐洲造紙業的地位，令義大利相形失色；史特拉斯堡絕大多數的搖籃本，也都印著法國紙廠的浮水印，其中又以香檳區產紙最多。至於特魯瓦的造紙商以及在其後陸續跟進的廠商，則長期在此間保有一席之地，畢竟德國、低地諸國與英格蘭境內，幾乎沒有同業能與之競爭。就連巴勒迪克這樣的小地方，也沿著馬斯河將紙張銷往布魯塞爾、魯汶、烏特列茲與梭勒；在那裡，《死亡藝術》、《人類救贖之鏡》與編年史書《時代集錦》最早的印刷版本，都用上巴勒迪克所生產的紙；這些紙甚至遠銷至牛津，用以印製《坎特伯里故事》⁵⁴。

其實在歐洲其他地方，紙廠亦是四處擴散，只是增設的速度略遜於法國。瑞士的弗萊堡一帶即出現過一些紙廠，其中又以義大利迦里札尼家族定居的巴塞爾為最。一五七〇年，巴塞爾周邊共有七家紙廠，供應鎮上的印刷廠。

在德國，第一間造紙廠設於葛萊斯穆，並於一三九一年開始生產。到了一四二〇年，呂貝克一地也設起紙廠，稍後於一四二八年，在靠近克雷沃斯的根內普又冒出另一家來。據考證，一四三一、一四六〇與一四六九年，在呂內堡、奧格斯堡與烏姆，分別有紙廠創立，而其他地方同樣出現紙廠。一四八〇到一四九〇間，萊比錫出現一家紙廠；此後，一四八二年的埃特林根、一四

八九年的蘭茨胡特、一四九〇年的布雷斯勞，與一四九六年的魯特林根，皆有新紙廠開業。但大致說來，德國的進展緩慢，且要等到十六世紀中旬，紙張的供應才不假外求。一五一六年時，諾德林根、奧格斯堡與紐倫堡仍須向義大利米蘭的金主周轉，方得創立工業，至於德國西部則轉向法國尋求支援⁵⁵。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便是印刷蓬勃發展、引人矚目的法國萊因地區城鎮，也不得不長期進口紙張。

低地諸國的情況則更顯奇特，甚至「令人費解」；在這裡，造紙業的發展比德國還要緩慢。例如十六世紀的普朗坦便經常遣人前往香檳區，打點他要的紙張⁵⁶；而十七世紀中葉，摩雷特斯一地的出版社依舊仰賴法國進口的紙張；艾齊維埃家族更會因為與法國方面終止生意往來，擔憂自己的出版社就此關門大吉⁵⁷。這些出版商之所以採用小開本，並因此而聞名，是為了節省紙張以能繼續印書；因此即使必須面對讀者的諸多抱怨，他們仍然開始印行十二開本的小書。倒是荷蘭商人曾在法國的夏朗敦投資設立紙廠，並將成品銷往歐洲各地，包括英格蘭、波羅的海區、西班牙，以及鄰近的低地國家。在昂古萊姆附近，紙廠生產高品質的紙張，上面還附有阿姆斯特丹的徽記。路易十四在位期間，這種紙因為出境時張張空白，所以不須繳稅；等到紙張被印成書籍或小冊子運回法國，書裡的異議文字可就常常得罪國王了。

然而，荷蘭也像其他國家一樣，終於感受到紙張國產的必要性。一六七一年，荷蘭上下議院宣布禁止進口法國紙，荷蘭人遂設立自己的紙廠。為了提升紙的品質，並令造紙方法順應該國象徵「風力」變化無常的特性，他們發明了新的機械結構，用搗筒取代長柄槌；這麼一來，紙質果真變好，產能也有提高。這項新的造紙技術很快傳到德國，卻一直拖到十八世紀末才為法國人所

採用；荷蘭紙業也得以長期保有其優勢。

縱使面臨龐大危機，且直至一七二五年仍餘波盪漾，法國的造紙業終究恢復了元氣；紙廠在布列塔尼、多菲內、香檳等地區，以及西南部、北部陸續出現。可惜的是，奧維涅和夏朗敦一帶，曾經叱吒歐洲市場的數個大型造紙中心，此時已不復當年。至此，各國皆已擁有自己的造紙業：十八世紀末，德國境內約有五百家紙廠，年產量兩百五十萬令；義大利造紙業活躍如昔；十六世紀時紙廠甚少的英格蘭，在一六九六年業已擁有一百家，而其中許多紙廠的創建者，係躲避舊教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教徒。一七二二年，英格蘭的年產量達到三十萬令；於一七五〇年發明織紙法，不用金屬絲或鏈線造紙的巴斯克維，也是英國人。

在紙廠數量大幅增加的同時，紙張的消耗也隨之成長，印刷機的使用亦趨普遍。這個時期裡，現代工業正在醞釀，並由技術的研發扮演要角；對照之下，法國較其他國家更加謹守傳統方法，所以在十八世紀之初落於人後，之後又試圖追趕。工廠督察員德斯馬瑞，為鼓勵特定的幾位企業家求新求變，委請曾在荷蘭受訓的工程師埃奎維榭相助。其中一些企業家聽從了勸告，例如在布利的柯大林法蒙提設廠的雷維翁氏、若漢諾氏，以及孟戈費埃氏（第一對成功試飛熱氣球的兄弟，亦出身此家族）。一七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國大革命爆發在即，素來享有盛名、致力於改進技術的迪鐸印刷行，在此時買下了埃松恩的幾家紙廠。十年之後，簿記員侯貝爾自美國歸來，在此地組裝出世界上第一台造紙機器，與同時期設法以現代機械取代老式手動印刷機的英格蘭、德國，並駕齊驅。時機至此已經成熟。十九世紀初，為滿足教育與資訊的新需要，待印的書

籍、行政出版品，乃至於後來的報紙，也愈來愈多；這使得紙張必須隨之增產。造紙、製書業的機械化，原因就在這裡。

第二章 技術問題與解決之道

古騰堡與同時代的人，如何在十五世紀中葉，克服各種可以想見的諸多技術困難，發明出印刷術？他們必須通過哪些階段（在我們可以得知或臆測的範圍內），方能獲致最終的解決之道？一四五〇到一八〇〇年間，印刷又有哪些改進？這些改進如何強化印刷業，並促成書籍的普及？這些問題，本章都會論及。雖有許多治學嚴謹的學者、史家和專家，承續了二十世紀初赫恩、海布勒與普克特的研究，可供我們參考，但早期的疑問，特別不容易找到答案。在此必須重複：諸如誰才是印刷術之父，印刷的改進又應歸功何人云云，並非我們的研究重點。我們的目的，是盡可能地指出，哪些技術促成了第一部搖籃本的印成，而這些技術在十五、十六世紀間，如何逐漸臻於完美，讓印量更多、印刷更快。換句話說，我們意在釐清，十六到十八世紀間，書本是如何以手動印刷機印成，而後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爲了趕上時人對書籍與雜誌的需求，印刷技術的革命又是如何地必要。

一、木刻版：印刷書的先祖？

十四世紀中期，歐洲各地都有人使用紙；在該世紀結束前，紙張更成爲普及的商品。紙張之

所以創造出各種可能性，倒不是因為它的造價低廉（其實紙價的下滑算是慢的了），而是因為這種表面平坦的新書寫材料，當時已能大量生產。基於此，欲大量生產圖畫或文字，紙張自是最理想的媒材。

十四世紀時，複製圖畫的標準化方法，已流傳開來，用以裝飾書的封皮；利用凹刻的印版，就可以把圖樣壓印在皮革表面。抄寫員製作手抄本時，則在每個章節或段落的開頭，預留空白給放大並描上飾紋的大寫字母；偶爾，這些大寫字母會用木頭或金屬做的浮刻字戳來壓印。以雕版壓印技術在布面印上式樣，則源自東方；沾上彩墨，用在絲綢或亞麻布上，就可以染出簡單的信仰圖畫與宗教故事場景⁵⁸。這種方法，對紙張同樣適用。與印在織品上相較，用浮刻的戳章在紙上壓印，不論是黑白或彩色，都能印出更為乾淨、清晰的線條。就我們所知，木版印刷或木刻印刷最早的例子，乃是將布帛專用的圖樣，壓印在紙上的結果；這種做法在歐洲人普遍使用紙張後不久即出現，比印刷書的誕生早了七十年，也開啓了後來文字稿印刷的先河。

最早的木刻版畫（block prints，通常為凸版，有別於以凹版為主的金屬版畫），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末甚至更早；據了解，當時的萊茵河沿岸與勃艮地，此種行業相當鼎盛⁵⁹。有了這種新的製作流程，便能大量複製宗教圖畫，而且所需的工具相當簡單，不過是一塊木頭跟一把刀子。在那個年代，精神生活、智識生活的中心，就是宗教儀式，教會的地位至高，而口耳相傳仍是文化的主幹，是以前述的複製方式大有斬獲。既然環境如此，用以複製信仰意象的圖案技術，當然顯得比印刷更必要。木刻印製的圖案，可以用來描述傳奇故事或聖人事蹟（在此之前，這些都只

能在教堂的圓柱、門廊、窗戶上看到)，生動地捕捉住時人的想像。也因為這些圖畫便於攜帶，一般人可以拿回家，在閒暇時欣賞、沉思；他們就此目睹基督的神蹟、耶穌受難的經過，感受《聖經》人物在他們手中活靈活現，記取凡人終將一死的教訓，或是見證天使與魔鬼為將死之人的靈魂而纏鬥。論需求，這一類簡單的視覺產品，出現的時間遠遠早過文學、神學、科學方面的印刷文本，並不叫人意外，畢竟後者僅有一小撮神職人員與學界人士感興趣。文字印刷固然較難，但就算文本的複印跟木刻版畫一樣簡便，先有印製圖、才有印製書，仍舊是自然且合理的順序。只是，單就事實論，木刻的翻印技術，對於後來的印刷術並無任何啓發；印刷術係脫胎自截然不同的技術⁶⁰。

蔚為風氣的象徵性宗教肖像，發展於十五世紀初。最先製造木刻圖版的工場，很可能就設於修院之內或附近，而來自修院的龐大訂單，促進了這種圖畫的廣泛應用⁶¹。木刻版畫的生意成長快速，諸如一四二三年「布魯塞爾的童貞女」、一四三七年「維也納的聖瑟巴斯丹」，以及聖羅格、聖亞波黎納的圖像，到處都可買到，除了用來裝飾尋常百姓的居所，還能趨吉避凶。聖基多福是旅人的主保聖人，免人於猝死；聖瑟巴斯丹免人於受傷；聖羅格免人於瘟疫；聖亞波黎納免人於牙疼。擁有其他的聖人版畫，則可能帶有贖罪券的效果；在朝聖途中、教堂門前、市集場合，賣出的版畫數以千計。

早先的木刻版上並無文字，但旋即有人發現，如果隨圖附上短文說明，效果頗佳；爲了印字，可以另刻一塊橫版，或是在人物之間的空白處加刻。一開始，圖說係採手寫，但後來則與圖

案本身一起刻在木頭上。在此同時，圖中人物的宗教意味趨於淡化；以人類與動物體態呈現的新奇字母表，基督教諸國九聖人的傳奇史蹟等，盡皆入圖。此間最有看頭的發展，當屬紙牌的製造，並很快變成一個龐大而繁榮的產業。先用木版印出紙牌然後上色，昔日逐張描圖、添飾的光景已不復見。同時在木刻版行業裡發展的，還有諷刺海報、商業告示，與最後才出現的日曆；至此，文字的地位自然地凌駕了圖畫⁶²。

不多時，單純的全開紙印刷已嫌不足，木版印出的四開小書誕生，並成爲一種完整的讀物類型，訴說著當時最受歡迎的道德、宗教故事：《默示錄》（新教稱《啓示錄》）裡的角色、《窮人聖經》、《童貞女生平》、《救贖之鏡》、《耶穌受難》、《聖徒生平》、《死亡藝術》等。在這個階段，文本跟圖畫的重要性相仿；置身偏遠地區、資源匱乏的神職人員，也從中獲得講道、傳教的範本。更重要的是，這些書的價格不貴、尺寸不大，故成爲尋常大眾買得起、用得著的第一批書本。就算不識字，至少他們可以從圖畫的起承轉合裡領略要義。此外，因爲這些小冊子是以方言寫成，對具備基礎閱讀能力的讀者來說，理解更加容易。當時風行的雕版書，其文字比重偏高，證明稍能閱讀的人已非少數。

這些雕印作品中，有許多比活字印刷更晚問世，雕版書曇花一現的故事，亦在此宣告結束。然而，木版印刷的技巧並未因而亡佚。最早的活字印刷書，仍然沿用與雕版書木刻版如出一轍的圖版，而第一批有圖畫的書籍，許多也採用了既有的版畫做爲圖飾。由於攝影術的發明，還要等上幾百年，所以在那之前，版畫行業確實隨著印刷書的生意，繼續興盛。

眾多的歷史陳跡中，只有流傳至今的雕版書，受到如此仔細的審視、如此熱切的研究；這些稀有的殘章遺頁，代表著一個曾經規模宏大的行業。其稀有的程度，正是它們曾經普及的明證；因為普及，當時的廣大群眾便不甚珍惜、未予妥善。碩果僅存的那些，大都是被人塞進書的封皮裡，或填入箱子的內襯裡，方得保全。在此，我們無意重啓老掉牙的爭論，諸如哪國在雕版書技藝上最有資格稱先驅，某幅版畫的正確付印日期為何、雕版師這種職業的起源與類型有哪些。我們的質問有別於此，且直接關係著印刷術的發軔：倘若第一批雕版書出現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我們能否找出兩者的關聯，宣稱木版印刷就是印刷書之父？會不會是因為刻木版的師傅，厭倦了反覆為每一頁書重雕新字，才設法變通，把單個字母從舊的木版上切割下來？或者，他們就此想出字母分別雕刻、依行文順序排列的辦法，供印刷之用？接下來，只要保留這套辦法，再把字母的材質從木頭替換成金屬，就成了真正的活字印刷術。

十九世紀裡，這種耐人尋味的理論，在研究印刷的史學家間流行。可是，此種理論的簡化詮釋，卻經不起仔細的檢驗。原因之一是，許多的木版，尤其那些包含文字的版，係出現於十五世紀的下半葉。這也就是說，它們出現的時期，印刷術已經發明，兩者在通俗讀物的領域互較長短。雕版書主要的缺點在於，用木頭刻出的字母不夠精準，線條無法清晰呈現；而且木頭過乾或受潮都會變形，用它們來排版甚不容易。木頭字母的耗損快，這麼一來就得反覆地刻製大量的字母，麻煩也不小。若說是這些師傅把活字材料從木頭換成金屬，同樣不合理；畢竟，把金屬澆鑄、製作成活字的技術，從事木雕的人可是一竅不通。不只這樣，現存的文獻還顯示，第一批印刷書，並非出自改採新製法的木刻板工場。金匠古騰堡才是傳統上公認的印刷術發明者，而事實

也應該如此；與古氏同時進行金屬活字實驗的，尚有布拉格的華沃高，也是一位金匠。其他的第一代印刷師傅，大都從事同樣的行業，尤其是巴塞爾一帶金匠行會的成員。

由是觀之，把印刷書視爲木刻板師傅改進既有技術的成果，並不足以服人。更進一步的理由如下：印刷書出現之後，濃稠的黑色印刷油墨，才取代舊有的版畫油墨（後者以燈黑製成，色澤淺、稠度低）。同理，也是在印刷術誕生之後，木版印刷方才以印刷機取代製作雕版書的老式拓印法。拓印法只能用來做單張單面，而非雙面的印刷⁶³。

這並不是說木版印刷對印刷書毫無貢獻。紙張用以大量複製文本的潛力，可能是藉著整塊木版印出的文字與圖畫，才格外彰顯的；要是沒有版畫與雕版書的成功，恐怕當時的人也無法預見更加理想的印製方法，竟能帶來如此進步。簡而言之，古騰堡最初的熱情，乃至於說服傅斯特資助其實驗，可能就是受到雕版書廣泛通行的激勵所致。也許最早的時候，是先用木製的字範，在陶土模具上壓出痕跡，再用該模具灌鑄出活字；也許起初是某人以鍛冶法做實驗，試著印出雕版書，而有了意外發現。不管事實究竟如何，必須重申的是，類似的實驗，只有由鍛造專家，尤其是熟悉熔鑄工法的師傅，方能著手進行，並得到成功的結果。現在，且讓我們探究這些熔鑄工匠從事的活動。

二、「發現」印刷方法

十五世紀上半，那些嘗試以機械方式複製書本的人，究竟在實驗當中遭遇哪些問題？首先，

讓我們回想一下印刷的基本流程，而後再擇要細述最終採用的印刷技術。歐洲數百年的印刷，始終以這套技術為基礎，直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為止。

手動印刷的技術，或可簡化成三個根本的環節：以金屬澆鑄的活字、富含脂質的油墨，以及印刷機⁶⁴。其中，如何製造出稠度比當時一般油墨更高的新油墨，乃至於如何設計出足以取代木刻工匠拓印法的印刷機，相對而言並不難，此處且不贅述。至少在西方印刷術的發展上，這兩個課題比起印刷技藝的核心，只能算是次要問題。真正的關鍵，仍在於如何以個別的活字組成一整頁的字版付印。

請回想一下此間包含的步驟。首先得在硬質金屬的一端，刻出浮凸的字樣，做爲陽文字範；每個字母或符號都要刻上一塊。然後，以此陽文字範在軟質金屬上敲打，便翻製出一個含有陰文的字模。再將陰文字模置於一手持模具內，便能重複澆鑄出所需的大量「字粒」，而字粒的材質則爲熔點較低的金屬，例如錫、鉛等。如此製成的活字粒，字母浮凸，一如原始陽文字範上的字樣。

鑄製活字的先驅，係師承金匠、獎章雕刻師，乃至於鑄幣工匠的經驗；其中，鑄幣工匠又經常從金匠中徵調而來。他們原本就知道如何鑄製乾戳（不上油墨、直接壓痕的戳印），用以裝飾書本的皮質封面。十三世紀以降的熔鑄匠，已懂得製作浮凸的字範，藉此敲出黏土模具，接著再從凹模翻製凸字，做出家族徽飾上的浮凸銘文。十四世紀起，則有製作白鐵製品的匠人，使用黃銅的戳模，而戳模被用來打製硬幣、獎章與印章，也有頗長的時間。在當時，一般的硬幣跟獎

章，是在兩模具之間塞入金屬薄片，再用鐵鎚擊打而成，但採澆鑄製作者亦有之。後者原是一種古法，直到十四世紀末，又在義大利重新流行起來⁶⁵。

換句話說，十五世紀初期開始，用金屬模具或黏土模具澆鑄的技術，以及用戳模敲擊的工法，業已齊備。工匠也知道如何合併這兩種技術，先敲出凹模，再澆灌金屬熔液，以鑄出浮凸的形狀，而這就是鑄字的基本原理。此時欠缺的只是一個念頭：把此種技術應用在印刷上。這樣的改變，需要的不過是解決一些細部問題。最後的發明則可能是多方嘗試各種工具後得來的，而非一蹴可幾。近期的研究指出，印刷術實驗的初期，發現由如此多顆活字構成的版面並不穩固，要把這些字母緊密地組裝成一片，表面平整而能平均沾上油墨，非常困難；早期可能有人將整頁文章用單一的模具同時澆鑄，以克服這些難題⁶⁶。

牢記這些事實之後，讓我們透過文獻的驗證，了解這些實驗最終是如何成功的。可惜現存的相關證據實在很少。檔案資料原本就很稀有，而那些沒有失傳的文獻證據又難以判讀。正因為印刷技術還在發展的初始期，早期的實驗者自然沒有合適的字彙可以稱呼這些甫經採用的新工具與材料。從當時編年史家著作裡點滴採集的線索，幾乎同樣的稀少，但至少稍微清楚些。至於現存的早期印刷書，仔細研究之，或可佐證少許假設，卻找不出任何關於印製過程的確切訊息。絕大多數的此類書籍，似乎都是在金屬活字幾經改良、臻於完美，並投入商業量產之後，才問世的印製品。

先來看看檔案。相關檔案中，重要性居首的，當推與一四三九年史特拉斯堡那樁知名訴訟相關的數份謎樣文件⁶⁷。話說有個原為美因茲市民的約翰·根富萊許，一般都稱他為古騰堡（古騰

堡」原本是根富萊許家族住屋的名字，當時的人習慣以房產名稱當作姓氏來稱呼），是位來自鑄幣家族的金匠；古騰堡後來移居史特拉斯堡，時值一四三四年，也許再早個幾年。爲了在德國亞琛的市集上圖利，他把幾種獨門的金工流程加以改良，並告知利夫、德禮謙、海爾曼等三人，尋求這些人的金錢資助⁶⁸。在一四三六到一四三九年間，他便與這三人合夥。稍後德禮謙辭世，其數位子嗣要求繼承父親的合夥權，從而引發了官司，相關的文件流傳迄今。根據記載，古騰堡研發中的祕密技術有三：其一是寶石的磨光法；其二包括了「鏡子」（德文文獻上記載爲Spiegel）的產法與一種新技藝，涉及印刷機、一些單獨或合併鑄成的「小塊」（德文記載爲Stücke），與一些鉛製「模具」（德文記載爲Formen）等工具；最後則是「關乎印刷機運作的各種物件」（德文記載爲der zu dem Trucken gehöret）。雖然這些文本有許多種解讀方法，彼此矛盾者亦多，但大致指出古騰堡當時正投身於印刷的實驗。可惜的是，這些文獻無助於闡明古氏研究的真正貢獻，也沒有說明這些技術有多進步、採用了哪些程序；所幸我們尚能推測，他已經投入印刷工作，技巧亦具一定水準。不過，這個課題並沒有贅言的必要，而他也不是唯一一位進行此類實驗的人。

根據在亞維農發現的文獻，另有一位金匠，即布拉格的華沃高，於一四四四到一四四六年間，與亞維農的鎮民達成協議⁶⁹，允諾在當地傳授銀匠的技藝與其他的「人工摹字」技術。一份一四四四年的合約就提到：「*duo abecedaria calbis, et duas formas ferreas, unum instrumentum calbis vocatum vitis, quadragina octo formas stangni, necnon diversas formas ad artem scribendi pertinentes.*」（大致的意思是：「兩組鋼製的全套字母，與兩組鐵塊，其中一套字母稱爲工具組，包括四十八個錫字塊，還有其他各式不同的書寫用符號。」編按，此處原文爲中世紀古拉丁

文，葉偉忠翻譯，由於原文古老且未使用合適的術語，譯文可能有些許誤差，以下同）。另一份一四四六年的文件則提及「*nonnulla instrumenta sive artificia, causa artificialiter scribendi, tam de ferro, de callibe, de cupro, de lethono de plumbo, de stangno et de juste.*」（一些為人工摹字製造出的字組，無論是工具組或字母組，材質有鐵、銅、鉛、錫、木等）。同年，華沃高答應把用於複製希伯來文與拉丁文的設備，提供給一位猶太人，即卡德魯西的達文，唯是否履約已不可考：

「*viginti septem literas ebraeycare formatas, s(c)lissas in ferro bene et debite iuxta scientiam et practicam scribendi... una cum ingenius de fuste, de stagno et de ferro... ingenia et instrumenta ad scribendum artificialiter in litera latina.*」（二十七個用鐵鑄造的希伯來文字母，以及印刷的知識及操作方法……同時還有用木、錫、鐵製造的……拉丁文人工摹字的技巧與工具。）

華沃高試圖改進的，究竟是什麼流程？這些文本並未以合適的技術詞彙寫成，甚難清楚詮釋，故此一疑問實無正解。或有人主張，華氏此處所指的，應當是一種較為原始的印刷機，甚至書寫機器；但這種可能性似乎偏低。在一四四四年訴訟中提及的兩組鋼製的全套字母、刻在鐵上的四十八個字母，以及涉入一四四六年訴訟的二十七個希伯來字母，可能是陽文字範，但同樣可能是陰文字模。至於前述的錫塊（*formas de stangno*）或許是鑄製品，但 *forma* 一字究竟何解？畢竟它在史特拉斯堡的文獻裡，已經出現過。它指的是個別鑄造的字母，還是一整頁同時澆鑄而成的字母？如果是後者，那豈不成了換湯不換藥的雕版印刷？一四四四年訴訟中所說的鐵塊（*formas ferreas*），意味的是不是用陽文字範連續敲出的、一整塊的模子？這些問題，係由奧丁所提出⁸。

講完了檔案，來看看其他的敘述資料。首先是知名的一四九九年《科隆編年史》。有趣的是，據執筆者的說法，他的資訊來自科隆史上第一位印刷師傅柴爾；此君與古騰堡的同事修埃佛有往來。以下是這段史料的翻譯：「印刷這種高貴的技藝，首先發明於德國的美因茲。主曆一四四〇年，印刷術傳到本地來，從那時起到一四五〇年，匠人持續地改進這種技藝，與其他所有相關的工法……縱使它是在美因茲發現的，一如前述，然首度試驗卻是在那之前的荷蘭完成的，成果則是一本印於當地的多納圖（四世紀羅馬人）拉丁文法書。當時的書籍，即印刷的濫觴；而今日的技術，實際上已比最初的方法更值信賴、更富巧思，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更形完善⁷¹。」

根據這段文字，「最初的方法」乃是出現在荷蘭，從而引發了頗大的爭議，諸般假設亦由斯而來⁷²。由於荷蘭曾經是木版印刷的重鎮，有人認為所謂的最初方法，指的應該是木刻版；但在當時，木刻版技術已然傳至德國、萊因地區與法國。其他的資料時間較晚，但也支持這一種說法，似乎確認荷蘭才是某種印刷流程的發軔地；許多論著試圖重建這種觀點，好替印刷的緣起翻案。兩位人文主義者，哈倫的范祖倫與庫爾赫即於一五六一年宣稱，哈倫才應該享有印刷術搖籃的榮銜。除此之外，德瓊澤也在他死後付梓的《荷蘭編年史》中記載，某位居民曾經敘述，根據當地傳說，一位姓柯斯特、名勞倫斯的匠人，早在一四四一年之前，就已經設法利用機械複製文字，並為此發明了金屬活字排版。此說宣稱，柯斯特印過一本《人類救贖之鏡》，一本多納圖文法書，以及其他書籍。他身邊有一名技工求去，於一四四二年把他的祕密在阿姆斯特丹洩漏，而後又傳到科隆與美因茲⁷³。

另有一些文獻提及，曾有人在布魯日購得「以模鑄成」的教本印刷本；前述的印刷起源說，

有時亦援引此事爲證。聖奧伯德坎布萊修道院的院長勒侯伯，著有一本《追憶錄》，兩度提及此印本，時間分別爲一四四五與一四五一年。然而詮釋的問題又出現了：這裡所寫的「以模鑄成」(jeté en moule)，跟「以模裁成」(taille en moule)會不會是同一個意思？萬一是，則該印本其實是由普通的木刻版印出（一如法文中的 tailleurs de moules，即以模裁製者，也可用以指稱紙牌製作人）。如若不然，則以模鑄成是不是用一塊預製的模，灌鑄出整個金屬版，印成一頁？嘗試這樣解讀的人也是有的。

受制於這些意義的模糊與解讀的難處，早期印刷術在荷蘭的試驗情形與進展，便只剩下一些有時顯得非常薄弱的假設。端詳當時的書籍，也無法得到答案，因爲其所使用的實際技術，光檢查成品是找不出所以然的。不過，以下的事實值得一書：在哈倫的圖書館裡，藏有一系列的印刷書，印製日期雖然不詳，但發源地卻極可能是荷蘭，其中包括兩張的字母書與四張的多納圖文法。部分專家相信，這些書上的文字印製，乃是來自黏土模具而非金屬鑄模，模具或許是用木質的陽文字範敲出。這些文本在印刷時間上大抵晚過美因茲的第一批書，唯其印書法的起源仍可能早過美因茲的那套工法⁷⁴。

時至今日，依然有一群比我們更專業的學者，試圖解答這些疑問。在此我們只能說，早期的印刷先驅，究竟如何獲致成果，恐怕永遠都不會有確定的答案。活字實際製造的問題，尤爲關鍵：初期實驗時，他們使用的是哪種陽文字範？陰文字模一直都是用金屬製造嗎，還是開始時會以黏土或細沙土爲素材？如果是後者，他們的陽文字範是不是木頭？陰文字模是否沒有其他的製

作法，像是用金屬或木質的陽文字範夾住鉛，加熱熔化成凹模？以鉛模鑄字，是否意味活字的材質一定不會是鉛，或其他金屬？鑄模跟印刷版，是不是一次做好一整頁？關於這些早期的工匠，有件事是確定的：他們邊摸索邊研究，一次進展一點點，長期下來終於找到解答。此外，我們似乎還能斷言，投入相關試驗的人，為數不少：荷蘭的柯斯特（如果真有此人）、美因茲的古騰堡、傅斯特與修埃佛，與亞維農的華沃高。他們都想找出最佳途徑，藉此以機械方法複製文字。木版印刷大為風行，證明以新的發明改良印刷，不但切合實用而且前景可期，故在一四三〇到一四五〇年間，可能也有其他的先驅者，與同樣的問題在鬥智；只怨文獻證據不足，無從得知這些遺珠的姓名。

可能的情况是，就算這許多的實驗者未在一四四五到一四五〇年間完成其發明，至少也處於重大突破的節骨眼上；而在這之後的十五年內，改良完成的發明，開始在商業上、工業上應用，並傳遍全歐，印刷史上另一個決定性的里程碑，遂出現於此時期。

最初的印刷產業，以美因茲為搖籃，這點當無疑義；其演進則與以下三位名人關係密切：史特拉斯堡訴訟案的被告古騰堡、古騰堡的金主傅斯特，和曾經就讀於巴黎大學，且可能當過抄寫員、也是書法家的修埃佛。一四四四年之前，古騰堡皆旅居於史特拉斯堡，實際停留時間可能更長；而他返抵老家美因茲，則是一四四八年十月之前的事。但為了繼續其實驗，古氏尚須更多資金；一四五〇年，傅斯特成爲他的靠山，貸給他八百弗林（金幣單位）以購買若干工具，利率百分之五。稍後傅斯特與他簽訂另一合約，允諾再借他三百弗林，爲其「製書工作」支應採購紙

張、羊皮、油墨之所需。所有線索皆暗示古騰堡距離實驗成功只差一步，甚或已經成功。豈料一四五五年，傅斯特竟控古騰堡違約，情況遂急轉直下；古氏以被告身分出庭，法官令他將尚未支用的款項，連同應付利息償還傅斯特⁷⁵。兩年後，第一本日期可考的印刷書《美因茲聖詠》，在傅斯特與其新夥伴修埃佛的合作下，於一四五七年的十月十四日，從印刷機裡誕生。接下來，修埃佛繼續發展事業，其印刷鋪更長期穩居歐洲印刷事業的重要地位，一直營業至十六世紀初。

此間的謎團頗多。《美因茲聖詠》的印相甚佳，絕非初試啼聲之作。從一些早期的多納圖印本與德文天文曆看來，印刷最晚自一四五〇年起，已經算是一門事業；而古騰堡也可能在返回美因茲之前，即已印出若干成品，尤其是在與傅斯特合作期間。會不會是傅斯特在古氏實驗終有結果之時，把握機會擺脫這個麻煩的發明家，並讓他那也許更聽話、更有生意頭腦的徒弟修埃佛，取而代之，據印刷祕術為己用？要真是這樣，古騰堡便與歷來典型的天才人物一樣，窮歲月之所得仍不免遭人強奪。他是否在與傅斯特反目後，仍繼續試驗？之後的他到底怎麼了？一種欠缺實據的說法聲稱，古氏移往班貝格繼續其實驗，是不是真的？一四五五年之後，他幾乎從歷史上消失。由於他從一四五七年到過世為止，始終無力將他在二四四二年借款的四里荷（法國舊幣，一里荷可兌二十索）孳息，償還給史特拉斯堡的聖多瑪斯教會，一般認為古氏晚年應是窮困潦倒。美因茲的護國總主教（特指與諸邦親王共享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選舉權之總主教）曾於一四六五年賜他貴族身分好替自己效力，並將他派駐在艾爾特維的宮殿；這不免叫人猜想，古騰堡可能曾在宮中架設印刷機器。但縱使許多當代著作，皆稱古氏為印刷發明第一人，卻從來沒有任何一本印刷書，在版權注記處印上他的名諱⁷⁶。

多數人都同意，一四五〇到一四五五這段期間，美因茲一地有許多的印刷工場，同時進行大規模的商業印刷：多納圖的拉丁文法入門書、用方言編寫的日曆、「贖罪證」（為協助賽普勒斯國王德呂希南抵禦土耳其人，由教宗尼格勞五世核發的贖罪券收據）等。此外尚有其他重要的印本，如傳統上被認為是第一套印刷書的《四十二行聖經》三卷、一四六一年之前印成的《三十六行聖經》三卷、《美因茲聖詠》、《康斯坦茨彌撒經本》、巴爾比於一四六〇年編著的《普天語典》和其他。這些出自美因茲印刷鋪的書籍，盡皆成爲反覆研究的對象，並依照其字體設計的不同而分門別類⁷⁷；有些學者甚至試圖找出哪本書是哪家印刷鋪的成果。我們無意繼續深究這些極爲專門的領域，但至少可以斷言：在商業印刷的第一階段裡，印刷方法日益進步，生產技術的效能日增，業已使得印刷商對自己的本領信心日增。早年的他們不印海報跟小冊以外的東西，稍後卻也不再怯於出版各種鉅著。在班貝格的菲斯特首度合併使用字版與木刻圖版之際，書籍的最終格式就此確立。同時間，首批印刷匠的徒子徒孫，逐漸遍及歐洲，並在各地傳授技藝；二十世紀前最具效率的理念傳播之途，由斯蔓延開來。

三、鑄製活字

第一批印刷匠的手法雖嫌粗糙，卻還是成功留下許多傑作。相傳爲古騰堡所印的《四十二行聖經》，尤令許多專家不由得讚嘆。至於古氏究竟遭遇過哪些困難、爲哪些事心煩，我們只能想像；這項發明到底耗去他多少時間，亦無從得知。不管怎麼說，當時的印刷，仍有許多技術上的

進步空間，如欲提升印刷業之產能，這些進步都是不可或缺的。時至今日，早期印刷匠爲了排除困難，理應經歷的諸多「屢錯屢試」，仍舊欠缺專家學者的探究與聞問。

首先得考慮活字粒製作的問題。當時的印刷師傅，需要的不只陽文字範、鑄模，跟一套簡便可靠的活字製作法，還必須找到夠堅固但不會損及陽文字範的金屬與合金，以及不會被液態合金的高熱所熔解的陰文字模。另一個重點在於，以合金鑄成的字，必須能吸著油墨，且具耐磨特質。最初使用的陽文字範，似乎是以黃銅或青銅製成，比起後來採用的鋼質工具，其耐用性略遜一籌。而這些匠人起先的製模手法，是把鉛熔化，傾倒在陽文字範的四周，使其凝固成模。在之後的過渡階段，他們開始把鉛敲擊成模，最後復改用銅模。有些學者主張，是修埃佛發明了鋼製的陽文字範與銅製的陰文字模；反對此說者則稱，鋼製的陽文字範要到十五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方才出現，而十六世紀的頭十年仍有人在用鉛製陰文字模⁷⁸。在這種情況下，匠人們各自採用特性不同的各種金屬，無怪乎十五世紀的活字林林總總：因爲用以製作活字的陽文字範和陰文字模耗損甚快，更換頻繁。此外，符號活字的製作，是爲了使印刷成果更富手抄本的書寫體韻味，但這些符號數量龐大，反而變成更大的缺點。第一批印刷匠人所鑄出的字母，係以連字線相接（將 *ae* 印成 *a*、*oe* 印成 *o*），且採用當時通行的縮寫法（以 *v* 代替 *ur* 或 *un*，以 *q* 代替 *qua*）；這麼一來，造成必備的各種符號活字，竟比現在還要多。這不免令我們疑惑，十五、十六世紀甚爲普遍的連字線與縮寫法，逐漸遭到淘汰的最主要原因，是否繫於工匠減少陽文字範和陰文字模數量的意願？畢竟在書籍演進的過程中，化異爲同、化繁爲簡的傾向，亦爲重要特徵。

活字字母本身，也反映出類似的問題。夠堅韌、不易磨損的合金，究竟是工匠一舉研發成功

的，還是反覆摸索而得？倘若我們將活字實際鑄造的問題，視為鉛、錫、銻三者比例拿捏的問題，只有正確的合金比例，方能確保其最大強度，此一課題應更容易理解。以純鉛製作容易氧化，在鉛中加錫則達不到理想硬度；倒是十五世紀以及此後三百年間所灌鑄的活字，強韌兩字當之無愧，雖然其強度還是不比今日。十九世紀迪鐸家族第四代的佛明·迪鐸，曾研究過阿爾都斯所使用的希臘字母，並推論這些活字耗損頗快。一五七〇年，阿爾都斯出版社第二代經營者保盧·馬努蒂烏斯同樣遇上這種難處，每印一本新書就得重鑄一套字母；他說，如果沿用已經印過書的舊活字，字粒會在四個月後報廢，只夠印完半本新書⁷⁹。或有人云，初期的活字合金，係以錫為基礎；這種說法的主要證據來自當時的錫字印，即一般人認定中，用以打印書末牌記（類似現代書籍的版權頁資訊）的器具。反過來說，用鉛質陰文字模鑄製含鉛活字（可行但難度高），容易損傷字模，工匠不願意加太多鉛在活字合金裡，是否因為有此顧慮？至於採用銻，想必是後來的事，因為十六世紀前尚無銻礦開採。不過，現存的最早活字，卻也是唯一足以推翻這種論調（或至少促其更正）的物證。它們鑄於十五世紀末或十六世紀初的里昂，奧丁亦曾研究之；經過攝譜儀分析，其成分包括錫、鉛、銻，偶爾還有微量的銀或鐵⁸⁰。要是連這種合金都快速耗損，那就只能說是多種金屬的融合比例難以精準掌控，成分迭有變化的緣故。事實上，一套活字裡，每顆字母的合金比例都不太一樣。尤有甚者，那些技術不夠好，或是弄不到所需金屬的印刷商，更有可能屈就於劣質的合金。甚至在三百年後，鑄活字的傅尼耶仍說，把金屬元素依正確比例混合，是件棘手而細膩的工作；時為一七六四年。他並指出，長期以來印刷匠所混用者，包含了鉛、一種叫「波錠」的粗銅、銻，有時還有鐵，但如此製成的金屬又有黏著性過高之弊，直到最

近的三十年，匠人才將製法簡化，並以鉛和一種含錫合金，提高金屬品質⁸¹。這麼看來，就連十八世紀的人，對當時所用的活字合金也不完全滿意。

活字本易磨損。印刷商被迫經常地更換活字，在這方面亦長期為許多困難所苦⁸²。欲了解這些難處，我們必須牢記，陽文字範的雕刻，與敲模、鑄模等工作，既冗長又容易失敗，只有專門的師傅才能勝任。像是陽文字範雕刻師，就得多年執業、經驗豐富才行。印刷產業乃是從無到有，其發展之初，舉凡陽文字範的刻製、陰文字模的製作、活字的鑄成，全靠早期的印刷匠一手包辦。每樣工作想必都得砸下大量時間跟金錢，且可能只得仰賴最原始的器具。若不是因為這些印刷匠曾經當過金匠，只怕連一點成功的機會也沒有。

所幸，在這些與印刷相關的新興工藝上，很快地便有專業人士投入。他們造訪一間又一間的印刷鋪子，貢獻一己之力，協助老闆添滿活字的庫存，或是更換新活字。至於他們製作的各種陽文字範和陰文字模，則由其雇主留存，變成各家印刷鋪的私有財，搖籃本因而在字體上呈現歧異、多元的樣貌。字體的設計與裁切很費時，故印刷商會把新鑄的字母與既有的字體混用，漸次汰換舊的活字。尤有甚者，印刷商還會把握同業死亡或破產的機會，收購因此而流落到市面上的工具，以因應過高的鑄製新字成本；雖然這樣的情形不常見。不過，他們還是可以請求資金寬裕的同業把字體賣給他們，如果能用對方的陰文字模製作自己的活字，更是再好不過。從十五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起，印刷商似乎慢慢地開始投入陰文字模出租的生意，只是一開始或許有些不情願，故把大寫字母稍加更動、重新刻製，藉此區隔不同印刷鋪的字型。

專門化的制度，也是由此開展。活字鑄造的事業，擴張於十六世紀的早期。在德國，這項工作由較大的印刷商接手；在法國，則由一小群專業的雕刻匠從事，其中不乏加拉蒙、廣戎等名人。在此同時，陽文字範的數量增加。哥德體爲人所棄，羅馬體起而代之，亦助長了分工的合理化。正因爲此種趨勢使得舊有的庫存再無用武之地，十六世紀之時，成套活字的個別製造與販售，逐漸成爲少部分企業的專門事業，企業主則盡可能蒐羅最好的陽文字範。到了十七、十八世紀，十多個財力雄厚的組織，獨占了歐洲的活字鑄造，這使印刷匠不須自己動手鑄造即有活字可用，產業分工更形合理⁸³。印刷匠購買多套活字組，乃是行之有年的做法，然而可用的字母數量仍嫌不足，其中的一個原因，得怪活字價格過高。十六世紀將屆時，他們購置的活字粒總數，一般約爲六萬到十萬顆，故一次只能組出十幾頁的版，且相同的字母還得重複「上場」，耗損自然更快。不僅如此，裝排好的「待印版」還得馬上付印，這樣活字才能儘快拆下來另組他版。如此一來，那些比較認真的作者，只能在印刷的過程中更正內文的誤漏，是以同一版的不同冊，便常常在內容上有所出入，參差之處多不勝數。

如果活字市場的組織化，是長期演變的結果，可以想見，任何一種形式的活字規格齊一化、標準化，都得費更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史料證實，欠缺一致的度量標準，確實讓早年的印刷商經常感到頭疼；像是「距紙高度」（即每顆字粒字身的總高度），今天已有定制，但當時卻無，每個地區，甚至每間印刷鋪，都有自己的規矩。我們還發現，有一套源自十五、十六世紀的里昂活字，兩百二十二顆字粒竟有十四種不同的高度；由此或可斷言，有時候甚至連同一鑄字廠鑄出的

活字，尺寸也不一定相同。既然每副活字組的不同字粒各有各的高度，要混用兩副活字，就不能不用銼刀修整其中一副的每顆字粒，俾使高度一致：這件差事既瑣碎又費工，想必多少阻礙了書籍的生產。所幸，活字鑄造稍後變成了大型鑄字廠的獨占事業，統一的規格遂逐步建立；唯不同的鑄字廠仍然生產不同高度的字粒，以避免客戶轉而光顧其他同業。十八世紀，路易十五律定了十又二分之一「行」的標準字粒高度，但根據傅尼耶⁸⁴留下的資料，里昂的印刷商與鑄字商並未奉行，其字粒高度至多可達十一又二分之一行。

就字體來說，欠缺一致性的情況也是一樣。衡量的標準尚未建立，有的只是一套約定俗成、活靈活現的名稱系統，諸如「大目」體、「典範」體、「西塞羅」體、「大羅馬」體、「奧古斯丁」體等，種種字體的命名皆任意為之，其意涵則是人言言殊。這種情況自然容易造成混淆。直到十八世紀，業界才在傅尼耶與安布拉斯·迪鐸的努力之下，採用了絕對的度量標準，即點數系統：一「點」相當於欽定呎的一百四十四分之一。這種活字排版專用的度量單位，一直沿用到今⁸⁵。

四、排字與打印

探討過陽文字範雕刻師和活字鑄造師的工作之後，以下將研究印刷匠本身的工作內容。這可以分成排字、印刷兩個部分來看。而所謂排字，就是把活字在「待印版」裡排組成許多頁；之後只要把整版放進印刷機，就可進入下一階段，進行實際的印刷。

手排版的技術，從印刷術誕生以來，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只是在整行鑄排機（又稱自動鑄排機）與單字鑄排機發明之後，這種老技術愈來愈罕見。其所應用的設備幾乎與古法相同：排字工面對著一個木製的方櫃，稱為「活字櫃」，櫃中分隔出許多鴿巢狀的小格子，用以收納字母或符號。先把活字一次一個地從中取出，放進一種小型的槽狀容器裡；這就是排字「條」，早年是木頭材質，後來改用金屬製作。等到櫃內裝滿一整行的活字，亦即組裝完成後，即可將排字條置於「活版盤」中；這個小盤除了裝盛活字，在每行之間還設有小塊的鉛，把一行行的活字隔開，但付印時不會留下痕跡。最後，排字工把數行活字合成一頁，再把數頁活字合組成待印版，以角狀木塊固定，確保密合不鬆動。

排字工必須精通一連串的動作，操作不僅要熟練，還得講求迅速跟確實，每個動作皆須流暢、不假思索。相較之下，十五世紀的製造業，在此之前並不講求這種緊湊的手工節奏；這使得我們不免要問，在十五到十八世紀這段期間，要求印刷商提升產量的呼聲，究竟強到什麼程度，從而促使匠人另覓良方，好讓排字作業的效率發揮到極致？

有兩件事情似應先注意。其一，比起現代的排版者，早年的排字工，工作起來無疑比較辛苦。今天仍在從事手排版的人，是站在斜置的活字櫃前工作，尚能自由移動；十五世紀，甚至十六世紀時，可不是這樣。一四九九年，胡茲在里昂所印製的《印刷工的死亡之舞》一書，其中有幅圖，圖中的排字工蹲坐著，面向一個甚為低矮、微幅翹起、裝在支架上的活字櫃。十六世紀早期，包括許多印刷鋪印記在內的各種版畫圖樣，顯示活字櫃的高度增加一些了，傾斜的角度也更

多些，揀取上半部的活字比較容易，並改放在桌面上以方便處理，唯排字工還是坐著工作。一直到十六世紀的後半，活字櫃擺放的位置終於改成現在的樣子，排字工也才改採今天的立姿作業。

其二，早期的排字工人，從事著非常講究細膩、敏銳的工作。舉例而言，今天的排字工在從小格子裡取出活字時，經由觸摸刻在字脛（從活字肩起算，到活字底的部位，不含活字面凸出部）上的凹槽，就能辨別字母的哪一面該朝上，並直接放進排字條，不須多瞧一眼。但端詳現存的古早活字，以及早期印刷書內頁在打印時留下的活字痕跡，卻顯示十五世紀的活字大都沒有這樣的凹槽；工人在把這樣的活字放進排字條之前，非得目視檢查不可。

但是，字粒如何分置於活字櫃內，才是排版技術上最主要的問題。爲了求快，排字工在處理活字的時候，不能遲疑或多看，得像機器一樣工作，一如現代的打字員敲鍵盤。故印刷工人所用的活字櫃，其中的字母必須永遠依同樣的順序「分」（分置）好，俾利迅速作業。此外，所有的印刷鋪，都得採用同樣的方法安排活字櫃，否則排字工只要換個地方工作，便無法完全施展眼明手快的好功夫（與近代相比，十五到十七世紀的排字工，較常更換工作的地點）。

時至今日，不管在歐洲的哪個國家，國內所使用的活字櫃皆同，彼此間差異甚小。櫃子上半部的隔間，即「大寫字母櫃」，又分成兩格，各自存放大小兩種尺寸的大寫字母；比較靠近排字工的下半隔間，則存放小寫字母。當然，不同國家的活字櫃，會隨字母系統的不同而改變，道理跟打字機的鍵盤一樣。

字粒是如何分置的？字母排放的方式，究竟是各國皆異，一如今日？抑或是在拉丁文通行全歐的情況下，各國同採一種活字收納方式？若後者爲真，各國活字櫃的差異，又是何時衍生出來

的？很不幸地，由於十七世紀末之前的文獻，流傳至今者，皆未記載確切的相關資訊，我們無從獲悉這些問題的真正答案。如果諸君還記得，符號活字的數目，可多可少並無定規；這不僅是因爲當時的匠人習慣刻製、鑄造字跡相連的字母，也是因爲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早期，印刷書使用大量的縮寫。既是這樣，活字櫃顯然無法統一。所有的證據都顯示，活字分置的方式，隨當地印刷業的習慣而有所不同。畢竟那是個在地習俗根深柢固的年代，今人欲判別十五或十六世紀的木刻版源出何處，辨識其風格即知；欲推測某種字體出自何處，亦可從外型來推敲；就連印刷機，也是因地而異。另一方面，受雇於人的印刷師傅，在當時頗爲頻繁地四處旅行，想必也發揮了傳播的功能，將起源於某地的實務技術移植至遠處；最後最合用的做法，就會廣泛地爲人接受。這麼說來，在我們看來最理所當然的原則，諸如將大寫與小寫字母分開放置等，廣獲採用也是遲早的事。雖然這些通則理應對排字工的工作有利，協助他們以必要的反射動作快速作業，但數個世紀以來，業界對此似無嚴格規定。

在《印刷學實務》⁸⁷一書中，來自亞眠的印刷商費泰爾指出，一直到了一七二三年，法國各地的印刷鋪，在活字的分置方法上依舊各行其是。當時的印刷鋪老闆，視情況任意變更活字收納的位置，尤其是大寫字母；這就讓應聘的師傅每次移地作業，都得「重新熟悉擺法」。有鑑於此，費泰爾提出兩種他認爲最便利的活字排放方式，希冀能爲人廣泛應用。其中一種，是把較大與較小的大寫字母依字母表順序存放，與今日雷同；至於早年較不常用的J與U兩字母則移往他格存放，這點似乎很久之前就就有先例。字母櫃上半部的左下方，以及字母櫃下半部內，依字母使用頻率的不同，設置大小各異的小格子，存放小寫字母，這點也與今日一致。除了些許顯著的差

異外，這一種擺放法，與摩默羅在一七九三年版《印刷術基本特徵》書中所示相似，也與法文《百科全書》⁸⁸所言者相近（唯該書所繪之活字櫃下半部，平面圖與立置圖竟相互矛盾）。這麼看來，就算到了十八世紀的尾聲，各類活字應當置於活字櫃的何處，在法國仍無共識。十九世紀初，類似摩默羅著作或法文《百科全書》所載的活字擺放方式，方告普遍（但仍舊稱不上「定於一尊」），就此成爲尋常印刷作業的一部分⁸⁹。

將字體打在紙面上的基本設備，當然就是印刷機。這種堅實而樸素的機器，從十六世紀中葉起到十八世紀末，幾乎沒有改變，它的原理並不難⁹⁰。由緊密接合、不易鬆動的許多活字排組成的數個頁面，合成了一個待印版。印刷之前，得先將待印版放在印床或印石台的上面，活字凸出的那一面朝上；印床原本是磨光的平整大理石，到了十八世紀由鋼板取而代之。待印版就定位後，用兩支墨極塗上油墨，紙張則置於整組直立活字的上方。接下來就是印刷機上場了：驟然拉動壓印桿，會牽動一枚螺栓，連帶推動大理石台上方的壓板，將紙張朝著待印版的方向重重壓下，字體便印在紙面上。

如此概括而論，整個原理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從實務面來看，前述裝置如欲應用於印刷工業，就必須先解決三個關鍵性的問題。第一，一旦把待印版放進印床與壓板之間的空隙，就幾乎不可能替待印版上墨，因爲壓板抬不高，作業的空間不夠。這也就是說，在上墨的時候，一定要設法把待印版從壓板下方移開。故第一批印刷匠設計出一種小型滑動架，裝在滑軌之上，再將石台跟待印版置於架上，並利用一根旋轉把手或所謂的「導桿」，配合簡單的牽曳系統，前後移動

滑動架。

第二個問題關乎實際的印刷，那就是在打印的剎那間，不能讓油墨濺到紙上，欄外的空白處尤其不能弄髒。待印版沾墨處接觸紙面時，油墨也可能擴散到不該被染黑的地方（如字母筆畫間隙處）。基於此，印刷工人會另以紙張或羊皮包覆待印版，只露出中間的活字部分。另外，就算活字鑄製的品質再高、印前的調整工作（即將每一行活字排列整齊）再仔細，也難保所有立於待印版上的活字，高度都能整齊畫一。如果讓紙張跟上方的壓板直接接觸，那些高度低於其他活字的字粒，就會印不出來，並使其其他字粒打印上過深或過淺的字母。若要解決這個問題，並賦予壓板表面若干彈性，就必須在紙張跟壓板之間，放上一張毛毯或許多張紙，俾利壓板平均施力於每一顆字粒。

前述的各種問題，促使印刷匠在印刷機上添加了夾紙框與墊框的設計。「墊框」係由一大一小兩片框架所構成，透過轉軸固定在印刷機上，印床與待印版則置於兩片框架間。兩框分別夾著一張撐開來的羊皮，其中小框覆上一層厚棉絨，以紓減其壓力。大片墊框的反面與印刷機相連，正面則以轉軸連接「夾紙框」；夾紙框除了夾紙，還繃著另一張羊皮或厚紙，其與活字接觸的地方悉數剪去，以避免於印刷時沾污。在壓印的過程中，夾紙框會向墊框的方向曲折，環抱住欲印的紙張。另外，再用兩顆釘子把紙釘在墊框上，避免其在擠壓中移位。

最後一個問題最麻煩，且與壓板的尺寸不能太大有關。爲了印出合宜的書頁，拉動壓印桿的方式也不能馬虎，務使各顆活字平均地承受壓力。易言之，壓板朝下的那一面，必須與活字朝上的那一面完全平行。長期以來，印刷機皆無法一次印完一張全開紙的大面積，原因即在此：匠人

得先印好半張，然後移動滑動架，再印另外半張。這就使得整張紙的打印還得扳動壓印桿兩次方告完工。

絕大多數歐洲國家，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用的都是這套辦法。印刷機是相當有效率的設備，而且構造簡單，一名接合工或木匠即可完成組裝；至少在法國，專業的印刷機製造者，要到十八世紀才出現。

早期的印刷術實驗者，在懂得應用印刷裝置來從事活字版的打印之前，使用的是不是雕版書的拓印技術？有此可能；但想必他們很快地改採廣獲肯定的新方法，開始應用印刷機，畢竟《四十二行聖經》不太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印出來的。因此問題又來了：第一台印刷機是怎麼來的？合用的印刷機，開始時是如何造出來的？起初他們試驗的印刷法，是否與後來採用的定案不一樣？有沒有部分的印刷匠，尤其是遊走各地的，完全不用機器打印，或只用輕型的簡便印刷機？就我們所知，從許多角度來看，早期的印刷作業技術，都是相當奇特的，可能與我們以為的樣子差距很大；早期用以在待印版中組裝活字的方式，尤其如此。檢查流傳至今的最古老活字，以及某些印本裡殘存的十五世紀活字痕跡，結果同樣令人困惑：大多數的活字，上頭都有小孔或縫隙穿過，且其底部不是切成斜角，就是呈現箭鏃形狀。

為解釋前述情況，有人提出一些假設。一種說法聲稱，當時用以鎖緊待印版的裝置尚不完美，所以要用絲線或細長的金屬器具，穿過整行活字使成一直線，活字組的表面才會平整，孔隙痕跡便是由此而來。這似乎牽強了些。不過，一旦我們了解到，這些洞是在活字鑄畢之後，才用

利器或銼刀鑽成的，便更能體認活字的製造，當真是「粒粒皆辛苦」。這同時也揭示了，在那個活字排版的技術依然原始的年代裡，首批印刷匠在執業過程中必須克服的種種難處，究竟有多麼棘手⁹¹。

講到活字底部慣有的斜切面或箭鏃形狀，更是令人不明究理。當然，若要說這麼做是爲了讓各類活字的字粒高度更加整齊畫一，也言之成理，畢竟斜切設計在作業上可能有其簡易、確實的考量。然而，平整方正的底部，肯定比傾斜或尖狀的底部更好，畢竟後者更加容易傾倒，一旦活字放歪了，即便把多顆活字緊密並置，還是會不夠牢靠；更何況我們連當時是用何種技術確保保持印版中的字粒緊密接合，好讓印刷成果清晰，都還沒有研究出來。綜合這種種的情況，活字充滿變數、字粒多所缺陷，待印版是如何夾緊的又說不一定，何以十五世紀的書，還能印得如此一絲不苟？提出這個問題的技術專家，曾用以下的大膽假設來釋疑。據他們推敲，當時的打印方式，跟如今我們認定的正常方式恰好相反：紙張並非夾在活字版上方，而是把待印版顛倒過來，字面朝下，壓在紙張的上面。假如我們也這樣想像，則起初的印刷機，不僅和最終所採用者不一樣，設計上或許還簡單些。若真是如此，應該考量的問題就只剩下兩個：一是印刷機可能不是絕對必要的，印製小本書冊尤其如此。二是十五世紀爲數眾多的遊方印刷師，是否有辦法隨身帶著印刷機。但願進行中的印刷技術研究，有一天能幫我們找到問題的答案⁹²。

真相如何暫且不究，初期的印刷機想必相當原始。率先誕生的印刷書，即便大小只有四開，一次仍只能印刷一頁，待印版的尺寸則永遠與頁面相同⁹³。這麼一來，就算印刷匠再費心，連續印刷的書頁上，總是會有某些頁面的行高，無法完全對齊前後頁的各行，這樣的書通常不會太美

觀。一四七〇年之後，這種不便漸漸消失，似乎與扳動壓印桿兩次的技術肇始於同一時間。此後，待印版開始由數頁組成，有時其尺寸還與整張全開紙一般大小。爲了切合這種多頁印刷的需要，光是把待印版裝設在滑動架上並不足夠，還得講求移位時的迅速與精準。過不了多久，在十五世紀結束之前，匠人利用一種結合旋轉把手與拉桿的系統，控制待印版的水平移動。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只要讓滑動架能在木桌的水平表面滑動，就足以因應印刷匠的需求；最後，又改以兩條滑軌支撐滑動架，操作也更加輕鬆、準確。

十五到十八世紀間，印刷技術的改進，可不只前述的這些而已⁹⁴。印刷匠固然未曾更動印刷的基本原理，卻完成不少細部的改良。十六世紀時，他們把原有的木質螺紋脊改以金屬製作，並將所有承受打印壓力的零件加以強化，提升印刷機的耐用度。只要端詳當時的木版畫，和印刷鋪印記裡的印刷機圖樣，就不難發現這些改進。這段期間的印刷機或可分成三類：第一種來自里昂、第二種來自德國北部、第三種則來自法蘭德斯。德式印刷機看起來既纖細又脆弱，一開始便迅速遭印刷鋪汰換，改用法蘭德斯式。巴黎則很快地便接受了里昂式印刷機，而它後來也普及至全法國、瑞士、英格蘭，最後傳往低地諸國和西班牙，到十六世紀末成爲廣泛使用的機種。

十七世紀早期，在荷蘭的印刷產業持續發展之際，地圖印刷的巨擘布勒，又替印刷機做了許多修改。布勒曾與天文學家布拉赫共事，並在投身出版業前製作過數學儀器。他除了強化印刷機的結構設計使之更爲牢固，還引進一種叫「軛片」的彈簧，好讓壓板打印出更均勻、平整的圖文。這種「荷蘭式」印刷機逐漸普及於低地諸國，不多時即以印刷品質優良而著稱，隨後傳往英

格蘭；然而法國繼續採用舊式的里昂式印刷機，沒有接納新機型。由是觀之，十六到十八世紀間，傳統的兩次拉桿印刷機，只有小幅度的變動。在這段將近三百年的時間裡，印刷工人似乎對這種結實的大機器非常滿意，而他們打印的速度之快，更叫我們驚訝。十六、十七世紀的工人，在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六小時的情況下，可以印完兩千五百到三千五百張全開紙（雖然只是單面印刷）；換句話說，每二十秒能印完一整張紙，效率實在嚇人⁹⁵。

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紀末，即百科全書的時代開始，印刷鋪老闆才在印量提升與技術問題的驅使下，尋求新的方法，以加快印刷速度、減輕匠人的工作負擔。一七八二到一七八五年間，迪鐸與阿尼森兩位大印刷商，分別修改了既有的螺紋脊，讓印刷機只要拉桿一次就能印完全張，但兩人的發明皆未廣獲採用。倒是書籍開本的增大，不僅促成了前一章所述的造紙方法大變革，也刺激印刷業改用與手動印刷機頗為不同的新機器。一七九五年前後，倫敦的史坦霍普伯爵，由一位名叫沃克的技工協助，設計出一台幾乎全由金屬製造的印刷機，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仍被許多印刷商用以打印校樣。在這之後，十九世紀的機械革命，開始影響印刷機。「泰晤士報」是史上第一批大量發行的報紙之一；一八一四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正當該報的手動印刷工人準備上工之時，社長華克竟向他們出示一份通宵趕工、已經印好的當日報紙，商業用機械印刷機的時代就此降臨。華克在那一天的報紙裡驕傲地寫道：「今天，本報將印刷術發明以來，最大幅進步的具體成果，向世人展現：一千一百多張紙，一個小時內即可印畢⁹⁶。」

昔日印刷匠所面對的問題甚多，絕非僅止於前面所提出的數種。要完成一次順暢的印刷，紙的品質必須講究，但高級的紙張取得不易；就算弄到了紙，印前仍須加工。更由於一張紙上常得印刷許多頁，其過程愈發複雜，且容後述。

唯有不易變形破損，且尺寸裁切得宜的紙，方能用來打印，並吸收油墨，但在印刷發展的早期，並不是每種紙都有這樣的能耐。十五世紀的造紙商，對印刷所需的高級紙格外用心製作，道理即在此；尤其是當時的義大利紙廠，為此採用優質碎布做為原料，製出强度高、纖維細、厚度充足的紙張。其色澤灰白，品質齊一，似乎全然滿足了印刷商之所需。

但印刷鋪的紙張需求實在太高，紙廠幾乎應接不暇。故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早期，印刷商常在一冊書裡混用不同類型、來自不同紙廠的紙；十六世紀中葉起，印刷鋪遽增，某些地方的造紙業，根本無力產出足額的堪印紙張。既然優質碎布欠缺，加快出貨速度又比較有利可圖，紙廠乾脆生產起二流的产品。有頗長一段時間，歐洲各地的印刷商，書信中滿是責難、埋怨供紙廠商的言詞，用「油膩」、「脆弱」、「易破」、「胡亂裁切」形容品質低劣的紙。更由於印刷商為了求經濟、省運費，只在印刷鋪的附近採購紙張，如此紙質就更難講究，書籍品質連帶低落。結果，印刷商不得不遷就於當地製造的低級紙，直到十八世紀才有能力負擔自外地購紙的運費。

然而，最叫人頭大的問題，其實與書頁在待印版中的放置有關。在解釋這個問題前，得先把決定書籍開本大小的原則重提一遍。對開的書本，是把一大張全開紙對摺一次之後做出來的，故整張（後文所言之「整張」，除非特別注記，否則皆指全開大小的待印紙張）紙的正反面分別印上兩頁，總共可以印出四頁。四開大的書本，是把整張紙對摺兩次，正反兩面各印四頁、共印

八頁；八開大的書本，須將紙張對摺四次，正反兩面各印八頁，共十六頁，其餘依此類推。摺好的紙張就變成一帖（quire），而對開書的一帖有四頁、四開書有八頁、八開書有十六頁。不過，對開與四開書的一帖，頁數過少而強度不足，故常把兩張紙做成一帖，厚度加倍，頁數也加倍。相反地，小開本的書（如十六開、二十四開、三十二開），若以一大張紙印出的所有書頁為一帖，又嫌太厚，故單張印成的各頁常被分成好幾帖：十六開的書，一張紙可以印成三十二頁，就分成兩帖各十六頁。二十四開的書，是把四十八頁印在一張紙上，所以將之分成兩帖：一帖三十二頁（十六張書葉）、另一帖十六頁（八張書葉），在法文裡以「大帖」和「小帖」來稱呼。

既以這種方式摺疊紙張，印刷工人自當小心安排每一頁在待印版裡的位置，否則就會印錯。就對開書而言，第一頁與第四頁的活字版，得並置於待印版的同一邊，而另外一邊則放著第二頁與第三頁；較小開本的書籍亦同此理。這套方法看似複雜，卻能確保每一帖的厚度恰當，並使書冊在裝訂後的牢固程度達到最高。此外，這樣的組版（各頁活字在待印版中的編排）規則，大大便利了裝訂工人的作業，不假思索地直接摺頁成帖，也不會導致頁碼錯編或頁序錯置；在採用這種方法之前，錯頁可是時有所聞的。

近期的研究⁹⁸顯示，手抄本的抄寫員，早就採用了這種組版法的頁序系統，在中、小開本的手抄本上，應用尤其普遍。這些抄本包括教學用的手冊與書摘，以及經常大量製作的實用性宗教書（每日頌禱、時辰禱書，以及關乎主教區行政業務者）。倒是印刷商，起初習慣把整張紙先裁成單頁大小，再用小型待印版（小於一張全開紙）一頁接著一頁印，較晚採用此種技巧；因為這樣，早期的印刷作業比較耗時。更麻煩的是，紙張的大小並無一定，主要的尺寸有「皇開」（大

約七十公分乘五十公分）與「中開」（大約五十公分乘三十公分）兩種。印刷商經常把半張的皇開紙與整張的中開紙混用，是以同一本書所用的紙，有些比照對開本的方式印刷，其他張卻當成四開本來印。此外在一般情形下，帖內的紙張數會儘量求多，唯以不影響裝訂的牢固程度為前提；至於同一冊書的不同帖，頁數也會不一樣。像是四開大的搖籃本裡，就鮮少由一大張紙摺成一帖，而是以兩或三大張紙合摺而成。十五世紀末，將兩大張紙摺成八張四開書頁，做成一帖，才變成慣例。這一套方法的缺點，也很明顯：印刷時可能出錯、印刷前須先推算每一頁在書中的位置、印刷後須依序核對紙張，這都造成了裝訂工的困擾。這些在在說明了，早期印刷匠的任務，究竟有多複雜；而複雜的也不只是組版，還包括印刷作業的許多面向。等到印刷商累積足夠的經驗之後，才在十六世紀期間，逐漸採行標準作業。那時發展出的統一慣例與技巧，更長期為印刷業所沿用，直至十九世紀、甚至現在。

六、中國的先例*

我們都知道，造紙術是中國人的發明，故歐洲人發現印刷方法，中國人亦有間接功勞⁹⁹。除此之外，迄今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對歐洲的印刷發展並無其他貢獻；然而，中國人懂得用活字來印刷，比古騰堡早了將近五百年，卻是事實。

*本節由圭娜爾女士（法國國家圖書館手抄本部門專業管理員）撰寫。

在中國社會，學者（士人）具備獨特的影響力，學識亦被尊為生命的活水源頭；至於中國文學，則是代代相傳，愈發博大精深。最古老的文字紀錄顯示，商朝（西元前一七六五至前一二三年）時候已有「書」的存在：爲了占卜，會將獸骨與龜甲用烤紅的火鉗鑿開，再把問卜結果刻寫上去。已經辨識出的甲骨文字，將近有兩千五百個，是今日八萬個方塊字的先祖。當時常見的象形字「冊」，現在仍用以指稱構成一整套中國書的薄本單行本。這個字由一橫穿過四豎所構成，象徵的其實是書本最原始的形式：用浸過某種亮漆的針筆，在許多竹片或木片上刻寫直行的字，再以皮帶或絲線串接成冊。孔夫子研讀的《易經》，就是寫在這種竹簡之上；根據「韋編三絕」的典故，他治學甚勤，就連皮帶都弄斷過三次。現存最古老的中國書籍，出土於二十世紀初的中亞沙漠。這些木牘與竹簡的成書年份大都在西元九八到一三七年間（東漢），其上載有各種字彙、曆書、藥方，和關乎絲路沿線駐軍日常生活的官方文獻¹⁰⁰。這批竹簡用毛筆寫成，意味當時的書寫技術應有一定進展；但這種書本既厚又重，且繩線一旦斷裂，竹片就得重新串接，煞是費事。因此過不多時，竹簡便爲柔軟、輕便、強韌的絲帛所取代。中文以「卷」字稱呼一本書，就是因爲古人會將蠶絲織成寬約三十公分的帛布，「捲」在兩端皆有裝飾的短木棍上¹⁰¹。

絲綢相當昂貴，是以便宜的替代品應運而生。經過不斷地嘗試，從失敗中學習，中國人先以廢絲帛爲原料，後來又改用更易取得的亞麻破布、漁網、大麻、桑樹皮，成功做出一種黏漿，乾涸後就能書寫於其上。不過，中國有樣根深柢固的傳統，總將所有的好事歸功於皇帝與朝臣，故卒於西元一二一年，兼任尚方令（宮廷手工坊坊主）的宦官蔡倫，雖是公認的造紙術發明者，但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在紙上寫字。根據現存的奏摺，蔡倫於西元一〇五年，向皇帝稟報造紙之

事，就此名留青史，倒是諸多造紙先驅的努力，反而遭人忘卻。

保留至今的古代紙張中，年代最久遠者，亦來自中亞；這七封以中亞古國粟特語寫成的信件，不僅妥爲摺疊，連收件地址都已經抄上。二十世紀初，斯坦因爵士在長城的一處塔樓廢墟，找到這些信紙；該處於西元二世紀中葉，遭中國官兵棄守¹⁰²。後經魏斯納教授以顯微鏡研究，發現其紙漿全以大麻布料製成，其中幾塊碎片仍然完好¹⁰³。由於我們可以確知這些紙是在中國境內製成，而使用它的又是遠離造紙中心的異國人士，可見這項新發明，傳播起來相當迅速。就這樣，紙張取代了絲綢，僅剩下少數奢華的抄本仍書於綢緞之上。中國人並把長四十五公分、寬二十五公分的小張紙，一邊黏一邊、一張接一張地連成一長串，末端接上軸棍，以便攤開閱讀或捲起收藏。另外，敦煌石窟壁內的浩瀚書海，乃是五世紀到十世紀末的產物，迄今出土的一萬五千多卷手抄本，分別由大英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與北京國家圖書館收藏。這些抄本雖以紙卷軸爲主，其中亦夾雜其他型態的書本，且終將順應印刷術的發明而有所變化。

是什麼改變了原本卷帙型態的書籍？攤開長達數碼的一整卷紙，才能找到某段文章，甚爲不便，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印度經典抄寫在細線串接的細長貝多羅之上（貝多羅即多羅樹的樹葉，此種裝幀方式稱爲貝葉裝或梵夾裝），也可能是虔信佛教者有意仿效的。當然，這更可能是許多張紙分開印刷後再接合成冊的結果。敦煌出土的手抄本，便是在各張書頁上打孔，並以細繩串接。當中還有一些例子，各張書頁並非完全分離，紙頁外緣連成一氣，收摺起來呈長矩形，開展時又似手風琴的風箱，向前或是向後翻查都很迅速，故中國人以「旋風裝」稱之。這種書頁摺法，很快地廣獲採用，阿拉伯作家伊斯哈格在西元九八九九年寫下的這段話，可以爲證：「中國人

把宗教經文與學術著作，抄寫在許多張紙上，展頁時宛如摺扇開屏。」其形式兼有印度與中國風，用以記載佛家與道家的文本，也成為版畫、水墨畫輯，以及書法字帖的格式。只是旋風裝裡的紙張沒有依托、容易撕裂，後人遂將書頁對摺，於中間摺縫處黏合，紙頁外緣不復相連，翻動時彷彿蝴蝶振翅，「蝴蝶裝」由斯得名。相較於歐洲的書本，這種裝摺法堪稱是中國書的典型，用來抄謄文字最為理想，但若耍拿來印刷，就只能採用凸版，拓印於紙張的其中一面。爲了隱藏起空白的背頁，古人又改變了裝訂方式，將對摺的各張書頁縫合於紙頁外緣而非摺縫處。中、日、韓三國使用的紙張，柔軟纖細，非常適用此法，甚或沿用至今。至於成書的各帖，外覆厚紙或絲帛以爲保護，厚度多半相當於書中的一章，六至八帖合成一冊，選用珍貴的薄木片做爲封面、封底，或收藏在表面裹以厚織物的盒子裡。這種書平放在架上，每一帖的書脊皆寫上篇章名，方便讀者檢閱。

中國人關心的，可不只在書閣裡查閱經書是否方便，也希望找出既實用又實惠的文本複製方式。約莫在西元紀年開始之際，他們的雕刻工藝已有長足進展，能將經書典籍刻於大型石碑上，也能刻飾比丘與道士的法器，以便複製符籙或宗教圖樣。

拓碑是複製文字或圖案的絕佳辦法。由於碑文的功能，不外乎避免傳抄錯漏、慶祝特定事件或頌揚某人功業，墨客或信眾也利用此法，替自己留下造訪名勝的紀念。這樣的拓印法未曾變化，用以複製文字，迅速而便宜，始終爲人所喜。中國紙堅韌而柔軟，稍加壓揉、敲打，便與石碑表面的起伏緊密接合。紙張濡濕時，會深陷進石面的刻痕中，此時上墨，不會沾染到陷入刻痕的部分；待紙張風乾、與碑面分離，自然在黑色或其他顏色的背景中，浮現留白的字跡。

不過，後來的書本印刷，還是由陽文反刻的印章直接演變而來。西元紀年肇始時，浮刻陽文的印章已經普及，亦有善男信女刻製長篇的佛典，稍後更在咒文旁雕繪大幅的神佛或菩薩像，用以裝飾出家人或信眾的房間。一方面，雕版匠的技術日益精純；另一方面，這種技術不適用於絲帛，打印在紙上卻相當清晰。一如在歐洲，中國人一旦發現了合適的印刷媒材，便展開許許多多的實驗，雕版匠也更加大膽地嘗試。咒文之外，他們並試著印刷小本經書，此後還印製短篇的信仰作品，以及曆書、訓詁書等通俗文本。

這種浮刻木雕版的最早例證，當推二十世紀漢學家伯希和在新疆庫車（古稱龜茲）附近發現的小幅佛祖像，伯氏推測其為八世紀中葉的產物。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古物，也包含許多九世紀附有經咒的佛家版畫。然而，有幸收藏世上最古老雕版書的，卻是大英博物館；這是一幅木版印刷的長卷帙，成書於西元八六八年。該篇佛經的卷首始於一幅版畫，構圖繁複而雕工細膩，證實當時的工藝水準已然卓絕。但是，使用此法印製經典古籍，卻因為學者的反對，延宕了至少一個世紀；這群文士認為刻書對古聖先賢不敬，此外似乎也憂心往後難靠抄書餬口。

起初，雕版印刷僅通行於黃河流域，但最終仍為文人採用，以之保存、散布儒學作品。五代之時的馮道，則是奏請皇帝刻印儒典的第一人；一如東漢蔡倫，他的上書留存至今，故今日仍有人誤信刻書是他的發明，實則只有奏議之功。馮道於西元九三二年提出此議，乃鑑於後唐財政吃緊，諸如前朝《開成石經》的雕鑿，已無力為之，故以雕版印書做為保存儒經的最後手段。這項雕經工作始於西元九三二年，完成於西元九五三年，大功告成後也大幅提升了雕版印刷的地位，此後並逐漸普及於所有既存的文字作品。也有人旋即嘗試改進此法，但銅版印刷、活字試驗等，

皆告失敗。

十一世紀時，知曉冶鐵與煉金的北宋人畢昇，相傳是首先嘗試活字印刷的人。他用膠泥刻字，並以火烤硬化；排版用的鐵板，則塗上紙灰、蜂蠟、松脂的混合物，活字置於其上，排定後以鐵框固定。接下來，將混合物慢慢加熱，冷卻後活字便牢固地附著於板面。該頁印畢後如欲取下活字，只消把鐵板重新加熱即可¹⁰⁴。也有人另闢蹊徑，試圖以硬質的檜木或澆鑄的鉛銅製作活字，但這些工法在中國始終罕見。倒是十八世紀的《古今圖書集成》，以銅質活字印成；然而，這套由皇帝敕令編纂、厚達萬卷的百科全書，並未採用鑄造字粒，而是直接鑿字於銅。印刷《康熙字典》的活字，係依兩百一十四個部首貯放，這才使得數以萬計的字粒，在檢取與歸位之時，有了比較切合實用的分類系統；唯這樣一套活字造價過高，印字所需的人手又極多，不假朝廷之力不能為之。不過，這些龐大的出版品主要供官差朝臣參考之用，相形之下成本高低也就無所謂了。若是民間籌印，則匯集鉅資、聘雇足額人力、依實用順序貯放大量活字等，想必都有窒礙難行之處。此外，中國墨汁較不黏稠，幾乎無法附著於金屬表面，亦不利於金屬活字的發展。最後，基於美學與感性因素，舊時的中國讀者鍾情於運筆的藝術，偏好與文旨相映成趣的書體筆法，活字印書自然不得垂青，還不如木刻書、雕版書，更能忠實反映書法風格。直到二十世紀，中國才重拾活字技術，但起初只用來印刷報紙與大宗書籍。

中國的出版品，常由堅持木版印刷傳統的民間個人出資付印。朝鮮的情況則不相同，文本的傳布全由官方負責，活字印刷術從而得到全面發展的契機。

十三世紀上半，朝鮮開始使用這種技術；俟十五世紀李朝世宗即位，大加推廣，其地位更形

重要。活字印刷啓迪了他的政策，這點可從西元一四〇三年的詔令清楚看出：「國欲治，法典經籍之理，必先行於天下，明正道、去邪心，然後能稱治矣。吾國西絕中土以海，大明篇卷東渡者希；至於刻木造書，底版未幾即損，豈窮天下文章？寡人之意，施字於銅以爲梓，廣印書冊，則利不可勝數。或謂民力拮据，不宜濫支，運官贖而成詞章，可也。」遵照這篇諭旨所做出的活字計十萬顆，但這只是第一套；在這一百年間，共有十套活字收藏於官方的印刷工坊裡¹⁰⁵。分別在一四〇三、一四二〇與一四三四年最先做成的三套，比歐洲印刷術更早。

同屬中國的鄰邦，也同樣應用活字印刷的，還有回紇人（今稱維吾爾人）。他們是突厥人的一支，使用拼音文字，故活字技術與他們的書寫系統一拍即合。伯希和曾在敦煌石窟裡，發現一套小顆木塊做成的回紇字母，大約刻製於一三〇〇年。突厥的遊牧部落固然與西方有接觸，但歐洲印刷術應該不是他們傳入的。

十四世紀初，在伊兒汗國（元朝四大汗國之一，位於今伊朗）擔任御醫的艾德丁，曾經提及亞洲人使用印刷術一事；除此之外，東訪的旅行家，皆未遺下其他相關紀錄。波斯的蒙古大汗，亦會修書予法、英兩國的國王與羅馬教宗，其中兩封寫於一二八九與一三〇五年，至今仍收存於巴黎的國家檔案室。至於當時的歐洲人，對於信箋上的朱紅璽印似乎不感興趣，但那卻是最早從東方傳入的木版印刷產物。好奇心旺盛的馬可波羅，初見中國紙鈔，大爲激賞，倒也沒想到紙鈔得用雕版印製。就這樣，具備足夠潛力推動人類文明大步向前演化的印刷術，終究與西方旅行家失之交臂；至少沒人認爲這事兒值得在見聞錄裡記上一筆。

第三章 書的樣貌

翻開從古到今的書本，其樣貌是如何改變的？原因何在？

最早的搖籃本，看起來與手抄本並無二致。最初的印刷匠，不以創新為旨，而是盡可能地做出最像手抄本的書¹⁰⁶。以《四十二行聖經》為例，其字體便忠實重現了萊因區彌撒經本所用的手寫字跡。有很長一段時間，印刷匠不僅襲用手抄本的個別字母，就連手抄本裡慣用的各組連字（例如 ss 與 ss ），也一併在印刷時採用。另一慣例持續的時間更長：起用手抄本時代的同一批書法家與畫工，以朱筆勾勒出印刷書裡的起始字母，並添飾紋圖。在這種情況下，外行人還得非常仔細地檢查，才能分辨出一本書究竟是印刷的，還是抄謄的。何以致此？史家發展出許多種解釋：有的說這是為了矇騙對機器印刷技術沒有信心的買家；有的說把印刷書當成手抄本來賣，對抄寫員與其「行會」而言比較不傷感情，甚至可以掩人耳目，免得惹惱那些獨占抄書生意的人¹⁰⁷。

這些說法統統不可靠。矇騙買書人，只怕三兩下就會露餡兒；比起咱們現代人，十五世紀的人，想必更能明察手抄本與印刷書的不同，看穿兩者的相像之處，並很快地找出破綻。此外，比起舊有的手抄本，印刷文字清晰易讀、錯漏較少，不多時便贏得了讀者的青睞。抄寫員跟書賈反彈？這點在所難免，但不要忘了，這些人大都處於大學的控制下，而在像大學這樣的自治團體中，他們並不真的擁有發言的權利。此外，也由於他們隸屬於大學當局，而當局又在印刷發展之

初即傾向採用此法，所以抄寫員的埋怨，自然起不了實質作用。更何況印刷匠與書賈，有時還攜手合作。就算抄寫員真有抗議過飯碗被新興的印刷商搶走，專精於手抄本買賣的書商，也未必就與抄寫員站在同一陣線。在巴黎、亞維農，以及其他許多地方，書商都願意同時販售印刷書與手抄本。其中有許多人，在明確體認新文本複製法的重要性後，索性自己做起印刷生意，或資助印刷鋪開張。像佛拉爾，就經常用羔犢皮印書，並添加彩飾，遵循自己早年經營抄書坊之時抄謄、描繪的方法，其成品儼然是豪華手抄本的翻版。

早期印刷匠審慎地仿照既有手抄本來製書，甚至盲目地追求神似，其實是可以想見的，這並不需要搬出天馬行空的假設來強加解釋；若說印刷書一開始即與手抄本南轅北轍，也斷無此理。印刷匠豈能不以手抄本為師，而憑空想出另一種印刷書的形式？印刷書跟手抄本的相同之處，豈不是更能證明製書技術高超、更能確保銷路？印刷機的降臨，亦不至於突然地改變書的樣貌。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回溯至這個演進歷程的第一階段，藉此區隔在往後其他階段中，印刷書與最初的仿效對象，也就是手抄本，漸行漸遠的情形。此外，印刷書是在十六世紀中葉時，變得與今日的書本大致相同；故我們還要探究，印刷書問世的頭一百年，其樣貌變化到什麼程度，又為什麼這樣變化。

一、字體

印刷術發明之時，即一四五〇年前後，手抄本的字體，會依內容不同以及讀者需要，呈現很

大的差異。其實當時通行的手寫體有四種主要類型，每種皆有其特定用途¹⁰⁸。首先是學術文本使用的哥德體；這種傳統的「粗黑體」，是神學家與大學教授的最愛。而第二種則是字體較大、較不圓潤的哥德體，其豎線筆直，筆畫不相連，為教會書籍常用的經本字體。再來還有衍生自總理官署（各國慣例皆有別）的手寫體：這是一種哥德「異」體，多用於敘事文本；如以各地方言所寫成的豪華手抄本，就頗流行用這種字體，有時也會用於拉丁文書籍。最後一種「仿古體」，又稱人文體或羅馬體，其出現順序最晚，但往後的發展卻最好，甚至成為印刷書最常用的字體。這種字受到加洛林小寫草書體的啟發，且因佩脫拉克與其門生愛用而聞名，但在一四八〇年，它仍舊只是一小群人文主義者的專利；一些雅好藏書的貴族，為了替自己珍藏的經典文本增添古樸氣息與真摯美感（或至少符合當時認定的古樸美標準），便採用此字體，好讓文章在內容、外觀上，都能與一般的中世紀文本形成對比。常與羅馬體相提並論的，還有一種草寫體，名為樞密體。這是由十五世紀中葉，梵蒂岡國務院的手寫字跡所發展出來的，後來獲得佛羅倫斯、費拉拿、威尼斯等地的總理官署採用，也是斜體字的濫觴。

根據史實，當時的各種字體關係複雜且種類繁多，彼此間亦有風格重疊者，並沒有涇渭分明的界線可言。簡要地分成四類固無不可，卻也得留心別被這種分類法誤導。在前述四種典型之間，仍有許許多多過渡、折衷的字體留存至今：像是波隆納抄寫員所用的哥德體，就受到人文體的影響。此外，通行於不同地區各種書寫體，還會發生當地獨有的變化。例如巴黎的哥德異體與低地諸國的哥德異體，名稱相近卻有不同樣貌。前者誕生於法國的王室總理官署，用以抄謄方言著作，後來並啟發了佛拉爾與吉堯姆·勒諾瓦鑄造的活字字體；後者則用以抄寫布魯日的約翰

(相傳為欽點畫家)的文字作品，而後十五世紀的布魯日印刷匠曼遜以此為藍本，鑄造出新的活字。實際上，由於因地而異的字體特徵極為顯著，有經驗的人，可以一眼就看穿某個手抄本源出何地。

如此一來，可供初期印刷匠模仿的字體範本，更是琳瑯滿目；首批搖籃本，乃至於十六世紀早期的印刷書字體，之所以能展現如此的多元性，其道理就在這裡。與手抄本時期一樣，何種書籍採用什麼字體、哪種讀者偏好什麼字體，都有成規可循：學術書籍、教會法典手冊，讀者是神職人員或學者，用粗黑體印刷；本土語文的敘事作品，讀者是一般人，以哥德異體印刷；拉丁文經典，與人文主義者的仿古之作，是嗜讀優美詞藻者的最愛，以羅馬體印刷。戈林與其同儕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們是巴黎第一批印刷匠，並在索邦當局的徵召下，為人文主義學者印書；既然印刷鋪接受大學資助，使用的自然是羅馬體的活字。稍後他們離開校園，在聖雅格街開業，印刷法律書籍與經院學者作品，服務另一批人數較多的讀者——法學生與律師，遂改用哥德體。另有印刷匠更進一步，仿照手抄本的筆跡印書。例如盧昂的印刷匠勒塔樂爾，在十六世紀諾曼裔英國書商頻森的委託下，出版了兩部探討盎格魯諾曼法律的專論；為此他鑄出一套不同以往的活字，試圖仿效英國抄寫員專門用來抄謄法律書籍的草寫體¹⁰⁹。

五花八門的印刷字體逐漸趨於統一，乃是基於幾個物質因素。起初活字鑄造尚未成為獨立行業，印刷匠必須自行打造陽文字範，即便只鑄一副活字，成本都不低。既然其財力有限，只能擁有少數幾副活字，為了印出特定手抄本的書寫字體，而特地製作或添購另一副活字組，幾乎不可能。此外，源自同個版本的印刷書，會在不同的城鎮、不同的國家販售；更重要的是，初期的印

刷匠乃是一種遊歷四方的職業。這麼一來，各種活字的漸趨統一，也就愈發無可避免了；倘若兩地的字體差異本來就不大，情況更是如此。第一批德國印刷匠，在離開萊茵地區、前往歐洲各地傳授印刷術的初期，確實有意模仿各地特有的字體。前往義大利的那些，除了模仿人文體來鑄字，更經常仿效波隆納抄寫員的筆法，做出線條圓潤的字體。然而還是有許多印刷匠，尤其是手頭資源有限者，無法太過講究。他們離鄉背井，除了一些陰文字模跟陽文字範，身上幾無資金，就連工具也不多；所用的幾套活字，都是離開老家前就鑄好的。無怪乎從巴塞爾一路追到里昂、土魯斯，甚至遙遠的西班牙，都能找到同一副粗黑體活字¹¹⁰。同理，勒華打印的里昂首批印刷書，用的是德國鑄造的活字¹¹¹。英國則長期使用來自盧昂與巴黎的活字¹¹²。

專屬某地的字體風格，首先消失。而後，書寫體的幾種主要形式，以更慢的步伐趨於齊一，直到最後終於由新興的羅馬體成爲歐洲多數地方的主流；這些地區包括義大利、法國、瑞士部分地區，以及西班牙和英格蘭。羅馬體的勝利，象徵人文主義精神的凱旋，值得在此一書。

羅馬體蔚爲風尚，得歸功於十五世紀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所組成的小團體。其中聲名較著的佩脫拉克與德尼哥里，更是滿腔熱血的書法家。一如許多與之同期的文人，其心願無非是以更貼近古早文本原貌的字體，來呈現古典文學，使之迥異於中世紀文本所用的「哥德」體——其實這兩個字頗有嘲弄意味，就連《建築十書》的作者亞伯特，也用「哥德」形容傳統建築的裝飾風格，以示輕蔑。

很快地，在那不勒斯、羅馬、佛羅倫斯等地的繕寫室，抄寫員紛紛改採羅馬體，其中又以佛

羅倫斯爲最，新興字體遂傳遍整個義大利。來自各領域的藏書人，包括貴族、主教、修道院長、樞機主教、銀行家與富商，轉而購買以羅馬體謄寫的手抄本。其中財力較雄厚者，包括十五世紀的匈牙利國王寇威努斯、那不勒斯諸王、費拉拿諸公，擁有自己的繕寫室，便直接命令麾下的抄寫員用新興字體抄寫拉丁文經典，甚至基督教教父（基督宗教初期的幾位重要主教與教士，尤指其神學著述被後人奉爲圭臬者）的作品。在義大利以外，又有哥勞斯特公爵亨利佛利，與稍後的盧昂總主教安博望等人，將「人文體」手抄本納入私人藏書閣。印刷術問世之時，即處於這種氛圍：「純文學」愛好者（未必限於所謂的人文主義者）的小團體，不僅欣賞新興字體，也能閱讀自如，但彼時的大多數讀者，仍舊支持傳統的哥德體。

爲了儘量維持最廣泛的客源，起初的印刷匠自然是投其所好、採行傳統字體。不過，在義大利境內，羅馬體的使用漸趨頻繁，也有許多愛書人指名以仿古字母印書，倒是採用此種字跡的手抄本，相對而言仍屬罕見。在這些「雅興之士」中，許多人資助或促成了印刷鋪的設立；佩脫拉克及其同儕所帶動的復古書寫體風尚，就這樣透過印刷術迅速地推廣開來。十五世紀先後在蘇比亞科與羅馬開業的史威罕跟潘拿茲，相傳是義大利境內的第一批印刷匠；他們先使用半羅馬體，而後在一四六五至一四六七年間，改用更具羅馬體特徵的活字。約莫從這個時候開始，史特拉斯堡的印刷商路許也獲得一副羅馬體的活字組；其於一四六七年之前所印刷的毛祿版《百科全書》，即以這副活字完成。一四六九年，德裔的達史匹拉，援引了類似的書寫體，在威尼斯印出一版西塞羅的《家書》。在另一方面，戈林也採用與史威罕、潘拿茲相近的活字字體；十五世紀

楊頌於威尼斯印刷西塞羅《致阿提庫斯書》，其所使用的羅馬體，迄今仍是公認的傑作¹¹³。

但在二四八〇年之前，用羅馬體印出的書，不過寥寥數本。以德國境內為例，二四八〇年之前的羅馬體活字，可考的只有十副。渴求這種字體的雅興之士屈指可數，市場更是迅速飽和；到一四七二年，採用羅馬體的印刷商（以希臘羅馬古文學的出版商為主）便因供過於求，陷入財務困境。前面已經提過，戈林帶著助手從巴黎的索邦校區出走，在聖雅格街開業之際，也同時棄絕了羅馬體，改以傳統粗黑體印書。在西班牙的瓦倫西亞，法蘭德斯裔的帕爾馬特雖用羅馬體印刷費諾勒的作品，卻險些變成羅馬體的絕響。相較之下，多數的印刷鋪都備有哥德體活字，其中最受歡迎的又屬異體；舉凡十五世紀維雍的《遺囑長詩》、《帕舍林鬧劇》、騎士傳奇、法文的編年史與民間故事、牧民曆與《死亡藝術》等，都有哥德異體印本。較尋常尺寸為大的哥德體，則散見於十四世紀奧坎、德黎拉的作品，以及隆巴第神學評注的印刷本內。

逐漸地，人文體愈發風行，印製於義大利的羅馬體書籍也更廣泛地流通，新興字體的勝出，其勢已不可免；隨後，又有與之關係密切的斜體字跟進。羅馬體與斜體能成為最終的主流，水都威尼斯居功厥偉。阿爾都斯那套深深影響十六世紀鑄字工匠的羅馬體活字，便是在威尼斯遣人刻製的；而在十五世紀末葉，葛利佛也仿效樞密體，在一五〇一年替阿爾都斯刻出一套斜體字，以便將長篇文字打印在侷促的頁面上¹¹⁴。有了威尼斯印刷商的先例，十五世紀末曾在水都見習的阿默巴赫以及稍晚的富羅本，遂以羅馬體與斜體字印出更多書籍，使新興字體傳入德國、並流行於法國。在里昂，印刷鋪爭相仿效威尼斯字體，其中德加彼安諾和忒羅亦仿阿爾都斯斜體鑄字。在巴黎，則有貝德與侯貝·埃蒂安納的父親亨利使得羅馬體的應用更為普及；從一五三〇到一五四

○年間，侯貝·埃蒂安納、德柯萊、魏卻爾、奧熱羅等人，分別使用多種羅馬體，相傳其中幾種出自印壇名人加拉蒙之手，唯何者屬之已不可考。這幾種書寫體較其先祖更趨近完美，不多時即成爲通行全歐的字體。保盧·馬努蒂烏斯與普朗坦尋覓、效法的對象，以及十六世紀埃傑諾夫在法蘭克福購得的字體，皆屬於這一類。這個時期刻製的陽文字範，多爲當時新設的鑄字廠所採用，一直到十八世紀才功成身退。

隨著人文思潮風行草偃，羅馬體的重要性也不斷提升。原先以哥德異體打印、用方言寫成的文本，此時也改採羅馬體。一五二九年，加黎·杜蒲雷使用新興字體印書，讓《玫瑰傳奇》與十五世紀詩人夏提埃的法文作品，以嶄新的面貌與世人見面。之後因爲大眾轉而偏好羅馬體，杜蒲雷便在一五三二年，以同樣手法印製維雍的《遺囑長詩》；此後羅馬體印刷¹¹⁵的書籍，一年比一年多。但再怎麼說，新興字體還是無法獲得所有人的接受。曾有一段時間，大學教授繼續支持舊有的粗黑體。又過了幾十年，舊有字體才依序從法律手冊、神學典籍裡消失，其中又以彌撒聖祭文本沿用最久。值得一提的是，爲數龐大的中產階級與城鎮居民，習慣辨識手抄本字體，而哥德異體又比羅馬體或斜體更接近手寫字跡，自令他們無法忘懷。是以十六世紀拉伯雷在里昂市集等地大爲暢銷的《巨人傳》，同樣採粗黑體印成。也因爲如此，當時的通俗書本、年曆與「哥德字小冊」，仍以哥德異體印製，此一情況延續頗久。資金比較匱乏的印刷商，若在印書過程中將活字磨耗殆盡，則會買下同行中有錢人所淘汰的活字，打印出上千本的哥德體書刊。直到十六世紀後半，羅馬體的讀者進一步增加，舊字體不得不功成身退了，他們才添購新字。

這也就是說，羅馬體通行全歐，比印刷術發明晚了不到一百年。既然這種字體是爲了滿足古代拉丁文經典的愛好者而設計，它能一躍成爲主流字體，也就不足爲奇了；畢竟當時的國際語言就是拉丁文，拉丁文書籍的買賣則跨越國界。字母形體的變化太過繁多，想必只會妨礙書籍在異國的銷售，這使得羅馬體在最後升格成各國通用字母（拉丁字母）的標準型態。我們也許可以說，羅馬體在義大利迅速成爲方言的出版字體，而後歷經各地既有字體的頑強抵抗，漸次普及於法國、西班牙，最後入主英格蘭；但在日耳曼諸國，它始終未能完全贏得讀者青睞，則是不爭的事實。盱衡德國、奧地利與低地諸國，拉丁文書籍固然採用羅馬體打印，粗黑體卻依然稱霸大多數以方言寫成的書本。十六世紀裡，哥德體家族又出現「曲音符號體」與「史瓦巴赫體」兩種新字體¹¹⁶；因爲它們比較容易閱讀，所以獲得當地印刷業的採納。是以馬丁·路德的早期作品固然用羅馬體印刷，後來卻回頭採用德國特有的字體，藉此確保自己的理念能傳遞給絕大多數同胞。由此觀之，當時的歐洲大致可以這樣分：一邊是拉丁文國度與英格蘭，另一邊則是日耳曼世界，兩邊用以印刷的主要字體各不相同。至於更東邊的斯拉夫諸國，印刷商採用西里爾體；這種字體源自古希臘體，與西方通用者少有共通之處。

二、打開書封：書名頁、牌記、印刷鋪印記

今天的讀者翻開一本新書，便能在書名頁中找到作者全名、完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等基本資訊，從而判斷這本書是不是他想讀的。理論上來說，出版法令對此皆有明文規

定；至少在法國是如此。

但在十五甚至十六世紀，情況就不是這樣了。第一批印刷書並沒有書名頁；不翻閱正文，便無從得知其內容，遑論這是本怎麼樣的書。當時的印刷書一如手抄本，內文始於第一張書葉的右頁，緊接在頁首題旨摘要（偶爾包含作者姓名）的後面。至少在十六世紀初之前，讀者都是憑藉書末的「牌記」，方可得知這部書的大多數資訊，諸如印刷鋪、出版地點，有時連書名與作者姓名也是如此；此係手抄本時代殘存的習慣。

然而，從十五世紀開始，又出現一種叫「印刷鋪印記」的識別標誌；這個木刻圖樣，若非印在正文起始的那頁，便是與牌記印在同一頁。最早的時候，印刷鋪託人將書運抵顧客處，並替書蓋上印記，以利運書人作業。當時的印記多半印在書的空白尾頁，或牌記的正上方；漸漸地，這種印記成爲印刷鋪拓展知名度的圖案商標，除了告訴讀者本書出自何家，更兼有美化書籍與品質保證的功能。書商與出版商複製自己的家族標誌，做爲識別圖樣；而在人文主義勃興、復古運動風靡之際，象徵畫與紋徽大行其道，印記更發展出複雜的符號系統。像阿爾都斯的標記是船錨，克韋爾是獨角獸，埃蒂安納是油橄欖樹，加黎·杜蒲雷則以船（加黎係大帆船的同音字）代表自己。從前出現在書本最末頁的印刷鋪印記，如今普遍出現在書名頁；一般印刷商開始採用書名頁，則可追溯至十五世紀末葉。

書名頁的功能，宛如一本書的「戶籍資料」；而書名頁的故事饒富趣味，亦可視爲印刷書整體演進的典例。此外，我們還能從這個掌故裡得到啓發，看出新興的觀念如何落實成新的製書

法，以提升書本的便利性。開始之時，印刷鋪先是發現第一張書葉的右頁容易污損，遂將正文之始移至反面的左頁，右頁整面留白。此後，他們自然興起了妥善運用空白首頁的念頭，便加印了簡短的書名；這點對書籍辨識頗有幫助¹¹⁷。

在一四七五到一四八〇年間，書名頁就這樣誕生了，而它的實用性也很快地變得不言可喻。在法國，出版商特別重視書本的美觀，例如佛拉爾，便率先以特異圖樣來裝飾放大的起始字母，替書名頁增色。其他印刷商，或將在書名下方的空白處蓋上自己的印記，或印上木刻畫，像是維伊度印刷的初學者課本《文法教本》，便在書名下面印著一位教師與幾位學童。至於其他的通俗小冊，則在該頁畫上一把萬用鑰匙。

十五世紀末，幾乎所有的書本裡都有書名頁，只是與今日的書名頁不盡相同。最初的書名頁上沒有幾個字，後來字數卻急遽增加；十六世紀的頭三十年，出版商竟又想用字填滿書名頁，遂將書名安插在流水帳似的官樣文章裡，附上書本主要內容的略記，以及作者與其友人題獻的詩詞。爲了打響名號，出版商很快地養成新習慣，將店鋪名稱與地址印在頁尾。即便如此，更詳細的資訊，像印刷鋪、確切印刷日期等，還是得翻到書末的牌記一探究竟。在此同時，書名頁的裝飾也愈見費心，邊框雕版的風尚迅速傳開。在史特拉斯堡，版畫家巴爾東格霖先後應納布洛克、修特與格呂寧格之請，自一五一〇年起使用數種邊框。稍晚，畫家霍爾班又替巴塞爾的富羅本設計了爲數甚多的邊框。這種新流行，稍後傳往紐倫堡、奧格斯堡與巴黎；在巴黎，貝德更以建築型態的裝飾風格仿效之¹¹⁸。

這種加印邊框的風氣，在日耳曼諸國與英格蘭，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當地書

籍的書名幾乎都被通篇的官樣文章所淹沒，周圍還環繞著多種圖樣。倒是義大利的阿爾都斯家族出版，與法國的人文主義出版商，包括德柯萊、埃蒂安納家族與德國爾恩家族，則設法用更清楚的方式來呈現書名頁。約莫從一五三〇年起，人文主義成爲主流，從此便有愈來愈多的新書，採行化繁爲簡的新式書名頁，頁面上除了簡短的書名、作者的姓名，就只剩下頁尾的出版商地址。換句話說，在斜體與羅馬體開始「得勢」的同時，書名頁也逐漸建立起今天這種體例。

銅版雕刻取代木刻版，在十六世紀末再度改變了書名頁的型態。當時，大多數書本的書名頁看起來都差不多，但加印邊框的技法，卻有捲土重來之勢；這點先是體現在對開的豪華本書籍上，而後遍及各種書冊。書名原先多半印在邊框雕版的正中央，但在銅版雕刻的時代裡，這點必須仰賴雙組版的技術才能辦到，畢竟銅版不像木版，無法與活字排成的書名字樣同時印上。除此之外，書名多爲粗黑字體，配上雅致、細膩的雕飾線條並不搭調。是以後來有人開發出新的技術，讓書名與飾紋能被刻在同一塊版上。從那時起，書名頁的配置便由畫家全權處理，而他們當然比較重視圖飾的華美，犧牲了文字的空間。漸漸地，頁面全爲圖案所占據，並以該頁最下端的「一行字，交代出版商地址與出版日期，至於書名則印在書本的留白頁面上，或於頁面中央刻上石柱基座或布幔的圖樣，中間印著書名。十七世紀仿效畫家魯本斯的雕圖，尤其是許多十七世紀前半書籍的書名頁，皆屬此類，其中也包括摩雷特斯所印製的書本¹¹⁹。現代人習慣了清爽簡約的書名頁，因此若以我們的標準來看，這般繁複密集的圖案，簡直令人眼花撩亂；事實上，在整本書籍的裝飾工作裡，也只有這個部分呈現出如此極端的巴洛克風格。這樣的情形在宗教書籍的圖樣設計上尤其明顯，即便才氣縱橫如魯本斯，也不免將許許多多象徵意義複雜的人物，一股腦地塞

進畫裡，而使整體的生動性爲之失色。

相較之下，十六世紀法國的德里烏或是高堤耶，把書名置於廊柱建築的中央，構圖就比較簡單。曾在安特衛普工作的拉斯內，則在模仿魯本斯之餘，棄絕他過度矯飾、大量運用象徵手法的畫風。不多時，到了一六四〇年，在普桑受命替法國皇家印刷館設計出版品時，想出了一套新方法，旋即引發流行，促成美術設計的大革新¹²⁰。他強調圖案輪廓的明晰，畫中只有幾個身披古早布帛的人物，整體的布局簡明而富古意。不過，他畢竟是畫家出身，一如魯本斯，優先考量構圖的整體性，所以寧願將書名從頁面中央移至「邊陲」。在他的設計裡，純爲裝飾而刻印的書名頁，成了卷首插畫，書一翻開就是圖畫——這也就是說，出版商必須把書目相關資訊，挪至卷首插畫的次頁，印在全由活字排組的頁面上。從那個時候起，書名頁的功用就已經不可或缺，並概略地保持著當時的面貌，直至今日。

三、內文呈現與開本

這種愈來愈簡約、整齊畫一的趨勢，在內文的呈現上，同樣地顯而易見。不過，此種演化也是漸進的，一如書籍製作在其他方面的演進。回顧手抄本時代裡，學者與學生所遭遇到的困難，當使我們更加了解這段來龍去脈。今天的我們習慣以頁數表示引用的出處，但當時不可能這麼做，因爲同一部著作的不同手抄本，書葉碼（各張書葉首頁的標示碼）或頁面並不統一，某段文字會出現在抄本內的哪個地方，也沒有固定。是以引文時不僅要注明章節、標題，甚至連出自第

幾段都得寫清楚；內文經常得用比段落更小的單位編排，以方便檢索。此外，書寫的字跡也是又小又擠；因為羔犢皮昂貴，為求經濟，抄寫時縮記省略所在多有，一頁能塞上多少字就儘量塞，不僅段落、章節間少有留白，就連標題、頁面編排也是能省則省。由是觀之，不難理解手抄本何以字跡難辨，而且查詢不易。

正如我們於前文所見，初期的印刷書籍，與手抄本並無二致；大體的編排相同、慣用的縮寫相同，上面的蠅頭小字也一樣難讀。但到了後來，印刷書的行距逐漸放寬，字體逐漸變大，縮寫與簡稱也逐漸變少，唯整體的呈現幾無變革。舉例來說，一四八〇、一四九〇年代製作的亞里斯多德作品集或《蘭斯洛傳奇》手抄本，跟一五二〇年間印製的同樣文本，看起來幾乎沒有差別。內文呈現的變異，要等到大眾品味的轉變激勵出新型態的文學，而羅馬體也普及之後，方始發生。

以下的發展，尤為典例：帖碼（各摺疊帖首頁的標示碼，用以表示各帖〔即現稱的裝訂台〕排列順序）的印刷，起初並不是為了方便讀者，而是為了協助書匠完成工作（尤其是裝訂工作）。在那個年代，裝訂需要高度技巧，因為全書的各帖內所含書葉多寡不一，構成一帖的全開紙也各以不同的方式嵌入成冊。為了便於裝訂，印刷匠便仿效抄寫員，把每一配帖或每兩書葉（即四頁）出現的第一個字，列成一個表格以茲確認；當時的人管這表格叫套準表（有別於現今印刷作業上，用來檢查墨色精確度的「套準」）。帖碼的出現，便是基於同樣考量，先是把單個字母印在整張全開紙的右下角；後來數字（也就是帖碼）取代了字母，順序標示各帖裝訂的先後。

接著，每張書葉上開始出現數字，其理由或許也相同（值得一提的是，最早的葉碼或頁碼編寫，已不見帖碼，反之亦然）。然而，標注各書葉次序看似順理成章，實際的發展卻很緩慢。一直到十六世紀初，還有很多書不是以書的葉或頁為單位編順序，編了的則多所漏誤；至於像現在這樣一頁一碼，而非一葉（兩頁）一碼的書，誕生得就更晚了。阿爾都斯曾於一四九九年出版裴洛提的詩評集《羊角盛宴》，或許是採用頁碼的濫觴。不過，還是要到一五二六至一五五〇年間，頁碼系統才真正普及；此間人文主義印刷商居功厥偉。

從那時起，書本才展現出較接近當代的面貌。人文主義的勝利，促成了羅馬字體的廣泛應用；比起哥德體，羅馬體通常較大、較易於辨讀。至於那些讓一行長文橫著走完一整頁的書，也愈來愈多，而不再是一頁兩欄、文分左右。在此同時，每行的間距更形寬闊，各種提升易讀性的嘗試紛紛出爐；而透過留白，章節標題與正文變得涇渭分明。現代書籍的樣貌，遂逐漸明朗。

隨著印刷文本的增加，書本不再只是圖書館的禁燬，束諸高閣待人查閱。一般人不僅希望能把書本帶在身邊，還要講求攜運方便，以利隨時翻閱、查詢。這點使得首見於十六世紀上半的「隨身版」書籍，逐漸地風行起來。另一方面，新興的中產階級，也開始建立起自己的藏書，閱讀不再是傳統上出身教會、學校或上流社會人士的專利。雖然四開、八開的書本，在十五世紀已經相當常見，但卻也只有較短的文本，因為以對開大小成書太過單薄，才以小開本付梓。至於神職人員用來講道的書，皆為大開本。其實也有一些書籍，有系統地採用較小開本，但它們主要是獻給神的禱詞，尤其是時辰禱書。這類書本使用頻繁、市場需求量大，因此非得方便攜運不可。

另有一種文學作品，亦以小開本出版，市場更爲龐大，其內容以通俗故事爲主，因爲外型小巧，所以法文名喚「哥德風小冊」。

然而，從十五世紀末起，「阿爾都斯家族出版」亟欲讓經典文學的閱讀更趨容易，遂出版了知名的「隨身版」叢書。起初這種格式只有少數人文主義讀者接受，但到了十六世紀初期，採用它的印刷商卻愈來愈多。舉例來說，巴黎的德柯萊，也仿效阿爾都斯叢書，推出一系列出版品；此後，許多印刷商起而模仿，在習慣把威尼斯風格當作範本的里昂地區，更是如此。不多時，新的文學作品，多半特意以小開本出版，以達攜帶方面、查閱輕鬆之效。如果說，舊時的騎士浪漫文學，是繼續以對開或四開本大小流通的例子，那麼人文主義者的拉丁詩作，如馬羅、拉伯雷、那瓦爾王后瑪格麗特等人的作品，乃至於七星詩派的作品，就是小開本印刷品的典型了。此外，荷人伊拉斯謨斯的《箴言》，也是以小開本型態風行全歐；尤有甚者，馬丁·路德與其他宗教改革者，同樣假借此一形式，刊行了難以計數的小冊子，以傳播其理念。即便是帶有插圖的書籍，其發展也大抵如是；一五四〇年間，霍爾班爲《聖經圖集》與《死神幻影》的四開、八開本，繪製小幅的藤蔓狀花紋裝飾，可謂名噪一時¹²¹。里昂的德國爾恩、巴黎的雅諾，以及其他地方的印刷商，則印製了多種版本的《聖經人物誌》、阿爾恰特彙編的《拉丁寓言詩選》，以及奧維德的《變形記》等¹²²。倒是當時的學生、學者，依舊較偏好對開本的書籍；雖然攜帶、翻閱頗爲吃力，但大開本仍有清晰易讀、便於參考等優點。

換句話說，圖書館內供人查閱的厚重學術書籍，以及讀者較眾的小開本通俗文學、異議說帖，彼此已是壁壘分明，成爲出版業在這個階段的首要特徵；綜觀整個十七世紀，這種對比依舊

鮮明。一六〇〇到一六五〇年，史稱反宗教改革（即天主教受宗教改革刺激而生的中興與反動）時期。在這五十年間，法國各地盡是兼具圖書館功能的修道院；新教旗幟下的神學家，則與舊教的耶穌會士在學識上頻頻交鋒。在此同時，法律工作者更仿效神職人員，蒐集大量的宗教書籍。倒是中產階級，已經不復十六世紀的愛好，閱讀活動明顯減少。這使得大開本的書籍再度勃興，對開的出版品頓時增加許多，其中包括許多不同版本的宗教典籍與基督教教父著作，乃至於歷屆大議會的官方紀錄、教會法典論文等。至於法文寫成的作品，泰半印刷成四開，因為八開的書本只是攜帶方便，閱讀起來並不輕鬆。這種明顯的趨勢，可用下面一例來佐證：印刷家族艾齊維埃爲了節省紙張，曾以著名的十二開特小本，印製希臘羅馬經典，藉此因應戰火（此應指十七世紀前半的「三十年戰爭」）阻絕供紙的問題，結果惹來學術圈讀者的抗議。到了十七世紀後半，潮流急轉直下，富有想像色彩的文學，再度變成大眾寵兒。在小說與通俗文本激增之際，成本偏高的學術參考書，卻礙於經濟條件，出版盛況不再。這種種的理由，終使小開本再度鹹魚翻身。十八世紀情況大抵相同：對開本愈發罕見，而成爲字典、百科全書等永久保存書籍的專利。至於當時價採四開、八開出版的書本，包括小說、詩詞散文、科普書籍、異議著述、各種版本的希臘羅馬經典等，也就這樣變成出版品的大宗。

四、插圖

手抄本常飾以細密畫，諸如時辰禱書、彌撒經本、信仰著述、騎士傳奇、狩獵專論的抄本，

多可見到這種圖案。至於華麗程度更勝一般手抄本的彩飾抄本，則常常出自頂尖書法家與知名畫家之手，唯有俗世貴族、高階教士、富商財主之流，才有機會收藏。

同樣地，印刷術問世後，並沒有為這些匠人帶來立即的轉變：彩飾師傅與細密畫家，在印刷事業興起之後，仍繼續原有的工作；諸如布列塔尼公國安妮公主的《時辰書》，與十六世紀的布迪瓊以及科隆巴的作品，皆可為證。佛拉爾等專擅豪華本編輯的業者，如欲推出與豪華手抄本同樣華麗的高級印刷書，依然是委託替抄本添飾紋圖的同一批畫家，為內文增色。

人工作畫既昂貴又耗時，若非特意以特級的羔犢皮印書、題獻予某位顯要，這麼做實在不合算。一旦閱讀變成民間的普遍習慣，同本書動輒印製數百冊，插圖就非得用別的方法來製作不可了。文字既然能用機械方法印刷，插圖當然也可採用類似手段複製。

早在印刷書出現前，木版印刷已經是標準化的製造方法，且應用頗廣。在十四世紀步入尾聲之時，木刻版畫開始增多；而在印刷產業揭開序幕之際，木版印刷業更臻於成熟。因為木刻圖版可與活字版一併置入待印版內，一次把圖文同時印完也不難，所以印刷商很快地利用起這種傳統技術。班貝格的菲斯特，便在一四六一年想出此法，為多本書籍打印插圖，其中包括波納的通俗寓言故事集，題為《珠璣集》。此書開風氣之先，插圖中的人物以無陰影的簡單線條表現，印畢後隨即以淡彩洗染上色；成品看來雖然原始，卻別具美感，似乎頗能讓早已習慣版畫的大眾欣然接受。很快地，在奧格斯堡，翟納亦打印出同類型的插圖書，包括通俗文學與信仰作品等；而在同一時間，菲斯特繼續利用雕版，製作書中圖案，講述達尼爾（基督新教稱但以理，以下並列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使用之譯名）、若瑟（約瑟）、友弟德（猶滴）與艾斯德爾（以斯帖）事蹟的所謂

《四聖軼事》，便這樣有了附圖。烏姆的柴爾，與其他許多印刷商，則在德國的其他城鎮，援用同樣手法。這些木刻圖版的目的，如同雕版印刷術本身，是爲了強化內文、具體呈現題旨而存在，而不是爲了藝術的創作¹²³。

故在雕版印刷欣欣向榮的德國，印刷商迅速接納了木刻圖版，以之裝飾通俗書籍；爾後刻圖、印圖技術精進，更用它替所有的書本添上插圖。萊因谷地一帶，印刷工人若赴外地工作，則隨身攜帶圖版，或替將印之書親手刻製新圖版。這麼一來，歐洲各地的最早的印刷插圖書，盡皆流露明顯的日耳曼色彩。以下僅舉兩例：其一發生於一四六七年，即義大利第一本印刷書問世後的兩年；在那年的羅馬，史威罕跟潘拿茲兩位德裔印刷商，藉著德國畫家雕製的木刻版，將樞機主教多凱馬達的《默想集》印成有插圖的書。其二則是產自那不勒斯的第一本插圖書籍，書內圖案似乎同屬德國雕刻師傅的傑作；在一四七八年印刷這本薄伽丘作品的人，是一位名叫利席格的德國人。即便是威尼斯，也有眾多的德國印刷商在此執業，強烈的日耳曼風格展露無遺。就我們所知，法國史上第一本插圖書，是在里昂印製的《人類世系之救贖》，其所使用的圖版，在一四七四年的科隆與一四七六年的巴塞爾，已經派上用場過，至於該書的印刷者胡茲，又是德國人。另外，魯汶、布魯塞爾、布魯日、豪達與安特衛普等地的插圖風格，多少師承了科隆畫派的特色。即便在英格蘭、西班牙，首批插圖書出現較晚，德國風的痕跡還是顯而易見¹²⁴。

最初，歐洲各地的書本插圖，皆奉德國爲圭臬，但當地獨有的趨勢也很快地興起，開啓了區域性畫派的先河。偶爾，某些地方的書籍插圖，會請當地的藝術家雕版，這些人可能離過紙牌圖

版，雕鑿手法並不獨尊德國風。一四七二年瓦杜流斯的《行伍論》，是維洛納地方的第一本印刷書，唯其插圖並未展現具體的日耳曼色彩。至於尚·杜蒲雷於一四八一年在巴黎印成的《凡爾登彌撒經本》，同樣不帶德國習氣。這些書的頁緣與邊框，首度以枝葉藤蔓或珍禽異獸來裝飾，係直接沿襲手抄本傳統。此種風格在起初，便比同期的德國插圖更能通權達變；它發展於巴黎，並傳往盧昂、英格蘭等地。十五世紀末的插圖書出版巨擘，佛拉爾當之無愧；他甚至還在倫敦設立辦事處，為自己印刷的部分法文書，出版英文譯本¹²⁵。至於義大利方面，羅馬、那不勒斯、威尼斯等地的首批插圖書雖然同為德國印刷商之作，但後來的當地畫派，受濕壁畫影響極深，其他國家遠不能及。義大利人雅好精妙複雜的美術品，簡單的書本插圖，當地民眾根本看不上眼，因此不得不順應他們的品味而改變。為呼應群眾之所求，德裔印刷師傅與其義大利弟子，旋即擁抱義大利風格——其中多凱馬達《默想集》所用的插圖，應是某位羅馬藝術家的作品翻版，且此君又深受聖母小殿濕壁畫的影響。有位德國印刷匠，受雇於那不勒斯人文主義者圖波，並於一四八五年印製《伊索寓言》。為此書雕刻頁首圖版的藝術家，名諱已不可考，倒是其所展現的絢麗風格，幾與東方藝術無異¹²⁶。

這麼一來，在各國的印刷重鎮裡，各種插圖的流派開始日漸壯大，不僅吸收當地繪畫與書頁彩飾的藝術養分，也就近接受經典建築設計的洗禮。每個當地畫派，都發展出特有的習氣、獨門的語言，與專擅的領域。像佛羅倫斯的印刷商，就擅長為當地客戶製作通俗書本的插圖；相反地，在威尼斯、里昂等商業大城，印刷鋪多從事出口生意，印刷商則潛心鑽研《聖經》與教會用書的插圖。此外，里昂還出版通俗書本、道德短論、信仰著作，並把當時較知名的古羅馬作家，

包括喜劇作家泰倫斯與詩人奧維德等人的作品，譯為當地方言，並加印書中人物的圖畫，以饗少數讀者。巴黎出版的插圖書，滿足了更多樣的閱讀需求：如時辰禱書、信仰論著、維雍的詩作、帕舍林一類的鬧劇、教會用書、歷史典籍與騎士傳奇等。低地諸國最負盛名的插圖書出版商德利烏，於豪達印製信仰書刊與傳奇故事，售予國內富商。十五世紀紐倫堡的柯貝格，主要出版學術書，但也製作出色的插圖書，並於一四九一年聘雇木雕大師沃格穆特，替《寶藏箱》多達九十一張的全頁插圖刻版，以圖畫呈現《聖經》與寓言故事的場景。他爲了出版謝德爾的《紐倫堡編年史》，遣人雕刻兩千餘塊圖版；是書於一四九三年同時出版德文版與拉丁文版¹²⁷，並售往法國、義大利，甚至遙遠的克拉科夫（位於今波蘭境內）與布達（匈牙利古城）。數年之後，柯貝格又在二五〇〇與一五〇一年，分別印刷了聖彼濟達的《神啓記》與十一世紀劇作家侯斯維塔的作品，其中前者更採用了畫壇名匠杜勒所刻製的圖版。

雖說各個畫派的習氣和語言皆屬獨有，外來的影響仍然存在。當時的每一本插圖書，名聲均傳遍全歐，不時成爲模仿的對象，甚至連重要性較低的作品亦然。前述柯貝格的《紐倫堡編年史》插圖，便於一四九六、一四九七與一五〇〇年，數度遭奧格斯堡的匈斯伯格仿刻。布蘭德的《弄臣之船》，於一四九四年印出巴塞爾版本；此書的圖版，替一四九七年巴黎版、一四九八年里昂版插圖的雕刻師，做了絕佳示範¹²⁸。至於那些仿刻舊圖的版畫家，也確實試著忠實複製原圖。例如《奪愛之夢》，堪稱是文藝復興時期巴黎最知名的插圖書；但這其實是將阿爾都斯五十年前在威尼斯印成的版本，稍加改動而得。值得注意的是，此書的巴黎版本，在刻製圖版的精神上，已

與義大利的原版南轅北轍，爲了迎合法國人的口味，只求表面的形似。更常見的情況是，在那些技術較差、經驗不足，或承受過大壓力的雕刻匠手中，仿刻變成等而下之的抄襲。若說十五世紀的威尼斯木刻師傅，尚能同時吸收法國與德國版畫的精髓，那麼，只怕十六世紀的雕版匠，已無力臻於此境。原來，雕版匠接受的印刷商訂單，因書本外銷而激增，忙碌之餘不免畫地自限，安於抄襲異國範本，再無原創可言。

在這些印刷重鎮裡，源自異地的風格隨處可見，用來印圖的雕版更常常是舶來品。出版商在多個城鎮擁有數家印刷鋪，尤其如此。如雷許同時在巴塞爾與巴黎開業，遂以刻製於巴塞爾的圖版，打在巴黎出版的書本。更有一些出版商與外國的同行接頭，委其請託當地的知名版畫家，替自己製作圖版。例如巴塞爾的知名版畫家葛拉夫，除了替富羅本刻製插圖，偶爾也爲其他地方的出版商捉刀：如史特拉斯堡的舒爾、胡普浮，阿格諾的安斯罕，以及巴黎的維篤、雷許等等¹²⁹。

前述種種事例足以顯示，插圖的研究有多複雜。雖然它只是一種次要的藝術，卻不宜等閒視之，而應視爲那個年代裡，藝術、智識、社會巨流中的一支，以專書探討亦不爲過，唯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此。顯而易見的則是，在圖像象徵意旨的傳播上，書本插圖扮演重要的角色；雕版書如此，印刷書亦然。二十世紀藝術史專家馬勒，曾在這個脈絡之下，闡釋《窮人聖經》與《人類救贖之鏡》的影響力。細密畫家在繪製貝瑞公爵《華美時辰書》的插圖時，《人類救贖之鏡》的抄本即派上用場。一四四〇年的凡艾克，以及一四六〇年的魏登，業已擁有該書的抄本版或雕印

版，故他們的畫風同樣受到影響。等到書商以雕版印刷法，大量翻印《窮人聖經》與《人類救贖之鏡》之後，兩書更是大為風行，成為版畫家臨摹的定本。就連榭斯迪約、雷姆大教堂、桑斯大教堂、頌恩河畔沙隆等地的簾帷繡圖，也多少師法了這兩本書；而維勒孔德聖教堂的兩扇大彩繪玻璃窗，甚至直接挪用兩書的插圖。類似的例子尚有多非內的維埃納聖茂利爵（或聖毛利斯）教堂的部分主門廊雕刻，以及特魯瓦大教堂的大門廊。至於利慕桑的琺瑯畫和天花板的象牙鑲飾，亦受其影響。類似的例子頗多，並不限於前述兩書；時辰禱書的插圖場景，即經常左右簾帷繡工、玻璃匠的作品。牧民曆以及《死亡之舞》，則與時辰禱書同為壁畫畫家下筆前的準繩；弗帖盧庇耶和梅利雷貴涅的壁畫，之所以有如此形貌，係參考兩種版本的《死亡之舞》所致；一由馬爾相所印，另一則由寇斯提烏與梅納爾印製。更進一步探究，會發現馬爾相版的《死亡之舞》，可能是模仿巴黎佚名墓窖內的同名畫作而繪。再晚些，又有好些琺瑯畫家，在十六世紀裡仿照書本插圖來作畫；如格呂寧格於一五〇一年印成的《伊尼亞德傳》（或譯《埃涅阿斯記》）便是這樣的書。一如今人所知，當時的簾帷繡圖手法，亦得益於德米厄加的《金羊毛演義》，以及十六世紀詩人德貝爾勒的《高盧群像》插圖。

在美術傳布上，影響力最為顯著的書籍插圖，可能要數德國爾恩出版的《聖經》，與奧維德的《變形記》，此一書分別於一五五三與一五五七年印成。這兩個版本裡的蔓狀花紋裝飾，皆由沙羅門刻繪，且發行後大受歡迎，後者還成為新教徒傳播理念的工具。沙羅門的插圖，啓迪了許多的簾帷繡圖、絲繡、琺瑯畫、瓷繪和木雕。同樣的花紋裝飾，也是許多系列圖畫的靈感源泉，或成為直接的仿效對象，或透過其他木刻圖版影響後繼之作。另一方面，《變形記》裡的頁緣邊

框，也成爲樣板，收錄在許多花邊圖冊，即風行於十六、十七世紀，專門蒐集花邊樣式的圖鑑內¹³⁰。

不過，本書探討的對象，僅限於十六世紀最知名書籍的插圖作品，以及較常提及且值得一書的少數藝術家。

這是一個講究華麗呈現的時代，在德國、法國各地，都可見到圖像書¹³¹。其中，於一四九八年出版的《默示錄》、一四九八至一五〇一年出版的《耶穌受難》，以及一五〇二至一五一〇年出版的《童貞女生平》等系列，均出自畫家杜勒之手（當然，嚴格而論，這些都是木刻圖版，而非「畫作」）；這些不得不提的大作，首先以版畫的形式問世，後來才集結成冊、佐以文字。一五二二年起，杜勒在奧格斯堡，與神聖羅馬帝國馬克西米連一世所聘雇的官方印刷商匈斯伯格共事，並先後刻繪《凱旋拱門》以及《馬克西米連凱歌》，藉以歌功頌德。十六世紀雕版師勃格麥則依杜勒的構圖刻版，稍後並與杜勒門生雪菲林、貝克合作，爲《至親謝忱》添上插圖；這是一部影射皇帝婚姻的作品。

在此同時，史特拉斯堡的印刷商，也發行著圖像書，其中格呂寧格尤爲知名。勃格麥還有一位名喚小魏迪茲的弟子，也是史特拉斯堡人，可能是當時最優秀的畫家兼版畫家。此人於一五二四年替納布洛克印製的德文版《聖經》刻製插圖；而一五三二年史坦納在奧格斯堡出版的佩脫拉克《財寶書》，可能也是由他所繪。不過，小魏迪茲最棒的作品，無疑是布隆費斯彙編，並交由修騰於一五三〇至一五三六年出版的《本草圖鑑》插圖。在其他書籍裡，小魏迪茲僅講求圖案的別致、生動，但替這本圖鑑作畫之時，他卻以精確、傳神爲唯一目標，展現其自然演繹動植物樣

貌的功力。另一位亞爾薩斯人，巴爾東格霖的作品，則歸屬於較為俚俗的領域；富拉克於一五一一至一二年印製的《心靈小圃》插圖，共計有四十三塊圖版，此人也為格呂寧格刻圖。最後，十六世紀的紐倫堡也有兩位雕版師傅：阿曼恩和索利斯；他們為出版商費耶拉本設計過許多圖版。

別忘了，在同一時期，尚有畫家克拉納赫父子在威登堡（參見第八章第三節）為馬丁·路德服務，而巴塞爾的富羅本除了與前述的葛拉夫合作，更委請漢斯以及安布羅瑟·霍爾班兄弟繪製插圖。霍爾班兄弟本身並不執刀，而是由雕刻師盧澤伯格遵照他們的畫作，精巧地刻製木版。特雷瑟爾於一五三八年於里昂出版的《聖經人物誌》，無疑地也是由盧澤伯格雕刻所需的小圖版；小圖版臨摹的花紋裝飾，亦由霍爾班兄弟設計，目前收藏在巴塞爾的博物館中。

比起德國的書籍插圖，法國的作品亦毫不遜色，包括沃斯特雷、阿朵因家族，以及稍後的維篤在內，許多的印刷商，均推出各種版本的時辰禱書。他們同時沾染日耳曼與義大利習氣，有時還熔兩種風格於一爐。前者係透過德裔書商，如克韋爾、魏卻爾等人，與杜勒、霍爾班、施恩高爾等日耳曼藝術宗師的強大影響力，傳入法國。這個時期的法國人，藉著德國，尤其是巴塞爾文化的居中斡旋，接觸北方的文藝復興；來自多菲內的十六世紀數學家菲內，亦從事圖版、邊框的雕刻，即是一例。在里昂，此種影響自然地顯得強勁；前文提到特雷瑟爾使用霍爾班設計的圖版，當可為證。在同一時期，義大利風格也直接影響法國；托利的圖樣設計，便反映出這一點。

爾後，法國書籍逐漸跳脫出異國影響的桎梏，在一五五〇年代達到巔峰。此時誕生的諸多傑作裡，包括前述的《奪愛之夢》；相傳書中部分圖畫為古戎所刻。不過，加佐在一五四七年印行，有關古羅馬建築學家維楚維斯一書中的插圖，以及一五四九年出版於羅斐的《亨利二世駕

到》，更有可能是古戎所刻。數年後，又有畫家古桑一世發表他的《透視論》。印刷商德圖爾恩，在里昂約聘了當地最優秀的版畫家沙羅門，以其豐富而多元的雕工，刻出極為生動的圖版，圖樣並以鄉間景色、古代神廟為襯底。沙羅門有不少佳作值得一提，除了在一五七四年出版的《瑪格麗特王妃選集》（即那瓦爾王后作品集）一書中（導師）故事的插圖，他更為帕拉丁的《聖經故事四行詩》與奧維德的《變形記》刻繪插圖。此類書籍大行其道的情況，且容後文補述。

舉了這麼多實例，當有助於強調，在美術成就輝煌的十六世紀，插圖書籍不僅舉足輕重，品質也很出色。這個題目就此打住。接下來，我們將回溯十五到十八世紀間所繪製的各種插圖書，探究它們滿足了哪些需求，又是為哪些讀者而印製。

據觀察，起初的插圖書，係承續雕版書籍而生，出版宗旨與讀者群皆相同。其目的在教化識字不多的大眾，假借圖畫解釋內文，把基督、先知、諸聖生平的不同事件，鮮明易懂地呈現，或將天使與魔鬼爭奪罪人靈魂的景況，與時人熟知的神話、傳奇人物，具體表現出來。木刻版畫的宗旨如斯，第一批插圖書籍的宗旨亦如斯。如此看來，十五世紀最受歡迎的插圖書，皆為勸人虔信、誨人向善的宗教作品，且大半以方言撰寫，也就不足為奇了。單就搖籃本的目錄來看，十五世紀的德法兩國，最常重複印製的插圖書，計有耶穌受難、基督生平、律師作家德特拉摩所著的《魔鬼記》等撒旦故事書、《救贖之鏡》、《人類生命之鏡》、《善終者與好命人》、德瓦拉吉納的《黃金傳奇》（即《聖人傳》）、《聖經故事》、牧民曆，以及相傳可能出自伊索、比培、卡圖手筆的許多通俗道德寓言。書本插圖的目的，在於將當時民眾時常聽聞、記憶猶新的故事，化為明白具體的圖像，實用價值大過於藝術價值。圖畫裡沒有光、影、色調的微妙變化，只有少許線條簡

單、特徵鮮明的角色。

印刷術問世之後，持續遽增的私人藏書，可不只時辰禱書跟騎士傳奇而已；那些早就譯成方言，一般民眾皆習以為常的古羅馬文學，如維吉爾的作品，也旋即出現插圖本，並成為收藏的對象。另外，手抄本時代，得用手工替這些書本添飾紋圖，此時卻沒有這種問題；於是前述書籍同樣棄絕了書頁彩飾的手藝，唯時人對此不無猶豫，更有許多惋惜。舉例來說，威尼斯的書商，一度採用折衷的辦法，以印刷的花樣做為手繪圖畫的邊框；在德國，書內的完整插圖，得等專人上色後才算完工，只有線條是打印上去的。一直到十六世紀初，印刷書的章節起始處仍經常留白，以留待稍後紋繪彩色的大寫字母；奈何印刷書本數量多，畫家只能替少數幾本添上圖案。

當時有許多人，對於各種手繪抄本的題旨與內容知之甚詳，卻不見得買得起這些書；為了滿足這些客戶，佛拉爾等出版商，費了莫大心思在印刷書的插圖上，使其樣貌如手抄本般物超所值。在法國，時辰禱書極為風行，其頁緣裝飾係以許許多多小塊的木刻版印成，而版畫師傅也愈發致力於光影對比的演繹。義大利的雕版藝術家，則與畫家競爭，刻圖更是講求細膩。一五〇〇年起，細線網底成為威尼斯常見的插圖元素，這多少使得木刻畫不再純粹，失去此許原味。

文藝復興的趨勢，與義大利藝術的盛名，很快地蔓延至日耳曼諸國與法國。想當然耳，最早，大約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人文主義者，特別是其中的學界人士，在蔑視插圖書的程度上，恐怕與索邦的校園神學家不相上下。插圖只是用來教導文盲的簡便方法，豈能登上大雅之堂？基於這種態度，那些伴隨著泰倫斯、奧維德的譯本（其讀者正是他們譴責的對象）而刻製的

插圖，讓這群雅士痛苦不已。至於插圖書師對考古學的漠視，與讀者對古代文豪的無知，彷彿樂於見到泰倫斯筆下的人物穿上十五世紀的服裝，尤令他們無法忍受。就算是比較帶有典雅古風的插圖書，華美如阿爾都斯印製的《奪愛之夢》，似乎也無法贏得這些文學家的尊重。就因為如此，此一版本的《奪愛之夢》未曾於威尼斯再版。

在法國，托利自義大利引進平實的邊框裝飾，卻是蔚為流行，各地都有人起而效尤。過不多時，克韋爾在巴黎重新編排《奪愛之夢》，以義大利風格的雕版打印插圖，於一五四九年出版，就此擄獲巴黎民眾的心；相較之下，此書在一五〇〇年的威尼斯，風行程度就頗為有限。等到菲內這位從事研究而迷上書本插圖的數學家，以幾何圖形設計邊框，圍繞著饒富寓意、忠於日耳曼文藝復興精神的圖樣，新的潮流才算真正建立。因為這種新的精神，成功征服了另一批更廣大的讀者——這群讀者的上一代，曾在十五世紀讀過《伊索寓言》、《聖經場景》、《玫瑰傳奇》、《特洛伊史》或《蘭斯洛傳奇》；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們對插圖習以為常，是以冀求一種形式合乎一己喜好的插圖。不多時，霍爾班和他在巴塞爾出版界的雇主，開始在通俗書本中，使用雕工精細的蔓狀花紋裝飾，印製出《新舊約聖經故事》與《繪本變形記》等。一時之間，里昂的德圖爾恩、巴黎的雅諾與格盧洛，以及各地的出版商，爭相仿效這些書的做法。就這樣，佐文以圖不僅時興於十五世紀，還在十六世紀形成更大的風尚。同一時間內，同樣的蔓狀花紋亦被拿來點綴寓言圖冊；十六世紀中葉以降，這種圖冊大大暢銷。

然而，此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仍有一整群的人，包括商人與識字甚少的基層民眾，似乎忠於

老式的插圖。他們的喜好鮮有變化，服務他們的則是財力較弱的印刷商與規模較小的出版商；這些書商長期使用舊式的哥德體活字，且有更長的時間（十五至十六世紀早期）一直靠著買來的二手木刻版來印圖，等到圖版磨損，才照章刻製新版、毫不更動圖樣。無疑地，正因為這一群人亦相當重要，大約從一五七〇年開始，成套的通俗木版圖畫場景頗有捲土重來之勢。在這個時期裡，巴黎蒙朵吉耶街的雕版師傅，推出了許多版本的《聖經故事集》；這是由《窮人聖經》衍生而來，每一頁皆以一塊大雕版打印，添上有幾行圖說形式的簡單文字，或可視為連環漫畫的鼻祖。但更能反映當時情勢的，當推宗教戰爭圖畫，其銷量亦頗為可觀。在此同時，專門由跑單幫叫賣的書貨，也成為新的通俗書籍類型。以法國為例，便有少部分的書商，在巴黎與特魯瓦，尤其是特魯瓦，持續出版《高盧的阿瑪迪》、《美露希妮》，以及《聖經場景》、標準版牧民曆等書；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紀，仍有小販在鄉間、較小城鎮，甚至巴黎叫賣這些書。識字率甚高的十九世紀，使得這種攤販書的流通更形廣泛，並重新地流行起來，曾在十五世紀大受歡迎的文本，也因而再次出現於各地；即便是伊拉斯謨斯、拉伯雷、拉封丹、伏爾泰的著作，也未會取代其地位。

到了一五五〇年，左右歐洲經濟的物價攀升潮，也開始影響書籍生意：這個發展中的危機，成為十六世紀下半的主要特徵。此後，插圖書籍發展的腳步幾乎停頓。木雕匠的作品，似乎不再用心為之，而是草草趕工；愈來愈多的圖畫，只是早期插圖的拙劣翻版而已。圖畫出版的數量也減少。俟十六世紀進入尾聲，插圖書版再度興起時，銅版業已取代木版。這項技術變革，意味智

識發展再臻新高峰，以下謹討論其意涵。

十五世紀起，雕製銅版的技術已然問世，且和印刷術一樣，在金匠的努力下改進甚多。它能更忠實地打印出光與影，傳達更細膩的線條，而畫家對它的偏好也勝於木版。從十五世紀末開始，諸如義大利的琴尼尼、德國的施恩高爾，令此種技術更形完備¹³²。偶爾，書商也嘗試將它應用在書籍印刷上，只是受限於技術上的窒礙，成果不彰。畢竟，以木版打印插圖，圖版可與組好的活字版一齊放進待印版裡，並用同樣方式沾上油墨、印字印圖一氣呵成。但雕製銅版，意味圖版的打印必須單獨為之，如果還要講求圖案與文字的彼此協調，花錢費事就更不在話下。

讀者大眾仰賴插圖，增進閱讀時的想像空間，是以長期以來，印刷商多半棄銅版而就木版，即便後者容易損耗且構圖呆板。但到了一六〇〇年前後，情況開始有所改變。首先得強調的是，十六世紀是畫家的世紀，全歐各地都有雅好繪畫的民眾。巴黎、里昂的富商，威尼斯、安特衛普的貴族，紛紛委人為己畫像；同時也有愈來愈多的畫家，作畫不是為了裝飾教堂牆面，而是供人裝飾宅第。在此同時，畫家也投入版畫創作，不那麼有錢的民眾，則購買銅版畫做為「窮人的繪畫收藏」。十五世紀義大利的曼帖納以及德國杜勒的版畫作品皆饒富盛名，至今還是家喻戶曉。至於法國，早先的銅版畫家多為金匠出身，他們泰半閉門造車，直到普利馬提喬、羅梭等義大利畫家，應邀至法國裝飾楓丹白露城堡。此後，楓丹白露一帶出現新的銅版畫派，在法國推廣起義大利的新裝飾風格。相較之下，傳統木刻版畫便顯得粗鄙。而當時的銅版，似乎已成爲演繹建築樣貌、古代豐偉事蹟，甚至某人確切長相的絕佳技法。這麼一來，銅版縱有技術上的不便，還是迅速成爲書籍插圖的打印工具。起初其應用並不普遍，只有少數的技術性著作與充斥肖像的書冊

會用上，後來才逐漸遍及各種書籍¹³³。

有許多畫家長居的城市安特衛普，是銅版印圖化身主流的決定性推手。十六世紀版畫零售鉅子柯克，也在這裡經營工坊，畫家勃魯蓋爾年輕時即於此工坊學習刻圖。普朗坦幾乎每天都曾接觸柯克和他麾下的工匠，後來更將自己印刷的一部分書本，交付柯克的工坊刻製銅版插圖。

普朗坦聘請的銅版雕刻家，盡是安特衛普畫派的一時之選，其中不乏德勃赫、于伊家族、威瑞克斯兄弟等。他於一五六六年出版解剖學之父維薩里與瓦威達的《人體結構圖》，並以四十二塊銅版做插圖；一五七一年，又出版蒙大努的《昌盛誌》；一五七四年出版山樸卡的《古今名醫碩儒群像》，其中有六十七幅肖像出自德勃赫之手。這些書籍傳遍歐洲，評價甚高；不多時，普朗坦所印之書，在各地都造成回響。例如鐵維在巴黎出版的《名人畫像》，使用在法蘭德斯刻製的銅版打印圖飾。此時，來自法蘭德斯的版畫商人與雕版匠，群集於巴黎，是以法國的出版商不愁書本插圖乏人捉刀¹³⁴。

十六世紀末之後，木刻版式微，在攤販書籍以外的領域，幾乎再也找不到木版打印的書籍插圖。從實務面來看，木刻版等於完全消失。這同時也開啓了銅版印圖獨霸的局面，且其為時超過兩百年；如此的改變，可不只是技術面上的變革而已。新技術廣獲應用，是因為銅版能細膩、精確地呈現圖樣。傳達寫實的影像也好，留存永恆紀錄也罷，皆無其他媒材能出其右。於是，在圖像事實的傳播上，版畫的角色日益重要，幾乎等同書籍對文字事實傳播的貢獻。若說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銅版的應用與版畫交易的國際化，促使歐洲人的視野更加遼闊，也不為過。德布里就是一個例子。他在十七世紀初期彙編了一系列的旅遊見聞錄，涵蓋範圍遠及北極圈內的拉

普蘭與新大陸的巴西。透過銅版畫，這些見聞得以傳播開來；其世界觀偶有錯誤，但也明確清晰。講到這裡，就更不能忘記，十七世紀的荷蘭出版業者，在這個特定領域亦有可觀的成就——地圖印製。

在收藏家廣羅雕版畫冊之際，愈來愈多的商人，甚至工農百姓，雖然買不起油畫，仍以版畫裝飾住家：不是粗糙的木版畫，而是刻工傳神、纖毫畢露的銅版畫。這些版畫的寫實感強烈，內容則關乎宗教、歷史，或尋常生活的不同面向。

各種場合、不同目的，都需要雕版師傅的一雙巧手；或爲了活靈活現地重現某個重大事件，或爲了紀念沙場凱旋、國王加冕，或記錄皇親國戚主辦的宴會、芭蕾舞劇、盛大活動，或依客戶之意味繪偉人肖像，或替學者、富商畫像以餽贈其同儕，甚或以圖像方式保存街景供人留念。版畫家比油畫家更常受託作畫，是因爲只有版畫才能複製；他們彷彿是古代的攝影師。十六世紀的銅版畫家卡洛，也是透過圖版，方使布雷達與拉羅榭遭大軍圍攻的主要景象廣爲人知。除了戰爭的駭人，他的作品還見證了露天市集的蓬勃朝氣、波希米亞人的流浪生活，甚至專爲戲迷刻繪「義式喜劇院」的劇中角色肖像。十七世紀博榭以版畫側寫巴黎中產階級的生活，細緻而準確。至於南特伊與其競爭對手，則分別於十七世紀下半，刻製許多皇族、富商的肖像。十八世紀裡，法國版畫派的雕版藝術家，轉而記錄當時的風尚與禮俗，描繪出一幅幅貴族、中產階級，乃至於巴黎市井百姓的生活。

傳布藝術品，版畫也有重大的功勞。多虧了這些版畫家，歐洲各地的多數民眾，方從十七世

紀起，涉獵了藝壇的各種曠世傑作。在義大利，便有來自各國的雕版師傅，致力於複製當地的油畫、知名建築與古代遺跡。委請版畫家臨摹當時國內油畫大師作品的，亦所在多有。例如南特伊、莫林的版畫，即是臨摹油畫教師德尚帕涅的肖像畫作而刻，故德尚帕涅能於當時享有盛名，似應歸功南、莫兩氏¹³⁵。魯本斯深知，以圖版為媒介廣泛流通一己作品，大有益處，故設立版畫工作室以翻印自家畫作。這麼一來，也有雕版工匠選擇住在巴黎的馬理埃等版畫大商人的店鋪附近，複製著義大利、法蘭德斯、法國、德國等地繪畫大師的畫作。閒暇時，人人都能賞玩、品評、比較這些版畫。此後，華麗精飾的畫風，遂藉版畫家而名聞遐邇、傳遍各地。

由此觀之，十七世紀的版畫家，堪稱資訊傳播的主要媒介。在前述各種轉變發生之際，插圖書籍往日的光環卻略顯失色。出版商礙於經濟拮据，只好少印插圖、少用圖版，以便將插圖與內文分開打印，或只印卷首插畫；這麼做比起雙組版：在同一頁上同時打印銅版圖畫與活字版，更能節省開銷。此時，雕版師傅的索價也轉趨昂貴；只有少數必定暢銷的豪華本書籍，像是十七世紀詩人夏普蘭令文壇千呼萬喚的超人氣作品《聖女》，方能享有充足的插圖。碰到這種暢銷書，印刷商則不吝於聘請最傑出的畫家，設計各種裝飾圖樣，供雕版匠臨刻。魯本斯、維農、普桑、德尚帕涅、勒布倫等人，便是以這種方式，共同投入書籍插圖的設計。這麼一來，十七世紀末期時，文本與圖像更加疏離，在多數書本皆無附圖的情況下，書中只要收錄一張作者畫像，便已經有資格稱作「插圖書」了。這個時期中，真正的書籍插圖畫家，寥寥無幾。

進入十八世紀，情況又有改變¹³⁶。隨著經濟發展持續向前，出版商重拾他們對書籍品質的關

注，印滿活字的頁面裡，再度出現蔓狀花紋。另一方面，大眾也重拾對插圖書的熱切喜好。然而年頭已經不一樣了，插圖書籍也不若十五、十六世紀那般訴求廣大讀者。十八世紀的需求來自豪華裝幀書的市場，客戶多為富豪、銀行家、金主；這些人爲了誇示新近賺取的財富，決意籌設自己的藏書閣。他們對嚴肅、正經的東西可沒興趣，愛書多半是裝飾奢華的作品。這個時期裡，有錢地主訂購的書本，多爲華麗插圖版的拉封丹《寓言詩》與《故事詩》之流；而最有名的插圖書，竟是音樂學者拉伯德所著，讀來索然無味的《歌謠選》。更能代表當時豪華裝幀插圖書的，竟是孟德斯鳩年少無知時的寓言作品《尼多斯神廟》。至少在法國，再次興起的插圖書籍風潮，就足以令人眼花撩亂。布歇與弗拉戈納爾等畫家，也委託法國版畫派的優秀版畫師傅複製畫作。然而，在那個時候的印刷書本中，插圖書僅占無足輕重的小部分，其讀者也只是一小撮，與當代藏書人訂製的作品、限量發行的藝術圖鑑，同屬小眾市場。若不是因爲當時的科技、工藝類著作，必須仰仗插圖協助讀者理解內文，相當借重版畫家優異的刻繪技巧，只怕這個階段的插圖書籍，並不值得多加討論。但這時畢竟是「啓蒙哲人」（指十八世紀法國啓蒙運動的哲學、政治、社會思想家）的年代，學術類插圖書籍眾多，且格外重要。精細準確的銅製圖版，不僅爲許多理工類文獻注入生命，更是博物學家布豐伯爵的著述，與法文《百科全書》這般壯舉得以付梓的關鍵。在庫克船長、拉佩胡斯徜徉七海的年代裡，出版商同樣靠著版畫技術，把航海家旅途中勾勒的草圖忠實重現；記錄地理發現的書籍，也就愈來愈普遍了。

五、替書穿衣：裝幀形式

流傳至今的古書裝幀，泰半維持其良好面貌。檢視這些十九世紀之前，任一時代的手抄本與印刷書，我們馬上就會發現：縱使是最普通的書本，都裝訂得相當堅韌，品質絕對優於今日出版界的成品。昔日法國皇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的藏書便是實例：十七世紀的舊書，封皮是紅色的摩洛哥山羊皮，表面燙金並飾以皇室紋徽。如今，皇家圖書館購置的書籍，頂多是布質封面。

這樣的裝訂，除了講究強韌，所用的材料也相當高級，自然會令現代的出版人眼睛一亮；但在當年，這些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在手抄本的年代也好，早期印刷書的時代也罷，書本都是相對稀少、所費不貲的商品，既然要兼顧耐用與美觀，作工豈會草率。從印刷術發明起算，一直到十八世紀，讀者迭有增加，但書本仍舊由少數受到優渥待遇的菁英所獨享。早年造紙全憑手工，印刷靠的是手動印刷機，書本是一般人眼中的瑰寶，保存工作非常重要，裝幀自當細心為之。

十五到十八世紀間，裝幀的主要特徵為何？這裡指的是商業上的大宗裝幀；至於豪華裝幀，算是專為一小群王公貴族和藏書家打造的收藏品，則不在此處討論範圍內。此外，在同樣的四百年間，裝訂工面對書籍數量的遽增，如何調整裝幀技術以因應之？書籍出版數量的攀升，對裝幀的品質與樣貌，又帶來哪些影響？本節的主旨，即在回答以上問題。

再次強調，印刷術的興起，並未導致革命性的技術遽變。印刷書的裝訂，係由手抄本時代的同一批工匠，應用同樣技術而得。他們仍然把書脊與封面、封底的硬板一併裹起；硬板則以實木製成。若是專為權貴印製的豪華裝幀書，還會用天鵝絨、絲綢、金帛等名貴織品做書套。一般書本，則以鞣過的犢皮、綿羊皮來裹覆，德國人甚至會使用豬皮。接下來，以處理表面的工具，即

束帶狀或滾輪狀的壓模，壓印許多重複的圖案。墊上金箔壓印，印出「實壓」的封皮，未壓金箔的稱作「乾壓」。壓印圖案的風格，各地不同；圖案的基調種類之多，更是難以盡數：蓮花、單頭或雙頭鷹、各種動物（包括真實存在的獅子、獵犬，或神話中的獅鷲獸、巨龍）、盾形紋章、四大福音作者像、長條旗幟、銘文等。有時壓印的內容很簡單：諸如 IHS 字樣（耶穌名諱的希臘文縮寫符號）、逾越節羔羊、聖人像、十字架，或耶穌頭像¹³⁷。

如果拿十五世紀初期的手抄本，跟一四八〇年之前的首批搖籃本相比，不會發現明顯差異。兩者都是以金屬釦帶固定內頁，裝訂起來厚重結實，封皮並覆以許多小圓釘做為保護（當時的書籍係平放收藏，或置於案頭）。許多書本在修道院裡裝訂，院內的裝訂工坊與抄書房近在咫尺。其他的書本，交付私人工作室裝訂；裝訂工與抄寫員密切合作，供應俗世書籍市場，買家以大學附近的書買為多。

大約從一四八〇年起，印刷術帶來的影響逐漸明朗；印刷書籍激增，閱讀也漸趨普遍。此時，私人藏書逐步建立，擁有書本不再是修道院的專利。在修道院裝訂工坊的重要性式微之際，民間的裝訂工愈來愈多；在書本買家眾多的大學城裡，尤其如此。多數的裝訂工坊設在鄰近書賣的地點，亦有書買兼營裝訂、出版；像柯貝格這樣的大出版商，更擁有自己的裝訂廠，配備各式大量裝訂的工具。但必須澄清的是，當時的書本裝訂，並非正常出版流程的一部分，與今日頗不相同。箇中道理很簡單：一本書在單一城鎮的銷量有限，是以許多印刷商都得透過廣布歐洲各地的經銷商，才能把書賣光。既然書要外銷，運費又高昂，當然不會先加上厚重昂貴的封皮，而是

把散張的書頁直接裝箱，一站接一站地運出。有些書固然是裝訂完畢才賣出，但根據當時的庫存報表，書商販售的書本中，裝訂好的只占少數，反倒是買家偏好散裝的頁冊，這樣才能依照自己的偏好另行裝訂。先前有些鑽研裝訂沿革的學者不明究理，總以為古早的印刷書是在印刷地裝訂的。

等到印刷機器的產能開始提升，裝訂工人也得調整作業方式，呼應新的需求。詳細點說，就是作業要快，且為了確保裝訂的品質合用但不致過重，以滿足財力普通、為數眾多的客戶，還得導入連續生產的模式。印刷術刺激了造紙業的成長，廢紙因而增加；於是裝訂工改變習慣，以「硬紙板」取代木板製作封皮。這種封皮是把多張廢紙黏合加厚，以提高強韌度，既便宜又不嫌笨重；廢紙的來源不一而足，包括舊的校樣紙、舊書破紙，以及用過的信紙、商業紀錄、文件等。這些有趣的發現，是把舊書皮撕開來研究的結果。

書皮的裝飾工作，同樣得講求快速與便宜。於是工匠棄絕了束帶狀的小壓模，不再一條接一條地反覆壓圖，既費力又費心；使用整塊飾版，不僅效果出色，也省時間。這種鐵版能一次在書皮上壓印整幅圖樣。在法國，常用的飾版上翻刻著《舊約》與《新約》的場景，其中又以時辰禱書裡常見的景象、聖人圖案等較受歡迎。即便是非宗教書籍，封皮上的圖案仍以宗教素材為主；少數的例外，則是書商以飾版壓製自己的標誌，後來亦有單純裝飾用的圖案¹³⁸。在另一方面，法蘭德斯的飾版則偏好以動物、細密畫為圖樣；稍後的日耳曼諸國，在北方文藝復興的啓發下，入畫者大都是富有寓意的、神話故事裡的人物。

十六世紀的頭幾年，又有一項改變。由於書本的出版量持續增加，裝訂工匠爲了節省勞力與成本，總是尋覓著更便捷的作業方法。而後他們研究出新的技巧：滾輪壓模。這是一種金屬滾軸，表面刻上簡單而可以重複壓印的圖樣做爲基調。採用這種工具，就能迅速地滾印出許多條帶狀紋飾，爲封皮增色。有時工匠會混用飾版與滾輪；易言之，書皮中央的圖案以飾版壓印，周圍的花樣由滾輪負責。

這就是十六世紀前三十年的商業裝幀樣貌；同時，豪華裝幀也引進新的方法。爲皇親貴胄製作的書本，傳統上採用布質封面，因爲當時的匠人只懂得援引「冷」戳印法加工高級封面，若是改採皮革，則無法處理出夠細緻的原料供加工之用。此時，摩洛哥山羊皮與燙金技術，從伊斯蘭世界傳入歐洲，情況遂爲之不變。十五世紀最後幾年起，產自哥多華的摩洛哥山羊皮，經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島輸入那不勒斯；來自東方黎凡特的摩洛哥山羊皮，則經君士坦丁堡進口至威尼斯。阿爾都斯在威尼斯使用這種山羊皮，約莫也是從這時開始，法國出版商則要到十六世紀初才開始採用¹³⁹。另一方面，燙金原本是東方文明沿用許久的技術，直到這個時期才被義大利人學起來。此一技術，是將燒紅的烙鐵，沾上金箔或銀箔；而一四七五年，那不勒斯工匠爲亞拉岡王國的斐迪南王製作的書本，就是以這種方式裝飾封皮的。到了一五〇〇年，威尼斯工匠亦如法炮製。當時的阿爾都斯，剛剛籌建出一間專印希臘字母的印刷鋪；將東方風格的燙金圖案印在封皮上，亦是推廣最力，導致一時間蔚爲風尚，甚至傳到義大利北部。是以法國人在入侵義大利之後，也逐漸喜歡上華美的書皮裝飾。舉凡法國的幾位國王，與一度掌管米蘭國庫的十六世紀法國藏書大家格羅里埃，都曾委請義大利的裝訂工坊製作書皮，燙金技術從而傳進法國。在十六世紀

中葉的三十餘年間，師承義大利技術的法國藝術家更是青出於藍，多色鑲拼、交織紋路、樹脂漆上的花朵狀圖案，紛紛出爐；另外有些書皮，印上文藝復興風味的純幾何圖案，營造較樸素的質感。就技巧的高超程度而言，這些書皮似乎無出其右者，但它們畢竟是君王公卿與少數闊綽藏書家的專利，故此處不多贅述。

就在這個時候，量產的商業封皮，也有部分採用熱戳印技術，「半豪華」封皮於焉誕生。自一五二〇年起，托利便開始將熱戳印技術應用在飾版上，壓印出他那名聞遐邇的出版商標「破瓶」。也有書商以雕著方格網底與交織紋路的飾版，裝飾平價書的封皮，營造滾輪般的效果；有時還在中央處放上特定的主題圖案，諸如書商標誌或某人物的胸像。此後一直到十六世紀結束為止，又有一種橢圓形的主題圖案，以戳模打在書皮（尤其是宗教書的書皮）中央。只是，這種種的加工方法，終究難以擺脫成本高、耗時多的問題，故簡單、無裝飾的犢皮封面，遂慢慢地出現。隨著經濟條件的惡化，市場需求不變，但求儘量便宜，平價書本遂以羔犢皮製作的陽春封面來裝訂；摩洛哥羊皮的書皮，縱使只在周圍印上金色束帶稍加裝飾，尊貴如樞機主教查理·德波旁，亦會欣然接受¹⁴⁰。

十七、十八世紀，最常見的是犢皮封皮，飾以平實的燙金邊框。稍微高級一點的書，採用摩洛哥山羊皮。身分較高的貴族或私人收藏家，時常差人在封面、封底中央，壓印自己的紋徽。倒是十七世紀的藏書家延續之前做法，訂購「以小烙鐵」燙金的封皮。十八世紀，藏書家的品味又有新的發展，並激勵了法國的豪華裝幀。此時出現的，包括了一七二〇年前後，裝訂工匠為攝政

王德奧林及其朝臣製作的鑲拼圖案，以及在中國風影響下，掀起時尚的多彩封皮。然而當時最受歡迎的，還是「鋸齒花邊」的封皮；即以蕾絲狀的基調裝飾邊框烙鐵，在飾版圖樣的周圍燙金。這個時期的知名匠人，諸如帕斯德魯、蒙尼耶與德洛米，是愛書人爭相邀約的對象，手中常有許多豪華本插圖書的封皮訂單。然而，這些封皮，與裝訂在內的書本一樣名貴，只賣給少數的菁英。一般的封皮則是大量製作，品質不過爾爾。此外，簡單的石紋紙封皮，出現於十七世紀末，除了偶爾為小本書籍所用，也有愈來愈多的期刊採用之。

綜觀十五到十八世紀的尋常書本，便會發現，在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初，客戶不多的情況下，裝訂工仍有餘裕裝飾零售書籍的封皮。但在書本產量逐漸攀升的十六世紀，出版數目成長，更多人有書可讀，裝訂業者面對的是裝飾平實的書本，尋求的則是更迅速的裝訂技術。過不了多久，量產書皮的封面、封底，連裝飾都省略了。豪華裝幀的製作技藝，固然在十六世紀中葉與十八世紀，兩度蓬勃發展，但一般書本的封皮，只求耐用、不問美觀。後來的書本，多半是書脊朝外，一本接著一本地立置於藏書閣的書架上，所以也只有外露的書脊部分，壓印著裝飾性質的重複圖案與書名。十九世紀裡，蒸氣印刷機與造紙機械相繼發明，印製大量書本，更加便宜而快速；這使出版商泰半棄絕了舊式的封皮，改以簡單的封面、封底，縫貼在書本上。一言以蔽之，伴隨書本增產與讀者增多而來的，是一般書皮的漸次簡化：先是放棄了美觀，而後又失去了堅固性。

第四章 書籍商品

從印刷工業存在的第一天起，便與其他工業一樣，受到同一套規則的支配：每一本書，都是一件商品；印製它們的人，首要目的是營利。即便有出版商，像阿爾都斯與埃蒂安納父子那樣，身兼學者與人文主義者，也不例外。基於這個道理，諸如籌措足夠資本開業、慎選欲印之書以吸引客戶，乃至於控制印書成本以與同行競爭等，早在產業發展之初，就已經是事業成敗的關鍵。講到行銷，書籍也與其他的市場商品相似。對書籍的量產者（印刷商）和銷售者（書商、出版商）而言，集資問題、成本問題，皆是重點所在。在了解這些問題如何影響整個書籍產業的結構之前，勢必得先把問題本身研究一番。

一、成本

首先，想想製書的成本從何而來？經營印刷廠的開銷，哪種成本占最多：是勞力？還是原料（尤其是紙）？在可以考證清楚的範圍內，構成整體成本的不同因子，彼此關係是否隨著時間流逝而變化？凡此種種，實難回答。舊時印刷商的紀錄簿冊與每日帳本，沒有多少本流傳至今；十五、十六世紀的印刷鋪帳簿，更是極度稀有。就算現存的買賣合約夠多，還是得有同一地區從古

到今天的文獻，且不可缺漏不連貫，才算是我們所需要的完整資料；偏偏情況不是這樣。

幸虧有圖書館學家寇伊克¹⁴¹，完成大半的細部整理工作，所以許多歷史資訊，才能保存於巴黎，因此我們就先從巴黎講起。一五二三年的一份財產清點資料，是此處第一個探討對象；其上詳列了一位小印刷商費列布所擁有的印刷設備，或可視為印刷鋪的典型¹⁴²。他的工具簡陋，計有價值十里荷的印刷機一台（併計兩只墊框則值十三里荷），總值低於八里荷的各種零件，五副磨損情況不一的活字組，加起來四十里荷。全部加總，大約值六十里荷。

一五二〇年的另一份清單，以同樣方式計算馬烏的財產¹⁴³。他的印刷鋪較具地位，配備鐵製螺紋脊、壓板、螺帽與螺栓的印刷機計有三台，價值六十里荷。整套哥德體刻花活字所需的雕模外加鑄模兩組，值二十四里荷。另外還有三套雕模，分別用來製作「布爾喬亞體」¹⁴⁴、「索姆體」¹⁴⁵（哥德體的一種較細變體）與「索姆安潔莉卡體」的活字，價值各為十二里荷、八里荷，以及七里荷又八索。八副磨損情況不一的活字組，總值一百二十二里荷。最後再加上幾塊雕版與黃銅字母（即陽文字範），十六里荷。活字櫃與其他的庫存，一百零二里荷。如此列計，他的印刷鋪設備總價值三百五十一里荷。

最後一例，當屬最高級的印刷鋪，由赫赫有名的神學書、教科書印刷商赫赫朴爾¹⁴⁵經營。他死於一五二三年，其印刷設備也一併清算：計有總值二十四里荷的印刷機五台（含墊框則值四十六里荷），十副狀況良好、總值約當二百六十里荷的活字組，數量甚多的陽文字範與雕模（後者尤難盡數）價值超過兩百里荷，以及加起來超過七十五里荷的雕飾字母、圖樣、木質與銅製的雕版等。這些器材共值七百里荷左右。

這些證據指出，一五二〇到一五二三年間，巴黎一地的印刷機造價，良窳有別，從九到二十里荷不等；跟整體投資相比，不算什麼大錢。更何況，有志創業的印刷商，還可以向人租借印刷機，以免去購置花費。一五一五年時，一台印刷機一年的租金四十索；而到了一五四〇到一五五〇年間，則調漲為六或八里荷，比之於同時期狀況較佳的印刷機市價（二十三到三十里荷）仍然低些¹⁴⁶。

換言之，印刷機本身是相對便宜的。添購必須經常更換的活字，才是較大的負擔。前述清單中的各式活字組，價差不小，從十到七十里荷都有，端視字粒打印面的磨損程度，與字體的多樣性、重要性而定。特魯瓦書商尼可拉·勒魯日，在一五一五年與巴黎印刷商巴比耶談成一筆交易。這筆交易的現存紀錄顯示，用以印製每日頌禱的布爾喬亞體活字組，一副包括大約八萬顆字粒；如將原料費用併計，每一千顆的價錢是五索。如此計算，則整套活字價值二十里荷¹⁴⁷，大約等於馬烏的大小布爾喬亞體活字，在一五二〇年的市價。到了一五四三年，雷尼奧依約提供印刷商葛羅莫一套半羅馬體（西塞羅體）的活字組，六萬顆活字的價格為每千顆六索，不含每千顆兩索的原料（鉛）；是以工本費總額應為十八里荷，材料費則為十二索。根據我們的資料，幾個月之後，這批活字與雕模一起出貨，葛羅莫支付了四十七里荷；換句話說，雕模的售價約當二十八里荷，此與馬烏、赫朴爾的財產清單數據相當吻合¹⁴⁸。

有了以上證據，我們就可以窺知，一位志在創業的印刷商，究竟需要多麼龐大的資源；不過，一旦他實現目標，印刷廠的利用價值便不可限量了。尤有甚者，倘若印刷鋪老闆同時身兼出版商，其在事業上的投資，數目愈發不可小覷；現存的契約，見證了書籍出版的開銷有多大。勒

尼奧在一五二四年，依照圖勒主教區批准的格式，替同個鎮上的某商人印製六百本學童禱本，索價五十五里荷¹⁴⁹。馬烏則在同一年，以三百五十里荷的代價，替桑利主教印刷四百冊彌撒經本¹⁵⁰。稍早於一五二三年八月的巴黎，亦有人遵照納韋爾主教區所頒格式，印刷六百冊每日頌禱，花費三百里荷¹⁵¹。貝德則花費六百一十二里荷，將德塞索所翻譯的《修斯提底斯》（古希臘歷史學家），印成一千兩百二十五冊對開本的大書¹⁵²。

欲爭取參與大規模出版的機會，印刷商得有相當的資產做後盾。更由於出版商必須頻繁地將手頭的活字汰舊換新，我們甚至可以說，想要投身印刷業，重金購置印刷機、活字櫃，乃至於整套活字，都不是絕對必要；設法維繫印刷機的持續運作，才是最需要雄厚資本的地方。就前述數據來看，印刷一整版的某部著述，其開銷甚至大過添購一間新設印刷鋪所需的設備。除此之外，那些同時經營出版的印刷商，投注於售書事業的金錢，也會高過印刷鋪的建置成本；前述的馬烏與費列布兩人，正是如此。事實上，印刷鋪的生產設備中，真正價值不菲的東西，只有木頭刻製的大寫藝術字母，以及稍後出現的「灰字」（即銅質字母）；而整塊的刻繪飾板，更是只有專精於特定書籍（如時辰禱書）印製的最大型印刷鋪才買得起。這就解釋了為何大部分的印刷商，似乎經常為財力豐沛的出版商、書商所聘雇，而這些出版商也將自己所擁有的整套雕飾字母、圖版，甚至活字，租借給效力於己的印刷商。

然而，印刷成本本身，只占整體開銷的一部分。紙張當然也要花錢，其昂貴更是不在話下。單純的印刷成本，謹舉證如下。一五一八年，巴黎的印刷商魏能，以一天二十索的酬勞獲聘，每天將《南特日禱本》所需的每一張全開紙印製一千三百份¹⁵³。同樣是巴黎的印刷商，喀布

廉於一五二四年承攬了六百五十份《南特日禱本》的印製，印時使用三組待印版，一天六十索¹⁵⁴。同年尼可拉·希曼也同意，以三組待印版印製七百五十份桑斯主教區的宗教會議敕令，索價三十索¹⁵⁵。到了一五二六年，喀布廉每天印製一版（一千兩百份）《布爾日日禱本》，則要價六十五索¹⁵⁶。如果考量到印刷鋪老闆得供應兩位印刷工與兩位排字工的食宿，如此的印刷價格似乎頗為低廉。據悉，在一五三九年的里昂，一位排字工的一日薪資為六索又六德涅¹⁵⁷。仔細思量這些數字後面的意義，當可理解印刷鋪老闆為何會死命鞭策壓下的師傅提高產能，又為什麼要廣招無給職的學徒了。

相較於那時候的概括印刷成本，紙張採購的開銷，占了多大的比例？從以下數例可以窺知一二。一五三九年，印刷商波拿梅印製神學家多赫的《真知學園》，要求委印人支付每令十四索的紙張成本¹⁵⁸。葛羅莫為採購印製聖經故事所需紙張，向雷尼奧開價每令十八索，時為一五四三年¹⁵⁹。當時的紙價隨紙質好壞而有所差別，每令至少十索，至多三十索。

這樣看來，印製一版書籍所費的紙張採購成本，便占去總出版支出的很大一部分了。這個事實並非限於前述的例子（十六世紀初的巴黎印刷鋪），以下史料可以為證：在一四七八年的威尼斯，有一位出身拉提斯伯恩、名叫威爾德的印刷商，在印製九百三十本《聖經》之時，收受每一台五杜卡（威尼斯共和國於十三世紀起發行的金幣，部分歐洲國家也曾仿鑄）的費用，共計兩百四十三杜卡¹⁶⁰。如果以普通品質紙張在當時威尼斯的售價（一令兩里拉半到四里拉不等）來計算，則紙張的總成本大約在兩百到三百杜卡間¹⁶¹。另一例證發生在一四八三年，李波利的印刷鋪，獲聘印製菲奇諾翻譯的拉丁文版柏拉圖作品；全書由三十帖裝訂而成，每帖的印刷索價三弗

林，故總額為九十弗林。由於這版書只印了一千零二十五本，而每一本的各帖又是以四張全開紙印成，依前述紙價推算，紙張的花費大約在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弗林間，超過了印刷部分的實質成本¹⁶²。

購紙成本占出版總成本的比率，或許隨著時間的演進而稍減，但一直到十八世紀仍是居高不下。一五七一年，印刷商皮耶魯在印製五百本《亞維農法典》之前，支領了每令十八索的紙張材料費，而整個印刷工作的收費不過三十七索¹⁶³。此外，十六世紀末尚有其他線索，揭示了印製一版書籍的各項開銷間，關係究竟如何。這些線索來自特利騰大公會議（天主教會第十九次普世會議，係馬丁·路德遭處決後的第一次），決議修訂新版彌撒經本之後，所擬定的印刷合約。法國教會組織兩個聯合團隊，分頭籌備新經本（史稱普瓦捷彌撒經本）的付梓：一個找上里昂的一家印刷鋪並與之議價，另一個則與普瓦捷的某印刷商接頭。達成最終協議後，兩組人馬共同分擔開銷，協力資助兩地分別印刷的版本。兩團體還透過法律規範，明文律定各自應該負擔的成本。

在里昂部分，依約印出的每日頌禱一千三百本，每本用掉七十二張半的全開紙，斥資五百七十八盾五十八索又十德涅，其中印刷費兩百六十四盾，紙張費用一百三十七盾五十八索，從里昂運往普瓦捷的費用為一百一十盾。至於在普瓦捷印成的一千兩百五十本，斥資五百九十二盾十一索，其中添購及運輸所需的活字組就花去一百盾，印刷兩百零四盾，紙張兩百六十四盾——如此天價，是因為普瓦捷當時遭到封鎖。此處我們不難注意到，里昂版經本的成本，因運費而增加將近五分之一¹⁶⁴。

審視十七、十八世紀的出版成本，所得結論也差不多。一六四八年，巴黎印刷商布魯內撒手

人寰；經過清算，他的生前財產包括兩台印刷機，分別價值九十與六十里荷。除卻印刷機，他的印刷廠裡計有活字十五套、飾字飾圖、銅字與其他工具，總值約當七百四十六里荷又十索。在此之前不久，兼營印書、賣書的卡慕薩，於一六三七年和鑄字廠老闔德拉佛吉訂立契約；根據契約所載，一整副的小羅馬體活字，包含十五萬顆字粒、兩萬五千顆「字鎖」（用以固定活字的木楔，以兩片為一組）、五千條「鉛空」（用以隔開各行鉛字、製造行距的鉛條）、羅馬體字母與此許兩點大小的小字。如果不把字粒、空白字距、鉛空與羅馬字的材料費計入，則整套活字的價格還比三十里荷稍低些。一六四四年，又有一位巴黎印刷商布伊羅，替一位名叫雷卡羅皮耶的作家印製其作品《猶滴傳》。這一版印了一千本，每一本需要八開書頁五十張，並以一種叫聖奧古斯丁的字體打印，而每張全開紙的印刷要價六里荷。在這個階段，品質良好的紙張，每令售價約為六十三索，即三里荷又三索。如此一來，我們或可論斷，以八開的書籍來說，紙張價格概略與印製成本相當。根據同樣數據進一步核算，當時欲以品質較佳紙張，印製一千本兩百四十頁的八開書，約莫得花掉一百九十里荷；紙張一百里荷、印刷九十里荷。

下面的例子，是一本名為《端章雅句》的課堂教科書；該書係依照貝納爾與汝利昂的指示付梓，選用一種一令五十索、名叫「約瑟夫」的紙張印刷，製作成一千冊四開本。由於每張全開白紙的印刷須花十里荷（印刷機的調校必須非常小心，才能將各頁印在同一整張的正確位置），故這本書的紙張材料費只有印刷費的一半。與前面其他例子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作者也支領了酬勞：每張全開三十索¹⁶⁵。

若對十八世紀的印刷工作稍加計算，結論也幾乎相同。根據一七七一年的一份合約備忘錄，

以行間加印方式將「西塞羅體」打印在全張紙上，複製一千份的成本細目如下：兩令的白紙，十六里荷；組版、校樣與第三者校對，十二里荷；正式付印，六里荷；庫存贖金與其他一般開銷（相當於該版書印刷開銷的百分之五十），約為九里荷。總額：四十三里荷¹⁶⁶。

最後一個例子，則是家喻戶曉的鉅著：法文《百科全書》¹⁶⁷。根據十八世紀德波瓦哲曼的見證，這部書籍印製了四千兩百五十套，其中每張全開紙的採購、印製支出如下：

印刷	二十四里荷又十五索
印刷商利潤與庫存贖金	十二里荷七索又六德涅
紙張	六十八里荷
合計	一百零五里荷二索又六德涅

舉了這麼多例子，可有得到什麼普遍性的結論？

第一，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間，高品質紙張的採購成本，比一般數量的書籍印製成本還高。無怪乎在通貨緊縮、利潤微薄的時期裡，印刷商會回頭採用較差的紙質來印書，以抑制印書成本；甚至在物價平穩時，也有這種現象。

第二，創設一間印刷鋪，只消籌募所需資金即可。基本的印刷設備，成本並不算高；購置印刷機、活字櫃、活版盤與數套活字，亦非難事。真正的問題，在於印刷工作本身，因為書本出版的實際成本比前述資本高的多，此外印書的關鍵器材，活字，也必須經常汰舊換新。除此之外，

不要忘記：當時的書籍買家甚少、書本銷售遲緩，印刷商如欲將書全數售出，就一定得把一小批、一小批的書籍，分送至歐洲各地的主要書市。這麼一來，投資自難迅速回收，現金壓力可想而知。萬一景氣陷入危機，印刷商可有活路？到了那種時候，書籍這樣的「奢侈品」，銷售恐有完全停頓之虞；為求溫飽，印刷商只能改印宣洩民眾不滿之情的小冊子。對出版商來說，出版書籍永遠有風險，因為大眾對某本書的好惡永遠無法事先預測；在這個前提之下，他們急於找出一種市場需求穩定的商品類型，如教會用書，如此才能在非常時期確保銷路。也因為這樣，同時出版不同書籍確有必要，這是為了避免唯一的出版商品滯銷，以至於血本無歸。但是，出版多本書籍，需要的資金勢必更為龐大，這就帶來了新的問題：籌資。

二、籌資的問題

印刷商大都欠缺資金，畢竟他們泰半是工匠出身。多不勝數的歷史文獻證明，吃這行飯就得面對金錢匱乏的常態，從印刷行業誕生開始便是如此。在巴塞爾，十五世紀的大印刷家，如欲自力出版書籍，通常會拿印刷設備做擔保，設法借款。如此的創業舉措常常失敗，害他們連陽文字範與陰文字模都賠上；偏偏這些器具都是他們親手製作的，要不然就是極難購得。比較幸運的印刷商，則得以保住一部分的家當，並負債潛逃，在別的國家，如法國，重整旗鼓¹⁶⁸。十六世紀裡，許多印刷師傅的財務困窘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好一個鎮接一個鎮地流浪，工作機會則完全仰賴當地政府當局、議會或教會委其印書，工作時有時無。到了十七世紀，印刷商悲慘的生計

更可說是苟延殘喘，只能遵照著來自鎮所或個人的訂單，日復一日地勞碌；偏遠鄉鎮的情況尤其嚴重。他們可不是不夠稱職，只是缺乏資金罷了。印刷商非得找到財力後援，才有機會成功創立自給自足的印刷事業。

從這點來看，阿格諾的印刷史，便相當具有意義了。這個位於亞爾薩斯的小鎮，周邊並無大學，表面上似乎沒有能夠成爲印刷重鎮的條件。但從策略面來看，其地理位置鄰近印刷商眾多的史特拉斯堡與巴塞爾，距離紐倫堡、法蘭克福等日耳曼的大型出版中心也不遠，足以做爲「中繼站」。書商與印刷商，旅行中屢屢途經該地；在那兒印製的書籍，便於運往各地，不致太過費時或費力。更何況當時的貨運成本甚高，但洛林與勃艮地出產的紙張，卻能輕鬆運抵阿格諾；此外，小城鎮的勞動成本想必是比較便宜的。即便如此，印刷商葛朗一四八九年在阿格諾創業之初，事業成長幾乎停滯；而在一四九六年前，他的生意一直做不大。其所印刷的書籍不過幾本文法書與布道書，一年出版的只有兩到四種；實際上，他的財力薄弱，手頭資金相當吃緊。

但到了一四九七年初，情況改變了。此時的阿格諾，印刷商數量已經夠多，足以結成社團。這是怎麼回事？說穿了，不過是葛朗跟一位名叫林曼的奧格斯堡商人，開始生意上的往來。林曼販售書本和「其他東西」（可能是印刷小工具與活字）維生。葛朗的印刷鋪，就此活了起來。他一面替林曼印書，一面把紙張、活字與其他原料的採購外包給林曼；過不了多久，其他大書商，包括洛克納、徐斯特，尤其重要的是史特拉斯堡的納布洛克，也效法林曼，向他訂購書籍。此後，葛朗每年印製的對開書與大本四開書，多達十二種；到了最後，總共有兩百九十種書籍由他印成，其中兩百四十種係受林曼之託，替納布洛克印刷的也有大約二十種。阿格諾的印刷商，生

意愈做愈大。一五一一到一五二五年期間，以及一五一九年之後，安格斯兩度協助林曼校訂書籍。另一方面，來自巴登巴登、曾赴笈巴塞爾大學的安斯罕，也因為自己在圖賓根的印刷生意沒有起色，於阿格諾另起爐灶，為柯貝格、科隆的畢爾克斯以及納布洛克印書。在他之後，當地還出現很多印刷商，諸如替梅蘭希頓（十六世紀神學家、馬丁·路德的摯友）印書的塞哲爾。這個時候，金主、資本家，也來插上一腳，並扮演重要角色。這些人承擔虧損風險，押寶在某本書的銷售上，並經常替印刷商決定哪些東西該出版。有些時候，他們還出資籌建極大的印刷鋪，產量之高宛如工廠，反倒不太像舊時的手工作坊。像這樣等著投資印刷事業的資本家，人數眾多，以下粗淺介紹幾位。

現在，請大家回溯到十五世紀下半，那個印刷剛誕生在萊因谷地、傳往歐洲各地的時代，看看里昂的小布伊爾¹⁶⁹及其家族。里昂是個繁榮的城市，里昂市集更是各地人士的聚會中心。米蘭、佛羅倫斯、威尼斯、盧卡，乃至於德國的商人，一年四次齊聚此地，互通有無。德國與義大利的銀行家，還在此設立長期據點。反過來說，里昂商人除了遍布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客戶與事業夥伴外，更定期造訪這些地方。經濟環境的利多，已然使里昂市獲益良多，確保了它的富庶。除此之外，里昂的地理位置也很優越：鄰近德國與義大利，同時坐落在地中海沿岸與首府地區（即法蘭西島，法國的直隸省）之間。來自萊因河沿岸、巴塞爾，甚至義大利的印刷商，在里昂發跡，也在里昂市集陳列販售書籍。

里昂也是智識、文化的中心。誠然，這座大城爭取設立大學未果，但人文主義風氣還是吹進了總主教的宮廷裡；至於當地的總主教，係十歲即位的查理·德波旁，早年由學問淵博、英明能

斷的叔父尚·德波旁代行職權。尚在亞維農長大，畢生致力於充實學養，並在勃艮地公爵下令劫掠克呂尼修道院之後，投身該院圖書館的重建。在他自己擔任勒皮主教時期，則有一座巍然可觀的教區圖書館落成。不僅如此，在德波旁皇族中，與尚隸屬同一支的血親，個個都有學者之風，其中還有不少人積極鼓勵印刷鋪的創建。年輕的總主教查理，與家族其他成員一樣喜歡文藝。巴黎大學的神學家費歇，曾將自己的著作《修詞學》獻給他，封面飾以樞機主教的紋徽；這是巴黎出產的首批印刷書之一。

里昂聖若望教堂的教士會，在當時的名聲正處於巔峰，除了成員中有不少貴族子弟之外，其文化水平也極高。想當然耳，該會的神職人員，人經常不在里昂，外出則多半是前往國內外各大學從事研究。從巴黎、土魯斯、奧爾林、亞維農、杜林、佛羅倫斯、比薩、波隆納、帕維亞到費拉拿，各地的大學學者名冊上，都找的到他們的名字。此種求知熱情，在中產階級的身上同樣明顯；這些新貴在皇親國戚家道中落之後，繼承其階級，而他們的下一代，經常是一流大學的學子，特別是在奧爾林大學修習法律的那些。他們是閱讀慾望強烈的一群，這點從以下的小故事中可見一斑：嘉連是位老派商人，滿腦子都是生意經；面對閱讀「過量」的兒子，他頗感頭大，甚至如此警告：

讀書讀書 學問掌故

打發時間 頭昏想吐

相貌堂堂 讀成朽木

若非如此 隨便你讀

假使讀書 樂趣盡失

千萬不要 愛書成癡

商場漢子 慎之戒之

小布伊爾便是在前述的社會風氣中成長。學界一度相信，小布伊爾的父親大布伊爾只是單純的商人，但此與真相相去甚遠。其實，他是里昂當地的要人，自己已是市政會議的一員，卻經常成爲議會請益的對象，其地位可想而知。他獻身法學研究，似乎頗熱中此道；一四二六年成爲法學院學生、一四三七年拿到學位，一四五八年再獲博士學位，月餘後辭世。成爲博士之後，距離紳士的稱號也就不遠了，這讓他在追求榮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至於小布伊爾的母親布堤耶，出身富裕的雜貨商家族，家中還有一些人躋身執政官階級。這些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爲小布伊爾極可能是出自對文學的喜愛（傳承父親的興趣？）而投身相關行業，並在愛財之心（出身商人門第緣故？）驅使下持續經營。這兩個誘因的結合，使他成爲積極投入工作之人，事業也得以擴展。父親過世之後，他負笈巴黎，於文學院就讀，時值一四六〇年。話說印刷術傳入索邦校園，與費歇、海恩林兩位學者關係非常密切。他們是在修埃佛造訪巴黎之後，對印刷藝術產生興趣的；小布伊爾求學期間，想必曾與這兩人相遇。此外，小布伊爾後來曾與威尼斯的法籍印刷商楊頌往來，楊頌之子一四八〇年在里昂時也曾與他聯絡，顯示他與楊頌可能早就搭上線。不管怎麼說，小布伊爾顯然明白，此種新興工藝潛在的雙重可能性——既是文化傳播的媒介，也是有利可

圖的投資。接下來的史料顯示，一位來自列日、遊歷各地，到過巴塞爾與瑞士的印刷師傅勒華，成爲他的房客，並依他指示入主一間印刷鋪，稍後便開始積極從事生產。兩人合作的第一個結晶，誕生於一四七三年的九月十七日；這便是據今所知，第一本在里昂印製的書籍，樞機主教羅泰爾的《網略》。

在這樣的合作關係裡，兩人各自的角色爲何？小布伊爾只是單純的金主？抑或活躍於印刷事業的經營？關於這點，史家多所辯論，此處且不深究。確定的是：哪些文本應當印刷成書，由小布伊爾親自決定，於是乎法學叢書與商人、中產階級閱讀的法文書，勝過其他類別的著作，成爲出版的大宗；這點後來變成里昂出版業的特徵。也因爲他財力可觀，不甘做一個只賣自家書籍的地方書商，遂有其他印刷商爭相委託他經銷部分書本；法國也好、其他國家也罷，書商紛紛登門造訪，請他代售存貨。在當地其他書商開始在里昂市集上洽談新生意、拓展業務之際，小布伊爾的買賣通路之多，仍然超越同業。即便如此，他還是不滿足；法國各地的城鎮，只要他覺得當地有書籍需求，他便開設分店。這些分支主要設在巴黎、亞維農、土魯斯等大學所在地。

在此舉他在亞維農的事業爲例。他於一四八一年抵達該地，並將部分生意交付給當地最成功的兩位商人，亞蘭與尤參·德羅姆。根據合約，兩人有義務替他販售七十八種書籍，其中部分由他自己的印刷鋪所出品，且多爲法文宗教書；其他書籍則由別家印刷鋪印製，以拉丁文的法學書籍（亞維農對這一類書確有需求）爲主。若說德國與里昂的同業，讓他在亞維農的生意驟然遭逢激烈競爭，則相形之下，他在土魯斯的事業，就順利得多。一四八二年，在這個法國與西班牙之間的中繼站，他把分店委任予自己的「隨從兼書記」克萊雷。接下來他又與來自薩伏伊的裝訂工

兼書商德波尼做起買賣，他的弟弟雅格·布伊爾稍後並將一批書籍放在德波尼處寄賣。到了十六世紀初，布伊爾家族在土魯斯的業務規模，已經不可小覷。

在巴黎，小布伊爾擁有一間大批發店，在他死後由桂伊波接管。此君憑著巴黎的分店賺了不少錢，甚至有餘裕將鉅款借給里昂的總店，做爲與之爭奪巴黎事業繼承權的訴訟費。除此之外，小布伊爾也因地位顯赫，成爲「產業自治會」的一員，並與其他舉足輕重的人物同獲授權，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左右當地政府的決策。他於一四八八年辭世，遺產中雖有兩千里荷捐給里昂的學院教會（不是總主教公署，但同樣附設學院或修士會的教堂）成員，留給子嗣的財富仍舊龐大。

身爲世上第一批對印刷產業感興趣的資本家，小布伊爾的生平種種大抵如斯。這個人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爲他在坐擁財富之餘，願意出資協助、涉入印刷工藝的發展，即便這個產業才剛問世。相關史料固然欠缺，好在我們仍對他的事業版圖稍有了解：從里昂到亞維農、從土魯斯到巴黎，甚至從土魯斯到西班牙，都有他的生意。也許其事業還遠及德國、義大利，畢竟我們已經確定他曾與威尼斯的生意人往來。

前面提過，小布伊爾曾提供食宿予印刷師傅勒華，並借重他的技能跟印刷機器，爲自己印書；當時這種事情時有所聞。然而，隨著印刷技術普及，印刷業的投資者（或者該說是發行商）便不再需要訴諸此一方法，而是直接與已經開業的印刷商交涉。他們或者提議借錢給對方，或者協助那些他們眼中夠本事的師傅創業、替他們爭取訂單，但不再隻手霸占對方的印刷服務。即便如此，印刷的關鍵還是操在他們手中：舉凡活字字樣、刻飾字母、浮雕圖版與其他設備，都是他

們的財產，只能用來印製那些他們有意資助的書籍。

名聲響亮的大出版商佛拉爾，其經營手法大抵如斯¹⁷⁰。一開始，巴黎的印刷術尚處於襁褓階段，他管理的工坊則專門負責豪華手抄本的繪飾與抄謄，客戶盡是王公雅士。很快地，他察覺新興的印刷法大有可為。在尚·杜蒲雷與波諾姆印出巴黎第一部插圖書時，他也決定聘請兩人替自己效力。一四八五年，他委請杜蒲雷印製《十日談》，此後一躍成爲最知名的法文插圖書出版商。他們鎖定的客源不再是珍藏手抄本的小眾，而是更廣大的市場；不過，爲了顧全那些喜歡舊式抄本的老客戶，他也會用羔犢皮印書，書中細密畫仍採手繪，而非木刻版畫。佛拉爾監印的書籍，盡爲上流貨色，圖版由他審核過的匠人刻繪，活字組（亦歸他所有）則經他挑選後始能啓用。他不會操作印刷機，但把工作指派給巴黎多位一流的印刷師傅：除了杜蒲雷，還有皮耶·勒魯日、勒維、勞倫、摩巴內、吉伊·寇斯提烏、勒卡隆、梅納爾以及特列裴洛。

佛拉爾也不把自己的賣書生意局限於單一店鋪，這點與小布伊爾相似。他在巴黎有兩個營業據點，一個位於皇宮區，另外一個最初於一四八五至一四八九年間設在聖母橋頭，其後屢經喬遷，先後落腳在小橋附近的聖雅格街，與聖母新街靠近「主愛之家」醫院一帶。他也擁有一家批發店；與小布伊爾不同的是，這家店位於圖爾，且生意由佛拉爾完全掌控。不僅如此，他的市場還擴及英國、在倫敦設立分店，甚至出版英文書籍。

其他還有不少的大出版商，循佛拉爾的先例，爲印刷商負擔出版成本、提供廠房與原料、租用印刷機，或預借現金。以出版騎士傳奇聞名的米歇·勒諾瓦，資助的印刷商是勒維。格列爾合作的對象，包括赫朴爾、勒吉耶以及時辰禱書的印刷專家沃斯特雷；此外，庇古歇的印刷機，幾

乎完全被格列爾的出版計畫所占用。像這種型態的投資，如論規模，則巴黎的出版商尚·佩堤，可謂無人能出其右¹⁷¹。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這位資本家的確在巴黎的出版領域獨領風騷。由他出資發行的書籍，從一四九三到一五三〇年，就有超過千本，其中多數是重要的出版品，占去巴黎書商出版總數的十分之一。他甚至比小布伊爾更能代表早期書商兼資助者的典型。他的家族從事屠宰業而致富，其發跡簡直就是「富商不怕出身低」的象徵，但這並不妨礙佩堤家人吸收文化養分，而他們也還是能與當時的學者保持最密切的往來。論富有程度，他與他的繼承者同享橫財：父子兩代除了在巴黎的資產，不動產還遍及克拉馬、伊西、默東、碧耶佛與普瓦西。

身為屠夫之子的他，名列當時巴黎大學御筆親點的四大出版商，同時也是服務大學學生的主要出版商，與巴黎一帶人文主義傳播的主要力量。在他手中初次出版的書籍之多，同業只能瞠乎其後，而其他的書商與印刷商常常樂於分擔他的出版成本。在這個由巴黎一流書商與頂尖印刷師傅共同扶植的事業裡，他的名號尤其顯赫。其在生意上頻繁接觸的對象，除了克韋爾、瑪內夫、倫堡德、波卡爾、科布倫茨的約翰，偶爾還有亨利·埃蒂安納。他聘用的印刷商也很多，沒有一位是等閒之輩：馬爾相、菲利浦、戈林、勒德魯、巴里高、德普雷。除此之外，托利與貝德，亦接受他的資助。以下將詳述他與貝德之間的關係，以此佐證：偉大的資本家兼書商，究竟如何鼓舞新的智識潮流¹⁷²。

一四九九年，貝德從里昂來到巴黎，替特雷瑟爾工作；當時巴黎的人文主義者，多半已經聽過這位年輕印刷師傅的名號。慧眼獨具的尚·佩堤，試圖說服他加入自己的事業，並請他擔任內文校對，以示禮遇。有次貝德抱怨，同時替多位印刷商工作、往返各地，浪費太多時間；於是佩

堤把握機會，建議他接受自己的資助，成立一間印刷鋪。貝德的印刷事業，其實是這樣肇始的。

如此一來，佩堤自然把許多生意交給貝德，尤其是需要細心校對排印的重要書籍。但是，這樣的合作關係並無獨占性；貝德除了有時候替其他書商印書，還經常在成本不高的前提下自行印書。佩堤也一樣會聘請其他的印刷師傅，這點前面已經提過；巴比耶、波拿梅、葛羅莫、維篤、寇斯提烏等人，都拿過佩堤的酬勞。他時常與諾曼地的商人、印刷匠往來，曾在盧昂以自己的名義出版些許書籍；盧昂市議會的一項命令中，甚至提及他「出版過的書籍之多，勝過一千個普通出版商」。克萊蒙也在他的生意版圖內，他在那兒擁有一間印刷鋪；而利摩日似乎設有他的分支，他的部分書籍即是在當地印製。至於里昂，更有佩堤雇用的印刷鋪，與他經營的書店。就是因為他的營運範圍極廣，在特魯瓦、奧爾林、布盧瓦、圖爾、布夏爾島等地，都能見到他替合夥人作保，為其清償債務。

這樣的商業皇朝，絕非僅此一例。整個歐洲的書籍產業，都由類似的機制經營。以德國為例，在許許多多的城鎮裡，皆由少數的書商委聘大量印刷商來出書。前文提過的林曼，在阿格諾的葛朗之外，還起用了奧格斯堡的尚·歐特瑪、歐格林、席范·歐特瑪，紐倫堡的斯圖赫與傑洛姆·賀澤爾，威尼斯的黎赫敦斯坦，巴塞爾的佛茲罕與亞當·佩特里，以及史特拉斯堡的納布洛克。偶爾，書商家族的成員，會在多個城市同時開業，以增加銷售通路；這就使得名副其實的「國際性」出版機構，得以跨越國界而誕生。

義大利的季翁塔家族，即以此種模式拓展事業利益¹⁷³。這個家族裡有位菲利波·季翁塔，可謂十六世紀初期佛羅倫斯最具影響力的出版商兼印刷商。他的父親是佛羅倫斯當地人，以買賣羊

毛致富。而他，則在諸多文士學者的協助與指點下，或爲自己，或替他人，委託印刷匠印製爲數頗多的書本。兒子伯納多·季翁塔在他死後接手，日後更位居伯爵之尊。另一方面，菲利波·季翁塔的手足路坎托尼歐·季翁塔，則在佛羅倫斯工作一段時間後，於一四八九年於威尼斯創業。他與當地規模較大的書商合作，委聘數位不同的印刷商爲自己效力，其後並開設一家活字印刷工場，名氣直逼托勒沙諾與阿爾都斯合資創建的工場。他的兒子托瑪索·季翁塔在他身後繼承衣鉢；而他分設於威尼斯與佛羅倫斯的總部，則保持密切聯繫。政治上，季翁塔家族支持共和制，是以路坎托尼歐·季翁塔在威尼斯的辦公室，亦是佛羅倫斯共和黨人出國避風頭的地方；當權派的柯西莫·德麥迪奇，甚至鼓勵朵尼在威尼斯創建一家頗具勢力的出版公司與之打對台，意圖牽制菲利波·季翁塔的政治活動。

另外還有一位雅格·季翁塔，一四八六年生於佛羅倫斯，父親是佛朗西斯科·季翁塔。他曾在伯父路坎托尼歐·季翁塔的麾下見習，而後由威尼斯轉往里昂，以自有資金創設出版公司，不過路坎托尼歐·季翁塔可能也會出手相助。從一五二〇年起，到他辭世的一五四七年的二十七年間，大量的神學、法律、醫藥類書籍，皆由他出版。除了聘雇三十多家不同的出版商爲他印書，他也擔任里昂書商聯誼會的主席，有時也與路坎托尼歐·季翁塔或盧卡的書商合作出書。其事業涵蓋歐洲，財力之豐厚，甚至還在一五三七年借款五萬里荷予樞機主教圖爾農，以供國王支用。他的倉庫與店鋪，分設於法蘭克福、安特衛普、坎波城、薩拉曼卡、薩拉哥薩及巴黎，其中巴黎的事業由姪兒巴泰勒米代爲照料。季翁塔家其他成員，仿效他的做法，是以由同族經營的售書事業，在佛羅倫斯、威尼斯、里昂之外，於布爾戈斯、薩拉曼卡、馬德里等地，也都可以見到；各

地經商的血親，彼此密切合作。

這一家人，一部分與外面的印刷商共事，其餘則在自營印刷鋪之餘，同時委請其他印刷商代工。一般說來，資金足夠的出版商，都會想辦法自設印刷鋪，並在鋪內實施勞力分工，職工們各有明確職掌。大出版商的目標不外乎二：一是憑藉組織分工的合理化，印製價格具競爭力的書本；二是確保書本的品質能更上層樓。事實上，如果不以這種生產線的型態從事出版，十六世紀那些極優質的出版品，根本無從誕生。托勒沙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位阿索拉的富有市民，在威尼斯以書商之姿崛起，除了聘雇印刷商，還指派當時只是窮學者的阿爾都斯經營店鋪。這段因緣，促成阿爾都斯與托勒沙諾之女瑪莉亞結為連理；五十歲的阿爾都斯，迎娶年方二十的新娘，自然因為其妻繼承的遺產而大大獲益。在如此的資金奧援下，阿爾都斯終能實現雄心，並在托勒沙諾聘雇的眾學者協助之下，完成古代經典文本（尤其是希臘文作品）的付梓計畫。

紐倫堡的柯貝格¹⁷⁴，可能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出版商。他在一四七三到一五一三年間，盡可能以最理想的開本、形式，推出兩百三十六種書籍，其中大半是極重要著作；其所採用的經營模式，亦不脫前述。此人生於一四四〇年，家中出過一位市長，而他早年可能是金匠，並在一四七〇到一四七二年間轉行從事印刷。他出版的第一本書，於一四七三年問世，即阿奎那評注的波伊提烏著作《哲學的慰藉》。入行之初，他便專門出版神學與哲學書籍，諸如十三世紀的德博章、杜朗、司各托、阿奎那、五世紀的聖哲羅姆、四世紀的聖安博，以及聖奧古斯丁的作品。在這之外，他還印製過數個版本的《聖經》（其中包括第一部德文《聖經》）、《教令集》與許多教會法典書籍——簡言之，神學院與法學院學生傳統上必須研讀的典籍，是他發行的大宗。

柯貝格最首要的服務對象，是各地的大學。這麼一來，其所出版的希臘羅馬經典，便顯得相當稀少。但他仍和人文主義者密切合作，合作對象的才識足與采爾蒂斯、柏克海默媲美，並殫精竭慮地追求文本編輯的正確性。由他聘為審稿的阿默巴赫、佛利斯納、柏克海默、馮懷勒、溫菲林、伯肯浩、布徐等，亦非等閒。樞機主教于格版的《聖經》，被他分成八冊出版；籌備期間，他並委託當時人在義大利的布徐，為他留意最好的手抄本。可別誤會了：柯貝格縱有文人習氣，首要的身分仍是生意人、製書商，對投資的回收念茲在茲。據一五〇九年的統計，為他印書的印刷機至少有二十四台，替他效勞的印刷匠、校對員、雕版師、裝訂工約莫一百人。其裝訂工坊的成品，牢固且整齊畫一，成為其事業組織的主要特色；至於部分書籍的圖樣設計，則由同為德國人、又與他交好的大師杜勒，提供插圖與整體格式方面的建議，於他更是受用。

然而，他自己的工坊，實不足以應付與日俱增的生意。是以柯貝格與他的後繼者，經常在生產上尋求其他印刷商的幫忙：例如史特拉斯堡的格呂寧格，與阿默巴赫。後者曾在他的麾下印書，而後在巴塞爾落腳開業，唯與舊東家的關係仍然密切。在書籍的銷售上，柯貝格仰賴龐大的商業網絡；他的經銷商，不僅遍布於法蘭克福、萊比錫、維也納、科隆、巴塞爾、史特拉斯堡等日耳曼大城，也廣布在布達佩斯、華沙、威尼斯、佛羅倫斯、安特衛普、布魯日、萊登、巴黎等歐洲重要都市。這意味他有能力替規模較小、銷售通路狹窄的同業擔任零售仲介，這也使他成為當時歐洲不可或缺的企业家。

單從金錢投資的角度來看，最有名的印刷機構，應該是安特衛普的普朗坦所創建者¹⁷⁵。安特

衛普是與歐洲各地皆有往來的商業重鎮，在此資金取得相當容易；這個特點究竟如何促進了印刷業的發展？普朗坦的例子，爲我們找到清楚的答案。

一五一四年出生於圖賴訥的普朗坦，並無私產可言。早年他在盧昂、巴黎的多家印刷鋪工作，一五四九年於安特衛普創業。此後許多年，他寫了一封信給教宗國瑞十三世（或格列高利十三世），提及這個決定的緣由：「從我看來，在其他的國家跟城市，我可以輕易獲得更大的好處；但我還是選擇比利時，偏好安特衛普尤勝其他城鎮。據我判斷，世上沒有其他城市，具備比它更多的資源，供人從事這個行業；這是令我如此決定的主因。它的交通便利——這裡的市場，可以見到許多不同國家的貨品，足以爲證。此外，印刷技術上必須的所有材料，在安特衛普都有機會找到。要招募足額人手，接受任何相關的訓練，一點也不難……最後，學風昌盛的魯汶大學，在各個領域裡都有學養豐富的教授；我的盤算是，這些學識化爲手冊、教本與重要典籍之後，對大眾的福祉將有莫大益處。」

開始時爲了謀生，普朗坦曾經從事裝訂、皮革加工等工作，後來才成爲印刷匠。其出身寒微，且在一五六二年之前只出版過一本真正重要的書，即極盡華麗能事的《查理五世國殤記》，出資印製的還是國庫。一度有人指控他傳印背教的邪書，迫他在一五六二年從安特衛普出走數個月，其書籍商品旋即遭到查扣；查扣清單顯示，這些書在當時也都不是值錢貨。

爾後，與普朗坦同屬「慈家」教派的其他信徒，便對他發生了興趣。一五六三年，他回到安特衛普，與幾位富裕的中產階級籌組出版商聯合會，成員涵蓋高內魯·凡邦博格、查爾斯·凡邦博格、銀行家史寇提、醫生布諾等。在該會五年的歷史中，出版兩百六十種書籍，有各種版本的

希臘羅馬經典、希伯來文《聖經》，和彌撒聖祭用書。事業「起飛」之後，普朗坦得以爭取貴人相助，諸如樞機主教格朗維爾，以及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祕書德卡雅。憑藉這層關係，他在財務上、法律上，雙雙贏得西班牙當權者的支持，其成名之作《多語本聖經》亦由國王負擔鑄印成本，甚至取得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銷售獨占權。另外，腓力二世依照天主教特利騰大公會議授權，下詔印行新版的彌撒聖書，亦假普朗坦之手實現。一五七二年初，已有數以萬計的禱書、經本、聖詠彙集、答唱詠，自安特衛普運抵腓力二世處；國王命令艾斯柯里爾（即聖羅倫佐修道院所在地）的修士，負責這些書在國土境內的經銷事宜。這個時候的普朗坦，手下有二十四座印刷機持續生產，也曾為前述書籍製作一整套特殊的陽文字範與陰文字模。他的鋪子聘用工匠一百餘人，且在許多歐洲城市，都有他的倉庫或銷售通路；如法蘭克福、巴黎、但澤、卑爾根、里昂、紐倫堡、威尼斯、馬德里、盧昂、里斯本、倫敦等，只是其中數例。來自安特衛普的資金奧援，以及西班牙國王的鼎力相挺，是普朗坦事業發展的主要推手；十九世紀之前，他創建的書籍量產業，始終是歐洲影響力最鉅者。

普朗坦是個極端的例子：他的印刷工場，以工廠般的生產線方式經營。實際上，如果把柯貝格、後來的艾齊維埃家族、荷蘭的布勒家族，以及巴黎皇家印書館、那不勒斯的皇家出版局、梵蒂岡等大型印刷機構，統統視為特例，則當時的常態，顯然還是工匠掛帥的傳統印刷鋪。十七世紀，有印刷機四台以上、工匠超過十人的印刷鋪，全巴黎找不到幾家。資助出版活動的有錢書商，偏好把工作外包，這樣不用事必躬親，還可保持營運上的彈性，不用一再地替固定那麼幾台

印刷機補充材料。另一方面，如果出版所需的資金甚多，有賴巨額投資人的介入，則我輩研究這種案例之時，尤須謹慎，不宜過度約化其實際的組織。其實當時有許多其他規模較小的書商，圍繞著大型出版機構而經營，靠銷售書籍、分擔出版來賺錢；此種型態的出版，經常與多個集團、商會內的出版大亨合作，並利用商會建立的廣大買賣網路，將自身的庫存書籍提供給較大同業經銷。一六二五到一六六〇年間，所有在巴黎發行的書籍中，多達十分之一，是由克拉馬希藉此方式，或獨力為之，或與人聯合，而流通於市；他也就這樣成為兩家出版商會的負責人，幾乎所有稍具名聲的書商，都加入他的陣容。這兩個機構，一家專事基督教教父著作的出版，另一家印行多種版本的彌撒聖祭。有許多地方上的書商，甚至外國書商，都委託他全權經營買賣事宜；他的商業網絡亦得以涵蓋全歐¹⁷⁶。

概括論之，資金欠缺的出版商，即以財力豐厚的同行為其金主。當時經常使用承兌票（十四世紀起，買方不克親自付款，故請中間人代墊的非正式委託書，由賣方收執，有別於今日具備法律效力之匯票、本票）來支付帳款，形成買方（發票人）、金主（墊款人）、賣方（收款人）的三角關係，助長了前述的事業模式。另一種常見的情況，是書商在為出版籌措現金之際，以租約的方式，向財力較佳的同業尋求貸款。十七世紀的狄耶里，便專門從事這一類的生意。

最後，探討出版業的資金來源，不能遺漏公家機關的金主角色。宗教儀式的相關書本，常由主教或各地教會出資贊助。中央與地方政府，為了印刷自身需要的文獻（大都是行政紀錄），撥款之事亦時有所聞。很多印刷商，尤其是小城鎮的業者，便是仰仗這一類的訂單餬口。除此之外，正因為政府會將特定的出版計畫，授予特定的出版商全權負責，故書商也常常糾合成出版集

團，或地方性、全國性的商會，以爭取事業獨占的機會。利用這種方式，國家也得以介入出版籌資活動。這不僅有系統地鼓勵了大型企業的設立，亦促使印刷商更加順從掌權者，成為政策的工具，踴躍檢舉「妖言惑眾」的書本。規模宏大的出版機構，藉著如此體制，也愈發雄霸書市¹⁷⁷。

第五章 圖書館的小世界

出版業很快就染上現代的色彩的原因，或多或少都有些偶然。套句二十世紀藝術史學者豪瑟的話，發展初期的印刷鋪，比較像是現代的小工廠，而非中世紀的修道院工作室¹⁷⁸。早在一四五五年，傅斯特與修埃佛的印刷事業，就已經具備標準化生產的傾向；此後二十年，歐洲更是到處都有大型印刷機構。當時的印刷速度與印刷機的產能，屢經改進，已頗為理想。過不了多久，排字工人也不再蹲坐著作業，改採立姿以提高生產力。正因為書籍的印製，必須講求數量多、成本低，印刷商唯有將生產過程合理分工。剛開始的時候，印刷師傅享有相當自由，「專業」也頗得尊重，然而過不了多久，他們就變成一般的勞工，得遵照規定在時限內完成工作，賺取薪水；此後的印刷產業，出現「活字工」這種新職業。雖然同樣是從事手工勞作，但他們卻因為識字並懂得一點拉丁文，遂能夠躋身「知識份子」之林，而且鎮日與書為伍，也認識不少作家；更重要的是，經常接觸新觀念。他們雅好推理，還以頻繁的反抗，爭取合理的工作條件。即便是十六世紀的活字工，也已經懂得發動有組織的罷工，儼然是現代的新勞工；據豪瑟指出，他們會撰寫宣言以表達訴求，其內容就連三百年後主張工會治國的工運人士，都無從反對起。無怪乎在十九世紀，社會主義的早期倡議者中，印刷匠為數也不少。

學徒也好、師傅也罷，本章的目的，在於研究當時的印刷工作者，其工作條件究竟如何，並

藉此探索：從事這種既勞力又勞心的行業，會讓勞動者用什麼樣的特殊角度看待事情？也就是說，我們除了要細審雇主與匠人之間的關係，還得追究：是什麼樣的物質與精神條件，形塑出兩造各自的價值觀？

一、印刷師傅

先來談談印刷師傅。在印刷匠「出師」之前，必須完成學徒的歷練；這些學徒可能十二歲就入行，也可能過了二十一歲才拜師，「入學」的平均年齡在十五到二十歲間。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舉凡尋常市民、藥劑商、地主管家、沙特萊要塞保安官、酒商、鎖匠、鞋匠、木匠、織布工家庭的子弟，都有可能成爲印刷學徒，父執輩從事印刷者更不在話下。許多人從各省來到巴黎學藝。他們必須能讀能寫，而且通常還得懂拉丁文，才夠資格投入印刷師傅的門下；有時甚至必須具備閱讀希臘文的能力。排字工匠不識字固然不行，操作印刷機的目的不識丁倒無所謂；更何況不識字的人比較聽話，通常還是有機會成爲學徒。

這些人的待遇，則在公證人的見證下形於文字，由師傅與學徒家長訂立契約，並由學徒畫押副署。師傅的義務除了傳授技藝，尚有提供食宿、添購衣物、核發零用金等。至於學徒，則宣誓聽命於師、忠心服侍，此外，更不得出走。

身爲學徒的印刷匠，起居皆有嚴格規範。他們被安置在印刷鋪的一角，替師傅跑腿；師傅對他們自不會好聲好氣。他們得在工匠大哥上工之前得先起床，把鋪子裡的器材準備好、整理桌

子，冬天還得生火，總之盡是做些卑微、折人自尊的活兒。在印刷之前調勻油墨、濡濕紙張，也歸他們做。正式上工之後，則多半操作印刷機；這件差事不太講究技巧，但卻相當累人。如果他們有志成為排字工，見習期滿之前還得排字，背後則有師傅監督。最讓他們開心的時刻，莫過於出公差，像是把校對人員訂正過的校樣拿回鋪子裡來。一天結束之際，其他工匠紛紛返家，他們卻必須留到最後，將所有東西歸定位，然後才能就寢。雪上加霜的是，印刷鋪的老闆，總是掛念著如何付最少工資、聘最多人手，故多半儘量增加學徒的數量，以減少師傅的人數；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徒難免遭到資深同儕蔑視。

完成「學業」的學徒，便獲得學歷證書，晉升師傅。此時的他們，依舊年輕、終於自由，而且未婚（見習期間不准娶妻），於是展開為期數年的遊歷、尋覓工作。德國與法蘭德斯的印刷匠，出師之初除了在國內各地漫遊，亦不怯於出國見世面，前往巴黎者尤多；但在法國，年輕工匠則以行走國內為主。他們走過一個又一個的城鎮，效力於當地的印刷商，有些地方只停留一個月，有些地方則工作一兩年，端視工作機會有無、與當地人情誼好壞而定。這般遊歷，磨練他們的技藝與經驗，學習各家印刷鋪子不同的作業方式，更讓他們與特定人士先行接觸，俾利爾後創業。他們有時會在途中娶妻（最好是某印刷鋪老闆的女兒），或是途經與自己契合的城鎮而定居、開設自己的印刷鋪¹⁷⁹。

不過，落腳異鄉者不算太多，多數師傅皆以老家做為旅途的終點，並受雇於當地的印刷鋪老闆，以資深工匠的姿態進駐工場。能力足夠的，則希望自己成為領班，監督其他的排字工；事實上，排字工與印刷機操作員的工作，就是由排字領班來分配、監督。他負責樣張的首校，故非懂

拉丁文不可，還要能辨讀許多不同的手寫字跡。至於薪水的發放、鋪內全盤狀況的維持，同樣屬於他的職掌。

位階在排字領班之下的，稱為能匠；他們是印刷鋪的主體，從事真正需要技術的工作，薪水則是按月支領而非每日領。地位再低一些的稱作零工，其中又分成排列活字、組裝待印版、安放紙頁的排字工，以及最基層的印刷機操作員（即實際負責打印的人）。排字工必須接受相當教育；相對地，操作印刷機只要知道怎麼做便行，講求的則是能吃苦、力氣大，畢竟成天扳動壓桿可是十足的粗活。這些匠人時常分成數組，每一組使用一台印刷機。十六到十八世紀，一組作業員多半為四到五人，其中兩人排字組版，兩人操作印刷機，另一人（學徒）負責跑腿。當然，完整的印書工作，尚須另聘校對人員來完成。他們通常是學生或受過教育的人，印刷師傅出身者較為少見；甚至連十六世紀的梅蘭希頓、雷納魯斯，以及十七世紀的杜佛斯內等知名作家，都可能投身此業。即便如此，當時的習慣，卻是由印刷鋪老闆或其家中成員，親自訂正校樣、不假外人；只有大型的印刷機構才例外。換言之，知名印刷商，如阿爾都斯、貝德、德柯萊、侯貝·埃蒂安納、韋特雷等人，皆負有校訂之責。

這樣的分工方式，在多數的印刷鋪裡，落實到何種程度？那些最大的印刷機構，像是巴黎的皇家印書館，以及柯貝格、富羅本、普朗坦、布勒所經營者，規模甚或大到十台印刷機、工匠五十人，且每一位匠人的任務皆有嚴格律定。這種情況，在那些工作量特別大、備極辛勞的印刷鋪亦然；埃蒂安納與韋特雷的工坊，雖然只有四台印刷機，但同樣仍屬此類。除此之外，印刷畢竟還是手工行業，大規模的分工作業並非常態。一五七〇年，日內瓦的二十家印刷鋪中，三家擁有

四台印刷機，五家擁有兩台，其餘十二家僅一台可用。到了十七世紀，巴黎與倫敦的大多數印刷鋪，依舊只擁有一到兩台印刷機¹⁸⁰。這些印刷鋪的經營者，無力聘雇龐大的印刷人力，在工作時有時無的情形下尤其如此。事實上，印刷鋪老闆親自上陣，帶著一兩位工人印書，如欲趕工則喚妻小一同下場幫忙，也是常有的事。遇上這種小編制，排字工就得自己扳動壓印桿了。

大型印刷鋪裡，工匠的日子也不好過，每日工時超過許多其他的行業。十六世紀末，日內瓦的印刷匠，每天固定得從早上五點到晚上七點，工作十二個鐘頭，當中只有兩小時休息時間供用餐¹⁸¹。在安特衛普的普朗坦摩雷特斯印刷工坊，匠人從早上五、六點間上工，中午到一點之間可以返家用餐，之後持續忙碌到晚上八點¹⁸²。十六世紀的里昂印刷匠，早上五點上工、晚上八點下班，中間只有一小時晚餐休息；爲了完成獲派的工作，有些印刷匠甚至經常凌晨兩點半就進工坊，熬到晚上九點才離開¹⁸³。一六五〇年的巴黎，這一行的工時爲早上五點起、晚上八點止¹⁸⁴。這不只是工時長而已，工作時還得以蠟燭照明；因爲印刷鋪大都位於狹窄巷弄的一樓，即便日正當中也幾無採光可言。

在這個時期裡，自始至終，印刷商皆以高產量要求匠人。對於排字工被賦予多大的工作量，現存的史料中沒有太多實質證據，而他們的負擔輕重，確實也隨著文本難易有別而變化（一五六三年，法蘭克福的印刷鋪經營者主張，排字工一天應完成一到三組待印版的排組，視所採字體與文字種類而定）。對於負責壓印的工人，我們所知倒是不少：十六世紀末，里昂工人每天必須打印的全開紙，多達二千三百五十張，巴黎則是兩千六百五十張。同時期的法蘭克福，在印刷鋪老闆的規定下，印刷機壓桿每天得動作三千零五十到三千三百七十三次，依印刷難度不同而有別。

蒙克雷斯帖的資料顯示，到十七世紀早期，荷蘭工人每天打印四千張，巴黎則為兩千五百張；十七世紀中葉，以紅黑兩色打印者，在巴黎先是訂為每天兩千五百張，而後又調增為兩千七百張。這些數字著實驚人。就算每天只印兩千五百張，在一天十四小時的工作裡，平均每小時也得印出一百七十八張，亦即每二十秒就得印完整張全開紙¹⁸⁵！

印刷匠面對這樣的工作負荷，工錢似乎沒比其他行業多。根據可靠史實，一五七二年的九月，皇室頒布詔令，規定巴黎的排字工，月薪應為十二里荷，日薪則為十二索；而當時的建築工每月也有十里荷可領。這還不是最糟的：一五三九年的里昂，印刷鋪老闆每天付給排字工六索又六德涅，只比其他不講求技術的純勞工高出一丁點；當時，法國印刷匠的待遇，竟然還是全歐最佳。在安特衛普，普朗坦聘用排字工的薪水，還不如修補屋頂的師傅。日內瓦有位波松，以鑄造活字為業，一五七〇年的每天薪資為八到十索，只比一般的砌磚工多出兩到四索¹⁸⁶。耐人尋味的是，排字工的工錢有時候還不如打印工人。一六五四年的巴黎，一般排字工每月可領二十四到二十七里荷，打印工人則有三十三里荷；排字工想要領到同樣多的工錢，得會排組希臘字母才成。在這些薪資之外，有時還有其他津貼：師傅不會放過任何要求老闆犒賞的機會，除了彼此均分作家打賞的小費，亦常常要求老闆提供食物與飲料。若說印刷匠人的薪水並不比那些低技術、低教育的工人多出太多，也不算言過其實。

印刷匠如同當時所有的勞工，未來是沒有保障的。夠本事的排字工，固然可能在大型印刷機構裡保有穩定的飯碗，萬一碰到非常時期，甚至只是生意清淡的時候，仍有事前未獲通知即遭解聘之虞；丟了工作，旋即三餐無繼。例如專門印製法令與布告的印刷匠，在法院休院的季節，就

形同失業。無怪乎印刷工作者以一窮二白者居多。他們普遍住在只有一間房的斗屋裡，除了幾件工作服與家具，再無其他私產可言。失業的時候，他們不得不透過各種權宜辦法圖個溫飽，並不令人詫異。有些人會把書的內容偷偷多印幾份，湊成一整本再私下叫賣；有些人則非法買賣禁書或短期流通的宣傳小冊，靠妻子居中仲介者亦所在多有。

縱令環境刻苦，印刷師傅仍以自己的事業和知識為傲，並形成了另一個社會階級。說得明確些，這群人擁有刀劍一般銳利的自尊，所以並非單純的技工。他們大都好爭辯、急性子，經常辱罵彼此，有時候還動粗。謾罵同事的工匠，通常以罰金薄懲：在普朗坦摩雷特斯印刷鋪的工作規約裡，甚至記載了每次侮辱他人所應繳納的罰金多寡¹⁰。另根據現存的公共檔案，巴黎的印刷匠會協議，遭人謾罵者可以要求賠償，金額則依共識律定，收了錢就無權再抗議。

這群人難以管理，卻珍惜僅有的自由；他們火氣大，是因為印刷鋪嚴厲的內規使然，畢竟印刷作業是團隊作業，一人缺席便足以危害所有人的工作。不准他們外出用餐，或是不替他們想何時較方便用餐，是他們不斷抗議的原因。另外，這些人食量驚人又貪杯中物，經常差學徒出去打點酒菜；在這種情況下，要他們守規矩實在不容易。大致說來，他們似乎認定自己已有權在想工作的時候工作、想休息的時候休息。隔天若有宗教慶典，他們傾向提早下班，次日再回來把工作做完；一旦老闆質問他們早退的原因，得到的恐怕也是不堪入耳的回答。

在鋪子內朝夕相處，又慣於團隊工作、分擔困難、共同用餐的結果，讓從事這一行的人團結異常。有時他們會與共事者組成印刷工會，大鋪子的員工，例如普朗坦麾下的師傅，即是如此，但全鎮所有同行合組一會的情形更為常見。不論是哪裡的印刷工會，都會爲了捍衛權益而遴選委

員數人，並設置幹部、專款，訂立會費表，還以罰金制度對付行為失當或工作表現不佳者。一旦會費累積起來了，他們甚至自辦彌撒、自籌宴會、照顧病弱同儕或有生計困難的寡婦。印刷鋪老闆當然不樂見這種工會成立，認定這會助長對工作的怨懟，有圖謀罷工之嫌。普朗坦摩雷特斯比較寬容，不僅准許這種型態的工會，還願意小額資助，並承認印刷工會會長有權代表眾工匠。但是，絕大多數的印刷鋪老闆，反對這種組織井然、成員橫跨多家印刷店的勞工結社，設法說服當局取締之，當局確實也一再地禁止工會設立。工會經常採取的對策，則是公開宣告解散，但立即祕密重組，繼續抗爭。

一五三九至一五四二年間，里昂與巴黎的印刷匠，先後群起抗爭，幾乎令所有的印刷機為之停頓；我們對這段史實的了解，得歸功於豪瑟的研究¹⁸⁸。那時的印刷商，一心降低生產成本、逼迫工人增產，從員工的飲食裡扣錢，還廣招學徒以獲取廉價勞力。工匠們眼見薪資的實際價值日益下滑，生活開銷卻愈發昂貴，迫於情勢發動罷工。里昂的市府、巴黎的議會，先後出面干預，最後還得勞駕國王來重建秩序。一五七一、七二年，勞資衝突再起，雇主不得不出諸多讓步；最值得一書者，在於具結保證招募學徒不得多過兩人。一五七二年九月十日，皇室公開承認這項宣誓的效力，並於一五七三年四月十七日頒布法令。

十六世紀的里昂與巴黎，乃是法國的印書重鎮，從事製書業的勞工超過二千人，彼此的距離還非常靠近；這就使得這兩座大城最有條件成為工匠抗爭的戰場。話雖如此，前述的法國工運可不是單獨的個案；歐洲的每一個角落，在十六世紀下半皆面臨物價飛漲與其他經濟危機，工坊老

鬧與工匠之間的衝突時有所聞。光是一五六九到一五七三年間，普朗坦手下的印刷匠就罷工了三次¹⁸⁹。身為法蘭克福的大出版家，若翰·勞爾曾在一五九七年，命令印刷匠自行至井邊汲水，引發匠人罷工，抗議主子叫他們做「分外之事」，最後對簿公堂。法院則是「兩邊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駁回了勞爾訴請的損害賠償八十金幣，另一方面也不准工匠要求勞爾補發罷工期間的工資¹⁹⁰。在那個年代裡，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公權力，都被迫介入勞資糾紛中，好讓兩方的共同利益得到更完備的規範。

日內瓦的印刷鋪經營者，大都是從法國逃出來的胡格諾教徒；他們最不樂見的，莫過於在里昂的競爭對手式微、有機可趁之際，竟有勞資衝突妨害本國印刷業的成長。故在一五六〇年，日內瓦市議會通過相關法規，以平等為精神；這點恰與法國在同時期內頒行的嚴厲諭令相反。根據法規，雇主不能聘用兩名或更多的學徒，而勞資雙方也不能在沒有正當理由、事前沒有通知的情況下，片面地中止契約關係。一旦工作弄砸了，或是必須裁員，兩造各負有哪些義務，法條中亦仔細地詳述。這份協議的內容，展現一種中庸、人本的價值，確保了印刷商的權益，同時維護著工匠與學徒。即便如此，當局還是沒有能力化解所有的衝突。一如法國，這裡的印刷匠也喜歡在周日與宗教節日之外，「另擇吉日」休假。後來有部分的印刷鋪，允許員工於周三休假，使得當天必須上工的匠人深感不平，並於一五六一年爆發抗爭。在抗爭的過程中，一些師傅甚至利用機會攻擊老闆，直到問題交付官方仲裁為止；最終的結果，則是匠人爭取到隔周的周三例休¹⁹¹。一五六三年的四月二十二日，法蘭克福的印刷鋪老闆向市議會訴願，希望排字工、印刷匠的每日工作量能以明文約束，並制定官方版本的公定假日。於是耶誕節、新年、懺悔節、基督升天日，分

別給假一天，此外還比照日內瓦的印刷匠，享有一天額外的隔周假日。經過這次請願，印刷業便從一五七三年起擁有第一套專屬的法規，此後更定期修訂、增補。

印刷師傅的騷亂，不只發生在十六世紀。在十七、十八世紀，已有許多公司法令公告施行，雇主還得到政府的其他支持；但法國的印刷師傅持續爭取權益，為達成目標而糾合，其訴求倒是大同小異。在生計成本上揚時，他們便要求加薪。他們還要求每日工時縮短，法定工作量一併調降。由於十七世紀的印刷市場供過於求，常有外地遠道而來的失業印刷匠，為了找到工作，不惜接受低薪；本地工匠為保衛飯碗，煞費苦心地防堵這些人進城，甚至到十八世紀還是如此。一七〇二年，巴黎印刷匠要求，來自法蘭德斯與德國的同行，至多只能在當地逗留三個月——他們認為，三個月夠這些人觀光的了。他們害怕失業，故對大型印刷機構的老闆設法增聘學徒，同樣抵死不從。他們主張，只有熟悉拉丁文，並至少能讀希臘文的人，才有資格當學徒，而且老闆麾下學徒數量應由法規明定上限¹⁹²。另一方面，印刷商基於成本考量，更加積極地尋覓低技術性的勞動力投入打印工作，藉此動搖印刷師傅的地位；於是，在師傅的抱怨與反對聲中，「小廝」逐漸出現，形成新的勞工階級，還在十八世紀成為法規認可的職別。縱使如此，印刷匠在與雇主的鬥爭中，仍有若干勝利。雇主屈於壓力，於十八世紀同意，要解聘工匠，必須在一個月前先行通知。只是，從今天的標準來看，印刷從業人員的處境，依舊艱苦難忍，充其量只是比當時的其他行業好一點。一六六六年，柯爾貝爾下令限制法國各城鎮的印刷機數量，上述景況更是雪上加霜；從那之後，工匠幾乎沒有機會開設印刷鋪、自己做老闆，除非自甘迎娶已故印刷鋪老闆的遺孀。

二、老闊

看過印刷師傅的處境之後，接下來探討的是他們的老闊，包括出版商與書商。由於當時的出版商絕大多數身兼書商，兩者似以合併討論為宜。誠然，許多書商沒有自己的印刷鋪，那些規模小、久久才出一本書的，尤其如此；但經營書店的印刷商，為數卻不少，而且他們還將印書的利潤投入出版事業，或獨立發行，或找人合夥。貝德便是如此。若說克拉馬希與季翁塔家族的成員，挾帶龐大資金稱霸出版業，是書商不從事印刷的例證，那麼，像柯貝格或普朗坦這樣，出資發行書籍，並將一部分或甚至更多的書本交付自己經營的工場來印刷，就屬於另外一種類型了。

這些當老闊的人從事的專業活動為何，是本節首先探究的課題，首先從擁有印刷鋪的老闊開始談起。在典型的情況下，較小的印刷商僅擁有一到兩台印刷機；十五到十八世紀間，歐洲各地多的是這樣的業主。這類商人泰半以零星的工作維生，印刷成品包括城鎮民眾所需的各種公告、招貼、提案書，以及鄰近學院所需的字母書、課表等。有時書商會把容易製作的小冊書本，交給他們來印；這些小書的讀者群，對書並不挑剔。

十六、十七世紀裡，這種小鋪子的老闊，早年多半是印刷師傅，而後創業、自行接單；他們沒有雇員，鋪裡的幫手就是兒子，甚至妻女。如有必要趕工，他們才聘請臨時雇員；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也會長期雇用一位工匠，不僅倚重對方，還讓他與自己的家人同吃同住。

印刷商的技術如果夠精熟，手上還有一套好活字，便有機會贏得某位出版商的青睞，定期接

獲印書訂單。此時他可能需要擴編印刷鋪的人力。一如前述，要讓一部印刷機發揮最大產能，需要五個人的分工合作；而在那個年代，麾下有如此規模的人手，就已經堪稱是舉足輕重的印刷商了。十七、十八世紀，絕大多數的書籍，都是出自這類印刷機構的手筆：十來個師傅、學徒，共同操作兩到三台印刷機。

唯有勤奮、洞燭機先，並徹底了解出版業的人，才有辦法管理這般事業。萬一出版商對印好的成書不滿意，印刷商恐怕再也拿不到對方的訂單，並因此生意清淡。大致說來，印刷的計酬取決於印出多少張全開紙，至於印刷商壓低成本的方法，便是要求工匠增產。他必須以身作則：早起（甚至搶在師傅之前進印刷鋪）、監督手下的工作、協助並指導他們解決難題、確保內文精確無誤（這點最是重要）。一般情況下，印刷商得親自從事校樣訂正，而這件差事，只有他的家中成員，有資格從旁協助。光有一等一的印刷技術還不夠，紮實的拉丁文根基亦不可或缺。他們多半繼承父親衣鉢，年幼學文，直到十五、六歲轉往父親或友人的印刷鋪幫忙，以便吸收打印、組版的各種相關知識。

要持續贏得出版商的訂單，又要尋覓新的工作機會好讓印刷機不閒置，印刷商自然必須平均分配工作、嚴密監督工匠的產量，並永遠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在不容耽誤的時限之前完成校樣訂正的苦差事，印刷工作才不致中斷。身為印刷鋪老闆，絕對不會閒閒沒事做；那些兼任書商、把店面開在印書鋪附近的人，其忙碌程度更是不在話下。要是獲利足夠，籌資又不成問題，他便親自出版書籍（有時他會與其他書商合夥，降低出版成本的負擔，兩者共享利潤、共承風險，並各自負責一部分書籍的經銷）。透過這種方式，印刷鋪老闆也有機會一躍成為重要的出版商。

書商經營的事業，跟出版商的一樣複雜。多數例子裡，這種人或多或少地扮演出版商的角色，並投資印書工作。哪些文本需要修編由他決定，與作者的協商由他出面（如果出版的是一本新書），印刷用的紙張由他採購（在當年這可不是印刷商的責任），印刷商的遴選與作業的監督更是非他不可。更重要的是，他所出版的書，得由他自己擘畫經銷事宜，並確保客戶想要的書籍在自己的書店裡庫存充足。基於此，他必須不論遠近，在各地都有門路、運用複雜的會計系統了解他人寄賣書籍的市況如何、遵照已知的顧客喜好而陳售不同的書。他還要有寫再多信也不厭倦的功力。有些時候，光是一天裡就有十來封信等著他去寫，偏偏能幫他的人又很少；再大的出版事業，文書人員亦不過兩三個。至於這些文書人員，除了辦理書籍配銷各地的託運，還要檢查書店裡的進貨是否無誤；別忘了，甫印成的書，在當時都是不加裝訂、整疊網綁後逕行出貨的，檢查起來自然棘手。

通常，光憑商業書信不足以將複雜的生意給談成，到外地洽公仍是必要的。較大的出版社，經營者或可委託助手、親戚出馬，再不成也可聘請捐客代勞。在那個家族事業隨處可見的年代裡，業主常把談生意的工作交給未來的繼承人去辦，一如自己年輕時足跡踏遍各地。繼承人可以親兒子、年幼的弟弟或甥姪晚輩；他們的任務，便是在書商群聚的大市集，或客戶的面前，代表家中長者。是以這些小開經常爲了生意往返全歐。

羅倫·阿尼松從事出版，在十七世紀的里昂獨領風騷。以下這封信，是他在一六七〇年，寫給某個兒子的家書，除了諄諄教誨，也提醒他在洽公途經德國、法蘭德斯之際，身爲賣書的商人，有哪些事情該做¹⁹³。全文如下：

我親愛的兒：

若不是收到你從阿姆斯特丹寄來的信，我還以為你在法蘭克福到安特衛普這段，中途沒有停下來。路過科隆之時，你沒有拜訪任何人，可惜了這座城鎮；比起你這趟經過的其他地方，那裡供人交易或採購的書本可要充裕得多。阿姆斯特丹的那封信，你輕描淡寫，說什麼接下一份十五天裡做不完的工作，卻不告知工作是什麼。在瓦茲堡與其他的阿姆斯特丹書商那邊，結果如何你也不講，更別說你後來造訪的地方。十七日，你從安特衛普寫來的信，亂七八糟，哪裡像從教堂出來之後寫的，簡直是酒後胡謔。信裡講的沒一件正事；唯一的例外，是你抱怨巴塞爾的庫尼格先生，沒有履行你與他兒子協議的以物易物。當初若由兩方共擬草約，他就沒法食言了。至於祁能先生，用法律威脅他是一回事，好言相勸讓他首肯又是另一回事，兩者可是天差地遠。

默修斯先生那邊，你說他手上的柯內盧已經缺貨，叫他再調一些，還說什麼柯內盧的權利非得讓他分一杯羹，才能用幾本波那西納跟他換書，而這正是你的打算。我壓根聽不懂你在講什麼。帕拉維西尼的四開本《議會史》不能接：這種書不適合我們來賣。很早之前我們就知道，法蘭德斯與荷蘭的印刷商，索價過高，對我們不利，這是因為他們老惦著我們以前的價錢；不接受調價的人，後果自行負責。根據你的說法，你對哈奇亞還以顏色，是在你離開之後；誰教你這麼做的呢？你應該當場問他，給我們的東西是誰託運，法國這邊的收件人又是誰，聽他的說詞。至於我們寄給他的那一批，應當包括單價二十二塊一毛的《卡利庇諾詞典》三本，以及一本五十塊的伽桑迪作品。這些都是奇貨可居，我們開價自然比以前

貴，除非能用一冊書換得另一本值錢貨；這你可得學起來。給他的這批書不包括卡斯提羅；我指的是哈奇亞。

帕定先生的事情，實則無關宏旨；至於斯波曼努的問題我會再查。關於詞典類書籍，你不妨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訴佩本柏，就說迄今已有許多更重要的增補內容問世，我正遣人一種抄下來寄給我。倒是你的來信，頭不連中、中不連尾；你究竟要我看些什麼意思？

你寄自法蘭克福的，我統統收到了。東西都完好，只有一件包裹例外。我們欠缺的，其實是容易取得的一般書籍；這種書對我們的生意最有幫助。你寄來五十本的《解憂集》第二卷（十二開本），但其實十二本已經足夠；至於四開本的曼儒斯《聖詠集》注記，只需三到四本，你卻寄了十二本。到頭來你還是得明白，這樣一趟旅行，所費不貲，一定要善加利用，不可像你這般走馬看花；你若是念及自己途經的城鎮裡，有這麼多書商可以接頭，想必不會如此。相信我，該改的還是要改。保重。

永遠愛你的父親

一六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里昂

這封信相當典型，也讓我們清楚知道，書商在洽公旅行當中，有哪些事情非辦不可，以及他們遊走於歐洲各地、親自敲定生意的必要性。這樣的旅行，是大型出版商的基本業務。信中這位羅倫·阿尼松的兒子，除了造訪巴塞爾、科隆、法蘭克福、安特衛普，還去過西班牙、義大利¹⁹⁴。

共處一鎮的書商與印刷商，彼此密切聯繫，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了。他們互相會面，討論生意、交換新訊息、扶助不順遂的同業，並在宗教節日裡一同祈禱、慶祝；尤其是他們的主保聖人，聖若望宗徒（福音作者聖約翰）的節日。印刷術發明之前，彩飾師傅、裝訂工與書商，業已組織行會；而基於同樣的理由，後來的印刷商、書商與出版商，也加入此一陣容。成立於一四〇一年的聖若望宗徒行會，在巴黎尤其活躍，直到十八世紀末。印刷商與書商，每年有兩次大典，除了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聖若望宗徒節，尚有五月六日的聖若望殉教節；這兩天的彌撒與其他隆重儀式結束後，多半還有宴會。至於每周日的行會彌撒，不在話下。行會成員的會費與募得款項，除了支應種種開銷外，更設立行善基金¹⁹⁵。

原則上，同一行業的所有從業人員，包括印刷鋪老闆、師傅與學徒，理應團結於同一行會之下。然而實際上，加入行會的只有老闆；師傅寧可另組聯誼會，並發展成抵抗中心、與資方對立，一如前述。說穿了，十六世紀下半與十七世紀，歐洲各地相繼設立的書商、印刷商協會，泰半是爲了打壓印刷匠的抗爭。在那之前，與書籍生意相關的行業，倒是頗爲自由。長期以來，他們只順從大學的規範（此係承襲手抄本時代的傳統）；開業城鎮附近若無大學，就更無約束可言。約莫到十六世紀中葉，歐洲社會一片均富局面，自由的情況依舊。而後經濟陷入困頓，引發印刷師傅的罷工與抗爭（前面已經強調過其規模），相關訴訟隨之激增，迫使政府開始插手，業界也衍生出複雜的行規，印刷商旋即群起結社，並授權部分成員代表自己出庭。很快地，工作機會的匱乏，迫使他們聯合起來，禁止新人投入這個行業；而失業導致的盜印書橫行，也驅使他們定期聚會，試圖解決業界困境。想當然耳，如此發展對當權者來說很是受用；生意難做，業者便

會組織各種團體，使得政治上的管理更易遂行，政府對出版業的監控遂日益強大，還能藉此防堵「妖言惑眾」的書本問世。

如此一來，一五四八年的威尼斯、一五五七年的倫敦、一五七〇年的巴黎，以及同時期所有的歐洲大城市（可能只有荷蘭例外），出版同業公會紛紛獲得特許權利，領導者也被授予公會會長、理事長等頭銜，得以執行日趨嚴格的行規。印刷鋪老闆、書商（偶爾還包括裝訂商）定期集會，為規範執業行為而協商。若有雜貨商撈過界、做起書本零售生意，公會馬上採取行動。若有人膽敢私售禁書，政府立刻就會要求會長公布違紀者身分。就連某鎮的書商發現自己印製的書本被外地同業盜印，公會亦會幫忙出頭。要是有特定書商獲得過多的特權呢？同業的陳情或申訴，可在公會的會議上進行。此外，同個城鎮的書商，同意單一著作不得由兩家以上業者印製不同版本，而攜手抗告侵害一己權益的外地書商，也是透過公會會議而定案。

圖書圈的小世界裡，同業競爭無疑是激烈的；在大城市開業的，還有派系之別。偶爾，印刷商甚至會沉瀆一氣，合力對抗與自己隸屬同一組織的書商。野心勃勃、總是想著宰制公會的大型出版商，也會遭遇較小印刷商、書商的聯合拒斥。單一組織內，或有書商針對特定議題結黨；這多半是衝著他們眼中坐享過多特權的其他組織成員而來。遴選出版同業公會議庭的成員，尤其容易造成反目；某些國家，如法國，甚至干涉選舉，力挺富商出線，只因爲官方認爲他們比較守法守分。仲裁糾紛、避免組織分裂，權充調人、維繫政商和諧，是出版同業公會會長的職責；這不僅需要圓融的手腕，亦取決於會長與官員私交的好壞。若問題涉及敏感的圖書檢查，則會長的角色便更是關鍵。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書商、印刷商的社會地位，便高低有別，差異甚大。無庸置疑地，這個行業的本質，賦予他們若干聲望，尤其是十六世紀。他們若開業於大學城，即成為大學不可或缺或缺的「附設單位」，在身分晉升的過程中、儀式慶典的場合裡，享有僅次於教授與學生的高位。縱有榮銜如斯，他們和鎮上其他的中產階級，幾無差別。他們的兒女多與財力相當的商人子弟成婚；最有錢的書商，常與金匠聯姻，地位稍遜者則跟雜貨商、製燭匠、酒商結親家。在巴黎，出版古希臘羅馬經典的宮廷書商，其姻親常是鄰宅的店東、食品商或亞麻布販。此間的討價還價至為重要，關鍵在於嫁妝、聘禮的多寡，以及聯姻雙方的財力是否門當戶對。

有時候，事業極大、財力傲人的書商，足以躋身市民的最高階級。在巴黎、里昂，許多這樣的富商甚至成為地方的父母官。可以想見，書商一旦賺了錢，都會期待有朝一日謀得一官半職，好讓子女的社會階級更上層樓；這意味下一代不再需要鬻書維生，至少在法國是如此。其他地方的情況則又未必；例如摩雷特斯家族，晉爵之後依然經營印刷。在義大利與低地諸國，也有發跡的書商轉戰金融業；來自里昂的于圭坦家族避居荷蘭後，有人獲封為巴拉丁公爵（掌管宮廷庶務或君主法庭的貴族），有人變身為銀行家¹⁹⁶。這些當然是特例。歐洲各地更常見的情況，還是委身出版業之後，代代相傳。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德國爾恩家族先在里昂入行，而後轉往日內瓦，最後又回到里昂¹⁹⁷。巴爾布家族的情況類似：從十六到十九世紀，在里昂、利摩日、巴黎等地，一代一代承襲祖業¹⁹⁸。十七、十八世紀的德斯波底家族亦不例外，先後在法國的索米爾與荷蘭，薪火相傳。這種橫跨數世紀的商賈世家，在出版業裡形成一個封閉的小天地，以他們獨有的觀點經商處世。

三、從人文主義印刷商到啓蒙時期書商

印刷商、書商，賣書營生，置身書海，又成天接觸文士、知識份子、神學家、讀書人與涵養較佳的群眾（即所有能讀能寫之人），自然對知識懷抱興趣，一如他們熱中於買賣；但求以更賺錢的方式經營事業，此外無他。

有些時候，作家也會變成印刷商，監印自己的作品，避免漏誤、確保成品美觀，甚至指導書籍經銷，直接影響閱讀大眾；這可是眾多知識份子共同的癡心妄想，古今皆然。尤其在智識陷入危機、道德興起論戰之時，異議文本大行其道，更有許多文人恨不得自己就是出版商。就知識份子而言，此種意圖主導輿論的行爲，在十六世紀初影響力最強；在這個獨尊古文學研究的時期裡，印刷的主要任務，在於傳播純正的古代經典。當時有許多學者、作家，替出版商校對典籍，或改行印書、販書。他們是行動派的人文主義者，處於生活水平相對優渥的時代，在識才的出版商或金主奧援下，成功地以書本復興了人文思維，風行而草偃。以下介紹的便是這群人。

阿默巴赫¹⁹⁹，屬於最早期的人文主義印刷商。他出生於一四三四年前後（約莫是古騰堡在史特拉斯堡著手實驗之時）的魯特林根，起初遊學巴黎，師事同爲日耳曼人的海恩林；索邦校區裡，法國史上第一部印刷機，便與他的這位恩師關係密切。海恩林並對他傳授司各托的思想。他在稍後成爲文學碩士，效力於紐倫堡的大出版家柯貝格；此時，這位年輕的知識份子發現，經典文本的真知灼見，可以透過印刷，正確無誤地傳布、倡導。大約在一四七五年，可能是在柯貝格的幫忙之下，阿默巴赫於巴塞爾開業，專門出版當時所能蒐羅到最完好的基督教教父作品，並終

其一生堅守此志。他先在一四九二年出版了聖安博的著作，一五〇六年出版聖奧古斯丁，而後又與伊拉斯謨斯合作，專門出版聖哲羅姆。同期的德國大哲，也爲他整理各式手抄本：諸如學界俊彥雷納魯斯，與羅伊希林等。前者爲了替他校稿而取消義大利之行，後者爲了與他共事而在一五一〇年搬進他家裡。在當時的印刷商與人文主義者中，阿默巴赫的地位有多不凡？看看歐洲各地人士寄給他的信，就能窺見一二。這些信件來自科隆、巴黎、迪戎、史特拉斯堡、多勒、紐倫堡、施派爾、倫敦、法蘭克福、弗萊堡、伯恩、色列斯達、圖賓根、海德堡等地。與他通信的印刷同業，有些長期印書，有些則偶一爲之；他們包括柯貝格，史特拉斯堡的路許，於一四八八至一四九二年間歷居貝桑松、多勒、迪戎的流浪印刷匠皮耶·梅特林傑，康斯坦茨的胡魯斯（一四七五、一四八〇年，此君分別在巴塞隆納與薩拉哥薩去函阿默巴赫）、海恩林、亞當·佩特里的姪子若翰·曼特林的外孫尚·修特等。另有信件來自神學家與人文主義者，聲名卓著的包括了十六世紀的戴塔普勒、羅伊希林、杜勒；籍籍無名的也有溫斐林、布蘭德、法學專家察瑟斯、地理學家特里泰姆與其他。

阿默巴赫不僅對工作執著，孜孜不倦地發行書籍，也是名副其實的一家之主。他把布魯諾、巴席爾兩個兒子送往巴黎的利雪學院就讀，並定期寫信給他們，揭示多不勝數的爲人處世之道。在這些家書裡，當時經院學者間的唇槍舌戰，以及巴塞爾市民在巴黎的起居、活動，躍然紙上。身爲父親，他不斷警告兩個兒子，巴黎是個危險的地方。他忠於自己所受的教育，在古今思潮的論戰上，站在希臘羅馬思想那一方，是以要求兩人遵從司各托（而非奧坎）的教誨。在經商、獻身出版之外，他仍然關心其他更加切身的問題，敦促兩個兒子避開壞朋友、每天記帳、不得奢侈

浪費，其家訓的主旨是：「人求生存才吃喝，莫貪酒食而苟活。」自始至終，阿默巴赫不會忘卻事業的傳承與諸教父的遺訓，在兩子學成回鄉後領他們投入聖哲羅姆鉅著的出版，並聘請知名的道明會修士（或稱多米尼克會士），即來自紐倫堡的庫恩，擔任家庭導師。他的助手還包括他最聰慧的公子波尼法·阿默巴赫；此君後來替富羅本（阿默巴赫事業繼承者）校稿，並擔任伊拉斯謨斯的出版商，甚至受託處理伊氏身後之事。

阿默巴赫的目標，在將諸教父的著作，正確無誤地印行。同為人文主義出版商的義大利人阿爾都斯，則以發行正確版本的新編希臘羅馬經典為職志，意圖爭取更廣大的讀者。阿爾都斯²⁰⁰同樣受過高等教育，甚至當過教授；此君轉行投入印刷業的動機，非常值得在此一提。他出生於瑟摩內他，鄰近教皇國的章萊特里區，時間大約在一四四九到一四五四年間。阿爾都斯早年的老師，盡屬傳統派。換句話說，維伊度那套駢韻不絕的拉丁文法，他了然於胸；如此經歷，激勵他撰寫一部條理分明的文法手冊，並自力出版。而後他負笈羅馬，在維洛納的賈斯柏以及卡德利諾兩位名師門下完成拉丁文教育，其後又前往費拉拿，在希臘學大家瓜里尼門下修習希臘文。學成後，阿爾都斯執起教鞭，並傳授文采較佳的希臘羅馬文人作品，其門生包括佛羅倫斯的銀行家史特羅齊，與親王之子皮科等；由於坊間古書良莠不齊，此時的他，想必感慨於合宜教材的匱乏。在威尼斯與費拉拿公爵德埃斯特爆發戰爭之際，阿爾都斯避居於他的門生皮科家中，此時皮科正著手撰寫其代表作；他則滯留米蘭多拉，接受對方長達兩年的慷慨款待。在這段時間裡，他與來自克里特島的學者阿德拉麥鐵諾交好，和波利奇亞諾通信，且兼任皮科兩位姪子，里歐納多與亞伯多·皮歐的家教；他使用希臘文教學的比重，與使用拉丁文一樣多。自從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

堡陷落，許多希臘學者流亡義大利；阿爾都斯見狀，便起了創立印刷社的念頭，打算請皮科出資，專事希臘文出版。他選擇在威尼斯開業，係因當地有許多的流亡學者落腳，印刷商、書商更是眾多，此外與各地的交流聯絡也很方便。他起用的校對者、排字工，可能就是克里特島難民中，曾經擔任抄謄工作者。如願創業後，他旋即出版一本附有拉丁譯文的穆賽厄斯詩集、一部《聖詠集》，並在《高盧人較勁》的前言裡插敘他宏大的出版計畫。一四九四年，他為拉斯卡里斯的希臘文法書出版拉丁譯本，並於接下來的兩年裡發行由加薩主筆的亞里斯多德《哲學工具》、文法學家注釋的希臘文文法書，與數篇忒奧克里托斯的田園詩。他出版的第一本拉丁文著作，在這個時候才問世，即本博的《埃特納記》；此後，每年皆印行數本令人讚賞的拉丁或希臘經典，後者尤是一絕。其中最為不朽的出版品，當推一系列的亞里斯多德文集。他委人刻鑄一套極盡優雅能事的希臘字母，就是為了這部文集；基於同樣的目的，他還結交義大利，乃至於歐洲各地，尤其是專攻希臘文化的頂尖學者。憑藉這種努力，卡爾皮兩位小王儲（即前述皮科的兩位姪兒）的專屬私塾，遂發展成史家所謂的阿爾都斯學院。各路博學之士，每天按時在他家聚會，商議哪個文本值得出版、哪冊抄本可以採信。與會者不乏威尼斯議員、志在高升的年輕教士、教授、醫師、希臘學者。舉凡詩人本博、卡爾皮王儲亞伯多·皮歐、柏查尼、名教授伊格那佐、薩貝利科、後來的樞機主教阿林卓、葛哥羅普魯、稍後官拜莫內巴西亞總主教的克里特人穆蘇羅、伊拉斯謨斯，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成了他的座上賓客。很快地，阿爾都斯的出版清單也隨之擴展。葛利佛受他之託，在一五〇一年刻鑄一套全新字體，即所謂的斜體字；他以這套活字印製自己在出版事業的代表作：八開隨身版叢書，藉此推廣拉丁文經典與義大利文詩集，其中包括維吉爾、賀

拉斯、佩脫拉克、但丁、奧維德、尤維納利斯、佩爾西烏斯、斯塔提烏斯、本博等人的作品，以及伊拉斯謨斯的《箴言》跟薄伽丘的《十日談》。另外，在一五一五年辭世前，他還替許多古書發行了史上最原始的印刷版本，光是古希臘作品的部分，就包括了亞里斯多德、亞里斯多芬、修斯提底斯、索福克勒斯、希羅多德、色諾芬、狄摩西尼、埃斯基涅斯，以及柏拉圖等人的著作。

貝德²⁰¹也是人文主義印刷商中，鶴立雞群的一位。他是法蘭德斯人，早年於根特一處居常修士會的修道院中求學，而後轉往魯汶完成基本學業。他曾遠赴義大利，在多位名師指點下學習希臘文，並於費拉拿拜瓜里尼為師。此後他還在曼圖亞（一說仍在費拉拿）投入老貝羅阿都門下；這位先生的作品，日後印製出書，在歐洲各地大為風行，可說是當時鑽研古希臘羅馬經典的第一把交椅。從事印刷之前，貝德已有學者之名，在義大利學成後，先後於瓦倫西亞、里昂執教。他重新編輯了老貝羅阿都的《演說集》，好讓自己的學生能像親聆貝氏講學一般，深入認識古代大哲。此一版本問世於一四九二年的里昂，是參酌一年前在波隆納發行的舊版而成書。之後，他又推出《德萃集》與泰倫斯的作品；前者是嚴選古今文人傑作的精華錄，並與後者同樣加上評注。印刷術龐大的影響力，貝德很早就有領會。他所編選的作品，皆交付里昂的大出版家特雷瑟爾發行，兩人因頻繁接觸，愈發相知相惜。特雷瑟爾並委託貝德在自己的出版社擔任要職，除了手抄本的修正、校樣的審訂，還常得撰寫題贈書函；由於他身兼教職重擔，亦令其無暇繼續個人的著述。不過，對這樣一位獻身學術的人文主義者來說，能以一己之理念，引領全里昂最重要的出版社，就值得他用全心去投入了。貝德立足於里昂人文主義社群的核心位置，並以一封封的題贈書

函在文壇闖出名號。當時他年紀尚輕，卻連特里泰姆都引用過他的文字，儼然是教會事務的名作家。他於一四九七年前往巴黎，謄錄一冊穆斯林醫學家阿維森納的手抄本，因此結識了瑪內夫等嚮往新思潮的巴黎學者與印刷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特雷瑟爾過世了；貝德雖然迎娶特雷瑟爾的女兒，卻還是失去了工作，原因似乎是與舊東家的繼承人不合。此後他遂效力於里昂其他的印刷商，而後更前往巴黎，這可能是應嘉圭因之邀。他在那裡遇見尚·佩堤；這位舉足輕重的印刷商聘雇了他。在此同時，他繼續遂行自己的出版計畫。若說當時有什麼人獨具投資慧眼，自非尚·佩堤莫屬；此君資助貝德設立印刷鋪的經過，前面已經提過²⁰²。當上印刷商後，貝德除了替佩堤印書，也與佩堤合作出版，或自行出版。不多時，他的住所成爲巴黎人文主義者與遊方學者的聚會所。被他呼之爲「多聞者」或「得力助手」的友人，包括戴塔普勒、比岱、達內斯、圖桑、瓦達博勒、德伯坎、人稱「波那斯柏」的杜樸伊、雷納魯斯、弗朗索瓦·杜布瓦等人。其與伊拉斯謨斯的私交，亦不在話下；他甚至跟阿爾都斯一樣，終因理念與伊氏鬧翻。這批多如天上繁星的學者，令他的工作容易許多，他們不但會把最值得出版的手抄典籍通報給他，有時還在旅行途中替他抄謄書本。處於如此的學術環境中，貝德的個人志業得以繼續。他專注於打響印刷鋪在文藝界的名聲，印製成品主要爲希臘羅馬作家的著作；其所推出的許多版本都添上注釋，且每個新版本都比舊版更進步。一五三五年，貝德與世長辭，身後留下欣欣向榮的事業，由女婿侯貝·埃蒂安納克紹箕裘。

人文主義者的印刷事業王朝，早年便是這樣建立的。其中較爲著名的家族，除了威尼斯的阿爾都斯家族、巴黎的莫雷爾家族和瓦斯科桑家族，尚有由埃蒂安納家族、德柯萊與貝德協力打造

者。值得一提的是，後者的經營者全是維阿特的子嗣，或與她有姻親關係。她結婚三次，先是下嫁達米安·希曼，而後嫁給亨利·埃蒂安納一世，最後又嫁給德柯萊。她與希曼育有數女，其中一人嫁給梭蒂耶，兩人的後裔直到十七世紀仍以販書為業。她和亨利·埃蒂安納生了三子一女，三個兒子都從事印刷，其中包括知名的查理·埃蒂安納；查理除了同時精通醫術與繪畫，尚有《法蘭西路輿》、《農事與鄉族》兩書與解剖學論文一篇傳世。侯貝·埃蒂安納一世，同樣享譽印刷界，並曾編印多個版本的《聖經》與《聖經》譯本。他協助繼父德柯萊經營印刷鋪，學得一身本事，而後娶了貝德精通拉丁文的千金佩蕾特，在校對工作上得益不少。外國學者遠來，常在埃蒂安納家中小住，其府上就連孩童、僕從，也都能隨口說出拉丁語。他們的下一代，則又出了好幾位學者型的印刷商，計有亨利二世（知名的希臘學者，開業於巴黎、日內瓦）、佛朗索瓦二世以及侯貝二世等。侯貝二世的遺孀，就是書商巴爾貝的女兒；她改嫁的對象是前夫印刷鋪裡的校對員，即希臘文學者帕提松²⁰³。

身為純粹學者，人文主義印刷商所關心的，並非僅止於發行學術書籍與印製正確文本。他們也是專業的印刷商，對於所印之書的美觀與版式同樣在乎，甚或視為第一要務。前文所言的阿爾都斯，採用比過往所有字體更加優雅易讀的希臘活字，並發明斜體字，當可為證。這個時期的人文主義出版商，全面革新了印刷書的樣貌，講求簡樸無華。埃蒂安納家族，擅長設計素淨大方、比例合宜的書名頁；另有一些人文主義印刷商執著此道，對文字的視覺呈現極其講究，文字的意義反倒居次，托利²⁰⁴即是一例。他曾任教於杜普萊西、科凱雷、布爾戈涅三地的學院，並數度造訪義大利，極為讚賞當地文化。托利一度任職於吉伊·德古爾蒙與亨利·埃蒂安納的麾下，而後

娶了埃蒂安納的遺孀；他在自行開業之後，出版了一整本探討法文字母比例的專書，即知名的《野花集》。源自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靈感，讓他為法文書籍打造出全新的樣貌。部分史學家認為，這位老教師還曾親手雕繪圖版，自製裝訂工具，並協助活字工刻模鑄鉛以製作所需字體，其熱忱可見一斑。

前面提及的諸位，又要照顧印刷生意，又要不停地訂正校樣，有時還得代行出版商職務，連絡海外書商、文人，並撥冗從事學術著述；若非阿爾都斯、貝德、侯貝·埃蒂安納這樣的能人，恐怕早已倦勤（如此揣測當不為過）。唯有不辭辛勞的熱情之士，真正的文藝復興全才，方能全盤勝任。亨利·埃蒂安納便曾在修斯提底斯的文集序言裡剖白：自己在夜半起床編撰學術書籍，竟是因為白天訂正校樣、管理印刷鋪的例行公事繁重，藉此紓解壓力！事實上，十六世紀中，在夠格冠上人文主義者名號的印刷商、書商中，許多人無暇從事個人著述，或許意願也不高。學養深厚的他們，亦是開明的出版商；為了顧全事業大局，盡可能與更多的作家、知識份子往來。在此同時，他們也鼓勵這些人鑽研學問、提筆寫書，並與其建立夥伴，甚至密友關係，以借重學人的長才。

格利甫²⁰⁵在里昂的眾多書商中，堪稱青年才俊。他推廣阿爾都斯樣式的書籍，不遺餘力地傳頌伊拉斯謨斯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做生意他也不含糊。一四九一年，格利甫出生在士瓦本的魯特林根，父親也是印刷師傅。在德國與威尼斯學得技藝之後，他回到里昂（當時的身分可能是威尼斯書販商會的代表），創建印刷鋪。起初他採用哥德體，替商會印製法律書籍；稍後又採用羅

馬體、斜體活字，仿效阿爾都斯的隨身書，印製小開本的拉丁文作品。此外他也印製古希臘著作的拉丁文譯本，並將當時最卓越的人文主義著述翻譯後再版，其中包括比岱、伊拉斯謨斯、波利奇亞諾等人的書。此人獲准印製的書籍，包括開明派的卡本查斯主教薩鐸雷之作，以及帕里亞黎歐探討靈魂不朽的專論。同樣地，他也受託印製老斯卡利傑的《拉丁語溯源》、帕尼努斯的《希伯來語典》、多雷的《拉丁文詮解》，乃至於拉伯雷的科學論著。在另一方面他也印行較不嚴肅的作品，如辜爾的《愛情俘虜》。歐洲各地的教科書，近半數由格利甫承印；里昂人文思潮的風靡，亦是以他為幕後活躍的推手。各地的文豪、鴻儒，將著作題獻予他以表欽崇，也相當頻繁地造訪他家，有時則與之攜手校對書稿。這位學識不凡的印刷商，身邊匯聚的人物亦非等閒：拉伯雷、阿爾恰特、薩鐸雷、叔沙諾、巴杜爾、奧特芒、波度昂、德古維拉、顧伊安、費勒、馬羅、維薩杰、波旁、莫里斯·塞夫與吉堯姆·塞夫、馬克蘭、亞諾等。他們之外還有許多人，同樣是格利甫家中的賓客。格利甫儼然成為與藝文人士交好的編輯工作者典型；他不是作家，滿腹學問卻不輸給他們。

印刷商與書商，不僅是文人的同伴、密友，也提供保護。只要對生意有利，他們時常會為其出版離經叛道的書籍（畢竟富爭議性的著作銷路較佳）。庇護有褻瀆宗教嫌疑的作家，於他們亦是家常便飯。多雷曾因販售「邪書」而被判刑，從土魯斯出獄之後，格利甫旋即迎接他到自己家裡，毫不避諱。此外，印書、賣書的人，總能搶先讀到剛完成的手稿，自然比常人更早接觸新觀念；他們多半會接納這些新思維，並率先捍衛之。印刷商安斯罕²⁰⁶，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在圖賓根以及阿格諾開業，是羅伊希林的朋友；就連繼承他事業的小舅子塞哲爾，也與梅蘭希頓結

交，身旁盡是追隨路德的宗教改革人士。安斯罕與塞爾鋪子裡的印刷機，除了印製路德、梅蘭希頓等人的著作，幾乎不印別的書，甚至直接迎向反對力量，祕密印製十六世紀年輕西班牙醫生塞爾維特的說帖。如此志士尚有篤布瓦。此君先後在巴黎、阿朗松印製書本，無懼打壓挫敗，積極宣揚路德的理念與著述。

若在傳播新思維的奮戰中身先士卒，印刷商與書商就無法迴避舊勢力的迫害，性命全賴審訊決定；牢獄之災還算好，火刑處決亦是常有的下場。還有什麼比重重懲罰散布可疑書刊之人，更能剷除異端？是以十六世紀的教會法官，審判印刷商鮮少留情。十六世紀下半，巴黎、里昂較負盛名的人文主義印刷商，幾乎清一色是新教徒；由於法國各地都有審查官與君王法院（巴黎最高法院的前身，創始於巴黎，而後各省亦增設）的眼線，他們只好流亡異國以求自保。侯貝·埃蒂安納與德圖爾恩，選擇退居日內瓦，許多同業也跟隨這兩人的腳步。至於當時的安特衛普，原本由抵抗西班牙統治的奧蘭治親王威廉（即後來的英王威廉三世）與阿朗松公爵掌控，尚屬新教勢力範圍，但後來又被阿爾瓦公爵率領的西班牙部隊攻克。普朗坦爲了能在安特衛普繼續印書，順應不同勢力消長，數度改信不同教派（誠心與否姑且不論），最後還是不得不離開。其他的印刷商與書商，或不夠好運，或不夠聰明，或不願像普朗坦那樣口是心非，遂爲出版「偏邪教理」而賠上一條命。擅長刻製活字，並曾出版那瓦爾王后瑪格麗特詩作的奧熱羅，死在火刑柱上，只是其中一例。

在那些人書俱焚、「以身殉書」的印刷商與書商當中，性格最特出的一位，當屬多雷。從現

代人的眼光來看，多雷的心理既複雜又難懂。他原本是作家，後來轉行從事印刷與出版，並因買賣禁書遭處火刑。此外，他的案例顯示，心理層面的問題，乃是詮釋其他書商兼印刷商的生平時，不應忽略的基本課題，且與這些人的專業關懷很有關係。若非如此，或許此處也無須詳述他的事蹟了²⁰⁷。

多雷脾氣火爆，喜怒無常，曾在鬥毆中致人於死，案情則是一團迷霧。他非常崇拜西塞羅，並一度就學於帕度阿大學。起初他並不願捲入當時的宗教爭端；從義大利返鄉途中，卻在土魯斯遭遇一群心胸狹窄的守舊人士，屢遭阻礙、限制，終於驚覺自己置身於多麼封閉的環境。一五三二年，追隨路德主張的德加圖西遭處火刑，多雷對宗教迫害的鄙夷、對自由的熱愛，至此再也壓抑不住。他成了異議份子，銀鐐入獄，罪名為誹謗君王法院成員；他的友人替他興訟，而後來他也獲得釋放。在他的莫逆之交中，有位名叫德布瓦桑的，建議格利甫對他多加禮遇；此後他遂在里昂住下，替格利甫校訂書稿以餬口。效力格氏期間，他除了自己寫書，也翻譯個人偏愛的一些拉丁文作品，並蒐集相關資料，準備以一部大作揭示西塞羅文體的卓絕之處；此間他甚至與伊拉斯謨斯展開著名的筆戰，只爲了捍衛自己的偶像。另一方面，他還替格利甫即將出版的書籍五十種，完成編審，就此投入印刷產業；豈料他在此時殺死了康龐，再度被捕下獄，工作一度中斷，倒是國王沒多久就赦免了他。

時間來到一五三八年。當時他已成婚，妻子即將爲他產子。多雷是否念及一家人未來的生計，才開設印刷鋪，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他的創業資金係借貸而來；可惜，史家雖努力考證，金主身分依舊成謎。就在同一年的三月六日，法蘭西斯一世特准他從事印刷業，他很快地發

行了第一本書。此書既不是新版的古希臘羅馬經典，也不是什麼拉丁詩選或哲學文集，而是一冊洋溢虔誠思想、名叫《基督徒箴言》的小書；這樣一位追求語藝詞藻，又不屑捲入新舊教爭端的狂熱西塞羅信徒，竟然推出這種書，著實令人意外。總之，此書雖然在稍後遭巴黎君王法院譴責，但問世之初還是獲得里昂學院院長杜朗的讚美。多雷此舉是向大眾品味妥協嗎？或藉此表態自己支持正統教會？莫非他虛榮心作祟，想讓大家看看，自己的文筆亦足以處理宗教題材？迄今這點仍無定論；或許各種因素都有一點吧。此後到一五四一年，多雷都沒有類似的後續作品，而轉為印製科特羅與方丹兩位友人所撰之書、馬羅的作品、些許醫學書籍，與泰倫斯、維吉爾、蘇埃托尼烏斯等古羅馬文人著述，此外當然還有他最愛的西塞羅。一四五一年，他出版一部拉丁文的《新約聖經》，和改革派神學家薩伏那洛拉的一本小書。

接下來的一五四二年乃是關鍵；他因業務擴張，轉而開業於大書商林立的梅西耶街，接連出版了三十二種書。其中僅五種屬希臘羅馬古籍；另有七本醫學書、六本精挑細選的法語文集與詩集（其中，出自拉伯雷與馬羅手筆者各一），與十四本宗教作品。後者清一色是舊教眼中的疑似禁書：如伊拉斯謨斯的《基督教騎士手冊》，以及戴塔普勒、薩鐸雷、德伯坎的書，都在此列。馬羅改譯的法文版《聖詠集》與《新約全書》，也在此列。這些作品未必有意挑戰舊威權，卻鼓勵讀者熱情擁抱核心教義，即「救贖」。當時奧里維坦已將《聖經》譯成法文，而多雷也準備推出《聖經》譯本，諸般動作已足以令當局對他特別提防。他的工作場所旋即遭人搜索，並起出一本喀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奧里維坦的法文版《聖經》，與些許梅蘭希頓的文章。一五四四年八月三日，多雷在莫泊爾廣場遭處極刑，人與書一同化為灰燼。

前述史實，令人對多雷的心路歷程更加疑惑。此人飽讀詩書、崇尚文采，還是個不屑選邊站的自由派，卻突然捲入新舊教爭、選擇孰敵孰友。他究竟做了什麼？原因何在？是爲了賺錢嗎？因爲有利可圖，他才出版改革派的作品？或者，他在喜獲麟兒、年事漸增之後，對信仰問題產生興趣？這些臆測都太過簡單。多雷令人費解的心態，只怕本書是無法解答了。即便如此，此人還是值得一提；畢竟，此間體現的問題，也是研究其他甘冒風險表達異議的印刷商、書商時，經常遇到的問題。

從十六世紀末開始，印刷商與書商的态度有了改變，作家與出版商的關係亦有別於以往。在世紀末的動亂中，歷時數代的人文主義印刷商消聲匿跡，印刷業也在異常蓬勃了一百年之後遭逢危機。不同版本的各種書籍供過於求，景氣低迷則切斷了金主對出版商的資助，印刷匠有的鬧事、有的罷工。到了這步田地，印刷商只求溫飽，在法國尤其如此。之後到了十七世紀初，蕭條景況最不嚴重的德國，又慘遭三十年戰爭蹂躪；所幸在歐洲其他地方，凋敝的民生已有起色，唯腳步緩慢。書籍的世界倖存，並因經濟劫難而貧困、萎縮。總的來說，此時的書商、印刷商，已結成行會、商會，學者印書或文人出版的盛況不再。印刷鋪、出版社的數量也嫌過多，經營者泰半入不敷出，生計困難不說，社會地位也跟小技工沒有兩樣。書商兼出版商，此時可顧不得什麼促進文藝發展，只發行銷路有保障的書本。他們之中最富有的，憑藉一定賣錢的書籍牟利；這些書包括重新打印的舊時暢銷書與通行各地的宗教書，特別是基督教教父的作品。獨領風騷的幾家出版商，盡皆隸屬反宗教改革陣營；他們雖是舉足輕重的商人，卻屈從於耶穌會的政策，支持教

宗的絕對權力。

就這樣，出版業對當權派，全然地言聽計從。原創著述反而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而新近完成的作品（至此已多半以方言撰寫）也不討喜。發行法文版經典著作的商人，生計勉強過得去；至於作家，總嫌小店東、小商人目不識丁、出身寒微，不屑與之為伍。印刷商的住所或店鋪，不再是文人學者聚會的場所，取而代之的則是上流社會的文藝沙龍、貴族階級的藏書閣（在博學的圖書館員邀集下，接受顯赫人物的贊助），甚至修道院。諸如克拉馬希或稍晚的雷歐拿等大出版商，與當時掌理圖書審查的塞吉耶大法官關係友好，不在話下²⁰⁸。知名書商中，供書予法蘭西學院的卡慕薩，以及賣書給詹森教派信徒（隸屬舊教內的非正統派別）的德斯普雷等人，繼續透過許多不同的方式服務讀書人，亦是事實。只是，客戶與商人的關係，至此宛如主從；十六世紀時的平起平坐，甚至書商庇護文人的光景，已是昨日黃花。替樞機主教馬薩連掌管圖書的諾德，曾以一對手槍，做為賞賜卡慕薩的新年禮。稍晚，身為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德巴查克，寫信聲稱書商洛柯雷應該接受公開譴責。倒是生性敦厚的夏普蘭，以「良伴」、「好友」稱呼洛柯雷、雷歐拿等大書商，頗有禮賢下士的意味²⁰⁹。

若與阿爾都斯、埃蒂安納家族的年代相比，如今確實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遙想過往的事業盛況，亦不免唏噓。文人階層裡，只剩下歷史學家，基於印刷複雜書籍的考量，繼續維繫與印刷商、出版商的友善關係。例如杜康熱與馬比榮，即與里昂的阿尼松家族時有聯繫。馬比榮為了尋訪修道院裡的珍稀手抄本，曾經遠赴義大利；臨行之際，為他提點方向的，正是羅倫·阿尼松的兩個兒子²¹⁰。至於荷蘭萊登大學的教授們，對於艾齊維埃家族的出版知識與印書手藝，有著同

樣的敬重；艾氏一族的友人與靠山，亦不乏海因休斯等博學的政壇人士。這家人或多或少地延續了上個世紀裡人文主義印刷商的傳統。在他們接連不斷的出差途中，曾接受作家夏普蘭、帕雷斯克等人的熱情款待。

這個時期的出版從業人員，以尋常的商販與工匠為主，儼然是一片龍蛇雜處的灰色地帶；能與他們區隔開來的書商、印刷商寥寥無幾。話雖如此，仍有一些人繼續奉行書籍業傳統的高標準，只是不比早年的人文主義出版家那般風光。巴黎的韋特雷，雖沒有學過拉丁文，卻長期獻身於多語版《聖經》的排印；他以五種文字印出厚達七冊的經文，連普朗坦都不免失色。若問誰是當時最頂尖的「希臘通」，馬赫唐當之無愧；他在學界頗受敬重，整個巴黎也只有他能印製正確無誤的希臘文書本。開業於迪戎的帕里伊亦有可觀，除了鑽研系譜學，還把自己的著作印製成書²¹¹。布拉赫的學生布勒²¹²，或許是當時聲名最著的印刷商；他在轉行之前以製作樂器爲業，而後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一家影響深遠的出版社，並改良印刷機。他所製作的地圖集，在當時是一大進步，不過這樣的業界奇葩寥寥可數，或許只在荷蘭稍微多些。

規範出版界的宗教與政治力量，此時轉趨強勢。印刷商與書商，由教會統一監控，甚至同時受到新舊教會雙方面的審視。至於俗世的權力機關，決策經常自相矛盾；即便是最奉行傳統教規、最遵守法條命令的印刷商，也難逃嚴格的圖書審查。如克拉馬希便會因收受了數本奇自羅馬的桑塔雷里名著《抗暴論》，遭君王法院處以罰金²¹³。只有極少數的印刷商和書商，終其一生都沒在法院受審過，所幸多數被告都獲輕判。就算當時膽敢觸法的書商眾多，且是職業使然，他們的犧牲精神也無法跟十六世紀的老前輩相提並論。當局對異議份子敏感如昔，但在嚴懲「邪書」

作者的同時，卻異常地寬容出版界人士。像十七世紀《帕爾納斯諷刺詩》的作者德維奧，便在沒有出庭的情況下，遭法官逕處火刑；發行此書的索馬維爾、艾斯托克與洛柯雷，卻連應訊都不必。如此的差別待遇，不禁讓人懷疑，三個書商其實是受到德維奧的死對頭，加拉賽神父的支使！事實上，政府心知肚明，打擊書商與印刷商，意義實在不大；他們雖有助長禁書傳布之嫌，卻都只是因為貪財，應客戶要求而印書，思想上則無問題。不過，有些時候書商仍會以行動表現對作者（或替作者辯護者）的赤誠。波爾羅亞爾修道院（係前述詹森教派的重鎮）的出版商，大抵如是；其中包括出版《外地人》的德斯普雷與勒佩提兩人。雖說他們的贊助者與總理官署關係良好、頗得同情，但他們仍明白自己的做為有很大風險²¹⁴。透過層峰的友人，這些人得以洞悉總理官署與其他官員對某部著作的反應，在當局展開嚴厲撤查之前，試圖擋下書本出版。

獨力經營、未能結交權勢的印刷商，更是欠缺庇護。他們貧窮，又常常無書可出版，只好冒險印刷各種鼓吹思想的小冊。柯爾貝爾掌權之後，他們遭受無情緝捕，蹲進巴士底監獄的不在少數。即便不碰禁書，只要涉及盜印本交易，下場還是一樣。有個名喚里布的印刷商，涉嫌誹謗國王而多次入獄；若非健康狀況欠佳，恐怕早就貶為划槳苦力²¹⁵。

十七世紀末，情勢再度變化。當時南特敕令（法王亨利四世特赦新教徒的詔令）已經廢除，反對君主專制的抗爭開始發展，並在啓蒙運動揭幕以及法文《百科全書》問世的十八世紀，出現新的面目。以身殉教、信仰迫害的案例四起，許多印刷商被迫奔逃他鄉；他們在國外印製措詞尖銳的小冊，衝著流放他們的國王，極盡批判之能事。政論書刊自此發展起來，而這種環境也孕育

出身兼記者的印刷商和每日一刷的報紙。輿論與當權派周旋，書商與印刷商則成爲重要的中堅人物。「啓蒙哲人」爲了要對抗圖書檢查，持續與主政者衝突，並力求一己作品儘量廣泛傳布；此外，他們更得重新評估自己的出版商。一如十六世紀，多數文士必須身兼出版商及印刷商，以倡導新的觀念。博馬榭在凱爾設鋪，印製伏爾泰全集，藉此避開法國的出版箝制，便是一例。鄰近法國的前哨城鎮，則有重要性居次的作家，尤其是記者，利用小間的印刷坊，發行書本與快報，以助長哲人論著與激進思想的傳播；與思想家盧梭恰好同姓的盧索即爲其一²¹⁶。他生於一七一六年的土魯斯，在當地接受耶穌會士的教導，而後赴蒙貝利耶，入醫學院就讀，卻又在二十四歲時輟學前往巴黎。身爲異議者，他有遠大的文藝抱負，並經常出沒於當時文人熱烈談論政治與藝術的公開場所，諸如杜樂麗宮與皇家府邸附近的咖啡館，並與數學家達朗伯等人交好。撰寫劇本之餘，他創立了「郵報」，時值一七五〇年。這正是法文《百科全書》逐冊推出的時候，盧索深深折服於這套鉅著所表達的觀點，故此後便設法以專門的出版社，創辦「百科全書期刊」，並推廣百科全書學派的論著。

奈何頭兩卷的法文《百科全書》，在出版的中途就喊了暫停。達朗伯與狄德羅身爲編者，固然窮於應付各種問題，而在另一方面，盧索顯然也無法替「百科全書期刊」取得發行許可。而後他想起了列日；該城與歐洲各國的聯絡都很方便，距離法國亦頗近。帕黎兄弟是當時首屈一指的銀行家，致力於保護落難的思想家；透過他們的穿針引線，盧索被推薦給列日親王主教的使者，並獲准於當地發行一份雙周報。在四年之後的一七五九年，他又惹來神職人員的反對而出走，並先後在布魯塞爾及布永落腳。此後他的事業才蓬勃起來，開始忙碌於期刊編輯工作。不少文人聞

風而來，為這份刊物執筆；管理印刷事務的，則是他的小舅子威森布赫。雖是隔周出刊，但其內容甚豐，厚度幾與書籍無異。

稍後，盧索與威森布赫創建了規模宏大、前所未有的出版社，名為「印藝社」，「啓蒙哲人」思想的倡導，至此更是如虎添翼。該社成立於一七六九年，擁有一間全新的印刷工場與六台印刷機，大量印書供應歐洲各地達二十五年之久。除了伏爾泰的小說、拉封丹的《寓言詩》、《故事詩》、《教理暨思想學史略》、《論克勞迪與奈隆之治》、老米拉波的《馬德里銀行研究》與狄德羅全集、愛爾威修全集，印藝社亦發行過伏爾泰、盧梭與其友人的其他作品。

至此，為數甚多的作家與啓蒙主義宣揚者投入筆耕，再以自己創立的印刷鋪發行書籍報刊。不過，除卻這些人，仍有一小撮出版商的影響力更在他們之上。這一批新世代的書商思想家，相當於拉伯雷那個年代的格利甫；他們既懂生意也懂風雅，不僅信仰新興思潮，還從中牟利。在對抗圖書檢查的過程裡，他們變成狄德羅、伏爾泰、盧梭的至交與戰友；勒勃雷東便一度扮演此種角色。此君可能就是法文《百科全書》的率先發想者，亦是協助其編纂、出版的靈魂人物。另外還有一些外國人，在國界的庇護下，化身為思想家抵抗法國執法者的後盾；其中，荷蘭出版商雷伊尤為重要。盧梭晚年精神不穩，動輒猜疑他人，雷伊卻以友誼克服了這一點，還認盧梭做自己女兒的教父，為其發行大部分著作²⁷。來自日內瓦的兄弟加布列·克拉默與菲利普·克拉默，性格亦大抵若是；他倆是伏爾泰的指定出版商，世故練達而手腕圓融，學養與生意頭腦同樣不凡。出身書商世家的他們，母親為德國爾恩之後，堪稱直接傳承了十六世紀里昂人文主義的出版商。其足跡遍及全歐，除了巴黎，事業版圖更涵蓋斯德哥爾摩、那不勒斯、威尼斯、加地斯、林茨、

阿利坎特、里斯本等地。他們坐擁巨富，活躍於日內瓦政壇；菲利博甚至爲了公職而逐漸淡出版業，此亦令他與舒瓦瑟爾公爵、財政大臣內克等法國政要的私交日篤。他旋即躋身社會的最上流，並曾於拉羅什富科公爵的豪宅作客，伏爾泰形容他朝氣儒雅兼備。相較之下，其兄加布列可能稍遜一籌；他繼續從事出版工作。加布列頗通音律，更是風流的多情漢，曾一度晉爲日內瓦兩百人議會成員，稍後又擔任審計官。他不僅是伏爾泰的朋友，還身兼演員；伏爾泰在費內自宅與樂盧發表的新戲，絕大多數都由他偕妻子跨刀演出。其妻也是性情中人，與樂盧定期書信往來。出版產業裡，克拉默兄弟是既高貴又富素養的一對，但在貴族名流間又處於邊陲位置；這點頗能打動伏爾泰，在一七五六到一七七五年間，他幾乎將自己所有的作品交付此二人出版，就連最大膽的《哲學詞典》亦不例外。他也建議兩兄弟出版達朗伯與摩瑞婁神父的書，一方面銷往歐洲各地，一方面走私至法國。

不論是盧索、博馬榭這樣的小出版商，抑或是雷伊、克拉默之類的大出版家，事業都得以大幅拓展；這大抵是因爲十八世紀的環境適合相關行業（一如十六世紀）。此時期的物質生活充裕，智識活動澎湃；既然人人都樂於求知與思辨，有學問、敢投資的出版商，便更有信心推展宏大的出版計畫。例如庫斯德列出版的早期法文詩選，迄今仍然家喻戶曉；巴爾布發行的一系列拉丁文經典，以開本適中取勝；潘庫柯更將自身承攬的一整套龐大百科全書，有條不紊地分成一百六十六卷來付梓。在此同時，萊比錫的柴德勒推出一部寰宇字典，全書六十四鉅冊。大出版家在文藝世界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優質出版品轉趨熱門，書刊整體發行數量提升，以及報紙的發展和增長，導致書市登時成長，從而促使業者尋覓新方法，提升書報樣式的美觀程度，對於革新技術、增進產能，尤其不遺餘力。十八世紀的歐洲，到處都能找到堪稱阿爾都斯、托利傳人的印刷業後起之秀。他們多半由鑄字師、字體設計師轉行，除了發明新字體，還研究出更理想的打印作業與造紙方法；十九世紀初，徹底改變出版業的技術革命，即奠基於他們的努力之上。

英人巴斯克維，生於一七〇六年，卒於一七七五年，是當時的書寫藝術大師與雕刻巨擘。他在一七五〇年迷上了活字技術，窮兩年光陰設計新字體、自行刻製陽文字範，同時精進造紙術，造出表面平滑如緞、沒有格狀直紋的「織紋紙」，又稱「布紋紙」。他在一五七五年發行維吉爾的詩集，品質甚佳，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書。豈料此君臨終之前竟是身敗名裂，留給寡妻的印刷器材則被博馬樹買走，並於稍後印製出凱爾版的伏爾泰作品²¹⁸。義大利人博多尼，年紀甚小時即在羅馬的宏教印刷社擔綱排字，日後則依另一套原則設計出新字體。一七六八年，他奉命前往帕爾馬，為費迪南王子設立官方印刷鋪，繼續雕製，或遣人代製新活字，也發行了不少品質出色的書本²¹⁹。

巴斯克維、博多尼，乃至於前文未述的卡斯隆，縱以印刷為業，卻都設計出獨到的新字體；後人不僅以發明者的姓氏稱呼這些新字體，更從中擷取許多靈感，迄今猶然。這些人既是工匠，也是藝術家，樂業之餘更深愛雅致的印刷；在他們之中，最傑出，在某些方面亦是最獨特的幾位，則出自迪鐸家族²²⁰。此印刷世家的第一代為佛朗索瓦·迪鐸，曾出版普雷沃神父作品與《航海史略》一書。佛朗索瓦有子女十一人，其中安布拉斯·迪鐸改良了十六世紀以降未有變革的印

刷設備，並以精進單次拉桿印刷機爲其最大貢獻。此外他也刻製新的活字，把織紋紙帶進法國，還用點數系統統一原先紊亂的字體尺寸單位；在他手中出版的插圖書，有不少援引了畫家達維的風格。皮耶與佛明兩子，繼承安布拉斯·迪鐸的龐大家業；他的另一個兒子皮耶弗朗索瓦則在一七八九年買下埃松恩一間紙廠，催生了七年之後在此地問世的史上第一座連續造紙機。

四、作者與版權

本章結束之前，還有一種與印刷相關的職業必須一提；那就是與印刷密不可分，仰賴印刷而生的作家。

今天的作家得以從著作的銷售中獲利，憑藉的是版稅制度；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通則，實則歷經長時間的醞釀。印刷術發明之前，版稅根本無由施行。手抄本固然能假抄謄員之手大量製作，但在沒有著作權、人人皆有權利抄書的古代，誰能想像從事著述還有稿酬可言？在此種情況之下，作家自無穩定收入，著書若非純爲名聲，就必須尋求名人的庇蔭與供養，並由贊助者監督，抄謄數冊求售。印刷術誕生之初，立即的變化也不多。對自己發行的文本，印刷商並不握有任何專屬權利，這點與過往的抄寫員相同；他們大都印製古代的篇章，是以只消學者、語言學家從旁協助，代爲選稿、校樣，就能順利成書。文人投身出版事業的捷徑，不是出書當作家，而是擔任校稿人。雅好文藝的人文主義學者，亦爲印刷鋪訂正錯誤，前已詳述，此不贅言。

很快地，尙未經人出版的文本便所剩無幾。盜印書開始出現，且數量激增；印刷商遂向當局

申請為期數年的許可，獨享自印書本的發行與銷售權，以維生計。此外，他們也尋訪可供出版的新著作。作家察覺自家之言可以透過印刷機而發揮影響力，便把自己的作品推薦給書商。畢竟，堅信人文主義的文士，三餐無繼、需金孔急者，為數頗多，但不是每位都有穩定的校稿差事可做；有些人運氣不夠好，有些校起稿來不甚牢靠。十六世紀末葉之前，把自己的手稿託付予書商，委其出版、從中獲利，再向書商支領稿酬（簡言之，即兜售自己的智識結晶），仍非普遍做法。即使在十六世紀之後，依舊有許多作家寧可訴諸傳統路線，仰賴貴族富商的贊助，也不願接納新的謀生管道。與伊拉斯謨斯同期的文士，多在一己著作成書後，向書商索取數冊，附上諂媚的獻詞信，贈予貴族和文藝贊助者，期待對方以籌金的方式打賞。如此行徑，與在卷首、卷末修書題詩，溢美某位權貴、盼其捐助的做法（這很快地變成印刷書的慣例），用十六世紀的眼光來看，似乎還是頗為體面的事，且通常都能如願得到回報。當時的作者若覺得稿酬欠豐厚，甚至可將受贈者的吝嗇公諸於世。別號「布魯塞爾盲居士」的人文主義者德旁特，因為對賞金的期盼沒有實現，失望之餘乾脆把作品題獻給門生，控訴贊助人不夠慷慨。

我們或許會覺得這種制度毫無文人風骨，當時卻是再自然也不過了，且比賣書給出版商更加穩當。伊拉斯謨斯曾向出版商要錢，卻招來某位政敵撻伐，於是憤慨地反駁，自言著作餽贈友人，從未索取超出對方能力範圍的報價。各位可別誤會，其實伊氏光靠著述所得，生活業已相當寬裕。其作品的題獻對象迭有增加，其文名也讓出版商願意拿出更多的書籍供他贈人；他甚至組織起一整批代理書商，活躍於歐洲四方，將書配送給各方的贊助者，也替他收取稿酬²¹。

但伊氏只是特例；據普朗坦摩雷特斯出版社的檔案記載，十六世紀裡，似乎僅有極少數的作

家，得以自印刷商處提領大量的印畢作品，供其題贈予人。在某些發行數量有限的情況下，普朗坦甚至要求作家自掏腰包，承購一定比例的印製成品。一五八六年，《法內西婚禮之歌》付梓，作者馬梅拉努便被迫自購四百到五百冊；一五七二年，瑟黎亞努更花了兩百弗林買下一百八十六冊自己的《勒未紀注疏》（新教譯《利未記注疏》），而這一版總共只印了三百冊。類似的例子很多，彙印成書的樂譜尤然。賣相欠佳的書，出版商通常會要求作者分擔部分成本，因此在普朗坦時代的作家中，能獲得出版商酬謝的，可說是少之又少，不免令人訝異。有時候，普朗坦會把印畢的幾本，免費送給布坎南等原作者留念。可以想見，埃薩克身為《希伯來文法》作者，在一五六四年出版時得書一百冊，以及《辯證法》印成之後獲普氏奉送兩百冊的胡奈烏，當如獲至寶、暗自稱幸。普朗坦亦會以其他的薄禮犒賞作者：撰寫《學名錄》的富尼斯，即在一五六七年獲得六條絲絨與三天的食宿招待。至於普氏在贈書之餘，另奉潤筆予作者的例子，就更加罕見了。德沙馮寫成《簿記方法與格式》一書後，於一五六七年交普朗坦打印，除獲贈一百冊之外，竟還領到四十五弗林；一五八一年，圭恰爾迪尼修訂其《尼德蘭全誌》的酬勞，則是印刷成品五十冊外加八十一弗林。

即使如此，作家把著作手稿直接賣給書商換取稿酬，在稍後旋即成爲常事。不少人婉拒稿酬，嚴守紳士風範者尤然；但絕大多數的作家，特別是劇作家跟小說家，並不那麼自命清高。十七世紀的布瓦洛和拉布呂耶爾便不靠出賣作品賺錢（而且總不忘記宣揚這點）；至於邦塞拉德、高乃依、羅特魯、拉封丹與莫里哀的悲劇、喜劇劇本，則待價而沽。一六一四年，貴族劇作家于爾菲則因地位尊崇，不好意思收受書商的錢，索性把《阿斯特萊》第三幕的本事送給隨從；這位

隨從因而獲得書商奉上的的一千里荷，與六十冊印好的成品。一六六〇年之後，稿酬大都有紀錄可查，所涉金額也不小：斯卡龍創作《滑稽小說》得酬一千法郎，《變裝維吉爾》更賺進一萬一千法郎。瓦利拉斯的詩作《異端》，獲巴爾賓奉酬三萬法郎。書商德斯普雷則以三萬三千法郎，向德沙奇的繼承人購買原稿²²。以下幾行布瓦洛的著名詩句，可令我輩更了解當時的情況（法文詩由程鳳屏翻譯）：

我知道 高貴的靈魂 可以沒羞恥 沒罪惡

總想出思緒讓它 合理法

但我為知名作家痛苦

他們不要名 窮困不堪

把他們美好的作品押給書店

出神聖的藝術 職業卑微

話雖如此，真正從出版商處領得高額稿費的作家，還是非常稀有。事實上，作家的酬勞甚薄；少數的例外，皆為獨立個案，且主要發生在十七世紀末。想要填飽肚皮，光靠寫書是絕不可能，只好繼續以序易酬、獻書領賞。高乃依把劇本《西拿》題贈給一位名叫德蒙塔榮的金主，換得兩百盾²³，不過是諸多例子中的一端。貴族階級繼續資助家族的專屬文人，與其說是愛才惜字，不如說是面子問題。難道作家爭相求取路易十四的供養，就不會覺得沒面子嗎？這也只是因

爲藝文人士依舊無法自立，只好仰權貴之鼻息；至少在法國的情況是如此。

當時的作家權益沒有保障，方導致前述的情形。一份手稿售出，即告賣斷，爾後的出版利潤，概與作者無關。更因爲著作權原則尚未誕生，書商只要設法弄到一份手抄本，就有資格打印出書，無須徵求作者同意。書商里布便是如此：他先是成功取得莫里哀的《可笑才女》腳本，即刻出版且未經莫氏授權，後來更變本加厲，爭取到獨家發行的特權，原作者如欲自行出版反而觸法。最後，莫里哀成功說服授權的當局收回成命²²⁴，但不是每個人都像莫氏這般幸運或地位穩固。在任何情況下，作家執意索償，都有可能引發爭端，自討苦吃。所謂稿酬，在出版之前業已議定數額、支付完畢；偏偏一本書會賣得多好，事前頗難逆料，萬一變成暢銷書，加印再版的好處可沒作者的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難理解書商爲何經常抱怨作者的要求；在他們眼中，這些搖筆桿的總是高估自己的著作，幾份破手稿也要獅子大開口。同樣地，當時的作家常常自覺受騙，也不是沒有道理。尤其從十八世紀起，書商多半有辦法展延某書的發行權；一旦買下手稿，實際上便得享長期的獨家出版權，偶爾也有人因此發財，反倒是原作者或其子嗣，只能喝西北風。

從十六世紀末開始，許多作家放手一搏，自力出版一己著作，以保有售書利潤、監控書本銷量。這樣的創業者，在法國、德國、英國皆有所聞，德貝熱拉克與聖阿芒²²⁵即屬之。書商、印刷商並不樂見這般創舉，窮各種手段打壓「作家私印書」的銷售；出版社甚至團結起來要求禁止書籍私印，在有些時候他們甚至還能得逞。一七七三年，這種或多或少要求作家權充生意人的自營

出版機構，差一點就變成法國的通則，而主要的反對勢力來自輿論。同時期的德國，萊辛等作家自力出書，更有文人籌辦出版合作社，其中最重要者當屬克洛卜斯托於一七七四年發起的「學人共和」²²⁶。

時至今日，作者的權益不再成爲問題，是因爲法律終於承認了著作權的存在。在一定的期限內，版權爲作者所獨享，期滿之後方化爲公共財。有了版權，才有現在的版稅制度，透過各種合約，使作者能在有效期間裡分享著作銷售的利益。

這種新穎的觀念，於英格蘭首開先例。約莫從十七世紀開始，有些出版商開始承諾，未經作者同意，絕不逕自打印第二刷的書籍；想當然耳，某書如欲加印，就得另付作者一筆酬金。密爾頓在一六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以五英鎊將《失樂園》手稿售予西門斯之際，西門斯允諾，只要第一版印出的一千三百本售完，將另外致酬五英鎊；若有機會印製第二與第三版，且順利出清，還會追加同額的稿費。安妮皇后當政後，於一七一〇年頒布詔令，試圖將此新做法化爲法條；法律認定作者（而非書商）擁有版權，這也是有史以來的頭一遭。基於此法，作者（而非書商）必須向書籍登錄機構申報一己之著作；申報人有權掌控該書的出版與銷售，爲期十四年，且期滿未亡故者得延長其權利十四年。情況從此改觀：英國的作家，偶爾也能從出版商那兒，領到高額酬勞²²⁷。

歐陸的著作權概念，發展相形遲緩。書商繼續以買斷方式收購書稿，並握有翻印權。不過，綜觀整個十八世紀，書稿的價格似乎上揚不少。尤其在最後五十年的德國萊比錫，出版商購買新

書手稿的代價，有時頗高。在法國，出版商同樣是在一七五〇年之後，方才付給作者比較像樣的稿酬。伏爾泰的《浪子》由出版商普洛爾付梓並致酬一千元郎；同樣在當時享有文名的克雷比永 and 德圖什則沒有如此幸運。據盧梭所述，其摯友孔狄亞克在一七四七年將《論人類知識起源》售予杜朗時，被迫接受三百法郎薄酬；盧梭自己的《論不平等之起源》、《致達朗伯書》與《愛彌兒》則分別換得五百、六百以及六千元郎的稿費。布豐伯爵編著的全套《自然史》共計五十卷，各卷的稿費超過一萬五千元郎，然而該書插圖甚多，圖版雕繪的龐大成本全由他個人負擔。一七七〇年開始，書稿行情水漲船高，就連二流作家的稿費，大致還是高過前人²²⁸。

書商支付的稿費雖然增加，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還是不願與作者分享書本零售的獲利。高乃依的弟弟托瑪，似乎自十八世紀初開始，便得以從自己編輯的字典銷售中抽成，唯這樣的例子極其罕見。偶爾出版商會允諾，某書的銷售一旦回本，願將部分利潤交予作者，但這也屬特例而非常態。一七四二年，《現代音樂論》的作者盧梭，即依此原則與書商締約，但終究還是沒有分到利潤。一七五三年，達朗伯的《文史哲薈萃》，亦採同樣模式印行。不過，這種計酬方式畢竟稀有，狄德羅甚至認為此法「又要甲方誠實，又要乙方肯信，未免苛求」。

十八世紀裡，愈來愈多的作家撰寫小冊或訴諸法律，以捍衛自身權益，最後終使業界接受了若干新做法。最令作家難堪的是，出版商一旦倒閉，著作權動輒轉賣他人，著作人卻一毛也拿不到。一七三六年，某個書商協會收購了里布店裡的存貨，其中包括五種克雷比永的劇作，為此克氏還訴請司法定奪。於是買方提議以五百法郎聘他修訂這五部劇本，爾後銷售則不另計酬；克氏因手頭拮据而接受。在十五年之後的一七五二年，他得到法國皇室授權，由皇家印書館印製自己

的著作合輯。早先購入克氏手稿，並於一七四六年取得版權的數家書商，遂提出抗議；原來，依當時通例，書商大都可在權利期滿之後順利獲得展延，豈料一七五五年之後的版權又將回到克氏手中。

這樁爭議如何收場，後人不得而知，倒是接下來的事，形同廣大出版商的重大挫敗。一七六一年，拉封丹的幾位孫女挺身護衛《寓言詩》、《故事詩》的版權，出版業者極力駁斥，自言早在一六八六年便與拉封丹的出版商巴爾賓簽約購得版權，合約的效力則延長迄今。在圖書審查官馬爾塞布的慷慨陳詞下，國務會議於一七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布命令，業者的申訴宣告無效。此後，一位名為德波瓦哲曼的作家，因自力出版、販售一己作品，被原先合作的出版商申請扣押其書，法院同樣裁定出版商敗訴，作者的權益更形穩固。

此後，一篇又一篇的論文問世，談的都是作者與出版商的權利。出版商委請狄德羅替自己辯護；另一方面，馬爾塞布、沙提尼則先後以出版業監督者的身分，試圖釐清問題的全貌。兩位官員後來都覺得作者有理。最後，政府當局在一七七七年八月通過五項相關法令以解決爭端，旋即又在隔年的七月三十日增補一項法令。自此之後，作家得享永久的著作權，而書商則擁有至少十年的版權，唯版權延長時間只能是原有期限的四分之一。作者如獲得某一版的發行權，可以在自家售書，亦可自費委商印書，次數不限；至於委商代售，則不涉及版權移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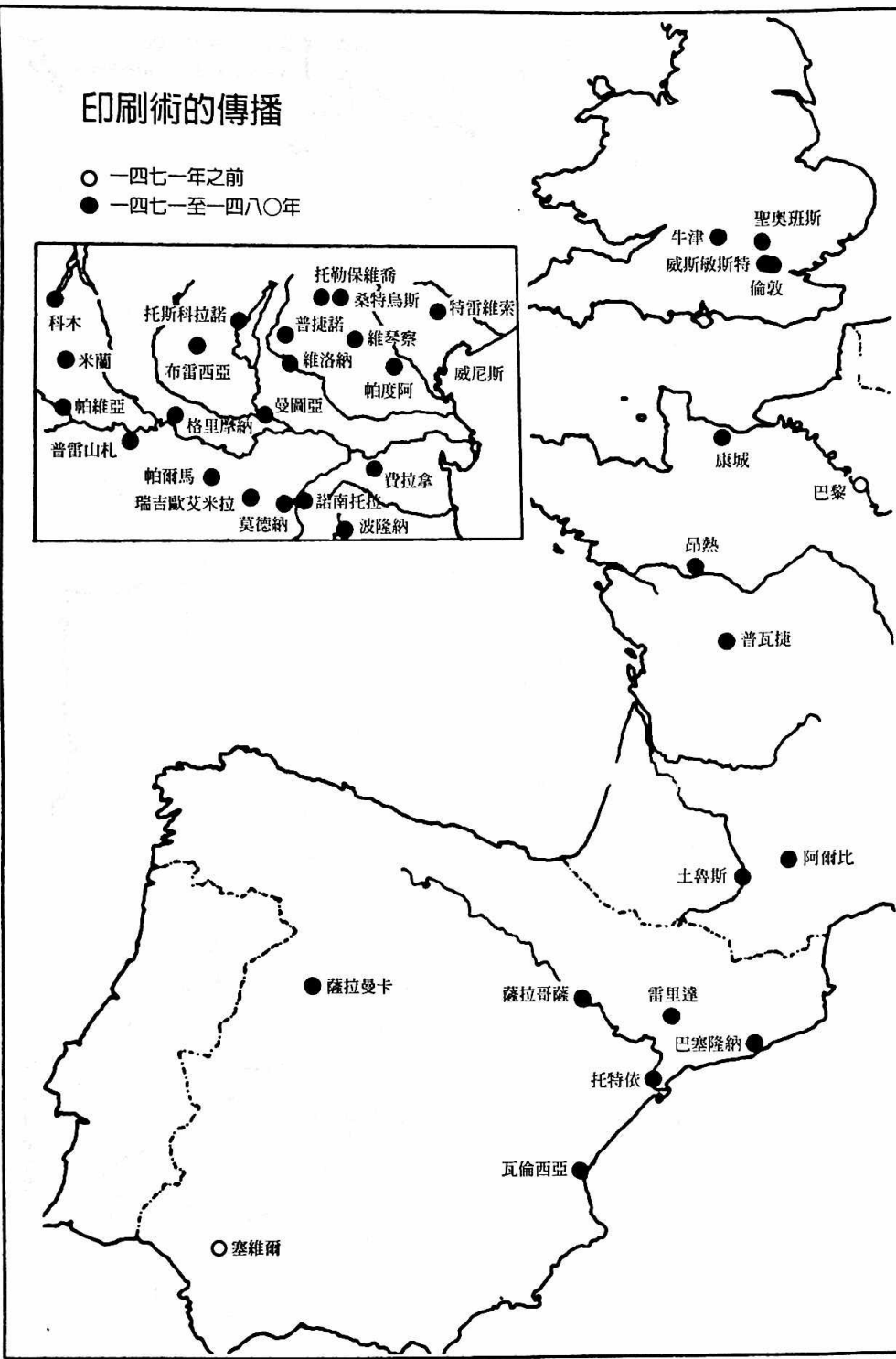
過了十六年，法國國民公會立法規範作者權利，其精神成爲現代著作權法規的基礎：作者有權銷售、流通自己的著述，亦得將權利全盤或部分讓渡他人；作者死後，其文字財產權歸屬法定繼承人，爲期十年（時至今已延長爲五十年）。著作人權利得以在整個歐洲立足，即因十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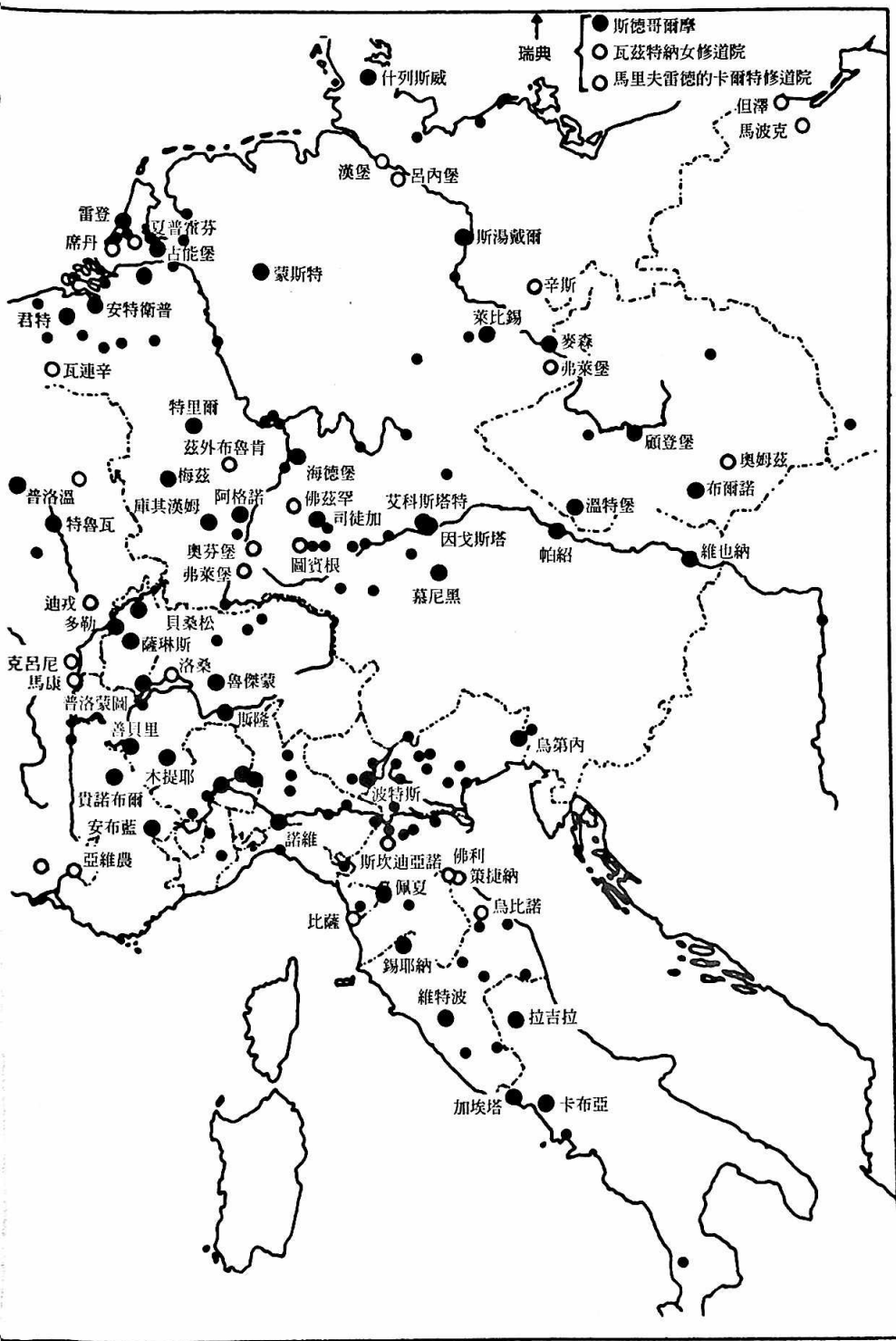
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功能相近的法條慢慢地在各處通過並逐漸普及。此後作家更有立場守護自己的權益。十九世紀時，大多數作家與出版商簽約，都會明確議定印刷的數量，如欲增印或再版，事前得由作者授權。縱有制度如此，筆耕事業仍不保證能日進斗金；欠缺理財頭腦的小說家巴爾札克，空有著作等身，還是債台高築。但這個時期的作家，至少可依作品暢銷的程度，尋求數額相稱的報償²²³。

作家這種職業，就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來的。他們歷經緩慢的演變，終於認清自己有權從著作中得利、有權支配自己的智慧財產，同時也讓外界承認這些權利。這更意味作家業已掙脫長期桎梏，不再仰仗私人捐助或國家供養。但有些限制還是存在：作家既然得以分享售書利潤，自然會試著寫出賣相最佳的書，從而以迎合最多讀者為目的。如此風氣，到頭來可能助長因循守舊的文風，反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

印刷術的傳播

- 一四七一年之前
- 一四七一至一四八〇年





- 斯德哥爾摩
- 瓦茲特納女修道院
- 馬里夫雷德的卡爾特修道院

↑ 瑞典

什列斯威 漢堡 呂內堡

但澤 馬波克

雷登 席丹 夏普 董芬 古能堡

蒙斯特 斯湯戴爾

君特 安特衛普 瓦連辛

辛斯 萊比錫 麥森 弗萊堡

特里爾

顧登堡 奧姆茲

茲外布魯肯

普洛溫 特魯瓦

梅茲

海德堡 佛茲罕 艾科斯塔特

溫特堡

布爾諾

庫其漢姆 阿格諾

佛茲罕 司徒加

圖賓根

因戈斯塔

帕紹 維也納

奧芬堡 弗萊堡

慕尼黑

迪戎 多勒

貝桑松

薩琳斯 洛桑

魯傑蒙

烏第內

克呂尼 馬康

普洛蒙圖 普貝里

斯隆

木提耶

波特斯

貴諾布爾

安布藍

亞維農

諾維

斯坎迪亞諾

佛利 策捷納

佩夏

烏比諾

比薩

錫耶納

維特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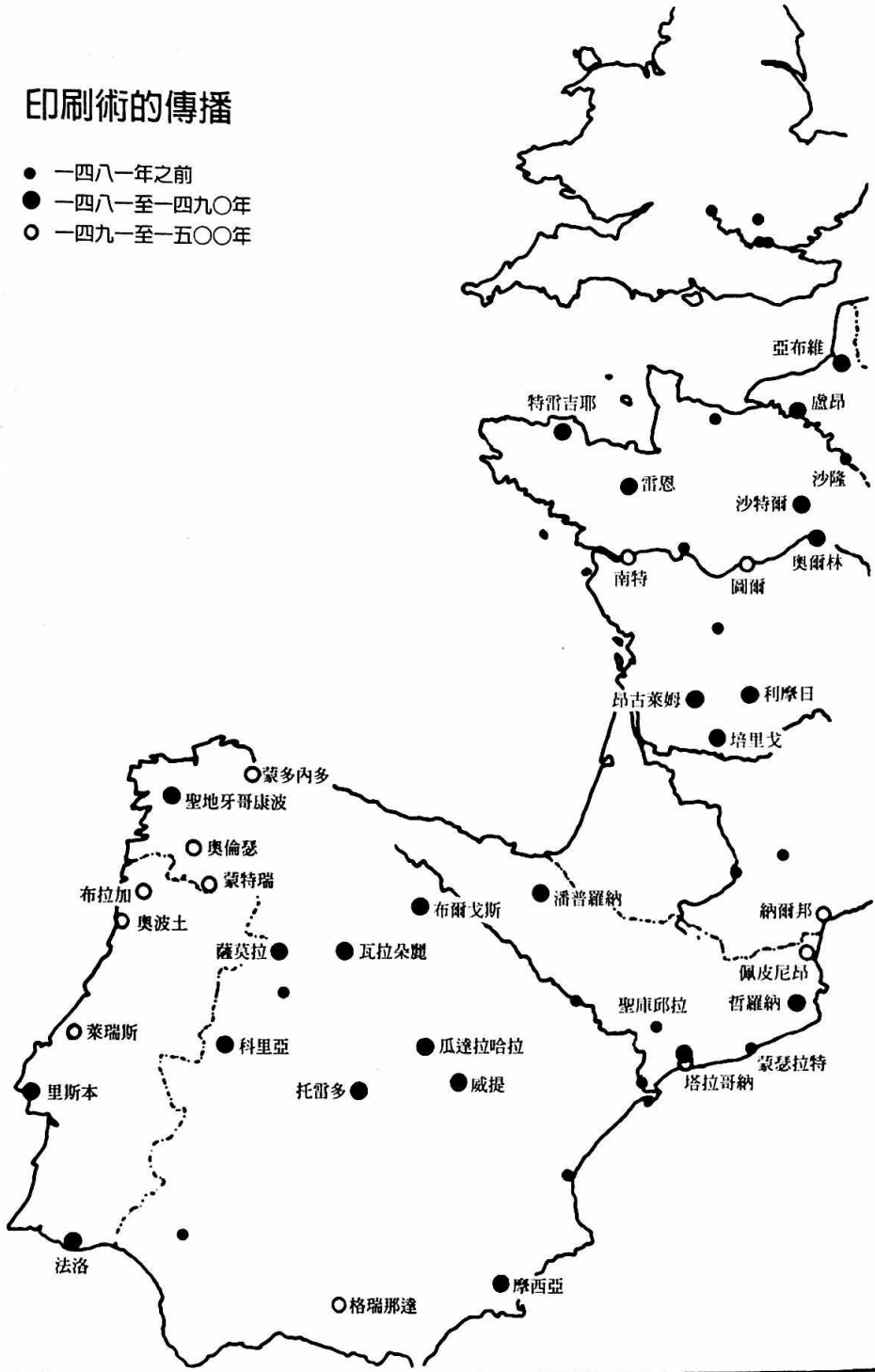
拉吉拉

加埃塔

卡布亞

印刷術的傳播

- 一四八一年之前
- 一四八一至一四九〇年
- 一四九一至一五〇〇年



第六章 書籍地理學

一、印刷匠的旅程

古騰堡、博斯特與修埃佛，都曾在美因茲的工坊裡，致力於改進印刷術。料想他們在大功告成的那一刻，心中當有如下疑惑：自己將來究竟能否獨占這項技術，抑或得面對同業競爭？修埃佛似乎曾試圖防範技術外流，還為此訂下慣例，命令麾下工匠發誓絕不洩露祕密。但當時已有許多發明家投注多年時間，意欲解決印刷技術的問題；此外，不管是從智識傳播或商業利益的角度來看，這項新發明都極其重要，幾乎不可能不讓「外人」知悉。野史甚至記載，法國國王曾在一四五八年派遣間諜前往美因茲竊密²³⁰。至於前述幾位發明者，就算一度獨占了活字印刷的奧秘，時間也不會超過十年，畢竟曼特林早在一四五九年，即於史特拉斯堡印出《聖經》。此時美因茲已有數家新的印刷鋪開張，而新技術旋即傳入萊茵地區諸鎮；俟一四七五年，波河谷地、巴黎、里昂與塞維爾已出現許多印刷商，同時間還有不少其他城鎮設有工坊²³¹。

早期的印刷技藝，一如火槍鑄造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日耳曼人的專利。最先設置的印刷工作室裡，師傅大都曾在古騰堡、修埃佛那兒見習，或任職於兩人的學徒門下而學得技術。這一群

工匠爲數雖少，卻有著不凡的經歷；他們勇於創業、不畏冒險，精神直令我輩欽服。一如當時其他行業的匠人，他們肯在出師後離開師傅的店鋪，漫遊於歐洲各個角落，並隨身攜帶各種器材，一面幫人印書，一面教人印刷。這些人的生活，想必與游牧民族無異；四海爲家的歷練，是他們最主要的資產，亦是他們最基本的謀生工具。他們會在某鎮駐足，期待當地客戶的託付，可能還得常常忍受貧困之苦。而他們所尋覓的，無非是願意幫助他們長期立業的金主，與環境合適的城鎮，俾使其草創的印刷鋪生意興隆。所以要說他們是「雖千萬人吾往矣」，亦不爲過；若非如此，紐倫堡的醫生蒙澤，又何以會在一四九七年的格拉納達，遇見多達三位的日耳曼印刷商，無懼局勢未穩，已然在當地創業（當時格拉納達才從阿拉伯人手中收復才剛滿兩年）？同期還有兩位師傅，分別來自史特拉斯堡與諾德林根，飄洋過海到中非的幾內亞灣，開業於遙遠而瘴癘不堪的聖多美島。

紐麥斯特²³²則是另一個例子。這位神職人員極可能跟古騰堡共事過（一說他在一四五九到六〇年間曾和古氏協力印書）。幾年之後他離開萊因地區，一如其他許多的最早期印刷匠，基於對義大利的嚮往而南遷，期望在這個崇尚學識、雅好文藝的國度中大發利市。他究竟是在一四六四年，連同其他德國印刷匠追隨史威罕與潘拿茲，而來到蘇比亞科和羅馬？還是與哈恩共同接受樞機主教多凱馬達的徵召來到羅馬？我們所確知的，是紐麥斯特在一四七〇年，定居於翁布里亞一處鄰近大教堂的城鎮福里尼奧，並先後覓得三位贊助者、合資人；他們分別是金匠奧菲尼、其弟馬利耶托，以及後來的安格里尼。在那裡，他們合力出版了布魯尼的《抵禦哥德記》、西塞羅的《家書》，以及史上第一本印刷版的但丁《神曲》。

後來，紐麥斯特的夥伴竟半途退出，想必是發覺印刷生意賺不了幾個錢。對德國印刷商來說，義大利實在不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原來當時的書市體系尚未健全，無法同時養活這許多匠人，就連羅馬的史威罕與潘拿茲也幾乎破產，滯銷的存書堆滿倉庫，不得不向教宗思道四世（或譯西克斯圖斯四世）求救。紐麥斯特無力償債，遂入監服刑，刑滿後被迫回到家鄉，麾下匠人也只得解散。在解散之後，有些工匠轉往佩魯嘉，任職於富有貴族巴格里翁新設的印刷鋪，但據考證，紐麥斯特十之八九是回到了美因茲，與其他入分道揚鑣。由他印製的一四七九年版多凱馬達《默想集》，大抵是在此時的美因茲完成，書中以金屬刻板打印的插圖，悖離了萊茵河流域首先開例的傳統。然而他也沒在美因茲久待，畢竟在那兒同行競爭激烈，籌措資金亦可能甚難。我們的臆測是，他繼續旅行，途經巴塞爾，並在當地遇見許多同業，之後又來到日耳曼印刷商人滿為患的里昂；而後沿著里昂商人（其中在不少人所攜運的商品中，已包含書本）經常行走的繁忙路線，動身前往土魯斯。一四八〇年，他人已在阿爾比；這是個富庶、地位重要的城鎮，並設有主教教堂，在此開業印書似乎前景可期。當地的義大利裔主教雷利可，可能就是邀他南來的人。阿爾比時期的紐氏印書不少，其中包括席爾維斯（即教宗庇護二世）一冊名叫《論愛與救贖》的短篇道德論文、一部《七賢士傳》、以原有刻圖再版的多凱馬達《默想集》，與對開的大本彌撒經本。其中彌撒經本係由里昂教會指定印刷，故銷售成績必然良好（事實上，里昂印刷商胡茲盜印的版本，幾乎與正版同時問世，可見其暢銷程度）。此後紐麥斯特離開阿爾比並返回里昂（可能是應里昂樞機主教查理·德波旁之邀），並於一四八五年在那兒印製出品質極優的新經本。此時的他重獲貴人相助，即多菲內的維埃納伯爵總主教卡同恩；德科米尼的《回憶錄》，就是在這位

總主教的要求下成書的。紐氏則依卡同恩總主教指示，爲他的主教區修訂舊有的每日頌禱，於一四八九年印畢；一四九五年他又與托派合夥，爲于澤斯主教區出版專屬的彌撒經本。身爲古騰堡的老同事，紐麥斯特終生勞碌又奔波四方，但印刷工作從未替他帶來恆產，甚至在一四九八年淪爲免稅的貧戶，並於同年被迫於昔日同事託派的印刷工坊擔任師傅。最後他寒微以歿，辭世的年份當爲一五〇七或一五〇八年。

與紐麥斯特同期的印刷匠，並非人人命運淒涼，亦有許多成就不錯者，未消多時即建立可觀事業。不過，他的例子予人不少啓示，我輩得以從中知悉，包括古騰堡、修埃佛的同事及其門生在內，最早期的印刷匠人，如何將印刷技術推廣至全歐。我們更因此而明瞭，爲何當時的印刷師傅總是浪跡天涯。印刷工作者行走各地，乃是早年的長期現象。十六世紀自始至終，甚至到了十七世紀，法國西南地區也多是這樣的人：在某個小鎮停留數月或數年，而後再度踏上旅程。居無定所的生活，並非這群人所專屬。只要拿他們跟同時期內專門雕鑿祭壇的比利時裔石匠一比，兩者間的相似便一目了然。許多十七世紀的印刷師傅，在雲遊法國各地之際，或同時遇上理想的結婚對象與足堪創業的資金，便把握機會在當地定居。再不然他們會在數年的間隔後，折回某個似乎具有開業潛力的城鎮，就此做起印書或賣書的生意。

二、開業地點

早期印刷匠的大本營，原爲美因茲和萊因地區；究竟有哪些誘因，使得這些人與他們的門

生、競爭對手，動身前往某些城鎮創業？身無分文的他們，靠誰提供資本？印刷術窮三百年之光陰，緩慢地普及到整個西歐地區，其過程又是如何？

決定印刷廠分布的主要因素，在於某些重要的人士與機構，能否從文本的普及與推廣中得到好處；在印刷肇始之初，情況尤其如此，因此本節且以印刷贊助人做為首先探討的對象。德羅昂，人稱布列安盧蒂亞勳爵，唯其實際握有的財富與權力只怕沒有頭銜威風（貴族羅昂世家中的某位幼子乃是他的先祖，其稱號由此而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文人，並在聖艾蒂安杜桂德立斯樂附近擁有一座華麗的法式城堡，迄今仍可見到，城堡周邊有科雷與富奎兩位印刷商，創業於一四八四年，其後並以九年的光陰，印製書籍十種，或可視為研究當時貴族階層文藝人士的理想題材。這些書本包括了《聖母院之逝》、《勒盧瓦家族亡者與德孟約翰的奇幻朝聖之旅》、《葛利塞利迪的耐性》、四百四十五行的詩作《貴族禱歌》、《皮耶德內桑禱詞》、《閨女夢》、《帶罪靈魂的金鏡子》、《布列塔尼服飾建築考》，此外當然還有《耶穌基督傳》與不可或缺的《亞里斯多德祕中祕》²³³。

像這樣的例子可不少。有些時候，即便是無足輕重的人物，也會邀請印刷師傅到家裡來，足見大家都對印刷術很感興趣。但整體說來，還是神職人員最有機會，也最有意願接觸這種新興工藝。教會從一開始便大力支持新的書籍複製法；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早期，在兵燹摧毀了許多教堂與教堂內的聖祭用書後，印刷術的珍貴之處愈發彰顯。多勒當地的教會，曾於一五〇八年唱嘆「聖歌歌本與其他晨禱詠唱所需之物」在法國軍隊劫城之際佚失，即是一例；神職人員豈能沒有

晨禱？印刷匠奮力工作以供應教堂用書，也是因其需求量大。貝桑松彌撒經本就具體說明了這點：一四八四年，該書先在薩琳斯印成，而後又在一四九七年由尼古拉·杜蒲雷翻印於巴黎，同年甚至出現邁伊僭造威尼斯印刷商戳印，在里昂盜印的版本，可見這類書籍的需求量頗多，必須多次重印才足以供應。許多地方的主教令印刷師傅前來成立印刷鋪，並遵照其需求印書，前述的紐麥斯特即如此銜命。其他還有許多例子，是由基層的教會人士，決定出資設置印刷工坊並打印彌撒經本與每日頌禱的。查理·杜蒲雷是當時巴黎一流的印刷商，從一四八二到八三年，沙特爾的大教堂裡，就有一位神職人員聘他前來，在教會的房舍裡架設印刷機，印製禱本及經文，以供教區使用²³⁴。

印刷匠在教會託付下所印的書，以聖祭用書最多，唯其他類別亦有之。《聖經》篇章與神學著作經常出版，以協助神學家完成艱苦志業。另外，為因應一般的教育目的而出版的古代經典和學生用書也不少。除此之外，勸人虔信的傳單與小冊亦常見，讀者就是廣大民眾。換言之，印刷機的存在，對於學界、教育界，與諸多信眾，幫助最大。首先誕生於美因茲的印刷書裡，最重要的當推《聖經》；十五世紀亨納堡的貝托爾德則在美因茲總主教任內，以「此藝只因天上有」形容印刷。日耳曼地區的主教，常常核發贖罪券給印書、賣書的工人與商人。神職人員對印刷的熱愛，似乎非常普遍；連《柯爾霍夫編年史》的作者，在看到最早期印刷商的努力結晶之餘，也在筆下讚嘆：「這是多麼趨近神的至善！讀了這許多印刷術造就的書本，我們心中又是多麼喜樂地讚美天主！」某個版本的《時代集錦》，則有如下的詞句：「晚近發明於美因茲的印刷，是藝術中的藝術，科學中的科學。幸賴這技術快速地流傳，智慧與知識的寶庫終於不再隱蔽，普世皆能

享有。無窮無盡的典籍，原本只有極少數的學生，能在巴黎、雅典，或其他大學城鎮的圖書館裡查閱，但如今卻譯成各種語言，廣泛流通於四海諸邦²³⁵。」

教會人士，尤其對希臘羅馬文學深感興趣者，率先成為支持印刷業的主力。因戈斯塔的哈恩，似乎也是因為在一四六六年得到樞機主教多凱馬達的部分資助，才湊足得以應邀前往羅馬的盤纏，這位主教並將自己的《默想集》交由哈恩印刷。在另一方面，樞機主教卡拉法，則於一四六九年邀請符茲堡的喬治·勞爾前來羅馬；這位師傅在一四七〇到一四八四年間，印出至少三十三本書，佩脫拉克的《歌集》也在此列。在巴黎與其他地方，相似的例證可以舉出好幾個。

為數甚眾的修道院，同樣歡迎印刷匠與他們為伍，就連修士也親自印起書來。早期有位名叫溫斯勒的印刷師傅，應修院之邀請，來到克呂尼²³⁶；奧格斯堡的約翰·梅特林傑，則在西多修道院院長德其雷的請託之下，從多勒來到迪戎，時為一四九〇年²³⁷。居常兄弟會的修士，在德國的羅斯托克架設一台印刷機；在其所印製的首批書裡，有一部將印刷形容為「寰宇知識之母」、「侍奉教會的女僕」，還說自己是「神的教士，非藉話語布道，但憑章句傳教²³⁸」。

到了一四七〇年，常設於阿爾高地區貝羅慕斯特的神職團體，已啓用自己的印刷機。聖烏里希與聖亞勿拉（或譯「聖阿芙拉」）的本篤會士，則先後於一四七二、一四七四，以及一四七五年，在奧格斯堡、班貝格、布勞貝倫各架設一台。舒臣黎的布萊蒙會修士，亦在一四七八年得到一台印刷機。紐倫堡的奧思會修士，以及愛爾福特地方聖伯鐸（聖彼得）修道院的本篤會士，復於一四七九年，分別加入修院印刷的行列²³⁹。義大利的發展情況與此非常相近。撇開迄無定論的蘇比亞科不談，佛羅倫斯一帶瑞波里的聖雅各伯（聖雅各）修道院，曾使用一台印刷機長達二十

年以上；菲奇諾的作品，只是其所印出的一部分罷了²⁴⁰。

此處舉證的，只是諸多史實的一小部分。教會固然積極參與印刷，但其在印刷時代所扮演的角色，仍不及手抄本時代重要，也無力繼續掌控文本的傳布。一旦印刷發展成真正的產業，光靠教會聘雇、資助、委託印刷商印書，或修院架設印刷機、修士學習印書，已不足以應付俗世的需求。假設印刷工坊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演進，牢固地蛻變為在商言商的店鋪，擁有獲利或至少損益兩平的能力，恐怕印刷難逃滅絕命運。就是因為這樣，綜觀所有由富有金主、教會人士籌設，或在他們鼓勵之下而創建的印刷坊，只有那些置身良好環境、有賺無賠的，方能永續經營。

找出市場需求何在，乃是重大問題。能否發掘經常光顧且數量眾多的客戶群（尤其如果就在附近，更是再好不過了），攸關印刷鋪的存亡。基於這個理由，知名大學城鎮一帶，總有印刷鋪林立，生意也都不錯，這點前面已經講過。從這個角度來看，探討巴黎地區首批印刷商的沿革，予人啓發尤深。當時的印刷書客戶，是以怎樣的心理、何種動機，邀請外地的印刷匠前來？巴黎的這一小群神職人員，就是最典型的樣板；此外，巴黎的條件最適合開業，印刷商還可自由調整經營策略，更使早期的當地業者成功創業、如願發達。

歷經英倫軍隊的占領，與十五世紀前半的戰火，巴黎的教育機構，一度陷入財務與文化的雙重危機。幸而在印刷術出現時，巴黎已經恢復知名大學城的地位，學術圈的八方豪傑，從法國各地與歐洲諸國慕名而來。法學、醫學、文學，皆是當地學府的強項，至於神學的水準更是特出。巴黎大學聘雇的二十四位書賈，由四位頂尖書商監督，嚴格遵循傳統的營運架構。他們打印的書

籍，盡是學界之必讀，其中不乏希波克拉底、西元二世紀的加倫著作及評注等醫學院用書；各種法典及其評注類的法學院用書；亞里斯多德、阿奎那、奧坎、司各托、十四世紀的比里當作品與維伊度的論文等哲學原理類書籍；以及文學院所用波伊提烏的算術書、赫利伍的約翰及德埃利的天文書。他們也替眾多的神學院學生，印製《聖經》與神學大師隆巴第的《名言錄》。隸屬大學的神職人員，如欲籌備宗教典籍圖書館，亦由同一批人供書；這些書包括了聖奧古斯丁、聖伯納、聖文德（或聖波拿文都拉）、德黎拉、德博韋（較富有的教士尤以收藏此類著作爲傲），與其他宣教勸善的作品，其中值得注意的包括十四世紀薩克森的盧道甫的《基督生平》，與德瓦拉吉納的講道書。另一重要的類目，爲告解神父的指導手冊，這種書的格式簡明、使用頻繁，比起那些將經院學者與教父言行奉爲圭臬的厚重對開書，既輕便又便宜，是以需求又多過於前述書刊。

在另一方面，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的著述，開始傳入法國。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巴黎的一流大學教師，對希臘羅馬研究的關懷與拉丁散文修詞的造詣，其實並不亞於十三世紀的前輩們；畢竟這些領域的知識從未完全失傳。再者，十五世紀後半，巴黎學界亦與義大利往來頻繁。數度前往義大利、後於羅馬臨終的費歇，便屬此潮流的代表人物。聖多瑪斯與司各托的教誨，他固然尊崇，熱愛古羅馬思想與拉丁文經典的赤誠，他也不加掩飾；一四七〇年前後，復古派以他爲中心，儼然自成一家。市面上欠缺正確無誤的古典書籍，這些人的感慨尤其深切。雖說授課時使用的手抄本參考書爲數甚多，但西塞羅、維吉爾、薩盧斯特等古代文豪的作品抄本仍然稀有，且疏漏訛誤亦不少。假使沒有印刷技術的新知識，欲準確而大量地複製這些古文本，簡直是奢

求。當時的巴黎，已然聽聞印書之法，使用印刷書也有多年時間；傅斯特與修埃佛，皆曾將存貨售往巴黎，其中傅斯特年輕時候便是巴黎大學德裔團體的一份子，並數度前往巴黎洽商，甚至以史塔波恩爲自己在當地的長期代理商。這樣看來，傅斯特的同胞、先前已成爲「索邦人」的海恩林，在一四七〇年決意外聘日耳曼印刷商前來，並在索邦校舍內安置他們，實屬順理成章。巴黎的第一架印刷機，就是這麼來的。負責印刷工坊營運的，則有康斯坦茨的戈林、科爾瑪的富里柏格（此君畢業於巴塞爾大學文學院，想必認識學生時代的海恩林），以及來自海恩林故鄉的助手克朗茲。在爾後的三年時間裡，索邦當局印出的書本，計有貝加莫的德巴爾齊札的《書信集》與《拼字辨正》、薩盧斯特以及馬克希穆的著作、西塞羅的《論職責》、瓦拉的《拉丁詞藻》與費歐的《修詞學》。後者係將正確的拉丁散文風格摘要成若干原則而成書，作者費歐亦對海恩林與戈林的印刷事業多有鼓勵。

但巴黎的人文主義圈仍小，通曉古語的文人更是極少，拉丁書市不多時即告飽和。尤有甚者，可供編輯出版的古代文本頗難取得，且在費歐前往義大利之後，復古派即無思想領袖。結果，戈林與他的兩位同儕只好改變印書宗旨，不再服務那些委聘他們前來巴黎的少數人文主義者，改替巴黎大學的一般客戶出書。所幸他們在索邦開業頗有獲利，故此時已有能力離開舊有工坊，更新設備並負擔另起爐灶的成本；新的印書坊極可能在規模上大過舊的，而事後證明，獨立於校園外的事業也能成功。不過，這群印刷匠並未斷絕與昔日客戶的關係，畢竟海恩林此後仍一度回到索邦印書，使用的還是曾經印過柏拉圖《書信集》、西塞羅《圖斯庫路姆之辯》、司各托《評注集》（此係針對隆巴第所著《名言錄》第四冊而撰）的印刷機。巴黎大學謹守聖多瑪斯的教

誨，學者中的領導人物盡是舊派，故同時追隨司各托主張與聖多瑪斯思想的腳步，亦喜愛古典文學。

新開的印刷鋪，位在雅格街上，名為「金色太陽」；除了偶爾印製古典文本（其中又以維吉爾最著），主要是以黑體字，而非羅馬體，印製中世紀的哲學、神學，以及教會法典書籍，以吸引更多讀者。這樣印成的書籍，還包括亞里斯多德部分的作品、德黎拉的《全本聖經小注》，與索邦印刷坊出版過的《名言錄》第四冊《評注集》新版。然而他們出版的最大宗，終究還是信仰類的禱詞頌詩、日常倫理的論文，與告解手冊；這些書不愁印了沒人買。隸屬此類的出版品，尚有德蒙卓卻的《牧靈團》、尼德爾的信仰作品、烏提諾的《布道集》，當然也少不了德瓦拉吉納的《黃金傳奇》。

第一批巴黎印刷商，之所以出版市場需求最殷的書本，是爲了追求更高的銷量，藉此穩固事業並提升利潤。這儼然是古今出版業最典型的局面：此後的每個年代裡，規模最大的幾家出版商，遲早都得把服務範圍從狹窄的學術市場中拓寬，同時供書給一般讀者。印製圖書館藏書與科學類出版品之餘，他們還必須印製價格較低、市場需求夠龐大的小本書，才能確保他們不時有重印再版的生意可做。

在戈林推出他的新印叢書之際，巴黎大學周邊的印刷商已不只他一家。「金色太陽」隔壁的隔壁，就是一間名叫「騎士與天鵝」的印刷鋪子，正對著夫羅曼塔街，幾乎與康布雷學院相望。兩位德國人經營著這家店，一是卡薩，擁有文學院碩士學位；另一位則是他的夥伴史托爾。卡薩

先是在一四七四年出版了長賣型的《牧靈團》，而後又與史托爾合作，將薩莫拉主教羅里加斯的《人類生命之鏡》編審完成；之後又於一四七五年印製帕爾馬的伯納德的法學著作《長期變故》、席爾維斯的些許論文、帕諾米塔諾的《格勒孟論議集》等。他們兩人與戈林相同，有些時候也會印製人文主義者喜愛的作品，諸如斐洛托的《拉丁文法入門》、埃布的《詩韻珍品》，以及西塞羅、薩盧斯特、泰倫斯、西尼加的作品。這些版本大都經過戈林的編修，且服務的有限讀者仍是同一批人，即巴黎大學的教師與學生。

印刷術在巴黎扎根的故事，大抵如斯。我們從中了解印刷鋪如何設立，印刷鋪發展的可能性又是如何成形；嗜書而與大學關係密切的神職人員，則是此間的功臣。我們也可以證明，在歐洲其他的大學城鎮，印刷業的發展大都相同，科隆就是最顯著的例子。稍後，萊登在十六世紀末建立起自己的大學，很快地發展成學術重鎮，而當地極其重要的印刷產業，幾乎與之同時興盛起來。普朗坦就在萊登待過一段時間，他的女婿則在當地建立起長久事業。接下來，艾齊維埃家族成爲萊登大學的指定書商；他們在當地的事業頗有可觀，或可視之爲當時最重要的出版者²⁴¹。以出版笛卡兒哲學名著《方法論》而聞名的梅耶，便在艾齊維埃家的附近開店。同樣地，當法國新教徒在索米爾創辦大學，並於十七世紀聲名大噪之際，周邊印刷業的茁壯也十分明顯；德斯波底家族等大型出版社，即活躍於當地²⁴²。

不過，吸引書商和印刷商的，並非僅止於大學校園裡面的客戶。總主教駐所與大教堂的設置地點，富有的教士眾多，亦是販售書本的好地點；至於司法法庭所在的各城鎮，許多律師常駐於此，印書求售更不愁乏人問津。跟神職人員一樣，律師也是書籍的大宗買家，購書手筆也許還要

更勝一籌。在宗教書之外，他們還購買成文法、習慣法書籍，至於通俗文學作品尤受喜愛。法國的書商與印刷商之所以選擇在君王法院的附近開業，常是爲了就近滿足諸多律師的需求。位於大學區的聖熱納維艾芙丘、聖雅格街沿線，幾乎匯聚了巴黎所有的印刷鋪，與絕大多數的書店。但在鄰近的幾條街內，仍有一群書商在法院區的建築裡另行開業，照樣生意興隆。這一帶便是佛拉爾於十五世紀創建主要店鋪的地方，十六世紀則有柯洛塞在此營業；至於十七世紀，此處又多了巴爾賓、狄耶里等商人，專門出版古典文學的重要作品。眾書商的店面與攤位林立於雜貨商、布商近側。光顧書店的客人，有君王法院成員、檢察官、辯護律師、爲數龐大的原告與被告；就連那些把法院區當成散步去處的社會名流與富商，也來插上一腳。店內陳售的時事與文學書，還比法學參考書來得多，且通常已譯成法文。在法國境內其他省份，乃至於其他國家的法院區，都有此類書店的蹤跡。在盧昂和普瓦捷，許多書商乾脆直接在法庭內設攤；隨後到了十七世紀，海牙書商的店鋪，甚至與議會設在同棟樓裡²⁴³。

只要是大學、高等法院或法國君王法院的所在地，就必然存在對書籍的需求。十五、十六世紀的書商與印刷商，受此吸引前來立業，而這也解釋了印刷與售書的重鎮何以落在特定地區。十六世紀末葉，前述公家機關坐落的所有歐洲城鎮，皆有相當數量的印刷鋪與書店。此時許多新的大學正在設立，新教盛行的地方尤然（萊登與索米爾可以爲證）；而新興學府的誕生，使得新創的印書、售書事業也找到了自己的市場。但在歐洲多數地區，尤其是天主教國度，情況則大不相同：景氣的窘迫，令法院區裡的書店難以獲利，同業競爭轉趨激烈。於此同時，各大學的重要地位不復以往，校園附近的書籍生意不時傳出倒閉。此後，書商與印刷商另謀他途，改於其他地點

(多半為次要城鎮)開業。在尋找穩定客源的過程中，他們不再仰賴高等法院，而接起了有一陣、沒一陣的小生意。為求溫飽，他們替人印製招貼告示、官方公告以及宣傳小冊；此係政府組織於十七世紀擴張，帶來新的印刷需求所致。在另一方面，耶穌會士與奧拉托利會士（俗家修士），活躍於教育界，在許多城鎮設立學院，創造新的工作機會，也吸引印刷商前來。其中，耶穌會學院帶來的商機尤其可觀，因為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教科書與其他授課用的印刷品，還包括信仰讀物與爭辯教義的傳單；後兩者儼然是耶穌會本質的一部分。當時有個叫鏃矢鎮的小地方，原本沒有印刷業，但在一六〇三年，耶穌會士於當地建立一所學院，並帶來一位名叫瑞解的印刷商。此君不僅替該校與耶穌會修士團印製許多書本，也採用他們的識別圖樣做為出版商標誌。在他之後，計有三家印刷商與為數更多的書商，選擇在這間學院的附近開業。

話雖這麼說，倒不是只有在鏃矢鎮這類地點創業的印刷商，才得以生意興隆。會買書的人，也不是只有教士與律師。富有的商人、生活優渥的中產階級，甚至商業城市裡日進斗金的工匠，對於打造個人專屬的藏書閣，皆興致盎然、蔚為風潮；此種現象在十六世紀尤然。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大城市裡，總有勇於投資的生意人，願意資助印刷、出書銷往外地。前面介紹的小布伊爾，即以商人身分，建立起里昂第一家出版社²⁴。此外，萊比錫的皮革商與毛皮商，曾於十六世紀提供資本予當地的書商；普朗坦在安特衛普創業之際，同樣不愁找不到金主²⁵。這些大城與歐洲各地都有貿易關係，利於生意人結帳催款，書籍原料與成品的運送也很方便。

因為水路的運費比較低廉，印刷商也會選擇在港埠一帶建立事業。盧昂印刷業的興起，便是

因為書本運往法蘭德斯、低地諸國、西班牙，皆可由當地的碼頭出貨；外銷英格蘭，更以盧昂為必經之地。在另一方面，當地印書如欲運往巴黎，只消以貨船溯塞納河而上。南邊的西班牙，則有克羅伯格家族透過塞維爾港口，出口書本到美洲。到了十八世紀，自里耳由海牙轉往鹿特丹營業之後，培爾與勒克勒格的著作外銷法國、英格蘭、日耳曼北部地區，遂更加便捷。其他吸引大型印刷社前來開業的港都，尚有十五世紀的呂貝克、十六世紀的安特衛普、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等。

三、地理與出版

接下來，本書將試圖釐清印刷從美因茲發源地傳往歐洲諸國的確切時間，並逐一細數從一四五〇到一八〇〇的這三個半世紀之間，各地出版重鎮的位置與概況。

本世紀的讀者對科技革命習以為常，或許覺得印刷術的傳布相當緩慢。然而，十五世紀的歐洲人，因交通不便、技術原始，遭逢的難處實難盡數。而在一四五〇到一四六〇年間，只有美因茲幾間工坊的少數人得窺印刷之祕，偏偏以當時的標準觀之，這又是種極其複雜的工藝。至於新建的印刷鋪，在原物料的取得上多所不便（如陽文字範需要鋼鐵，陰文字模需要銅，字粒本身又要鉛錫合金），可謂困難重重。就連印刷所需的技術人員，也甚為匱乏，舉凡雕模匠、鑄字工、排字工，盡皆不足。若把前述總總一併納入考慮，則印刷術的傳播一點也不算慢。再怎麼說，一個仰賴各種不同技術與方法而建構的新產業，都不是一蹴可幾；況且大量印製的書本如欲開闢銷

售通路，有賴新商業關係的建立。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印刷術的傳播，其實快得出奇。此外，十五世紀的人，乃是特別積極於創新的一群；只消回顧幾個歷史上的時間點與當時的地圖，即足以證明這點。

一四五五到一四六〇年間²⁴⁶，美因茲出現數家印刷工場；我們對這些工場所知甚少，唯一確定的是，它們當中以傅斯特與修埃佛所經營者最爲重要。時值印刷業誕生的最早期，但已然有印刷商規畫於大學城內設置商業通路；傅斯特與修埃佛，除了供書給法蘭克福、呂貝克與昂熱的客戶，更準備在巴黎開設書店²⁴⁷。同樣在早期階段即有書店販售印刷書的，還包括亞維農地區²⁴⁸。在一四六〇到一四七〇年間，印刷的版圖顯著擴張；而在印刷發軔的德國，相關行業的組織亦頗有進步，在這個礦業發達的國度裡，繁榮的商業都市林立，其中住著不少技藝高超的金屬工匠，亦有富庶的商人階級扮演新產業的資本後盾。到了一四六〇年，曾經做過彩飾師傅與主教書記的曼特林，業已於史特拉斯堡開設自己的印刷鋪。但過不了多久，他便得面對來自同業的競爭；這些對手包括主教的典璽官埃格史坦、以「瘋狂字母R」做爲標記的神祕印刷商路許，以及後來投入此業的許多人。大約在同時，可能當過古騰堡門生的菲斯特，在班貝格成立印刷鋪，旋即開始出版插圖書。一四六五年以降，許多曾經在古騰堡與修埃佛麾下擔任印刷師傅的匠人，各於不同城鎮開業：哈璦的柴爾，原爲美因茲主教區的教士，後來於一四六六年在科隆開業；魯波爾一四六八年於巴塞爾開店；克卜佛與森臣斯密在一四七〇年選擇了紐倫堡，且同時期的當地尚有柯貝格投入印刷和出版。奧格斯堡的第一本印刷書，由翟納於一四六八年出版；至於義大利的第一本印刷書，則在一四六四或一四六五年，由來自德國的史威罕跟潘拿茲，在蘇比亞科（一說爲羅馬）

的修道院裡印成。同樣是德裔，施派爾的約翰在一四六九年的威尼斯，印出西塞羅的《家書》；隔年，前文提過的紐麥斯特，也在福里尼奧開始為人印書²⁴⁹。

就在一四七〇到一四八〇的十年間，印刷產業的成長步伐又見增加。施派爾於一四七一年出現了印刷店鋪的蹤跡，其他如烏姆（一四七三）、呂貝克（一四七五）、布雷斯勞（一四七五）與其他許多德國城鎮，亦大抵如斯。在同樣的十年間，義大利的威尼斯，以德裔為主的印刷商亦可說不少；特雷維的印刷鋪出現在一四七〇年，而費拉拿、米蘭、波隆納、那不勒斯、帕維亞、薩維良諾、特雷維索、佛羅倫斯、耶西、帕爾馬、蒙多維、布雷西亞、費威贊諾、曼圖亞等地的印刷鋪，於一四七一到一四七二年間進駐，旋即擴散到其他城市。在法國方面，巴黎的第一本印刷書，由戈林與其助手在一四七〇年的索邦校園出版；到了一四七三年，勒華抵達里昂，憑著小布伊爾的金援，打印樞機主教羅泰爾的《綱略》。在那之後，巴黎與里昂的印刷鋪，隨著日耳曼工匠前來創業而激增。昂熱與土魯斯，在一四七六年開始有印刷機投產，普瓦捷則在一四七九年加入此一行列。波蘭的印刷坊早在一四七四年於克拉柯夫現蹤；至於低地諸國則有狄耶里、馬騰斯與西伐利亞的約翰於一四七三年的魯汶開業，到了一四七七年又有豪達的德利烏，發行一連串的插圖書。就連歐陸以外，亦有英格蘭商人卡克斯頓，在科隆習得印刷術、在布魯日執業之後，於一四七六年回到祖國，設印刷機於西敏寺內。西班牙的許多城鎮，同樣變成德國印刷匠活躍的舞台。

截至一四八〇年，西歐各地擁有印刷機的城鎮，超過二百一十個；其中義大利大約占了五十個，德國約三十個，瑞士五個，波希米亞兩個，法國九個，荷蘭八個，比利時五個，西班牙八

個，波蘭一個，英格蘭四個。從那時起，印刷書的使用，才算的上是「普遍於全歐」。德國與義大利的大型出版社陸續誕生，且與四方皆有頻繁的生意往來。就義大利境內而言，地位稍顯重要的城鎮，至少都有一間設備精良的印刷鋪，有些地方甚至成爲與德國大城平起平坐的出版重鎮；如此榮景，遠道而來的德國印刷匠，居功自是不小。也因爲威尼斯在地理位置、富庶程度與智識活動上皆具優勢，綜觀一四八〇到一四八二年間問世的搖籃本，便會清楚地發現，這個美麗的水都，同時也是歐洲印刷產業的首都。光是學者伯格考證出來的威尼斯印刷書，出版於一四八〇到一四八二年之間者，即多達一百五十六版²⁵⁰，這還不包括亡佚、失傳與不可考的版本。大型出版社的經營者，包括楊頌、賀波特、曼佐萊斯、毛佛特、科隆的約翰、布拉維斯、斯寇托、托爾提、吉拉丹哥、拉特鐸等等。再來則有米蘭的印刷商，即帕卻爾、查洛提、瓦達佛等家族經營的事業，印製出各種不同版本的經典拉丁文著作，其中八十二個版本有案可考。奧格斯堡的印刷商，產量排名第三，總計有六十七版；在這個地圖繪製與木刻板畫的大本營，索格、匈斯伯格和碧姆勒，製作出各式插圖書籍。同期的第四名應爲紐倫堡，共計發行五十三版的印刷書；柯貝格家族在此建立起當時最多產、最有條不紊的印刷機構。佛羅倫斯以文化特色著稱，其印刷商所印之書，主要供應在地的需求，同期的出書版數達四十八。萊因流域的教會中心、大學城鎮，首推科隆；這裡是昆泰爾家族跟科爾霍夫家族開業之地，出版書本同樣以宗教及學術類爲大宗，文獻記載的印刷書計有四十四個版本。第七名以下的城鎮，依序爲巴黎三十五版，羅馬三十四版，史特拉斯堡二十八版，巴塞爾二十四版，以及豪達、波隆納、特維索、里昂、帕度阿、台夫特、魯汶，分別由從二十五到十五版不等。

這個時候的美因茲，已然失去一些原有的重要性。雖說中德、南德地區，坐落著許許多多的印刷業中心，但義大利的印刷商，數量與產能儼然超越德國同業。首批採用羅馬體活字排版的古羅馬經典與義大利文學名著業已上市，並採用當時就地購得的優質紙張打印；至於法學書、宗教書，則以哥德體與異體付梓。至一四八〇年，義大利與德國的印刷商為數頗眾；相形之下，在英格蘭、義大利，甚至法國，這群人仍是「稀有動物」。縱使巴黎唯一的出版社（由戈林經營者）乃是公認的大商家，當地講師與學生所需書本，還是得從德國進口。里昂的出版業，存在也有許多年，只是規模一直很小。

了解了前述史實後，往後幾十年的印刷業發展，當更容易理解。西班牙與英格蘭，新設了數家印刷工坊，但還是得仰賴進口書籍。倒是法國的印刷業起步雖晚，卻在十五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急起直追。一四八〇年的法蘭西，設有印刷機的地點不過九處，到了一五〇〇年，已有印刷工坊啓用的城鎮，驟增為四十個。更重要的是，在馬爾相、佛拉爾幾位師傅的努力下，首府巴黎的印刷業頗有進展；稍後，里昂的印刷業也轉趨熱絡，當地的德裔匠人特雷瑟爾尤其多產。類似的演進也發生於北德地區，只是不那麼引人注意而已。呂貝克即擴張成當地的出版中心，同時也是該產業向斯堪地那維亞擴張的中繼站。反觀德國的中南部，先前已經存在的印刷據點，雖然持續上個時期的榮景，但幾乎沒有大進展；唯一的例外是萊比錫。卡克洛芬、斯托克爾、羅特赫、蘭德斯堡等人，紛紛在此營業，萊比錫就此蛻變為新產業的另一重要根據地。同時期的義大利，一方面有印刷業傳往較小城鎮，另一方面大型印製廠加速集中於威尼斯，唯米蘭書業竟顯露衰退跡象。

欲衡量產業的演進情況，或可細數一四九五至一四九七年間印成的書本。光是可考者，即多達一千八百二十一個版本，其中有將近四分之一，約四百四十七版是來自大印刷社眾多的威尼斯。這無疑是威尼斯大出版家各逐勝場的年代：除了羅卡泰利家、貝維拉夸家、塔庫伊尼家、托勒沙諾家、阿爾都斯家族之外，還有平希歐和德賈戈萊的出版社。行文至此，假設我們要說最關鍵的出版業重心，就在威尼斯，那麼，緊迫在後的兩座大城，當屬巴黎與里昂。

這段時間問世於巴黎的書籍，計一百八十一個版本；當地也許沒有太多大型的印書機構，但印刷商與書商的數量卻多不勝數。里昂推出的各版書籍，已知者有九十五版，前述的出版商特雷瑟爾尤為里昂業界中的翹楚。產書比這稍少的是佛羅倫斯，而萊比錫則是首度擠進印書重鎮的排行榜。戴芬特爾同樣初露頭角；這主要是德布雷達以及帕夫洛特家族印刷社的功勞。接下來是米蘭，以帕卻爾、辛臣斯勒為其主要出版社經營者。至於史特拉斯堡，則為格呂寧格、富拉克開業之地。在這之下尚有科隆、奧格斯堡、紐倫堡，以及巴塞爾。

這也就是說，在十五世紀結束之際，即印刷業肇始之後五十年，歐洲人至少已完成三萬五千個版本的印刷書，如將冊數加總，最保守估計也有一千五百到兩千萬本；印刷鋪的分布，全歐各地皆有²⁵¹。大量製書的產業中心，首見於德國，傳向義大利，最後出現在法國。僅半世紀時間，設置起印刷機的城鎮，便超過兩百三十六個。

十六世紀仍然延續如此成長，不時有新城鎮加入印刷行列。這個世紀的頭五十年，經濟成長異常迅速，人文思維反映在文學上，是以印刷欣欣向榮，已至空前地步。此階段的書籍事業，由

財力豐厚的資本家把持，成爲其他時期難以望其項背的龐大產業；值此印刷的黃金年代，出版變成一門大型的跨國生意。此時引領風騷的出版家，當推富羅本、柯貝格家族、碧爾克曼、阿爾都斯、尚·佩堤等；他們多少沾染了人文主義色彩，就連智識份子圈的知性交流，也得仰賴他們遍布全歐的生意人脈。雖然小本生意仍在許多城鎮持續竄起，書籍事業的主流，則因金主、投資者的鞭策，開始轉往最有利可圖的市場，並於大學城市、商業要地裡，覓得最多需求；這點在低地諸國尤然。早在出版鉅子普朗坦崛起前，安特衛普已是擴張神速的商業之都，並以黑馬之姿，於十五世紀末成爲第二大出版中心；起初次於戴芬特爾，旋即迅速超越之。安特衛普的出版商，以滿足富有的商人與中產階級客戶爲宗旨（商業大城裡，這類的客戶頗多），使用法文與法蘭德斯文，印製各種插圖版的騎士傳奇與信仰作品，供人消遣賞玩。過不多時，這些匠人又開始印製外文（如英文）書，外銷他地，安特衛普便這樣迅速地變成低地諸國貿易舞台的主角。一五〇〇到一五四〇年，低地諸國的一百二十三家印刷鋪，近半（六十六家）位於安特衛普；至於這個區域出版的書籍約莫四千種，其中也有兩千兩百五十四種在安特衛普印成，儼然過半²⁵²。

在萊因河與易北河間，富庶的日耳曼城鎮，則有財力豐、素養高的中產階級定居著；這裡的書籍生意，於十五世紀末與十六世紀的前二十五年，持續拓展其規模。史特拉斯堡，因急遽發展而成爲最重要的印刷之都，特別值得一書。路許，是曼特林的女婿，並於產業起步之初，資助許多書籍的出版，同時於一四六六至一四八九年間，跨足造紙生意；他有一位名叫馬丁·修特的姻親兄弟，於一四八一至一四九九年間執業，地位也很重要，只是沒有於一四八〇至一五一〇年間執業的普魯斯或於一四七六至一四八四年執業的納布洛哲那麼活躍罷了。在此同時，書籍插圖的

技藝，亦於此地發展起來，並在格呂寧格於一四八二至一五三一年所打印的書本裡，昇華為極致之作。史特拉斯堡的印刷書，品質卓越，印刷社因而享有盛名，訂單來自四面八方。格呂寧格即曾將某版書籍一口氣印出一千冊，全數賣給奧格斯堡知名的出版商匈斯伯格；尚·修特印製的書本，最遠銷往萊比錫、維也納、米蘭，由書商代售²⁵³。

然而，巴塞爾的重要性，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那裡，人文主義者阿默巴赫，經手活絡的書籍生意；鄰近的若翰·佩特里（後文將有詳述），則把重量級的神學、教會法典論文印製成書，並分十一巨冊出版聖奧古斯丁作品。他們兩位分別在一五一一與一五一三年辭世，之後又有富羅本，憑著女婿拉赫納之助，擴大既有事業。他大量使用羅馬體印書，並以阿爾都斯的字體為基礎，設計自己的斜體字；此外，他也設計了希臘文活字，後來還將字粒賣給貝德、陰文字模賣給羅特赫。一五三六年，一度由修埃佛經營的鑄字工場，被他給買下來。為了委人刻製圖版，用以打印插圖、書名頁、帶狀紋飾與大寫飾字，他與多位畫壇巨匠接洽，先是起用了葛拉夫，一五一六年後又聘用霍爾班家族裡的漢斯與安布羅瑟。替他審核校樣的有兩位，一是親家兄弟波尼法·阿默巴赫，一是思想家雷納魯斯。至於他個人則替伊拉斯謨斯編審其作；這位人文主義大哲，原本只打算拜訪富羅本幾天，後來竟在當地逗留了三年多（一五一四至一五一七年）。

在多數的德國大城，各家印刷社皆從年初忙到年尾。美因茲那兒，修埃佛創立的老字號印刷鋪，便長期活躍；創辦人之子、修埃佛二世，亦嘗與馮胡騰的友人合作，在美因茲印刷馮胡騰的著作。修埃佛二世擁有大量的印刷器材，後來大都轉賣給富羅本，並不時添購新工具。奧格斯堡方面，則有拉特鐸的鋪子，在一五二〇年之前印製許多聖祭用書，其中不乏《康斯坦茨彌撒經本》

等插圖精美的傑作。老若翰·匈斯伯格，亦在此地為馬克西米連皇帝服務，印書甚多，其中包括知名的《至親謝忱》；這本以譬喻方式歌頌皇帝婚姻的著作，採用一種仿照皇庭書寫體而鑄的新字體打印，法拉克圖體即由此衍生而來。漢斯·歐特瑪更在這裡出版蓋柏與馮凱瑟堡的講道書，身後並由席范·歐特瑪承襲父志，印刷許多路德教派書籍。約莫同一時間，米勒出版了不少普廷傑與馮胡騰之作。在另一頭的紐倫堡，此時仍見柯貝格家族生意興隆，不過其他印刷商亦稱重要：一五三二年之前的希羅尼穆·賀澤爾尤其多產，至於新增的重要印刷事業創建者，則有一五一〇到一五三五年間執業的派普斯、一五一四年到一五四〇年的岡特內赫，以及一五一九年到一五五〇年的佩特雷伍等。安德列亞的印刷鋪較小，卻也專門刻鑄了全新而優雅的法拉克圖體活字，並印刷《凱旋車駕》一書與杜勒的神學著作。

路德教派的宗教改革開展之初，德國業已擁有許多印刷大城，許多未於前文詳述，但重要性並不遜色，亦值得一書，萊比錫即是一例。路德在世的時候，乃至於十六世紀後半，則有許多新興的製書中心發展起來（詳見後述）。不過，現階段本書的探討重點，著眼於天主教大城科隆的重要地位；十六世紀早期，其印刷業遭逢衰退，那時當地僅亨利赫·昆泰爾一位印刷商，出版繁多的神學論文集，後來則因上千學生湧入鄰近的大學，需求驟增而火力全開。一位名叫希托普的出版商，甚至拜託外地的印刷商協助代工；巴黎、巴塞爾、圖賓根的印書鋪，都曾受雇於他。他的商場人脈橫跨全歐，還與賀倫肯合夥，於巴黎、萊比錫、威登堡、布拉格經營分店。另外，十六世紀人文主義者布斯赫與默美里烏編輯、瑟威柯努出版的拉丁文作家作品，也在科隆問世。書商碧爾克曼，於一五二六年收購一印刷鋪，並自安特衛普聘來印刷匠後，又在倫敦設立分店。類

似的事業還有很多，科隆也因此化身爲日耳曼的印刷重心，也許還一度成爲全德最大的印刷之都（如果這點可從法蘭克福圖書市集的目錄來判斷的話）；倒是時至十六世紀末，其排名退居第三，輸給法蘭克福與萊比錫²⁵⁴。

德國的各個城鎮中，十六世紀之前不會有過印刷機，但在十六世紀時設置，並至少使用過一段時間的，多達一百四十處。法國的印刷產業也迅速擴張，十六世紀前半尤其如此；一個接著一個的城鎮，紛紛投入印刷行列。學者雷普路即曾詳列一五〇一至一五五〇年間設立的三十九間印刷鋪，另創建於十六世紀下半者亦有四十家²⁵⁵。巴黎、里昂，和威尼斯一樣，成爲印刷書產量最多的歐洲城市；其印刷鋪數目之多，即便僅列舉大者，仍恐枯燥冗長，姑且按下不表。一五〇〇年起算的一百年裡，計有兩萬五千種書籍在巴黎印出，而里昂也有一萬五千種；相較之下，盧昂、土魯斯、普瓦捷、特魯瓦、昂熱、貴諾布爾、波爾多等地，產量則落後多矣。雷奴亞的著作記載，光是一五三〇這一年，巴黎就印出兩百九十七種書，里昂亦有一百一十五種；至於康城印出的五種、盧昂的五種、普瓦捷的四種，以及波爾多、貴諾布爾與土魯斯分別印出的三種，反而比不過史特拉斯堡於同年印成的三十二種，與產自阿格諾的十九種²⁵⁶。至此，法國的活字印刷，儼然分成兩派，而有地域之別。北方書市由巴黎的產品稱霸；特魯瓦與盧昂的書商，尤其是後者，則爲彌補首都產能之不足，常常接受巴黎書商的訂單。一方面，巴黎與東邊科隆、巴塞爾的印刷匠密切聯繫，有時也吸引這兩個地方的匠人前來設置印刷坊；另一方面，巴黎與諾曼地則有印刷商西進，印書銷往英格蘭市場，或直接到英國開業。講到法國南方的印刷業，則是里昂的天

下；當地書商不僅跟巴塞爾、萊因地區做生意，其書本市集規模之大，亦促使外銷成爲里昂業者重要的營收來源。這些書商和海外同業的往來頻繁、互動良好，其中以義大利書商爲最。季翁塔家族的分支事業，遍及威尼斯、佛羅倫斯、里昂，乃至於西班牙境內，便是這個時期的事情；還有許多里昂出版商，翻印義大利出版的書本，成爲威尼斯同業的勁敵。他們多半在土魯斯設分店，而馬德里、薩拉曼卡、布爾戈斯、巴塞隆納亦有其代理商。

十六世紀將屆時，義大利的出版業並不如法國、德國那般活力四射，此係義國當時環境並不適合產業快速擴張的緣故。威尼斯依舊是業界的龍頭老大。十七世紀初，威尼斯印刷品在德國的常見程度，甚至超過安特衛普的產品。阿爾都斯的出版社，持續出版馳名海內外的書籍，另外季翁塔家族、薩比歐的尼柯里尼、瑪寇里尼家族、帕納尼尼家族，皆大量印行各式讀物。然而，昔日的質感，如今似乎不復見；出版商重量不重質，印藝上鮮有創新。約在一五三〇年過後，相關行業的榮景明顯降溫。雖說布拉多家族所印之書仍具水準，梵蒂岡出版社也在反宗教改革派歷任教宗的維護出版政策下，於羅馬堅守高標準，米蘭的印書業卻持續走下坡；縱有帕卻爾家族、波納寇塞、雷格納尼、勒席內爾的印書成績，亦難挽回。波隆納的處境相似，只剩法耶里家族與波納齊等，獨撐大局。佛羅倫斯一樣慘淡；季翁塔家族與其競爭對手朵尼家族的出版品，至此雖然愈來愈多，但也僅供應當地而無力外銷矣。

西班牙的印刷業，在此一時期裡幾無進步。當地印刷匠甚爲保守，字體一概採用粗黑體，就連古早形式、舶來風格的木刻板，亦沿用至十六世紀中葉之前。樞機主教席梅內茲，雖得人文主

義者德內布里亞（相傳爲史上第一本西語文法書作者）襄助，於一五一四到一五一七年間，在埃納雷斯堡委託德布羅加（此君可能來自法國南部的小鎮布羅加斯，故得此姓）印出多語版《聖經》，但在薩拉曼卡、巴塞隆納、塞維爾（克羅伯格家族在此發行騎士冒險故事）之外，印刷業簡直是一片死寂。十六世紀後半的馬德里，印書活動略見增長，稍後並於十七世紀大幅躍進；只可惜，西班牙大部分地區，還是繼續仰賴外地進口的書本，其中又以里昂、安特衛普印書爲大宗。²⁵⁷

但在另一方面，英格蘭的書市卻是自給自足，足見其書商與印刷商的成功之處。²⁵⁸歷經宗教改革，英格蘭與歐陸天主教國家幾無往來，助長了書籍自產自用的風氣；掌權的都鐸王室，則厲行保護主義，保護本土產業。這個階段的英國印刷史，或可視爲特殊的個案。其實，早在十五世紀，英格蘭即有人試圖吸引歐陸的出版商與印刷商前來；一四八四年的一項法案，更使一般外籍工匠所蒙受的各種限制，在書籍從業者的身上放寬。十六世紀的頭十年，英格蘭主要的印刷商，一律來自歐陸。來自亞爾薩斯省渥特一地的德沃德，接續卡克斯頓的事業，截至一五三五年，已印出七百餘部作品。法奎斯與頰森，則雙雙以諾曼地人身分，成爲欽定印刷師，於一四九〇到一五三〇年間，他們的印書鋪，印出四百多種書籍。據考，諾泰瑞也很可能是法國人，而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一四七六到一五三六年間的英格蘭，有多達三分之二的印刷商、書商、裝訂匠是外國人。他們的器材與工具，多半源自法國；就是在蘇格蘭，麥爾蘭使用的字體，也與瑪內夫的活字極像，可見那兒的情況亦同。專銷英國的書本，先是從巴黎、盧昂出口，不久安特衛普也加入此一行列；同一時間，倫敦則先後出現佛拉爾、雷尼奧等數位巴黎書商的分店。

隨後，愈來愈多土生土長的不列顛人，投入印刷工作，競爭更趨激烈，迫使本地人以行動對抗外籍同業主宰印刷業的局面。以一五二三年的命令為例，外籍印刷商倘若收受非英國人爲徒，或是聘用超過兩位外籍師傅，概以違法論處。到了最後，當局索性在一五三四年施行新法，廢除一四八四年的解禁法案。一五四三年，英國印刷商的印書水準已經頗高，亨利八世龍心大悅，遂將英國國教祈禱書的專印權，賜予格拉夫頓與懷卻曲二人。一五五七年，瑪麗女王下詔，書商與印刷商總算得以組織出版同業公會。

英國印刷書的成長，不曾間斷。於一五二〇到一五二九年間，共有五百五十種書印出；一五三〇到一五三九年，增爲七百三十九種；一五四〇到一五四九年，更達九百二十八種。比之於一年產書三百種的巴黎，如此數量或許遜色，卻也反映出可觀的進展。十六世紀後半，市場上出現更多書，新建的印刷社也愈來愈多。爲了控制印刷機構的產量，並確保此行業的擴張不致造成異議書刊激增，當權者於一五八六年發布詔令，命業者集中在倫敦開業，同時限制印刷工坊的總數。一六一五年，倫敦的印刷商數量，固定爲二十二家；倫敦以外地區，只准牛津、劍橋兩大學的印刷商營業，直到一六六二年，方有一家印刷社，循兩大學之前例，獲准於約克郡設置。一六九五年，這項苛刻的法規總算廢除，此後印刷業再度成長；到一七二五年，舉凡曼徹斯特、伯明罕、利物浦、布里斯托、賽倫塞斯特、艾塞特、烏斯特、諾威治、坎特伯里、坦布里奇威爾斯、約克郡、新堡、諾丁罕等地，皆有印刷機。

是宗教改革，促使英格蘭幾位君主干涉、中斷了英國與歐陸間的書籍貿易。也是宗教改革，

刺激德國印刷工坊的地理分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一五二〇年起，路德教派的改革運動，開始影響日耳曼社會。十六世紀初期的萊比錫，原本是個繁忙的印刷中心，成功的印刷業經營者，包括蘭德斯堡、斯托克爾、譚納，以及最出色的羅特赫；然而，同時擔任「選侯」（神聖羅馬帝國的各邦領袖與總主教中，有權共推皇帝者）的薩克森公爵喬治，卻是死忠的天主教徒，並對宗教改革文獻的出版商展開迫害，萊比錫的出版業因此不復往日雄風。斯托克爾出亡至艾林堡，即為規避圖書審查。另一方面，路德派的運動，竟替威登堡的印刷業營造出蓬勃發展的適切環境。一五〇二年，威登堡一帶新建一所大學，吸引印刷商踴躍能堡於一五〇八年前來；除了一五一六年出版的路德早期作品集，一五一七年問世、名滿天下的《贖罪券論》，也幾乎可以斷言為勞氏所印。從那年開始，威登堡的印刷生意，發展轉趨穩定。一五一九年，萊比錫的梅爾希奧·羅特赫，在此地設立分店，並由其子梅爾希奧二世於一五二〇年親自坐鎮。這家印刷鋪，數度重印了多種版本的路德譯本《聖經》，發行的全是路德一家之言。另外，多林也擁有一間印刷坊，印製路德版的德文《聖經》；此後不多時，諸如席爾冷茲、約瑟夫·克魯格、魏斯、魯伏特等眾多同業，亦獻身於改革派書籍的發行。大型印刷社推出的路德作品，發行冊數動輒數十萬；在支持宗教改革的城鎮，路德的譯本、宣道書，乃至於與人筆戰的文章，翻印、盜印者難以勝數。也是從這時開始，德國的印刷鋪，便專門以地方語文，印製成本低廉的論文小冊與文宣品，透過四處遊走的小販，將反叛精神遠播各地。

本書將在後文評估此種傳播行為的結果²⁵⁹。現階段的重點，在探討影響德國書籍產製的各種因素。早期，當地的印刷鋪泰半集中於南部地區，且數量甚為龐大，而北德地區的印刷鋪在大約

一五二〇年之前皆是生意清淡；然而在一五二〇至一五四〇年間，北德印製的書本驟然增加。雖說北部業者曾在一五四〇至一五七五前後陷入衰退，但終究於十六世紀末葉東山再起。這麼一來，拜路德與宗教改革之賜，南德書籍產業凌駕北德之勢，在這個時期裡也就不那麼明顯了。

德國以外，新舊教之爭，一樣方興未艾；在此同時，十六世紀後半的歐洲，正值惡名昭彰的經濟蕭條時期，一些出版重鎮經不起打擊，就此凋敝，甚至滅絕。宗教與經濟的雙重變局，帶來許多重大的影響。喀爾文學說在法國傳播，許多南方的城鎮，因而出現新的印刷鋪，只是這些清一色支持新教教義的事業，多半只能短暫經營。約莫從一五五〇年開始，里昂的產業衰退了，後來才一步一步地逐漸顯赫起來，直到一六三〇年，當地的書商與印刷鋪老闆，因為經常接觸新思維，甚或直接改信喀爾文教派；他們集體出走里昂，不只是為了逃避迫害，更是因為麾下工匠不時罷工、爭權益，以至於他們不得不另覓平靜處所開業。一如路德對威登堡的影響，喀爾文的改革，連帶將日內瓦打造成舉足輕重的印刷中心。這個城市不僅鄰近里昂，其勞動人口訓練有素，也比里昂工人聽話；過不了多久，日內瓦的周邊已是紙廠林立。除了大印刷社遷至此地避難，飽受失業煎熬的里昂印刷師傅，亦很快地向這裡移動²⁶⁰。

第三個要講的，是法蘭克福。這個城市，憑藉著發達的市集，在里昂與日內瓦的競爭中，坐收漁利。一五一一年，這裡才有印刷業，說來起步甚晚；但到一五三〇年，埃傑諾夫在此地開業，後來還變成大出版家，而法蘭克福的大市集旋即擴張為全歐出版事業的集散要地（後文對此將有詳述），各地的最新商品群聚於此供人參觀。一六二五年之前，這裡一直是歐洲書籍交易的

天主教復興運動，或所謂的反宗教改革運動，約莫在一五七〇年後發揮其影響力。既有的書籍產業版圖，因著這股風潮，呈現另外一種變化。根據特利騰大公會議的結論，教會應制定官方版本的聖祭儀式經本，並順應羅馬天主教的實用需求，修訂舊有文本；天主教的印刷鋪受此激勵，獲得重生。一些富有的出版商，在教會或天主教貴族的支持下，獨占了聖祭經本的出版權，事業從而擴張；前面提過的普朗坦，就是這樣發跡的。同時，耶穌會士在全歐各地創建新學院，也鼓勵印刷鋪在校園周邊設置。除此之外，天主教國度裡，到處都有修道院成立，每間都想建立自己的藏書閣。這種條件，加上虔信風氣的復興和新宗教文學的崛起，帶動印刷業在天主教內茁壯。

就因為這樣，在歐洲的天主教國度內，大型的出版中心，即等同於宗教文藝復興的重要據點。德國境內，印刷再度興盛於南方地區與科隆。西班牙人統治的尼德蘭區，如安特衛普等地，自從再度落入西班牙之手，便化身為反宗教改革的堡壘；摩雷特斯印刷社，長期出版的大量彌撒用書，皆是遵照特利騰大公會議決議而修訂的版本，印畢銷往歐洲各地與美洲。該社與安特衛普另一個出版世家維杜森家族，發行許多由耶穌會士編撰的學術典籍。法國的情況，則是由克拉馬希與其親戚、同儕，共同主宰巴黎出版生意，並得到教會與耶穌會士的雙重庇助。在里昂，印刷業略見復甦，一六二〇年之後尤然，也是因為耶穌會。義大利的威尼斯，出版業同樣有若干增長；身為阿爾都斯之後，保盧馬·努蒂烏斯則在梵蒂岡內開業，其印刷設備全供正統教會差遣。

至於新教徒的印刷社，自成一一個網絡，與天主教的同業鼎足而立。法國方面，圍城之前的拉羅榭，新教印書業昌盛；索米爾更因為附近的新教大學，吸引英格蘭、低地諸國，以及日耳曼的

學生前來，事業蒸蒸日上。這些學生的出現，激勵這個小鎮發展出數個重要的印刷社。地處索烏倫邑域的舍丹，同樣是因為大學而促成了當地印刷鋪的建立。在瑞士，巴塞爾出版業每下愈況，迫使日內瓦的印刷商假造印記，暗中供書予天主教國家。與之相反的是荷蘭；掙脫西班牙統治之後，搖身變成新教印刷業的大本營，見證了印刷鋪的倍增。萊登的大學，係由奧蘭治親王威廉創建於一五七六年，其周邊的新鋪特別眾多；艾齊維埃家族的大出版社即發軔於此。在這裡，古代文學研究跟神學一樣鼎盛，艾齊維埃家族印製的古代經典著作更是不勝枚舉，供應全歐洲的專業人士。以印製地圖、地誌聞名的布勒，則於阿姆斯特丹開展其偉業²⁶²；除了萊登印刷鋪之外，艾齊維埃家族亦在阿姆斯特丹印書，以偽造的出版印記，盜印法國、英國作家的著作，並透過組織井然、脈絡綿密的銷售網，把這些書本賣往歐洲各地。

十七世紀中，新的趨勢再度浮上檯面。反宗教改革時代畫下句點，專門發行宗教書籍的大出版商，往日興隆亦隨之而逝。厚重的典籍，如基督教諸教父作品等，變得更加滯銷。一方面，新創的修道院愈來愈少；另一方面，新創修道院的藏書閣設置，與既有修道院藏書因宗教戰爭毀毀的重建，業已大功告成，不再需書孔急。在此同時，俚俗、非宗教的文學興起，服務不識拉丁文的大眾，並在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形成風尚，旋即流行至荷蘭。到了十七世紀後半，資金募集愈發困難，業務拓展大受圍限，出版商轉而競逐迅速回本的蠅頭小利，所印之書亦不復早年的宏大企圖。他們致力於出版銷路較佳的方言讀物，而這種經營核心的移轉，竟又導致產業版圖重新洗牌。

一六四〇到一六六〇年間，盜印書猖獗，同業陷入割喉苦戰，小印刷商因之關門者甚多。在安特衛普，憑藉大部頭宗教作品賺錢的出版商，利潤年年緊縮；摩雷特斯爲了避險，乾脆只出版祈禱書，畢竟這種書擁有現成的顧客。里昂的業界，歷經了分工合理化的過程，汰弱留強之後，只剩阿尼松一家大型業者，與巴黎的敵手陷入殊死鬥。科隆與威尼斯則一日不如一日。

既然有愈來愈多的方言作品付印，跨越歐洲各國國界的書籍買賣，便不再是產業主流。英國的印刷商，尤其無意維繫與歐陸同業的生意往來。三十年戰爭的危機過去了，而德國的法蘭克福，亦失去書籍交易重鎮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縱有萊比錫的市集取而代之，慕名前來的出版商，卻清一色是德國人，與當年法蘭克福市集吸引各國出版商的光景大異其趣。法國的學者，如欲向萊因河的另一邊訂購書本，還得排除萬難，對此他們迭有抱怨。那法國自己呢？智識活動持續匯聚於巴黎，當地成了碩果僅存的主要印刷基地；相對來看，盧昂、里昂、特魯瓦、土魯斯的印刷業者，幾無新書可印，只好委曲求全，做起盜印勾當。

如此困頓的時局，起初隱而不顯，而後迅速表面化，法國出版業面對的，可都不是小問題。問題之所以愈發棘手，是因為在一六五〇年代之前的兩百年，印刷鋪的數量穩健倍增，最後竟成爲天文數字。每一個小鄉鎮，都可見到印刷鋪老闆忙著打印字母書、地方法規、學童禱本、評議小冊，或承攬其他論件計酬的工作。許多旅途中的印刷師傅，壓抑不住創業的念頭，買台廉價的二手印刷機，便就地創建新工坊、自己當老闆。一六四四年的巴黎，共有七十五家印刷鋪，印刷機計一百八十一台；其中十六家鋪子是唯一一台印刷機的小本生意，僅備兩台印刷機者也多達三十四家。結果大約有一半的印刷機，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可做。柯爾貝爾見狀，遂制定嚴酷的法

條，矯正出版商過多、盜印書氾濫，以及更令當局重視的問題；沒有生意上門的印刷商，索性印起煽動性小冊與情色書刊。除了頒布嚴格的版權法規，柯爾貝爾並於一六六六年，勒令數家印刷社停業。他還禁止新的印刷商入行，新鋪設立亦屬違規，執法更是不講情面，此情形到了一六八六年才告鬆綁²⁶³。直至法國大革命時，印刷鋪的數量仍被苛刻地抑制著²⁶⁴；其政策之嚴峻，宛如一百年前的英格蘭。這種高壓手段的後果頗慘，其主要宗旨到頭來亦未實現；出版不但沒有萎縮，禁書銷售也未絕跡，反使更多的法文書（其中不乏影響力驚人者）逕自在境外印成。十七世紀結束之際，法國那頂印刷大國的冠冕，拱手讓給了荷蘭，本地出版業還陷入空前的蕭條。

荷蘭的書籍產業史，說來頗叫人驚艷²⁶⁵。一如前述，其發展的序幕揭於十七世紀初，即國家甫脫離西班牙暴政、投入帝國主義擴張事業的時刻。十七世紀也是荷蘭的全盛時期，國力至為昌隆；此時的荷蘭商人嚮往自由、崇尚文藝，恰好助長了書籍產業的進展。弗美爾、林布蘭、哈爾斯等畫壇巨匠，令這個時期的荷蘭畫派名揚天下。國內各地的學人，則湧入主要城市，並與外國的學界同僚互通聲息。惠更斯這樣的荷蘭菁英，同時與法國、德國、英國的知識份子往來，居中穿針引線，使原本對彼此不甚認識的三國，得以在文藝領域熔於一爐。前述菁英創辦的荷蘭文新聞刊物，更成為後來報紙的雛形。這段期間，不少法國知識份子滯居於荷蘭，諸如德巴查克、德維奧，以及鼎鼎大名的笛卡兒。另一方面，出身拿騷的莫里斯親王，雖掌荷蘭軍政，宮廷裡卻也使用法語；海牙的書店裡，多的是法文書籍。而每次法國爆發新一波的宗教迫害，喀爾文教派當道的荷蘭，便有法國籍的新教徒前來避難。路易十四主政期間，當局採取「重騎鎮壓」手段對付

新教徒，並廢止南特敕令，法國難民尤其眾多。來自法國的德斯波底、于圭坦等出版界富商，遂在荷蘭遇上了來自瓦隆地區（即今日的比利時法語區）的其他難民，包括莫蒂埃家族，此外也遇見不少法國作家，其中還有部分是文壇的重量級人物。是以十七世紀將屆時，阿姆斯特丹成了全歐第二大的法文書籍產製中心，僅次於巴黎。荷蘭的大書商，諸如鹿特丹的里耳等，則因事業人脈廣博，又身處地理位置優越的國度，得以將培爾的作品與盜印自巴黎出版品的法國大文豪著述，推廣至歐洲各地，西達倫敦，東至柏林。不多時，這些書商便與法國出版商展開激烈競爭；畢竟，荷蘭人印製的書籍，只要不是偽書或禁書，運往巴黎販售，並非難事。就算其中有禁書，只要預擬對策、小心行事，通常也不會有太大問題。進入十八世紀，法文成爲歐洲諸國的通用語言，違禁書籍的走私隨之成長。荷蘭出版商，以及部分的比利時、瑞士同業，很快地化身爲「啓蒙哲人」最堅強的後盾；出版家雷伊的例子，便足以證明這點²⁶⁶。於是乎，一六九〇到一七九〇年間，法國文壇名人的大作，便透過法國境外印行的版本，傳遍整個歐洲。

四、印刷征服世界

隨著印刷術快速席卷西歐，十五世紀以降，德國、義大利、法國、低地諸國的重要城鎮，幾乎一概建立起自己的印刷事業。此後稍晚，葡萄牙、西班牙、波蘭等國的情況亦然。英格蘭的書籍產業局限於倫敦，則或多或少與政府禁令有關，並非自然致之。倒是北歐國家，人口稀少而分散，距離產業發軔地又頗遠，印刷術如何傳入？又於何時傳入？在斯拉夫諸國，尤其是那些字母

系統與西歐迥異的國家，印刷術又如何因地制宜？在另一方面，矢志征服新大陸的歐洲人，意在掌控這一片廣袤而無人跡的沃土；印刷術面對全新的環境，該如何適應？最後要問的是，亞洲的古文明裡，懂得複製文字的可也不少，其技術或許有欠成熟，卻似乎更能適應當地的需求；屢經改良的西方印刷術，究竟如何在東方立足？既然要全面、正確地評估印刷書籍的影響力，這些問題自當納入考量。

(一) 斯拉夫諸國*

波希米亞與摩拉維亞

波希米亞位於今天的捷克境內，是第一個採用古騰堡發明的斯拉夫國家。在這塊文化高度發展的土地上，最重要的兩個城市，當推一三四八年起成爲大學城的首都布拉格，以及比爾森。一如歐洲其他地方，中世紀以降，在當地的舊有貴族之外，又有商人階級崛起，透過自身的經濟地位，發揮可觀的影響力。一四一五年，波希米亞宗教革命家胡斯慘死，數年的宗教與政治動盪接踵而至，恰與同時期的文藝復興肇始形成對比。但就印刷術傳播的角度來看，這反倒可能是助力；畢竟「以書寫文字影響群眾」的念頭，因動亂而深植於波希米亞人心中，程度更甚於其他斯拉夫國家。當時的布拉格，由國王波蒂布拉德的良善政府所統治，胡斯教派的主張此起彼落。相

*本節由芭薩諾芙女士（法國國家圖書館館員）執筆。

反地，比爾森以瀰漫天主教觀點而聞名，一度有人呼之為「永遠忠於教會的比爾森」；這個富庶的商業中心，坐落於陸路要衝、水路匯流之地，一四六八年時第一架當地的印刷機已然運轉。波希米亞第一本印刷書，名為《特洛伊史》，係由十三世紀迪柯隆納的義大利文著作翻譯而來，也是捷克出版史上的第一本書，唯印書人已不可考。波希米亞第一本土產的印刷書，印刷商選印的卻是世俗故事，而非聖經經本；光是這一點，就已經意味深長（在手抄本的時代，此書已然大為風行，西歐人爭相拜讀；印製成冊之後，仍長期受到歡迎）。至於其他的斯拉夫國家，首批印成的書本皆為宗教書，無一例外。《特洛伊史》所用的字體，是一種非常美觀的異體，各字母並以大量的連字線相接；其與科隆的柴爾字體淵源深厚，但又添加了捷克文字母特有的變音符號，方告完備。至於那位不知名的印刷商，可能也是德國人，料想他是在當地人的協助下，才將工作完成，並從舊日的捷克文手抄本中汲取靈感。一四七六年，又有一本拉丁文書籍《阿內斯提總主教法典》，使用哥德紋體印出。

巴卡拉於十五世紀將屆之際，在比爾森創建印刷鋪，長期經營；從他手中印出的書，至少二十二種，廣泛銷往各地。它們包括有馮別登巴赫的《朝聖紀行》、韋斯普奇的《新世界與新識國家》、基督教故事改編的《巴蘭與約沙法》，以及於一四九九年出版的第一本捷克文《聖詠集》與一五一一年出版的字典。巴卡拉所印之書，有些特點是共通的：字體採史瓦巴赫體、單頁二十行、行文使用捷克字。就連該國第一本諷刺小說《馬夫與書生》，也是巴氏的功勞；此書原是拉丁文故事，成書於十四世紀末，巴氏出版的翻譯本，則在一四九八年問世。巴卡拉不僅是半個語言學家，亦身兼書商、出版商；就連印刷鋪裡的工作，可能也由他自己親自動手。

首府布拉格，計有三家印刷鋪，分別設立。最先於一四八七年開業的，乃是邁托的鋪子；他使用一套兼具圓體與異體特色的特有捷克字母，印出《聖詠集》一種、《特洛伊史》一部。接下來，於一四八八至一五二〇年則有卡普與瑟維林兩人合力創建的印刷鋪。其中，瑟維林擔綱出版工作，也是事業負責人。他所創立的家族印刷業，由其子帕渥繼承，並於一五二〇年之後，成為布拉格最主要的印刷社。一四八八年印製的第一本捷克文《聖經全書》，即歸功於瑟維林與卡普；這部《布拉格聖經》精美的程度，在波希米亞的各種搖籃本中名列前茅。他倆也是率先獲得皇室授予執業許可的匠人，時值一四九九年。出自他們手筆的二十種印刷書，大量使用木刻版綴飾，風格近於紐倫堡的雕版匠；其中包括一本一四八八年的《伊索寓言》（同時也隸屬第一批印出的捷克文插圖書），與一四九五年的《耶穌受難記》。一五〇一年，他們又出版了佩脫拉克《福運禍蹇之消解》的捷克文譯本；此即當地第一本以插圖裝飾書名頁的書籍。在字體方面，他倆先用異體印書，之後改採哥德紋體，兩者大概以一五一三年為分水嶺。

貝內達也是布拉格的印刷商，服務的對象更為眾多；此君略有名氣，是因為他用史瓦巴赫字體搭配木雕圖版印製曆書。曆書的內容，則仰賴布拉格大學內精通曆算的學者逐年提供。不過，一五〇〇年之前，其他的一些捷克城鎮，亦有印刷活動；這不單單是經濟、文化因素使然，也是受到波希米亞兄弟會的鼓勵。該會修士追隨的榭里奇，主張勞動、安貧，反對教會官僚，與後世的托爾斯泰所見略同。在庫特諾，德提諾瓦於一四八九年仿造紐倫堡風格，印出兩本《聖經》；在溫特堡，阿拉克勞自一四八四年以降，投入印刷工作；在摩拉維亞首府布爾諾，斯塔黑於一四八六年，成立摩拉維亞第一家印刷鋪；奧洛穆茨的印刷鋪，則首見於一四九九年。印刷術傳往斯

洛伐克西部大城布拉迪斯拉發，亦在同一時期。

前述的搖籃本，流傳至今者，有二十九種產自波希米亞，其中拉丁文書籍五種，其餘皆為捷克文；十一種產自摩拉維亞，其中只有一種不是以拉丁文印行。雖然這些捷克印刷鋪作品不少，卻仍趕不上需求攀升的腳步，聖祭經本更是供不應求，只得仰仗史特拉斯堡、紐倫堡、威尼斯等地的外國印刷社進口。

波蘭

若說城市裡的富商，是推動印刷業在波希米亞傳播、扎根的力量，那麼，波蘭呈現的又是另一種光景。十五世紀初，正值波蘭政治、經濟大躍進的前夕。該國一方面征服了但澤，勢力直通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盡入囊中；另一方面又在二四一〇年擊潰條頓騎士，就此成為政治與軍事強權。然而，十五世紀的波蘭，只有在克拉柯夫看的到印刷機的蹤影。做為當時的國都，克拉柯夫擁有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文化重鎮的名聲更是遠播四鄰，唯當地印刷商欠缺，迫使學者委託外國業者印書。另外，法國、義大利、德國各地的大學，都有年輕的波蘭學生負笈前來，是以人文主義發展之初，即對波蘭產生顯著影響。

匈牙利人、捷克人、烏克蘭人、巴伐利亞人、西里西亞人、亞爾薩斯人、法蘭克尼亞人，均群聚於克拉柯夫。這裡的第一批印刷商，即出身外邦社群，雖是異族人士，仍享有市民權。波蘭的第一本印刷書誕生於一四七四年前後，係多凱馬達的《聖詠釋疑》；其印刷者可能是翟納麾下師傅。隨後，聖奧古斯丁的《文集》也付梓。在一四七六到一四七七年間，出身黑斯布隆的巴

伐利亞人霍赫菲德、楊·克魯格、佩培勞等人，又增設數家印刷鋪。不過，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國度裡，真正主導印刷沿革的人物，還是要屬一四七五年來自法蘭克尼亞的費歐爾。他原本是位金繡師傅，隸屬於克拉柯夫的金匠行會，發明過礦坑抽水裝置，後來更印出冊數龐大的書本。費歐爾與當時致力於彌合天主教、東正教裂痕的所謂「斯拉夫本篤會士」，往來甚是密切；印製書本，則是爲了賣給斯拉夫的東正教教徒。因此他既是專門印刷教會儀式用書，亦是用西里爾字母印書的第一人。據考，他的印刷作品廣泛流通各地，就連偏遠的列寧格勒與莫斯科，都曾見證其印書手藝。一四八三年，費歐爾獲得首批印刷設備，並於八年後的一四九一年，忙著印刷五種書籍，即《素歌》（源自中世紀葛利果聖歌的歌曲）、《卡索羅維》（禱本的一種）、《聖詠歌集》、《四旬期經本》，以及《五旬期經本》。在這之後，費歐爾的鋪子便停業了；他被視爲胡斯教派同路人，以異端論處，淪爲階下囚，後來重獲自由，便離開波蘭，前往匈牙利。

法蘭克尼亞的哈樂，則在克拉柯夫建立永久的印刷傳統。他是知名的資本家，原本從事紅酒及牲畜的買賣，直到十五世紀末期才投入出版。一五〇五年，亞歷山大國王賦予他波蘭全境的書本專賣權，他在業界的活躍程度，從此大幅提升。之後，他創建一家印刷社，發行拉丁文與波蘭文書籍；其代表作品「克拉柯夫彌撒經本」，更由他獨占印製與銷售權利。哈樂憑藉自己的資金，另外開設了紙廠與裝訂工場，同時也是波蘭史上跨足印刷、售書、出版的第一人，與同期西歐各國身兼數職的大出版家很相似。他推出的每日頌禱、經本、聖歌歌本、信仰手冊，幾乎淹沒波蘭書市。尤有甚者，根據他所握有的專賣權，某本書只要能在他的書店目錄裡找到，就不准進口外國印製的版本。短期來看，此一舉措提振了在地產書的銷售，使波蘭的出版品免於舶來品，

尤其是義大利進口書籍，競爭的威脅。哈樂對波蘭文化界的貢獻之大，應無疑義；也因爲他資助不少詩人、作家，還得到「當代人文導師守護者」的稱號。

倒是出身巴伐利亞的昂格樂，便只是單純的印刷商。現存的早期波蘭文書籍中，以他在一五一四年前後印製的《心靈小圃》年代最爲久遠；該書由德盧布里納改寫自薩利切的尼可拉作品《心靈良藥》。其與原作的差別，在於增補了具體的建議，並附上一系列的木刻板插圖。昂格樂與十五世紀的阿格里科拉、克羅茲納的帕韋爾等學者，皆有書信聯絡，對於當時各種科學進展，亦多有涉獵。就連絕大多數波蘭人所使用的口頭語言，也由他第一個印成書面文字；薩伯洛夫斯基探討拼字的著作，出版於同一時期，可能跟這種發展有關。至於增補版《心靈小圃》的發行，當是印刷書在波蘭邁向全面普及的路上，踏出的第一步。

波蘭的第三位印刷商威特，來自西里西亞；哈樂於一五〇五年獲得的專賣權，延宕了他的事業發展。一五二七年，哈樂的獨占權利甫告失效，早先才在維也納建立印刷鋪的威特，便來到克拉柯夫創業。一五一八到一五四六年間，他分別以拉丁文、匈牙利文、波蘭文，推出各種書籍；不可否認地，這些書的品質比哈樂的成品更加優越。

同樣在十六世紀的前半，夏分堡展露了頭角。他與享有盛名的哈樂競爭，終告勝利，迄今仍爲人所津津樂道。夏分堡也開啓了子承父志的家族印刷事業，持續至十七世紀初爲止；他的兒子尼古拉，後來成爲波蘭王巴托里的御用印刷匠。這位國王在一五七六到一五八六年間執政，並一度與恐怖的伊凡（即伊凡四世）所領導的俄軍兵戎相見；戰爭期間，尼古拉負責印刷官方公告與軍報。我們可以說，夏分堡家族之於波蘭，就好比柯貝格家族之於德國，或普朗坦家族之於低地

諸國。

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宗教改革橫掃波蘭。印刷社紛紛設立，分別支持著舊教與新教的各個流派，設立的地點也不限於城鎮，還包括郊區與占地廣闊的莊園。對捷克斯洛伐克來說，十六世紀乃是印刷的黃金時期。

費歐爾在克拉柯夫的創新事業，由斯寇里納承續。此君生於俄羅斯西北城鎮波羅茲科，並曾分別在克拉柯夫大學與帕度阿大學修習哲學與醫學。學成後轉往威尼斯的他，想必就是在那兒結識了印刷商兼出版商武柯維克，並見識過武氏的整套西里爾活字。斯寇里納此後便以布拉格為創業基地，主要印製東正教的教會用書，並於一五一七至一五一九年，成為印製斯拉沃尼亞文《聖經》的第一人；此係以西里爾字母印成，涵蓋《聖經》中的二十三卷書，還以大量的木雕版打印插圖。對信仰東正教的斯拉夫人來說，斯寇里納的科學知識、翻譯作品與出版書籍，在在都有相當的影響力。他在一五二五年離開布拉格，印刷器材悉數帶走，原因則不可考；這回他選在立陶宛的維爾納，也就是行政官巴比克的居城，重新創業，同年又印製了兩本書。

另外還有一位梅蘭崔赫，相傳是梅蘭希頓的門生。他與繼承他事業的親家兄弟維勒斯拉文，同為十六世紀布拉格的傑出印書人，也都和布拉格大學往來密切。史瓦巴赫體與羅馬體，是梅蘭崔赫慣用的兩種字體；其對內文的編排與訂正甚是費心，還以四種不同語文印書。他的鋪子聘用十一位排字工，並支付十八捷克格羅申到一萊因金幣不等的周薪。

至於維勒斯拉文，則是布拉格大學的教授。他的努力，讓捷克印書的品質臻於極致境界。產

學兩棲的他，把文藝復興風潮帶進波希米亞，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西邊的阿默巴赫。總的來說，捷克與波蘭的印刷業，在十六世紀掀起高潮，可惜於十七世紀，復因圖書審查、戰火頻仍、經濟萎靡而式微，進入十八世紀才緩步復甦。

斯拉夫南境

前面已經提過，斯拉夫西部諸國的印刷，受到德國的潛在影響。但在今日統稱南斯拉夫的地帶，左右當地印刷風格的，卻是貿易大城威尼斯；此係兩地距離較近、往來較頻繁的緣故。也是這種關連，帶動了斯拉夫南境的印刷發展，並促成部分經典印刷書的誕生。

蒙特內哥羅的第一間印刷鋪，立足於鄰近亞德里亞海沿岸的采蒂涅。這個城市由當政的杜拉親王守護著，而這位親王的妻子也是威尼斯人。但也有人認為，杜拉親王的父親伊凡，早在一四九〇年，即於歐波德設立印刷鋪，後來才把鋪子遷往采蒂涅。印刷鋪的經營者是位名喚瑪卡利的修士，早年在威尼斯學藝，其所使用的活字組亦購於斯。他是第二個使用西里爾字母印書的匠人，只比克拉柯夫的費歐爾晚些。一四九四年出版的素歌集，成為蒙特內哥羅的第一部印刷書；隔年問世的采蒂涅彌撒經本更是彌足珍貴，其工法反映出威尼斯文藝復興的影響力。一五〇八年，瑪卡利又前往特戈維塞，服務瓦拉幾亞與摩達維亞的沃伊沃達（即當地的封建領主，蓋「沃伊」指戰士、「沃達」意近領導者），首度將印刷帶進兩地，並使用一種與采蒂涅字體略有不同的活字，印出三種聖經經書，分別為一五〇八年版、一五一〇年版，以及一五一二年版。在另一方面，十六世紀初的威尼斯，也有武柯維克創設印刷鋪，專以西里爾字母印書。

塞爾維亞接受印刷洗禮的時期，亦為十六世紀，且仍處於鄂圖曼土耳其統治之下；印刷工坊若非設於修道院內，便是由王公貴族資助，且兩者的印刷匠皆以東正教修士為大宗，專門印製聖祭用書。一五三二年，第一本祈禱集成書於格拉茲德；一五三七年，魯楊斯克修道院的修士提歐多西使用木刻活字補足缺漏的鉛字，以印製福音書；一五三九年，一部素歌集在格拉加尼卡成書；一五四四年，於赫塞哥維納境內的米雷榭瓦修道院，馬爾達利與菲鐸兩僧侶合力印製一部聖詠彙集。另外，在貝爾格勒，狄米卓維克親王於一五五二年創建印刷工坊，他死後則由岡都里克接手；馬爾達利並在此印出他的福音書。一五六二與一五六三年，梅爾克辛與思科達爾的修道院，又有修士分別設立新的印刷坊。

塞爾維亞的印刷工坊，無不是斷斷續續地開業，且加總起來也不過五十年時間。兼任印刷匠的修士，貧苦日甚，頗受羈絆，礙於技術純熟的鑄字人才欠缺，一旦活字磨損了，他們只得土法煉鋼，親手在黃銅或鐵塊上鑿字頂替。就連印刷所需的原物料，為數亦少，只夠他們印個幾冊書；因此過不了多久，這些修士便被迫改採古法，回到繕寫室裡謄寫手抄本。這些地方產出的斯拉夫文書籍，在插畫與圖飾上，保存了斯拉夫式的拜占庭古抄本特色，充斥著阿拉伯風的繁複黑白花紋；可惜圖樣設計固然精巧，雕工之拙劣卻難以掩飾。

講到克羅埃西亞在十五世紀的情況，只能以複雜兩字形容。克國北方與首府札格拉布，顯然與波希米亞、匈牙利淵源深厚；鄰近亞得里亞海一帶，則又感受到威尼斯的強勢影響。印刷在克國起步較晚，札格拉布也要等到十七世紀才有穩定的書籍生產，雖有人於十六世紀，嘗試在內得里斯塞（一五七四年）與瓦拉茲丁（一五八六年）印書，唯成果並不足論。十五、十六世紀，克

羅埃西亞作家的拉丁文著述，泰半在義大利印製出書。

一四八三年開始，在威尼斯印製的克羅埃西亞書籍，採用了格拉哥里字母（發音方式與西里爾字母一致；同屬斯拉夫文字，但格拉哥里字母屬於天主教，西里爾字母則為東正教信徒所用），以因應達爾馬西亞、伊斯特拉與克瓦內爾群島的教會儀式需求。至於克國本土，印製格拉哥里文書籍的工坊，從一四九一年至一五〇八年在森宜，之後又在一五三〇至一五三一年於里耶卡開業，產量均相當有限。

斯洛維尼亞的宗教改革思潮，係於十六世紀後期由圖魯巴教長所引進。他既是教授，又是隸屬於盧布爾雅納教會的神職人員；奈何他頗受歡迎的講道，敵不過羅馬天主教會的施壓，最後被迫離境、避居德國。一五五〇到一五五一年間，他在圖賓根修訂一本教理問答，和一本斯洛維尼亞文的字母書。至於他合作的對象，則是昂格納男爵；這位改信新教的印刷商，將工坊設於烏拉赫，打印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書籍，專做外銷生意。

盧布爾雅納的印刷業，要到一五七五至一五七八年間，方揭開序幕；在杜布羅夫尼克（義大利語稱拉古薩）於一七八三年建立印刷鋪之前，達爾馬西亞也無印刷業可言。倒是有為數眾多的難民逃離前述地區，落腳於威尼斯、帕度阿與義大利其他地方；十五、十六世紀的義大利精緻印刷書，即在他們的協助下印成。這些人包括了來自科托爾的克羅埃西亞人帕爾塔席克（義大利文稱卡特潤希斯的德帕爾塔席奇）、克羅埃西亞人多波里克（他在義大利自稱波尼尼斯）、達爾馬西亞人達爾馬丁，以及斯洛維尼亞人德溫迪斯。不過，他們之中沒有人採用西里爾或格拉哥里字母印書。

俄羅斯

印刷究竟透過哪條路徑傳入俄羅斯，我們並不清楚。在費歐爾傳給采蒂涅的修士瑪卡利，再相繼傳給武柯維克，與斯寇里納的曲折過程中，是否發展出其他分支，使技術流向俄羅斯？至少我們知道，在斯拉夫西部與南部，尤其是南部，出版的書籍，莫斯科人必然有所耳聞。在莫斯科印製的書籍中，成書時間可考的第一本，乃是《門徒傳》，一般人認定莫斯科的印刷業開展於一五六三至一五六四年間，係以此為根據；至於當地最古老的印刷書，為何人於何時所印，我們無法確定，但有可能早在一五五三年即問世。開始之時，俄羅斯的印刷業，全由教會、政府把持著，其起源可追溯至恐怖的伊凡在十六世紀中葉征服喀山後，採取的行政舉措。這不僅是呼應工匠與商賈階級成長的景況，也是政府審查教會祭典用書的迫切需求使然。當時的印刷，乃是中央集權、高壓統治的工具。

前述的「佚名」印刷社，即為莫斯科的第一家，出品書籍計六種，其中包括於一五五五至一五五七、一五五九，以及一五六五至一五六六年所印製的福音書、可能於一五五七，以及一五六六至一五六七年所印製的聖詠彙集，以及專供四旬期使用，於一五五八至一五五九年所印製的《三頌經》(Triodion，這個字的字尾 odion 即頌歌 ode 之意。東正教部分教會裡，《三頌經》泛指七旬節至五旬節期間的禮拜經文或禱詞)。一般認為，內費迪耶夫與尼齊佛羅夫兩位印刷匠，都在那裡工作過。一五六七年之後，這家工坊所使用的整套西里爾活字，突然失去蹤影，恐怕是在火災中熔毀了。

同時也是東正教輔祭的費鐸洛夫，則因姓名出現在出版商戳印裡，成為俄羅斯第一位身分可

考的印刷鋪工作者。除了一五六四年的《門徒傳》，他還在一五六五年印出兩個版本的《警鐘》，成爲當地第一部富含木雕版插圖的書本。一五六六年，他與工作夥伴米茲拉維克連袂離開莫斯科，帶走了部分的活字與絕大多數的木刻板，並在立陶宛的薩布魯多夫（今屬波蘭）落腳，一度受雇於寇科維奇親王。恐怖的伊凡准許他們遷往立陶宛，可能是希望藉此擴大俄羅斯在當地的影響力。立陶宛與波蘭合併之後，費鐸洛夫又在一五七二年前往波蘭的里沃夫開業，而後轉往沃利尼亞的奧斯特羅格；一五八一年，他在當地印出一部《聖經》，援用的活字組與過往所用者已不相同。

在西里爾文書籍的歷史中，費鐸洛夫乃是關鍵人物；他所打印的《新約聖經》，發揮了將近兩百年的影響力。甚至到一七二二年，印製於里沃夫的《聖經》，仍舊沿用該書的部分木刻板。

在莫斯科方面，內維雅接續了費鐸洛夫的工作，印製出聖詠彙集兩種、並於一五八九、一五九一，以及一五九七年分別印製了四旬期《三頌經》一種、五旬期《三頌經》一種，以及一版一千五百冊的《門徒傳》。到了十七世紀初期，莫斯科之外，基輔、里沃夫、諾夫哥羅德、切爾尼戈夫等大城，白俄羅斯地區，以及分布各地的一些修道院，皆有書本印出，內維雅的事業這才畫下句點。

就這樣，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祈禱書一直是唯一的大宗出版品；非宗教類印刷書的出現，則要等到十七世紀中葉。一六三四年，勃斯契夫自撰自印的一本字母書開了先河。該書於一六三九年再版六千冊，史無前例地添上了俗世題材的雕版插圖。第二本非宗教書籍問世於一六四七年，係由德文翻譯而來的軍事教材；其書名頁所用的圖版，在雕繪時參照了布拉塞辛所設計的

圖樣。俄羅斯的印刷活動雖然持續著（絕大部分仍印製教會儀式書籍），傳統的手抄本卻未淘汰，甚至延續到十八世紀。誕生於繕寫室的抄本，包括聖徒傳記、旅遊記實、歷史書籍，甚至科學類著述。

在那個時期印刷的各式書本，種類固然繁多，卻有一個強烈的共通點：使用的西里爾活字，係模仿教會手抄字體而鑄。雖說俄羅斯的印刷產業起步較遲，日後的成長倒是非常可觀：二十世紀裡，該國的印刷書籍便有多項數據刷新紀錄。

（二）新大陸

十五世紀的後五十年與十六世紀初，尤其是十六世紀初，歐洲史上的重要「發現」，迅速拓展了西方人的世界觀；時間則約與活字印刷機的發明同時。這些地理上的大發現，揭開了歐洲史的新頁，此後歐洲人更是竭力征服眼前浩瀚無邊的汪洋與疆土。在他們之中，有的人直接闖進未知的新世界，有的人透過虛實參半的紀錄管窺之。時至今日，這個肇始於地理大發現的時代仍未終結，而西方文明更持續地改變世界其他地區的面貌。西風東漸的過程中，印刷產業同樣扮演著自己的角色。

先來看看美洲。歐洲人占領美洲之初，印刷即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但令人疑惑的是，西班牙征服者燒殺擄掠，其背後動機究竟為何；貪圖黃金？渴望刺激？這些原因各自成理。至於他們對西印度群島的觀感，則脫胎自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西班牙印刷社印行的無數騎士傳奇；根

據這些故事，大海彼端的土地上，居住著許多樂天的民族，坐擁驚人的龐大財富。讀者胸中因而燃起炙熱的慾望，急著體驗故事中主角的冒險經歷。印刷商克羅伯格於塞維爾出版《伊斯普蘭蒂安的功績》，與征伐美洲同時，並非偶然；這本書是蒙特維德的第二本小說，也是《高盧的阿瑪迪》的續集，講述居住於加里佛尼亞島（此係杜撰之島，美國加州卻因此得名）的亞馬遜女戰士。而在十六世紀柯提茲侵略廣大的墨西哥王國，以及皮薩羅、阿馬格羅先後為尋找黃金城埃爾多拉多而探索亞馬遜盆地（亦因該書而得名）的時候，這部小說更是頻頻重印。騎士傳奇故事，在印刷術的推波助瀾下大為風行，營造出冒險犯難的社會氣氛，有利於新大陸的探索。不僅如此，這些故事更深植於西班牙征服者的腦海，並不時浮上心頭。據悉，克羅伯格還將此類小說，一大箱一大箱地銷往西班牙新得的殖民地，幾乎每艘航向新大陸的船隻，貨艙裡都裝著這種書。

在西班牙人新奪的疆土上，印刷書快速傳布。不假多時，由許多聚落糾合而成的美洲兩大都市，墨西哥市與利馬，也出現幾家印刷鋪。不過，這些鋪子打印的，可不是騎士傳奇；權力至高的教會，並不支持此類書籍。理論上來說，教會是不允許書商將小說外銷新大陸的；實際上，默許出口的當權者，心中也頗不情願。更重要的是，南美洲所需的宗教書籍，長期從歐洲進口，從中得益的仍是普朗坦摩雷特斯出版社。換言之，長久以來，新大陸的書市，都是西班牙或安特衛普出版商的天下。至於美洲的印刷社，則清一色由教會當局籌建，且初期只准印製下列幾種書：向印地安人傳教所需者、供應發展中殖民地的基本教科書；至於勉人虔信的教義書，也不可或缺。墨西哥第一家開業時間明確可考的印刷社，當然也是長期經營的第一家，其沿革亦符合前述特徵。

十六世紀的托倫巴之役，揭開柯提茲征伐行動的序幕；此後不過十三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欽點的墨西哥主教德祖馬拉加，便曾在信中表露設立造紙坊與印刷社的意願。一五三九年，在他的計畫獲得西班牙總督批可後，方告實現。克羅伯格遂將一台印刷機，與一位名叫帕布羅的印刷匠，自塞維爾遣往美洲；他還先與教會訂立嚴格的合約，確保自己能在未來的同業競爭裡立足。開始時，帕布羅似乎以印刷字母書、勸說印地安人信教的基本文宣、信仰手冊，以及法律書籍為主；這樣的起步稍嫌克難，卻證明當地確有顧客存在。而後，墨西哥市的印刷活動逐漸成長。一五五〇年，鑄字工匠德埃皮諾薩，從塞維爾來到此地，開始替帕布羅鑄造羅馬體與斜體的新活字，汰換他原本使用的哥德體。一五五九年，德埃皮諾薩創建了當地第二家印刷鋪。其他的印刷鋪則在十六世紀結束之前相繼設立，十七世紀的新興印刷社更是眾多。墨西哥市出版的書籍，十六世紀裡計有一百一十六種，進入十七世紀竟激增為一千兩百二十八種，還大幅勝過許多歐洲都市。若思及當地所需的紙張皆從歐洲進口，則如此的出版數量愈發令人讚嘆。

也因爲墨西哥市原本即規模斐然，印刷注定在此蓬勃發展；一六〇〇年剛過，該市人口即達兩萬五千人，其中歐洲白人約占一萬兩千人。至於祕魯首府利馬，亦很快就有印刷鋪投入營運。一五八四年，一位曾在墨西哥短暫工作的印地安印刷匠利卡多開業於此。吸引他前來利馬的，乃是耶穌會的神職人員；他們除了創辦一所大型學院，亦自一五七六年起號召印刷商前來設鋪、印製必要書籍，俾利其向印地安人傳教。是以利卡多的主要成果中，最先印成的一部，係以三種文字寫成的教理問答。利馬的印刷業，就從這樣的一小步開始茁壯。十七世紀時，利馬居民達到一萬人（其中包括西印混血兒），擁有五間學院（其中一間專供原住民就讀）與一所教師多達八十

人的大學；到了一六三七年，城裡共有三家印刷社同時營運著。

由是觀之，美洲大陸上的西班牙帝國，印刷業的起步可謂相當早；兩個最大的城市，逐漸發展成兩大印刷中心。但是，兩市以外的地區，在這方面卻繳了白卷，且為時頗久。據今人所知，當時的書籍中，有四種蓋印著的喀喀湖沿岸城鎮胡立的印記，而胡立確實也設有耶穌會的神學院；不過，這些書仍然很有可能是在利馬印成的。其他有案可考的，包括一六二六至一六二七年，厄瓜多的昆卡曾有印刷鋪營運，以及一六六〇年起，瓜地馬拉聖地牙哥亦有開業者。也就是說，在十八世紀之前，除了墨西哥市與利馬之外，印刷活動少之又少，這暗示著西班牙人雖然征服廣袤大陸，實則還有許多地方未能實質掌控，遑論開發。北美的情況則大大不同：在這裡，印刷產業尾隨拓荒者而至，一點一滴、按部就班地占據新疆土。

在今天歸屬美國的土地上，第一家印刷社開業於一六三八年的麻薩諸塞灣，新英格蘭殖民地內；這個殖民地，係由清教徒先民在大約二十年前建立²⁶⁷。第一批移民也好，後繼前來者也罷，當中多的是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此外，移民裡尚有不少律師與反對舊教的神職人員（此間又以劍橋大學畢業生為多），為追尋信仰自由落腳英格蘭。殖民地很早就感受到設置學院的必要性，遺產與捐款隨之湧入創校基金會，而以哈佛捐贈的八百英鎊與三百二十本書，手筆最大。到一六三六年，計畫終於實現，學院落成於一處名為「新鎮」的村莊；該村於一六三八年改稱劍橋。一位反對英國國教的牧師葛羅佛見狀，便從抵達沒有多久的美洲折返英格蘭，張羅新學校所需的印刷設備，並尋訪願意前往新天地的印刷匠。葛羅佛購得一架印刷機，並與鎖匠史蒂芬·戴伊及他的

兩個兒子達成協議，其中年僅十八的馬修·戴伊正是印刷匠。三人接受了牧師提供的工作機會，搭船前往美洲。二度赴美的葛羅佛在航程中身故，由其遺孀接手，在劍橋村學院的附近開業。他們出版的第一批書本，包括《自由民誓詞》（即殖民地政府要求公民表態效忠的誓詞格式）、一本曆書，與一冊《聖經·詩篇》的翻譯集。一六四三年，又印行了《麻薩諸塞灣基本法》。此印刷社先後由馬修·戴伊與格林主其事，是當地印刷活動蓬勃的明證。除了學院研究與授課所需書籍、各種年曆與教理問答，一六六三年問世的《聖經》印地安文譯本，亦出自該社手筆。

下一家印刷鋪的出現，時間相隔頗久。佛斯特於一六七四年在波士頓創業。一六八五年，布萊德福則在費城開業，在一六九三年移往紐約之前，他更與兩位合夥人，在當地創設美洲第一間造紙廠，時值一六九〇年。再往南方移動，則有印刷商納黑，在一六八二年選擇於維吉尼亞的詹姆斯頓開業；後來總督對他下逐客令，他又轉往馬里蘭，在一六八五年開業於聖瑪麗市。即便這樣，十七世紀的北美殖民地，印刷鋪還是明顯稀少。

如此現象並不令人太感意外。十八世紀初，美國尚未獨立建國，境內人口不到四十萬，散布在廣大領土的各處，且居民所讀之書泰半產自英格蘭。在這種情況下，北美印刷商只能仰賴其他的例行工作餬口，諸如法案、地方規章、曆書、字母書、在地牧師布道集、商業傳單、祈禱書的印刷。印刷商的主要營收來源，長時間繫於法條、內規、官方律令的出版。這就使得實際上只有獲得某殖民地指派為官方印刷商的鋪子，方能存續。即便如此，官方印刷商的地位仍不穩固；各殖民地的總督，常常猜忌他們，不太願意允准他們開業，不然便是在他們開業之後嚴密監控。尤有甚者，印刷商的工酬來自地方議會，而議會也宣稱自己有權審查他們的印刷品。

十八世紀的北美印刷業，初期實無進展，直到印刷商發現印行報紙的新商機，情況才算改觀。北美的拓荒先驅，離鄉背景，又置身人煙稀少之地，頗感與世隔絕；這可能足以解釋北美報業的發展為何快過其他地方。早在富蘭克林辦報之前，北美的第一批報刊已經出現，其報導大半抄自歐洲報紙；不過，彌足珍貴的當地要聞，也能在這些報刊裡找到。論其印行數量，通常相當有限，且許多報紙歷經短時間的出刊即銷聲匿跡。然而，從一六九一到一八二〇年間，先後誕生於三十個殖民地與洲的報紙，超過兩千一百二十種，其中發行超過十年者亦多達四百六十一種。

也因爲這樣，創設新鋪的印刷商，總不忘順便發行一份報紙，並通常由自己擔任主要，甚至唯一的撰稿人。印刷商身兼記者，遂成爲北美早期報業獨有的現象。如何確保讀者能讀到報紙，在幅員遼闊的當地，可是個大問題；幸有新崛起的郵驛制度，此一困境方告解決。這麼一來，辦報的印刷商，自然與郵驛官密切合作，至於兼營印刷的郵驛官，與投身郵務的印刷商，亦所在多有。事實上，北美的郵政系統，根本就是印刷商的傑作；郵遞往來的中繼站，常是各地的印刷社。這些印刷社大半附有書店，只是販售的並不限於書本。簡而言之，印刷社就是新聞傳播、書信流通的中心，也頻頻成爲地方公眾生活的重心。北美的印刷社於十八世紀激增，都得歸功於這種完全迎合當地需要，組織又甚具系統的郵務制度。新印刷鋪的成立，時常繼之以新報紙的創刊。也是在這個世紀裡，幾乎每個殖民地都架設起自己的印刷機。十七世紀就有印刷鋪的，最早是麻薩諸塞，接著有維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與紐約州。至於十八世紀，則依序爲一七〇九於康乃狄克州的紐倫敦，一七二三年於紐澤西州的伯斯安布伊，一七二七年於羅德島的紐波特，一七三一年於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一七四九年於北卡羅萊納州的紐伯恩，一七五六年

於紐罕普夏州的普茨茅斯，一七六一年於德拉瓦州州的威明頓，一七六二年於喬治亞州的塞芬拿，一七六四年於路易西安那州的紐奧良，一七七八年於維蒙特州的德勒斯登（今改名哈諾威），一七八三年於佛羅里達州的聖奧古斯丁，一七八五年於緬因州的法爾茅斯（今改名波特蘭），一七八七年於肯塔基州的萊辛頓，一七八九年於哥倫比亞特區的喬治城，一七九〇年於西維吉尼亞州的謝波茲敦，一七九一年於田納西州的霍金斯公館（今改名羅傑斯維爾），一七九三年於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以及一七九六年於密西根州的底特律等。

以上一長串的地名，證明盎格魯薩克遜移民，確實有能力開發這片新天地。雖然他們長期以來努力生產的，僅止於簡樸、實用、不甚起眼的書籍，卻也相當迅速地建立繁忙活絡的印刷產業；過不了多久，他們更開創出自己的造紙業，從此不再依賴舊大陸。

（三）遠東地區*

不論是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與北美地區，抑或是葡萄牙人自一五〇〇年開始據有的疆域（一五〇〇年前後，葡人向東進逼印度，向西則占領今天的巴西，此處應指後者），在在都向我們證實，十九世紀庫爾諾所謂「每個文明初次接觸書寫系統之時，皆是史上的重大時刻」，確有其說服力。墨西哥的阿茲提克，與秘魯的印加，原本都是不懂書寫的民族；至於西班牙新得領土與葡

*本節由伯納梅特雷神父撰寫。

屬巴西境內的諸多印地安小部落，更是不在話下。這點甚至可以解釋，歐洲書籍在南美洲的發展，何以相對延宕。

倒是入主非洲與亞洲，尤其是亞洲，的葡萄牙人，很快就體認到自我宣傳的媒介有多重要。阿比西尼亞的第一本印刷書，早在一五二五年，即輸入該地；至於印刷機在印度沃亞（一五五七年）、澳門（一五八八年）與長崎（一五九〇年）投產，更早過第一本印刷書在俄羅斯（一五六三年）、君士坦丁堡（一七二七年）與希臘（一八二一年）問世的時間，值得我輩繼續深究。第一套在歐洲鑄成的「異國語」活字，誕生於一五三九年的里斯本，係歷史學者德巴羅所訂製，旨在打印衣索匹亞、波斯、印度所需的童書，而後印出了一部文法書與一部教理問答。在葡萄牙探勘海外之初，探險家即以書籍為貨品，隨船輸出；這是歷任國王蕭規曹隨的政策。一四九〇年，奉命前往剛果的遠征隊伍，即是一例（一四九四年，還有兩位德國印刷匠獲派至剛果，唯兩人前往當地所欲為何難以考證）。沙勿略於一五四一年離開里斯本時，葡王若昂三世更以為數龐大的圖書相贈，市價約一百庫薩多。

在早期，葡屬印度地區的殖民者，鮮少接觸印度的知識階層；十七世紀初，德諾比利神父努力宣教，情況方才改觀。也是因為這樣，一五五七年起，在沃亞（當地有三位印刷商）、拉秋爾（五位印刷商）、科欽、瓦彼科塔、普尼加爾、安巴卡拉特等地印刷的小冊子中，很難找到教理問答與祈禱書以外的讀物。其中尚可考證的，包括葡文書本十六種、雙語對照或採用亞洲諸語文印製的書本二十四到二十七種（其中包括馬來西亞文一種；阿比西尼亞文兩種；葡文與坦米爾文對照，且印於里斯本者一種；採用印度文，並在葡萄牙印製者四到六種；印度文譯為葡文者一種。

餘不贅述)。

另一方面，分別在一五一三年抵達中國以及一五四二年抵達日本的葡萄牙人，赫然發現兩地，尤其是日本，已有不假外求、高度發展的印刷技術，即以木雕版印字。傳教士沒有浪費時間，旋即將西方最新的印刷技術，播種於遠東，其中又以耶穌會士推廣最力。不過，道明會的貢獻也不宜忘卻；十六世紀末，在馬尼拉郊區的帕里安，以木刻版印製的幾本中文宣教小書，即由他們所監印。

沙勿略於一五四九年起在日本傳教，至於他的第一批後繼者，包括了一五八四年前後來華的羅明堅神父；起初他們只想利用當地既有的木雕版來印書。倒是一五八四年帶著四位「小使節」(侍童)離開日本的范禮安神父，很快地有了別的盤算，即欲以歐洲的活字鑄造法供應當地所需。這個念頭終在澳門實現，先是於一五八九年印成一冊學堂教本，一五九〇年又印出以拉丁文撰寫的東瀛使節西遊記。在日本所謂的「基督教年代」(即一五四九至一六四四年)裡，包括改編版的歐語詞典在內，相繼印出至少二十種書本，反映多元的閱讀興趣；這些書還被人爭睹、競相收藏，如同古騰堡印書、首批莎士比亞印刷書一樣珍貴。從文獻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日本的「搖籃本」，地位甚為重要，直可與梵文佛典首度譯成中文的抄本相提並論。學者鑽研這些首批印刷書，可謂字斟句酌、鉅細靡遺；這不僅是爲了研究近代方言，更是爲了釐清日语文法與字彙，在歐洲思想的影響下，發生了哪些難以體察的變異。

改寫成中文、越南文、韓文、東印度語的西方書籍，亦隱含類似的訊息可供研究；這些書籍多半只剩抄本傳世。不過，比起那些引介西方思想不甚起勁的國家，歐洲著作在中國發揮的影響

力，便顯得重要許多。除卻十餘本以木刻版打印的歐文書籍，西方著述譯成中文者，數量更是眾多，直可填滿一座圖書館；此係第一批天主教傳教士，即「北京神父」的貢獻，值得在此略加敘述。

中國歷史上，修編、翻譯基督教文本的第一人，當推來自那不勒斯的羅明堅神父。一五八三年，復有利瑪竇神父投入這項工作；這位才幹出眾的義大利人，奉獻多年時間研習文武百官使用的文言文與口語，並翻譯中國最欠缺的科學典籍，以及人文主義著作選輯。前者以航海學、天文學為大宗，後者則承襲伊拉斯謨斯與斯多噶派學人的筆法，選譯《箴言》等書。利氏於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辭世之後，中國的耶穌會士派遣出身杜埃的金尼閣返回歐洲。他肩負數項任務，其中包括儘量蒐羅大量典籍，供中國傳教之用；一六一六年抵達羅馬後，又有鄧玉函旋即表示願當他的助手。鄧氏本名施瑞克，拉丁名喚泰倫修斯；此君曾經行醫，並與天文學泰斗伽利略連袂加入新創的林塞學會。也因爲金、鄧兩人跟教會層峰關係良好，與創辦米蘭聖安博圖書館的樞機主教博羅梅奧過從尤密，所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即籌措到大量的圖書，其內容之豐富，足以媲美歐洲一流圖書館的館藏。爲此，他們甚至遠赴法蘭克福大市集購書。幾經波折，這一整套獨一無二的書籍，終於運抵北京；其中光是醫學著作，流傳迄今的就超過兩百冊。此後，多數圖書皆能完好保存（一六四四年清兵入京焚城、一九〇〇年義和拳亂，這些典籍泰半倖免），甚至因爲法王路易十四於一六八八年遣使節團贈書，與其他使節、傳教士的慷慨捐獻，迭有擴充、增補，直到十八世紀。連同數本原始印刷書在內，這些書籍計有四千餘冊保存至今，現由北京大學的圖書館所典藏。隸屬拉匝祿會的司鐸維哈倫，曾獲洛克斐勒基金會襄助，爲其編訂詳盡的圖書目錄。

在中國的千年古都、文化重鎮裡，這些書乃是首見的歐洲圖書選集，意在引介西方文化與文學的菁華，並譯為中文。不過，譯介經典的工程浩大，令人卻步；來自科隆的德人湯若望，則是接受艱鉅挑戰的第一人。由於聖名保祿的大學士徐光啓從旁協助，湯氏終能出版全一百巨冊的《理百科全書》。俟一六四四年明朝陷落，滿人入關建國，前述壯舉一度中斷；所幸湯氏得到清朝首位皇帝順治的庇護，官拜欽天監監正，百科全書亦得以重印。一六六一年順治駕崩，失勢的湯若望旋即下獄，由法蘭德斯教士南懷仁接續其工作，並成為聖祖康熙（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的首席大學士。

由法國耶穌會士洪若翰領軍的五位數學家，銜法王路易十四之命，於一六八八年抵華；他們的本意，是在中國建立隸屬巴黎「法國科學院」的學術機構。一七〇六年，他們開始繪製大清輿圖，亦是值得一書的成就；大力提倡歐亞文化交流的德國大哲萊布尼茲，在看過他們以中文印製的作品後，大表激賞。至於康熙的孫子，也就是高宗乾隆（一七三五至一七九六年在位），僅容忍歐洲傳教士加入曆算學會，未予重用。但他至少還知道以凡爾賽宮為藍本，修建圓明園；清帝國版圖二度勘測的結果，在他任內出版。

此類西典中譯的工作，催生出不下數百種新書，日後卻逐漸式微；耶穌會士於一七六二年遭清廷鎮壓，乃是諸多原因之一。倒是十八世紀的歐洲，以法國人為主的各地傳教士，出版多種側寫中國的書籍，稍稍彌補了這種缺憾，也為近代漢學奠定基礎。這些著作包括《一七〇二年起中國異聞與啓示》（一七三五年出版）、杜赫德神父編撰的《中國概述》，以及全書十六卷的《中國回憶錄》。

印度的發展情形，與中國類似，只是規模較小。歐洲人在當地興建天文台，其中以位於阿格拉者尤具盛名。另有許多印度的重要典籍譯為歐文，其中又以吠陀經最爲重要。十八世紀耶穌會的卑斯齊甚至使用坦米爾文字，創作數首長篇史詩。奈何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征伐各國期間，東西交流中斷；之後，兩邊的關係雖緩步恢復，但扮演要角的卻大都是新教的傳教士，時空脈絡已大不相同。也因為西方科技一度使東方文明處於相對弱勢，兩造的往來更無平等可言。特別是在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過後，歐洲人幾乎完全宰制東方。在這種宰制中，印刷書扮演關鍵角色，唯印書的動機盡是爲了西方國家的利益；直到一八五三年，日本幕府將大政奉還明治天皇，與一九一九年中國展開五四新文學運動，東亞國家方才憑藉一己之力，傳承初燃於十六世紀的文化火炬。

第七章 書籍生意經

前面已經提過，十五至十八世紀間，印刷鋪的數量增加了數倍，至於印製的書本，數量同樣持續增加。必須釐清的是，當時的印量與今天相比，仍然差上一大截。各式各樣的書籍，大批裝箱、風塵僕僕地運往各地，其中又以大眾讀物，包括年曆、曆書、字母書、祈禱書、宗教小冊，以及十六世紀末開始流行的古早騎士冒險故事，占了很大一部分。此外，同樣自十六世紀末開始，學校、學院的數目激增，帶動教科書需求的成長。除了這些，就只有最暢銷的書本，得以廣獲閱讀；其餘的書，亦即絕大多數的印刷品，實則只能得到極少數讀者關愛的眼神。如此一來，出版商在這個時代裡，自始至終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便與其他行業裡，從事相同產品大量生產的製造商，並無二致，亦即：如何找到足夠的零售通路？今天的出版商固然有同樣困擾，但程度已比當年減輕甚多。故長期以來，出版商持續關注的中心議題，在於如何組織商業網路，好讓自己能生產的書本能儘速銷出。

一、基本資料：每版印量

大致上來說，只要先將活字拼組好，既存的文本印成再多份，都是可行的；即便使用最原始

的印刷機，或至少較早期的印刷機，欲印製大量的書本，技術上皆無困難。更何況，從成本的角度看，印刷前的必須準備工作，包括排組活字在內，乃是一筆無可避免的大開銷，占印書總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考慮到這一點，書商與印刷商，自然認為每次付梓的書籍，所印冊數應該要多，攤銷前述的固定成本，單冊印製的平均成本才會低。反過來說，單次印書的數量，一旦達到某個上限，再多印便不划算了。原因之一在於，最初成本的攤銷效果，會隨著所印冊數的增加而逐漸減弱；到頭來，單冊的印製成本縱使降低，幅度也小到沒有意義。另外一個原因，則足以突顯零售通路的重要性：要是印製數量過剩，令書市無法在合理時間內消化，豈不是本末倒置？總而言之，枉顧印量過多之弊，將使許多書本賣不出去，或至少銷售過慢，讓龐大的成本難以回收。

以下是相關的數據。首先，從印刷術誕生起，到一四八〇或一四九〇年，問世的乃是最早期的印刷書，而當時的書市，相對而言鬆散、無組織²⁶⁸。至於印書數量，今人看來頗為有限。一四六九年，施派爾的約翰在威尼斯打印的西塞羅《家書》，總數不過一百本；聖安東尼努的《告解錄》與斯塔提烏斯詩集，分別在一四七七與一四八〇年，於瑞波里的聖雅各伯修道院印出，數量也相同。根據德利尼亞明本人於一四七二年所留下的線索，他在同時期於羅馬印製的書籍，每一版平均數量約為一百五十本。倒是同在羅馬的競爭對手史威罕與潘拿茲，普通書籍的平均印量多達兩百七十五本，多納圖的文法書更是印了三百本。奈何事實卻很快地證明，如此發行量在當時仍然嫌多；縱使是羅馬這種人文重鎮，史威罕與潘拿茲仍舊抱怨古代經典書籍之人間津，足見市場無力消化。到了一四六五年，紐麥斯特在福里尼奧印出兩百本西塞羅；一四七一年，貝爾富堤於費拉拿印製的查士丁尼大帝《法學總論》，數量也是兩百。此後，發行量增多，在威尼斯尤

然；這個城市位居商業與文化要津，欲往四面八方輸出大批書籍，都很方便。早在一四七一年的威尼斯，施派爾的溫德林，業已將帕諾米塔諾的《教令集》評注，一口氣印了一千本。一四七八年，威爾德又應法蘭克福的尼古拉斯之邀，印製了九百三十本拉丁文《聖經》。對那個年頭來說，這種發行量宛如天文數字，溫德林突然陷入周轉困境，可能也是這個緣故。

到了一四八〇年，市場的秩序與組織開始浮現。堪稱史上最早跨國書商的柯貝格家族，便在這個時候，真正做起大生意。此外，書本售價更跌至過往價格的零頭，各版書籍的平均印刷量則水漲船高。根據海布勒的說法，一四八〇到一四九〇年間，多數書籍一次付印的數量約當四百或五百本，比這更多的情況也逐漸普遍。利克斯於一四九〇年的瓦倫西亞印製傳奇故事《白武士提南》，數量即超過七百本；幾年之後，迪阿羅帕於佛羅倫斯印成的柏拉圖作品，共計一千零二十五本。威尼斯有卡普加薩，於一四九一年印出一千五百本每日頌禱；那不勒斯一地，則在一四八九年，由摩拉烏斯印製兩千本卡拉喬利的《講道暨諸聖頌詞》。托爾提又在一四九〇年，於威尼斯出版《查士丁尼法典》，印量一千三百本；他還兩度印製教宗國瑞（或譯格列高利）九世的《教令集》，兩版各印了兩千三百本。

就這樣，到十五世紀結束之際，一些天出版商的書籍平均發行量，已達一千五百本；柯貝格籌備的較大規模出版品，印製數量亦大抵如斯²⁶⁹。此後的印量，長時間停留在這個數字。倒是畢達針對戴塔普勒主張而作的《注釋集》，發行時間雖晚，印刷量只有六百五十本；至少出版商貝德在一五二六年的說法是如此。不過，在此之前不久，君王法院曾經審查此書，貝德未將此書擴大出版，疑是當權者偵查下的對策。兩年之後，貝德出版一本修斯提底斯文集，數量又恢復成一

千兩百二十五本。同年，魏卻爾委託波拿梅所印的奧古斯丁《聖詠評注》固然也只有六百五十本²⁷⁰，但一五三九年，波拿梅替勒布雷特與布魯耶利印製的多赫《眞知學園》，數量又達一千五百本²⁷¹。同一時期裡，希臘諷刺作家盧奇安的短篇作品《帕里奴烏》，問世於一四九七年的亞維農，印量一千五百本；俟一五一一年，盧爾的《智術摘要》付印，數量爲七百五十本²⁷²。最後，印刷商葛朗也在一五一五年於阿格諾印製西班牙傳教士德波塔的《諸聖節慶經》（依時節不同而變異的專用經文，但不包含聖誕節期間所使用者），共計一千五百本²⁷³。綜合這些數據，則十六世紀早期的書籍平均發行量，應在一千至一千五百本之間，偶有低於此一數量者。另外，伊拉斯謨斯在一五二七年的一封信中提及，他的《對話集》一度遭德柯萊盜印兩萬四千本之多；或有人據此判斷，當時的書籍中，今人所認定的大受歡迎之作，出版數量必定較多。只是，伊拉斯謨斯的指控，道聽塗說而無實據，經不起書誌學家較具公信力的考證²⁷⁴；所謂兩萬四千本恐爲自吹自擂。實際上，就算是極有機會大暢銷的著作，印製的數量可能也不比普通書本多出太多。例如一五一五年，富羅本於巴塞爾印製的伊氏名作《愚人頌》，成品就只有一千八百本²⁷⁵；路德翻譯的德文《聖經》，初版數量亦不過四千本²⁷⁶。所幸，單次印刷的數量少，並不會限制這類著述的廣泛流通；透過多位印刷商（通常已經不是初版的那一位）屢次的重印、再版，書籍傳播各地，不成問題。

因此，這個時期的印書量，可說相當穩定。普朗坦是十六世紀後半的大印刷家，以豐富人脈形成高度發展的商業網絡。他所印刷的每一版書，都在一千兩百五十到一千五百本之間，幾成慣例。特殊的作品，諸如多東斯的《草穀誌》等，普朗坦的印書量偶見縮減，約在八百本上下；倒

是有些時候，對於學術著作與教會聖祭用書，他的印量不減反增。一五六四年克雷拿的希臘文法書，與一五六六到一五六七年間推出的《民法大全》，印量皆達兩千五百本。普氏印製的希伯來文《聖經》裡，某些篇章的印量甚至達到兩千六百至三千本，其中一部分銷往北非的猶太殖民地²⁷⁷。在英格蘭方面，由國王授予特權的「星法院」於一五八七年裁定，國內發行的書籍，各版的數量不得超過一千兩百至一千兩百五十本，偶有印刷三千本者亦屬罕見²⁷⁸。

十七世紀的印刷量，沒有太大改變。高乃依的三部劇本，《尼科梅德》、《伯塔萊特》與《安卓梅德》，印量皆在一千兩百至一千兩百五十本間²⁷⁹。替布瓦洛出版諷刺詩《讀經台》的商人，認定這部作品應可賣到一千兩百本²⁸⁰。在專門出版古希臘羅馬經典的商人當中，呂伊納堪稱主力；他所印製的普利米作品《荷蘭戰史》，計法文版一千本、義大利文版五百本²⁸¹。拉布呂耶爾的《品格論》數度重印，而最早的八次出版，每次的印量都在兩千本左右²⁸²。在荷蘭，艾齊維埃將格勞秀斯在一六七五年發行的《基督教教真理》重新付梓兩千本，供應英國市場²⁸³；一六三七年，萊登一地則有梅耶，首度印製前面章節所提過的《方法論》，數量三千本²⁸⁴。雖有部分的重要著述、知名創作印量低於一千本，但絕大多數的重點參考書、教科書，單版印量都在一千到兩千本間擺盪。《法蘭西學院字典》首度付印求售，係由庫瓦亞爾擔綱印刷，成品一千五百本²⁸⁵。皮圖版的《教會律法全覽》出版於一六八七年，印量一千五百本；相較之下內容略少的《法文律師手冊》，曾由卡特倫於里昂印出一千五百本，時值一七〇四年²⁸⁶。另外，一六七七年，阿里亞加的《神學辯》，由安特衛普出版商維杜森發行，印量一千五百三十本；同書也在里昂出版，由阿尼松印行兩千兩百本²⁸⁷。阿姆斯特丹，則是哈瑪開業之地，他在一七〇一年，印製一千

五百本的馬連新編荷法詞典²⁸⁸。

在這個時期，印量經常突破兩千冊大關的，只有宗教書與課本。部分產自荷蘭的《聖經》，印刷冊數似乎超過三千本，甚至達到四千本²⁸⁹。俟十六世紀接近尾聲，盧森堡與列日的盜印商，剽竊巴黎德斯普雷的翻印權，複製了兩千五百到三千本的德沙奇版法文《聖經》²⁹⁰。納爾邦一地，則有印刷商貝塞，印製三千本的字母書²⁹¹；里昂的摩廉，更將一部名為《皇家小典》的拉丁文法文字典，一口氣盜印了六千五百冊²⁹²。

講到十八世紀的書籍印刷量，還是以少於兩千冊者居多；不過，那些確定會大受歡迎的作品，印量自然多些。對開大小的蒙福孔著作《古物釋》，首次付梓印出的一千八百本，在兩個月內便告售罄，但第二次印製的兩千本就沒有那麼好賣了²⁹³。莫勒里的《詞典》，由書商庫瓦亞爾在巴黎印製，此後數度再版，每次印量皆為兩千本²⁹⁴。在另一方面，培爾的《詞典》係依莫勒里版重新編撰，單次印量似乎也更多（超過兩千五百本）²⁹⁵。潘庫柯會計畫將自己的《百科全書》印製兩千一百五十套，時值一七七〇年；到狄德羅的《百科全書》問世之時，初版數量終於達到四千兩百五十套之譜²⁹⁶。列日印字社也會同時推出三種不同版本的愛爾威修作品，其中四開本版僅印五百本，另兩種八開的版本則分別印製一千本與兩千本。該社還將梅爾西埃的劇本《巴黎風情畫》盜印一千五百本，須臾便在列日一帶銷售一空；至於插圖版的《達夫尼斯與赫洛雅》同樣暢銷。此外，這群印匠也在一七八八年，規畫將盧梭作品合輯打印一千五百本²⁹⁷。

前述的數據顯示，即便到了十八世紀，出版商對於委印真正大量的書籍，還是有疑慮。文學書籍中，由部分「啓蒙哲人」撰寫的作品，則是印量較多的唯一例外，伏爾泰的著作尤然。克拉

默除了將伏爾泰《風俗論》印製七千本出版，還會對下游書商承諾，只要伏氏的《俄羅斯帝國史》印完兩千本，便將儘快運往巴黎；言下之意，印刷的總數不止兩千。《路易十四的年代》一書在柏林的發行量，亦達三千本²⁹⁸。但若是剔除當時的教科書與歌謠故事集，則十八世紀的單版印刷量，比起其他時期並不算多。這不免令人覺得，即便是確知出版後將大受歡迎的作品，也沒有出版商敢用大幅超越傳統印量的規模來印書。箇中理由如下。

從紀錄上看，即便是今天的出版社，也只需印製數量少到令人詫異的書籍，就足以應付一個中型城市裡所有潛在讀者的需求。當然也有一些例外：像在法國，贏得龔固爾獎的著作，銷量就會好些。因此我們可以猜想，在十六、十七甚至十八世紀，城鎮人口比現在少的多，讀書的人比例小的多，運輸更形艱困，盜印也更加猖獗，書商所面對的難題尤甚於現代。

以下的數據，有助於我們認識當時的書籍物流學，並從中得窺，將大量書籍分批託運，每批數量皆甚少，僅含數本，有時甚至只有一本，相同著作的情況，究竟有多普遍。畢達的《注釋集》，詮解對象為戴塔普勒與伊拉斯謨斯。貝德曾發行此書，而一五二六年的配銷情況如下：三十二本給紐倫堡的梅爾希奧·柯貝格，五十本給貝德在里昂的代理商（擬銷義大利），五十本給另一位代理人，二十本給事業遍及巴塞爾與巴黎的書商雷許，六十二本外銷英格蘭，四十本賣往盧昂，六本運往奧爾林²⁹⁹。十七世紀時，一起出貨的各網書籍，所含數量同樣偏少。這點從下面的清單裡可見一斑：一六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摩雷特斯向克拉馬希訂購的書本，計有：法學專家修邦的作品三本，杜皮伊的《法國教會特權紀實》十本，《民刑事實務判例》六本，奈歐里的

《酷暑集》三本，波利比奧斯作品三本，亞里斯多德作品三本，《不列顛本國律法評注》六本，以及杜珮隆作品三本³⁰⁰。十七世紀後半，書本訂單的規模大抵相同。德呂伊納曾在洽詢客戶時宣稱，自己印製的普利米《荷蘭戰史》，有二十四本交付里昂的阿尼松與波蘇伊販售，五本批給南特的胡格維爾，八本批給雷姆的加尼爾，六本批給波爾多的拉寇爾，另出貨予杜埃某書商的也有四本³⁰¹。這固然只是德呂伊納剛開始推銷書籍時的成果，卻足以證明，當時依訂單出貨的書本，數目究竟有多少。

凡此種種，贅列無益，就此打住，來看看最後這個特別值得研究的例子：即克拉默兄弟籌印的伏爾泰全集，甫出版那一年的配銷情況³⁰²。他們有些時候分批出貨，但也有大量託運之時。巴黎的書商當中，一位名叫羅賓的得書一千六百冊，另一位藍伯也有六百冊；亞維農諸書商分得一百四十二冊；巴塞爾的書商八十冊；迪戎的零售商三十六冊；阿姆斯特丹的雷伊五十冊；盧昂的馬素爾七十五冊；巴松皮埃爾的書商二十五冊；尼姆的高德二十五冊；貝桑松大教堂一位名叫吉伊伯的教士二十五冊；米蘭的雷森德與哥羅布二十五冊；里昂書商中則有德拉維伊二十冊、布魯伊塞十八冊、德拉羅赫十二冊、坎普十五冊；漢堡的赫羅德二十四冊；馬賽的布瓦爾與寇隆各十六冊；哥本哈根的菲里伯十二冊；利摩日的巴爾樸十二冊；布魯塞爾的瓦希十冊、修奧七冊；紐倫堡的洛赫納六冊；萊登的魯薩和六冊；其他小額出貨，則運往熱納亞、加地斯、杜林、米蘭、帕爾馬、伯恩與威尼斯；以上並不包括直接賣給個人的零售額。

二、圖書交易的問題

統籌一個有效率的經銷系統，是書商的必要工作。倘若書本皆以前述的少量多次方式，託運過大半個歐洲，這件工作將更形棘手。首先，就運輸而言，書籍屬於貴重商品，重量可觀且搬運不便。在那個年代裡，運費自始至終居高不下，此對書本售價的影響甚鉅。爲了降低書貨的重量與體積，當時習慣以散裝形式運書，即不加封皮逕行裝箱。只是，這種方法有很多明顯的缺點。印刷鋪裡負責裝箱的工人，還得確定書內各頁全無缺漏且順序正確；這不僅容易出錯，更令當時的書商得經常去函印刷商，索取漏頁缺張，才能湊齊一冊完整的書本。

此外，書籍也是種脆弱的商品。早期運輸方式只有兩種，不是船運便是車載，故書籍可能在途中就被艙底的海水泡爛，或因天候惡劣，於載具上被雨淋濕。一般說來，貨物都會用牢固的木製板條箱裝盛，以避免損傷，但在運抵目的地時，濕透或破損的書本，仍是所在多有；萬一運輸過程中還得多次更換交通工具，損壞的機率就更高了。據我們所知，當時的安特衛普書商，係以如下方式出貨：運往巴黎的，交給專門（或經常）運送此類商品的馬車夫，全程車載；再不然，就是先經海路運抵盧昂，再轉交塞納河上的平底船。至於運往里昂的，有時以貨運工具直接送達，但多半會先抵巴黎，再由里昂書商在當地的代理商負責，半陸路、半水路地轉往目的地。普朗坦會將許多書籍運往西班牙，先走海路抵達盧昂或布列塔尼的某個港埠，續以海路運至西國港口，繼續轉銷至美洲者亦屬常見。摩雷特斯便因爲書本出口但澤、卑爾根、英格蘭等地，經常煩惱著船期問題，焦急地等待商船入港，或爲惡劣天候憂心，戰時還得提防像巴爾這種劫掠敵國船隻的海盜。其實，一旦爆發戰爭，整個書籍產業都有危險。在紅衣主教黎塞留時代，法國會與西班牙交戰，期間低地諸國便因爲多項皇家禁令，無法直接與法國通商。權宜之計應運而生，並成

爲普遍的做法：先把書籍裝上掛著中立旗幟的貨船，送往多佛的某家書店，再安排轉往巴黎；若非如此輾轉，貿易無以爲繼。即便在承平之世，貨運風險亦不可謂小，對里昂書商來說尤然；他們有許多商品銷往義大利與西班牙，前者必須以載具橫越阿爾卑斯山，後者在抵達羅亞爾河畔之前探陸運，之後藉河道前往南特，再經大西洋運至西國港口，最後才經陸路抵達坎波城，配銷其他地方³⁰³。

在多數情況下，無法直達目的地的書本，都必須仰賴書商在轉運地點安排代理人，方能順利出貨。也因爲當時的識字率低，貨物在轉運時遭人遣往錯誤地點，遂成爲必然的額外風險。除了寫明收件地址，委運人通常會把貨品目的地的地名縮寫，以花押字樣刻在箱上，但此舉經常幫倒忙。這種種的問題，解釋了這個行業爲何總發展在往來方便、通聯順暢的地方，諸如港埠與其他正在擴張的商業中心。

貨箱完好無損地送達，寄件人與收件人總算鬆了口氣，接下來只要付清貨款，就算功德圓滿。但對書商來說，這個階段的問題，才是最、最棘手的，畢竟當時的金融體系，甚難滿足這種貿易需求，欲以實體貨幣付款，通常無法如願。要求書商每收貨一次，就把貨款寄往海外一次，焉能不出差錯？這當中有太多無法克服的難處，他們只好另謀他法，甚至成本提高也在所不惜。

十七世紀末之前，貿易商大都以兩種方式代替直接付款，除了實品償抵、以物易物³⁰⁴，亦可使用承兌票，而兩者更經常並用。大致流程如下：收到貨品時，書商便將己方的欠款記在帳本

上；同樣地，如果出貨的人是他，他也會記下自己應對客戶催收的款項。經過幾次交易（通常是頗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所有參與買賣的書商各自結算，欠款的一方再透過傳統的承兌票來付款。舉例來說，克拉馬希在巴黎向安特衛普的摩雷特斯批貨，素來多過對方從他那裡進貨，損益相抵之後，他自然成爲較常欠款的一方。不過，由於他過去曾對布魯塞爾的書商（尤其是老雷歐拿，即巴黎雷歐拿的父親）大量出貨，只要開出承兌票，要求雷歐拿將積欠他的貨款移轉給摩雷特斯，他與雷歐拿的債務便同時清償。安特衛普鄰近布魯塞爾，兩城當時又隸屬同一國家，這麼做當然不會有問題。這種制度的原理看似簡單，實行上卻頗爲複雜，畢竟承兌票會在過程中數度轉手。尤有甚者，此法有時會誘使書商在從事買賣時，倚賴手中承兌票（而非法定貨幣）的效力，一如其他行業的商人；偏偏這麼做是有風險的。一旦國與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中斷，買賣便有癱瘓之虞；而貨款清償延宕的結果，還可能導致某一方的破產，連帶引發其他書商的周轉不靈。爲了降低自己的生意風險，書商大都願意在同業面臨破產威脅之時，再度代墊或協助周轉，否則別人跳票，自己的買賣也無以爲繼。而這種制度更成爲做生意的標準方法，直到十八世紀爲止。

三、圖書市集的交易方式

這麼一來，對早期的印刷商而言，如何建構確實可行的商業網絡，快速而有效率地將足額的書本賣出、紓解現金壓力，便成了主要的課題。爲了解決這個難處，首先應運而生的方法，就是透過中間人買賣。早年的印刷商，很早便開始雇用自己信賴的人士，替其遊說促銷；這些仲介人

造訪大大小小的各城鎮，尋覓潛在的客戶。多數情況下，他們會帶著許多小張傳單與招貼，除了宣傳生意，也將自己兜售的書籍逐一列出。抵達某座城鎮之後，他們旋即張貼、分發這些廣告單，通常單子上還會註記著他們落腳的旅舍名稱，以及哪幾天是他們的營業日。顯然，這仍是相當原始的手法。而地方節慶的日子，自然成爲仲介商常造訪某鎮的時節，藉此對更多人宣傳，招攬更多商機。至於令四方商人匯聚於一處的市集，當然也會出現他們的蹤跡，期待前來趕集的商人賺了錢後，順手向他們買本書或月曆。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些趕集商人有可能受不克前來的同鄉所託，代爲訂購書籍，亦可能願意替賣書人運貨或收款。有些時候，商人之中甚至會有人批走一小部分的書，回鄉承銷。如果仲介商在某鎮的業績特別好，他們便會一再造訪，最後可能常駐此地，憑藉自己的力量，或由聘雇他們的印刷商出資，開設小書攤或店面。這麼一來，零售書店遂普遍開業，廣設於許多的城鎮，並負責將上游大出版社的商品，分別賣給各地的民眾。

此後，書籍事業很快地發展成涵蓋全歐的大組織。巴黎原本即是手抄本謄製與買賣的重鎮；早在一四六〇到一四七〇年間，修埃佛與他的仲介商，便已造訪這個大城，並於此時安排史塔波恩常駐當地，做他的長期代理商。一四七四年，史塔波恩死時，庫存的修埃佛書籍，價值高達兩千四百二十五克朗。史威罕與潘拿茲，自德國派遣代理商常駐羅馬的時候，恰好也是其他事業規模比他們小的書商兼印刷商，開始與大出版商簽約代銷商品，或彼此合併、共同銷售自印書籍之時。邁寧根的萊因納迪，雖只印製過一部重要作品，卻能遣人聯絡上義大利的書商，在該書出版的同一年，將其遠銷至羅馬與佩魯嘉。另一方面，佩魯嘉本地的部分書商，則聯合起來出版書籍，在一四七一到一四七六年間，憑藉他們籌設在羅馬、那不勒斯、錫耶納、比薩、波隆納、費拉

拿、帕度阿的書攤，廣銷各地。同樣地，馬提亞與台夫特的蘭柏圖，開業的地點雖然都在熱納亞，銷書的範圍卻不限於倫巴底的諸多城鎮，還向南延伸至那不勒斯王國。至於里昂的小布伊爾，如何在一四八五年之前廣泛拓展銷售通路，以及紐倫堡的柯貝格如何外銷書本，前面章節業已詳述；同時期的威尼斯，書籍交易同樣已經高度組織化。據悉，楊頌在死前一段時間，似乎已經放棄印刷，全心投入書籍銷售，為此還與好幾位德國書商締結重要的合夥關係，即「尼可拉·楊頌暨同業」出版社，並在多個義大利城鎮安排代理商，尤以羅馬、佩魯嘉、那不勒斯等地為最。楊頌的夥伴則在他身後，與經營出版社的曼騰以及科隆的約翰結盟長達五年；此一新事業的組織廣布各地從事交易。就在零售通路與日俱增的同時，各版書籍的印量同時成長，書本的單價隨之下跌，亦符常理，不足為奇³⁰⁵。

到了一四九〇年前後，書籍產業的銷售組織，已經相當健全，歐洲的每一個角落，盡皆納入。多數的城鎮，都有零售書商，提供大出版社的產品供人選購，而這些出版社的代理商，也出現在許許多多的城鎮裡。從那時起，產業內部開始形成階層組織。躋身出版鉅子之列的柯貝格，光在法國便有三家分鋪，設於巴黎、里昂與土魯斯。土魯斯有位名叫德帕黎的印刷商，因為西班牙的生意需要安排，還在一四九一年派遣麾下某位代理人遠赴該國，拜訪柯貝格的手下，足見其影響力之大。在這之前的一四八九年，來自瓦倫西亞的書商兼印刷商利克斯，則在西班牙的許多地方，替數家威尼斯的出版社銷售書籍。同一時期裡，「叫賣書販」在法國出現，而在德國境內更是普遍；他們或在城鎮，或在鄉間，販賣小冊書本與曆書。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得以風行草偃，這些人的傳布居功厥偉。

在市集場合賣書，乃是既有的慣例，起源甚早，並延續數百年之久，舉凡巴黎地區的許多市集，與英格蘭斯道布里吉的大市集，此景皆然³⁰⁶。趕集的商人得享通關特權與各種優待，令搬運集散更方便；貨幣兌換員的設置，促進了商品的成交；聞風而來的龐大人潮，更使商人不愁找不到買家。大型市集也就這樣成爲早期印刷商與書商的關注焦點。其他的有利因素如下：市集定期舉行，利於書商定期結帳、償債；鑄模匠、刻字師傅，也會現身市集，便於印刷商採買器材；它又宛如論壇，同業在此討論常見問題，並宣布未來的出版計畫，藉機確認其他人即將出版的書籍未與自己重複；此外，這更是聯絡、洽談生意合作的良機。凡此種種，都是趕集的重要理由。欲理解書籍產業的成長，就不能不探究，萊比錫、里昂、法蘭克福、坎波城等地的大型市集，究竟在當時的歐洲扮演何種角色。

起初，最重要的圖書市集所在地，當推里昂³⁰⁷。很早之前，這個城鎮便是舉足輕重的印刷業基地，同時身兼數個跨國大型市集的舉辦地點。從百年戰爭結束起，此鎮便數度獲得特許與皇室授權，致力於各種市集的籌建，期間迭有興衰，但在路易十一於一四八三年駕崩之前，穩固地位儼然確立。法國入侵義大利，實則刺激了法義兩國的貿易，尤其帶動里昂與當地諸市集的成長，於十六世紀前半達到高峰。如此蓬勃光景，全賴其位置優越，地處商業要衝。值此時期，頌恩河與隆河的水運，承載數量龐大的貨品；此外，里昂還是兩條重要陸運路線的匯合點，一條取道吉羅堤耶橋，途經多菲內與阿爾卑斯隘口，進入義大利，而另一條則在羅阿訥與羅亞爾河再度交會。里昂有著熙熙攘攘的商業活動，對此威尼斯人李波馬諾有如下描述：「此地幾乎處於義大利與法國的邊界，又假瑞士與德國通連，就此成爲歐洲最富裕、人丁最旺的三個國家，共通的寶

庫。」所有在歐洲境內買賣的商品，在里昂的市場上統統見的著，尤其是香料與絲綢；產自義大利、葡萄牙與黎凡特的稻米、杏仁、香草、藥草、染料，也得先經里昂，再配銷至法國四隅。

如此一來，里昂市集的商業重要性，便愈發顯著。歷任法國國王與地方政要，大方地將各種權利授予各國前來趕集的商人，正是爲了繁榮市集。在這裡，商業機密得到保障，商人不必出示帳本供官員稽查，金錢借貸皆獲恩准，至於造訪市集的外國人士，出境入境都沒有橫遭阻擋之虞。此地的商人不用擔心私掠許可證、財產沒入令，或財貨復歸法的騷擾。就連他們攜往市集的商品，亦獲數項特權保護，且免繳運輸稅捐。

市集每年舉行兩次，每次十五日，期間商販與滿載貨品的馬車，雲集於里昂。由於此地沒有棚頂商場供生意人進駐，趕集商人的攤位，便設在任何找到空位的場所，有的位於街道兩側，有的坐落廣場各處；有人布置體面的貨架，有人搭起應急的遮蔽；甚至連以前用來暫屯貨物的旅館，也變成開張的地點。市集的核心，則是頌恩河上的幾座橋樑，以及聖尼齊耶教堂周邊的小胡同。

販賣結束之後，才是付款的時刻。市集舉行期間，買賣憑藉的是實質信用，而後由交易所於市集結束時下令停止所有的純商品交易。接下來兩到三天，貨款未訖而產生的信用狀，得由帳簿的一方來「認帳」，即就期滿付款的約定正式達成協議。而後，商人分別派出代表，協商後決定承兌票於第三地兌現的期限，以及下次市集之前適用的票據利率。三天過去之後，開始結清雙方確認無誤的賒款，現金償付固無不可，但大都是開立承兌票。如此交易方式，自然吸引銀行家前來里昂，其中又以義大利的銀行家最負盛名，並使里昂很快地成爲法國的金融中心。

書商與印刷商，大都將店鋪設在梅西耶街與其附近，並成爲里昂商業活動的中堅；他們之中還有不少的外國人。一五〇〇年之前，在里昂謀生的書商與印刷商約莫四十九人，其中法國人還不到一半，僅二十位；德國人則有二十到二十二位，義大利人五位，比利時人一位，西班牙人一位。拜地理位置之賜，里昂變成了一整個地區的跨國書籍交易樞紐，當時舉足輕重的義大利書籍，便由里昂書商引進法國，至於德國書與瑞士書亦然。不過，在進口書本之餘，他們照樣從事仿印、偽造外國書籍的勾當。藉著開設於土魯斯的分鋪，他們也在西班牙書市的拓展上，扮演關鍵角色。基於此，季翁塔、加比亞尼與波托納黎等主要的義大利出版家族，迅速於里昂開設分店，也就不足爲奇了；這些分店大都發展成重要的事業據點，走上獨立經營之途，但還是會與以前的總店密切往來。里昂的市集就這樣迅速地發展成大規模的圖書市集；源自義大利、德國、瑞士的書本，經此銷往法國與西班牙，同時也有許多法國印製的書籍（其中又以出版於里昂的法律書刊最享盛名）由此銷往義大利、西班牙與德國。這些市集還成爲一般人匯聚群集的盛事；他們愛讀的通俗書刊，在此大量售出，包括曆書、預言書、通常伴有木刻插圖的通俗故事集等，盡皆待價而沽。拉伯雷自言其作品《巨人卡岡都亞傳》大受歡迎，在一次里昂市集上，就可以銷出比《聖經》長賣十年更多的數量³⁰⁸。

十六世紀裡，另有一個圖書市集發展茁壯，重要性甚至超過里昂市集，即法蘭克福市集³⁰⁹。在美因茲印刷業肇始之時，距其不遠的法蘭克福，早已是重要市集長期舉行的地點，市集本身更變成整個萊茵地區的票據交換所，其他市集相形失色。許許多多留存至今的十五世紀晚期、十六

世紀文獻，皆佐證了它在當時的顯赫地位。就連英格蘭與低地諸國的布帛商，也為趕集遠道而來。來自東方的香料、產自南歐的佳釀、德國諸城的製品，統統在法蘭克福成交。呂貝克、維也納、威尼斯、里昂、安特衛普與阿姆斯特丹的商賈，在這裡跟史特拉斯堡、巴塞爾、烏姆、紐倫堡、奧格斯堡的同業互通有無。至於商品的種類，更是不勝枚舉：魚類、馬匹、漢撒同盟（起源於十三世紀的日耳曼商業聯盟）諸鎮的葎草與金屬、波希米亞的玻璃、鋼料、白銀、施泰爾馬克的錫、圖林根的銅、烏姆的亞麻、亞爾薩斯的酒、史特拉斯堡的布帛與金飾銀飾、瑞士的酒、義大利的酒與油品，以及來自東方的各種產品。早在歐洲人發現前往印度群島的航線之前，法蘭克福市集上便有大象的蹤跡，其國際化的程度可見一斑。不管是白銀還是其他商品，在這裡的市集都買得到；湧入此鎮的商人，與絡繹不絕的篷車，分別來自不同地方，並在神聖羅馬帝國士兵的護衛下，成群結隊地造訪。皇帝的部隊，更捍衛著該市集獨享的各種權利。

印刷術來到法蘭克福的時間，相較之下算是晚的了。事實上，要到埃傑諾夫在此創業之後，也就是一五三〇年開始，這裡的印刷業才發展起來；不過，在此之前許久，便有大書商的代理商前來趕集。修埃佛曾親自參與，而溫斯勒與阿默巴赫亦曾在二四七八年前來。此後的阿默巴赫成為常客，並很快地利用起市集的機會，和來自紐倫堡與義大利各地的書商會面。一四九五年之後，柯貝格則定期帶著一箱箱的書貨，抵達法蘭克福；一四九八年到一五〇〇年之間的幾次市集，他更是無一缺席。由於他時常投宿法蘭克福的某家旅店，旅店老闆遂在一五〇六年，替他搭建一間書店，好讓他的商品能像在紐倫堡的店鋪一樣展售，並在市集結束後將書本寄屯於此，直到下次市集開鑼。從此，柯貝格便在法蘭克福市集擁有據點，他和巴塞爾書商之間，活絡而興旺

的生意關係，就是這麼來的。

年復一年，來自四面八方的書商前來趕集，人數也愈發龐大。德國境內的馬爾堡、萊比錫、威登堡、圖賓根、海德堡、巴塞爾，皆有生意人赴此。外國書商也不少：威尼斯人拜訪這裡的足跡，可以追溯到一四九八年之後，而巴黎書商杜普伊從一五四〇年之後成爲常客，此後不久侯貝·埃蒂安納亦加入。一五五七那年的最後一場市集，出現了兩位里昂書商、四位巴黎書商、兩位日內瓦書商、五位安特衛普書商，以及其他從烏特列茲、阿姆斯特丹、魯汶出發的業者。至於一五六九年的幾次市集，可考的書商多達八十七位，其中十七人來自法蘭克福，三人來自威尼斯，四人來自里昂，五人來自日內瓦，而且每一位都受到不克前來的同業所託，或承銷，或代購。

市集期間，書商攤位的集中區，坐落在美因河與聖良納德教堂之間，名爲布赫加賽；「布赫」的意思是書，而「加賽」爲街道之意。市集一旦開始，書商就得趕緊幹活，從馬車上卸貨，把書攤展在架上，並從每位參展出版商的清單中選出自己想要採購的書籍以便進貨，同時也把自己的貨品賣給同業或個別讀者，幾乎沒有時間休息。遇上其他書商與出版商，他們便與之交換情報，宣告自己未來的出版計畫，並爲下次市集或將來的生意預先接單。某部特定作品的大宗買賣，亦在此進行：弗洛蕭爾曾在一封日期注記爲一五三四年十月十日的信中提到，他將自己印製的對開本與八開本《三洲地理管窺》共計兩千冊，攜往市集並銷出一半，預料下次市集可全數出清。

即便在印刷設備的交易方面，法蘭克福也培養出一定的知名度；印刷商在這裡，向德國的鑄字、刻字匠，採購活字組與陰文字模，尤其是那些長期在城裡開業的匠人。精於木雕、銅刻的藝

術家，同樣前來趕集，貢獻一己技術。慢慢地，這裡的市集變成所有書籍產業相關人士的集結地，生氣盎然、熱鬧非常，圖畫般的活絡場面，亦成爲亨利·埃蒂安納等當時作家樂於描寫的景象。舉目所見的，是書商與他們的助手從店鋪的門口跟窗戶探出頭來，對過路人喊著求售新書的名稱；小販四處遊走，叫賣記敘近期大事的年曆、版畫與小冊書。作家置身人群中，有的拿著自己著述的抄本，尋訪有意願的出版商，有的則觀察起自己的作品賣相如何。還有讀書人群聚於此，打聽替印刷社譯稿、校稿的機會，承接自己擅長的差事。根據亨利·埃蒂安納的描述，法蘭克福儼然成爲「新時代的雅典城」：名聞遐邇的學者，在驚訝的群眾面前，操拉丁語與同儕交談、辯論，推擠著身旁的演員伶人；他們正向前來籌組劇團的演出經紀人，洽詢工作機會。如果讓後來的莎士比亞獲悉這種盛況，料想他也會爲之著迷吧。

法蘭克福市集的最重大創舉，當是將市集上供人採買的各种書本，編成商品目錄。時至今日，依固定時間發行，以提供最新出版訊息的圖書目錄，應奉此爲先祖。在這個行業裡，爲銷售中與甫出版的書本製作目錄，起源頗早。至少從一四七〇年或更早之前，就已經有大出版商聘雇的代理商，開始替手頭代售的書本編列清單，初期全用手寫，後來改採印製。至於多位印刷商聯合發行的目錄，由來亦久；梅明根的阿布雷希這位書商，便曾推出一千五本冊的《威尼斯、紐倫堡暨巴塞爾售書一覽》，其中列出兩百餘種出版物。十六世紀時，書商更加體認到，將新印書籍公告周知，乃是必要之舉，因而編印、發行書籍目錄者，也愈來愈多。一五四一年，小阿爾都斯（阿爾都斯的孫子）曾在威尼斯出版此種目錄；一五四六年之前，德柯萊也於巴黎發行過一本；

至一五四八年，蘇黎世的克里斯多·弗洛蕭爾，亦依樣畫葫蘆；一五四九那一年，則有里昂的格利甫，以及巴塞爾的富羅本，分別編製目錄。此外，侯貝·埃蒂安納兩度發行目錄，時間分別在一五五二年與一五六九年；普朗坦在安特衛普發行的目錄，可考者最多，先後於一五六六、一五六七、一五七五、一五八七年問世。

這些目錄，也常在法蘭克福市集上流通、傳閱。一段時間之後，更有人領略，將各家書商分別發行的目錄，彙集成單一的總目錄，列出市集裡所有可以買到的書，效果可能更好。此外，日耳曼的出版商，以及不少外國來的出版商，也常以法蘭克福做為新印書籍的首賣地點；這些人很快地發現，如果想讓潛在客戶獲悉這些新書，並替自己的招牌打響知名度，那就非得借助總目錄之力不可。一五六四年起，奧格斯堡的書商威勒，肩負起這個責任，為每次市集的求售書籍造冊，一年出版兩次目錄，直到一五九二年才停止。沒過多久，包括掃爾、費耶拉本、施密德在內的書商，亦起而效尤。最後，法蘭克福市政會議終於在一五九八年，決定發行官方版本的圖書總目錄，年復一年、不曾間斷地持續至十八世紀。十七世紀問世於德國的第一批文獻書目學論文，即以此為研究素材。

前述目錄乃是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見證了各種書籍在法蘭克福的銷售。一五六四到一六〇〇年間發行的目錄，涵蓋了超過兩萬種不同的書籍，其中有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四種產於德國，分別出自六十一個鄉鎮裡，一百一十七家出版社的手筆；在德國境外印成的也有六千一百一十二種，另有一千零一十四種來源不詳。十七世紀的目錄，納編了為數更多的書籍。該世紀前半的目錄，

總共記載了一萬八千三百零四種德國書，與一萬七千零三十二種外國書；十七世紀下半，則有三萬八千六百六十二種德國書籍名列其中，外國書亦有四千九百六十二種。求售的書本當中，以德文排印者不少，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拉丁文書籍的數量要來的更多些。從一五六六到一五七〇年，市場上的三百二十九種新書裡，拉丁文書籍多達兩百二十六種，德文一百一十八種；一六一〇到一六〇五年計有一千三百三十四種新書，其中拉丁文達八百一十三種，德文四百二十二種；一六三一至一六三五年，七百三十一種新書問世，拉丁文四百三十六種，德文兩百七十三種。事實上，直到一六八〇到一六九〇年，局面才演變成德文書多過拉丁文書³¹⁰。

這也就是說，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與十七世紀上半葉，法蘭克福市集，既是德文書的主要市場，同時也是拉丁文著作的國際市場。普朗坦有非常多的生意在此成交；各次市集，他的攤位必不可少，若非親自前去趕集，便派遣親信代勞（通常是女婿尚·摩雷特斯）。除了在那裡會見其他出版社的代表，跟他們結清早先的帳款，市集也常是他採購必需的印刷設備的地點。艾齊維埃家族則從十七世紀早期開始成爲常客。此外，每年出席的巴黎書商，至少都有三或四位，這還不包括其他地方的書商；其中，英國商人的陣仗總是特別浩大，畢竟這是他們採購歐陸印刷書籍的主要管道。一六一七年起，英國書商比爾，則在倫敦定期地翻印起法蘭克福的書籍目錄。

拉丁文書籍，特別是天主教的書籍，固以法蘭克福市集爲跨國交易中心，但信奉新教的書商，同樣會在此地會面、買賣，在十六世紀尤其如此。他們從里昂、史特拉斯堡、日內瓦、巴塞爾前來，就爲了尋訪德國宗教改革者的作品；這些書大都印製於威登堡與萊比錫。日內瓦的印刷商也是常客，他們趕工印刷新教的異議著述，期能在市集期間及時上架。這麼一來，市集也變成

倡導宗教改革理念的基地，日子一久，神聖羅馬帝國很難沒有芒刺在背之感。十七世紀初，帝國書刊評議會決定採取行動，此後新教書商橫遭迫害，風聲鶴唳的結果，便是迫使印刷商逐漸從法蘭克福出走，前往沒有此等妨礙的萊比錫執業。

從一六一八年開始，至一六四八年結束的三十年戰爭，一度令德國的書籍印製事業土崩瓦解，幾乎消失，法蘭克福市集也受到頗大打擊。一六一〇年，德國出版商推出一千五百一十一本著作，一六一三年則有一千七百八十本；但在一六二六年，數量銳減為一千零五本，一六三五年更只有三百零七本。戰爭末期那幾年，絕大多數外國書商不再參與市集；一六二〇至一六二五年之後，市集裡幾乎見不著法國人。縱然交易在戰後復甦，法蘭克福過往的國際書市地位已然不復，甚至迅速失去日耳曼地區主要市集的寶座。探究箇中種種的原因，最主要的一個，在於德國書籍產業的本質已經改變。在大約一六三〇至一六四〇年之前，日耳曼境內出版的神學作品，乃是天主教書籍多過新教，此外南德的印刷鋪也比北邊更活躍。然一如前述，這種情況並沒有延續到一六四〇年之後。原本即長期與法蘭克福打對台的萊比錫市集，在新的情勢助長下，日益發達；而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南征告捷後，萊比錫印製的新教書籍隨之大增，更加鞏固了當地市集的繁榮³¹¹。

印刷術傳至萊比錫的時間，約當一四七九年，比法蘭克福早得多；事實上，早在一四七六年，修埃佛以及來自巴塞爾的印刷商，便於當地販售印刷書。之後，柯貝格、林曼，和許多來自奧格斯堡及紐倫堡的書商，亦在萊比錫做起生意。十六世紀初，萊比錫的印刷事業發展更顯蓬

勃。雖然新教一度遭到薩克森選侯喬治公爵的殘害，迫使許多重量級的新教印刷商，包括羅特赫在內，離開萊比錫，但稍後也有數位改信新教的選侯，有系統地推行包容新教的政策，還允許天主教出版商參與市集。尤有甚者，一六九七年執政的選侯於該年改信舊教，卻蕭規曹隨，延續對新教徒的寬容政策，確保住萊比錫市集的穩健成長。就這點來說，宗教改革，與改革所導致的北德新教印刷鋪增加，乃至於普魯士國家在東歐的勃興，皆有貢獻。一六〇〇年，萊比錫印出第一本商品目錄，從此宣告當地市集的重要性已概略等同於法蘭克福市集，之後更在三十年戰爭終止後凌駕其上。

十七世紀裡，萊比錫的商業活動穩步擴張，法蘭克福卻相對萎縮；這可說是歐洲書籍產業演進的重要階段。在此之前，法蘭克福以全歐主要出版商匯聚地的姿態，先行發跡；萊比錫則主要是德國印刷商的開業重鎮，糾合了來自俄羅斯、波蘭、荷蘭的同業，成爲後起之秀。也可以說，一六三〇至一六四〇年間，萊比錫市集的勝出，象徵書籍生意分區化的開端。一六四〇年以降，用拉丁文印製的書本愈來愈少，以在地方言寫成的書本愈來愈多，出版便不再是跨越國界的事業了。

四、邁向新的交易方式

在這個時期裡，商業出版與銷售方法，正歷經緩慢的轉變。而本節首先討論的，乃是償付方式的改變。一如前述，十六世紀時，書商兼印刷商最常採用的支付方式，就是以物易物；透過交

換，他們自印的書籍得以出清，同時換得自己店鋪裡所需的各種書籍並轉售之。這種制度不僅在德國高度發展，更成爲不同國家的出版商彼此買賣的常用手法，跨國結帳的問題因而簡化。然而這也不是沒有風險。事實上，大出版商經常爲了出清己方存貨，被迫收受較難賣的書籍；這說明了爲何在十七世紀裡，率先棄絕以物易物方法的，多爲規模較大的出版社。曾有一段時間，他們似乎在多數場合持續使用承兌票，後來又在十八世紀廣泛地改採信用轉讓系統。即便如此，日耳曼地區仍長期奉行以物易物。對於德國書商延續的這種慣例，荷蘭同業雖然配合，卻也不願意拿自己印製的高級貨，換取品質多半較差的德國書刊，除非能用一本荷蘭書換得三到四本德國印製的書籍。一直要等到十八世紀進入尾聲，專門出版新書、印書品質不俗的萊比錫書商，才總算終結了這種令自己吃虧，也普遍妨害大型出版社發展的交易制度。

由於書籍產量每年皆穩定成長，即便是業者人士，也愈來愈難獲悉近來有哪些新書出版；學者與受過教育的讀者大眾，對此更是無力掌握³¹²。長期以來，法蘭克福的商品目錄，一直是新近出版書籍目錄的代名詞，但在市集沒落之際，書籍交易分區化，使得有新的書目供人參考才行。隨著十七世紀的產業進展，主要的大出版商紛紛推出自己的書籍目錄，且常常附在新書的最後幾頁上，但目錄只列出單一出版社的商品，仍嫌不足。萊比錫書籍目錄，固然甚具參考價值，卻只能服務德國的業界人士。很快地，在法國、英格蘭等其他地方（尤其是後者）的書商，也感受到定期製作清單、促銷新書的必要。一六四八年，一位名叫霞柯神父的書目編輯，開始彙編《巴黎書誌》與《高盧書誌》，分別列出巴黎與法國境內出版的新書，或可視爲多年之後《法蘭西圖書

目錄》的先祖；不過，這些發行時間大致規律的老書誌，僅維持到一六五四年即告中斷，要到很久之後才由新的目錄承襲之。約莫同時，英格蘭專屬的書誌開始出現，首先是一六五七年的《英格蘭求售書籍總目》，而後又有數本類似的目錄。一六八八年，倫敦一位名叫史達奇的書商，在克雷沃的協助下，開始推出名為《水星書商目錄》的定期目錄，每年發行四次，規律地出版至一七〇九年，而後則由其他同性質的目錄接續之。克雷沃也以自己的替這部定期目錄編列的清單，後續推出四個修訂版的總目錄，納入一六六六年（也就是倫敦大火燒毀許多書商存貨的那一年）以降，所有在英格蘭印製的的書本。

此類書籍清單，主要供生意人參考，並非專為學者與知識份子設計。若是學人文士，則必須仰賴遍布於歐洲各地的友人與同儕提供情報，才能得知近期有哪些新書是自己或許有興趣一讀的。較具地位的讀書人，也會在這樣的聯絡網絡中，扮演資訊中樞的角色；例如被人封為「文人共和國總買辦」的佩雷斯克，以及夏普蘭、杜皮伊兄弟等。

到了十七世紀晚期，這些方法顯然不足以應付與日俱增的新出版品；隨著期刊出版的崛起，又有一類全新的書日期刊紛紛問世，其中影響深遠者有之，無足輕重者亦有之³¹³。法國重臣柯爾貝爾，可謂催生此種目錄的第一人。掌控國內的智識與經濟活動，乃是他的念茲在茲之事，故在夏普蘭的建議之下，他責成君王法院參事，同時也是國際知名學者的德沙洛，將科學實驗的紀錄與近期新書的書評，每月公開一次，以期刊形式發行。顯然地，這樣的書評是爲了在「必要情況下」影響智識界的輿論而作。這份名為《學人誌》的刊物，創刊於一六六五年的元旦。德沙洛與同僚在刊物裡彙集了相當豐富的資訊，但部分讀者卻覺得它對特定書籍的非議太露骨，更惹惱許多作

家。不多時，德沙洛便遭撤換，由審慎練達的賈洛瓦神父接手，並將苛評從刊物的新書摘要中剔除。此後《學人誌》大受歡迎，不僅譯成義大利文、德文、拉丁文，更於一六七八年由賈洛瓦改版成小開本，好讓它能像信件一樣，藉郵驛寄往國外與地方省份。

在此同時，倫敦皇家學會於一六六五年開始出版「哲學彙刊」，並於一六七五年起，在萊比錫增印拉丁文版本。至於《學人誌》，則在一六八〇年之後遭逢多種期刊的挑戰，它們發行的動機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一七一二至一七八年間，耶穌會士在勃艮地棟布侯國印行的「特雷烏期刊」；不過，更為典型的例子，乃是發難於荷蘭的幾份報刊。值得在此一提者，計有培爾創辦、一六八四年問世的《文人共和國新象》，勒克勒格創辦於一六八六年的《通識暨史學總錄》，以及巴斯納吉的《學人著述誌》。相較於《學人誌》避免選邊站的立場，培爾、勒克勒格與巴斯納吉則採批判態度，並以荷蘭為基地，令法國讀者首度接觸英國（尤其是洛克）的思維與哲學。打從未臻成熟的草創期起，這些刊物便深遠地影響了近代思潮的演進。

與今天相比，十七世紀時候的印刷著作，生命周期長得多。一般的書籍，視同珍稀物品，收藏上格外小心翼翼，有時則轉售他人，使用年限當然較長，教科書尤其如此。拉辛便是很好的例子：此君初讀的希臘悲劇，乃是上個世紀阿爾都斯排印的版本，到他手上時已經是一百五十年的老書。是以二手書市長期興盛，地位亦重要。大致說來，二手書的買賣也是經過書販，與市場裡的舊書攤；只要是大城鎮，諸如里昂的頌恩橋一帶、巴黎塞納河的橋上與碼頭邊，都有它們的蹤影。除此之外，更有許多大書店，投身二手生意：十六世紀晚期，巴黎的杜歇爾大量囤積了宗教

戰爭期間掠奪自各地圖書館的書籍，轉化為可觀的獲利。到十七世紀，則有布雷塞與畢安，先後自海外（特別是英格蘭）購得上千舊書，並以《萬卷錄》之名發行二手目錄為之促銷。在這種情況下，二手書專家經常成為學界、文壇的瑰寶，例如圖書管理學家諾德，便會遍尋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保住投石黨爭（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三年，路易十四尚未親政前的內亂）期間，從樞機主教馬薩連的圖書館中遭人劫掠的書籍。法蘭西學院的專屬書商卡慕薩，似乎也是箇中專家，專門從國外蒐羅院士們需要的古籍舊書；亦有很多大型的書商兼出版商，從事此種生意。

與今日相同的是，當時的二手書商，也會大批收購過世學者留下的藏書，以充實店鋪存貨。十七世紀裡，這門生意持續發展，書本拍賣會遂成為常見的交易管道（今日亦然）。爾後，藏書豐厚的某人辭世之後，會有人先替這些書發行目錄，再將所有收藏打散、分批拍賣；常見的情況則是，亟欲典藏某本作品的幾位專家，以及很快加入此一行列的愛書人士，形成人數龐大的一群，與書商激烈搶奪眾人覬覦的書中逸品。一五九九年，德聖阿德洪的生前藏書，在萊登書商波瑞特的規畫下拍賣，乃是我輩所知最早的舊書拍賣。此後拍賣會迅速成為荷蘭最受歡迎的舊書販售方式，其中還有不少由艾齊維埃家族成員主持。十七世紀後半，舊書拍賣的風氣吹進了英國與德國，十八世紀初復傳往法國。

本節最後探討的是市井書刊的交易。一如前述，早期的大出版商，會派遣捐客前往沒有業務往來或聯繫的城鎮，以大致固定的時間間隔，在各地售書。而後，非專業性質的書店，迅速在各大城市開業，出版商對捐客的需求也遞減。不過，從十五世紀起，一些人口稀少的小鎮與鄉村，

無法穩固支持書商生計，遂成爲小販的市場；他們除了販售宗教塑像、衣褲布帛，也將短期流通的簡單小書，賣給未受教育、幾不識字的民眾。這些印刷品主要包括簡明字母書、年曆、預言書、牧民曆等。宗教改革思想傳播期間，開業於固定地點的書商，容易淪爲當局監控的對象，小販卻能倖免，因此其數量遂日益增多，甚至成爲宣揚新教「非法」理念最活躍的使者。宗教改革的早期，他們在德國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將各種宣傳小冊傳遍各地，當中偶爾可見舊教文本，但更常見的還是新教的讀物，尤其是批評教宗與教廷，意在挑戰神職人員聲望與威權者。一五四〇到一五五〇的十年間，來自日內瓦的新教主張，便藉著小販傳往法國各地。十六世紀裡，則又形成了井然有序的正規商業網絡，以散播說帖、捍衛「非法」信仰爲主要任務，並在遭逢強弱不一的阻力之後轉入地下。這些書商首見於德國，而後出現於法國，並終於遍布全歐。

下面所言，便是此種交易的後果。禁書因爲印行、買賣皆犯法，反而變成熱門商品，不僅常常數度轉手，更得花上大錢才能一睹。情勢如此，令這種買賣更加有利可圖；到了十六世紀後半，眾多的巧匠與工人失業，小販的數量隨之成長，尤其是在法國，不僅有許多婦女跟小孩加入禁書販子的行列，就連丟了飯碗的印刷師傅，也藉此餬口；他們在書籍產業有人脈，輕輕鬆鬆就能弄到大批禁書，甚至自己動手，偷偷地印起宣傳小冊來。這些流浪販子與「好手好腳的乞丐」，無視於當局的徹查嚴懲，變成城市裡每日必見的景象；他們在兜售小本的違禁書刊之餘，也一併叫賣官方律令和時事快報，而後者亦逐漸演變成每天都會發行的刊物。

兵戎平息之後，執政者大力掃蕩此類商業行爲。大城鎮的商會，則試圖禁止沒有營業執照的書商繼續賣書，但這些盡皆徒勞。在遭到起訴的諸多異議人士當中，固然有不少的雜貨販子，但

同時也有人在巴黎與其他城鎮，試著讓特定宗教書籍的兜售就地合法，並納入當局管理。於是，曾經為印刷商所聘雇，如今卻不適應打印、排字工作的師傅，獲准叫賣宗教書籍，並在地方官員的授權下，販售類似今天報紙的刊物；他們也奉令叫賣官方的出版品與公報。不過，這種制度難免助長違法行爲。想當然耳，即便是官方允許的小販與報攤，亦販售著許多超出法令許可範圍的商品。只要是民眾生計陷入危機的時期，「好手好腳的乞丐」必然激增，在城鎮中最熱鬧的各處，暗中賣著一般書店不敢公然展售的報刊與小冊。十六世紀時，眾多街頭商販遭處火刑，就是因爲販賣異端書籍；到了十七、十八世紀，法國還有更多小販，兜售批評當權貴族的小冊被逮，送往巴士底監獄服刑。

然而，宗教書籍的兜售遭逢打壓，僅限於城市地區。較小的城鎮與鄉村，縱有法規也幾無貫徹執行的可能，地下印刷業因此得以持續。十七世紀的鄉間小販，大量承銷內容俚俗且完全合法的印刷品，至十八世紀愈發盛行。當時的村莊房屋與簡樸農舍，經常以原始粗陋的版畫藝術裝飾牆面，即是此種買賣所致。專門印製通俗書本的印刷商，大量印製插圖版《聖經》、牧民曆、一般曆書，以及傍晚時闔家閱讀的傳奇故事，諸如《美露希妮》與《艾蒙的四個兒子》等，其數以千計。首見於十九世紀的單張大報，亦以同樣方式銷售，成爲今天地方性報紙的先祖。一併販賣者尚有套色粗糙的《埃及納勒群像》，藉版畫形式歌頌皇帝的功業，維繫君王在鄉間的威望。傳統的市井書刊，種類更是豐富而繁多，其中的木刻插圖則以十六世紀的通俗讀物爲臨摹對象，歷三百年而不衰，廣受歡迎的程度穩定攀升。在此之前，幾乎全靠口耳相傳的民間文化，就這樣變成印刷機一展身手的舞台。

五、特權與侵權

書籍產業固然在十五到十八世紀間，充分展現了跨越國界的特質，但若據此對實際情況妄下斷語，認為當時的書市毫無內在壁壘可言，印刷商的產品亦得法律充分保障，甚至誤信書本的流通全然自由，那可就錯得離譜。事實上，當時的出版活動並無國際協議做基礎，防杜盜版的舉措也從來沒有周全過，相關的立法不但漏洞百出而且還只在少數地區有效，當局官員干預各種瑣事卻無力節制違法，就連圖書檢查的執行單位也多到相互掣肘的程度。這種種的情況，阻礙的不可只是書籍事業的發展，還有理念的交流。要把這些限制因素的來龍去脈講個仔細，可得寫上好幾本書才行，在此僅述其大要。

在書籍生意的最早期，印刷商發行某書後，根本無法節制其他同樣看好此書的同行，印製同樣的作品。起初，這種狀況倒不怎麼惹人嫌。對當時，特別是最早期的印刷商來說，古代典籍與中世紀作品的手抄本，乃是市場的基礎；由於足堪出版的文本甚多，選擇非常豐富，再加上書本的需求甚是迫切，即便令一部作品的不同印刷版本同時出現，也不至於對哪位印刷商不公平，反正市場都能照單全收。就此一時期論，出版商鮮少能從損害同業的生意當中圖得私利，也沒有興趣挑起可以避免的同行競爭。

等到書籍的銷售發展成有組織的系統，情況隨之改變。那些最尋常的作品，開始大量付印，配銷各地；當代作家委託印刷鋪印製的著述，也逐漸增加。出版商之間，競爭轉趨激烈，書本售

價是否低過競爭對手，日益重要。這也使得翻印他人甫出版書籍的誘惑，愈來愈強烈，畢竟盜版商不但不用負擔各頁版面編排調整的成本（僅需逐頁照印即可），更無須支付作者分毫。尤有甚者，盜印商還可以犧牲製書品質或獲利率，藉此壓低書籍售價，把原出版商比下去。十六世紀初，人文主義出版商的出版物，就這樣不時淪為仿冒的對象。在巴黎，貝德印製的書籍，常常被一群書商與印刷商仿印，甚至有位名叫德斯普瑞茲的印刷商，特別刻製一塊頁緣飾版，其圖樣完全仿造貝德打印在書名頁上的花紋，以收魚目混珠之效。在里昂，盜印商剽竊威尼斯與巴塞爾印刷商的心血，也是毫不手軟。至此，伊拉斯謨斯與德波提瑞眼見作品到處被人翻印，卻未經自己許可，經常流露憤慨不平之意。

盜印行為或多或少抑制了出版新書的意願，這是因為優秀的印刷商，總擔心自己印製的高品質書籍，會被人粗劣地翻印，並以半價拋售，反而害自己的高價「正版」產品滯銷。為避免這種情況，愈來愈多的出版商，在籌印重要書籍之際，求助於政府當局，盼上級把特定著作在一定期限之內的專印、專賣權，授予他們。

對版權（或發行某書的獨家權利）需求最先有所體認的，可能是義大利，尤其是米蘭的出版商。早在一四八一年，一位名叫德波西斯的出版商，便知道爭取希蒙內塔所著《斯福爾札傳》的出版專權，並委託查洛提印刷。一四八三年，米蘭公爵又把菲萊爾福的《樂宴集》出版權，獨家授予托倫蒂諾的查斯提努，為期五年。很快地，威尼斯議會也開始定期核發類似的獨占權；到十六世紀初，法國同樣施行此制，起初出版權須由國王或君王法院親授，而後地方法庭亦開始授予；至於德國，皇帝與地方政府皆有此種權責。其中，法國與德國的統治者，不僅試圖全面掌控

「特定作品的專印權，應授予何人」的裁量權，更設法將這種授權之權，轉化為進一步監控印刷鋪書籍生產的機制。法王查理九世甚至在一五六三年下詔，除非得到皇室執照，蓋上總理官署的大官印，否則任何書籍皆不得出版；此制使君主得以監控印刷成品，更令往後的查理九世成爲法國境內唯一有權核發出版執照的人³¹⁴。相較之下，日耳曼皇帝即便有意將權威提升到同樣程度，成效也不彰，數度推行同樣政策，卻無法終結地方政府授權與皇帝授權並行的局面。

整個獨占權、專屬權的制度，衍生出的缺點可不少，至於相關的各種立法繁多而矛盾，令問題更加嚴重。其中，仍被繼續翻印的舊書版權與專印權的再次授予，引發的激辯最是熱烈。原則上來說，翻印舊書的權利，一如印製新書的權利，是可以自由授予的。享有皇室青睞的出版商，總希望手中握有的專印權能無限次展延，而政府則傾向把權利保留給最服膺正統、最順從政令的出版商。爲了組織強大的出版商聯合會，發行高品質（且口徑一致）的書籍，查理九世與亨利三世毫不遲疑地，將獨占出版權授予支持天主教聯盟的一群書商，令其印製基督教諸教父中主要人物的著述，以及依照特利騰大公會議決議修訂的教會儀式用書。法國之外，保盧·馬努蒂烏斯則自教宗處獲得類似的特權，而普朗坦亦由西班牙國王授予此權。這種舊書授權帶來的龐大獲利，有時可持續三十年之久；相較之下，印行當代作品的出版商，則致力在最初獲得的權利到期後，協議延長之。

大多數的印刷商與出版商，都不是大型獨占業者的對手，事業受創之餘，便發出激烈的不平之鳴。大致說來，這些小商人在法國贏得了君王法院的支持，這是因爲君王法院原本即反對任何的王權擴張。這麼一來，君王對於較老舊的作品所行使的授權，便愈來愈少，對當代新作品的出

版權展延，則愈發從寬審核，以保障那些背負虧本風險、發行初版新書的出版商。

於是，這樣的特權授予制度，也就形同犧牲其他的出版商，好讓特定的出版商占得優勢；即便授權範圍僅限於單一著作，仍是如此。以法國為例，這種制度實際上偏袒的乃是巴黎的出版商。比起其他地方的同業，他們距離王宮較近，對執政者施壓也較敏感，知名度更是高出一截。從十七世紀後半開始，作家出現只在巴黎出版其作的傾向。在此同時，地方各省的印刷商沒有作品可印，聽聞巴黎傳出某書暢銷消息，只能焦躁地等待，直到該書的專印權期限屆滿，才輪到他們動手；萬一原本那位印刷商的權利得到展延，他們也不吝於抗議。對這些人而言，盜印幾乎是一種謀生管道，不想讓印刷機閒置下來，就非得這麼做不可。他們膽敢挑戰巴黎印刷商的獨占權，係因執法機制本身即欲振乏力，有些時候又太過複雜難以施行。

不過，在公平性的問題之外，此制度還有著更重大的缺陷。不論獨占權的授予者是國家還是地方封邑，其效力皆有地域性，出了國境便不算數。若說法國、英國、西班牙等早就已經大一統的國家，國內市場尚能消化某一版的印刷書，那麼，公國、侯國林立的日耳曼或義大利，不管是效力僅限於諸親王疆界內的獨占權，還是皇帝下授的特權，皆不足以真正保障出版商。如此環境下，從事跨國生意的當地大書商，便長期處於偽書的威脅下，新近印書的龐大投資，仍有血本無歸之虞。

但一般說來，書商與印刷商是沒有興趣跟同業起衝突的；因為，在那個年代裡，每一家大出版社，皆與海外商人有著密切的生意往來，某個人的事業垮了，其他同業很容易被拖下水。每家印刷鋪、每個印書的城鎮，皆有其專屬印記，基於商場慣例與總體利益，一般人並不會偽造同行

的印記。一旦偽書出現，那些同時跟苦主與偽造者做生意的商人，便迅速介入、權充調人，好讓兩方達成和解協議。再不然，遭人盜印的苦主也可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偽造起盜印者自己的印記來。這種「用偽書打偽書」的戰爭，就等於逼迫那些跟兩方都有買賣的商人選邊站，最後淪為損人不利己的消耗戰，業界人士尤為忌憚。

如果說，避免盜印彼此書籍，最符合一般出版商的利益，到了產業陷入危機的時期，這種共識仍免不了破局。就算十六世紀，乃至於十七世紀上半時的盜印書，尚且不到氾濫的程度，但大約從一六五〇年開始，情況業已惡化。甚至可以說，一六四〇到一六六〇年間的變化，不僅是出版史上的巨變，更是整個書籍產業史的巨變。此時的書本市集重要性盡失（德國的市集除外），各國的大出版商都不再參與。各種版本的大部頭宗教書籍，原本是反宗教改革運動的重要特色，且外銷與內銷一樣暢旺，如今銷量卻滑落。拉丁文書籍的出版量愈來愈少，就連學術作品也愈來愈多以地方語文寫成。而在想像文學、通俗文學大行其道之際，史上第一份報紙也問世了。就在這個行業的許多領域面臨轉型的節骨眼上，融資卻相對緊縮。很快地，出版業陷入危機，書籍市場亦分區化，各國市場涇渭分明。反觀早年的神學、護神學（辯護、佐證基督教義的學問）必備典籍，市場需求開始萎縮，從而使得安特衛普、科隆、威尼斯、里昂等地，專門出版聖哲羅姆、阿里亞加與埃思科瓦爾著作的商人，滿倉庫的厚重典籍卻無處銷售³¹⁵。

在安特衛普的出版生意日漸式微的當兒，科隆、盧昂與里昂的印刷商，被迫改以盜印來維持生計。約在一六五〇年之後，激烈的商戰爆發，持續了數十年之久。外地的印刷商，有系統地盜印起巴黎出版、賣相不錯的讀物，同業眼中規模太大的出版商，則變成攻擊對象。貝爾提埃離開

里昂之後，在巴黎創建印刷鋪，與西班牙的生意往來頗有成就，但終究還是在這場商戰中破產。幾位頂尖的巴黎出版商，包括克拉馬希、居爾貝與後來的德斯普雷，下場也好不到哪裡去。

對此，巴黎的書商當然竭力抵抗。奈何在巴黎的書籍買賣歷經危難之際，荷蘭書商日益壯大。一如前述，到了十六世紀晚期，阿姆斯特丹儼然成爲第二大的法文書籍出版中心，僅次於巴黎。荷蘭印刷商置身法國疆域外，盜印在法出版的書籍也不會受罰，甚至還能輕鬆地把盜印書回銷巴黎。更重要的是，法國當局百般打壓的禁書，他們仍能自由印行，並以走私方式運回法國，身家性命卻不受威脅。正因當時缺乏版權與出版的國際法規，才有這些「好處」。

六、檢查制度與禁書

從十五到十八世紀，執政當局意圖掌控、管制印刷業（或者說意圖掌控而未果）之舉，屢見不鮮；這反倒刺激盜印書的大量增長，並連帶促使多少帶有地下色彩的書籍產業成長茁壯。在此同時，圖書檢查的嚴令峻法，在行政機構長期以來無力防堵新觀念傳布的情況下，也導致類似的結果，甚至在許多例子裡，成爲書籍生意轉往地下的主要推手。

就這點來說，天主教會的角色至爲重要，特別是在早期³¹⁶。諸君可能還記得，印刷術誕生之初，許多主教和神職人員不僅熱情地接納，還扶植不少印刷工坊的建立。但教會同時也是宗教正統的捍衛者，力阻異端邪說擴散。早在中世紀，便有許多文本遭教會譴責，閱覽、抄謄、販售，一概嚴禁。而教會的當權派很早就覺察，必須防杜「妖言惑眾」之書假印刷方式大行其道；在宗

教改革者採用印刷術之後，更是如此。於是，教宗便將審查執照授予科隆大學，命其揪出監控的印刷鋪、出版商、作者，甚至讀者，而當時不過才一四七五年。美因茲總主教巴沙雖對印刷術甚有好感，卻仍在一四八六年援引教宗英諾森八世詔書，囑咐兩位博士與其主教座堂轄下兩位司鐸，全面檢查所有書籍。到一四九六年，他又禁止任何未經總主教批准的書籍出版，違者逐出教會。另外，身兼教廷駐威尼斯使節的特雷維索總主教法蘭寇，於一四九一年制定法規，要求所有涉及信仰或教會權威的著作，必須先取得該教區主教或代理主教的批准，才能付印。在此同時，羅塞利探討君主政體的專著，與皮科的作品，成爲譴責對象，後者更在接下來的六年裡，背負異端嫌疑，無由平反。

十六世紀，教會涉入圖書檢查的程度，穩定地增加。一五〇一年，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發布名爲「聖靈統一」的詔書，從此在德國建立預防性的圖書檢查機制：未獲教會高層授權的書刊，一律不准印製，同時任命三位總主教選侯與馬德堡總主教，控管書籍出版。一五一五年，教宗聖良十世（利奧十世）利用拉特蘭大公會議場合，禁止所有教會權力不允許的書籍印製。在羅馬，這種核准權歸屬教宗或教廷衛道部（聖職部）首席；在其他地方，則由教會總法官或其委任官員判定。

在這些法條、諭令之下，獲判禁印或裁爲邪書者，在十六世紀裡漸次增加，數量之多令人咋舌，此處就算有辦法悉數列出，只怕意義也不大。值得我輩注意的是，由於禁書的成長太過迅速，當局不得不編纂《禁書索引》供人查閱，並不停地增修這部索引。即便如此，若是沒有俗世執法機構的協助，教會仍無從落實這些法令。至於俗世政權協助教會查緝禁書，自有一套別理

由；其所打壓的，其實是不利於在位者或政府的著述。

率先干預出版的俗世力量，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其中一任曾將帝國境內審查、督導印刷活動之責，指派給史特拉斯堡的歐斯勒，時值十六世紀初。過不了多久，帝國又設立委員會，負責評議圖書檢查措施，並研擬可行方案以查扣違禁書本。委員會後來落入耶穌會士手中，並於十六世紀末試圖禁止新教書商在法蘭克福從事買賣。只是皇帝在圖書檢查方面的努力，大都白費了心機；真正控管各地書籍生意的，其實是各行其是的日耳曼諸侯。他們當中有好幾位，與帝國政府、天主教會皆敵對。帝國政權的分裂狀態，導致許多重大後果，其中之一更助長了萊比錫市集取代法蘭克福，蓬勃成長；畢竟萊比錫是薩克森選侯的地盤，發展成新教書籍的重鎮，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法國，情況的演變頗不相同。十六世紀前半，在索邦當局與君王法院對圖書的審核、查禁與告發日益嚴格之際，國王親自干預出版管理相關問題的頻率，也節節升高。查理九世於一五六三年下詔，所有書籍出版之前都必須取得執照，至此掌控住所有問世的新書。執照核發與否，圖書審查官的進言乃是唯一依據；起初的審查官多由索邦校區的神學家出任，而後進入十七世紀，改由政府官員（非神職人員）擔綱。透過版權法規的掩護，法國國王與其他施行此制度的歐洲國家君王，嚴密看管書籍的產製，只是仍有一些「不受歡迎」的書籍得以突圍、流通於各地。後文將述及法國印刷商如何在宗教改革年代裡繼續印製異端書刊，也會論及鄰近法國的重要印刷商如何在外發展成專門出版此類書刊的事業。就十七、十八世紀來說，禁書的發行與流通，依舊普及大多數地方，受阻並不嚴重，與過往情形無異。也因為可能惹惱官方的著作數量實在太多，即

便是最奉公守法的書商，還是有可能被起訴。話雖如此，他們對於被捕下獄並不一定疑懼內疚，反正這種莫須有罪名泰半不會損及名望之士的聲譽。在法國，柯爾貝爾首開先例，憑藉效率卓著的執法網，大興文字獄，引發危機，相關的判決隨之加重。爲了防堵盜印本與地下書刊擴散，柯爾貝爾毫不遲疑地削減、限制合法印刷商的數量，還將他們統統遷至首都集中管理。來自國外，特別是荷蘭的禁書，輸入法國照常買賣，尤令他芒刺在背；這些書在他轄外印成，且通常敵視天主教與法國君主。正當他盤算著如何禁止荷蘭書籍進口法國，卻又被夏普蘭所諫阻，指出法國學者從事研究的必備書籍，恐因進口禁令而斷炊。

沒有多久，被柯爾貝爾緊掐住脖子的法國印刷業，又遭低迷景氣的打擊，頗見凋零；在此同時，各種盜印與未經核准的出版品，竟大行其道，填補了書市供給的真空。違禁的傳單與宣傳小冊，暗渡陳倉運進法國，並非難事，就連囚於獄中的胡格諾教徒，也能讀到這些書。交易非法書刊的地下組織，遍布各地。書商商會裡負責查驗進口書貨的官差，還經常變成禁書交易的共犯；實際上，這些官員只有在別無選擇之時，才真正對私梟採取行動。既然當時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書籍又是體積小、易藏匿的貨品，消弭走私的舉措，怎麼可能收效？如此一來，官方實施嚴厲圖書檢查的主要後果，反而是在十八世紀裡，造就了法國邊界附近許許多多專印禁書、盜版書的印刷商，營運全然自由。「啓蒙哲人」的著述，即在他們手中印成。有些時候，總理官署甚至悻悻然地驚覺，挾帶「邪書」偷運進巴黎的馬車，竟由自己的馬車夫駕駛。不多時，在新上任的馬爾塞布主導下，負責圖書檢查的官員也試著放寬管制，默許某些書籍的出版，或以其他方式網開一面。顯然，當時所認知的官方圖書檢查，終究還是功虧一簣。

第八章 印刷書：變革的推手

本書的最後一章，旨在總結全文，試算出一張「資產負債表」，並勾勒出印刷術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對歐洲人造成何種影響，藉此評估前文縱橫時空所言的種種。透過研究印刷書問世之後一個世紀的沿革，本書將試圖釐清，新的印刷技術，究竟在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畫時代變局裡，扮演何種角色。

一、從手抄本到印刷書

印刷發明之前的幾個世紀，以親手抄謄書籍為業的人，屢次因應需求的變遷，而調整他們的抄謄方法與成品；這點前面已經提過。十五世紀早期，有能力將需求殷切的書籍，一口氣抄寫十餘本，甚或上百本的抄書坊，已存在於許多地方；當時需求量最大的書，不外乎各種時辰禱書、通俗宗教作品，與通用的入門教科書。對古騰堡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印刷大概只是一種借助機器力量，用以複製最迫切需要文本的方法。

然而，這種新方法的潛力，很快地轉趨明顯。隨著印刷帶動文本的大規模普及，它更成為變遷背後的原動力，其影響已非手抄書本所能企及。這裡謹以數據佐證此種變遷的程度。在一四五

○至一五〇〇年間印製的各種書籍，殘存迄今的就有三萬到三萬五千版之多，各自代表一萬到一萬五千種不同的著作；若把亡佚的書本與作品也計入，數目必然更爲可觀。若我們假定各版的印書量不超過五百冊，則一五〇〇年之前印出的各種書籍，數目已然達到兩千萬冊³¹⁷。即便用二十世紀的標準看待，這仍是了不起的成果；若思及當時的歐洲人口遠不如目前稠密，如此數據更叫人肅然起敬。在印刷術發展的歐洲諸國裡，早年的總人口絕對不到一億，其中識字者僅占少數。

這顯然是種變遷，且變的腳步還頗快。既然如此，變的結果是什麼？大眾究竟需要書商與印刷商提供他們哪類書刊？印刷究竟令傳統的中世紀文本，普遍到何種程度？這些舊時代的傳承物，又被印刷術保存住多少？印刷機驟然突破了既有的智識作品保存媒介，是否也助長了新的文類？或者情況正好相反，是早期的印刷機大量印製了許多傳統的中世紀書籍，才讓這些作品的壽命意外地延長數十年，一如米歇列所言？我們將試著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牟利，從一開始就是書商與印刷商的最主要宗旨，這是不能忽略的事實。第一個印刷合資事業（即傅斯特與修埃佛創設者）的故事，可以爲證。十五世紀的出版商，跟今天的出版商一樣，只有那些能在合理時間內售出足夠數量，並帶來利潤的書籍，才能說服他們掏腰包。基於此，我們不難理解，印刷術的最直接效應，不過是讓手抄本時代裡已然廣獲爭讀的作品，進一步地擴大發行而已，其他較不受歡迎的文本，則泰半淪爲絕響。印刷機大量複製的書籍，其冊數以百計，而後更達千冊，這不僅促成書本數量的提升，更令選書變得嚴格。記住這些事實，有助我們更加深刻地體認十五世紀印刷產業的本質。

首先，以下數據或有利於我們概括認識當時的情況。在西元一五〇〇年之前印成的書本，即所謂的搖籃本，拉丁文書籍的比例甚高，約百分之七十七。其餘義大利文約占百分之七，德文百分之四到六，法文百分之四到五，法蘭德斯文只比百分之一多一點。這個時期的書籍，宗教類的勢力最龐大，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至於希臘羅馬舊作、中世紀與當代作品，比例略高於三成；法學叢書比百分之十多一點，而科學類的比例則在百分之十上下³¹⁸。

因此，絕大多數的（或至少將近半數的）書籍屬於宗教類，其中當然也包括許多不同版本的《聖經》。畢竟，在那個大多數讀者都是神職人員的年代，還有哪種題材更能替印刷商賺錢？至於早期印刷鋪最先推出的兩種主流書籍，分別為《四十二行聖經》與《三十六行聖經》，亦非偶然或巧合；綜觀整個十五世紀，《聖經》的版本之多，難以盡數。光是赫恩考證出的拉丁文《聖經》，就有一百零九種版本，克品杰更列出多達一百二十四種；有些附有九世紀斯特拉勃、毛祿、阿爾昆或拉昂的安塞姆的注釋，有些則否。拉丁文《聖經》係為司鐸與大學學生而印，除此之外亦有翻譯版的全本《聖經》印製成書：德文版十一種，低地德文三種，義大利文四種，法文一種，此外尚有西班牙文、法蘭德斯文、捷克文等版本。這些還不包括《聖經》片段或摘錄的翻譯，其版本繁多更勝一籌，尤以《聖詠集》、《默示錄》（《啓示錄》）、《約伯傳》（《約伯記》）等篇章為最³¹⁹。

與《聖經》經文同樣印製成書，且數量多出更多的，乃是教會儀式與教士、信眾私下祈禱時必備的書冊。但因這類書籍亡佚失傳者不在少數，故其總數難以計算。想當然耳，那時候的每日頌禱與彌撒經本，數量必然驚人；較小的聚落裡，若是沒有印刷鋪，當地的神職人員通常會聘請

印刷匠前來，其任務正是印製這一類的書。至於時辰禱書，早在印刷書誕生前，需求即已存在，其抄謄、添飾紋圖等，皆按標準化的程序行之。十五世紀裡，許多印刷鋪爲了印刷此類信仰作品，而忙得不可開交，十六世紀的情況更是如此，且容後文詳述。

自然地，中世紀神學與哲學的經典著作，印製的版本便相對少了許多。這些書是專門爲一特定族群而印的，但這一小撮人仍稱重要；他們是來自各大學的教師與學生（在波隆納、科隆、巴黎等地學府，其人數動輒上千），而他們需要的課程大綱、參考著述，在新設印刷機的協助下，以印刷品的型態問世。舉例來說，除了《聖經》正文，各種注釋也是不可或缺的，是以隆巴第的《名言錄》，乃至於其他評注家（司各托、奧坎、比里當、阿奎那）爲數更多的作品，皆印製成書。專門印製此類學術讀物的印刷商，早年多在巴塞爾、威尼斯、紐倫堡等商業大城（而非主要大學城）開業，箇中原因值得深究。這意味著，選擇在商業重鎮開店，則他們的產品，即便是再笨重、再累贅的未裝訂對開書，依舊能順利運往四面八方，顯見開業地點的選擇，乃是一種提高行銷效率的策略。於是，一五〇〇年之前，市面上有十六個版本的隆巴第《名言錄》，其中至少有八種來自巴塞爾，七種由凱斯勒麾下的一家印刷社推出，卻無一產自當時最大學府坐落的巴黎。同樣的，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主要出版於威尼斯、奧格斯堡、科隆、萊比錫等地，這當中只有一個城鎮位於大學附近。但在部分古代典籍翻印次數相對較少的情況下，倒也有些中世紀彙編的書籍（大都爲字典、專門詞典等）被人一印再印，像是巴爾比的《普天語典》、馬卻希尼的《鉅論》、科梅斯托的《經院哲學史》等。

信仰書籍的讀者群，可比專業的神學典籍讀者群龐大許多；特別是那些帶有玄秘色彩的書

刊，數量更達印刷總數的六分之一。由坎普滕的托瑪斯所撰的《師主篇》，便從這個時期開始，成爲《聖經》以外，近代最常被翻印的作品。即便在基督教諸教父的著述裡，玄秘之作印製成書的次數，也多過闡釋教義者。這當中又以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最受歡迎；其他歸功於他的作品，諸如《默思錄》、《獨白集》、《主答性靈》、《戒律手冊》等亦然。聖伯納的神祕主義著作，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偽經與經外書，同樣再三翻印。被人喚作「聖使博士」的聖波拿文都拉，則有《基督生平靜思集》與其他相傳由他所作的書籍，享有廣大讀者。熱爾松與德埃利的玄秘短論，再版與加印的頻率，遠遠勝過其他教義典籍。在此同時，一版再版的尚有出身阿西西的聖方濟《織卉集》、聖佳琳（錫耶納的聖凱瑟琳）的《主命之書》，與瑞典聖彼濟達的《神啓記》。至於日耳曼神祕主義作家的著作，影響延續數個世代，市場需求更殷；這些書包括赫甫的亨利赫所著的《至善鏡》、十四世紀蘇索所著的《永恆智慧鐘》等。

這一類書籍之所以暢銷，可能是因爲它們的讀者並不限於大學裡的文學院學者；基層的神職人員，甚至虔誠的俗世信眾，皆爲訴求對象。爲收啓迪之效，它們皆以方言印刷成書。

另有許多專爲教士準備的著作，數度付梓，尤其是牧靈手冊；佩迪曾考證出二十五種不同版本的《慰苦牧靈書》，至於德蒙卓卻所作的《牧靈團》更被印刷了大約百次（佩迪曾列出九十八種版本）。神職人員每天講道傳教所需的書冊，種類同樣繁多。其中，布道合輯早在手抄本的時代，業已相當豐富；指導神父聆聽告解的書籍，像是相傳爲聖安東尼努作品的《告解錄》，翻印了數百次之多，此外艾斯柯巴的《告解法》也同樣廣獲採用；葛黎奇的《四旬布道本》，以寓言插圖搭配其中的布道詞（佩迪書中列有三十一種版本）而聞名，但論普及程度，尼德爾的作品還

勝一籌。

在同一個時期裡，旨在鼓舞大眾信仰的各種讀物，應運而生。也因為崇拜聖母的風氣進入了極盛期，許多讚頌耶穌聖母生平與懿德的作品，例如德因蘇拉的《漫談》，或寇拿察諾的《聖母傳》（據佩迪考證，有十五種版本），更是一印再印。另一方面，民眾對諸位聖人的崇拜，則令德瓦拉吉納的《黃金傳奇》大為風行，光是拉丁文本就有八十八種，此外法文版有十八種、英文五種、德文兩種、捷克文兩種、法蘭德斯文十三種、義大利文六種³²⁰；其他記載聖人事蹟的故事，更是不計其數。

道德書、教誨書，則與前述書籍同樣存在著需求。它們大都沿襲了木刻版書籍的傳統，經常附有插圖；譯成各種語言的《死亡藝術》、薩克森的盧道甫所作的《假救主生平》與《基督生平》、圖解《聖經》故事，乃至於多不勝數的同類作品，盡皆屬之。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宗教書，令人不得不承認，印刷術早期的效應之一，便是大幅增加了通俗信仰書籍的數目，並促其廣泛流通；印刷事業也就這樣地見證了十五世紀晚期，民眾根深柢固的宗教情感。

因此，早在人類應用印刷機的最初，就已經實現了許多極重要的成就；同時以拉丁文和各地方言印製《聖經》，使之普遍程度迅速達到空前水準；選印經院學者豐富著述裡的重要典籍，服務大學裡的學生與教師；促使每日祈禱與教會儀式所需之書，諸如每日頌禱與時辰禱書等，供應無虞；更重要的是，它令一般人得以接觸信仰實務與神祕主義作品。隨著書籍數量的提升，有機會讀書的人愈來愈多，讀書的門檻則愈來愈低，讀者的規模便這樣擴張了。

此外，時人對於拉丁語文與古代經典作家的認識，也因印刷術而更加明確。義大利人文主義的學問，就是在印刷書問世之後，才得以傳遍歐洲。文人對遠古文明與拉丁語文的興趣，遂成長於歐洲各處；在此之前許久即已發展出人文主義的義大利，尤其如此。諸如索邦校區的費歇與海恩林等人士，雖然從未棄絕既有的研究課題，仍有餘裕啓發少數喜愛純粹拉丁古風的同好；一如前述，這群復古派積極鼓勵印刷鋪的設立，相信此舉終能將正確的古代經典推廣開來。十五世紀結束之前，印刷術對人文主義學術活動的主要貢獻，與其說是讓古代文本歷經中世紀的缺漏、訛傳之後，接受人文主義學者的重新發掘、校正、補遺，並廣為流傳，倒不如說是藉著發行量的大幅提升，讓中世紀裡廣泛使用的文本更加唾手可得，替希臘羅馬古文學的鑽研預先鋪路。

首先應當注意的是，印刷機的應用，令初階拉丁文法教材的數量增加許多，其中又以印刷版的維伊度《文法教本》與多納圖的《拉丁文詞類八講》最是重要。流傳迄今的維伊度《文法教本》，版本超過三百種，雖是十三世紀文法學家的作品，卻始終是學童研習的對象，一代傳一代。這部中世紀作品，以韻文形式成書，而繼承維伊度職志的後進，竟無人敢更動其內容，最多也只是增補注釋，足見其地位尊崇。縱有精通拉丁文的人文主義者，經常挖苦這本書，貝德卻認為，只要加以增補，此書依舊值得出版；至於伊拉斯謨斯，亦將此書評為「尚且堪讀」。另方面，再版次數可能與《文法教本》不相上下的，則是多納圖的文法書；一如前述，此書甚至有可能是史上第一本印刷書。這同樣是一部全然因襲古代觀點的作品，作者是四世紀的文法學家，就連聖哲羅姆也曾受教於他。在一三六六年之前，如欲取得學位，這本書可是必讀；所有中世紀的學童，都曾透過此書習得基礎的拉丁文。

在此同時，我們必須了解，最能替出版商賺錢的拉丁文經典作品，當然是那些中世紀時便已大受歡迎的作品，也就是那些最常被改寫、翻譯成通俗方言的作品。這些古書中，又以伊索、卡圖兩人之作，最是廣獲傳頌；不僅有許許多多方言版本的諷諭詩集與寓言故事集選錄了他們的作品，更有不少誕生於中世紀的類似作品，借用了他們的故事原型。當時的學童，在完成邏輯課程之後，修習道德學理之前，大都會從這兩人的作品著手，開始研讀古代拉丁文經典。甚至到了一五〇三年，巴黎大學的校長仍然因為年輕的畢業生將全部時間拿來研究亞里斯多德，對卡圖卻一無所知而轉趨激憤，熟讀卡圖著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見。若說這些學子對卡圖的《雙行訓》欠缺認識，是因為該書的印刷量不足，那就錯了；就連伊拉斯謨斯，也曾替這本書添過注解、助其出版。截至一五〇〇年，市面上共有至少六十九種的拉丁文版《雙行訓》，三十六種德文暨拉丁文對照本，九種義大利文暨拉丁文對照本，兩種西班牙文暨拉丁文對照本。至於未附拉丁原文的方言譯本，數量也不少，其中包括法蘭德斯文一種，法文九種，德文三種。《伊索寓言》流行的程度，可也不遑多讓，在一五〇〇年之前，拉丁文版本超過八十種（大都在義大利印製），義拉對照版十五種，希臘文版一種，希拉對照版一種，德文版十五種，低地德文一種，法文七種，英文三種，捷克文一種，法蘭德斯文兩種；其中捷克文與法蘭德斯文版，甚至附有插圖，可能是為學術圈外的讀者而印。

換句話說，印刷術問世之初，拉丁文的鑽研，仍以傳統上做為拉丁語文入門書的舊有文本為起點。率先交由印刷機大量印製的書籍當中，除了伊索與卡圖的著作之外，尚有其他書籍，例如《八文士集》；此書係各校廣為採用的初級讀本，且在早年即由抄寫員大量抄謄、供應大宗市

場，抄謄的冊數動輒上百。《八文士集》不僅收錄《雙行訓》與《伊索寓言》，還納入一些富含更多中世紀習氣與觀點的作品：希奧多勒斯、法瑟圖斯、弗洛瑞圖斯、德旺多姆的《多俾亞傳》（新教譯《多比傳》）、里耳的阿蘭的《寓言集》，以及詩體的小論文《論譴責俗世》。也是在這個時期，波伊提烏的《哲學的慰藉》大為風行（一五〇〇年前出現過七十種重新發行版本），但這並不讓人驚訝；畢竟，對十五世紀末的絕大多數學者，乃至於先前數百年的學者來說，波伊提烏象徵了古典思想與中世紀價值的完美融合。

事實上，如欲學習文情並茂的一流拉丁文體，閱讀、師法早期基督教會幾位教父的作品，乃是當時最主要的途徑；哲羅姆、拉克坦提烏斯、奧古斯丁的著述（尤其是後者），廣獲推崇、爭睹，部分原因即在此。其他在中世紀享有盛名，並經常為人傳抄、翻譯、改寫的古拉丁文經典，則是進一步增廣此類學識的法門。在這些古代文豪中，維吉爾的作品，於一五〇〇年之前，翻印的次數尤多，許多版本印製於義大利，專供學者研究收藏，但翻譯本付梓的也不少。古羅馬詩人奧維德，同樣在中世紀享有盛譽，翻印其作品的頻度之高，不亞於維吉爾。手抄本時代，奧維德已是熱門的抄謄對象；應用印刷術之後，其作品分別以拉丁原文、詩體翻譯、通俗改寫本（附插圖）的型態發行，同時滿足學者與一般讀者。其中較受歡迎的改寫本，直到十六、十七世紀，仍舊反覆出版。

其他比較普遍的古典作家作品，則出自尤維納利斯（在赫恩的著述中，列有六十一種不同版本的尤氏《諷刺詩》）、佩爾西烏斯（三十三種）、盧奇安（十九種）、普勞圖斯（十三種）等人之

手。喜劇作家泰倫斯，尤令中世紀文人折服，十二、十三世紀的劇本，模仿他的頗不少；其劇作的印刷版本之多，絕不亞於六十七種。講到史家，薩盧斯特應是當時最得人心的史書作者（赫恩考證出五十七種印刷版）。至於羅馬史家李維的作品，在一五〇〇年之前，全文照收的印刷版約有二十三種，但這並不包括摘錄本；其實早在中世紀時，其著作便經常以摘要本、改寫本問世。韋格提烏斯之作，印刷版本更達九十九種（以上皆根據赫恩的統計）。《圖書總目》記載，凱薩的《高盧戰記》，亦印製成十六種不同版本。至於其他廣獲翻譯的史書，不在話下。

哲學家方面，西尼加的作品仍然極度暢銷（赫恩書中列出七十七種版本）。不過，眾多古典作家的作品當中，卻是西塞羅著述的大為風行，最能體現印刷術帶來的嶄新出版前景。十五世紀裡，西塞羅自始至終都是最常被翻印的古拉丁作家，這可不限於他的哲學文章，就連演講稿與書信，長期的需求也甚可觀（尤其是後者）。一五〇〇年之前，其作品已有至少三百一十六種印刷版問世，其中大多數印製於義大利，但成書於德國的也不少，印於法國的更多。他的主要作品，即《論職責》、《論老年》、《論友愛》三書，計有四十種印刷版，此外演講稿也印有二十八種、書信集八十四種，當中又以《家書》最獲青睞。

此間，欣賞古典文學的風氣，日益成長，在義大利，更是早就蓬勃發展起來。但卻有部分人士，對此頗表憂慮，甚至有些學人，縱使承認散體拉丁文的素養應當培植，仍心存顧忌。這是因為，人文主義早將抵觸基督教義的思維，引進了義大利的大學殿堂。教會正統如是聲稱：誰說基督教作家寫不出像維吉爾那樣的抑揚六步格，基督教演說家沒有西塞羅那樣的三寸不爛之舌？佛羅倫斯的多明尼奇、亞爾薩斯的溫菲林、巴黎的嘉圭因，似乎都有這種想法。更重要的是，基督

教作家，不宜全盤忽略；要是沒有他們，後世沿用的中世紀文法書，引證必然失據。基於這種理由，亦有人聘雇許多印刷商，搶救瀕臨失傳的基督教詩人作品。他們並推廣朱文可斯、普魯登蒂烏斯、塞杜里烏斯、亞拉脫等中世紀作家，試圖取代維吉爾，還將布盧瓦的彼得所著之《論基督徒之友愛》跟西塞羅的《論友愛》相提並論。如此力挽頹勢，最後畢竟是一場空，但也不能不承認，那些文名看似衰弱、終將凋零的作家，總還是藉著印刷出版之力，延長了風行的時間。所幸當時尚有一批雅好古典文學之士，以優美雅馴的拉丁文采，傳述基督教故事與義理，供學童研讀，獲得較大的回響。曼圖阿努斯的詩作，光是在一四八八到一五〇〇年間，便被翻印一百次以上，其中又以《聖母詩》與《牧詩》最著名。他的文風頗能見容於當時，廣獲傳誦的情況還延續至十六世紀。話雖如此，此刻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在義大利以外，仍然不成大氣候，諸如塔西圖斯等重獲肯定的古羅馬作家，作品影響力也有限。直到十五、十六世紀之交，由古文學者考據訂正的古書，方以各種版本問世；柏拉圖、荷馬的作品，至此才大量發行。倒是人文主義者創造的拉丁文寫作格式，在十五世紀裡，已然大為風行，尤其是安迭里尼、老貝羅阿都、菲萊爾福、德巴爾齊札等人之作；前文曾言，第一部在巴黎印製的書本，就是德巴爾齊札的《修詞學》。他們享有的文名，證明文壇的眼界已不同於以往，但要等到十六世紀初期，此種改變方得開花結果。

一如前述，印刷書當中，逕採方言創作者，比之於拉丁文作品，實為少數，大約只占十五世紀印刷總量的百分之二十二。絕大多數以當時通行方言成書的作品，其實是拉丁文舊作的譯本，

從道德短訓、信仰篇章、《聖經》經文與注解、古典文學，到原本即以拉丁文寫成的中世紀文學等，不一而足。在這眾多的印刷作品裡，原創的方言著作極少，但可以想見的是，其中仍有一些廣獲閱讀；義大利境內，情況尤其如此。但丁名著，即爲人一讀再讀（已知的《神曲》版本就有十五種），至於讀者喜愛薄伽丘的程度，相去亦不遠，是以《十日談》不僅有十一種義大利文本，還兩度譯成德文，一度譯成法文與西班牙文。講到佩脫拉克的《歌集》，和布魯尼之作，翻印、彙譯的次數，同樣可觀。

以宮廷爲背景的情詩艷詞，乃至於勃艮地公爵宮中參贊的文人之作，早在法國印刷術發展之初，即蔚爲其特色。十五世紀裡，《玫瑰傳奇》八度送上印刷機，其人氣於十六世紀仍然不減。勒法朗克的《護花使者》，亦於此間付梓。同屬宮廷文學的創作，尚包括米修爾的《宮儀廷規》、相傳爲勒內一世所作的《宮闕禁語》、達刺的《美露希妮》，以及《魔鬼之審》；此外當然還有德皮桑跟夏提埃的大作。到一五〇〇年前後，梅斯基諾的《王子的透鏡》、格林哥爾的《農忙之德》、維雍的《遺囑詩》與尚·米榭的《耶穌受難之謎》，盡皆進入它們最暢銷的時期。

在這些作品裡，有些似乎只付印一到兩次；其中需求量最大者，當推《玫瑰傳奇》、《魔鬼之審》、《宮闕禁語》，與夏蒂埃、格林哥爾、梅斯基諾、維雍之作。很快地，又有另一類的創作，以印刷書的型態問世；它們早就廣獲喜愛，熱門的程度至此仍未式微。此類騎士傳奇當中，又以歌頌中世紀英雄功業、多少帶些誇大的故事，聲名最著。《榮勳記》即爲一例；此書有時題爲《查理曼征討記》，以法文付梓十三次，義大利文兩次。《戈德弗拉公爵其人其事》以法文印刷一次，英文一次，德文一次，法蘭德斯文兩次。其他如《梅林》、《普羅旺斯的皮耶》、《魔鬼

羅伯爾》、《蘭斯洛傳奇》、《特力斯坦》等，皆此之屬。另外，關於特洛伊的各種歷史故事（其中特別暢銷的則是《特洛伊淪亡錄》），亦多不勝數；它們雖是由拉丁文作品改編、轉譯而來，實則應與傳奇歸於同類。成書較晚的《史潮》等其他作品，其理亦同。

當時的閱讀大眾，對於道德短文與勸人向善的故事，也有極高的興趣。但在純粹的勵德小語之外，蒐羅宮廷趣談的《奇聞百篇》等書，則以淫譎笑料為賣點。哥德風小冊（以黑體字印成的小開本）在十六世紀享有最廣大的讀者群；此種小本書的前身，即發軔於此時。時至今日，它們幾乎絕跡，仍然陳列於圖書館珍貴藏書區的也剩不到幾本，更鮮少為人所提及、引述。然而在歷史上，它們似乎一度以龐大的數量，占據書商的攤位。舉例來說，婚姻的苦與樂，自古即是寫作題材，在當時更有人以各種不同的角度詮釋之。《婚姻妙趣十五篇》，相傳為十五世紀德拉薩勒所作，而《新婦訓》與其他許多題為《新婚守則》的不同作品，亦屬此類；書中各種正經八百的忠告之多，甚至超出書名給人的預期。這些作品的訴求對象，其實也就是那些會向叫賣書販購買阿雷克塞《世界之懶》、《帕舍林鬧劇》、各種版本的《死亡藝術》與其他小書的讀者。前述種種書籍，連同牧民曆、一般曆書，以及用以裝飾牆面的通俗詩掛圖等，想必曾經在十五世紀開始之後，成為印刷品的大宗（尤其是在日耳曼地區）³²¹，奈何遺留迄今者，已寥寥無幾。

誠然，所謂的實證科學，在當時尚未萌芽³²²，但堪稱科學類著作的書籍，產量業已相當可觀，約在三千種之譜，相當於著述總數的十分之一。中世紀的大部頭總輯，乃是其中最常印製成書的一種，其內容理應涵蓋當時所有的知識科目，與後世的百科全書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俗世

之鏡》便是印刷興起之後的半世紀裡，此類書籍大行其道的見證。其內文計有四部，分別名為法理之鏡、歷史之鏡、自然之鏡與道德之鏡。前三部係由兩百多年前（一二六四年）已經作古的道明會士德博韋所作；他曾擔任大傳，教導路易九世的子女。而在自然現象的領域裡，十三世紀時候編纂的書籍，仍為後世反覆研讀，其中又以德克雷臣的《論事物之性質》，定期翻印成各種語文，最是著名。這些選集與套書，替讀者省去了尋覓、翻查原典的麻煩，也因為方便，成為經常使用的參考書；一如當時的神學家，常將疑難訴諸字典、詞書、摘要，查閱原文的反倒不多見。至於所有古代的科學先驅與數學巨擘裡，最後仍以亞里斯多德、歐幾里德、老普林尼、托勒密，以及最受景仰的阿拉伯科學家阿維森納等人的作品，出版頻率最高。

這些大師當然不會是多數讀者直接神交的對象。即便是鑽研神學的人，也不常援引亞里斯多德的原著，寧可研究《亞氏正義》，或是一部名叫《祕中祕》的藥方合輯；後者早就以手抄本的形式廣泛流通，而後並數度印製成書，但當時的人經常誤信此書為亞里斯多德或十三世紀大阿爾伯圖斯的傑作。這些書受到的歡迎跟肯定，竟超過今天所公認的真正科學論著。

此外，當代科學著述，逕印成書的自然也不少。此類新近創作，占科學類搖籃本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左右，其中兩百五十五種以義大利文寫成，德文一百二十四種，法文四十六種，西班牙文四十四種，來自低地諸國者二十六種，英格蘭或蘇格蘭也有二十一種。偏偏在某些地方，由於各種著作尚未歷經時間的考驗與篩選，不值一讀卻仍舊出版的書籍，所占比例更高。年復一年，愈來愈多的科學類著作打印成書，奈何多數的課題均欠缺長期研究的價值。許多「科學家」所嚮往的，不過是在占星學的實務領域中，留下作品傳世。馬可波羅的《遊記》，雖是中世紀最出色

的地理作品，但截至一五〇〇年為止，卻只被人翻印四次；思及當時讀者大眾的品味，這點也就不令人訝異了，畢竟《曼德威爾爵士遊記》裡光怪陸離的故事，相較之下更富趣味。是以用我們的眼光來看，至關重要的客觀知識，在當時是全然缺席的；話又說回來，世事的常態不也如此？同理，出版於當時的數學著作，有著同樣的情況，亦不致令我輩意外。這類著作不僅很早就印刷成書，其次數也頗頻繁：第一本首見於一四七八年的特雷維索，而一四八四年的威尼斯、一四八二年的巴塞隆納，亦有新印書問世。反倒是十五世紀後半最具原創性的算數、代數專論，即丘凱的《數學三篇》，完成時間雖晚（一四八四年），竟只見手抄本。尤有甚者，知名的雷喬蒙塔努斯，身兼數學家與天文學家，是當時探討相關課題的頂尖學者，更有金主贊助他印刷機來打印作品，然其著作終究只有少數印成書，且付印的幾部大都在他死後才出版。他的《論三角學》乃是西方第一部闡述平面三角與球面三角的專書，卻要到一五三三年才印製出來。

簡言之，在一開始的時候，印刷術對於科學理論的發展，彷彿沒有太大貢獻，倒是世人對工藝技術的重視，印刷似乎可以居功。實用技術著作，印製成書較早，例如亞伯蒂的《建築十書》印於一四八五年，德克雷臣的《農產論》印於一四八六年；至於由里米尼的沃圖里歐所著的《機器論》在一四七二年初印之後，又在一四八二與一四八三年的維洛納、一四八三年的波隆納，以及一四九三年的威尼斯，獲得翻印。在那個時候，許多領域的工藝技術，都有不少進展，儼然一片新氣象，且早在十五世紀前半，即已有跡可循。若說印刷術是眾多技術裡最可觀的一樣，並不

爲過³²³。

印刷術問世的最初五十年，印刷書的主要類型，大抵如斯。單就前述的既有進展來看，我們該對這種嶄新文本複製技術的成果，做出何種定論？

以上種種足以證明，印刷肇始之初，並未帶來驟然或徹底的轉變，至少就一般性的特徵而言，當時的文化開始時幾乎未受影響。然而，成千上萬的中世紀手抄本，不可能全部印製成書，是以箇中的取捨，很快就變成了當務之急。一如前述，書商的主要考量既然在於獲利與暢銷，當然會把當時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優先列入考慮。這也就是說，印刷術的問世，其實可以看成人類邁向大宗消費與標準化的現代社會之前，一度歷經的階段。

決定哪些作品值得一印，係以十五世紀的良窳標準行之，判定為過時之作的，則就此亡佚。最先銷聲匿跡的，乃是問世於《俗世之鏡》之前的知識總彙，以及成書於十三世紀全面編審之前，仍成遺珠的許多神學作品。另有一些文學類別，隨著印刷誕生而宣告死亡，例如中世紀流浪書生的俚謔拉丁詩。今日碩果僅存的幾首俚謔詩，靠印刷而流傳下來的極少，且多半是爲了湊滿書末的幾頁空白，才打印上去的，可以說是偶然倖存。

相反地，遭人長期遺忘的若干作品，也因為再度得到十五世紀讀者的青睞，藉著印刷重獲新生³²⁴。義大利人文主義者窮百餘年時間，有系統地從古代手抄本中搶救出的希臘羅馬典籍（後文將探討它們風行於十六世紀的情況），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十五世紀人的眼中，與當時生活仍有關聯，或實用價值歷久彌新的一些中世紀著述，同樣開展了第二春。就這樣，部分基督教詩人的拉丁文創作，因應當時的需要，得以風華再現——倒是里耳的阿蘭所著的詩集《反克勞狄安》，以及里加的彼得所作的《曙光女神》，縱有許多手抄本流通於市，終爲印刷商所忽略。更有一些

十二、十三世紀的神祕主義作品，在戴塔普勒等人的努力下，硬是從失傳的邊緣給救了回來。最後，決定哪些印刷成品得以存續的，則是歲月本身。一五一〇年之後，再也沒被翻印過的印刷書，為數頗眾。反過來看，也有許多馳名於現代的古早著作，不僅未能在「一四五〇到一五〇〇年間」製成書，還被當時人視為不合時宜。它們當中運氣好的，偶然為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或十七、十八世紀一些較博學的本篤會修士發現，重見天日；比較不濟的，就只能等到十九、二十世紀發軔的現代文獻學來拯救它們了。佩脫拉克曾經提及的《埃羅伊姿暨阿伯拉雷書信集》，直到一六一六年才付印，即屬此類一度佚失的傑出作品。這種「中興之作」還包括九世紀艾利基納大多數的作品、十三世紀貝根的作品、十一世紀德菲利耶與熱貝爾的書信、聖加侖的埃克哈德的回憶錄，以及蒂爾伯里的杰爾衛、帕里、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寫的編年史與其他史書。至於拉瓦丁的希德伯之作，與《羅蘭之歌》，亦是典型例子。這也就是說，孰存孰廢的選擇，起初確是由十五世紀的人，憑藉十五世紀的品味與輕重緩急，拍板定案。

雖然說，當時印刷鋪選擇所印之書的標準，不能隨使用「人文主義」一詞形容之，卻不代表它們對人文主義運動是沒有貢獻的。事實擺在眼前：以羅馬體活字印製的古代經典著作，品質良好且供應充足，產自義大利印刷鋪者尤然。書籍交易的組織，業已相當健全，能將這些印刷成品銷往歐洲各地。阿爾都斯的時代即將到來，而後不久又會有來自法國的幾位同業與之競爭。也就在這個時候，印刷事業艱苦的本質，迫使印刷商（並連帶促使讀者）修正了前人遺留的既有觀念。為了確保即將付印的書籍，在排版組字上精確無誤，並尋訪最具參考價值的手抄本做為原稿，文獻、古語的相關研究，遂在這些需求的刺激下勃興。更重要的是，中世紀的作家發表著

作，並不喜歡具名，如此印刷商便不得不考證（或遣人查證），所印之書的作者，身分究竟為何；未經考證而胡謔瞎掰者，姑且不論。許多十五世紀裡，按中世紀手抄本逐字印製的書籍，作者仍然不詳，或牽強附會；不過，此種普遍情況很快地就改變了。當時的作家，對個人的名聲頗有自覺，著作一旦付梓，數以百千計的印刷本，都會附上自己的大名。名聲遂成爲新的原動力，象徵著創作者署名、著作權抬頭的新時代，已翩然降臨。於是，爲持續增加的讀者而撰寫的新書，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中世紀的慣例與遺風，便在時代的洪流裡滅頂。

二、人文主義與印刷書

一五〇〇到一五一〇年間，印刷書的時代，算是揭開了序幕。這些書本漸漸取代了圖書館裡的手抄本，使之屈居其下。到一五五〇年，手抄本幾乎無人問津，只剩從事特殊研究的學者還在沿用。

欲解釋這種革命何以如此風行草偃，就必須重提首批印刷鋪龐大且迅速攀升的產能。一如前文所述，一五〇〇年之前問世、如今有案可考的印刷書，版本多達三萬到三萬五千種，總發行量約當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冊。到了十六世紀，規模則是不減反增。此處謹以前面提過的數字再度舉證：出版於十六世紀巴黎的書籍，超過兩萬五千種，里昂有大約一萬三千種，在德國約有四萬五千種，威尼斯一萬五千種，低地諸國只算十六世紀前半就超過四千兩百種。至於英格蘭當地，光是以英文印製者，一六四〇年之前就有兩萬六千種，其中約有一萬種爲十六世紀產物³²⁵。據此

概略推估，則一五〇〇到一六〇〇年間印製的書籍，應有十五萬到二十萬種的不同版本。爲了計算方便，我們假設單版的平均印刷量爲一千冊；這麼一來，推算十六世紀裡出版的書本總額，便達一·五億到兩億冊。這樣的推計還嫌保守，可能低估了實際數字。當然，較之於二十世紀的法國，一年就有一萬五千種書籍依法登記，每種印刷五千到一萬冊（小冊與期刊尚不包含在內；這當中亦有動輒印刷五十萬冊者），十六世紀的產量並不足掛齒。但重點在於，十六世紀出產的印刷書，其數額之多，已經足以讓所有識字的人，都有機會讀到書。十六世紀初期，出版業在古典文學知識的傳布上，扮演關鍵角色，稍後並成爲宗教改革信條的推廣主力；它也促成了方言的固定、確立，刺激民族文學的發展。

本節首先探討的，是當時的讀者³²⁶。倘若在十六世紀裡，有志建立私有書庫的人士逐年增加，而藏書的規模也穩健擴張，那也不足爲怪。當時的人一旦亡故，負責料理後事者，便在勸募者面前草擬遺產清單，其中也包括書籍目錄。這些目錄乃是認識昔日法國私人書庫的寶貴資料，對研究富裕階級的藏書，助益尤大。

擁有私人書庫的，都是些什麼人？在我們獲得的目錄裡，記載了十五世紀晚期與十六世紀裡，三百七十七座私人書庫的情況，其中一百零五座歸神職人員所有（五十三座爲總主教、主教、主教座堂司鐸、修道院長等教會要人資產，十八座爲大學師生所用，三十五座隸屬教區司鐸）。此外，法律工作者所擁有的數目也頗多（一百二十六座），其中二十五人爲君王法院或其他上訴法庭成員，六人任職於地方政府，四十五人爲出庭律師，十人爲檢察官，公證人則有十五位。其間，歸屬法界人士的書庫，數目逐年增加，與神職人員擁有的數量恰成對比；這倒與一般

的預期相符，如下所示：

時間	法律工作者	神職人員
一四八〇—一五〇〇年	一座	二十四座
一五〇一—一五五〇年	五十四座	六十座
一五五一—一六〇〇年	七十一座	二十一座

隨著神職人員添購的書籍日益減少，其在出版市場的重要性也相對下降；至於社會地位與日俱增的律師，則逐漸變得舉足輕重。此種情況在巴黎尤然，因為政府機關與上訴法庭群聚於此，當地的法律工作者多達一萬人，對書商來說，更是動見觀瞻的大客戶。一五〇〇到一五六〇年間，位於巴黎且有案可考的一百八十六座書庫，由法律工作者與朝中官員擁有者超過一百零九座，只有二十九座的主人是神職人員。至於軍人與「配劍貴族」，擁有書庫者甚少（三百七十七座中僅三十座）；倒是生意人、商販、工匠等，雅好藏書的還不少，有些收藏數量頗大，令人詫異。三百七十七座書庫裡，六十六座屬於雜貨商、織布匠、衣帛商、鞣皮匠、食材商、乳酪商、叫賣販、鎖匠、糕餅師傅、剝皮匠、染房工、製鞋匠、製車匠等。當然，書庫規模不一，彼此差異很大，例如任職於主教座堂的德奧頓即擁有四千本書之多，但也有人藏書不過寥寥數卷。書本多寡姑且不論，十六世紀的書庫，隨年代的推移而規模漸增，可說是明顯的趨勢。現今所知的最早書庫，建於十五世紀末，書籍總數（包括手抄本）亦以十五到二十本最為常見，並無傲人之

處；但是到了一五二九年，巴黎某位富商過世時，留下的藏書已經多達一百七十冊。一五二五年以降，數額龐大的藏書，開始出現在法界人士與朝中官員的財產清單裡；曾經擔任君王法院訊問委員會主席的波特，一五二六年的藏書量為三百零九冊，而一位名叫德梅篤拉的君王法院法官，於一五二九年時也擁有兩百三十五冊藏書。

這種成長是持續的；到了一五五〇年，擁有五百本藏書的法官，已是司空見慣。另一位曾任君王法院訊問委員會主席的鮑德利，於一五五〇年的藏書量為七百本。一五五四年，君王法院的資深法官里才，則坐擁五百一十三本書。從此以後，幾乎找不到一位君王法院成員、地方行政官，甚至出庭律師，手中沒有相當圖書收藏的。至於化學家、剃頭刀手術師（中世紀時，兼做簡單外科手術的理髮師）、檢察官等，藏書豐富者，也占頗大比例。

擁有此種書庫的人，當然不會是書商唯一的顧客群。十六世紀的法律工作者，固然是書商眼中的衣食父母，不過，會買書的，可不只這批讀書人與些許商人、工匠而已。通俗書刊的買賣，始終都存在；月曆、聖徒生平、曆書、時辰禱書等，大量販售給更廣大的群眾。書商霞諾便專做這種大眾生意，其店鋪內囤售的宗教類小冊與其他通俗讀物，在一五二二年達到五萬多本。一五二八年時，書商陸瓦爾庫存的十萬零兩千兩百八十五本時辰禱書與其他信仰類書冊，也是考量同樣的市場而進貨；一五四五年的高達，手中更有二十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九本類似的書刊待價而沽³²⁷。

與更早之前相比，十六世紀前段所生產的各類書籍，有著明顯的消長。此時的宗教書籍仍占

極大宗，且印製而成的實際數量很可能多過十五世紀，只是隨著書籍總產量的提升，其在總額當中所占比例顯著下滑，倒是愈來愈多的古典著述賡續付梓，令人印象深刻。在十五世紀的史特拉斯堡，超過五成的印刷書屬宗教類，而古代經典成書者不到一成。一五〇〇至一五二〇年間，拉丁或希臘文古籍，以及當代人文主義者的作品，占印刷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三，與宗教相關的書刊竟降為百分之二十七³²⁸。在巴黎，演變的步伐較慢，但持續進行著，如以下所列³²⁹：

時間	印製總數	宗教類書籍	古典暨復古作品
一五〇一年	八十八種	五十三種	二十五種
一五一五年	一九八種	一〇五種	五十七種
一五二五年	一一六種	五十六種	三十七種
一五二八年	二六九種	九十三種	一三四種
一五四九年	三三二種	五十六種	二〇四種

針對當時的任何地方，進行類似的研究，幾乎都會得到同樣結果。也由於這個階段正是後人所稱的人文主義精神最盛的年代，如此情勢實不足為奇。

在義大利，尤其是威尼斯與米蘭印製的古代經典，品質精良，一方面早從十五世紀起，便令那些尚未被中世紀遺忘的遠古文豪更享盛名，另一方面則讓部分讀者，雖然僅限於一小群，重新認識人文主義學者所推崇的其他古代作家。這正是爾後逐漸茁壯的復古運動，初試啼聲的時刻。

值此十五、十六世紀之交，這個領域裡穩坐第一把交椅的出版商，當推阿爾都斯；他所出版的古文著作，種類繁多且引證淵博，更以便攜易讀的小開本發行。也因為他事業有成，巴塞爾、史特拉斯堡、巴黎等地，旋即出現有樣學樣的競爭者。前面的章節，已經大略敘述了人文主義印刷商，奮鬥不懈、終告勝利的冗長歷程，此處不再贅言，但這些人文主義出版社的部分成就，有必要在此重提。在大約一五〇〇到一五一〇年之前，義大利乃是人文主義印刷業的唯一核心。義大利以外，復古進展的第一步，則是史特拉斯堡的舒爾與尚·修特、貝德、巴黎的吉伊·德古爾蒙等人所出版的小開本書籍；這些韻文係由安迭里尼、小貝羅阿都、曼圖阿努斯等流浪海外的義大利文人，亦或他們的門生，仿效一流的拉丁文采所作。瓦拉的《拉丁詞藻》，亦於此時獲得極大回響。尤其重要的是，傳統的拉丁散文寫作入門，經過貝德、伊拉斯謨斯等學人的補遺、校訂，與時俱進，更有一些新撰的文法書取而代之。諸如德波提瑞大獲成功的著作，以及林納克、塔迪夫的作品，與馮胡騰的《駢韻藝術》、裴洛托的《拉丁文法入門》，皆是例證。另外，新的詞典開始出現，其中包括卡利庇諾的詞典，與裴洛托的《羊角盛宴》；此後沒有多久，侯貝·埃蒂安納的《拉丁語典》問世，更為後世長期援用。

閱讀古希臘羅馬經典的人口，在此期間穩定成長。至於那些十五世紀即不乏讀者的作品，則更廣為人知。泰倫斯著作受歡迎的程度，持續上揚，便是一例；其中，由徐恩諾與貝德編輯，特雷瑟爾於一四九三年於里昂出版的版本，在不到二十五年的時間裡，也就是一五一七年前，即再版三十一次。維吉爾的各種著作，十五世紀裡即付印一百六十一一次，在十六世紀裡更又付印了兩百六十三次；這還不包括難以計數的各種譯本（爾後的譯本數目更多）。所有主要的拉丁文學

著作，慢慢變成隨處可見的普遍讀物。一五〇〇年以前，塔西圖斯作品的出版次數寥寥可數，此時也出現數十種印刷版本。一五二六到一五五〇年間，巴黎地區尋常百姓的藏書，大都包含幾部公認的拉丁文學必讀之作，足見這些遠古作家的讀者群確實廣大；特別符合當時喜好的，係卡圖盧斯、提布盧斯、普洛佩提烏等拉丁哀詩的作者。諷刺詩當中，出自賀拉斯與佩爾西烏斯手筆的，最受當時讀者肯定，後者尤然；貝德曾在一四九九年發行佩爾西烏斯的詩集，結果在一五一六年之前十五度再版。歷史學方面，不僅薩盧斯特、李維、蘇埃托尼烏斯、凱薩的論著長期暢銷，馬克希穆的作品，需求更是特別龐大。

在古拉丁文作家成爲書市新寵之後，對古希臘文學的需求，旋即興起、茁壯。這方面亦以阿爾都斯爲引領風潮的主要人物。既有風氣如此，鑄造合用的希臘文活字，自然成爲印刷商在技術上的新挑戰。偏偏希臘文的氣音、重音符號，必須與字母鑄刻在同一粒活字上，才能確保印刷效果；這就使得希臘文的特殊字樣遠多於拉丁文，憑添難度。

印刷書於內文引進希臘文³³⁰，係一漸進的過程，初期出現在古人語句的引述中，這在西塞羅的作品裡尤多。多數印刷商起先的做法，是把這些句子改寫成拉丁文，或在打印時留白，印畢再以手寫補上希臘文。一四六五年開始，一些勇於嘗試的印刷商，試著鑄刻少許的希臘文字母；它們不僅模樣原始，有時連氣音、重音符號都省略。至於缺漏字母，他們多半以形狀差異不大的拉丁文字樣補上，湊成一整套希臘字，例如以A頂替大寫的α，以c代表σ或ς等。蘇比亞科的史威罕與潘拿茲在一四六五年十月三十日發行的拉克坦提烏斯作品裡，以及修埃佛在一四六五年發行的西塞羅《論職責》裡，率先採用此種權宜做法，隨後爲許多義大利印刷商仿效之。在羅馬，

哈恩與德利尼亞明於一四七〇年印製的書籍，內文的引句也出現希臘字母。一四七一年，開業於米蘭的查洛提，與開業於威尼斯的施派爾的溫德林，亦如法炮製。此後，一四七四年的費拉拿，和一四七六年的特雷維索、維琴察等地，也陸續出現這樣的書籍。另外更有好幾位義大利印刷商，從一四七四年開始，便試著以希臘文打印整本書，或令書中文走兩欄，一欄是希臘原文，另一欄為拉丁譯文，兩相對照。布雷西亞的佛朗都斯，即在大約一四七四年，以希臘文與拉丁文印製《蛙鼠之戰》。一四七六年起，則有帕拉維希努、阿庫爾蘇，以及後來的辛臣斯勒，開始或已經在米蘭印製希臘文作品；此後，希臘書便在義大利的部分城鎮持續出版，尤其是佛羅倫斯、威尼斯與米蘭。十五世紀末，義大利境外亦見希臘文書籍。

德國與法國的印刷商，循義大利同業之前例，先是鑄刻了少許的希臘文字，用以打印引語。阿默巴赫並於一四八六年，在巴塞爾出版菲萊爾福的書信，當中引用的不少語句，以希臘原文印出。依樣畫葫蘆的，包括了戴芬特爾的帕夫洛特跟布雷達的傑克，時間分別為一四八八年與一四九六年。柯貝格於一四九二年出版的維吉爾詩集，注腳裡也有若干希臘文引言。一四九二年起，里昂印製的書本裡開始出現希臘文（特雷瑟爾首開風氣之先）；一四九四年起，巴黎印製的書本也加入此一行列（戈林與倫堡德在當地拔得頭籌）。話雖如此，全本皆以希臘文印刷的書籍，似乎要等到一五二〇年代開始，方才出現於義大利以外的地方。吉伊·德古爾蒙嘗在堤薩爾的指點下，於一五〇七年的巴黎，把字母與氣音、重音符號分開，鑄出一整套希臘活字；翻印阿爾都斯版的忒奧克里托斯作品時，這副活字便在此許段落落派上用場。到了一五一二年，德古爾蒙再接再厲，完成另一套字母與氣音、重音符號鑄在同顆字粒上的希臘活字。約莫同時，勞顧能堡先是在

一五一一年的威登堡，將《希臘文法入門》的部分內容以希臘原文印出，而後又在在一五一三年，推出附有拉丁譯文的《蛙鼠之戰》。在那之後進展轉趨迅速，早年印刷匠所使用的原始希臘活字，遂汰換成字體較為優雅的活字。在一五一四至一五一七年間，爲了打印樞機主教席梅內茲所需的多語版《新約》與《聖經全書》，匠人也特別鑄製一套希臘活字。

此外，許多大出版商察覺，在當時的市面上，已有極多不同版本的古典拉丁文作品問世，故轉而承攬希臘文作品的出版事宜。各種希臘新體活字，在許多城鎮嶄露頭角，且多以阿爾都斯字體爲模仿對象。我們發現，舉凡紐倫堡的采爾蒂斯，史特拉斯堡的舒爾，奧格斯堡的米勒，萊比錫的舒曼，科隆的瑟威柯努、梭特爾、琴尼赫，乃至於先後在佛茲罕、圖賓根與阿格諾開業的安斯罕，都使用過這類活字。地位格外重要的，則是巴塞爾的富羅本；他曾將希臘活字賣給法國（巴黎與里昂）和德國的印刷商。法王法蘭西斯一世，於一五四一至一五五〇年間，亟欲帶動巴黎研究希臘古文的風氣，遂命加拉蒙仿效克里特島書法家維吉圖斯的筆跡，鑄刻知名的御用希臘體活字，更使印刷商推動下的希臘活字發展，達到高峰。埃蒂安納家族，以及許多的巴黎印刷商，日後都曾使用這種字體。

以上簡短敘述，當使我們明白希臘語文相關知識的傳播過程，也認識了古典希臘著作的原文書市場是如何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前面已經提過，阿爾都斯的做法，是先行出版文法書與入門教範，爲讀者奠定研習希臘文的基礎，而後再遂行更大規模的出版計畫；至於巴黎的吉伊·德古爾蒙，與史特拉斯堡的舒爾，做法大致雷同，只是採用的字體更加原始些。當時人的希臘文知識得以增長，都得歸功於這種按部就班的措施。在一五二五年之後，義大利以外的地方，簡直掀起

了研讀希臘文的狂潮。牛津與魯汶（一五一七）、埃納雷斯堡（一五二八）、巴黎（一五二九），乃至於德國數個城鎮的大學，相繼開設正式的希臘文課程。在巴黎，貝德率先印製多種希臘文著作，起而效尤的包括德柯萊、奧熱羅、魏卻爾，最後連埃蒂安納家族也加入此行列。克雷拿並於一五三〇年寫道，他所編撰的《希臘文法則》，僅幾天時間就在巴黎賣出五百本。這種說法看似不足採信，實則未必誇大其詞，畢竟那一年的法國出版了四十種古希臘著作，其中以原文印行者多達三十二種，與同年出版的拉丁文作品（三十三種）不相上下。一五四九年，巴黎又額外出版了三十三種希臘文作品（不含譯本），而同年發行的拉丁文作品不過四十種。是以在十六世紀前半，印刷業先是致力於出版拉丁文書籍，而後是希臘文書籍；接下來，希伯來文著述，也或多或少普遍於全歐各地（以下探討希伯來文書籍的段落，係根據卡唐先生的筆記寫成）。

十六世紀人文主義陣營的學者裡，有不少人立志成為「古語三通」（即同時通曉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希伯來文的人），其中許多人得償宿願，例如德內布里亞、羅伊希林、季達齊耶、明斯特與克雷拿。法國皇家學院的宗旨之一，便是鑽研這三種古語，瓦達博勒的希伯來文課程，即在此校開設。大約從一五二〇到一五三〇年開始，懂得希伯來文的學人，已經相當常見了³³¹。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此後許多拜占庭學者流亡至義大利，以躲避土耳其的鐵騎；有意學習希臘文的人文主義者，便向這些人請益。在另一方面，想學希伯來文的，以猶太學者為師，卻得忍受旁人質疑他們悖離耶穌，意圖改皈猶太教，或像羅伊希林那樣，面對死敵偏頗地貶低猶太文化，仍不改其志。人文主義者對希伯來文的興趣，意味從很早期開始，便有為數眾多的注疏、神學書或語言學作品，一如引用希臘文那樣，引用希伯來字母寫成的字詞或語句。但與一

般認知不一樣的，猶太文的書籍，泰半出自猶太印刷商之手，讀者也以猶太裔為多。人文主義印刷商，固然常向猶太同業學習這種文字，然其印出的成品，服務的卻未必是有意鑽研原典的基督教徒。例如普朗坦打印的希伯來文《聖經》（即《聖經》舊約的原典），數量雖達兩千五百到三千冊，似乎仍以猶太讀者為主要訴求對象，基督教學者倒是其次。

印刷術的發明，猶太人當然不會毫不聞問。這個民族的文化，必須透過希伯來文方得表述；他們所讀所寫，皆是希伯來文字。縱令猶太婦女與教育程度較低者，置身非猶太裔占大多數的環境，言談間已經慣於使用方言，閱讀或書寫時候，仍以希伯來書寫文字為主。他們擁有許多手抄本，宗教類與俗世書籍兼而有之，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與信仰緊密結合，且以誠惶誠恐的心態面對下一代的教育，或謹守著每日恭讀經書片段的誠律。他們歡迎印刷術，則是因為各種學術、禱詞、儀式、祭典、宗教律令與法規的文本，不但可用這種花費低廉的方式傳布，印出的成品更是經過細心校對，少了傳抄的訛誤。此外，印刷書的頁面編排，讓他們得以輕易在宗教典籍的空白處，添進各種注解，這種便利可是前所未有。

西班牙與義大利境內的猶太人，是當時最進步、最富庶的兩個猶太社群，他們比落腳他國的同胞更早擁有希伯來文印刷機，且兩者幾乎同時開始印製希伯來文書籍。雖然第一本日期可考的希伯來文印刷書，乃是狄卡拉布黎亞發行於一四七五年的《摩西五經》注，作者為特魯瓦的掃羅門，出版地點則在義大利，但最近這幾十年的研究卻發現，義大利並不是猶太印刷業唯一的發軔地。其他付印日期不詳的書本，有些是由寇拿特在曼圖亞所印，有些則有人認為產自羅馬，雖未標示確切的出版地點，卻幾乎可以確定其年代早過一四七五年。另外，第一本產自西班牙的希伯

來文印刷書（同樣是特魯瓦的掃羅門所作的那部注），印製於蒙塔班，時間與前述的義大利版幾乎相同。

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境內的猶太人遭強行驅逐，希伯來印刷事業的一支，在歷史上戛然而止。鄰近的葡萄牙，由於境內猶太人投身印刷的時間（一四八七年）比基督徒早了七年，一度取代西國成爲希伯來文印刷中心，然此一榮景亦甚短暫；一四九八年，拒絕改信基督的猶太裔葡人，也遭驅逐出境。如此情勢下，希伯來文印刷的發展自然更集中於義大利。希伯來印刷鋪散見於數地，其中又以曼圖亞附近桑奇諾一地最爲著名³³²，以地名爲姓的桑奇諾家族發跡於此，並成爲最享盛名的猶太印刷商家族。

不過，在德國、瑞士、低地諸國、法國、英格蘭等地，仍有些許的人文主義書籍，印著少量的希伯來字句；這些書泰半是注疏、神學、文法方面的論文。尼格利的《反猶太背信論》，於一四七五年印刷於埃斯靈，首開先例。但在莫納爾於一五二二年的法蘭克福出版猶太教儀式全書，以及猶太裔印刷商舒瓦茲與約拿桑之子達維於一五三〇年的西里西亞出版《摩西五經》之前，並沒有純粹的希伯來文印刷書可言。同樣一位舒瓦茲，而後又與他人共事，於一五三三年的奧格斯堡，印製特魯瓦的掃羅門那部不可或缺的五經注；此後，在巴伐利亞的伊臣浩森和鄰近法蘭克福的黑登罕所印成的書籍，又相繼出現他的名字³³³。

一五一二年，在布拉格與克拉柯夫，日益繁榮的猶太印刷中心，亦隨之而起；一五三四年，黑里茲家族在此創建印刷鋪，並自一五五一年以降，出版各種版本的聚會禱本，供善男信女使用³³⁴。

在法國，馮別登巴赫的《遊記》出版於一四八八年的里昂，而後在一五二六年，又有帕尼努斯的《聖經詞典》問世。同期的巴黎，堤薩爾的一部文法著作，也包含若干希伯來文，出版商則是當地率先鑄刻、使用希臘文活字的吉伊·德古爾蒙。一五二〇年，德古爾蒙又印製了十三世紀基姆希的一部短篇著作，稍後並印出部分的希伯來文《聖經》。不管是巴黎的德古爾蒙、魏卻爾，還是里昂的謝法龍、格利甫，皆曾出版若干希伯來文作品，稍後並由老侯貝·埃蒂安納承續此風，印製出迄今仍是傳世傑作的希伯來文《聖經》³³⁵。

研究希伯來文的人文主義學者，不僅在法國多，在瑞士與低地諸國也不少。一五一六年，富羅本在巴塞爾出版希伯來文的《聖詠集》。蘇黎世方面，其實在一五二六年已有印刷匠使用些許希伯來文活字，唯第一部全本以希伯來文印刷的書籍，即一本名為《約西彭》（以作者名為書名）的史略，還得等上二十年方與世人見面。至於魯汶與安特衛普，只有幾本援用些許希伯來字彙的手邊冊付梓。倒是出身安特衛普、一五一七年於威尼斯開業的波姆伯格，雖致力於希伯來文本的出版，也聘請猶太裔的印刷匠與校稿員做幫手，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基督徒印刷商；據他在牌記中自述，這是他對猶太文化的同情與個人喜好使然。他也是出版全本《塔木德經》的第一人，並將特魯瓦的掃羅門及其門生的評注（此部分又稱《托薩佛實》）打印在正文的左右欄位。時至今日，這部記載誠律、教規的經書，仍然遵照他所確立的樣式成書，不論何種版本的《塔木德經》，其頁碼標示與頁面編排，皆以波姆伯格的版本為準³³⁶。總的來說，他在一五一七到一五四九年間，印出兩百五十種希伯來文書籍，其中還是以歷久彌新的《塔木德經》最是經典；其所聘雇的猶太印刷匠，約當兩百人，並由知名的阿德金統籌指導之。

一般相信，十五世紀裡，大概有兩百種希伯來文作品印製成書，而十六世紀的數量則增為四千種。現存的搖籃本當中，超過一百種希伯來文書籍出自義大利，餘皆產自伊比利半島（西班牙與葡萄牙所印之書，數量約為二比一），例外的也只有一本³³⁷。它們幾乎全是既有的傳統作品，當代的新著作僅三本。在這個階段裡，希伯來《聖經》四度全書付印，各種節錄版則共計印刷三十次。至於《塔木德經》，十六世紀之前不曾全本印出，卻也發行了二十七種不同的評述摘錄，而《密西拿經》的內文亦兩度出版。在《聖經》評注的部分，共有十五種各自獨立的著述問世，評注《摩西五經》者尤多；在《聖經》本文旁附上評注者尚且不計。這些評注的作者，通常是法國或西班牙的猶太學者，箇中的第一把交椅，一如前述，當推特魯瓦的掃羅門；其論著在義大利印製的有五種，在西班牙有三種，葡萄牙一種³³⁸。其他宗教法規與道德裁量的論文，出版成二十七種書，亦具同樣的重要性；其中，將亞舍之子雅各伯（與希伯來人先祖同名的十三世紀末猶太學者）彙編的《四類書》全篇或部分印出者十六種，十二世紀邁蒙尼德彙整的「第二律法」（猶太律法輔導）有五種，庫西的摩塞所作的「規戒小書」亦印成兩種。除了這一些，另有十四種禱本，一部宗教儀式評注，與一本兼論聖祭事務的月曆（純粹的月曆反倒只有兩種）。由於《塔木德經》的研讀，在猶太教裡似乎是比较參與猶太教堂儀式更加要緊的職責，前述類別的信仰書籍，竟占總數的八成以上。剩下的或可如此分類：文法書暨字典（六種），詩集、文藝作品暨哲學書（十二種），旅遊、歷史與醫藥書（各一種）。十六世紀裡，除了各種學者版的《聖經》（如德內布里亞參與、埃納雷斯堡出版的多語版，普朗坦版，埃蒂安納版等），還是有許多其他書籍，包括文法入門、指導手冊等，受到人文主義學者的影響。總的來看，一四九七到一五二九年間，共有

二十八種希伯來文法書發行，當中又以羅伊希林、德內布里亞、卡皮敦、艾可、克雷拿、帕尼努斯、萊維塔、明斯特等人的作品最著。這些在在證明了，希伯來文研究，與希臘文的研究同受重視。

與早年不同的是，此時有愈來愈多的人，對學術氣息濃厚的作品，產生興趣。這些人對於前述幾種學術語文的通曉程度泰半低落，卻已然受到出版業的影響，緩慢地培養出閱讀的雅興。出版商也理解，書市需求有限，很快就會飽和，如能擴大讀者群，必然有利於生意。是以就我們目前探討的作品類型而言，翻譯書籍的數目因而驟增。特別是一五二〇年以降，許多印刷商（一些重量級的業界人士，亦包含在內）還把自己的工作間變成譯書坊：德國爾恩即是里昂當地的一個例子³⁹。這樣一來，已然快速演進的各地民族語言，便藉著翻譯與古典語文擴大交流，進一步地充實內涵，去蕪存菁。

民族語言從幅起到扶正為官方語文的過程，首見於義大利，至於法國在這方面的沿革，則最值得得一提。歷來幾位法國國王皆以促進國家統一為其政策的一環，到了一五三九年，更有「維萊科特雷敕令」宣告法語成為各級法院的官方語言。此外，多數的在位者皆認為，支持、鼓勵譯者翻譯古文或外語，有利於鞏固本國語文。是以法國的路易十二與法蘭西斯一世（尤其是後者），積極促成各種譯成方言的作品。前者詔令德塞索翻譯古典著作，後者則把譯本從楓丹白露的皇家圖書館遷出，俾利印刷。亨利四世在位時，法文譯本產量大增，經國王欽點而印製的譯作愈來愈

多，且通常成爲重要而成功的出版品。最多產的幾位譯者中，不乏頭角崢嶸之輩；像是與德塞索同期的德聖杰萊，以及德圖爾、馬羅、阿米歐、德巴伊夫、多雷等人。

就這樣，從十六世紀初開始，法國境內將古典著作譯爲法文的例子，逐漸增長、日益繁多。出版商若是置身於一個財富與人口成長飛快，且治權迅速統一的國家，便有足夠龐大的翻譯書市場支撐其事業。相較之下，西班牙與英格蘭的翻譯書市，崛起步伐就慢了些；後者因爲人口少於法國，似乎要到十六世紀後半，翻譯書的銷路方才讓書商鬆了一口氣。一五五〇年之前的英國，古典作品譯成英文者，僅四十三種付梓。一五五〇至一六〇〇年間，則增爲一百一十九種³⁴⁰。至於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這方面的進展自然更遲緩些。西邊的低地諸國，民族語言通行的範圍太過有限，只有千篇一律的騎士傳奇與信仰作品，因爲讀者多，印成當地方言之後尚有足夠銷路。

享有最多不同譯本的作品，通常出自那些最早受眾人肯定，且地位最穩固的古代文人。十六世紀譯人，頻繁逐譯維吉爾的作品，可謂孜孜不倦；其數種不同作品，印刷成兩百六十三個版本的拉丁原文，一併出版的義大利譯文也有七十二種（十五世紀時僅六種）、法文翻譯二十七種（十五世紀僅一種）、英文翻譯十一種（十五世紀僅一種）、德文翻譯五種（十五世紀時無）、西班牙文翻譯五種（十五世紀無）、法蘭德斯文兩種（十五世紀無）³⁴¹。在另一方面，奧維德的作品，恐怕比維吉爾更常被翻譯，其詩集有各種天馬行空的不同譯法，《變形記》亦屢經改寫，數目之多難以盡數。在此同時，尚有許多古代文豪重新躍然紙上，史書作者尤其特出，與多年前一樣廣獲傳頌，例如凱薩、蘇埃托尼烏斯、約瑟夫斯、塔西圖斯、馬克希穆、普盧塔克、優西比烏斯、波利比奧斯、希羅的安、色諾芬、修斯提底斯等。

印刷產業的發展，使當時所有識字的人，無不關注起古希臘羅馬的創作與論著。至於文本所承載的知識，以其譯文為主要傳布媒介，原文的角色反而居次。以柏拉圖作品為例，就要等到一五七八年，才在法國發行完整未刪的希臘原文版，但仍得附上平行的拉丁譯文。在那之前，柏拉圖的顯赫文名，與其說是透過摘錄版的希臘文原著而建立，不如說是菲奇諾的拉丁文譯本和《對話錄》部分篇章的法文譯本所致。前者（菲奇諾譯本）在十六世紀前半的法國翻印了五次，後者（法文版《對話錄》）則經常為格利甫、德國爾恩、瓦斯科桑所翻印。

推出各種古典作品譯本的人文主義者、古文學者、作家與印刷商，同時也是出版《聖經》原典翻譯本的生力軍。自然地，人文主義者在復古風潮引領下，創作的各種新拉丁語文學當中，亦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譯成各國語文。這其中不僅有摩爾的《烏托邦》、波焦（即布拉喬利尼）的《談諧集》、曼圖阿努斯的詩集，更涵蓋了埃米黎、喬維歐、圭恰爾迪尼等史家的著作。

更進一步說，這個時期還有一種特徵，就是翻譯某種當代語文書寫的作品，以服務使用另一種當代語文的讀者。像義大利的人文主義者與詩人，長期以自己的語文來創作，深遠的影響力遍及全歐；又因為當地語的文學日益普及，各種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的義語和西語書籍，為數甚眾。除了佩脫拉克與薄伽丘的名作持續譯成多種語言之外，從上個世紀開始流行的布蘭德作品《弄臣之船》，也在此列。只是出自義大利與西班牙文人手筆，並藉譯本風行全歐的作品，數量過於龐大，不可能在此細數而盡。至於其中人氣最旺、最能迎合當時風尚的幾本書，則是從薩拿札洛、本博、馬基維利，以及後來的阿里奧斯托、塔索等人的論著翻譯而來。另外還有一些著作，立論於菲奇諾所闡釋的「柏拉圖式精神之愛」，雖與遠古大哲頗有段距離，仍然引領風騷，並和

卡維卻歐的《流浪者之書》、阿布拉瓦諾的《愛神之箭》、卡斯蒂流內的《侍臣之書》一同熱賣。以至善觀點描述完美廷臣的《侍臣之書》尤獲好評³⁴²，此後並有《高盧的阿瑪迪》試圖進一步淬煉此書所言之理想典型。透過各國的眾多譯者在這方面的努力，即便有民族性的當地俗文學於此時誕生，歐洲文化的整體同質性仍得以保全。某些情況下，翻譯印刷書的數量，甚至多過原作的印製版本。以西班牙文學為例，顧瓦拉的《馬可·奧里略的黃金書》，一五二九年首度出版，至一五七九年已翻印出三十三種西班牙文版本。一五三〇與一五三二年，該書分別印成法文和英文，之後又出現超過二十種法文、五種英文的翻印版。德聖佩羅的《愛的牢籠》，情況也類似：一四九二年首度出版，而後出現十五種西班牙文版，十二種法文與法西對照版，十種義大利文版，一種英文版。德羅哈斯創作的喜劇《卡利斯托與梅莉貝亞》，以《塞萊斯蒂娜》之名廣為人知，也有六十種西班牙文版，十二種法文版，十一種義大利文版，三種德文版，三種荷蘭文版，兩種拉丁文版，兩種英文版，以及一種加泰隆語版。

至於拉丁文的國際語言地位，則要等到十七世紀才全面式微。至此，各地的民族文學皆建立起基礎，並令泛歐書市開始分裂；各國執政者基於政治與宗教理由，推展各種成效顯著的圖書審查，亦助長這種分化。到頭來，歐洲的不同國家，終以文化差異為界，將彼此的出版市場永久區隔開來。

如前所述，一部分當時作家的作品，憑藉前述的翻譯與交流，從十六世紀開始，登上更廣大的舞台。這當然也包括與本節主旨息息相關的書籍類型，亦即影響力一度廣被各地的人文主義領

袖人物著述。

首先，欲了解幾位菁英作家的作品如何傳布各地，就得從相關的史料片段著手。此間的頭號思想家，自非伊拉斯謨斯³⁴³莫屬；十六世紀大多數的圖書館與私人藏書裡，都能找到他的大作。一五〇〇到一五二五年間，他的《箴言》尚未完全成書，業已分階段發行，市面上的初版、翻印版、修訂版等，共計七十二種；一五二五到一五五〇年間，另有五十多種版本問世，此後到一五六〇年又再出現了四十多種。至於《對話集》在一五一八到一五二六年間，發行過六十種已知的版本，一五二六到一五五〇年也有七十種上下，一五五〇到一六〇〇年再印出二十種；這還不包括各種翻譯本與節錄本。在這兩部鉅著淪為《禁書索引》列管對象之前的半個世紀，各種版本的印刷量總和，恐已達到數十萬冊。

倘若我們將伊拉斯謨斯視為拉丁文寫作、作品通行全歐的代表性人物，則在民族文學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拉伯雷，或可視為前者的對照組，頗切合研究之所需³⁴⁴。一五三三年，拉伯雷首度以納席耶的假名發表《龐大固埃》。該書的初版印製多少冊，不得而知，如今可考者僅餘一冊，但在發行的第一年裡即已五度翻印（可能還有更多亡佚的版本）；一五三三到一五四三年間，《龐大固埃》與《徵兆書》兩書先後印行的版本，合計有二十七種之多。

《龐大固埃》問世之後十二年，拉伯雷的《第三卷》（即《龐大固埃》續集）宣告出版，不再依循前作以黑體字打印的先例，改採用羅馬體活字，作者並以真名示人。在巴黎，此書由人文主義出版商魏卻爾發行，訴求對象則顯然是涵養較佳的菁英讀者。在一五四六到一五五二，將近七年的時間裡，此書再版至少九次。他的《第四卷》於一五四八年初次發行，此後五年至少再版

八次；《第五卷》則在一五六二到一五六五年間五度翻印。從一五五三年起，到一五九九年止，拉伯雷的諸多作品至少再版二十四次。由此推敲，十六世紀裡，市面上應有上萬冊的拉伯雷作品流通著；如將亡佚的版本一併計入，發行總數可能上看十萬冊。

即便像比岱這樣的學究，也不讓享有廣大讀者的伊拉斯謨斯與拉伯雷專美於前，一部名為《論錢幣》的學術專書，印製成二十種法文、拉丁文版本。相較之下，摩爾的《烏托邦》更像是為了通俗大眾而寫，一五一六年於安特衛普初版之後，在整個十六世紀裡再版十一次；這還不包括十二種法文、四種德文、三種英文，以及三種義大利文的譯本。前述情形也發生在其他許多十六世紀作家的作品上，比維斯的著作亦是一例。這些史事足以證明，當時有能力領略最高水準著述的讀者群，已經相當龐大，而唯有新興的印刷技術，才能滿足這群既重質又重量的讀者。更進一步說，古典文學重新獲得重視，帶動了數股風潮的發展；這些風潮我們無以名之，只能視為盛極一時的流行，雖然終不免消退，卻足以替異常興旺的印刷事業奠定基礎。其中，寓言作品亦是當時風潮的一端。身兼法學專家的阿爾恰特，於一五三一年的奧格斯堡，推出一套遠古格言故事的小選集，每則故事皆佐以雕版插圖。就因為這些版畫，這部《拉丁寓言詩選》大受歡迎，在一五三一到一五五〇年間翻印了三十九次，一五五一到一六〇〇年間又翻印了五十四次。很快便有桑布克、帕拉丁、圭盧特等人，起而仿效阿爾恰特的做法，興起一股一直延續到下一個世紀的寓言書風尚³⁴⁵。

科學知識的範疇裡，人文主義者所關心的，大體而言，在於挽救並恢復古典理論文本的原

貌，修編後重新發行，徹底擺脫中世紀編輯者遺留下來的解釋與評注。故十五世紀以降，人文主義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古典科學理論的主要著述送上印刷機³⁴⁶。一四九九年，阿爾都斯將遠古天文學家的基本論著，集結成一整套的《星象古說》並出版，內容則是希臘文、拉丁文均有。至於同樣由他發行的希臘文對開本亞里斯多德全集，問世更早（一四九五至一四九八年），全套共五冊書，其中第三冊為《動物誌》，第四冊則為《習題篇》、《力學篇》與亞氏門生泰奧弗拉斯圖的《植物誌》合訂本。托勒密的《宇宙誌》於一四七五年已然印製成書，但沒有附上星象圖；俟一四七八年在羅馬發行時，方才把銅版雕印的星圖加進去。何瓦根於一五三三年的巴塞爾，首度出版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而後又於一五四四年率先印行阿基米德作品。加倫的著作，則於一五二五年，由阿爾都斯首度出版，全套五冊採小對開格式；希波克拉底的希臘文作品，同樣由他在一五二六年出版，唯相同文本已然在前一年的羅馬問世。醫學領域中，阿維森納算是較早（一四七三、一四七六、一四九一年）印製成書的，但就博物學著作而言，普林尼又比其他作家早，先由施派爾的約翰於一四六九年在威尼斯發行，而後復於一四七〇、一四七三、一四七六，以及一四七九等年份付梓。於是在力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自然史與醫學領域，古代碩儒的作品皆有新版本與新譯本誕生，供應那些足以體會箇中奧妙的讀者，並取代過時的十二、十三世紀舊版本。到這個時候，古典科學家的學說與教誨，總算有機會接受重新詮釋、評注，甚至增添補述；就算古書新解不會見於當時，也只是因為古代理論深受崇敬，並非無力為之。人文主義者的普遍職志，在於重現托勒密、泰奧弗拉斯圖或阿基米德的文本。他們以為，只要經過精確地考證、傳播，古代的學術權威即足以解決所有疑難雜症。至於這些古籍的文筆修詞，在他們眼

中常與其科學價值同樣引人入勝。結果，中世紀作家全然遭到蔑視，復古派對其論點隻字不提，簡直像是串通好了一樣；在另一方面，負責古籍彙編的人文主義者，大量援引古希臘羅馬的原始資料，以炫耀自己的博學。雖然仍有人文主義出版商，有系統地將中世紀的科學著作打印成書，唯書中宣稱的原作者，常是假託、附會而來。

於是，另一種奠基於古籍舊典的智識傳統就此蓬勃，與既有的學術傳統分流而並立。在此同時，尚有一類讀者群更廣的「科學」讀物，在印刷技術的刺激下發展起來；這些書以方言編寫，呼應龐大的市場需求。學理摘要、療術藥方、侵兆卜詞、占星圖譜等，占去此類書刊的絕大部分。相對來說，以拉丁文寫成的科學書，仍不能免於讀者稀少、銷量不彰的顧慮，有時亦令印刷商躊躇不前。這就使得科學類的著述裡，比其他類別有著更多遲未付印、僅以抄本流通的作品。許多新撰論文，重要性不俗，卻不會出版，或在筆者作古之後才印出；一五〇一年，瓦刺的《常識總論暨補遺》，即是一例。斯托埃佛勒以近八十的高齡卒於一五三一年，生前印製過不少占星譜，但他自己編著的《星象全解》，卻要等到一五三七年，才在馬爾堡首度問世。類似的例子頗多，此不贅述。

與十五世紀相同的是，涉及占星術實務的書籍，在十六世紀裡特別受歡迎。巴黎有許多律師與商人，基於對占星術的興趣，而收藏占星命盤。一五二四年二月，五行行星在鄰近雙魚座的天空彼此趨近，幾乎匯合成一點，被占星術士預告成恐怖大災難的前兆，更引發超過五十六位作家為此撰寫專論，其中包括斯托埃佛勒、尼福與殉道者彼得。這個事件蒙受的高度關注，並不值得驚訝：占星術在當時本來就被視為完全理性的學科。倒是哥白尼在幾經躊躇後，將研究成果發表

於《天體運行論》第六卷，並於一五四三年交付紐倫堡的佩特雷伍出版，反而證明當時的大眾對此類嚴謹的學術書籍興趣缺缺。此書拖到一五六六才再版，足足等了二十三載。

最得力於早期印刷術的學術領域，或許可以用「敘述性科學」一詞名之，內容以當時的自然科學與解剖學為主；而印刷術在此間的功勞，首推打印插圖的相關技術³⁴⁷。

就在哥白尼《天體運行論》成書的同年（一五四三年），維薩里也委託巴塞爾的出版商歐波林替他發行《人體結構七卷》；書中細膩的木刻插圖，出自堤香門生馮卡爾卡的手筆。這些圖樣係由維薩里親繪，且早在一五三八年，岡特魯斯版本的《解剖學理》於威尼斯推出時，已然派上用場。維薩里的作品，經常為人所再版、複印、仿製；透過其中的雕版插圖，人體的解剖結構，方能廣為人知。約莫在同時，植物學家憑藉遠古的草木誌，試著辨識各種當地植物的物種卻飽嘗困頓，這才發現古書作者並不認識這些植物，從而改採直接觀察法。過不了多久，動物學家也起而效尤。這段期間問世的著作不在少數。一五三〇年，布隆費斯鉅作《擬真草本圖鑑》的第一卷，於史特拉斯堡問世，並為爾後所有的植物圖鑑，樹立實質典範。福克斯的《植物記》繼之出版於一五四二年的巴塞爾。格斯諾則把自己曾經讀過（書籍類型不拘）的所有動物加以描述，彙集成對開的四鉅冊，於一五五一年的蘇黎世出版；真實存在的魚蟲鳥獸，與虛構的動物並列其中。過沒多久，隆德萊完成一本描述魚類的專書。一如其他嚴謹的科學作品，這部搭配出色木雕插圖的書籍先以拉丁文於一五五一年發行，而後又於一五五八年出版法文本。約莫在同時，勒芒的貝隆所著《魚》、《鳥》兩誌亦出版。早期礦學家埃格里科拉，先是在一五四六年的巴塞爾推

出《礦層形因考》，一五五五年又在當地以對開本發行其代表作《金屬論》。前述所有書籍，皆附有另版印製的整頁插圖，俾利按圖索驥；負責雕版的木刻師傅，則在自然學家的指導下，生產出數以千計的圖版。現今仍由普朗坦摩雷特斯博物館典藏者，約有三千多塊。這些佐以華麗圖雕、印製成本高昂的書籍，亦讓許多略通學理的既有業餘人士趨之若鶩，其中大多數人可能是對特定幾冊書較感興趣，並非純粹研究科學。

印刷在某些領域，確實幫了學者的忙，但若據此認定，加速促成時人接受新知、新觀念的，就是印刷術，整體而言仍然不宜。事實上，印刷術還一度推廣著既定的舊信仰，強化了傳統的偏見，並令似是而非的理論更難動搖；許多新觀點難獲認同，甚至可說是印刷術從中作梗。學界即便有了新發現，也常常被冷落，傳統的思想權威，則持續受人信賴。地理上的大發現，與此後歐洲諸帝國在海外的侵略，固然深遠地影響了歐洲人的日常生活，但只要研究十六世紀一般人的態度就會發現，民眾對這股影響力的重要性與成因，要到很晚才有體認；這點或許是新發現難敵舊認知的最有力證據³⁴⁸。

葡萄牙航海探險之所得，有很長一段時間祕而不宣。參與者跟資助者的小圈子，外人不得其門而入，是以地理新發現的知識，外界完全無從獲悉。事實上，一直要到哥倫布（即發現新大陸的那一位）以一封名聞遐邇的書信，敘述二己首航的見聞，這才喚起公眾對海上探險的興趣。由於這封信曾在一四九三年，同時於巴塞隆納、羅馬、巴塞爾、巴黎等地付印並公開，稍後並於一四九四、一四九七年，分別於巴塞爾與史特拉斯堡重印（後者為德文翻譯），此趟航行所引發的

重視極爲廣泛，無庸置疑。然而，新發現的熱潮真正揭開序幕，卻是十六世紀初的事。由殉道者彼得執筆的《手札》，記載了哥倫布前三次的航行，一五〇四年出版於威尼斯。此後在一五〇五到一五一四年間，又有一系列的文獻公諸於世，首度將葡萄牙人在東印度群島的活動紀實印製成冊，其出版地點以羅馬爲主，但在紐倫堡、科隆與其他地方亦曾發行。這裡面包含許多寫給教宗、署名葡萄牙國王的書信，多數以拉丁文印行，偶有印成德文者。大約同時還有另一本小書流通於世，內容關乎新大陸；該書題爲《新世界》，係根據十五世紀末韋斯普奇寫給羅倫佐·德麥迪奇的一封信所撰。這本書大爲成功，在一五〇四年之後更以多種語文印行，分別出版於羅馬、巴黎、維也納、奧格斯堡；繼之而起的其他同類型作品，也很快地出現。光是一五〇一到一五二五年間，《新世界》便在法國印出六種法文與一種拉丁文版。而在一五二二到一五三三年間，又有三封柯提茲的書信，分別在西班牙、義大利、法國、德國印成十四種書籍。至此，西班牙、葡萄牙境內，興起了全新的文類，記載著新大陸的種種，與其遭到征服的故事；這不僅是海外征伐引發大眾興趣所致，也是諸位國王支持相關書籍出版的激勵結果。前文提過的殉道者彼得，於一五一一年在西班牙首度出版他的《旬年錄》，並很快引來其他仿效之作；至一五一九年，德恩西索推出一部《地理略記》。奧維耶多伊巴德則從一五二六年起，出版與西印度群島相關的一系列史地書。

凡此種種皆顯示，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地理發現與帝國征伐事業，並非不爲人知。只是，在伊比利半島之外，除卻一批人數甚少的學者、商人與廷臣，此類書籍並未引起世人太大的興趣，直到大約一五五〇年之後才改觀，這點似應特別澄清。尤有甚者，探險遠航的新經驗，並未完全得

到接納，許多至為重要的相關著述，僅以手抄本流通，沒人願意承印。同時期的法國，尚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曼德威爾爵士浮誇空撰的《遊記》於一五三〇年又以法文翻印了三次，反倒是殉道者彼得的諸多著作中，一五五〇年之前僅一部《群島初訪摘記》印製成書（一五三三年）。就連一五三九到一五五八年間，七度以法文翻印的波埃謬斯地理書，也對美洲隻字不提，關於亞非兩洲的新發現亦少著墨。

一五五〇年以後，這種情況方有改變，歐洲人地理認知裡的新地平線，也才更趨清晰。西班牙方面，擔任柯提茲祕書的德戈馬拉，有《西印度史暨墨西哥收伏記》一書出版；道明會名人拉斯卡薩斯神父替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說項的一系列書信，也公諸於世。在葡萄牙，這些新發展更是醒目，一連串傑出的編年體史地著作就此問世。其中，德巴羅的《旬年錄》，從一五五二年開始出現；《葡屬印度之發現與征服大事記》，則是一五五一年起問世的系列作品；阿爾布克爾克（曾任印度總督）的《評釋集》，於一五五七年出版，負責編輯的正是他的兒子。俟卡蒙斯（曾旅居澳門的葡文詩大家）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付梓，更是長期風行而不墜，早期殖民文學的出版運動，從而達到巔峰。至此，論及晚近地理發現與探索的書刊，如雨後春筍紛紛露臉，尤其是關乎西班牙、葡萄牙海外征伐之作。部分的傳教士團隊，開始將自身活動的紀錄定期回報歐洲。大環境如此，明斯特的《穹蒼寰宇志》遂於一五四四年的巴塞爾問世，概括地記載了當時歐洲所知的世界全貌。這部書引發巨大回響，甚至在初版之後的一百年內，以六種不同語文出版四十六次。另一方面，一五五〇年之前的法國，僅八十三種地理專書出版，但在一五五一到一五六〇年間即出版了四十八種，一五六一到一五七〇年間又出版了七十種，一五七一到一五八

○年間更出版八十二種，一五八一到一五九○年間也出版了七十六種，一五九一到一六○○年間則出版五十四種（疑因宗教戰爭削減發行量），一六○一到一六○九年間甚至出版至一百一十二種之多。這些書籍占法文圖書出版總數的相對比例，若與其他語文的地理出版品相較，大概相去不遠。除了銷量驚人的殉道者彼得作品，卡斯當涅朵編年史書的西班牙文、拉丁文、法文譯本，亦爲人所爭讀，至於德戈馬拉與阿爾布克爾克的見聞錄，需求同樣龐大。若從最受歡迎的新書當中隨機舉出數例，則有耶穌會士馬菲依的《印度史卷十六》、皮嘉費塔關於剛果的著作，以及德埃斯卡蘭特與德曼多薩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他不勝枚舉的作品中，《非洲總述》尤不宜等閒視之；其作者係來自格拉納達的阿拉伯裔，曾經遊歷整個非洲，後遭信奉基督教的水手所擒，交予教宗聖良十世發落。教宗於是鼓勵他整理遊記供人出版。

在那之後，又發行了許多關於新世界的書籍，其種類之龐雜，直令我們眼花撩亂。大眾對此類作品的興趣與日俱增，也催生了以此爲題的大型圖書總輯，當時多數的印刷重鎮，都曾印製此類套書。其中，十六世紀由賴麥錫編纂並出版於義大利者頗享盛名，由哈克路特與珀卻斯在英格蘭彙編的總輯則更是家喻戶曉。於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買賣出版品的德布里家族，旋即推出各種規模龐然的大小遊記選集，佐以華美精巧的蝕刻板插圖。這一整個系列的叢書，花了他們四十四年才出版完畢，其中不少單行本經常以拉丁文或德文翻印。即便如此，德布里最後還是打消了發行法文版總輯的念頭，可能是因爲有意訂購的讀者太少，不敷成本。

綜上所述，新世界的存在，要到一五六○年之後，才在特定的一小撮人以外，真正爲一般人所知悉，並成爲引人入勝的課題。至於此課題化爲普遍的興趣，則又要等到十六世紀步入尾聲的

那幾年。可見在十六世紀，新知新訊若是與既存世界觀相扞格，就得耗費相當的歲月，方能得到大眾的接受與理解。甚至到了十六世紀末，舊有的世界觀在本質上究竟有了多大程度的改變，也實在說不準。在法文地理讀物的範疇裡，艾金森的作品，尤其清楚地證明了舊觀點的根深柢固。就這點來看，馬可波羅的《遊記》，處境就非常有趣了；它雖是十六世紀法國人最常讀的作品之一，獲得的重視卻不比上個世紀高出多少，百載光陰裡，僅於一五五六年的巴黎，以法文出版過一次。卡蒂埃與山普倫的見聞錄，同樣無法在作者尚且在世時廣受歡迎。十六世紀裡，最常被翻印的法文地理作品，乃是耶穌會佛洛也斯神父在日本時所撰寫的書信集（付印十九次）、在今人眼中不算重要的維拉蒙《土耳其敘利亞埃及遊記》（付印十三次），以及勒胡瓦、波斯帖、貝隆、德威特等人的著作；這些作品的發想固然原創，文內的二手地理知識卻露了餡兒，有時還出現態度欠嚴謹、資訊數量不足之弊（勒胡瓦或許是個例外）。前文提過的波埃謬斯，在一五五八年之前仍持續出版；至於奧特利烏斯之作，也常是翻印對象，唯其聲望主要來自華麗的雕版地圖。更重要的是，前述書籍流行的程度，就連那些偉大西班牙探險作品的譯本，竟也自嘆弗如；著作較受法國人歡迎的幾位，不外乎德戈馬拉（共計印出六種不同的法文版）、德曼多薩（五種）、卡斯當涅朵（五種）等人。這倒不能說是法國與西班牙在政治上交惡，所導致的普遍敵意使然，畢竟拉斯卡薩斯神父批判西班牙軍隊在新大陸暴行的作品，也只發行了三個版本的法文譯本。

我輩若進一步探究，論及哪些國家的書籍最受歡迎，所得的事實也頗有趣：絕大多數的法文地理書與遊記，皆以今日所謂的近東地區為題。在當時，關於土耳其人的著作，比談述美洲的書籍多出一倍，似乎在法國民眾的想像裡，前者較具魅力。關乎西印度群島與葡萄牙殖民地的作品

次之，數量也不少；亞洲國度的相關書籍則又次之，數量相去並不遠，除了提及中國、韃靼，當然更少不了耶路撒冷（東遊聖城的記敘文字，尤其常見）。以美洲爲旨的書籍，數量僅排名第四，最後才是乏人問津的非洲與南半球風物誌。十六世紀的法國讀者，對於鄰近疆域的關切程度，似乎大幅超過遙國遠邦，且對以往已然耳熟能詳的地區較爲好奇，新進展開交流者反被冷落。他們注目的焦點在東方而非西方，縱令其地理視野在文藝復興期間開展，腦海中的世界全貌仍不免失真。

略具素養的十六世紀讀者，對法律的興趣似乎超過地理、自然科學，甚或是醫藥（此指具有科學根據的醫學，而非詳述民俗偏方的暢銷讀物）。成文法規的合訂本，大量地出售，威尼斯與里昂更有一些專門零售、經銷法律書籍的大書商。跟十五世紀比起來，十六世紀印製的法律書籍更多。前文曾經提過，這是一個法界人士（包括從業人員與學者）構成多數書籍消費人口的時代，故此一事實並不足爲奇。在當時的法文藏書當中，所有迄今尚且可考的，便有超過四分之三，涵蓋了大量的法律類文本；亦有許多法律書的收藏者，從事的是看似不會關心法律的職業，諸如金匠、磨坊老闆、藥材商等。顯然地，那些從事法律與法庭相關行業的人，更是清一色坐擁爲數甚多的法律書籍；在一五一八年的巴黎有位名喚韋西諾的律師，擁有五十五本書，其中法律書籍即占四十二本，且一五三一年的首席書記官里才，情形亦類似，在其五百一十三本藏書中有三百一十八本法律書籍。如此的高比例，絕非偶然或特例。

《民法全書》與《教會法全書》，是當時最常被人翻印的法律書籍；在各種書庫裡，亦最常

見到此類館藏。但時至今日，這些書籍頗多已經亡佚，難以估算其出版的次數。而《法學總論》、《法學彙編》、《敕令典》、《新律》，以及《格拉蒂安教規集》、教宗國瑞九世《敕令集》等法規全集的片段條文，則同樣印製成多個版本，唯數量不詳。此類書籍的陣容裡，或許還包括不少標準的參考典籍與摘要，像是《盛年法典》、《司法之鏡》等，其中又以《民法暨教會法選粹》最為重要。這些涉及羅馬法與教會法的專論，乃是任何法學書庫必備的基礎書籍，但普通法與近代法的相關著作也漸趨普遍，並再三翻印，法國的情況尤其如此。此類書籍並經常出現在各種私人藏書當中。話雖如此，隨著王室立法之制勃興於法國，愈來愈多的成文法選集在宮廷出版。爲了讓王室成文法的內容能在頒布之後儘速公告周知，法國國王很快地任命了專門的印刷商，令他們印刷、傳布這些法規。君王法院與下級法院見狀，旋即遵循宮廷先例，有樣學樣起來。這麼一來，當時數量日增的官方傳單與招貼，在印刷的目的上，便與今天的政府公報極爲相近了。

在法學、法典之外，還有一類書籍，更令那個年代的大多數讀者所喜：歷史故事。許多史書出版之後便席捲市場，以方言成書者尤其成功。古典作家與歷史學家的著述，究竟如何地受歡迎，又如何頻繁地譯成各國文字，前文已經提及。就十六世紀來說，希羅多德、修斯提底斯、塔西圖斯、蘇埃托尼烏斯，以及馬克希穆，作品出版皆算頻繁，也是許多私人收藏裡的常客。比這些更普遍的史書，則有李維的作品，凱薩的《高盧戰記》，約瑟夫斯的《上古猶太史》，優西比烏斯的《教會史》，以及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等。這些作品的大部分，經常被翻譯，有

時還發行插圖版本。在同個時期裡，也有許許多多的人文主義者，動手寫史書³⁴⁹；他們意在師法古典鉅著，尤其是李維的作品，故許多人以拉丁文寫作。這就使得義大利再度獨領全歐風騷。先有布魯尼在十五世紀裡記敘自身時代之事，而在波焦替佛羅倫斯人作史之後，又有本博撰寫威尼人史。此外，席爾維斯（即教宗庇護二世）以《當代奇聞要事史》為題，撰寫回憶錄。義大利史家的做法，從十五世紀末開始，成為全歐各地仿效的對象，至十六世紀風潮更盛：在西班牙有殉道者彼得，在法國則有查理八世欽命義大利裔的史料編纂官埃米黎。埃米黎於十五世紀末撰寫《法蘭克史論》，在他之後又有法裔的嘉圭因，繼之以《法蘭克史要》。爾後，此類著述便相繼在各地誕生。回溯史書撰寫的發展沿革，當然不是本書宗旨；此處只是想強調一項普遍且重要的事實，即前述史書不僅極度風行，也常常被譯成各國的方言。以嘉圭因的《法蘭克史要》為例，除了拉丁原文在一四九四到一五八六年間十九度翻印，法文譯本也在一五一四到一五三八年間翻印過七次。而後，圭恰爾迪尼的《義大利史》於一五六一年初版，此後更印出難以計數的眾多義大利文譯本，法文譯本也不少；該書亦以西班牙文、英文，甚至法蘭德斯文版本流通於世。

鍾情歷史的讀者，包括的不只是神職人員、人文主義學者與學生，也涵蓋律師與朝臣、軍人與商賈，甚至單純的工匠。古代史家的大作也好，人文主義者的史學仿作也罷，都是顧念這些讀者，方才譯成現代的方言。但這些人愛讀的史著，實際上卻比較偏向編年史（依中世紀的習慣而編著者）、年鑑總輯、政治人物回憶錄等體裁。德博韋的遠古史書《史事寶鑑》，與羅勒文克的《簡編史》，仍獲不少讀者青睞。《史潮》曾在十六世紀裡數度再版、改寫，而謝德爾的《紐倫堡編年史》更與其他同類作品一樣大大地暢銷；這些作品有時並印製成卷軸狀，採單面印刷，各張

書頁首尾相黏成一長串。民族史、年鑑、編年史，甚至只是記載單一地區史事的著作，盡皆引領書壇風騷：在西班牙，德瓦勒拉的《西班牙紀年史》，以及西古羅的《西班牙記略》，便是其中兩例。後者印出六種版本，而一五三〇到一五三九年間問世的版本即占五種，包括三種卡斯提爾語（以正統自居的舊有西班牙語）和兩種拉丁文本。法國的讀者則重拾中世紀的史書與年鑑，其中特別風行的，當推圖爾的格列高瑞（六世紀時曾任圖爾主教）所著的《法國教會史》，與吉依的《法蘭西年鑑》；兩書在這百年間皆翻印達十餘次之多。此一時期印製成書的地方史料也頗多，當中諸如布歇特的《亞奎丹年鑑》和德阿榎特雷的《布列塔尼年鑑》，直至十七世紀，市場需求依舊穩定。另有柯洛塞於一五三一年出版的《巴黎遺事》，在十六世紀往後的幾十年間頻頻修訂再版。不過，比起德科米尼的《回憶錄》，與後來馬當·杜貝萊的同類作品，也許前述史書的暢銷程度都還差上一截。之後沒有多久，由帕基耶編寫的《法蘭西遺事考》出版，旋即再版無數次。在此之前的十六世紀讀者，則以德貝爾勒撰寫的《高盧群像與特洛伊秉性》自娛。德貝爾勒是莫利尼的親戚，而他這部有趣的著作，聲稱證實了特洛伊人乃是高盧人與日耳曼人的共同先祖，多次付印不在話下，書中插圖還變成簾帷繡圖常用的範本。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當時的民眾雖為「歷史」深深著迷，對凝聚國族意識的史料更是日益認同，但大致上仍無力辨別傳說與史實，也有可能懶得釐清兩者間有何不同。

這一股為數龐大的群眾，對史書懷抱著不可遏抑的偏好；帶著傳奇色彩的歷史故事，像是特洛伊的掌故，常比客觀的史事陳述更能博得他們的歡心。對於幻想、杜撰的文學作品，他們亦有

同等程度的迷戀。十六世紀的印刷事業，自始至終持續印製出版本繁多的中世紀小說，尤其是永遠不退流行的古早騎士冒險故事，便是此種偏好的首要證據。一方面，十五世紀已經付梓的故事，三不五時地翻印，在另一方面也有印刷商持續把未曾出版的文本引介給讀者大眾，或從尚未亡佚的中世紀手抄本中隨機取材，依照當時讀者的口味加以改寫再行出版。常被視為民族史詩的《騎士與天鵝》或《波爾多的于翁》，與《納韋爾的熱拉爾》、《佛羅里芒》等諸多遠古騎士傳奇，同在此時發行再三。根據奧特龐的統計，當時所有以散文體裁流通的騎士傳奇與民族史詩裡，有十三首民族史詩係於十六世紀首度出版（十五世紀時僅兩首），而民間流傳的英雄故事也有八篇（十五世紀僅五篇）。至於一五五〇年之前印行的八十餘篇中世紀故事中，無疑以《艾蒙的四個兒子》（一五三六年之前印有十八種版本，十六世紀內共印出大約二十五種版本）、《榮勳記》（版本數目與前者相仿）以及《普羅旺斯的皮耶》（一五三六年之前印出十九種版本）贏得最多的書迷。勒費弗爾的《特洛伊史彙》，是將多個中世紀的特洛伊故事合編成冊，反映出十六世紀及其後，讀者對這個題材的興趣持續增長；至於《奇人奇事維吉爾》，則繼續讓上古詩聖維吉爾以巫師的身分，扮演中世紀故事的男主角。法蘭德斯的包杜旺、波爾多的于翁、丹麥人歐吉以及伯斯佛瑞斯等英雄豪傑的事蹟，乃至於圓桌武士、亞瑟王、仙湖武士蘭斯洛、魔法師梅林、帕齊法爾爵士、特力斯坦等傳奇人物，更是家喻戶曉，歷久而彌新。即便有這麼多的故事，還是無法完全滿足十六世紀民眾的小說癮；是以在十六世紀的頭四十年裡，《玫瑰傳奇》不得不重印多達十四次。薄伽丘的《菲亞美達》之所以讀者滿天下，部分原因即是它滿足群眾在這個面向的需求。源自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小說，像是阿普留斯的《金驢記》與赫利奧多魯的《衣索比亞

人》，需求又特別龐大，並不時推出翻譯、翻印本。

在此同時，也有幾種文學型態，或多或少與前述的虛構小說、鄉野故事，有著密切的相關，並在全歐各地發展起來。新的文學之所以能博得大眾好感，大抵是這種相關性的功勞；摩爾的《烏托邦》與拉伯雷的作品廣獲爭讀，無疑也是拜此關聯之賜。然而在十六世紀裡，杜撰作品最爲發達的兩個國家，並不是摩爾或拉伯雷的祖國；倒是西班牙與義大利，擁有無庸置疑的優越地位。在西班牙，騎士冒險故事的魅力與影響力甚是深刻。十六世紀初期，更有《高盧的阿瑪迪》在此出版，其起源雖難以考證，卻絕對是那個年代銷售成績最傲人的一本書。也就是在同個世紀裡，這部作品（包括其續集）印製成超過六十種西班牙文的版本，許許多多的法文、義大利文譯本，以及英文、德文、荷蘭文譯本各一種。正因為它太過暢銷，短短一百年的光景，《阿瑪迪》竟發展成一整套的系列故事，包含前傳、外傳、續作等。阿瑪迪之子埃斯普蘭丹的英勇行徑，以及英格蘭的阿瑪迪、奧利瓦的帕梅林、英格蘭的帕梅林等豪俠人物的功績，接連地創作、印行，無非是爲了沾點光，藉《高盧的阿瑪迪》的盛名獲利。

綜觀書市，新版的《高盧的阿瑪迪》固然持續出版，同時還是有不少風格迥異的新小說，大量印製成書。同樣在西班牙境內，「感傷小說」便非常受到歡迎，諸如德聖佩羅的《愛的牢籠》（部分內容改編自前文已列爲暢銷著作的薄伽丘《菲亞美達》）、《阿納爾特與盧森姐的愛情合約》（一五二二至一五二七年間印出三種西班牙文版，十七種法文版則從一五三七年起陸續發行，另有四種英文版），德富羅瑞的《格麗賽與米拉貝拉記》（西班牙文版八種、義大利文九種、法文十種），以及作者不詳的《愛戀情事》（約印出十五種版本）等等。此種文學傳統，催生了蒙特馬

約的《狄安娜》，以及稍晚出現在十七世紀法國的于爾菲作品《阿斯特萊》，最終則演變為田園小說、感傷小說一派。這麼看來，如此文類乃是以薄伽丘的《菲亞美達》為源頭，逐步發展起來的。在另一方面，義大利風行的卻是另一種小說，尤其是受到亞瑟王系列與加洛林王朝等源自中世紀法國的傳說所影響，而創作的一連串騎士史詩。這些作品受到歡迎，無疑也應歸功於其中虛構的主人翁。在十五世紀浦爾契的《摩爾干提》與博亞爾多的《熱戀的羅蘭》之後，又有出自阿里奧斯托手筆的《瘋狂的羅蘭》，贏得廣大的回響。也就在這個時候，傳統的騎士冒險故事，與《聖特雷的小約翰》之類專供勃艮地貴族消磨時間而寫的小說，變成了小販囊中必備的書籍商品，與牧民曆一同兜售。我們不難看出，此間有種迄今仍顯而易見的演進歷程在運作：一部原本訴諸菁英階級讀者的經典，經過後人一代一代地改寫，讀者群也一代一代地擴大。今人欣賞電影、報載漫畫或觀看電視，透過新興媒體認識雨果、斯湯達爾、莫泊桑等文壇祭酒的力作（或是那些聲稱出自大文豪手筆的作品），其理亦同。

三、印刷書與宗教改革

當然，傳統的道德與宗教書籍，在這段期間內仍持續出版，與之齊頭並進的，包括了書籍消費群眾的增長、希臘羅馬經典著述的印行（原文與譯本皆然），與新文學類型的崛起。《師主篇》（坎普滕的托瑪斯所作）、《黃金傳奇》，乃至於聖人聖女的傳記，在十六世紀初期依舊大行其道，與《救贖之鏡》、卡圖的德訓故事、各種假救主生平的記載，同樣熱門。此外尚有蘇索、熱

爾松、尼德爾等作家，十五世紀即非常流行的神祕主義作品，以及標準版的布道詞選集（有時還會增錄一些較新的講道內容），也一樣擁有廣大讀者。同理，教父諸賢作品，尤其是聖奧古斯丁與聖伯納所言所書，銷量之大未曾稍減。奧坎、德拉帕盧、杜朗、司各托、比里當等神學大家的鉅著，暢銷程度則一如往年；另有麥爾、塔特瑞、布里寇等較為晚近的思想家齊享盛名，在巴黎地區大量印刷成冊，直到大約一五二〇年為止。同期（十六世紀初）嶄露頭角的全新神學著述，則是伊拉斯謨斯、戴塔普勒與其同儕的傑作，以《聖經》文本研究為基礎。換句話說，宗教書在十六世紀肇始之際，印刷數量仍維持在高檔，可能還超過十五世紀。然一如前述，這類書籍占印刷書總額的百分比，卻隨著印刷鋪產量的賡續攀升，愈發遜於以往³⁵⁰。總的來看，此類圖書似與絕大多數的非宗教書刊不同，即未能在讀者數量上比十五世紀更上層樓。誠然，戴塔普勒的作品，像是他所翻譯的聖保祿宗徒（使徒聖保羅）書信，乃至於聲名更著的伊拉斯謨斯部分著述，書市需求似乎相當龐大，各種翻印版本的數量之多，更證明學術書籍在當時亦能維繫相當的發行量。但大體言之，一五二〇年之前的宗教書，流通範圍還是囿於擔任神職的知識份子與人文主義學者的小圈子內，鮮有例外者。

在一五一七年的德國，前述情況驟變，稍晚並逐步感染至歐洲其他地方。宗教爭議於此刻迅速變成至高無上的重大問題，掀起民眾內心最激昂的情緒。藉印刷媒體之力推展的理念宣傳運動，亦發展於此時期，成為空前創舉。世人見識了印刷業的厲害之處：即協助有意引領思潮、塑造輿論之人，實現其目標。

將宗教改革的肇始與發展，過度歸功於印刷書或傳道人，則失之偏頗；對此我們當然得戒慎小心。把新教的宣傳與新教推廣者，視為這種變革歷程的主要起因，同樣有誤。本書的宗旨，也不是爲了讓「印刷爲宗教改革之母」的荒謬命題借屍還魂。若說單憑一部書不足以改變任何人的既定立場，則宗教改革的例子或許正能佐證此說法。雖然印刷書未必是成功的說帖，至少書內文字體現、象徵的信念，爲抽象的信念留下了具體的證據。尤有甚者，書本更將論證過程提供給那些已經改信新教的讀者，促其信仰成長茁壯，列出各種論點、助他們在辯論中勝出，並勸進那些躊躇之人。綜觀以上總總理由，印刷書確實在十六世紀新教陣營的發展裡，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在那之前，教會固然發現過許多異端的存在，卻總是立於不敗之地；至少在西歐是如此。史界先輩豪瑟爾曾納悶，若令那些較早期的異端（例如胡斯教派）也得以任意支使印刷機的力量，像路德或喀爾文那樣純熟地利用印刷品，先攻訐羅馬教廷，而後傳播新教義，則可能會導致何種後果；這樣的疑惑並不違背常理。路德、喀爾文等宣傳家的中心任務，即試圖以系統化的做法，將改革教理、中興信仰的基礎，即《基督聖訓》（《聖經》的別稱），以方言重新印行，讓尋常百姓都能讀到。豪瑟爾強調，宗教改革者「在一己著作的卷首插畫裡，用萃取葡萄原汁、製作上等佳釀的榨酒池，比喻他們爲新教信徒擺設心靈飲宴時憑藉的印刷機」，自有其充分理由³⁵¹。

印刷術確實在宗教改革之前許久，即爲自身傳播信仰的新角色，預做了準備；先是反覆印製出數量可觀的宗教版畫（這可以追溯至木雕版複製術的時代），而後印出數量同樣龐大的基本信仰讀物（尤其是時辰禱書），最後又被用來大量印刷《聖經》（以方言版本居多）。事實上，早在路德譯經之前，市面上已經出現過十九種的高地德語《聖經》；而在戴塔普勒的版本之前，譯成

古代法語的插圖版《舊約》(或《舊約》節譯本)亦達二十四種。印刷設備不僅便利、激發了新的《聖經》研讀風潮，也替一般大眾印出數以千計的傳單、海報與全張招貼。史上第一種傳播資訊的刊物，即現代報紙的鼻祖，便發展於此時。此類刊物存續至今的非常少，是以今人很難想像其樣貌，然稱其具備相當重要性，並不為過。畢竟海報與公告可能比印刷書更早出現，且其中提供時事訊息者頗多。在此同時，宣告各種大事的報導，例如記載彗星凌空、敘述佳節慶典、描寫國王進城儀式、直陳戰役勝敗者，在十五世紀愈後期愈是常見，印刷量動輒上千。在法國，此類傳單把法王在義大利的勳業，與法軍在戰場上的捷報，告知民眾；在德國，神聖羅馬帝國帝位的遴選更迭，亦藉此流傳開來，並為宗教改革期間無數「飛字本」(德文教改小冊)的印刷預先鋪路³⁵²。

群眾對於宗教改革者的活動、改革者所涉入的爭端、「異端邪說」的進展與其所受到的壓制手段，常是透過這些短期流通的小冊與傳單，才得以獲悉。這就使人不得不做如是想：如欲估量印刷機造成的影響，則應顧及印刷海報在宗教改革進程裡的角色。改革運動期間，每一樁大事發生之前，都會有人印製海報昭告大眾，事件本身的普遍重要性也從中得到彰顯。象徵路德對贖罪券制度展開抨擊的里程碑，與其說是在講道中的批判之詞，不如說是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那天，他將宣傳海報貼在威登堡奧古斯丁教堂大門上的舉動。他的幾篇論文，在擇要譯成德文之後，亦是印在單頁傳單之上，才流通於全德；不出十五天，該國每個角落都看得到。數載後的一五二一年，皇帝查理五世令路德出席沃爾姆斯的帝國議會；他跟隨皇帝的傳令官橫越帝國疆土，所到之處只見每個鎮上都張貼諭旨，命百姓焚毀路德著作，不禁為之氣結。或有人猜想，尋常百

姓即是透過這樣的海報，得知禁書或所謂邪書的存在，甚至常常據此判斷哪些書得儘快弄到手。除此之外，就連針對這一類對邪書的指摘所引發的回應，也經常張貼在城鎮的牆面上。一五二四到一五二五年間，爆發於莫歐的筆戰，即是正反雙方藉海報交鋒的例子，事件起於教會高層以公告指控當地主教布里松內為路德派異端；一五二四年十二月，布里松內轉守為攻，在城門與大教堂牆上大舉張貼教宗格勒孟七世赦免自己的證據，但當時教宗詔書已然遭人撕毀，並被更多反稱教宗才是假救主的布告取而代之。過不多時，在一五二八年的一月十三日，竟有人張貼一紙假造的格勒孟七世詔書，「允許並要求信徒反覆閱讀、廣為傳布路德著述」，對教廷的蔑視儼然達到最高峰。最後，這場小規模的筆戰演變成一五三四年的「布告教案」；其中大膽宣告彌撒儀式無效的知名布告，係由皮耶·德文格勒在納沙泰爾所印，還被人貼在國王行館的房門上。如此挑釁所引發的鎮壓，以及法王法蘭西斯一世隨後對印刷業採行的政策，則變成廣為人知的歷史事件。

像這樣的告示，不過是當時民眾內心掙扎日益激烈的外在表現、具體徵兆罷了。牆壁上、教堂大門上，乃至於門廊上緣垂吊著的，盡皆屬之。有些是趁著夜晚偷偷張貼上去的，旨在批判彌撒禮或教宗；其他則為教會的正式通知，預告其對付異端的舉措，或下令禁止、沒收某些「淫邪之書」。自然地，滿懷好奇的社會大眾，會把所有的公告都看過，密切注意著論戰的進展與雙方你來我往的辯詰。同時，在街頭文宣交鋒的背後，則有大量的相關書籍，被人扣上「不見容於當道」、「異端邪說」、「搬弄是非」的帽子。以下探討的，就是這些書籍在此一時期的印製與流通。

路德責難贖罪券的主張，變成當時最搶手的印刷書，連作者本人都感詫異。他也因而發覺，德國確實等著把祕而不宣的滿腹怨氣公然表露，唯獨欠缺一個暗號、一位領袖。最後，印刷機的產物成了暗號。首先是馮胡騰，因為厭倦了一己言論僅能在狹隘的神學家圈子流通，遂將自己的拉丁文對話錄《怯熱一集》與《怯熱二集》於一五一九至一五二〇年間譯成德語³⁵³；路德則爲了儘量讓更多人讀懂，於一五二〇年選擇用德語撰寫《告日耳曼民族貴冑基督徒書》，唯其回應正統派神學家的文章仍以拉丁文寫作。至於路德的講道詞、德訓短文，以及說理鏗鏘的異議言論，從威登堡的印刷鋪裡源源不絕地產出，印量動輒上千，都是方言的版本。德國各地都有人第一時間翻印這些書，雖然只是輕薄易攜的短文集，印刷卻毫不馬虎，標題採用明晰的粗體，邊框圖樣精美且富日耳曼風格。印刷地點或出版日期並未標注，但書冊正面一概打印著人盡皆知的馬丁·路德名諱，也常常搭配其肖像，讀者就這樣熟悉了他的長相³⁵⁴。

這股熱潮延燒到整個德國。每個陣營都推出了措詞強烈、振聾發聵的宣傳小冊。發行於一五二〇至一五三〇年間，並流傳迄今的「飛字本」（德文以此形容其印製飛快，著實傳神），超過六百三十種。投入這項事業的可不只是印刷匠，還包括插圖書師甚至諷刺圖文的創作者；題爲《敕教宗與牛修士》的小冊，挖苦的對象正是教宗與眾多修士。身兼安貧修士與《路德派狂人》作者的莫納爾，因爲名字寫起來與德文的公貓近似，便以貓頭人身的修士形象出現在諷刺畫裡。此時德文書籍占出版總數的比例激增：在馬德堡、羅斯托克、漢堡、威登堡與科隆，計有七十種低地德語書刊在一五〇一到一五一〇年間出版，一五一一到一五二〇年間也只有九十八種，但在一五二一到一五三〇年間卻增爲兩百八十四種（其中兩百三十二種論及宗教或教會事務），一五三一

到一五四〇年間也有兩百四十四種（包括一百八十種宗教作品）。想當然耳，路德的著作於此間尤其突出；根據估計，書商在一五一八到一五二五年間售出的所有德文書冊，超過三分之一是路德作品³⁵⁵。它們當中有些特別暢銷，像是一五一八到一五二〇年間翻印就超過二十次的布道詞《論贖罪與寬宥》，另外於一五一九年首印，同為布道詞的《基督蒙難聖化論》則有二十種可考的印刷本。在雷納魯斯寫於一五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中提到，路德的《神學論》與《上主禱詞解》兩書「被查扣的比賣出去的還多」。在另一方面，享有盛名的《告日耳曼民族貴胄基督徒書》在一五二〇年八月十八日問世，到二十五日即因售罄而增刷；此書在三周內配銷四千冊，兩年內出現過十三種印刷本。短文《論自由》則在一五二六年之前出現過大約十八種迄今可考的翻印版。除此之外，他在一五二二年裡最出名的三部著作足以佐證，任何一篇出自路德手筆的文章，讀者無不爭相拜讀，程度幾近狂熱：《論人世知識之不宜》十三度付印，《婚姻小書》印了十一次，而《小禱簿》更在一五四五年之前印了二十五次。

而後，德國境內的印刷鋪，忙碌的大半都是宗教改革著述的發行。一如同時期多數的中產階級，印刷商通常對老教會沒有特別好感，其中還有不少人因為不時接觸人文主義者與學界、藝文界，頗能趕上新思維的腳步。多數情況下，他們拒絕為天主教會印製宣傳小冊，卻煞費功夫地細心印刷路德、馮胡騰、梅蘭希頓之作；就算這未必出自他們對新教理念的堅信，至少證明改革書籍比較有利可圖。在這個時期裡，每件事情都能扯上路德，反動派就算攻擊他，也不會占得便宜。莫納爾的《路德派狂人》銷量淒慘，至於先前風靡至極的作品，尤其是伊拉斯謨的書，願買的讀者亦日漸稀少。相反地，發行路德著作的印刷商頗有賺頭，其中尤以羅特赫與魯伏特最為

成功，甚至搖身變成威登堡最富裕、地位最重要的市民，後者更一度官拜市長。在史特拉斯堡，納布洛克會因慷慨捐款予天主教組織而名噪一時，如今其辦公室竟成爲路德思想的傳播中心。哥茨³⁵⁶研究過的七十位德國印刷商裡，至少有四十五位隸屬路德陣營，其中開業於威登堡者盡皆屬之，開業於史特拉斯堡的則有六人（共八人執業），開業於奧格斯堡的也有九人（當地僅三位天主教印刷商）。即便在那些俗世政府忠於羅馬教廷的城鎮，還是有人印製改革派的作品，且通常可以躲過刑罰；當然，開工之前該防範或該打點的，仍不能免。印刷商塞哲爾，便因梅蘭希頓與他關係密切，而名留青史。他除了在阿格諾印刷梅蘭希頓的作品，也印刷路德的書，以及布根哈根、布倫茲、艾格里科拉、萊吉烏斯編寫的小冊。帝國總理官署對此並沒有坐視，但在一五二四、一五二六兩度的下令干預中，卻顯得理不直氣不壯，收效也不大；這是因爲塞哲爾所出版的，係專供外銷的拉丁文書籍，是以縱有部分作品的序言，以筆鋒遒勁的拉丁詞藻指控羅馬當局是「宛如猶太教堂的假救主淵藪」，執政者也莫可奈何。直到一五三一年，塞哲爾以德語出版一本成年領洗派（主張教會不應對嬰孩施洗的教派）的小書，其印製品才真正遭到查扣，但這樣的打壓，亦未能阻止他在一五三七年印行塞爾維特的《三位一體謬誤論》³⁵⁷。

不過，如此的寬貸，並非各地皆然。舉例來說，一五二七年的紐倫堡，就有一位顧登朗，因印製反對教宗書刊而面臨起訴；當地畢竟是喬治公爵（當時的薩克森選侯）當家，豈能容忍轄內印刷商意圖造反。另有好幾位印刷商出走萊比錫，係因政府只准他們發行天主教讀物，偏偏印這種書又賺不了錢。無怪乎譚納留在萊比錫，卻因債台高築而入獄。倒是斯托克爾在喬治公爵領地以外籌設印刷鋪，打印刷德的短篇論文以彌補虧損，便顯得較有生意頭腦。把書運往管制禁書的

各邦，並在鄉間流通的，則是當時的叫賣小販。話雖如此，接受宗教改革的各邦，在施行沃爾姆斯帝國議會的圖書檢查決議時，反比舊教陣營的地方政府更加嚴格、積極；這是因為議會的本意在對付路德，決議的措詞卻模稜兩可，僅稱禁止誹謗書刊出版，新教徒遂以利己角度詮釋決議，修理那些發行天主教宣傳冊的印刷商。葛林姆便會因出版艾可的《彌撒與獻祭》而獲罪，並於一五二六年的奧格斯堡被捕。而在史特拉斯堡，格呂寧格是唯一對舊教不離不棄的印刷商，持續印製艾可、伊拉斯謨斯與莫納爾的作品而無所懼；一五二二年，地方行政官沒收了他發行的《路德派狂人》。整體言之，德國境內捍衛天主教信仰的書刊，比起各種敵視教廷著作的排山倒海之勢，確實少得可憐。一五二二年之前，另有少數印刷商，同時出版路德派與舊教的文本，像是布雷斯勞的德勇、馬德堡的拿普斯，與美因茲的漢斯·修埃佛。天主教的反擊，則要到一五二六至一五二八年間才發展起來，其根據地包括萊比錫（以薩克森的喬治公爵為後援）、瑞士的弗萊堡、因戈斯塔（此鎮自古即支持教宗。有位來自奧格斯堡的印刷商，名喚威森洪的亞歷山大，在此與艾可、科克拉烏斯以及當地大學的神學家合流，印刷他們的書）、琉森（莫納爾於一五二六年在於此設立印刷鋪，發行己作）等。而在其他地方，未替宗教改革勢力服務的印刷商，一般而言僅止於印行純粹的學術及神學著述；這類書與當時風起雲湧的各種事件，較無直接牽連。

宗教改革思潮的推行，係以宣導小冊與傳單的形式，透過流動書販滲入農村地帶。煽動歐陸農民起義的諸多原因裡，印刷術也得記上一筆，似無疑義。尤有甚者，一些印刷商似乎也打從心裡接受了激進的政治與宗教新主張。替席范·歐特瑪校對書稿的赫策爾，便會親自撰寫若干短論，而他也是奧格斯堡的浸信會眾；開業於史特拉斯堡與羅騰堡的印刷商克爾納，在數度涉入羅

騰堡的宗教事件後受到譴責，支付高額罰鍰之餘，亦被視之為危險的鬧事者；一五二七年的紐倫堡，更有一位成年領洗派的知名印刷商遭處火刑。如此一來，就等於告訴卡爾斯達麾下成年領洗教派，與後來的農民領袖：印刷商已經準備好，站在他們那一邊。其動機則不外乎二，實踐信仰或多賺點印書錢。

在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歷史上，有幾個決定性的轉捩點，農民起義與其面臨的鎮壓，亦屬其一。起義之後，宣導小冊已不似以往那樣氾濫，就連路德自己出版的辯詰文章也逐漸減少；所幸其《聖經》翻譯工作未曾中斷，且成效甚為卓著。他所翻譯的《新約》，最早是由羅特赫動用三架不會稍歇的印刷機，在威登堡印行，其售價雖比一般書貴，但自一五二二年九月上市以來，僅十周時間便銷售一空。從一五二二到一五二四的兩年內，威登堡一共推出十四個翻印版的《新約》，其他在奧格斯堡、巴塞爾、史特拉斯堡、萊比錫出版者更多達六十六種。同樣的譯作，光是亞當·佩特里，即在巴塞爾一地七度付印。科克拉烏斯見狀，也不免感慨：「這個譯本人人讀，乃至滾瓜爛熟。」路德翻譯的《舊約》，於一五二三年首度問世，風靡的程度亦同。從那時起，《聖經》幾乎成爲人手一冊的典籍，而宗教爭議所引燃的熱情更形激昂，連目不識丁的民眾，也拜託讀過書、習過字的友人，幫忙口述、解釋經文。此種風氣，從瑞士新教領袖茨溫利的記敘中可見一斑：農民起義肇始之際，每位莊稼人的住所，都變成傳授新舊約文本的私人學堂。

這些發展，當局無力管束，早先如此，此刻亦然。路德的《舊約》譯經工作，迭有進展；他動輒尋求梅蘭希頓與同儕的建言，至於構成整部經文的各書，則逐冊出版。一五一九到一五三五

年間，《新約》路德譯本共計發行八十七種高地德語版本，和十九種低地德語版。經內各書分別印行的《舊約》，須與即遭紐倫堡的派普斯、蘇黎世的弗洛蕭爾、沃爾姆斯的修埃佛等人盜印。總的來看，則有四百三十種完整或片段的印刷譯本，在一五二二到一五四六年間推出，當中若干版本的印量格外龐大。像是赫苟特於一五二六年推出的盜印本，雖未注明譯者名諱，倒也印出三千冊成品。從這點來看，路德譯經的印刷量之多，已達史無前例的驚人地步，即便進入十六世紀後半，產量鮮見下滑；魯伏特在一五四六到一五八〇年間，發行過三十七個版本的《舊約》譯文，可以為證。這也暗示著，克雷流斯聲稱魯伏特在一五三四到一五七四年間印出《聖經》十萬冊，似非誇大之詞。在同一時期，法蘭克福先後出現二十四種全本《聖經》（節譯本不計）的印刷版。據此推敲，十六世紀前半的《聖經》印刷量，總額可能突破一百萬冊，且接下來的五十年更多。換句話說，即便以今日的標準來衡量，暢銷鉅著之銜，《聖經》仍是當之無愧。不過，《聖經》譯本只是路德作品的一部分，在這之外他還撰寫售價更低、易讀易懂的講道詞、議論文（諸如《告日耳曼民族貴胄基督徒書》）、教理問答，而此類著述的印刷量又更勝一籌。由此可知，史上首度出現真正的大宗讀者群，以及人人皆得以一覽的通俗讀物，原來就在此時³⁵⁸。

幾乎在此同時，法國宗教改革者的諸多目標裡，有一樣跟路德欲藉印刷機實現者相同：把《聖經》印成當地方言，令所有人皆能一讀。戴塔普勒應改革派主教布里松內之邀，於一五二二年來到莫歐，還因此放棄學術研究，就是為了把《聖經》譯成法文，服務庶民讀者。一五二三年，四大福音、使徒（宗徒）書信暨行傳（大事錄），由德柯萊印製成書，接著又有一五二四年

的《詩篇》（天主教《聖詠集》），以及一五二五年的《全年各周書信福音讀本》；後者是一本信仰手冊，旨在將《聖經》內基督教義的基本原則與切身真理，播種於尋常讀者的家中。這種做法，等於用最方便的型態（即八開或十六開的小書），把《聖經》經文傳給法國民眾，時間則與德國方言《聖經》的發行約略同時。一五二四年夏天，布里松內設計出比神父講道更加平易近人的公開讀經會，每天早上進行一小時，由宣教者對信眾裡的尋常百姓朗讀、詮解《聖經》；遇上教育程度稍高的信眾，則講解《詩篇》。初期幾次試辦成功後，讀經會的場次旋即大增，並有四位「讀經師傅」銜命造訪其他較大城鎮。為了徹底啓迪信徒中的識字者，布里松內遣人分發四大福音的印刷法文譯本，鼓勵收受者帶著譯本出席教會儀式。此舉深深感動了他的某位追隨者，促使此君發願在莫歐設立印刷鋪，以具體行動籌措必要的設備。

此種行動得到善果，莫歐與鄰近地帶的百姓，像是織布工、梳刷毛料的工人與其他寒微工匠，無不對福音的道理心悅誠服。這套有效的宣教方法，終將為胡格諾教派的宗教改革人士所奉行。為了閱讀經文、研討經義、齊唱頌歌（後者尤令不識字的信徒心領神會），共聚一堂的眾人，形成了自己的圈子。法國遂以這樣的圈子為起點，與德國同樣地發展出新教會。也因爲當時有宗教議題喚醒民眾的激昂情感，戴塔普勒譯本的傳播便更形迅速，足令咱們現代人詫異。不假時日，新譯經文的流通範圍已經超越莫歐與巴黎，伸向里昂、諾曼地與香檳地區；連地處偏遠的普羅旺斯，以及多菲內、皮埃蒙特等地華爾多教徒的藏書裡，都能見到此類印刷本的蹤跡。同一時間裡，尚有第一部法文版的禱詞選集在巴黎付梓。

法國首度接觸路德的著作，亦在此時。書籍買賣本來就是跨國事業，這些作品會在多短時間內出現在法國書市，不難想像。來自巴黎、里昂的書商和印刷商，既然能在法蘭克福市集期間，與萊比錫、威登堡的同行碰面，藉機把這類造成日耳曼社會大騷動的書刊帶回國內，自是常事。尤有甚者，有些外國書商從很早開始，便特意印製專銷法國的版本，安排新教書籍打進法國書市。富羅本即是一例：在一五一九年二月十四日一封寫給路德的信裡，他自言翻印了若干路德的作品，其中六百冊出口至法國，另有銷往英格蘭、西班牙、義大利、布拉班特（位於今日比利時境內）者。在巴黎，甚至掛著「巴塞爾幣」招牌開業的雷許，利用購自巴塞爾的印刷設備，印出一系列議論宗教的傳單，其中包括一篇路德撰寫的文章，解釋他為何在威登堡把教宗控訴他的詔書燒毀。約從一五二〇年開始，巴黎各學院開始閱讀、探討路德，他的文章旋即流傳至較遠的里昂與莫歐。至於當局對這些異端著述的散播做何反應，讀過法國史的人，必不陌生。在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的教宗詔書之後，巴黎大學復於一五二一年的四月十五日發表譴責聲明。這些動作似乎觸發了真正的印刷宣傳戰，許許多多的小冊與詩歌因而出版。梅蘭希頓回應反動派的《駁巴黎神學界謬論》，先有拉丁文本在巴黎販售，同年七月又有法文本問世。其實早在一五二一年的三月十八日，王室已經根據教宗詔書的指示通令君王法院，傳喚書商與印刷商出席，確保所有未獲巴黎大學出版許可的書籍不得發行，尤其是涉及《聖經》的文本。同年六月十三日，君王法院針對所有未送巴黎大學神學院教授群審查，即逕自印行或販售的《聖經》相關作品發布禁令，這項禁令自然變得聲名狼藉。至一五二二年的三月二十二日，禁令增補，納入初步批准的新原則；在另一方面，列席巴黎議會的幾位桑斯省主教，已經著手彙編禁書目錄。布里松內一派立

刻遭到高層猜忌，莫歐的神職團體宣告解散。戴塔普勒迫於情勢，前往史特拉斯堡暫避風頭；一五二六年，國王召他進宮，以布盧瓦的皇家圖書館員一職任用，雖也交付他擘畫法國兒童教育體系的重責，卻未允准他所譯的《聖經》在國內出版。一五二八年，他的《法文新約》終於在安特衛普露臉，而法文版的聖經全書——《聖書》則於一五三〇年出版，唯當時仍須匿名發行。

至此，巴黎大學神學院與君王法院的政策，已等同公然打壓（有時還與國王的意思相左），查察禁書的行動，則由畢達與里才協同指揮。這時的書商與印刷商，不得不小心翼翼，疑似禁書的作品，沒有人敢太過公開地散布、經銷。倒是在一五三四年的「布告教案」之前，鮮有書商遭逢嚴厲盤查，唯嚴密的監視與頻繁的騷擾在所難免；至少在巴黎的情況是如此。其間固然有人大膽嘗試續印禁書，特別是先後在巴黎、阿朗松設鋪印行大量路德短文的篤布瓦（即為那瓦爾王后瑪格麗特印製詩集者），但形勢已然如此，實在很難把新觀念賴以傳遞的議論書冊悉數印出³⁵⁹。

外國的書商與印刷商見狀，自然試著滿足法國在新教書刊方面的需求，而第一批的法國宗教改革者，則已然張羅著完全自主的印刷事業。曾為前往威登堡追隨路德，不惜脫離方濟會的亞維農修士蘭貝爾，於一五二三年規畫在漢堡開設印刷鋪，以法文出版路德作品。約莫同時，寇格與法雷爾，肚子裡也打著類似的算盤。一五三三年，法雷爾的計畫在納沙泰爾實現，一五三六年復於日內瓦設鋪。至於法國的新教難民，此刻轉向德國印刷商求助，於是鄰近法國邊界的安特衛普、史特拉斯堡、巴塞爾等地，紛紛印起宣傳讀物，以便走私進入法國。其中史特拉斯堡或可視為私印活動的重鎮；當地居民頗早之前即服膺改革派志向，法國難民在此受到盛情歡迎。也有許多知名人士，一同客居於此，自威登堡返回的蘭貝爾，即於一五二四至一五二六年間在此停留。

一五二五年十月從莫歐逃出的戴塔普勒，偕路塞爾共同抵達，借住史特拉斯堡新教領袖卡皮敦家中，鄰近德阿蘭迭與法雷爾的落腳處。不久，塞爾維特也在史特拉斯堡找到庇護，喀爾文更在這裡結婚，並於一五三九年發行第二版的拉丁文《基督教原理》。其他籍籍無名的廣大難民，則在一波波新迫害的驅使下，魚貫進入該城。到一五三八年時，難民數量之多，已足以讓喀爾文在當地建立法語教區；一五七六年八月的「聖祿茂之夜」過後，教區信眾已達一萬五千人之譜。

就這樣，史特拉斯堡順理成章地變成法國境內新教理念的散播中心。在此地的印刷商當中，普魯斯執著於法文印刷，算是一位異數，其餘的人則長期拒印法文書，只在情況特殊時才偶爾破例，以避免法國當局找碴；事實上，他們的使命與普魯斯不同。他們在一五二〇到一五四〇年間對法國新教運動的貢獻，是將路德的拉丁文作品輸入法國，並以組織井然的團隊把路德的德文著述譯成拉丁文。諸如尚·修特、何瓦根、黎切爾和塞哲爾等重要印刷商，皆矢志於斯。他們為數龐大的成品在法國販售，令法國天主教會惱羞成怒，光是譴責史特拉斯堡已不足以洩憤。同一時期的安特衛普，出現一群專門印刷法文議論傳單的印刷商，佛斯特曼與德凱瑟倫（法文姓名寫成 Martin Lempereur）屬當中最活躍的兩位；後者並在一五二八、一五三〇年，兩度扛下戴塔普勒在法國未能完成的工作，即打印其法譯本《聖經》。伊拉斯謨斯《基督教騎士手冊》法文本（相傳為德伯坎所譯）的出版，也是德凱瑟倫的傑作。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與篤布瓦致力於印製一種小本信仰手冊，並在一五三〇年之前通行於法國，可能是路德神學最有效的推廣媒介。如此一來，出自安特衛普的新教宣傳品，林林總總盡皆齊備，欲借商賈流販之力暗銷法國亦不為難；這無疑是法國新教難民努力的結果。當地的統治者來自西班牙，起初或對這些意在外銷的出版物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連魯汶的神學家也准許戴塔普勒《聖經》譯本發行，但他們終究還是採取了行動。一五二九年的十一月十四日，當局禁止新教版《新約》在安特衛普出版，至於「以法文或低地日耳曼語成書，並於序文、前言、眉批或注解中挾帶偏邪教義或謬誤神學者，諸如《聖經》內福音書、宗徒書信（使徒書信）、先知書（預言書）或其他任何篇章」，一概比照辦理。一五三一年，當權派重申前義，而這兩道禁令似乎讓安特衛普的印刷商謹慎了些，爾後他們印製的法語文本，遂摻雜著更少量的新教主張。

經伊拉斯謨斯要求，巴塞爾的富羅本決定不再印刷路德派作品，但他的同事亞當·佩特里則不願做出違心之舉，堅持己見，並因此獲利；當中更有部分書籍，係專為法國讀者而印。巴塞爾的法國難民數量頗眾，在當地的影響力可能還超過史特拉斯堡，是以他們同樣積極促成新教宣傳書刊付梓，也幫忙把這些書偷渡入法國。一位名叫沃爾弗的當地印刷商，似與新教難民過從尤密。一如安特衛普的德凱瑟倫，沃爾弗打印不少法文書；他先在一五二三年印製《法文版聖經全書》，隔年並推出一本嘲諷巴黎大學決策的知名作品，其作者化名穆爾茂。一五二五年，他發行戴塔普勒的《新約》譯本，書內雕版畫係仿製自克拉納赫為第一版路德《聖經》譯本刻繪的插圖；於此同時，他還出版許多譯自德文版路德作品的拉丁書，令人聯想起史特拉斯堡的何瓦根。

此類書籍印製於法國境外不遠之地，且常是法國新教徒煽風點火的結果，它們大舉輸入法國，毫不費力。這方面的史料十分充足；審訊異端時，常做為物證的被告家中禁書清單，尤可為證。但這些書何以輕易地運進法國？常見的解釋是，由出境洽商的生意人在返國時挾帶，或隨流

浪的小販入境。當然，這些人也確實是若干書本的進口商。不過，位於日內瓦的地下組織，在禁書的流通上，有著格外重要的地位。此種組織約從一五四〇、一五五〇年開始發展；印製於喀爾文根據地的書刊，便由它們負責配銷。在那之前，叫賣書販的活躍程度自不在話下，甚至在專責組織興起之後，他們仍繼續從大城鎮出發，祕密前往各地的小鎮與村落兜售禁書，委託當地書商代銷者也很常見。即使如此，要說這些異議書籍的買賣，可能有相當一部分無異於合法的一般交易，只是移至規模非常龐大的黑市來進行，仍屬合理假設。如此一來，法國本土書商與印刷商在禁書生意裡扮演的角色，便不能等閒視之。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同情改革理念，在里昂的尤其如此，因此加入新教會的亦不在少數。他們與海外同業的生意往來相當頻繁，常藉此在法國引介禁書，並承擔起打印異議著述的風險。此間不少人與出亡在外的宗教改革領袖交好，提供他們各種協助：有時是他們的金主，更常常替他們通風報信、居中傳話。這些生意人所以能避開許多風險與麻煩，訣竅在於事前小心防範，並採取必要的自保措施。畢竟那個年代沒有警察，法律程序又繁瑣，即便貴為一國之君，也並非總是嚴厲執法。凡此種種，只消引述一項針對當時書商集體活動所做的研究結果，便昭然若揭：曾有一批書商，或具親屬關係，或互為事業夥伴，在宗教改革時期，始終協同行動，步調完全一致。他們在巴黎與里昂的店面，一概以「巴塞爾幣」或「科隆幣」做為招牌。這群商人象徵著巴塞爾書商在法國的利益³⁶⁰。

此一事業群的創建者，就是出身於士瓦本的夏布勒（或在法文寫成Cablier）；瓦騰徐尼是他比較知名的別號。一四八三年他在里昂落腳，也可能資助過從事印刷的同鄉胡茲。而後他在一四八五年自行創業，經營的並非出版社或地方書店，倒有點類似小布伊爾，既是書籍買賣的中間

人，也是專跑書本市集的單幫客。他即刻變成巴塞爾書商在里昂的首席代理商，並於一四九五年成爲巴塞爾公民。到了一五〇四年，他表明擴張事業的意向，把里昂店面交給一位名叫皮耶·帕門提耶的員工管理；大約在一五二一到一五二四年間，他又促成一度調職、年紀最長的表親渥格里斯與帕門提耶合夥。這兩人獲派的職務，分工非常明確：法國南部、義大利、西班牙各城鎮，由帕門提耶負責，而渥格里斯則關照史特拉斯堡、巴塞爾、日內瓦與法蘭德斯的業務。至一五三六年前後，帕門提耶設立兩個分支，分別位於亞維農和土魯斯。

夏布勒曾一度想在南特另開分店，動機很可能是替巴塞爾與里昂的出版商著想，爲其銷往西班牙的圖書建立中繼站，但念頭一轉，他似乎又改於在一五〇四年前後，涉足巴黎的出版事業；克韋爾與佩堤曾在此地發行一部教會法典，別具歷史價值，而他也參與其中。在那之前他是否已在巴黎開店，無法確知；可以確定的是，一五一六年開業於巴黎聖雅各街，並高掛「巴塞爾幣」招牌的雷許，其實就是他的外甥。里昂市集舉行期間，信函與包裹大量寄至米榭·帕門提耶處，由他確保每樣貨品皆安抵收件人手中，就連阿爾恰特、拉伯雷、馬當·杜貝萊、阿默巴赫家族，乃至於許多宗教改革的推手，都得靠他周詳地居中聯絡，方能成事。夏布勒後來在巴塞爾退休，時間約莫在一五一六年或更早，並維持與法雷爾、寇格等人的良好交情。至於渥格里斯，身爲夏布勒在法蘭克福與史特拉斯堡的代理人，可能也曾與宗教改革運動聲息相通；他在一五二〇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致信阿默巴赫，其中提及：「倘若你有德文版的路德，勞煩寄來里昂給我。這裡有好些個師傅有意拜讀。」遊歷四方、交遊廣闊的結果，令他成爲搶先獲悉最新要聞的包打聽；像他在受託寄錢給波尼法·阿默巴赫（當時在亞維農求學）的時候，便隨信通報了馮胡騰

的死訊與伊拉斯謨斯的近況。考證結果顯示，他爲了催促法雷爾的論文《論天主經》（或《論主禱文》）儘速發行，曾於一五二四年在巴塞爾插手斡旋，並於同年八月二十日寄信給當時人在蒙貝利亞爾的法雷爾，信中透露許多關於他所扮演角色的資訊。原信以法文寫成，內文的拼字方式與今日慣例迥異，以下僅節錄較可觀的數行：

威廉，我的好友與兄弟，願主將慈悲平安降臨於你。你的來信囑我把錢送交爵士先生（即寇格），我亦已拜託舅父雷許轉交十盾。第一，你的書一送過來，我馬上攔下所有事情，替你處理，現已裝訂完成。第二，我正將這些書寄還給你，由爵士代收，另外尚有兩百冊的《天父》（即法雷爾所著《天主經暨信經普釋》）（《天主經》或《主禱文》的第一句爲「我們在天上的父」，故省稱爲《天父》）與五十冊《書信集》（可能是今已亡佚的法雷爾作品），只是我不清楚你打算怎麼把書賣出去，或是委人代售……我曾對旗下幾位代理商表達謝意，好讓他們賣起書來更起勁兒，這樣的話東西就能一點一點地出清，並同時獲利。第三，可能的話，我覺得你應該責成才識足夠之人，參酌M.L.（即馬丁·路德）的版本，將《新約》譯成法文，畢竟法蘭西、勃艮地、薩伏伊等省份都很需要。若有必要，我可從里昂或巴黎派遣法文學者過去，如果巴塞爾就有合適人選當然更好。第四，今日我將從巴塞爾出發，前往法蘭克福。一五二四年八月十九日於巴塞爾。

在宗教改革宣傳品的傳播上，渥格里斯有著決定性的貢獻，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在巴黎與馬

恩河畔沙隆的店鋪裡，想必積存過許多來自巴塞爾出版商的異端書刊，諸如夏布勒、富羅本、克拉坦德、庫里翁印製的新教作品，而他則是他們的業務代表。正因為這樣，俟他於一五二七年六月，在巴黎洽商折返途中猝死於洛林的納坦庫特，君王法院就在聖伯努瓦樂貝士內教會的通報之下，查扣他在巴黎分店籌備處的庫存書籍；籌備處與克韋爾的工作坊位於同一棟獨角獸商號裡。此外，馬恩河畔沙隆的主教也採取了類似行動。巴塞爾書商見狀頗感憂慮，遂對市議會上告此事，議會勃然，出面干預。由於君王法院不願跟瑞士人起衝突，相關調查似乎也就算了。話雖如此，既是巴塞爾公民，也是渥格里斯娘家親戚的書商魏因加納，還是在一五二九年的巴黎遭到當局襲擾。

以「巴塞爾幣」做為巴黎店鋪招牌的雷許，一如渥格里斯，也把事業全心奉獻給宗教改革；現存最早的路德著作法譯印刷本，亦是出自他，這點前文已經提過。雷許對當時的信仰爭議非常有興趣。值得一提的是，就連他所聘雇的兩位印刷師傅，維篤以及篤布瓦，也對新教懷抱同等熱忱。一五二三年，雷許委託維篤印製伊拉斯謨斯《聖經釋義》中，詮釋宗徒（使徒）書信的部分，而這部書似乎招致巴黎大學相當的敵意。

雷許在一五二六年，跟隨夏布勒與渥格里斯前往巴塞爾，可能是嚮往更多行動自由的心情使然。他和兩位親戚一樣，重操書籍舊業，定期趕赴市集，並維繫著自己在法國的商業利益。這個時期的雷許，似與法雷爾、喀爾文聯絡頻繁。一五三八年，巴黎的杜堤伊表示願意捐款給當時人在巴塞爾的喀爾文，也是他穿針引線的結果。魏卻爾一度擔任雷許代理商，至此則頂下巴黎的「巴塞爾幣」店面；他在雷許客居巴塞爾期間，證明自己對宗教改革的支持，一點也不輸給舊東

家。魏卻爾出身布拉班特，不僅與德國方面保持密切往來，更常常出版德國作家的文章，尤其是杜瑞爾的神學論文。雖然出版了許多異端著述，他卻審慎異常，極盡規避過度風險之能事，就連路德的《小禱簿》片段，也要改寫成明顯不犯上意的短文，重新題為《純正禱詞之書》，並尋求王室特准，方於一五二八、一五三〇年兩度發行。同在一五三〇年，他還出版了《聖經禱詞經文選》；該書譯自布隆費斯選錄《聖經》文本的小書《聖經惕世語》，唯其內容照實譯出必遭查禁，故特別譯得表面上溫順無傷，方能拖到一五五一年才列入禁書目錄。也虧得魏卻爾行事迂迴，執業期間似乎未曾遭到當局嚴厲騷擾，安詳地在巴黎辭世。倒是他的兒子碰上了「聖祿茂慘案」（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新教貴族與平民在巴黎遭太后擁護者屠殺一案），幸得借宿他家的薩克森教士蘭古耶援助，僅以身免，翌年遷居法蘭克福。

尚有另一個出版機構，與「巴塞爾幣」的招牌成長於同一時期，且同樣跟巴塞爾印刷商與宗教改革有關係。他們是尚與弗朗索瓦·浮瑞隆兄弟，父親是巴黎的書商，自己則在里昂開業，以「科隆幣」為招牌。身為兄長的尚，曾受雇於雷許，在那之後似乎也到過巴塞爾；這可能是為了完成修業，也可能是因為他的信仰逼他離開巴黎避風頭。回國之際，他選擇在較能包容異己的里昂繼續發展，雖然巴黎的店鋪仍為他所有，巴黎卻不再是他的棲身所。很快地，他開始與弟弟弗朗索瓦聯手經營事業，並在一五四二年成為出版商。他對外宣稱自己信奉舊教，無疑是審慎盤算的結果，至於他內心堅定的新教信念，大概不會有人質疑。想當然耳，他在巴塞爾的印刷商友人，也印出不少異端書刊，由他引介至法國。他與雷許，同為巴塞爾印刷業在巴黎的代言人。一五三八年五月三日的事件，可以證明尚·浮瑞隆與巴塞爾的淵源有多深厚：巴塞爾市議會獲悉法

蘭西斯一世下詔禁止《路德靈糧》銷售，便故伎重施，以一五二七年渥格里斯過世時對付查扣令的辦法先發制人，同時去函巴黎地區檢察長，一方面替雷許與浮瑞隆這兩位優秀的市民同胞與書商美言幾句，二方面請他不要過度解讀兩人遭受的不實指控。指控真的不實嗎？恐怕不至於，畢竟浮瑞隆確實和雷許一樣，與法雷爾、喀爾文互通書信，並一度聘雇塞爾維特替他校對版樣。此外，塞爾維特與喀爾文聯絡，也曾靠他居中傳話；塞爾維特的《基督教義原貌》在多菲內的維埃納出版時，浮瑞隆還允諾協助經銷。乍看之下，浮瑞隆的出版物與天主教的儀式用書頗為相似，實則常常是新教教義的倡導工具，下面由他在一五四五年出版的兩本小冊就是例證：《詠歌仿作裡的教義訓示》，以及《新舊約訓示》。他還在一五五三年版的《新約》裡，以雙腳狀似豬蹄的修士象徵誘人犯罪的魔鬼。後文將會提到一位凡森，身兼里昂與日內瓦兩地的出版商，且全心奉獻在新教志業上；浮瑞隆真正的信仰認同，或是他的出版事業在本質上隸屬哪一方，從他與凡森的關係來看，就更加沒有疑問了。

也就是說，支持改革、組織井然的書商團體，係以巴塞爾的公民身分為掩護，方能在十六世紀前半的法國，幾未受阻地經營滿是異端書刊的店面，甚至偶爾在巴黎、里昂等地逕印新教著作。他們既是巴塞爾書商的代理商，又是法雷爾、喀爾文及其友人的眼線，有時還權充這些新教領袖的金主。細究他們的活動，便不會訝異，何以在各種法規層層箝制之下，當時法國的禁書流通量竟比早年更多。此外，「巴塞爾幣」與「科隆幣」這兩塊招牌，更絕對不會是那個時代中，絕無僅有的禁書出版總部。

當時有愈來愈多的書商，其實只是純粹基於牟利的需要，才銷售禁書，從而忤逆索邦當局、君王法院，甚或是國王本人所下達的禁令。早在一五二二年，官方封殺路德著作之時，這些書就已經令讀者深感興趣，終年熱賣也是理所當然，故在許多生意人眼中，禁令想必擋住不少財路。另外，馮胡騰的作品，銷路尤其出色，一旦書商無法公然出版他撰寫的小冊，生意所面臨的威脅，理應與前者類似。在這個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仍然密不可分的時代，書商對人文主義作品的需求格外殷切，出版商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暢銷作家的作品接連被禁。戴塔普勒的《聖經》譯本於一五二五年遭查禁之後，遍布各家書店的伊拉斯謨斯作品，成爲下一波受害者。再來，馬羅也被列入黑名單。理論上來說，巴黎與里昂的書商礙於禁令，不能像當時在安特衛普與巴塞爾的同學那樣，任意展售戴塔普勒的新版《聖經》，只得將就著翻印舊有的插圖版《聖經》；即便如此，舊版還是賣得不錯，屢屢增刷，反映民眾爭睹《聖經》的強烈慾望。倘若戴塔普勒的譯本不是禁書，不知道會有多暢銷！一五二五年的五、六月，巴黎大學神學院譴責了伊拉斯謨斯的《婚姻讀詞》、《祈禱方法訓略》、《宗徒信經》與《和平的泣訴》等四種書，至一五六二年五月又禁止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閱讀他的《對話集》。由於這部作品很可能是許多巴黎書店必備的商品，業界對此禁令做何反應，可想而知。就連基督教諸教父論文當中，最廣獲閱讀的幾篇，都必須先取得批准才能出版；樹瓦隆發行的聖哲羅姆文集，因以伊拉斯謨斯的詮釋爲依據，還是招來側目，足見索邦當局對伊氏十分猜疑。事實上，索邦當局也不吝於表達反對之意，經過嚴詞警告，樹瓦隆終究學到了教訓，在一五三〇年的二月十五日，主動把即將付梓的聖奧古斯丁作品送交巴黎大學審查。

那時候官司纏身的尚有德伯坎，此君受到的折磨凌虐，只怕更使其他書商慄慄不已。但要等到一五三〇年，盤查侵擾書商與印刷商才成爲常事。就在那一年的四月，索邦當局宣稱，任何主張研習希臘文與希伯來文方能正確領略《聖經》的，皆屬叛教。到一五三二年的三月二日，同一批人又對一系列的書籍展開審查，其中包括《異論輯》、《耶穌基督即天父禱詞》、《信經暨十誡法譯全文》等。他們還煽動君王法院的高等法院，在一五三二年七月十二日委派兩位成員與巴黎大學神學院的兩位代表合作，共同檢查所有在巴黎銷售的書籍，凡夾雜「訛偽教義」者一概沒入。一五三二年的五月十七日，索邦不但重申前令，還特准神學家逕自搜索書店，專擅的程度令君王法院不得不下令，除非君王法院代表在場，否則不得搜索店家屋舍，亦不得逕自發布禁書令。至一五三四年初，「皇家講師事件」終告爆發。事件起於幾份告示，稱季達瑟魯、瓦達博勒與達內斯有意公開講解《聖經》與亞里斯多德。君王法院與索邦當局聞訊，怒不可遏；前者旋即下令，未經索邦神學院允准，不得閱讀、詮釋《聖經》。顯然在同一時間，供書給這些皇家講師的官方指定代理商，營業處所亦遭搜索，其中魏卻爾、樹洛姆·德古爾蒙和奧熱羅三人，名字還曾出現在最初那份告示裡。奧熱羅的牢獄之災即源於此³⁶¹。

大多數的巴黎書商與印刷商，皆服膺於巴黎大學的權威，且通常與舊教正統的兩大堡壘（此指巴黎大學神學院成員與君王法院官員）保持友善關係；比之於國內其他地方的同行，他們可能較不願意支持新興的意識型態。然而他們仍得滿足客戶，在商言商的結果，很難不被加諸於他們生意之上的種種限制惹惱。以下的事件尤能說明這一點。一五四五年，在君王法院批准了索邦神學院草擬的一長串邪書譴責清單之後，由索邦發給執照的二十四位書商，思及這份書單很可能使

他們破產，同意提出抗議。根據書單內容，他們不僅必須將店內庫存註銷、承擔虧損，連已經敲定的印刷訂單也得認賠了事。爲了避免這些慘事，他們請求當局准許在禁書上加上封套，注明書內哪些段落不准閱讀，如此書本照賣，民眾亦不致誤信妖言。這項陳情當然沒有過關³⁶²。

面對如此施政，業界對於法令自然是能規避就規避，尤其在當局執法鬆散，法庭上寧採寬容態度的一方又頗強勢（特別是在一五三四年之前）的條件下，情況更是如此。這應該歸功於那瓦爾王后瑪格麗特以及杜貝萊家族的尙與吉堯姆等人的影響力，和他們不吝於插手袒護宗教威權受害者的態度。不僅如此，就連法國國君也認爲神學家與地方長官對教規不宜太過狂熱；這點人盡皆知。更何況在這個節骨眼上，新教異端與舊教正統的分界線仍舊模糊，每件案子皆然。諸位千萬別忘記，此一時期裡，插手袒護德伯坎的，在索邦攻擊伊拉斯謨斯時支持馬羅爲之辯護的，替戴塔普勒提供保護傘的，將豁免權核予索邦眼中異端書籍的，乃至於國王的親姊妹（即前述瑪格麗特王后）遭懷疑、著作遭責難時挺身而出的，可都是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本人。即便到了後來，這位國君執政晚年的教爭加劇，他還是下詔保護自己的印刷商侯貝·埃蒂安納免於索邦淫威，更在索邦與君王法院將《巨人傳》、《龐大固埃》列爲禁書的情況下，於一五四五年特准拉伯雷出書，並容許拉伯雷委託魏卻爾印刷《第三書》。

索邦當局全不理會王室的授權，以極快速度公開譴責了拉伯雷的新書。雖然這項譴責不至於阻撓國王將一五四五年核發的特准令自一五五〇年起再延十年，以王室爲靠山的拉伯雷依舊不安，遂以走爲上策、逃往梅茲。以下的事例，說明了這確實是個怪異的時代。安迭既是服務君王法院的印刷商，也是院長里才的報馬仔。他曾數度替舊教陣營印刷禁書目錄，卻在一五四四年，

用同樣一台印刷機，印製一部紀念馬羅的詩集；馬羅不但是叛教份子、御用詩人，更有作品名列禁書目錄。

綜觀種種情勢，不難理解圖書檢查制度何以徒勞，又為何會有愈來愈多異端書籍誕生，乃至於新教信眾憑什麼穩定成長。實情是，在許多的案例裡，法國的書商都有辦法繼續印刷、銷售異端書刊，滿足客戶的熱切需求，卻不因此惹禍上身；只要行事慎重點，再編幾個好用的藉口即可。書商當然不會毫不遮掩地出版甫遭查禁的著作，反正他們總是可以仿效拉伯雷的出版商，一旦碰到禁書，就出版社的地址從書名頁上槓掉。反過來說，他們印製艾可、費希爾、畢達等人對異端的駁斥，除非國王擺明了不准，否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受阻。同理，如果在一部滿紙舊教正統思想的書本中，巧妙地穿插離經叛道的言論，風險亦是微乎其微。實際說來，想要智取神學家、誤導君王法院，辦法可是有一籬筐。

也因爲這樣，縱使譴責不曾停歇，各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正統教義書籍，卻日益增多。在法國境外印製的，可以比較大鳴大放些，印製於法國的，也許就得稍加掩飾大膽主張；但不論明講還是暗示，都有宣揚宗教理念之效。這點可以從下面幾部作品的出版沿革看出來。

首先僅以《聖母時辰禱書》爲例。是書係由詩人格林哥爾假託「傻媽」之名，於一五二五年譯成法文，但在許多重要層面皆與拉丁原文有出入。更離譜的是，譯者似乎在書中開了個不甚莊重的玩笑，沐猴而冠地自比基督，身穿教士大衣、頭戴博士方帽。雖然其插圖沒被挑出毛病來，內文還是令君王法院不安，決定徵詢索邦當局看法。一五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索邦正式譴責此

書，君王法院亦不准它發行。負責出版的尚·佩堤並不死心，仍想著把他花大錢替這本書雕製的木刻圖版派上用場，或至少重印文字部分。經過三年等待，他猜想此事已被淡忘，於一五二八年將其再版；爲慎重起見，這一版的部分成品不再採用原本的怪誕插圖，改印較爲單純的圖樣。一五三三年與一五四〇年前後，《聖母時辰禱書》再度翻印，初版的詭異插圖竟又借屍還魂。這或許是因爲這部譯作不算很顛覆，但即便是路德的著述，似乎也曾在法國境內成功地出版、銷售，遇上的阻力並未大上太多。《小禱簿》即是一例：初版於一五三二年，拉丁文譯本則問世於一五二五年，出版商是史特拉斯堡的何瓦根。前面提過的信仰小冊《純正禱詞之書》，是魏卻爾以王室執業許可爲掩護，於一五二八、一五三〇年出版的，光看目次無法覺察其與異端有涉，實則包含片段的路德著作翻譯。奈何到了這個階段，索邦的審訊官已經懂得不能光看表象，故於一五三一年三月二日譴責這卷書。此舉影響不大，畢竟德凱瑟倫依然在一五三四年的安特衛普接手其印刷。隱忍一段時間後，德布利的孀妻見時機成熟，又於一五四〇年在巴黎公開翻印之，在她之後還有雷尼奧與富寇在一五四三年起而效尤，印製地點同爲巴黎。最後是威斯馬肯與奧里維耶·阿奴雷兩人，分別在安特衛普（一五四五年）與里昂（年份待考）打印同一作品。如此一來，這卷可能部分出自德伯坎手筆的路德作品譯本，等於先後印成六種不同版本，總共發行上千或上萬冊，卻沒有書商或印刷商因此遭罰³⁸。

當時可有不少宗教改革者著作，以同樣的規模大量印行。《異論輯》作者署名玻迪烏，實爲布塞爾的化名。此書於一五二七年的科隆印出拉丁文版，之後又在一五三一年的安特衛普，與一五三一、一五三二、一五三三、一五三四年的里昂付梓。其法文譯本，先由德凱瑟倫的印刷鋪於

一五二八、一五三三年兩度打印，而後又在二五三九與一五五一年於日內瓦成書。布隆費斯的《論真正規約與戒律》，首度出版於一五二五年，索邦當局於一五三三年譴責之，在此之前曾由侯貝·埃蒂安納於一五二七年的巴黎發行，被禁之後格利甫於一五三八年的里昂率先出版，俟一五四一、一五四二年回到巴黎印行，復與黑根道夫的《理論》合為一冊。廣戎在里昂推出此書法文譯本的時候，已經是一五五八年了。倒是布隆費斯的《聖經傷世語》讀者回響更佳；這是因為逃離祖國的法國新教徒有意發行引述《聖經》章句的短篇論文，以取代各種傳統版本的《新約》，故拜讀這部作品之後加以翻譯。以《聖經禱詞經文選》為名的法譯本於焉誕生，且一直到一五五〇、一五五一年，才分別在魯汶、巴黎兩地列為禁書，是以成功的程度尤勝原作，期間並於一五二九年以及一五三三年的安特衛普，分別由佛斯特曼與德凱瑟倫重印之。打印於巴黎的版本首見於一五三〇年，由魏卻爾主其事，此後更被多雷（一五四二年）與德圖爾恩（一五四三年）印行過。

一五三四年之前，扯上這類違禁書的書商與印刷商，顯然尚有豁免權可恃，至於因此遭逢嚴重騷擾者，鮮少聽聞。奈何在「布告教案」過後，好日子結束了，法國國王轉趨野蠻的對策更是惡名昭彰³⁶⁴。懺悔遊行在一五三四年的十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舉行三天，君王法院更在宮廷內宣布：「凡檢舉張貼前述布告之個人或團體，經查屬實者，逕發賞金一百盾。至於窩藏疑犯之罪，概以火刑伺候。」此言一出，各種控訴之詞從全國各地湧入巴黎。在圖爾更有書商、印刷商的住處遭到搜索，而這些商人在羈押疑犯當中占了頗大一部分。一五三四年十月，接連不絕

的公開處決揭開序幕，十日當天即有某位印刷商被活活燒死，罪名為印製、裝訂路德「謬論」。同年的十二月二十日，《女罪人心靈之鏡》的印刷商之一，且已然因皇家講師事件下獄的奧熱羅，也在火刑柱上斷氣。隔年元月的二十一日，白天先是舉辦了懺悔遊行，穿梭於巴黎街道的行列中，也包括國王率領的隊伍；傍晚時分，遊行經過的街道上，焚死了異端六人。爲了強化火刑所象徵的意義，從六員死囚家中搜出的三大袋書刊，還在正式行刑之前，一併扔進將燃的柴堆。

查緝禁書期間，大量曝光的傳單與扣留的眾多可疑書刊，想必令國王非常詫異，似乎也在此刻突然明瞭，印刷書對異端思想的宣傳究竟有多重要。更進一步說，欲將疑犯定罪，印刷書更是唯一的具體證據，實質地證明了疑犯不爲人知的私密見解確實傾向異端。於是法蘭西斯一世下了決心，非得將偏邪信仰根除不可，遂採取極端手段，於一五三五年的一月十三日詔令全國不得印書，違者絞刑伺候。這項敕令史無前例，且不可能真正落實，更何況在任何情況下這都不是平息爭端的辦法。事實上，觸怒國王，並引發諸般迫害舉措的導火線，根本就是皮耶·德文格勒在法國境外納沙泰爾所印的傳單，「帝力於我何有哉」。經過比岱與尚·杜貝萊的諫阻，國王收回成命，並於二月二十三日宣告「最後裁奪延後公布」。同時他御筆親點了十二位巴黎印刷商，聲稱「他們之外再無旁人」有資格印製「必需且證實有益大眾」的讀物，至於新書更是一本都不准印。

這道諭旨與同一時期英格蘭元首的三令五申，內容非常近似，但從來都沒有落實過。實際說來，法國各地的印刷商繼續作業，並未因此中斷，在一五三五年裡印出的書籍，絲毫不比其他年份來得少，只是對書籍的監管，比先前更加嚴苛。一五三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七位書籍產業人士

的名字，出現在疑似異端的名單上；這些人在逃跑途中，當局以軍號代替傳票，押解他們出庭。書商與印刷商，此後便經常被逮捕，遭處火刑者亦有所聞。禁書的印製與銷售，隨著民眾對新教信仰的支持而日益增長，是再自然也不過的事，但爲了遏止這種風氣，一整套的法令因而頒布，且規範事項愈來愈明確，執行也愈來愈嚴厲。一五四二年，一些印刷完成的喀爾文《基督教原理》遭查扣，君王法院趁機重申前義，強調不管任何書，凡事前未經索邦神學家審查通過者，一概列爲違禁品，絕不寬貸。前文曾經提及的第一部法文禁書目錄，完成於一五四五年，或可視爲先前許多年以來，反動派在巴黎持續搜索書店的「戰果」。一五四七年四月，國王再次主動出擊，於楓丹白露二度下令禁止《聖經》相關作品印行、銷售，至於來自日內瓦或德國的書刊，更是不問內容全數禁售，除非內容已先行通過巴黎大學神學院的審核。最後，國王復於一五五一年在夏托布里揚降旨，確認了過往所有的箝制措施並加以整合，使形成完整的體系，同時特別強調，絕對禁止自日內瓦或其他異端國度進口書籍。

簡而言之，當時出現的大規模立法，苛刻、殘酷且鉅細靡遺，涵蓋了所有可能的案情，卻換來普遍的漠視。事實上，嚴律峻法在周延化、細膩化的過程裡，反倒印證了新教支持力量的進展，與禁書買賣的增長。從一五四〇年開始，尤其是一五五〇年以後，法國的書商與印刷商，逐漸變得大膽起來。地下印刷鋪在全國各地忙碌著，叫賣書販行走四方書囊飽滿；省略出版注記，或印上假標記的異端小冊，發行量更勝以往。在此同時，愈來愈多的異端著述，憑藉看似無害的書名掩人耳目。外觀看來全然臣服於正統、無懈可擊，但骨子裡卻是新教宣傳工具的書籍，遂發展成一種龐大的出版品類型。通俗讀物的各種樣貌，都被這類書拿來偽裝，有些禁書乍看之下，

甚至與字母書或曆書無異。舉例來說，《默示錄人物誌》出版於一五五二年，其上的出版標記屬於格盧洛，即專門出版通俗小本書的巴黎大出版商雅諾的繼承人，然其內文卻屬異端。《字母書或基督教幼童教本》一書亦然，雖然屢遭封殺，埃斯提亞德卻仍然在離開里昂、前往史特拉斯堡之前，公然印製之，時值一五五八年。此外，德國爾恩也做過同樣明目張膽的事，於一五五九年的里昂發行信仰小冊《悔罪者之鏡》³⁶⁵。

由此觀之，前述由法律專家設計的縝密法規，究竟有何重要性可言？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某地的某位印刷商，被捕下獄或是判處火刑，又有什麼意義？如果想讓打壓更有效，大可訂立更嚴苛的法條，但即便如此，也不保證必然能抑制異端。更別提那些被捕或焚燒至死的，大都是叫賣的書販了，偶爾才有小書商或印刷鋪小廝獲罪判刑。在所有真正淪為宗教迫害受難者的異端當中，沒有任何一人出身於稱霸書籍產業的印刷世家。德拉圖爾，便注意到這一點，從而宣稱較富有的書商、印刷商，擁有店面或印刷鋪房契，自不願冒險觸法，故異端書刊一般是由地下印刷鋪承印。單就巴黎地區言，這樣的推論倒有幾分真實，但更貼切的解釋是，大型出版商擁有太豐富的人脈、太多可供自保的資源了。一旦危機浮現，這些人根本不愁沒有友人出面搭救、事先警告，甚或拖延查緝。就算發生最壞的狀況，地位顯赫如康拉德·貝德或侯貝·埃蒂安納，也會有充裕時間準備遠走高飛。

里昂一地最是特別，書商與印刷商的營業，幾乎完全自由。一五四二年之後，此地已無人印製舊版的插圖《聖經》，取而代之的是奧里維坦的譯本，外觀宛如正統教會典籍。舉凡阿奴雷、浮瑞隆、德國爾恩、路伊耶、帕顏、皮迪耶、巴克諾瓦、伯霖根家族，曾經印過這部《聖經》的

印刷商，沒有一人因此獲罪。稍晚從一五五八年開始，畫家沙羅門的女婿廣戎（無巧不成書，廣戎岳父的岳父就是出版家德圖爾恩）使用一種名為「儀禮體」的活字體，印製一套冊數不多，但徹頭徹尾宣揚異端的信仰手冊；這種字體一看就能認出是誰的傑作，印者卻不避嫌。這套書竟也不影響他在後來前往羅馬替梵蒂岡鑄刻活字。此時期里昂最享盛名的幾位書商、印刷商，皆同情新教，其中亦有不少與法雷爾、喀爾文，以及日內瓦當局互通聲息。德圖爾恩即與改革派同儕過從甚密，格利甫還在多雷自土魯斯出獄後相迎，對於曾被索邦禁過的書，二話不說就付印。舉足輕重的印刷商森內敦家族，則與浮瑞隆一樣改信新教。巴塔薩·阿奴雷名義上奉行天主教教義，實則與後來在日內瓦活動的圭盧特合夥；他跟喀爾文的關係頗密切，還委請塞爾維特擔綱校對。一五五三年，圭盧特經他暗中允許，於維埃納出版《基督教義原貌》。就連與塞爾維特交惡的喀爾文，也不得不在巴塔薩·阿奴雷下獄之前，表態譴責他，所幸他很快就獲釋了，重操舊業之餘也跟喀爾文和好。在這種政治氣候下，縱使市面上的異端書籍為數甚多，也不致令人意外。君不見還有一位凡森，為這類書籍提供資金、策畫產銷，其規模之大，在巴黎、梅茲、里昂或日內瓦，皆屬空前？他可是同時經營著日內瓦與里昂兩地的事業據點哩。

蘭貝爾、寇格與法雷爾長期勾勒的願景，是為法國建立新教難民的庇護所，並打造改革理念的宣傳基地，與威登堡的路德派大本營媲美。而後，法雷爾得到納沙泰爾一部分商人的支持，於一五三〇年進入該城，並於同年十一月四日驅逐舊教司鐸，廢止彌撒儀式，願景才終於實現。

至此，納沙泰爾變成法國流亡人士的聚會所，與福音派（狹義而言專指路德派，也可能泛指

喀爾文派以外的新教團體）宣教的總部。法雷爾是位務實的行動家，深刻理解印刷術的力量，故即刻遊說印刷商皮耶·德文格勒³⁶⁶前來納沙泰爾。出身皮迦地的皮耶，父親也是印刷商（尚·德文格勒）。一五二五到一五三一年間，他曾擔任努瑞的印刷匠領班。努瑞在里昂開業，堪稱通俗讀物印製的專家，後來還變成皮耶的岳父。改信新教之後，皮耶成了法雷爾的得力助手，一五二五年以降，更利用岳父的印刷機打印新教書籍，再以假的出版商資訊掩人耳目。一五三一年，前文提過不止一次的小書《異論輯》，以他自己的名義印行，同年三月二日遭索邦當局譴責。據他自己說，此後沒有多久，他就因為印製《新約》法文譯本，走出里昂逃避追捕。他憑著一紙來自伯恩的介紹信，獲准在日內瓦創業，奈何這個時候的日內瓦，局勢也不穩定，法雷爾遂建議他前往馬諾斯克；出身加普的法雷爾在那裡有好幾位親戚，且當地的新教勢力正邁向成功之途。除了販賣新教宣傳品，他也在馬諾斯克印製較為單純、短期流通的書刊，例如牧民曆。

一五三二年十月，華爾多教派的新教徒，爲了在他們居住的多菲內與皮埃蒙特谷地傳福音，要求法雷爾印製《聖經》，以及掃尼耶翻譯的《聖經篇章總彙》（原著爲拉丁文，布塞爾撰）。承印這批書的合適人選，非皮耶·德文格勒莫屬。詩人葛寧遂在同年十二月的日內瓦恭候德文格勒大駕，以便轉交華爾多派支付的五百金盾印書款。德文格勒稍晚才趕到，帶著那封來自伯恩的介紹信，選在一位名叫蕭譚普的富商隔壁架設印刷機。這位商人聘請喀爾文的表親（即奧里維坦）擔任小孩的家庭教師，對德文格勒創業所需的資金似乎也出過力。該市行政官則受蕭譚普之託，准許德文格勒根據安特衛普印製的《聖經》法文譯本（即戴塔普勒譯本），打印、銷售經文。然在四月十三日，當局卻又禁止《篇章總彙》發行，德文格勒只好假造「皮耶·杜邦印于安特衛普」

的標記，祕密出書。他所印製的《聖經》也在當月問世（雖然只包含《新約》部分），接著又印行另一部作品，即奧里維坦的《孩童之教導》，之後於八月轉往納沙泰爾開店，還得到當地牧師馬庫爾特與前道明會士馬林桂的協助，得以不受干擾地印製為數甚多的書本。一五五三年，他推出了法雷爾的禮拜儀式書，以及一部福音頌歌選集；隔年印成的包括《梗概》、數本宣教小冊、《商賈書》，以及因批判彌撒而聞名的數張招貼。印製於一五三五年者，除了奧里維坦的《聖經》譯本，亦有不少近期才考證出起源的著作。以上種種，全是以法國境內讀者為主要考量而印，上面的出版商資訊皆為偽造且各不相同（例如「印于科林斯」、「皮耶·德維諾雷印于巴黎索邦街」，甚或只有「印于巴黎」四字），或根本沒有出版注記。

法雷爾則坐鎮納沙泰爾，朝日內瓦的反動勢力開砲。一五三五年的八月十日，日內瓦兩百人議會也廢止了舊教的彌撒，十一個月後喀爾文順利進城。新教攻陷日內瓦，等於掃除了前進里昂的障礙。改信新教的城鎮、聚落，從史特拉斯堡一路延伸到日內瓦而沒有間隙，令法國不再與日耳曼的天主教諸邦接壤；環繞法國邊境的新教城市，一本接著一本地印製著各種異端書籍。在那之後，法雷爾的密使頻頻從法蘭克福與史特拉斯堡前往巴塞爾與日內瓦，再由日內瓦推進至里昂、巴黎。日內瓦印製的書本，彷彿滾滾洪流，湧向法國。

法雷爾與喀爾文回到日內瓦的時候，當地只有幾座印刷機，承包的不過是一般的印刷工作，例如齊爾恩，即以黑體字打印公告與曆書餬口。法雷爾旋即著手改變這種情況。一般認為，來自蘇伽的熱拉爾，便是在法雷爾的請求下，於一五三六年設鋪，同年打印出法文版《新約》之後，

又印刷了《大衛王詩篇》（天主教《達味聖詠》）、《孩童之教導》，以及後來許多的宣教小冊。熱拉爾的印刷產能從一五四〇年起又向上攀升，在一五四五年達到巔峰。維雷特的作品，他固然印了不少，喀爾文的著作，由他打印的更多；後者以他為指定印刷商。

在這座新教思想的堡壘裡，尚有其他印刷機投產。尚·米榭在一五三八到一五四四年於此執業，器材來自納沙泰爾的印刷鋪；米榭·杜布瓦也在一五三七到一五四一年間投身這一行。父親是巴黎律師的奎斯班，一度克紹箕裘，一五四八年來到此地改行印書；大名鼎鼎的康拉德·貝德和侯貝·埃蒂安納，亦分別於一五四九跟一五五〇年從根據地巴黎來此。爾後的日內瓦市，變成許多大印刷工坊的坐落之處。隨著新教難民的大量湧入，印刷商與書商的人數愈見攀升，光是一五五〇到一五六〇年，就有超過一百三十人進城。至於當地印製的著作，一五三三到一五四〇年間不過四十二部，一五四〇到一五五〇增為一百九十三部，一五五〇到一五六四計有五百二十七部。至此已有四十架左右的印刷機運作著，且多數機器任由一小撮有效掌控書籍產業的大出版商差遣：奎斯班、侯貝·埃蒂安納，乃至於更富影響力的凡森，與德諾曼地。其中後者還可能操縱著所有在法國私售禁書的勾當³⁶⁷。

撇開埃蒂安納不提，日內瓦的印刷商，幾乎不太出版宗教作品以外的書籍，以下的數據可以為證。一五五〇到一五六四年間，當地印行的全本《聖經》或《新約》，光是現存的法文版就有五十九種，這還不包括拉丁文、希臘文、義大利文與西班牙文版本。後文還會提到各種不同的《詩篇》印刷本，其數量也頗多。部分的小冊直斥教宗站在耶穌的對立面，遣詞粗鄙，也獲出版，例如《暴虐瘋教宗結局的鬧劇》。不過，比前述各書更普遍的作品，是以當地俗語文寫成的

神學短論，旨在協助每位信徒從中領略新的神學觀，並盡可能讓新的教義跨越社會階級藩籬而遠播，諸如維雷特的《福音真義與舊教謬論簡述》，布林格的《福音教義略》，以及寇瑟的《對話裡的信仰之盾》。當然，為數最龐大的，恐怕還是喀爾文所撰之書。一五五〇到一五六四年間，喀氏作品一共打印了兩百五十六次，其中一百六十次是在日內瓦。他的《基督教原理》，在這段期間內二十五度付印，包括拉丁文版九種、法文版十六種，當中多數為日內瓦印刷商傑作；風行程度更勝一籌的，還有一五四一年的《問與答解教理》，跟一五五一年的喀爾文版《聖經》譯本。如此多產的書籍印刷量，確保了信仰新正統的風行草偃。

出版規模既已這般宏大，資金哪裡來，書本如何賣，難免衍生出許多問題。日內瓦的書商與印刷商，自然不會錯過法蘭克福市集。運抵會場的書籍，一方面可供新教國家的書商自由進貨，二方面亦讓現場的法國書商帶回法國，只要設法規避異端書刊的進口禁令即可。但自一五四二年起，法國當局開始有組織地對付產自日內瓦的書本；一五四八年的禁令，更全面封殺所有日內瓦的印刷品，此後這類書貨只能仰賴小販暗中零售。在日內瓦，每位印刷商都擁有自己的通路，由許多叫賣書販所構成，他們分別在不同的「轄區」兜售商品。這種勾當頗危險，書商得與遊走四方推銷員共同承擔各種虧損，俟書貨出清才結算、拆帳。不多時，奉命潛入法國的日內瓦傳教士，也仿效、組織此種通路，其中不乏改行的書商，而康拉德·貝德就是一例；他在一五六二年結束店面營業，前往奧爾林地區傳福音，後因瘟疫歿於當地。魚貫進入法國的異端書刊，若產自德國，則途經柯隆熱、聖尚德羅斯內、朗格勒、聖狄奇耶入境；若印於日內瓦，則取道熱克斯、薩伏伊、沙布萊斯一線，再從里昂轉往各地。

如此偷渡的可不是絕無僅有的寥寥數冊，而是一度多達百冊的書本，或打包裝箱，或塞進商人行囊，或搬上走販馬車。那個年代欠缺有效警力，途中被逮的風險甚低，或許只有城門守衛構成威脅。話說回來，一或幾箱的禁書，與成堆的合法商品並置，甚至爲了謹慎起見而夾藏在其他貨品之下，守衛要從何搜起？這麼一來，書籍運抵目的地就再無困難可言，其中先行運往巴黎或里昂者居多，而後分銷地方各省，最終無法順利送達書店者幾希。各地書商也頗願意收受這些貨，至少據我們所知，在圖爾、普瓦捷、昂熱、培里戈、博熱等地，都不成問題。若情勢順遂，某地區恰好處於某個相當包容異端的時期，當地書商有時候會在開放書架上，偷偷擺上一本異端書，與舊教書籍共置一處。只要書上打印的出版商資訊是捏造的（此爲常事），且能以近似正統信仰著作的外觀誤導不知情的人，即便是公然展售，風險也不至於太大。但大致說來，帶有新教色彩的書刊，多半還是藏於地窖，或存放在特別的儲藏室裡，儲藏室裡的貨品只賣給初識新教的民眾。憑藉此法，異端書籍通行八方，甚至闖進修道院和神學院裡。萬一苗頭不對，這些以八開或十六開發行的書本，也很容易藏匿³⁶⁸。土倫有位藥劑師，發現自己名列疑犯，索性把一己藏書埋進後院。其他尚有許多此類小書與短論的印刷本，被人藏在各式各樣的隱密處，過了許多年終於見天日。

地下的書本交易，究竟延伸至多廣袤的範圍，並不容易評估。畢竟又有誰知道，在那些看似空白的間隔地帶，有多少禁書亡佚？倒是這個行業的規模甚大，無庸置疑。這麼說是有憑據的，此處謹以德諾曼地舉證³⁶⁹。此君與喀爾文交好，與喀氏同樣出身諾洋，旅居日內瓦期間是活躍的律師，然他主要的精力還是用在出版與賣書方面，並控有龐大的地下銷售網。一五六三年時，光

是印刷商沛林的鋪子，就有四座印刷機爲他印書，可以想見應該還有其他印刷機供他差遣。他在一五六九年辭世時，店裡屯放了三萬四千九百一十二冊書。他與眾多書商直接接觸，藉此大量銷書，舉凡秀希、梅茲的波榭榮、錫斯特龍的馬何丹、雷姆的德烏和其他許多書商，都會向他批貨。不過，起用叫賣書販爲他效勞，才是他的拿手好戲；這些人是來自法國各地、與書籍產業有關的難民。伯納爾跟瓦列烏，便是其中的兩位，他們曾在一六五三年的十二月六日，收下德諾曼地寄出的書貨十七大箱又四捆，運回祖國求售。拉沃朵出身法國的哈佛爾德格拉斯，也在同月十五日受他之託返國兜售。巴隆以難民身分於一五五五年前往日內瓦，並向德諾曼地購買宗教書，返回法國叫賣。隔年他在普瓦捷被捕，死罪定讞後脫逃，稍後於馬恩河畔沙隆二度落網，一五五八年遭處火刑，命喪巴黎。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顯而易見的是，當局的鎮壓政策斬獲甚小，無力防杜異端教義書籍買賣擴散。喀爾文《基督教原理》淪爲查扣目標之後，君王法院於一五四二年通過一項敕令，旨在重整書籍產業。查扣的書籍悉數焚毀，至於流通這些書的叫賣小販，即自日內瓦取道安特衛普入境法國的安圖瓦尼·勒諾瓦，則被迫於聖康坦與巴黎聖母院的台階上，公開宣告自己棄絕新教主張。勒諾瓦接著慘遭流放，然新教的地下活動未受影響，就連一五四四年於聖母院門口焚燒一冊《基督教原理》的象徵性訓誡，效果也好不到哪裡去。雖有更多的教令與法規限制書籍買賣，異端書販屢遭追緝、逮捕之餘，更在一五五六到一五六〇年間成爲火刑場的常客，禁書照樣進逼法國，如入無人之境。

禁書席卷法國的程度，或可以宗教戰爭前夕出版的各種《詩篇》版本，做爲度量的依據³⁷⁰。

眾所皆知，新教會非常重視《詩篇》的吟唱；早期的宗教改革者，以馬羅與貝札的譯本為準，在普雷奧克勒或瓦席穀倉裡的聚會場合高歌。赴火刑柱就義的新教徒，與宗教戰爭期間馳援沙場的新教士兵，詠唱的歌曲亦同。雖說馬羅對《詩篇》的詮釋，在法國數度遭禁，卻還是贏得法蘭西斯一世的垂青與研讀，其子亨利二世不但自己唱，更常把各篇分別指派給多位貴族，於廟堂之上輪唱。無怪乎凱特琳·德麥迪奇（即法王亨利二世之妻，支持新教）會在普瓦西會談（一五六一年九月舉行，欲消弭新舊教間歧見而未果）終了之際接受貝札請求，將其甫完成的法文新譯本授權給里昂書商凡森出版。帕爾馬的瑪佳烈（西班牙統治下的尼德蘭總督）同樣包容新教，並於大約同一時間將類似的出版許可授予普朗坦。

從那時候起，凡森便著手進行空前龐大的出版創舉，旨在讓法國每位新教徒，都能擁有一冊屬於自己的《聖經·詩篇》。身為里昂的書商，凡森一方面與當地的浮瑞隆兄弟合夥，另一方面在日內瓦經營另一家出版社；那裡架設著四座歸他一人所有的印刷機，唯將書籍發包給其他印刷商承印亦不成問題。就這樣，日內瓦所有的印刷鋪，或經他勸誘，或自動自發，全都投入《詩篇》的出版工作，幾個月的光景，竟印出兩萬七千四百冊。至於里昂的印刷鋪，也為同樣的計畫努力著。凡森進一步善用手中的許可令，和梅茲、普瓦捷、聖洛、巴黎的印刷商簽約。巴黎方面計有十九家較為重要的印刷商與出版商加入此行列，不只幫忙發行《詩篇》，還允諾提撥獲利的百分之八，逕捐巴黎新教會的貧困信眾，幾個月內完成的《詩篇》印刷本，同樣數以萬計。法國宗教戰爭爆發之前，竟有如此群策群力的異端書刊大量印製，迅速而激烈的反制之舉，自是在劫難逃。包括古堯姆·勒諾瓦、勒普路、歐丹·佩堤等，在與凡森締約的巴黎地區出版業要人中，有

好幾位進了監獄。「改信舊教，或連夜潛逃」的兩難，終於來到必須抉擇的時刻。在新教印刷商當中地位顯赫的浩爾廷家族，選擇遷往拉羅榭；前文提過的安德列·魏卻爾逃至法蘭克福；勒普路與尚·佩堤三世則出奔洛桑與日內瓦。同一時間，除了剛剛揭開序幕的宗教戰爭，尚有更進一步的新教宣傳戰，以各地忙碌的印刷鋪為基礎，推出各種小冊與宣言，投入戰局；不過這已經是後話了。

四、印刷和語文

一如印刷助長了宗教改革的茁壯，對於歐洲現代語文的定型，它的出力也不少。十六世紀開展之前，西歐諸國的民族語言，發展成書寫語文的時間雖有先後不一，卻都緊緊跟隨著口說語言持續演化。就是因為這樣，《武功歌》（以查理曼大帝及其麾下俠客為主角的英雄史詩）以法文書寫的樣子，在維雍改編時的十五世紀，儼然已與十二世紀大相逕庭³⁷¹。進入十六世紀，書面文字的演變開始停下腳步，至十七世紀歐洲語文的樣貌更與今日大同小異。在此同時，中世紀通行的一些書寫語文佚失，或在此後逐漸變成純口語的溝通方式，愈來愈少人用它來寫字，像是今天的普羅旺斯語跟愛爾蘭語。最終就連拉丁文的使用頻率也驟減，並慢慢地宣告死亡。

這也就是說，單一的書寫語文之所以能在相當遼闊的疆域內確立地位、通行無阻，乃是歷經了統合、整併的過程而致。今日隸屬於諸民族的語文，當時分別在各自的疆域裡或多或少地迅速發展，取得決定性的地位。至於字詞的拼寫法，則日趨固定，字母組成與發音之間的關聯也愈來

愈不明顯，有時更因為古代語言的影響而轉趨複雜。促成這種演化的因素，當然不只印刷書一端。長期以來，各國總理官署使用的官方語文，皆試圖爭取廣泛的認同與應用，並在很多例子裡化身為寫作語文。到了十六世紀，中央集權、君主統治的民族國家，或逐漸成形，或日益強大，有利於民族語言大一統的趨勢。法國與西班牙的國王，尤其明顯地以政策實現此一目標。話雖如此，在國族語言的發展上，印刷術既深且遠的影響，自比其他因素更勝一籌；梅頤與布盧諾這兩位語言學家，都曾強調過這點。出版商之所欲，無非是盡可能地滿足最大的市場需求，當然樂於推廣方言的新用途（即用來印書）。更重要的是，機器打印在頁面上的文本，是恆常不變的，根據梅頤的說法，這就使得書籍免於橫遭竄改，畢竟「抄寫員特有的習慣，是在抄謄的同時修飾內文，使之較具現代感；這一部分是有意識為之，一部分是不自覺的」。一旦由印刷匠接手了抄寫員的工作，前者便著手消弭文本裡各種隨興的單字拼法，與方言獨有的習慣語彙，從而使更廣泛的讀者能立刻讀懂書中的意思。

文藝復興固然掀起了復古學術風，但在十六世紀裡，拉丁文還是開始失去立足之地。一五三〇年以降，此一趨勢愈發明顯，說來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一如前述，愈來愈多的一般民眾與非專業人士，從那時起開始加入閱讀的行列，當中有頗多是婦女與生意人，不少人幾乎不識拉丁文。宗教改革領袖以當地方言撰寫宣教作品，就是為了顧及多數人；就連人文主義者，一旦必須訴諸較廣大的讀者時，也不吝於放下身段，採用同樣的語文媒介表達理念。以義大利為例，如此現象已然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很早之前，即有佩脫拉克以義大利文寫作，這樣一位復古楷模尚且

如此，自然更能說服同道中人拋開疑慮。比岱曾自友人拉斯卡里斯處，收過一封希臘文書信，並在國王面前即席翻譯，對此甚為自豪，然他臨終前所寫的《公侯論》，仍以法文成書。換種看似怪誕的角度來說，古典學術的中興，反倒促成拉丁文的死亡。一如布盧諾強調過的，一味追求純粹拉丁古風的西塞羅主義，雖然擺脫了常見的偏邪文法與蠻夷鄙語之弊，卻也逼得寫作者迂迴表意堆疊詞藻，反而自暴其短；文人爲了明確傳遞新理念，最後還是得棄絕僵化的拉丁文³⁷²。

十六世紀的一百年裡，方言著作的發行，占書籍總數的比例愈來愈高，算不上值得意外的事；可惜，相關的佐證數據，都無法反映全面的情況。然而從一五〇〇到一五四〇年間，安特衛普出版的兩千兩百五十四種書籍裡，法蘭德斯語有七百八十七種、法文一百四十八種、英文八十八種，至於丹麥文、西班牙文與義大利文加起來也有大約二十種，幾乎達到總數的一半；這些數字雖是一時一地的管窺，仍有重大意義³⁷³。安特衛普係一商業重鎮，當地書商的客戶，想必至少有一部分是新近發跡，但肚裡墨水不太多的生意人。但就算是安特衛普以外的地方，相同的趨勢還是廣泛地出現。在一五〇一到一五一〇年的亞拉岡地區，出版了二十五種拉丁文作品，多過西班牙文的十五種，且前者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裡激增至一百一十五種，同期的西文書竟不超過五種；但在二五四一到一五五〇年間，拉丁文書籍又驟減爲十四種，讓西文書以七十二種超前³⁷⁴。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該光憑這些證據就草率地下結論，一如書目考證顯示，十六世紀印製於英格蘭的書籍主要是英文作品，未必代表英人少讀拉丁文書。由於英格蘭與西班牙所需的拉丁文書，也有自法國、德國、低地諸國進口者，單就這點來看，英格蘭與西班牙的印刷業，係以彌補西歐各國之不足爲其功能。倒是從巴黎產製的書籍，可以一清二楚地辨識出現代語言的發展軌

跡。一五〇一年裡，當地印出八十八部作品，其中僅八種法文書，而在一五二八年，兩百六十九種書裡也只有三十八種是法文作品。但到了一五三〇年，隸屬今日法國疆土的所有地區（包括亞爾薩斯）內，就有一百二十一種法文書與十種德文書問世，而出版總數不過四百五十六種。一五四九年裡，巴黎一共印出三百三十二種書，其中法文七十種；而在一五七五年，法文書的數量已然過半，在四百四十五種中占去兩百四十五種。新教的小冊與傳單，固然是法文印刷品的大宗，但就算在宗教戰爭落幕之後，巴黎所印之書，終究還是以法文居多³⁷⁵。

在路德生平的幾十年間，拉丁文在日耳曼國度的式微，比鄰邦的情形更快，只是單一民族語言的進展腳步卻沒有跟上。衛勒的書目研究頗欠完整，但至少列出了一五〇一到一五二五年間，以德國各地方言印成的四千多部作品。一五二〇年之後，方言成爲大勢所趨，這都得感謝路德的宣教。比之於一五一九年裡僅有的四十部德文作品，一五二一年的德文書增爲兩百一十一部，一五二二年有三百四十七部，一五二五年又攀升至四百九十八部，其中光是路德的各種作品就包含了一百九十八部³⁷⁶。宗教改革運動期間，德文書始終都是主角，倒是在稍後拉丁文又恢復了一陣子的地位。一如前述，至十六世紀晚期，拉丁文作品明顯地變成法蘭克福市集的主力商品。想當然耳，這是因爲許多供應本地市場的德文書沒有列入市集目錄的緣故，但光從表象來看，則這期間印出的拉丁文書似乎較多，呼應了天主教的漸占上風。而後進入十七世紀，萊比錫的市集取代了法蘭克福，最後的勝利仍屬於德文，只是比其他現代語言晚一步罷了。

印刷術帶來的語言統合歷程，對於德國寫作語文的成形，貢獻特別顯著³⁷⁷。當然，在印刷機誕生之前許久，通用語文已經在各國的總理官署發展起來；此係專業的公文書起草官員，極力追

求文意明晰精確的成果。而在十五世紀後半，印刷術的影響尚未全面展現時，一套標準的文體與拼字原則已然嶄露頭角，並得到德國知識份子圈內重要團體的認可，視之為書寫語文的正規形態。現代德文即是源於此種語文³⁷⁸。

即便如此，路德在印刷術的幫助之下，仍舊扮演德文發展過程中的關鍵角色。據他自己所言，他希望自己的理念「能同時為北德與南德的民眾所理解」；這個目標使他擬定出一套原則，用以構築他的書寫語文。更因為其作品（尤其是《聖經》譯本）廣為流傳，路德才有機會成為「德文規則的起草人」。但他的語文改造志業並未一夕功成，畢竟德國各地的方言南轅北轍難有交集，而起初的他並沒有體認到這一點。是以他早先的寫法屢有變化，在一五二四年之前都沒有按部就班的方法可言，而後才著手把德文字的拼法簡化，像是廢除了雙子音（即 *nn*、*mm* 等）的單字結構等。

建立一種所有人都能即刻看懂的語文，則文法與字彙必須標準化，其重要性更勝拼字的統一。為此，路德非得努力擺脫「己母語（即下薩克森方言）」的影響不可。除此之外，他住在圖林根與薩克森的時間甚長，自然對薩克森公國總理官署的洗鍊語言最有好感，並視之為理想的模範與靈感的主要來源；但他賴以寫作的文法，還是長期流露著地方方言的痕跡，佐證他不厭其煩的努力，無非是為了解脫個人的偏好。至於他主要的關懷則是字彙，不僅尋找最精確的字眼來表意，更同時從許多同義字當中，挑選尋常百姓最熟悉者用以寫作。本著這項宗旨，德國中、南部地區最普遍的口語講法，成為他取材的對象，唯其著述的基本字彙終究源自圖林根與薩克森。

就因為這樣，路德塑造的語文，比起當時他的大多數同胞所說所撰，更加接近現代德文的樣

貌。他的作品富於文學氣息，銷路甚佳，新舊約譯本又被死忠支持者賦予幾近神聖的地位，這一切種種都令他的語言昇華成廣獲採用的範本。操標準高地德語的讀者，可以馬上理解其文意，至於巴伐利亞人與士瓦本人，乍讀之下可能一頭霧水；但到了最後，隸屬德文大家族的所有同義字群裡，最獲廣泛使用的幾個單字，幾乎都是路德開風氣之先。許多字詞本來只有德國中部居民懂得，亦是在路德的影響下，終於推廣到整個德語區。他所選用的字彙，武斷而不容質疑，幾乎沒有印刷匠膽敢替換其中任何一字。縱然巴塞爾、奧格斯堡、紐倫堡、史特拉斯堡等地，有些印刷師傅更動了原文字彙的拼法，但用詞遣字卻不曾被擅改。一旦遇上路德選用的語彙是某地民眾無法明瞭的，當地印刷商也只是加印難字表，逐條解釋之。

如此一來，高地德語便確立了優勢地位，印刷術也令更多高地德語書籍流通於世，從而使其日耳曼族寫作語文的姿態日趨明朗。不過，僅以路德一人的作品為範本，過不了多久就顯得捉襟見肘，亦有人開始體認，想要更有方法地學習德文，文法實不可或缺。大約在一五二六年起算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德文文法這個先前幾乎無人鑽研的課題，開始浮上檯面。起初的文法書係以拉丁文撰寫，最有名的要屬《路德譯經之德語文法暨相關書選》，由萊比錫的卡拉儒斯於一五七八年出版；爾後，這種由路德決定其基本特徵的語文，遂在各地的新教徒圈子裡散播開來，天主教徒雖然拒斥，終究還是得順應時勢。

德國之外，其他國家的印刷業，同樣藉著多種方言文本的大量印刷，促進了該國寫作語文的進步與系統化。在英格蘭³⁷⁹，宗教改革的效應令《聖經》與其他宗教作品的譯本得以出版，而這

此譯者的語言注定成爲深刻影響英文發展的力量，一如路德之於德文。在丁道爾與科佛戴爾相繼譯經之後，又有各種譯本承襲他們首開先例的志業，並在一六一一年《欽定本英文聖經》問世時達到高峰，成就了英語散文發展史上傲人的一頁。其實在此之前許久，似乎已有一些作品激發出英國人對民族語文的自豪，其中功勞最大的，應是一五四九年的《平民禱本暨聖餐禮程序》。此書在一五六七年復行增補，添上斯登霍德與哈普金斯以韻文譯成的《詩篇全書》。它們之所以易讀易懂，實是因爲其中援用的字彙非常有限，只有六千五百多個不同單字（莎士比亞用過的單字多達兩萬一千個）；至於書中的許多詞語，則很快地通行開來，一如路德作品在日耳曼的情況。印刷術替這些譯著生產出數以萬計的印製本，同時固定了英文的樣貌。此時的英格蘭，書籍事業堪稱蓬勃，但還是有許多書籍進口自法國、西班牙爲首的歐陸國家，尤其是在一五四〇年之前。除了譯自進口書的許多作品之外，英文版的拉丁文、希臘文古書譯本也旋即流行。多虧了這一段翻譯與出版的歷程，即將定型的英文才得以吸收許許多多的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措詞，變得更加豐富。就是因爲英文接受的異國語彙甚多，十六世紀末還出現激烈反對外來語的聲浪，反映出這種民族語言發展的實質危機。

英文文法書的印製，當時也有增多之勢，至於單字拼法的確定則比較緩慢；作者即將付印的手稿，有時會由印刷商主動校訂，有系統地去除文中累贅而罕見的拼字。只消把留存至今的手稿與其付梓之後的成品相互對照，就能清楚看出，印刷商爲了求取拼字的規律與統一，付出多少努力。下面的例子出自哈林頓翻譯阿里奧斯托的原稿與印刷本³⁸⁰：

	原稿	印本
	bee	be
	on	one
	grief	grief
	these	these
	sword	sword
	noorse	nurse
	skolding	scolding
	servaunt	servant

一旦印刷術將民族語文提升至國民文學表述媒介的地位，並同時建立起拼字、文法、字彙運用的標準化通則，基本規律即告確立，印刷商也就隨之退守本分。他們固然可以試著更進一步，大刀闊斧地創造新語，條理分明地自定語法，卻都沒有踰矩，唯恐做得太過火。在拼字的問題上，他們的躊躇不前尤其強烈；一如前述，路德同樣是在這個領域，對德文的影響最不明確。雖說英格蘭印刷商已將文中可能妨害閱讀的異常拼字剔除大半，仍然饒過了許多其他的怪誕拼法。倒是法國印刷商對拼字問題的處理，最值得仔細探討；不為別的，只因爲他們在字母增刪上所受圍限，可能比其他國家的同行更爲明顯。十六世紀的法國，一如其他地方，通用口語穩固地成爲民族寫作語文的基礎，同時也有許多人努力豐富法文的內涵，並編纂語法規則³⁸¹。到這個階段，

書面語文業已享有相當程度的規律性，這主要是因為法國的王室總理官署與各級法院的司法工作者，書寫的傳統已經發展了幾百年，再加上較為中央集權的國家，君主意志容易貫徹所致。這便使得絕大多數的法國印刷商，變得相對保守，敢在拼字上創新的人只有幾位。為了避免自己的書籍存貨滯銷，也避免工作內容變得複雜，最符合法國印刷商利益的實際做法，乃是盡可能避免大幅度更動，維護、延續既有成規，不強求內文符合嚴苛的字詞規則，在拼字問題方面尤其如此；總的來說，就是寧可讓寫作語文歷經較長的過程才塵埃落定，以便順應最穩當的既定做法。然而，部分的人文主義印刷商，在羅馬體與斜體字在法國各地廣泛應用之際，尤其是一五三〇年前後開始，變得更勇於破除舊例，從而躋身第一批法語改革者之列，卻不能說是意料之外的發展。在這些人當中，曾經擔任杜普萊西學院教授的托利，雕版工夫頗為精熟；因為久居義大利，產自義大利的範本，便成爲他的靈感泉源。讓自己的母語能像希臘文或拉丁文那般，洗鍊而有規則可循，則是他的宏願。一五二九年，名著《野花集》出版，他對視覺設計的興趣，終於有了表述機會。根據他在書中詳細闡釋的驚人理論，大寫的羅馬體字母，設計時可依人體比例做爲參考準則。他也藉此書歌頌法文，比杜貝萊早了二十年。更重要的是，他用各種角度研究法文字母的成敗，亦在此書呈現，不僅示範了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在字母發音上的異同，還分別記載法國境內不同地區的發音法。

在此同時，他建議法文的拼字應行改革，提倡重音符號、♀尾符號（即♀下方的小鉤）與省略符號（反逗點）的使用。在他一五三三年出版的兩部書，《少年版格勒孟書》與《法文書寫規則特性簡述》裡，托利實踐了自己的改革主張；此後，拼字法應否變革的大哉問，成爲公眾辯論

的課題。篤布瓦於一五二九年出版《法文拼字藝術與學理之實用成規概論》，倡言數種簡化的辦法，而在這之後，又有與托利同屬人文主義印刷商的多雷，於一五四〇年出版《一統語文之正確變易法則：兼論法語標音符號之長處與地方腔調》，書名雖然冠冕堂皇，多數內容卻抄自《法文書寫規則特性簡述》。至此，幾乎每一位有意提升法文格調的文人，都像著魔一般執著於拼字問題。到了一五三五年，翻譯《聖經》的奧里維坦一度表示，希望「未來能有一套可長可久的規則，解決此一爭議」。梅格列一五四二年的作品《法文書寫通則之相關特徵》，與他後來的著述試圖解決的，正是同樣的問題。他是推動拼字法根本變革的代表人物，把各種拼字疑義視為一個整體，倡導「省略不必要字母」（以un代替ung、aure代替aure、renars代替renards）、「替換爭議字母」（以ombre取代umbre、maintenant取代meintenant、manger取代manjer）、「以字母變化區隔發音變化」（o唸成開放母音時以o代替，例如mort應作mort）等觀念。

本書要旨並非探討梅格列著作所引發的爭論，故相關細節無需贅述。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創新人士率先提出的主張，雖有當時最富盛名的一批作家在背後支持，卻沒有什麼成果可言；主要的原因，終究還是安於現狀的慣性，阻礙了語言的徹底改革，此乃各國語言發展的普遍現象。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此一課題的最終決定權，操在印刷商手上，一旦他們之中多數人寧可墨守舊例，推動變革當然失敗。部分文法學者，諸如杜曼與蘭堡，認為替法文設計全新的字母系統，才是最好的辦法，奈何支持兩人看法的幾位印刷商，不曾得到同行的響應。博列烏曾經費心研究巴黎大出版商蘭熱黎爾發行過的書籍，尤其針對先後於一五四九年與一五五七年推出的兩版《法文的捍衛與宣揚》，鉅細靡遺地比較，結果發現，即便是在同一家出版社裡，慣例也會變化。字母

「y」在一五五七年已不若一五四九年時受到重視，曾在一五四九年一度援用的「é」到一五五七年則常被剔除不用；至於ç尾符號，早先即已出現在托利和奧熱羅的出版品裡，蘭熱黎爾卻到後來才漸漸採用。

長期以來，拼字一直任憑印刷工頭與組版員隨意更動，作家對此縱有微詞也莫可奈何。不過，標準終究還是一點一滴地固定下來了，這與其說是創新派語文理論家的發明，不如說是習慣漸變的結果。事實上，十六世紀最致力於法文拼字法則確立的，乃是人文主義印刷商侯貝·埃蒂安納，但他的變革方法格外保守，且其影響力並非來自他所建構的理論，而是他所出版的字典。

侯貝是印刷商亨利·埃蒂安納一世的兒子。他生於一五〇三年，故能充分利用文藝復興新人文研究的成果。比岱不僅是他的摯友，在出版上更常常與之合作。侯貝最關心的，始終是如何出版最正確的《聖經》文本，除了孜孜不倦地解決相關問題，也在字典編纂的領域上付出大量心力。卡利庇諾的拉丁文字典，在當時堪稱權威，曾有人建議他修訂、重印這部參考書，他卻寧願從零開始，編纂全新的《拉丁語典》，一五三一至一五三二年間首度成書之後，又在一五三六年推出加大開本的新版。《拉丁文—法文字典》問世於一五三八年，是他專為學生出版，長期以來廣受歡迎，前文已有述及；一五三九到一五四〇年間，他的《法文—拉丁文字典》終於推出，此書於一五四九年發行的二版，體積只有初版的一半。在這之外，他還以這兩本大字典為基礎，編輯過兩部詞彙書，分別出版於一五四二年與一五四四年，供課堂講解之用。

在編輯字典的過程中，埃蒂安納自然而然地深刻涉入法文拼字的各種問題。他曾參考篤布瓦與梅格列倡議的文法規則，但努力的重點仍在追求與王室總理官署、財政部、君王法院的拼字慣

例一致。尤有甚者，由於他想當然耳地認定，法文字彙與其拉丁同義字彙間，必然有所關聯，故字典中某些法文字的拼寫，甚至遵從拉丁單字的形構，實則值得商榷。如此研究成果毫無革命性可言，卻不失為方便的參考依據，同時贏得了印刷業與法律界的支持。結果，他的字典迅速成為拼字學界廣獲認同的權威。

但是，天馬行空的怪拼字，還是存在了頗長一段時間，直到十七世紀，即沃熱拉、梅納日與《法蘭西學院字典》的時代揭開序幕，才真正改觀。拼音的標準化，乃是緩慢漸進的過程，過程中，來自荷蘭與法蘭德斯印刷商的影響，諸如普朗坦、艾齊維埃家族等，皆不宜小覷。身為法文書籍的大宗出版商，他們遭逢的棘手難題，在於麾下的印刷師傅只懂得粗淺的法文，卻得用法文活字來組版。爲了避免不忍卒讀的錯誤，他們開始在某些出版計畫裡，推動有系統的拼字簡化。對語言相關問題頗感興趣的普朗坦，想必是在安特衛普那樣的大都會裡，覓得了足夠的資料，並在幾經反思之後，成爲法蘭德斯出版商當中，領略法文拼字系統簡化有何好處的第一人。第一批由他發行的書籍，與他後來的出版品，除了採用字母「j」，省略字尾的字母「x」之外，還效法詩人龍薩的辦法，把許多累贅的中間音字母，一概改寫成重音符號。一五六〇年，《阿瑪迪的寶藏》出版，他藉著作序發表一篇類似宣言的文章，宣告他已用「e」取代「es」(文中的 *prestes* 皆改爲 *prêt*)、以 *oultre* 取代 *mieux*、以 *mieux* 取代 *mieux*。爲避免外銷法國的業績折損，他所發明的簡化拼法，後來有一部分被他自己棄置不用，但在他的法文—法蘭德斯文字典裡，援引的拼法仍比當時通行者簡化許多。低地諸國其他的印刷商，遂起而效尤，專門出版字典的偉斯伯格即是一例；至於有系統地採用「j」、「v」等字母的艾齊維埃家族，令這些新字母的應用

轉趨普遍，更是重要的後繼者。換句話說，來自異國的印刷商，憑藉成千上萬銷往法國書市的印刷品，對於法文拼字的標準化，亦有相當貢獻。也因為這些印刷讀物的活字排版品質甚高，甚至贏得法國學界人士的讚賞。

不論印刷商對於拼字法變革持何種態度，可以確定的是，印刷業對於方言著述的成長，大致而言仍是一股助力。民族語文遂在印刷術的助長之下，化身為日益精巧複雜的表述工具，並在十六世紀裡憑藉堅實的基礎，各自發展出分屬各國的民族文學。在此同時，各國語言文法的制定，也有相當普遍的進展。西班牙方面，德內布里亞在一四九三年出版了他的《卡斯提爾語法》，雖於十六世紀遭巴爾德斯批判，卻還是成為現代西班牙文確立的重要基石，並驅使整個西班牙接納了源自卡斯提爾的語文傳統。亞拉岡地區的印刷商與作家，主要也是受到這股影響力的帶動，放棄出版原本蔚為特色的方言習癖，向語文統一之路邁出重要的一步³⁸²。至於十六世紀的法國，不僅有眾多的文法學家，包括杜貝萊在內的語言研究者、文體理論家，更是不勝數。在日耳曼地區，書面德語的文法，於十六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內形成常規，乃是文法學者參考路德著述的結果，前文業已敘述。歐陸以外的英格蘭，亦有史密士、哈特與布洛卡等理論家，先後在一五六〇、七〇、八〇年，發現英文拼字受印刷術影響轉趨確定之後，發音與拼字的關聯日漸薄弱，故倡議徹底改革。在此同時，早在一三〇四到一三〇六年間即有但丁創作《論通俗口語》的義大利，開始出現當代義大利文的文法書與字典。包括馬基維利、本博、特里希諾在內的許多文人，在研究本國母語之餘，也試著擬定其文法規則。這個時期裡尚有斯佩羅尼以體現義大利文優異特質為著眼點，提出一套獨創的說法；杜貝萊在《法文的捍衛與宣揚》一書中所倡議者，即脫胎於

斯。然而，義大利境內多種方言，究竟哪種最有資格奉為首要語文，卻引發激辯，阻礙了理論的進展。該國沒有中央集權的政治力量出面律定何者為官方語言，也欠缺像路德那樣一呼百諾的權威人物，使得辯論持續了頗長一段時間；到底應該直接把托斯卡尼語當成寫作語文，還是綜合各地方言另創新語，叫人莫衷一是。

至此，拉丁文式微已成定局，唯幾經掙扎，還是殘存了一段不算短的時日*。拉丁文的優勢，在於不同國籍的文人皆解其意，而這種國際語文的地位，也得以長期延續，尤其在學術圈裡，甚至幾度迴光返照，似欲收復失土。不過，十六世紀裡，原本以拉丁文寫成的學術典籍，已偶有翻譯或改寫的版本問世，諸如法國比岱的《論錢幣》和查理·埃蒂安納的《解剖學》。尤有甚者，此一時期的貝隆，乃至於後來的帕壘、帕利西等人，直接用法文寫書；只是這些例子不但少見，帕壘還因不用拉丁文寫作，招致巴黎大學醫學院的怒目相向。就立場言，天主教會反對方言的使用與發展，支撐拉丁文免於衰敗，有別於新教。宣揚科學新發現的著作，只要以拉丁文成書，舊教多半認可；俟學界開始使用尋常讀者看得懂的普通語文傳播新知，舊教又予譴責。是以學者常常擇拉丁而棄俗語，既能為學術圈的同儕所理解，又能免於叛教罪名，可謂一石二鳥。

隨著反宗教改革運動在歐洲許多地方高唱凱歌，耶穌會士也針對智識領域當中最活躍的幾個社會階層，廣興學院以傳布拉丁文知識，為了振興拉丁新文學的發展，甚至以戲劇為媒介，試圖

*以下由史戴格曼先生提供的史料，說明了當時的情況，謹此致謝。

爲其注入新生命。拉丁劇場在這個階段大爲風行，諸如人文學家格勞秀斯的拉丁悲劇，或是師承魯汶大學利普修斯的維努爾茲筆下本事，皆馳名歐洲各地，廣獲討論。另外，這種文人眼中最尊貴的語文，還被用來書寫最高貴的詩詞形式，史詩，是以十七世紀間付印的拉丁文史詩，數目之多實難計量；舉凡皇室聯姻、貴胄得子、征戰告捷，即便只是寫成史詩也湊不滿十五行的小事，稱頌時仍得祭出拉丁文。以慶賀路易十三攻陷拉羅榭的數首史詩爲例，作者包括義大利人、法蘭德斯人、德國人與法國人，幾乎每一位都用拉丁文下筆，就連能寫法文的後者亦然。倒是馬萊伯爲此一事件創作的頌詞採用法文，宜以特例視之；受到他的影響，愈來愈多的頌歌改用法文寫作，可見拉丁文的勢力並非沒有消退，只是速度非常緩慢。將拉丁文推向衰亡的最後一擊，可能是一六三〇年前後法蘭克福市集的式微，以及書籍生意的分區化。拉丁文較晚棄守的一些地區，則要等到十七世紀末，甚至十八世紀初，才由現代的各地方言全盤取而代之。

拉丁文何以頑強地殘存，有許多可能的解釋。首先，它一直是最多人使用的跨國溝通語文。一個國家的民族語言，愈沒有外國人懂得，該國以拉丁文寫作的傾向就愈強；如此情況不只發生在法蘭德斯，就連一六四〇到一六六〇年間，與庫黎努斯往來密切的許多德國法學家，亦以拉丁文出版作品。英格蘭的情形同樣證明了這點。莎士比亞也好，都鐸王朝其他的劇作家也罷，因以英文創作，在歐陸鮮有人知；反而是康登、霍布斯、巴克萊與諷刺詩人歐文，作品多爲拉丁文，暢銷程度便不亞於歐陸文人著述。西班牙、義大利與法國，也許較少使用拉丁文，但若訴求的對象爲廣大的泛歐讀者，仍不得不藉拉丁文之力；利害關乎兩個以上國家的宗教、政治、文學、法律爭議，尤其是拉丁文的勝場。作家宜用哪種語文寫作，終究還是取決於心目中的讀者爲何。是

以在羅馬擔任耶穌會英格蘭學院院長的費茲赫伯，爲了勸說家鄉的英國國教徒改信天主教，當然得以英文撰寫神學短論，一旦爲文批判馬基維利，則又改用拉丁文，好讓歐陸的讀者都能看懂。身兼神學家與巴黎大學校長的斐勒薩，曾於一六〇六年以法文針對一項關乎法國利益的教會法典議題做出宣判，事隔十年則又針對當時激烈爭辯的王權限度問題，發表兩篇拉丁文論文，好讓自己的論點能在法國以外贏得認同。「紅衣主教」黎塞留公爵一派的舊教宣揚者也不例外，其中有位希爾蒙神父，在義大利戰爭與「最虔誠國君」（係法國國王自道之詞）向新教徒靠攏等問題的態度上，淪爲瓊內神父攻訐的對象，其自辯即以拉丁文寫成。另一方面，法蘭德斯與低地諸國的烽火，刺激了許多小冊書的出版，但這些記錄戰事的史料，卻有不少是先用該國語文寫成，再譯成拉丁文；在德國境內舉辦市集的各城鎮，拉丁譯本尤其常見，以爭取更廣泛的讀者。許多文學創作，同樣是在原初的方言版本風行之後，方才發行拉丁譯本，其中又以悲劇劇本和史詩最多。

拉丁文的長處，像是指涉精確、表意清晰等，無疑地展延了這種語文的壽命。面對不斷發展、不時變化的各種現代語言，拉丁文的優勢，在於擁有一套固定的字彙，且每個單字的定義皆易釐清，只要參照知名的權威文本即可。它所以在十七世紀裡，繼續扮演外交、科學、哲學語文的角色，想必有一部分的理由，跟此種優勢有關。雖然醫學界使用拉丁文的頻率逐步減少，數學與天文學，依舊靠它來溝通。

笛卡兒係以法文完成《方法論》一書，但他和數學家巴斯卡一樣，絕大多數情況下都用拉丁文寫信。《默思錄》的內文深具權威性，被人視爲拉丁文的範本，更是文人在闡明某項晦澀論點時必須訴諸的語言，而這也是法文不及之處。即便到了一六六五年，曾以法文演繹史詩鉅作《聖

女》的夏普蘭仍然發現，用拉丁文出版的科學著作，可以吸引更多讀者。一直要等到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豐特奈爾的時代，《法國科學院回憶錄》才以法文書的型態問世；至於萊布尼茲與同期的許多德國人，還是習慣用拉丁文寫文章。一言以蔽之，其他民族語文推翻拉丁文的地位，乃至於法文取代拉丁文成為哲學、科學、外交場合的通用語文，都是十七世紀末葉才有的現象。進入這個階段，歐洲的智識圈裡，人人皆得學習法文，而法文的出版品，亦由法國籍或出身瓦隆地區的流亡書商，在全歐各地販售。培爾、巴斯納吉、勒克勒格，以及眾多仿效他們的人，則投身法文學術期刊的編輯，同時滿足不同國家的讀者。

即便拉丁文在十六世紀式微，文學作品與知識學習，依然是跨國界的。一如前文所示，只要是引人入勝的書籍，不管用哪一種語言出版，都會衍生出多種語文的譯本。但另一方面，文藝世界的分區化，正一點一滴地發生作用。十七世紀的法國人，對莎士比亞能有多少認識？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對當代德國的著述，又知道多少？一六三〇年的法國，就有夏普蘭這樣抱怨著：法蘭克福市集式微之後，德國地區出版的新書，他已無從認識。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英國文化除了借助荷蘭期刊之力，再無其他傳往法國的管道。法文本身固然在十八世紀升格成首要的國際語文，奈何始終無法完全填補拉丁文消逝所留下的永久真空。這也就是說，書籍產業為牟取經濟利益而鼓勵書刊以民族語文出版，最後則助長了這些語文的茁壯，同時造成拉丁文的衰微。如此發展不僅決定了歐洲語文往後的命運，也確實標記著一種廣大民眾文化的濫觴；此一歷程一旦觸發，便會導致深遠而難以逆料的影響。各種的方言，受惠於印刷機的力量而勃興，終究瓦解了萬流歸宗的歐洲拉丁文文化。

注釋

■ 半抄本

- 1 W. Wattenbach, *Das Schriftwesen im Mittelalter*, 3rd edition, Leipzig, 1896; J. W. Thompson, *The Medieval Library*, Chicago, 1939 (Bibliography); Mgr Lesne, *Les Livres: scriptoria et bibliothèques du début du VIII à la fin du XI Siècle*, in Vol. 4 of the *Histoire de la Propriété Ecclésiastique*, Lille, 1938.
- 2 Douet D'Arq, *Comptes de l'Hôtel des Rois de France aux XIV et XV Siècles*, Paris, 1865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pp. 64, 67, 97, 101ff., 151, 160, 162, 183, 224, 231, 233, 332, 334.
- 3 J. W. Thompson, op. cit.
- 4 Douet D'Arq, op. cit.
- 5 A. Ruppel, *Johannes Gutenberg,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Berlin, 1947, p. 141.
- 6 On this, see Mgr Lesne, op. cit.; J. W. Thompson, op. cit.
- 7 R. R. Root, 'Publication before Printing', i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MLA), XXVIII, 1913, p. 417.
- 8 P. Delalain, *Étude sur le Libraire Parisien du XIII au XV Siècle*, Paris, 1891.
- 9 *Ibid.*; and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ed. H. Denifle and E. Chatelain, Vol. 1 (1889), Vol. 2 (1891), Paris, 1889-97, 4 vols.
- 10 J. Destrez, *La 'Pecia' dans les Manuscrits Universitaires du XIII et du XIV Siècle*, Paris, 1935.
- 11 D. A. Callus, 'Introduction of Aristotelian Learning to Oxford',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XXIX, 1943. St. Bernard complained about the popularity of Abelard's ideas, altogether too hasty in his view. When Abelard was expelled from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paid for private lessons from him. Cf. *Patres Latini*, CLXXXII.
- 12 L. Delisle, *Recherches sur la Librairie de Charles V*, Paris, 1907, 3 volumes, one of plates.

- 13 E. Faral, *Les Jongleurs en France au Moyen Age*, Paris, 1910.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fascicule 187).
- 14 R. R. Root, loc. cit.
- 15 L. Delaisé, 'Les Chroniques de Hainaut et l'Atelier de Jean Wauquelin à Mons', in the *Bulletin des Musées Royaux des Beaux-Arts*, Brussels, 1955.
- 16 L. Delisle, *Le Cabinet des Manuscrits*, Paris, 1868-1881, 3 Vols. Vol. 1, p. 102.
- 17 On royal patronage in the 15th century, see Doutrepont,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à la Cour des Ducs de Bourgogne*, Paris, 1909, and A. Coville, *La Vie Intellectuelle dans la Domaine d'Anjou-Provence de 1380 à 1435*, Paris, 1941.
- 18 Nicole Oresme, *Le Livre des Éthiques d'Aristote*, published from the text of MS. 2902 in the Belgian Royal Library, by A. D. Menu, New York, 1940.
- 19 H. Loomis, 'The Auchinleck Manuscript and a possible London bookshop of 1330-1340', i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LVIII, 1942, p. 595-627.
- 20 J. J. Guiffey, *Inventaires de Jean, Duc de Berry, 1401-1416*, Paris, 1894-96; M. Thomas, 'Recherches sur un Groupe de Manuscrits à Peinture du Début du XV^e Siècle', in *Bulletin Bibliographique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Arthurienne*, 4, 1952, p. 81-89.
- 21 H. Martin, *Les Miniaturistes Français*, Paris, 1906.
- 22 L. Delisle, *Le Cabinet des Manuscrits*, passim.
- 23 On illuminators' workshops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15th century, see the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ion, *Manuscrits à Peinture du XIII^e au XVI^e Sièc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55. Reviews of this have been compiled by Jean Porcher, with an extensive bibliography.
- 24 The Tenth Congress, Rome, 4-11 September, 1955, in *Atti*, Florence, 1955, p. 152 ff.
- 25 H. S. Bennett, 'The Author and his Public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y', in *Essays and Studies by Members of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XXIII, 1938, p. 7 ff.

■第一章 前奏：紙張傳入歐洲

- 26 造紙術如何從亞洲傳播至歐洲，不在本節探討範圍內。無疑地，西班牙確是歐洲第一批造紙廠的所在地，其所製造的紙張亦為其他國家所用；不過，這種造紙產業卻是肇始於義大利，並從義大利傳往歐洲其他地方。On this see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revis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2nd edition, New York, 1955.
- 27 A. Blum, *Les Origines du Papier, de l'Imprimerie et de la Gravure*, Paris, 1935, p. 22 (English edition. *On the Origin of Paper*, New York, 1934, translated by H. M. Lydenberg.)
- 28 On the water mill and medieval technology, see M. Bloch, 'Avènement et Conquêtes du Moulin à Eau',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II, 1935; R. Gillies, 'Lents Progres de la Technique' in *Revue de Synthèse*, XXXII, 1953. On the paper mill, see C. M. Briquet, *Opuscula*, 1955.
- 29 See A. Zonghi, *Zonghi's Watermarks*, Hilversum, 1953, and C. M. Briquet, op. cit.
- 30 C. M. Briquet, *Les Filigranes: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s marques de papier*, Paris, 1907, 4 Vol. (reissued 1927), nos. 65-71.
- 31 A. Zonghi, op. cit., p. 27; A. Blanchet, *Essai sur l'Histoire du Papier et de sa Fabrication*, Part I, Paris 1900, p. 61 ff.
- 32 Archives Nationales, J1, 76 (1340-1348).
- 33 On Champagne as a papermaking region, see L. Le Clerc, *Les Papiers: recherches et no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u papier, principalement à Troyes et aux environs, depuis le XIV siècle*, Paris, 1926, 2 Vols.
- 34 Gerson, *De Laude Scriptorum*.
- 35 *Papier in Diderot and d'Alembert's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1751-1772.
- 36 C. M. Briquet, *Opuscula*, p. 20; J. M. Janot, *Les Moulins à Papier de la Région Vosgienne*, Paris, 1952, 2 Vols. Vol. 1, p. 60.
- 37 今日的紙張係置於大缸內上膠，缸內若使用硬水（如含鈣量較高者），紙張不易沉澱。不過早年的上膠是在空氣中進行，造紙匠無須煩惱相關問題，唯混濁水質想必增加上膠的難度。
- 38 E. Blanchard, 'L'Industrie du Papier dans la France du Sud-Est', in th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du Dauphiné*, XLVI,

- 1925, p. 279-460.
- 39 R. Corraze, 'L'Industrie du Papier à Toulouse', i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apeterie en France*, II, 1934, p. 95 ff.
- 40 Cf. L. Le Clerc, op. cit., and A. Nicolai, *Histoire des Moulins à Papier du Sud-Ouest de la France (1300-1800)*, Bordeaux, 1935, 2 Vols.
- 41 A. Blanchet, op. cit., p. 60, 101-102, 108; C. M. Briquet, op. cit., p. 70 ff., and p. 182 ff.
- 42 H. Chobaut, 'Les Débuts de l'Industrie de Papier dans le Comtat Venaissin' in *Le Bibliographe Moderne*, XXIIV, 1928/29, p. 157-215.
- 43 A. Blanchet, op. cit., p. 72-76.
- 44 L. Le Clerc, op. cit.; H. Stein, 'La Papeterie d'Essones', in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u Gâtinais*, XII, 1894, p. 334-364; 'La Papeterie de Saint-Cloud', a supplement to *Le Bibliographe Moderne*, VIII, 1904.
- 45 C. M. Briquet, *Les Filigranes*, nos. 345 ff.
- 46 Cf. H. J. Martin, 'Quelques Aspects de l'Édition Parisienne au XVII^e Siècle', in *Annales*, 7th Year, 1953, p. 314 ff.
- 47 Antoine Vitré, *Ce que les Presses qui Travaillent à Présent dans Paris consomment de Papier*, Mémoire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16746, leaves 402ff.
- 48 Cf. p. 58 and note 68.
- 49 L. Le Clerc, op. cit., Vol.2, p. 351 ff. and E. Howe, 'The Le Bé Family', in *Signature*, (8), 1938.
- 50 F. Ritter,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à Strasbourg aux XV^e et XVI^e Siècles*, Paris, 1955, p. 467.
- 51 C. M. Briquet, op. cit., nos. 873-881.
- 52 R. Gandillon, 'Imprimeurs et Papetiers du Midi de la France', i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Papeterie en France*, Vol. 2, 1934, p. 91 ff.
- 53 Cf. P. Baud, *L'Industrie Chimique en France. Étude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Paris, 1932, p. 195 ff. (An essential work.)
- 54 C. M. Briquet, *Opuscula*, p. 269 ff.
- 55 C. M. Briquet, *Les Filigranes*, passim; A. Schute, 'Die Ältesten Papiermühlen der Rheinlande'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 1932, p. 44-52; and 'Papiermühlen und Wasserzeichenforschung', in *Gutenberg-Jahrbuch*, 1934, p. 9-27.
- 56 R. Rooses, *Christophe Plantin*, 2nd edition, Antwerp, 1892, p. 116 and 123 題獻給顯貴人士的印刷本，普朗坦會從里昂和義大利採購品質好上許多的紙張來製作。
- 57 R. Lebeque, *Les Correspondants de Peiresc dans les Anciens Pays-Bas*, Brussels, 1943, p. 61.
- 第二章 技術問題與紙張之類
- 58 C. Morlet, *Les Origines et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d'après les Recherches les plus Récentes*, Paris, 1922, p. 8 ff.; A. Blum, *Les Origines de la Gravure en France*, Paris, 1927, p. 12 ff.; H. Bouchot, *Les Deux Cents Incunables Xylographiques du Département des Estampes*, Paris, 1903, p. 40-49.
- 59 C. Morlet, op. cit., p. 18 ff.
- 60 Cf. p. 68 ff.
- 61 C. Morlet, op. cit., p. 18, 20 ff.; H. Bouchot, op. cit., p. 55.
- 62 C. Morlet, op. cit., p. 11; A. Blum, op. cit., p. 35 ff., 52 ff.
- 63 C. Morlet, op. cit., p. 22 ff.
- 64 *Ibid.*, p. 28 ff.
- 65 *Ibid.*, p. 31.
- 66 Marius Audin, 'La Metallographie et le Problème du Livre',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30, p. 11-52; 'Typographie et Stereographie',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31, p. 28-37; and Vol. 1 of the *Somme Typographique*, Paris, 1948.
- 67 De Laborde, *Débuts de l'imprimerie à Strasbourg*, Paris, 1840; C. Morlet, op. cit., p. 35-37; A. Ruppel, *Johannes Gutenberg,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Berlin, 1941; H. Lüfing, 'Neue 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in *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 XXXVII, fascicule 2, 1955, p. 244-263.
- 68 André Heilmann owned a paper mill near Strasbourg; cf. F. Ritter, op. cit., p. 67, 487.
- 69 H. Requin,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es Origines de la Typographie', in *Bulletin Historique et Philologique du Comité des*

-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890, p. 288 ff., p. 328-350; H. Requin, *L'imprimerie à Avignon en 1444*, Paris, 1890.
- 70 In Marius Audin, *Somme Typographique*, Vol. 1.
- 71 C. Mortet, op. cit., p. 37.
- 72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studies are listed in Victor Scholderer's bibliography,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The Library*, XXI, June, 1940, p. 1-25.
- 73 Cf. C. Mortet, op. cit., p. 39; V. Scholderer, op. cit., p. 2.
- 74 Cf. Note 72.
- 75 C. Mortet, op. cit., p. 51 ff.; R. Blum, *Der Prozess Faust gegen Gutenberg*, Wiesbaden, 1954.
- 76 Ruppel, *Gutenberg*; A. Dresler, 'Hat Gutenberg in Bamberg Gedruckt?' in *Das Antiquaria*, 1955, p. 197-200, 229 ff.; H. Lufing, *Neue Literatur zur Geschichte des Buchwesens*, loc. cit.
- 77 Seymour de Ricci, *Catalogue Raisonné des Premières Impressions de Mayence*, Mainz, 1911.
- 78 Cf. A. Giesecke, 'Das Schrifmetall Gutenbergs',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44-49, p. 63 ff.; V. Scholderer, 'The Shape of Early Types',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27, p. 24 ff.
- 79 A. Firmin-Didot, *Aldo Manuce et l'Hellenisme à Venise*, Paris, 1875, p. 99 ff.
- 80 On the types recovered from the River Saône, see Marius Audin, 'A propos des premières Techniques Typographiques',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XVIII, 1956, p. 161-170; M. Audin, *Les Types Lyonnais Primitifs Conservés au Département des Imprimé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55.
- 81 P. S. Fournier, *Manuel Typographique*, Paris, 1764-66, 2 Vols. Vol. 1, p. 109 ff. (English edition, *Fournier on Typefounding*, London 1930, translated by Harry Carter.)
- 82 K. Haebler, 'Schriftguss und Schrifthandel in der Frühdruckzeit', in *Zentralblatt für Bibliothekswesen*, 1924, p. 81-104; H. Harsse, *Les Premiers Incunables Bâlois et Leurs Dérivés: Toulouse, Lyon, Venne en Dauphiné, Spire, Eltville, etc.*, 1471-84, Paris, 1902, 2nd edition.
- 83 傅尼耶的《活字印刷手冊》(Manuel Typographique)裡，收錄一份有趣的表格，列出一七六六年時歐洲各地營運的

鑄字廠。其中，法國皇家印刷館擁有當時最精緻的陽文字範組，包括由加拉蒙雕刻的御用希臘體。大傅尼耶（即作者兄長）繼承自雷貝家族的鑄字廠，擁有吉堯姆（十六世紀著名的陽文字範雕刻師）、加拉蒙、德柯萊等名家的陰文字模與陽文字範。桑雷克（Sanlecque）鑄字廠由吉堯姆的弟子德桑雷克創建於一五九六年，而後一直是雷貝家族事業的一部份；另外尚有五家鑄字廠設立時間較晚。里昂方面，傅尼耶提到兩家鑄字廠。表格中尚有二十三家曰耳曼鑄字廠，以羅特赫在法蘭克福、布賴科夫（Breitkopf）在萊比錫的事業最有名。荷蘭境內，阿姆斯特丹有三家，其中一家由第克（Van Dick）知名的繼承者布斯（Jean Bus）經營；魏斯坦（Westein）的工場位於哈倫，後由恩謝德（Enschede）接管，迄今仍在營運，並擁有十六世紀流傳下來的鉛質字模；此外還有四家鑄字廠。安特衛普當然還有普朗坦摩雷特斯的工場，位於現今普朗坦博物館所在地。英格蘭雖然只有四家鑄字廠，設備倒是齊全精良：除了寇崔爾（Cottrell）在牛津、華森（James Watson）在愛丁堡經營的之外，卡斯隆的倫敦工場與巴斯克維的伯明罕工場，尤其值得一書（博馬樹在凱爾印製的伏爾泰全集，即採用向後者買回的活字）。義大利的鑄字廠不算多，教宗國瑞（格列高利）十三世徵召廣戎前來羅馬，於梵蒂岡創建者（一五七八），算是最有名的一家；宏教印刷社（Tipografia della Propaganda）為前往東方傳教者印製的書本，即採用該廠的東方體（Oriental）活字。其餘的鑄字工場，位於西班牙者三家、瑞典一家、哥本哈根一家、里斯本一家、華沙一家、俄羅斯也有兩或三家。總的來看，當時約有六十家鑄字廠供應歐洲各國所需。

- 84 Ibid., Vol. I, p.125.
- 85 Pierre Didot explains his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Essai de Faibles Nouvelles*, Paris, 1786; on the system propounded by P. S. Fournier, see his *Manuel Typographique*, Vol. I, p. 129 ff., Paris, 1764-66, 2 vols.
- 86 On the problems of the printer's case, see P. S. Fournier, op. cit., Vol. 2, p. 119-142, and D. Fernel, *La Science Pratique de l'Imprimerie*, Amiens, 1723.
- 87 D. Fernel, op. cit., p. 11 ff.
- 88 A. F. Momoro,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l'Imprimerie*, Paris, 1723; 'Imprimerie' in the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 89 Marius Audin, *Somme Typographique*, Vol. 2, p. 124 ff.
- 90 On the hand press, see P. Dietrichs, 'Die Buchdruckerpresse von Johannes Gutenberg bis Friedrich König', in *Jahresbericht*

- Gutenberg *Gezelschaft*, Mainz, 1930. J. W. Enschedé, 'Houten hand pressen in de zestiende eeuw', in *Tijdschrift voor Boek en Bibliotheekwezen*, 1906, p. 195-208, 262-277; D. Fertel, op. cit.; J. Moxon, *Mechanick Exercises, or The Doctrine of Handy-Works*, London, 1683; L. Neipp, *Les Machines à Imprimer depuis Gutenberg*, Paris, 1951.
- 91 根據奧丁 (Marius Audin) 的分析結論，鑄字是這一種活字印刷的一種變體，且只有特定的字體需要鑄孔，並非鑄圖形字體。
- 92 Marius Audin, 'A propos des Premières Techniques Typographiques', loc. cit., p. 165-170.
- 93 K. Haebler, *The Study of Incunabula*, New York, 1933, p. 79-82.
- 94 J. W. Enschedé, loc. cit.
- 95 Cf. p. 169.
- 96 Marius Audin, *Somme Typographique*, Vol. 2, p. 94 ff.
- 97 C. Moret, *Le Format des Livres. Notions Pratiques suivies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 Paris, 1925; K. Haebler, op. cit.
- 98 C. Samaran,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ivre Manuscrit du Moyen Age. Manuscrits Imposés et Manuscrits non "Coupés"', in *Comitat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toric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lorence, 1957, p. 88 ff.
- 99 On the route by which paper came from China to Europe, see T. F. 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rev.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2nd edition, New York, 1955.
- 100 Edouard Chavann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 1913.
- 101 E. Chavannes, 'Les Livres Chinois avant l'Invention du Papier', in *Journal Asiatique*, V, 1905, p. 5-75.
- 102 Aurel Stein, *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Asia*, Oxford, 1921, Vol. 2, p. 669-677.
- 103 J. Von Wiesner, 'Über die ältesten bis jetzt aufgefundenen Hadempapiere',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Series*, CLXVIII, part 5, Vienna, 1911.
- 104 Paul Pelliot,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aris, 1953. (Oeuvres Posthumes de P. Pelliot, Vol. 4.); K. T. Wu, 'The

-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in China', in *T'ien Hsia*, III, September, 1936, pl 137-160.
- 105 Kim Won-Young, *Early Movable Type in Korea*, Seoul, 1954, (36 pages of Korea text, 15 pages of English text, and 26 plates.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eries A, Vol. I).

■漢字書 書體變遷

- 106 C. Beaulieux, 'Manuscripts et Imprimés en France, XV-XVI Siècle',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Émile Chatelet*, Paris, 1910; C. Morlet, 'Observations sur les Influences qui ont Diversifié les Caractères Employés par les Imprimeurs du XV Siècle', in *Gutenberg-Festschrift*, 1926, p. 210-213.
- 107 L. S. Olsecki, *Incunables Illustrés Imitant les Manuscrits. Le Passage du Manuscrit au Livre Imprimé*, Florence, 1914.
- 108 Jacques Guignard, 'Du Manuscrit au Livre', in *La France Graphique*, 9th Year, February, 1955, p. 8-16, and the titles referred to in notes 110 and 111; on the various manuscript hands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stic script, see B. Bischoff, G. J. Liefinck and G. Battelli, *Nomenclature des Écritures Livresques du IX au XVI Siècle*, Paris, 1954; S. Morison, 'Early Humanistic Script and the First Rome Type', in *The Library*, XXVI, 1943, p. 1-30.
- 109 G. Lepreux, *Gallia Typographica. Province de Normandie*, Vol. I, p. 276, Paris, 1912, 2 vols.
- 110 H. Harsisse, *Les Premiers Incunables Bâlois et leurs Dérivés: Toulouse, Lyon...*, Paris, 1902, 2nd edition.
- 111 C. Perrat, 'Barthélémy Buyer et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à Lyon', in *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2, 1935, p. 103-121, 349-387.
- 112 Cf. T. B. Reed, *A History of the Old English Type Foundries*, ed. A. F. Johnson, London, 1937.
- 113 On the history of type faces, essential reading is A. F. Johnson, *Type Designs, Their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1934; D. B. Updike, *Printing Types, Their History, Forms and Use*, 2nd edition, Cambridge, 1952, 2 vols.
- 114 For the history of Italic type and its beginning, see S. Morison, 'Towards an Ideal Type', in *The Fleuron*, II, 1924, p. 57-76; 'On Script Types', in *The Fleuron*, IV, 1925, p. 1-42; 'The Chancery Types of Italy and France', in *The Fleuron*, III, 1925, p. 53-60. The practice of using italic for quotations seems to have been begun by Froben at Basle, in 1510-1520.

- 115 E. P. Goldschmidt, op. cit., p.24.
- 116 D. B. Updike, op. cit., Vol. 1, p. 139 ff.
- 117 K. Haebler, *The Study of Incunabula*, New York, 1953.
- 118 A. F. Johnson, *German Renaissance Title Borders*, Oxford, 1929; J. Von Pflug-Hartung, *Rathmen Deutscher Buchtitel im 16.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09; A. F. Johnson, 'The Title Borders of Hans Holben',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37, p. 115-120.
- 119 Cf. L. Voet i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nvers. Ville de Plantin et de Ruben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Paris, 1951, p. 56 ff.
- 120 P. Hofer, *Baroque Book Illustration*, Cambridge, 195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rt du Livre à l'Imprimerie Nationale*, Paris, 1951, p. 56 ff.
- 121 G. Duplessis, *Essai sur les Différentes Éditions des "Icones Veteris Testamenti" de Holbein*, Paris, 1884; *Essai Bibliographique sur les Différentes Éditions des Oeuvres d'Ovide Ornées de Planches, Publiées au XV et au XVI Siècle*, Paris, 1889.
- 122 Cf. below, and G. Duplessis, *Les Emblèmes d'Alciat*, Paris, 1884.
- 123 A. W. Pollard, *Fine Books*, London, 1912, p. 96.
- 124 M. Sander, *Le Livre à Figures Italien depuis 1467 jusqu'à 1530*, Milan, 1942, 6 Vols. There is an excellent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Volume 4.
- 125 J. Macfarlane, 'Antoine Vérard', in *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4, 1896.
- 126 M. Sander, op. cit., Vol. 4.
- 127 This practice was followed currently at Lyon where Trechsel published a Latin and a French version of Terence simultaneously, each illustrated with the same wood blocks, attributed to Peréal. Cf. A. Martin, *Le Livre Illustré en France au XV Siècle*, Paris, 1931, p.167.
- 128 A. Martin, op. cit., p. 141.

- 129 A. F. Johnson, 'Basle Ornaments on Paris Books, 1519-36', in *The Library*, 1927/28, p. 355-360.
- 130 On the *Biblia Pauperum* and the *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 see A. Mâle, *L' Art Religieux de la Fin du Moyen Age*, Paris, 1922, p. 232 ff.; J. Lutz and P. Perditzel, "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 *Les Sources et l'Influence Iconographiques*, Mulhouse, 1909, 2 Vols. On the influence of mural painting, see M. Hébert, 'Gravures d'illustration ed Peintures Murales à la fin du Moyen Age', in *Association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Bulletin d'Information*, no. 20, June, 1956, p. 69 ff. We wish to thank Mlle Hébert for help on the question of book illustration. On enamels, see Marquet de Vasselot, 'Une planche des "Grandes Heures" de Vostre, copiée par deux emailleurs limousins', in *Bibliographie Moderne*, Vol. 16(1912-13), and 'Une Suite d'Émaux Limousines à Sujets Tirés de l'Énéid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rt Français*, 1st fascicule, 1912; On Bernard Salomon's influence on wood engraving, see E. A. Standen, 'A Picture for Every Story',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April 1957, p. 165-175; C. Dantion, *La Faïence de Lyon*, Lyons, 1926. On tapestries, R. A. Weigart, *La Tapisserie Française*, 1957, and Marguerite Sartor, *Les Tapisseries Toiles Peintes et Broderies de Reims*, Reims, 1912. On the influence of lace designs on decorated borders, S. Morrison and Francis Meynell, 'Printers' flowers and Arabesques', in *The Fleuron*, no. 1, 1923, p. 1-43.
- 131 On French illustrated books in the 16th century, see R. Brun, *Le Livre Illustré en France au XVI Siècle*, and *Le Livre Français*, p. 39-63. For Germany, see especially R. Muther, *Die deutsche Buchillustration der Gotik und Frührenaissance (1460-1530)*, Munich, 1884.
- 132 On this, see A. M. Hind and S. Colvin, *Catalogue of Early Italian Engravings Preserv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rints and Draw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09-10, 2 Vols.; M. Pittaluga, *L'Incisione Italiana nel Cinquecento*, Milan, n.d.; L. Rosenthal, *La Gravure*, 2nd edition, Paris, 1939.
- 133 R. Brun, *Le Livre Illustré...* p. 126 ff.
- 13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nvers, Ville de Plantin et de Ruben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p. 106 ff., 201 ff., 257 ff., Paris, n. d.
- 135 E. Bouvy, *La Gravure en France au XVII Siècle: la gravure de portrait et d' allégorie*, Paris, 1927.

- 136 F. Courtoin, *Graveurs et Marchands d'Estamp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4; H. Cohen, *Guide de l'Amateur de Livres à Gravures d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2.
- 137 R. Burn, 'Manuel de l'Amateur de Reliure Ancienne', in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1935-37; E. Ph. Goldschmidt, *Gothic and Renaissance Bookbinding*, London, 1928, 2 Vols.
- 138 L. M. Michon, *La Reliure Française*.. Paris, 1951, p. 53. ff.
- 139 *Ibid.*, p. 39 ff.
- 140 *Ibid.*, p. 86 ff.

■第四章 書籍源由

- 141 E. Coyecque, 'Cinq Libraires Parisiens sous François I (1521-29)', and 'La Librairie de Didier Mahieu en 1520', in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Paris et de l'Île de France*, Vol. 21, 1894, p. 53-136, and p. 197-205; and same author, *Recueil d'Actes Notarié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Paris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05-1929, 2 Vols.
- 142 E. Coyecque, 'Cinq Libraires Parisiens', loc. cit.
- 143 E. Coyecque, 'La Librairie de Didier Mahieu', loc. cit.
- 144 製本一種部德辭體字、用以行印中產階級所需的書籍（繪本與騎士傳奇故事）。
- 145 H. Stein, *Wolfgang Hopyl, Imprimeur-Libraire Parisien du XV^e Siècle. Note sur son Atelier Typographique*, Fontainebleau, 1891; 'Nouveaux Documents sur Wolfgang Hopyl, Imprimeur à Paris', in *Bibliographie Moderne*, Vol. 9, 1905, p. 178-193.
- 146 E. Coyecque, *Recueil d'Actes Notarié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Paris*, nos. 2029, 2854, 2875, 3312, 4132, 4227, and 4610.
- 147 *Ibid.*, no. 15.
- 148 *Ibid.*, nos. 2975 and 2997.
- 149 *Ibid.*, no. 544.
- 150 *Ibid.*, no. 533.
- 151 *Ibid.*, no. 435.

- 152 P. Renouard, *Bibliographie des Impressions et des Oeuvres de Josse Bade Ascensius*, Paris, 1909, 3 Vols. Vol. 1, p. 58 ff.
- 153 E. Coyecque, *Recueil d' Actes Notariés...* no. 37.
- 154 *Ibid.*, no. 465.
- 155 *Ibid.*, no. 500.
- 156 *Ibid.*, no. 645.
- 157 H. Hauser, *Ouvriers du Temps Passé*, Paris, 1919, p. 185.
- 158 E. Coyecque, *op. cit.*, no. 1262.
- 159 *Ibid.*, no. 2975.
- 160 R. Fullin, 'Documenti per Servire alla Storia della Tipografia Veneziana', from the Venice Archives, Vol. 23, Part I, p. 2. A 'quinternion' is a quire of five leaves.
- 161 Cf. H. F. Brown, *The Venetian Printing Press*, London, 1891, p. 17 ff.
- 162 V. Finesch, *Notizie Storiche sopra la Stamperia di Ripoli*, Florence, 1781.
- 163 P. Pansier, *Histoire du Livre et de l'Imprimerie à Avignon du XIV au XVI Siècle*, Avignon, 1922, p. 142 ff.
- 164 A. de la Bourlière, *L'Imprimerie et la Librairie à Poitiers pendant le XVI Siècle*, Paris, 1900, p. 367 ff.
- 165 Archives Nationales. Central registry of Paris notaries.
- 166 P. Melloté,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Imprimerie*, Vol. 1 (the only one to appear), Paris, 1905, p. 448 ff.
- 167 *Ibid.*, p. 449-452. 以下謹羅列另外三部書籍的印製成本 (以英鎊換算) ..
 一、科隆巴 (Colombat) 的《年曆》(Almanach)。於十八世紀初・每年印製七萬兩千本 ..
 紙張 一、〇〇〇英鎊
 印刷 (打印字樣) 五四〇英鎊
 組版與校對 二、五〇〇英鎊
 合計 五、〇四〇英鎊
- (Cf. *Mémoire sur les Vexations qu'exercent les Libraires et Imprimeurs de Paris*, published by Lucien Faucou, Paris,

1879, p. 31.)

二、莫勒里 (Morel) 的字典。對開本，全套六冊，於十八世紀早期印製兩千套：

紙張	五四、〇〇〇英鎊
組版	一一、〇〇〇英鎊
打印字樣	一二、七五〇英鎊
活字更替、油墨、蠟	一五、〇〇〇英鎊
燭、校對、其他開銷	
合計	九三、七五〇英鎊

(Cf. *Mémoire sur les Vexations ...* p. 35.)三、吉本 (Edward Gibbon) 的《羅馬興亡史》(*Decline and Fall*) 第三版，印於一七七五年，共一千本：

紙張	一七一英鎊
印刷	一一七英鎊
校對	五英鎊五先令
其他各種開支	十六英鎊十五先令
合計	二一〇英鎊

(Cf. Mumbo,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 London, 1949, p. 197.)

168 H. Haisse, *Les Premiers Incunables Ballois et Leurs Dérivés: Toulouse, Lyon, Venne en Dauphiné, Spire, Elville, etc.*, 1471-1484, Paris, 1902, 2nd edition.

169 C. Perrat, 'Barthélémy Buyer et les Début de L'Imprimerie à Lyon', in *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2, 1935, p. 103-121 and p. 349-378.

170 J. Macfarlane, *Anoine Vérard*, London, 1899; A. Claudin,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en France, Paris, 1900-1905*, 4 Vols. Vol. 2, p. 385-506; J. Guignard, 'Recherch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ivre à Tours...', in *Écloue des Chartes. Positions des Thèses*, 1938, p. 36-44.

- 171 R. Renouard, 'Quelques Document sur les Petit, Libraires Parisiens, et Leur Famille (XV et XVI Siècles)',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Paris et de l'Île de France*, Vol. 23, 1896, p. 133-153.
- 172 P. Renouard, *Bibliographie des Impressions et des Oeuvres de Josse Bade Ascensius*, Vol. 1, p. 19 ff, Paris, 1909, 3 Vols.
- 173 A. A. Renouard, *Annales de l'Imprimerie des Aldes...* 3rd edition, Paris, 1834, 3 Vols. Appendix on the Guntas at the end of Vol. 3.
- 174 O. von Hase, *Die Koberger*, Leipzig, 1885.
- 175 M. Rooses, *Christophe Plantin*, 2nd edition, Antwerp, 1896-98.
- 176 H.-J. Martin, 'Sébastien Cramoisy et le Grand Commerce du Livre au XVII Siècle',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57, p. 179-188.
- 177 G. Lepeux, *Gallia Typographica*. Paris Series, Vol. 1: *Livre d'Or des Imprimeurs du Roi*, p.34 ff.

■第五章 圖書館的小世界

- 178 H. Hauser, *Ouvriers du Temps Passé*, Paris, 1917, p. 231.
- 179 Cf. p. 219 ff.
- 180 Cf. p. 241 ff.
- 181 P. Chaix, *Recherches sur l'Imprimerie à Genève de 1550 à 1564*, Geneva, 1954, p. 3 ff.
- 182 M. Sabbe, *L'Oeuvre de Christophe Plantin et de ses Successeurs*, Brussels, 1937, p. 188 ff.
- 183 H. Hauser, op. cit.
- 18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2064, sheet no. 19.
- 185 H. Hauser, op. cit., p. 218 ff; L. M. Michon, 'A propos des Grèves d'Imprimeurs à Paris et à Lyon au XVI Siècle', in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s de Paris et de l'Île-de-France. Mémoires*, 1953, p. 103-115; K. Pallmann, 'Frankfurts Buchdruckerordnungen',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1881, p. 261-27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2064, sheets 45-47.

- 186 H. Hauser, op. cit., p.34, 94,104; M. Roosses, op. cit., pp.240, no. 1; P. Chaix, op. cit., p. 39 ff.
- 187 M. Sabbe, op. cit., p. 159 ff.
- 188 H. Hauser, op. cit., p. 177 ff; Marius Audin, 'Les Grèves dans l'Imprimerie à Lyon au XVI Siècle',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35, p. 172-189; L. M. Michon, 'A. Propos des Grèves d'Imprimeurs à Paris et à Lyon au XVI Siècle', loc. cit. An unpublished article rounding off H. Hauser's work.
- 189 M. Rooses, op. cit., p. 241.
- 190 K. Pallmann, 'Ein Buchdruckerstreik zu Frankfurt-am-Main im Jahre 1597', in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1883, p. 11-21.
- 191 P. Chaix, op. cit., p.25 ff.
- 19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2064, sheets no. 52, 56, 60; Decree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dated 19 June 1702.
- 193 Plantin-Moretus Archives, no. 526, the Anisson dossier, 28 November 1671.
- 194 E. de Brogié, *Mabillon et la Société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au XVIII Siècle*, Paris, 1888, 2 Vols. Vol. 1, p. 374, 422; Vol. 2, p. 363; J. B. Vanel, *Les Bénédictins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et les Savants Lyonnais*, Paris-Lyons, 1894.
- 195 P. Melloté, *Historie Économique de l'Imprimerie*, p. 142 ff.
- 196 E. von Bienna, *Les Huguenot de Mercur et de Vrijthoeven*, The Hague, 1918.
- 197 A. Cartier, M. Audin and E. Vial, *Bibliographie des Éditions des de Tournes*, Paris, 1937.
- 198 P. Ducourtieux, *Les Barbou, Imprimeurs. Lyon, Limoges, Paris (1524-1820)*, Limoges, 1895-98.
- 199 *Amerbachkorrespondenz*, edited by Alfred Hartmann, Basel, 1942-47, 3 Vols. Cf. L. Febvre, *Au Coeur du XVI Siècle Religieux*, Paris, 1957.
- 200 A. A. Renouard, *Annales de l'Imprimerie des Alde*, 3rd edition, Paris, 1834, 3 Vols.; A. Frimmin-Didot, *Alde Manuce et l'Hellenisme à Venise*, Paris, 1875.
- 201 P. Renouard, *Bibliographie des Impressions et des Oeuvres Josse Badius Ascensius*.
- 202 Cf. p. 156.

- 203 E. Armstrong, *Robert Estienne, Royal Printer*, Cambridge, 1954.
- 204 A. J. Bernard, *Geoffroy Tory*, 2nd edition, Paris, 1865.
- 205 J. Baudrier, *Bibliographie Lyonnaise*, Vol. 8, Lyons, 1895-1921, 12 Vols. Revised by George Tricou, Paris, 1963.
- 206 F. Ritter,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Alsacienne*, p. 377-387, Paris, Strasbourg, 1955.
- 207 L. Febvre, 'Dolet, Propagateur de l'Évangile',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8, 1945, p. 98-170.
- 208 H. J. Martin, 'Sébastien Cramoisy et le Grand Commerce du Livre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57, p. 179-188.
- 209 J. Chapelain, *Correspondance*, edited by Tamizey de Larroque, Paris, 1880-83.
- 210 Cf. p. 178-179.
- 211 M. H. Clément-Janin, *Recherches sur les Imprimeurs Dijonnais*, p. 34-43.
- 212 P. J. H. Baudet, *Leven en Werken van W. J. Bleau*, Utrecht, 1871.
- 213 H. J. Martin, *Sébastien Cramoisy*, loc. cit.
- 214 H. J. Martin, *Guillaume Desperes, Imprimeur de Pascal et Port-Royal*, loc. cit.
- 215 G. Mongrédien, *La Vie Quotidienne sous Louis XIV*, Paris, 1948, p. 175.
- 216 The Ducal Museum (Bouillon). *Le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et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An exhibition in honour of Pierre Rousseau (1716-1785) and Charles-Auguste de Weissenbruch (1744-1826), Bouillon, 1955.
- 217 Cf. p. 248.
- 218 W. Bennett, *John Baskerville, the Birmingham Printer*, Birmingham, 1931; J. H. Benton, *John Baskerville, Typefounder and Printer, 1706-1775*, Boston, 1914.
- 219 R. Bertieri, *L'Arte di Giambattista Bodoni*, Milan, 1913.
- 220 L. de Peluson, 'Les Didot', in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1929-30, p. 779-789.
- 221 J. Hoyoux, 'Les Moyens d'Existence d'Érasmus',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6, 1944, p. 7-59.
- 222 H. J. Martin, 'Quelques aspects de l'Édition Parisienne au XVII^e Siècle', in *Annales*, 7th Year, 1952, p. 309-319.

- 223 G. Mongrédien, *La Vie Littérair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1947, p. 257.
- 224 *Ibid.*, p. 275 ff.
- 225 H. J. Martin, loc. cit.
- 226 L. Kirschbaum, 'Author's Copyright in England before 1640', in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p. 43-80; H. Falk, *Les Privilèges de Librairi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1906; F. Milkau, *Handbuch des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Vol. 1, p. 905 ff., Wiesbaden, 1952-1961, 4 Vols.
- 227 W. W. Greg, *Some Aspects of London Publishing between 1550 and 1650*, Oxford, 1956.
- 228 M. Pelisson, *Les Hommes de Lettre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11.
- 229 R. Bouvier and E. Maynial, *Les Comptes Dramatiques de Balzac*, Paris, 1938.
- 第六章 書籍の出版
- 230 On Jenson's possible mission, see A. Claudin,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en France*, Vol. 1, p. 11, no. 2; J. Guignard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France*, 1945-47, p. 39.
- 231 Cf. the map on pp. 214-215.
- 232 A. Claudin, *Les Origines de l'Imprimerie à Albi en Languedoc (1480-1484)*. *Les Pérégrinations de J. Neumeister, Compagnon de Gutenberg en Allemagne, en Italie et en France (1483-1484)*, Paris, 1880; L. Charles-Bellet, 'Les Deux Séjours à Albi d'un Compagnon de Gutenberg', in *Revue du Tarn*, 1881, p. 81-91.
- 233 A. Claudin, *Les Imprimeries Particulières en France au XV^e Siècle*, Paris, 1897; A. de la Borderie, *L'Imprimerie en Bretagne au XV^e Siècle*, Nantes, 1878.
- 234 M. Langlois, *Le Missel de Chartres Imprimé en 1482*, Chartres, 1904.
- 235 J. Janssen, *L'Allemagne et la Réforme*, Paris, 1887-1914, 9 Vols., Vol. 1, p. 7 ff.
- 236 L. Delisle, *Livres Imprimés à Cluny au XV^e Siècle*, Paris, 1897.
- 237 M. H. Clément-Janin, *Recherches sur les Imprimeurs Dijonnais et sur les Imprimeurs de la Côte-d'Or*, Dijon, 1883, p. 1 ff.

- 238 J. Janssen, *op. cit.*, p. 14 ff.
- 239 *Ibid.*
- 240 V. Fineschi, *Notizie Storiche sopra la Stamperia di Ripoli*, Florence, 1781; G. Galli, 'Gli Ultimi Mesi della Stamperia di Ripoli e la Stampa del Platone', in *Studi e Ricerche sulla Storia della Stampa del Quattrocento*, Milan, 1942, p. 159-184.
- 241 A. Willems, *Les Elzevier*, Brussels, 1880.
- 242 E. Pasquier and V. Dauphin, *Imprimeurs et Libraires de l'Anjou*, Angers, 1932.
- 243 G. Pepreux, *Gallia Typographica. Province de Normandie*, Vol. 1; A. de la Bouralière, *L'Imprimerie et la Librairie à Poitiers pendant le XVI Siècle*, Paris, 1900; E. F. Kossman, *De Boekhandels's Gravenhage*, The Hague, 1937.
- 244 *Cf.* p. 150 ff.
- 245 *Cf.* p. 160 ff.
- 246 請參照二二五頁的地圖。某個城鎮開始有印刷業的確切年代，長期以來都是爭辯不休的課題，我們並不預設一切已有一定案。此處僅採納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年代。
- 247 A. Claudin,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en France*, Vol. 1, p. 67. ff; H. Lehmann-Haupt, *Peter Schoeffer of Gemshelm and Mainz*, Rochester, New York, 1900.
- 248 P. Pansier, *Histoire du Livre et de l'Imprimerie à Avignon du XIV au XVI Siècle*, p. 129 ff., Avignon, 1922, 3 Vols.
- 249 *Cf.* p. 216-217.
- 250 These figures are intended only to give an idea of the scale of operations. They are based on an annotated copy of K. Burger, *The Printers and the Publishers of the XV Century with Lists of their Works*, London, 1902.
- 251 *Cf.* p. 312 ff.
- 25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nvers. Ville de Plantin et de Rubens* (Exhibition Catalogue), p. 95 ff.
- 253 F. Ritter,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Alsacienne aux XV et XVI Siècles*.
- 254 On German publishing in the 16th century, see F. Milkau, *Handbuch der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2nd edition by George Leyn, Vol. 1: *Schrift und Buch*, Wiesbaden, 1952, p. 490 ff.; J. Benzing, *Buchdrucker-lexicon des 16. Jahrhunderts*:

Deutsches Sprachgebiet, Frankfurt, 1952.

- 255 G. Lepreux, 'Introduction de l'Imprimerie dans les Villes de France', in *Supplément au Bulletin Officiel de l'Union des Maitres Imprimeurs*. Special Number, December, 1925, p. 9 ff.
- 256 P. Renouard, *L'Édition Française en 1530*, Paris, 1931.
- 257 C. Perez Pastor, *Bibliografía Madrileña*, Madrid, 1891-1907, 3 Vols. According to this bibliography, 769 works were printed at Madrid between 1566 and 1600, and 1,471 between 1601 and 1626.
- 258 H. S. Bennett, *English Book and Readers, 1475 to 1557*, Cambridge, 1952; M.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London, 1939; F. A. Mumby,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 London, 1949.
- 259 Cf. p. 363 ff.
- 260 Cf. p. 396 ff.
- 261 Cf. p. 289 ff.
- 262 P. J. H. Baudet, *Leven en Werk van W. J. Bleau*, Utrecht, 1871.
- 263 H. J. Martin, 'Quelques Aspects de l'Édition Parisienne au XVII^e Siècle' in *Annales*, 7th Year, 1952, p. 309-319.
- 264 P. Melloté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Imprimerie*, p. 458 ff., Paris, 1905.
- 265 The basic work is M. Kleekoop and W. P. van Stockum, *De Boekhandel te Amsterdam, voornamelijk in de 17 Eeuw*, The Hague, 1914, 5 Vols. It has an excellent selection of documents.
- 266 Cf. *Lettres inédites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à Marc-Michel Rey*, edited by J. Bosscha, Amsterdam and Paris, 1858.
- 267 See H. Lehmann-Haupt, *The Book in America*, 2nd edition, New York, 1951.

■ 綴り紙 韋德士抄本

- 268 K. Haehler, *The Study of Incumbula*, New York, 1933, p. 171 ff.
- 269 O. von Hase, *Die Koburger*, 2nd edition, Leipzig, 1885.
- 270 E. Coyecque, *Recueil d'Actes Notariés Relatif à l'Histoire de Paris*, Vol. 1, no. 886.

- 271 *Ibid.*, no. 1262.
- 272 P. Pansier, *Histoire de Livre et de l'imprimerie à Avignon du XIV au XVI Siècle*, Avignon, 1922, p. 85 ff. and 100 ff.
- 273 A. Hanauer, *Les Imprimeurs de Hagenau*, p. 23, Strasbourg, 1904.
- 274 P. Renouard, *Bibliographie des Éditions de Simon de Colines*, p. 96 ff and p. 461, Paris, 1894. See also the *Bibliotheca Belgica*, 2nd Series, E. 466, Brussels, 1964.
- 275 P. Renouard, *Bibliographie des Éditions de Simon de Colines*, p. 23.
- 276 Cf. p. 375 ff.
- 277 M. Rooses, *Christophe Plantin*, 2nd edition.
- 278 爲確保同業生計，出版同業公會於一五八七年律定了單版書籍印量的上限，只有特定類別的書刊方可一次印製一千兩百五十冊到一千五百冊以上，諸如文法書、禱本、教理問答、成文法典與公告榜文、日曆、年曆、卜詞預報等。其實印量上限對印刷公會的歷任會長似無約束力；此外，就連四開本的莎士比亞劇作，印刷數量亦無超過一千冊之虞。一六三七年，限制終告廢止。 Cf. E. Boswell and W. W. Greg, *Records of the Court of the Stationer's Company, 1576-1602, Register B*, London, 1930, p. xliii ff.; and M.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London, 1939.
- 279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2074, sheet no. 2.
- 280 G. Mongrédien, *La Vie Littéraire au XVII Siècle*, p. 272.
- 28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1856, f. 40.
- 282 *Ibid.*
- 283 Kleetkooper, 'Daniel Elzevier Betrekkingen met England', in *Tijdschrift voor Boek en Bibliotheekwezen*, 1910.
- 284 G. Cohen, *Écrivains Français en Hollande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du XVIII Siècle*, Paris, 1920.
- 285 P. Delain, *Les Libraires et Imprimeurs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de 1634 à 1793*, Paris, 1907, p. 57.
- 286 Council decree of 17 October 1704.
- 287 Plantin-Moretus Archives, 296, leaves 680-682.
- 288 M. M. Kleetkooper and W. van Stockum, *De Boekhandel te Amsterdam...* The Hague, 1914, the article on 'Halma'.

- 289 Ibid.
- 290 H. J. Martin, *Guillaume Desprez*, loc. cit.
- 29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2127, sheet no. 52.
- 292 Lyons city archives, HH 101.
- 29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lat. (Latin) 11915.
- 294 *Mémoire sur les Vexations qu'Exercent les Libraires et Imprimeurs de Paris*, Lucien Faucon, Paris, 1879.
- 295 Ibid.
- 296 P. Mellotée, *Histoire Économique de l'Imprimerie*, Vol. 1, *L'Ancien Régime*, p. 449-452.
- 297 Ducal Museum (Bouillon), *Le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et la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 298 On this see Introduction to Voltaire's *Lettres Inédites à son Imprimeur Gabriel Cramer*, edited by Gagnebin, Geneva, 1952; G. Bengesco, *Bibliographie Voltaire*, Vol. 1, p. 342 (Voltaire's letter of 28 December, 1751), Paris, 1882-1890, 4 Vols. Likewise in England the usual edition was 2,000, sometimes rising to 10,000. Cf. M.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London, 1939, p. 94.
- 299 M. Plant, op. cit., p. 257.
- 300 Plantin-Moreus archives, 148, leaves 163-164 此處訂購的書籍，部分來自傅耶 (Fouet) 的庫存貨，印製完成已是二十年前的事，可見其銷售速度之遲緩。
- 30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MS fr. (French) 21856, f. 40.
- 302 Voltaire, *Lettres inédites à son Imprimeur Gabriel Cramer*, Introduction.
- 303 多虧了魯宜 (Ruiz) 家族遺留的檔案，我輩對於南特的轉運站角色，這才有了鉅細靡遺的認識。來自西班牙的魯宜家族從事商業金融，扮演法國與西班牙兩國間的橋樑。十六世紀晚期，安德列·魯宜與席蒙·魯宜負責將法國的紙張運往西班牙，其中安德列與提耶爾一帶的造紙商過從甚密，當地亦有西班牙的採購代表常駐。一五五二年，安德列將兩千零四十一網紙張寄往西班牙，每網的數量在十八到二十四令間（每令包含五百張全開紙）。一五五三年，他又遣人將八百二十六網紙運回國內，一五五四與五五年則分別購入三百八十三網與四百三十六網。一五五

七到一五六四年間，他一共把一千零五十七個書頁派送回國，其中九百一十九個來自里昂，一百零三個來自巴黎（巴黎的書頁中，多數皆自里昂下單訂購）。其事業版圖甚至延伸至布爾戈斯、瓦拉朵麗（Valladolid）、薩拉曼卡等地，唯交易仍以坎波城為核心。檔案裡的席內統（Senenon）與佩斯諾（Pesnot）係里昂書商，其中佩斯諾出版鋪的經營者，起初曾任命其姪查理·佩斯諾在坎波城擔任代理商，最後並由返回里昂的查理繼承店鋪。之後崛起的季翁塔家族、路伊波托納里家族（the Rouille-Portonaris）、米利家族（the Millis），皆在坎波城派駐代表。一五七四年，在安德列·魯宜的安排下，一百二十六個教會儀式用書，從安特衛普運抵西班牙；一五七八年，他更與德拉卜雷薩（Francisco de la Presa）合作籌設大型商社，以滿足西班牙對教會儀式用書的需求。這項計畫雖然失敗，相關檔案卻披露，每日須繕需求達一千五百冊的主教，在當時的西國境內即多達五十位。總的來說，西班牙境內約有四十架印刷機，足以印出四萬冊彌撒經本以及四萬冊每日頌禱。Cf. H. Lapeyre, *Une Famille de Marchands, les Rays*, Paris, 1955, p. 566 ff. 至於南特做為轉運中心的價值，彰顯在該城鎮的位置上（羅亞爾河口）。至於水運成本低於陸運的情形，可由以下比較窺知。（One taken from Lapeyre [op. cit.] the other from E. Trocmé and M. Delafosse, *Le Commerce Rochelais de la Fin du XV^e Siècle au Début du XVII^e Siècle*, Paris, 1952, p. 95.）

一五六三年間，由里昂運書前往西班牙與葡萄牙（途經拉羅榭）的成本：

里昂至拉羅榭的馬車（陸路）

五至六里荷

拉羅榭至畢爾包

十四至十六索（上述成本的八分之一）

拉羅榭至里斯本

二十索（六分之一）

拉羅榭至塞維爾

一里荷又十索（四分之一）

由里昂運送二十一冊書籍（低於平均託運量）至坎波城（途經南特）的成本：

里昂至南特（先走陸路，而後取道 一里荷七索；五六三瑪拉維帝（maravedis，古西班牙銅幣單位）

羅亞爾河）

水運保險費

百分之四：約三六五瑪拉維帝

畢爾包至坎波城

四八八瑪拉維帝

如此簡單比較，解釋了「里昂—拉羅榭」的陸運路線何以乏人問津，以及書商為何偏好以羅亞爾河道途經南特運

送貨品。

304 這裡必須強調，前文乃至於後文所說的以物易物，皆指以書易書，不過也有不少書商以書籍換取其他貨品。幾乎所有的書商，都會以書貨換取印書所需的紙張。小鎮書商則以書籍換得當地出產的貨品，貴諾布爾的尼可拉 (Nicolas of Grenoble) 即是一例。這位富有的錢莊老闆與皮革商，會將手套、羚羊皮運往巴黎和里昂，償抵他向書商進書的貨款。

305 A. Claudin,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Vol. 1, p. 67 ff.; F. Milkau, *Handbuch der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Vol. 1, p. 875 ff.

306 M.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p. 262 ff.

307 H. Brésard, *Les Foires de Lyon au XV et au XVI Siècle*, Lyons, 1914.

308 J. Guignard, 'Les Premiers Éditeurs de Rabalais', in *Association des Bibliothécaires Français. Bulletin d'Information*, no. 13, March, 1954, p. 13 ff.

309 F. Milkau, op. cit., Vol. 1, p. 879 ff.; Fr. Kapp and J. Goldfriedrich,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Leipzig, 1886; H. Estienne, *The Frankfurt Book Fair*,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W. Thompson, Chicago, 1911.

310 See Kapp and Goldfriedrich, op. cit., Vol. 1; H. Estienne, op. cit.; A. Dietz, *Zur 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Büchermesse, 1462-1792*, Frankfurt, 1921.

311 F. Milkau, op. cit., p. 894.

312 A. Growoll, op. cit., and the works cited in note 310.

313 G. Weill, *Le Journal, Origine, Évolution de la Presse Périodique*, Paris, 1934 (Vol. 95 of *L'Évolution de L'Humanité*), p. 19 ff.

314 H. Falk, *Les Privilèges de Librairie sous l'Ancien Régime*, Paris, 1906.

315 *Brigwisseling van de Gebroeders Verdussen, 1669-1672*, ed. By M. Sabbe, Antwerp-The Hague, 1936, 2 Vols.; H. J. Martin, 'L'Édition Parisienne au XVII Siècle', in *Annales*, 7th Year, 1952, p. 309-319.

316 G. H. Putnam, *Books and Their Market during the Middle Ages*, London, 1896-1897, 2 vols.

■第八章 印刷書：變革的推手

- 317 當然，如此粗估只是為了揣摩其規模。根據薩布林斯基（Vladimir Loubinsky）的說法，當時的總印量應在一千兩百萬到一千萬冊之間。Cf. the review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present book in *Vesnik Istorii Mirovoi Kul'tury*, Moscow, 1959, no. 4.
- 318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Vol. 18, *La Civilisation Écrite*, Paris, 1939; R. Steel, 'What Fifteenth Century Books Are About', in *The Library*, New Series, Vol. 5, 1903-07; J. M. Lehnart, *Pre-Reformation Printed Books: a study in statistical and applied bibliography*, New York, 1935.
- 319 W. A. Copinger, *Incurtabula Biblica*, or, *The First Half Century of the Latin Bible*, London, 1892. In an appendix the author quotes 437 editions of the Bible in the 16th century. (See *Gesamtkatalog* under 'Bible'). The examples given are taken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are only an indication, not meant to be definitive.
- 320 M. Pellechet, 'Jacques de Voragine. Liste des Editions de des Ouvrages Publiées au XV Siècle' (from the *Revue des Bibliothèques*, April, 1895).
- 321 See particularly B. Woledge, *Bibliographie des Romans et Nouvelles en Prose Antérieurs à 1500*, Geneva, 1954.
- 322 O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in the 15th century, see G. Sarton, 'Scientific literature transmitted through incurtabula', in *Ostria*, Vol. 5, 1938, p. 41-245.
- 323 B. Gilles, 'L'ens Progrès de la Technique', in *Revue de Synthèse*, 32, 1953, p. 69-88.
- 324 E. P. Goldschmidt, *Medieval Texts and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Print*, Oxford, 1943.
- 325 The examples given are from notes prepared by P. Renouard for the *Bibliographie des Impressions Parisiennes au XVI Siècle*. For Lyons see *Bibliographie Lyonnaise* by J. Baudrier. For England, the *Short Title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before 1640*, edited by Pollard and Redgrave, London, 1926. For Germany and Venice, see J. Benzing, *Die Buchdrucker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 im Deutschen Sprachgebiet*, Wiesbaden, 1965.
- 326 The figures are taken from Mille Nicole Bourdel's thesis at the École des Chartes. See also R. Doucet, *Les Bibliothèques Parisiennes au XVI Siècle*, Paris, 1956; A. H. Schutz, *Vernacular Books in Parisian Private Libraries of the Sixteenth*

- Century;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1958.
- 327 Cf. R. Doucet, op. cit.
- 328 P. Ritter,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Alsacienne au XV et XVI Siècle*, p. 463 ff.
- 329 P. Renouard's notes.
- 330 R. Proctor, *The Printing of Greek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Oxford, 1900; British Museum, *Greek Printing Types, 1465-1927*,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London, 1927.
- 331 Paul Colomies, *Gallia Orientalis*, The Hague, 1665; Paul Colomies, *Italia et Hispania Orientalis*, the Hague, 1730; Wilhelm Bacher, *Die Hebrä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vom 10 bis zum 16 Jahrhundert*, Traves, 1892; Bernhard Walde, *Christliche Hebraisten Deutschlands am Ausgang des Mittelalters*, Münster-in-Westfalen, 1916; *Encyclopedia Judaica*, see 'Hebräische Sprache (Christliche Hebraisten)'; Daniel Merowski, *Hebrew Grammar and Grammarians Throughout the Ages*, Johannesburg, 1955 (doctorate thesis); L. Kuckenheim,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Grammaire Grecque, Latine et Hébraïque à l'Époque de la Renaissance*, Leyden, 1951. J. Soury, *Des Études Hébraïques et Exégétiques chez les Chrétiens d'Occident*, Paris, 1867; Samuel Berger, *Quem Notitiam Linguae Hebraicae Habuerim Christiani Medii Aevi Temporibus in Gallia*, Nancy, 1893.
- 332 D. W. Amram, *The Makers of Hebrew Books in Italy*, Philadelphia, 1909; C. B. Friedberg, *Toledoth Ha-defous Ha-ivri Bi-medinoth Italya, Aspanya-Portugalya, Togerma We-aristoth Hakadem*, (History of Printing in Italy, Spain, Portugal, Turkey and the West), Antwerp, 1934; Giacomo Manzoni, *Annali Tipografici dei Soncini*, Bologna, 1883-86. Vols. 1 and 2 the only ones to appear.
- 333 C. B. Friedberg, *Toledoth Ha-defous Ha-ivri Be-arin Ha-ele Chebe-Erope Ha-ritkhona: Augsburg, Offenbach*. (History of Hebrew printing in the following Towns in Central Europe: Augsburg, Offenbach), Antwerp, 1935; K. Haebler, 'Die Deutschen Buchdrucker des XV Jahrhunderts' (a chapter from *Die Hebräische Drucker, 1475-1500*, Munich, 1924.)
- 334 C. B. Friedberg, *Toledoth Ha-defous Ha-ivri be Polonye*, (History of Hebrew printing in Poland), Antwerp, 1933.
- 335 H. Ormon, 'Alphabets Grecs et Hébreux Publiés à Paris au XVI Siècle' (from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Paris et*

- de l'île-de-France, 1885); H. Ormont, 'Spécimens de Caractères Hébreux Gravés à Paris et à Venise par Guillaume Le Bé (1546-1574)' (from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Paris*, 1887); H. Ormont, 'Spécimens de Caractères Hébreux, Grecs, Latins et de Musique, Gravés à Venise et à Paris par Guillaume Le Bé (1545-1592)' (from *Mémoires*, 1889); E. Howe, 'An Introduction to Hebrew Typography', and 'The Le Bé Family', in *Signature*, 5, 1937 and 8, 1938.
- 336 R. N. Rabinowitz, *Maamar'al Hadpassah Ha-Talmud* (The printing of the Talmud), Munich, 1877; 2nd edition, Jerusalem, 1940.
- 337 Alexander Marx, 'The Choice of Books by the Printers of Hebrew Incunables' reprinted from *To Doctor R*, Philadelphia, 1948.
- 338 在西葡兩國遭到驅逐後，猶太印刷師轉往土耳其設舖，頗得當地接納，並成爲土國印刷業的濫觴。土耳其因而成爲希伯來文印刷書的搖籃，其中《雅各家族四代記》(*The Book of the Four Generations of Jacob*)約在一四九二到一五〇三年間出現於當地。至一五〇三年，已有不少猶太印刷商在土耳其帝國境內開業。知名的德尙西諾(Gerson de Soncino)，一度在一四八九到一五三四年間，游走八座義大利城鎮執業，後因感慨心血屢遭盜印，同行競爭激烈，落腳土耳其；他的出版印記，散見於薩洛尼卡(Salonica)與君士坦丁堡等地。Cf. G. Manzoni, *Annali Tipografici dei Soncini*, and A. M. Habermann, *Ha-madpissin bene Soncino*, Vienna, 1933; 也因爲猶太人僑居土耳其的建樹頗多，德尼柯萊(Nicola de Nicolay)甚至在二五八六年的著作《土耳其舟車行腳紀實》(*Discours et Histories Véritables des Navigations, Pérégrinations et Voyages Fais en Turquie*)當中，不無誇大地聲稱猶太人「在君士坦丁堡架設印刷機，係近東地區之空前創舉，並選用合宜字體，以之印刷希臘文、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乃至於黎凡特地區口語文字之書籍」。Cf. A. Blum, 'L'Hébraïsme à Constantinople après la Conquête Turque', in *Revue des Deux-Mondes*, May 1943, p. 98 ff., and C. Roth, 'Jewish Printers of Non-Jewish Books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y', i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 IV, 3, 1953.
- 339 F.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Vol. 2: 16th Century, p. 3, Paris, 1905-1953, 13 Vols.
- 340 H. B. Lathrop, *Translations from the Classics into English from Caxton to Chapman (1477-1620)*, Madison, Wisconsin, 1933.

- 341 G. Mambelli, *Gli Annali delle Edizioni Virgiliane*, Florence, 1954.
- 342 A. J. Festigière, *La Philosophie de l'Amour de Marsille Ficin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VI Siècle*, 2nd edition, Paris, 1944.
- 343 *Bibliotheca Belgica*, 2nd edition, Vols. 6-14.
- 344 Cf. P. P. Plan, *Les Édition de Rabelais de 1532 à 1711*, Paris, 1904.
- 345 G. Duplessis, *Les Emblèmes d'Alciaia*, Paris, 1884; M. Parz, *Stud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Imagery*, London, 1939, 2 Vols.
- 346 L. Febvre, *Le Problème de l'Incroycance au XVI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 Paris, 1968 (reprint); L. Thronldike, *Science and Thought in the 15th Century*, New York, 1929. Here we confine discussion to a brief review of the ques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se two works. We should also mention a very valuable guide: Geroge Sarton, *Th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1955.
- 347 On the evolution of illustration from the early fabulous pictures to accurate observation of nature, see Sarton, op. cit., p. 89 ff.
- 348 B. Penrose, *Travel and Discovery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1952; G. Atkinson, *Les Nouveaux Horizons de la Renaissance Française*, Paris, 1935.
- 349 Van Tieghem, 'La Littérature Latine de la Renaissance',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I, 1944, p. 177-409.
- 350 Cf. p. 371 in Verso edition.
- 351 H. Hauser, *La Naissance du Protestantisme*, Paris, 1940, and *Études sur la Réforme Française*, Paris, 1909, p. 86 ff., and p. 255 ff.
- 352 J. P. Seguin, 'L'Information à la fin du XV Siècle en France,' in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October/December 1956, no. 4, and 1957, nos. 1 and 2.
- 353 On the widespread influence of Ulrich von Hutten's works, see J. Benzling, *Ulrich von Hutten end seine Drucker*, Wiesbaden, 1956.
- 354 L. Febvre, *Un Destin: Martin Luther*, Paris, 1928.
- 355 M. Gravier, *Luther et l'Opinion Publique*, Paris, 1942.

- 356 A. Goetze, *Die Hochdeutschen Drucker der Reformationszeit*, Strasbourg, 1905.
- 357 C. Ritter, *Histoire de l'Imprimerie Alsacienne au XV et au XVI Siècle*, pp. 384-396.
- 358 On this see the Weimar Edition. And see O. Clennen, *Die Lutherische Reformation und der Buchdruck*, Leipzig, 1939.
- 359 A. Tricard, 'La Propagande Évangélique en France: l'Imprimeur Simon Dubois (1526-1534)', in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Geneva, 1957, p. 1-37.
- 360 J. Baudrier, *Bibliographie Lyonnaise*, Vol. 8; J. Plattard, 'L'Écu de Bâle', in *Revue du XVI Siècle*, Vol. 13, 1926, p. 282-285; P. Renouard, *Imprimeurs Parisiens. Libraires et Fondateurs de Caractères*, op. cit., articles on Cabiller, Resch, and Vidoue; E. Hubert, 'Chrétien Wechel, Imprimeur à Paris', in the *Gutenberg-Jahrbuch*, 1954, p. 181-187.
- 361 J. Veyrin-Forrer, 'Antoine Augereau, Graveur de Lettres et Imprimeur Parisien (vers 1485-1534)', in *Paris et Ile-de-France. Mémoires Publiés par la 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Historiques...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 1957.
- 362 N. Weiss, *Jean Du Bellay, les Protestants et la Sorbonne (1529-1535)*, Paris, 1904.
- 363 W. G. Moore, *La Réforme Allemande et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 446 ff. and passim.
- 364 N. Wiess, and V. L. Bourilly, 'Jean Du Bellay, les Protestants et la Sorbonn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u Protestantisme Français*, Vol. 53, 1904, p. 97-143; L. Febvre, 'L'origine des Placards de 1534',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7, 1945, p. 62-75; R. Harf, 'Les Placards de 1534', in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Geneva, Droz, 1957, p. 79-142. The articles in the last mentioned work are of outstanding merit.
- 365 H. Hauser, *Études sur la Réforme Française*, p. 255-298.
- 366 T. Dufour, 'Notice Bibliographique sur le Catéchisme et la Confession de Foi de Calvin (1537) et sur les Autres Livres Imprimés à Genève et à Neuchâtel dans les Premiers Temps de la Réforme (1533-1540)', p. ccx-cclxxxviii of *Le Catéchisme Français de Calvin*, Geneva, 1878; J. Guignard, *L'Introduction de l'Imprimerie à Neuchâtel et Pierre de Vingle*, Neuchâtel, 1933; H. Delarue, 'Olivétan et Pierre de Vingle à Genève, 1532-1533', in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Vol. 8, 1946, p. 105-118; E. Droz, 'Pierre d'Vingle, l'Imprimeur de Farel', and G. Berthoud, 'Livres pseudo-Catholiques de Contenu Protestant', in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p. 38-78, and p. 143-166.

- 367 See P. Chaix, *Recherches sur l'imprimerie à Genève de 1550 à 1564*, Geneva, 1954; M. Kingdom,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France, 1555-1563*, Geneva, 1956.
- 368 P. Imbart de la Tour, *Les Origines de la Réforme*, Paris, 1935, Vol. 4, p. 292-299.
- 369 H. L. Schlaepfer, 'Laurent de Normandie', in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p. 176-230.
- 370 E. Droz, 'Antoine Vincent. La Propagande Protestante par le Psautier', in *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p. 276-293.
- 371 Cf. A. Meillet, *Les Langues dans L'Europe Nouvelle*, Paris, 1928, p. 16.
- 372 F.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Vol. 2: *Le XVI Siècle*, p. 2 ff.
- 373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nvers au Temps de Plantin et de Ruben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p. 95.
- 374 J. M. Sanchez, *Bibliografía Argonesa del Siglo XVI*, Madrid, 1913, 2 Vols.
- 375 Information from the papers of P. Renouard.
- 376 E. Wiler, *Repertorium Typographicum.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ersten Viertel des Sechzehnten Jahrhunderts*, Nordlingen, 1864; F. Milkau, *Handbuch der Bibliothekswissenschaft*, Vol. 1, p. 516 ff.; B. Clause, 'Niederdeutsche Drucke im XVI Jahrhundert', in *Zeitschrift für Bibliothekswesen*, 29, 1912, p. 201 ff.
- 377 E. Tonnelat, *Histoire de la Langue Allemande*, Paris, 1927, p. 127-145.
- 378 Cf. E. Tonnelat, *op.cit.*, p.125.
- 379 F. Mossé,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a Langue Anglaise*, Lyons, 1947, p. 105 ff.
- 380 Quoted in Mossé.
- 381 F. Brunot, *Histo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Vol. 2: *Le XVI Siècle*, Paris, 1931; C. Beaulieux, *Histoire de l'Orthographe Française*, Paris, 1927, 2 Vols.
- 382 R. Menéndez Pidal, 'El Lenguaje del Siglo XVI', in *Cruzy Raya*, 6th and 15th September 1933, p. 7-63.

索引

一畫

《一七〇二年起中國異聞與啓示》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puis
1702 272

《一統語文之正確變易法則：兼論法語標音符號之長處與地方腔調》

Manière de bien traduire d'une langue en autre. D'avantage de la punctu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lus Des accents d'ycelle 411

二畫

卜道繼 Tyndale, William (149?-1536) 408

七星詩派 *Pleiade, the* 115

《七賢十傳》 *Historia septem sapientium* 218

一回轉印刷機 two-revolution press 21

「人工摹字」技術 *ars artificialiter scribendi, art of artificial writing*

70

人文主義・人文思維・人文思潮

humanism 22, 104, 107, 109, 111, 114-115, 119, 150, 156, 183, 185, 187, 189, 191-192, 195, 197, 200, 203-204, 225, 235-237, 253, 271, 304, 318, 321, 328-329, 333-334, 338-340, 346-347, 350, 385, 410-412

人文主義者 humanists 42, 72,

102-105, 115, 119, 126, 140, 156, 160, 183-184, 187-188, 190, 204, 224-225, 227, 237-238, 240, 318, 322, 327-328, 333, 338, 345, 348-350, 359, 369, 403

人文體 humanist script, the 102, 104-106

《人類世系之救贖》 *Mirouer de la Rédemption de l'humain lignaige*

118
《人類生命之鏡》 *Speculum*

humanae vitae 125, 227

《人類救贖之鏡》 *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 58, 72, 121-122

《人體結構七卷》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libri septem 351

《人體結構圖》 *Vivae imagines*

partium corporis 130

《八文十集》 *Auctores octo* 40,

319-320

刀（紙張計量單位） *quire* 27, 47

《力學論》 *Mechanica* 349

《十日談》 *Decameron* 155, 187, 323

三畫

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

116, 195, 247, 295-296

《三位一體參照論》 *De Trinitatis*

Erroribus 370

《三洲地理管鏡》 *Epitome trium*

- terrae partium* 291
- 《三領總》 *Triodion* 260-261
- 《上主禱詞解》 *Explanation of the Lord's Prayer* 369
- 《上古猶太史》 *Jewish Antiquities* 358
- 上座之城 *City of God, the* 32, 316
- 凡林克 *Van Eyck (137?-1441)* 121
- 凡森 *Vincent, Antoine* 384, 394, 397, 401
- 《凡爾登彌撒經本》 *Missal of Verdun* 119
- 千伊家族 *Huy family, the* 130
- 千圭坦家族 *Huguetans, the* 182
- 千格(樞機主教) *Saint-Cher, Hugues de* 160
- 千爾菲 *Urfé, Honoré d'* 205, 363
- 千澤斯 *Uzès* 219
- 土耳其 *Turkey* 258, 338, 356, 438
- 土耳其人 *Turks* 76, 356
- 《土耳其敘利亞埃及遊記》 *Travels in Turkey, Syria and Egypt* 356
- 土倫 *Toulon* 399
- 土魯斯 *Toulouse* 45, 49, 57-58, 104, 151, 153-154, 191, 193, 199,
- 213, 218, 232, 239-240, 247, 286, 289, 380, 394
- 士瓦本 *Swabia* 190, 379, 407
- 大布伊爾 *Buyer, Pierre* 152
- 大目體 *Gros Oeil* 81
- 大帖 *gros cahier* 92
- 大阿爾伯特圖版 *Albertus Magnus (?)1200-1280)* 325
- 大寫字母體 *upper case* 83
- 大羅馬體 *Gros Roman* 81
- 大議會 *Great Council, the* 116
- 《女罪人心靈之鏡》 *Miroir de l'âme pécheresse* 391
- 小布伊爾 *Buyer, Barthélemy* 150, 152-156, 229, 232, 286, 379
- 小貝羅阿爾 *Beroldus, Filippo, the Younger* 334
- 小帖 *feuilleton* 92
- 小阿爾都斯 *Manutius, Aldus the Younger* 292
- 「小張」 *petite forme* 27
- 小寫字母體 *lower case* 83-84
- 小廟 *alloué* 174, 393
- 小橋 *Petit Pont* 155
- 小魏迪茲 *Weiditz the Younger,*
- Hans (149?-1536) 123
- 《小鏡》 *Berbüchlein* 369, 383, 389
- 山維德 *Champlain, Samuel (1567-1635)* 356
- 山維半 *Sambuca, Jean* 130
- 工作間 *atelier, workshop* 38-40, 132, 135, 165, 216
- 工作 *workshop* 32, 39-40, 55, 64, 66, 76, 94, 99, 130, 135, 137, 150, 155, 158, 160, 162, 167-169, 172, 175, 200, 216, 219, 221, 223, 225, 230-231, 234, 237, 242-243, 247, 254, 258-260, 308, 397
- 四圖
- 《不列顛本國律法評註》 *Commentarii in Parras Britonum Leges* 281
- 中國 *China* 8-9, 43, 93-99, 139, 270-273, 355, 357
- 《中國回憶錄》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272
- 《中國概況》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272

- 中開 median 93
丹麥人歐吉 Oger the Dane 361
《五旬期經本》 *Triod Cwinaja*
254
什列斯威 Schleswig 214
內克 Necker (1732-1804) 201
內得里斯塞 Nedelišće 258
內費迪耶夫 Nefediev, Marusha
260
內維雅 Neveja, Andronik 261
公共文書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45
《公侯論》 *Institution du Prince*
404
公證人 notaries 166, 330
分工合理化・合理分工
rationalisation 40, 165, 247
分支教會 chapter 52
分區化 fragment, fragmentation
296-297, 307, 416, 418
分置 (活字) distribution 83-84
切爾尼戈夫 Chernigov 261
友弟德 (猶滴) Judith 117
《反克勞狄安》 *Anti-Claudians*
327
- 反宗教改革 (運動) Counter-
Reformation 116, 195, 240, 245-
246, 307, 415
《反猶太背信論》 *Tractatus contra
perfidios Judaeos* 340
《天父》 *Paters* 381
天主教聯盟 Catholic League, the
305
《天主經與信經普變》 *Exposition
Familière de l'Oraison Dominicale
et des Articles du Credo* 381
天使報喜日 Annunciation, the 39
《天體運行論》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351
夫羅曼塔街 Fromentalle, Rue 226
孔狄亞克 Condillac (1715-1780)
209
孔塔弗內森 Comtal Venaisin 46
《少年版格勒孟書》 *Adolescence
clementine* 410
尤參・德羅姆 Rome, Joachim de
153
尤斯達許・弗洛蕭爾 Froschauer,
Eustache 57
尤維納利斯 Juvenal 187, 320
- 巴比克 Babić, Jacob 256
巴比耶 Barber, Synphonien 142,
157
巴卡利 Bakalar, Mikuláš (1489-
1513) 251
巴伐利亞 Bavaria 253, 255, 340,
407
巴托里 (波蘭王) Stephen
Báthori, King of Poland 255
巴托魯斯 Bartolus (1314-1357) 44
巴西 Brazil 131, 268, 269
巴克萊 Barclay, William (1582-
1621) 416
巴克諾瓦 Baquenois 393
巴杜爾 Baduel, Claude 191
巴里高 Balgault, Philippe 156
巴拉丁公爵 Count Palatine 182
巴拉爾 Ballard 56
巴松皮埃爾 Bassompierre 281
巴斯爾・回默巴赫 Amerbach,
Basil 184
巴格里翁 Baglione, Braccio 218
巴泰勒米 Barthélemy, François
158
巴勒迪克 Bar-le-Duc 58

- 巴哈(萊因哈德) Berthold, Archbishop of Mainz 309
- 巴斯平 Pascal 417
- 巴斯克維 Baskerville, John 60, 202
- 巴斯德世 Basnage, Henri 299, 418
- 巴登巴登 Baden-Baden 150
- 巴達 Ballon, Nicholas 400
- 巴塞隆納 Barcelona 184, 213, 240-241, 326, 352
- 巴賽德 Basel 50, 57-58, 67, 104, 110, 118, 120-121, 124, 127, 148-150, 153, 157, 160, 178-179, 183-184, 218, 225, 231, 233, 235, 237-240, 246, 277, 280-281, 290-291, 293-295, 304, 312, 315, 334, 336-337, 341, 349, 351-352, 354, 372, 375-376, 378-385, 396, 407
- 「巴賽德塞」 *Écu de Bale* 375, 379-380, 382-384
- 巴賽德·厄文圖 Amoulllet, Balthasar 394
- 巴德 Bart, Jean 282
- 巴德比 Balbi, Giovanni 76, 315
- 巴德比 Barbou 182, 201
- 巴德比 Balzac, Honoré de 211
- 巴德比 Barbé, Jean 189
- 巴德比塞爾 Baldung-Grien, Hans (148?-1545) 110, 124
- 巴德賓 Barbin, Claude 206, 210, 228
- 巴德曼斯 Valdes, Juan 414
- 巴黎 Paris 26-27, 32, 45-46, 52-54, 56, 74, 89, 99, 101-104, 106, 110, 115, 119-122, 127, 128-132, 141-146, 151-156, 158, 160-163, 166-172, 174, 180, 181, 182, 183, 184, 188, 189, 192, 194, 197, 199, 200, 213, 216, 221-228, 230-235, 238-239, 241-242, 245, 247, 249, 272, 279-287, 291-292, 294, 297, 299, 302, 304, 306-308, 311, 315, 319, 321-322, 329, 331-338, 341, 347, 350, 352-353, 356-357, 364, 374-386, 389-394, 396-397, 399-401, 404-405, 411, 415, 417
- 《巴黎風物誌》 *Tableaux de Paris* 279
- 《巴黎叢書》 *Bibliographia Parisiana* 297
- 《巴黎叢書》 *Antiquitez de Paris* 360
- 《巴羅風物誌》 *Balaam and Josephat* 251
- 《心臟小圃》 *Horvilius animae* 124, 255
- 《心臟叢書》 *Antidotarium animae* 255
- 戈林 Gering, Ulrich 53, 103, 105-106, 156, 225-227, 232, 234, 336
- 《戈德弗拉其其人其書》 *Faitz et gestes de Godfrey de Bouillon* 323
- 《書史》 *Libretto* 353
- 手寫本 manuscripts 18, 24-26, 28-33, 37-40, 42, 44, 46, 63, 77, 92-93, 95, 100-103, 105, 107, 109, 112-113, 116-117, 119, 121, 126, 134-135, 155, 160, 180, 184, 187-188, 196, 203, 207, 223-224, 251, 258, 262, 285, 303, 312-313, 316, 320, 325-329, 331, 339, 354, 361
- 半個厄文圖 hand press 21, 60, 62, 90, 134

- 手寫字跡 handwriting 100, 102, 107, 168
 《文人共和國新象》 *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299
 《文藝哲學叢書》 *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209
 文字事實 typographic fact 130
 《文法教本》 *Doctrinal/Doctrinale* 110, 318
 《文集》(國譯古語一編) *Works* 253
 文藝復興時代 Renaissance man 190
 方丹 Fontaine, Claude 194
 方書 vernacular 22, 33-34, 37, 65, 76, 102, 107-108, 120, 125-126, 196, 246-247, 270, 296, 316-317, 319, 322-323, 330, 339, 343-344, 350, 358-359, 365, 368, 373-374, 403-407, 414-418
 《方法論》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227, 278, 417
 日内瓦 Geneva 168-170, 173-174, 182, 189, 192, 200-201, 244, 246, 291, 294, 301, 376, 379-380, 384, 390, 392, 394-402
 日内瓦兩百人議會 Genevan Council of Two Hundred, the 201, 396
 日本 Japan 270, 273, 356
 木刻版畫 block-prints 63-64, 117, 125, 129, 155, 233
 木版・木刻版 wood-cut 62, 64-67, 72-73, 84, 111, 118, 124, 126, 128-131, 240, 252, 255, 261, 270-271, 317
 木版印刷 xylography 63, 65-67, 72, 74, 97-99, 117
 木提耶 Moutiers 214
 比利時 Belgium 161, 219, 232, 249, 289, 375
 比里蘭 Buridanus, Iacopus (1300-1358) 224, 315, 364
 比拉 Budé, Guillaume (1467-1540) 188, 191, 348, 391, 404, 412, 415
 比摩 Bidpay 125
 比德 Bill, John 294
 比德森 Pilsen 250-251
 比維斯 Vives, Juan Luis (1492-1540) 348
 比薩 Pisa 151, 285
 毛佛特 Maurent 233
 毛萊 Maurus, Rabanus (776-856) 314
 《水星書局印書》 *Mercurius Librarius* 298
 牛津 Oxford 58, 212, 242, 338
 《王子的透鏡》 *Lunettes des Princes* 323
 五書
 世宗 Sejong 98
 《世宗之鑒》 *Fainisès du Monde* 324
 世蘭 Chuquet, Nicolas (1445-1488) 326
 《天主之書》 *Book of Divine Providence* 316
 天主聖人 patron saint 64, 180
 《天主之書》 *Dialogues of the Soul with God, The* 316
 「天主之家」鑲嵌 Hôtel-Dieu 155
 主題圖案 motifs 138
 以小格鑲 au petit fer 138

- 以模裁成 *taillé en moule* 73
 以模鑄成 *jeté en moule* 72-73
 代理主教 *vicar-general* 309
 令 *reams* 27, 47, 52, 55, 60, 144-147
 巴黎·巴黎 *ingaglio, impression* 63
 出版同業公會 *Company of Stationers* 181, 242
 出版同業公會議院 *Court of the Company, the* 181
 出版註記 *imprints* 392, 396
 出版商 *publisher* 59, 106, 109-112, 120-121, 124, 126-128, 130, 132-133, 135, 137, 139-140, 142-143, 148, 155-159, 161, 163, 175-177, 179-181, 183, 185, 189-190, 195-196, 198-201, 204-206, 208-211, 226, 229, 235-238, 240-241, 243, 245-249, 251, 256, 260, 263, 274, 276, 278-280, 285, 291-293, 295-297, 300, 303-309, 313, 319, 334, 337, 341, 343-344, 347, 350-351, 380, 382-385, 388-389, 393, 395-397, 399-401, 403, 411, 413
- 加比亞尼家族 *Gabiani, the* 289
 加尼爾 *Garnier* 281
 加布列·克拉默 *Cramer, Gabriel* 200
 加地斯 *Cadiz* 200, 281
 加佐 *Gaszeau* 124
 加拉蒙 *Garamond (?-1561)* 80, 107, 337
 加拉賽神父 *Garasse, Father* 198
 加洛林小寫草書體 *Carolingian minuscule* 102
 加倫 *Galen, Claudius (129-?199)* 224, 349
 加埃塔 *Gaeta* 214
 加泰隆語 *Catalan* 346
 加普 *Gap* 395
 加達湖 *Garda, Lake* 45
 加黎·杜蒲雷 *Du Pré, Galiot* 107, 109
 加薩 *Gaza, Theodore (?1398-?1478)* 186
 北京 *Peking* 8, 95, 271
 半日坎與 *Cavalcaniti, Maghinardo dei* 35
 半布呂 *Capua* 214
- 半本查斯 *Carpentras* 52, 191
 半皮敦 *Capton* 343, 377
 半同恩 *Carone, Angelo* 218-219
 半克洛芬 *Kachelofen, Konrad* 234
 半克斯頓 *Caxton, William (?1422-1491)* 232, 241
 半利 *Cagli* 212
 半利庇諾 *Calepino, A.* 334, 412
 《半利庇諾語典》 *Calepinus* 178
 《半利斯托與梅爾西諾》 *Calistro y Melbea* 346
 半拉喬利 *Caraccioli, Roberto* 276
 半拉羅斯 *Clajus, Johann* 407
 半洛 *Callot, Jacques (?1592-1635)* 131
 半唐 *Carane, Moché* 338
 半特雷 *Careron, Antoinette* 278
 半特潤希斯的德蘭德塔德格 *De Palastichis Caterensis, Andreas* 259
- 《半索羅維》 *Casolovec* 254
 半斯提爾語 *Castilian* 360, 414
 《半斯提爾語法》 *Grammatica Castellana* 414
 半斯提羅 *Casillo* 179

- 卡斯頓 Caston, William (1692-1766) 202
 卡斯當河米 Castanhedo 355-356
 卡斯蒂流區 Castiglione, Balhasar (1478-1529) 346
 卡普加薩 Capcasa, Matteo 276
 卡蒂埃 Cartier, Jacques (1491-1557) 356
 卡圖 Cato 40, 125, 319, 363
 卡圖盧斯 Catullus 335
 卡爾皮 Carpi 186
 卡爾斯薩 Carlstadt (1480-1541) 372
 卡維約歐 Caviceo, Jacomo 346
 卡蒙斯 Camoens, Luis de (1522-1580) 354
 卡德利諾 Calderino, Domizio (1447-1478) 185
 卡德魯西的戴文 Davin of Cadrousse 71
 卡慕薩 Camusat, Jean 146, 196, 300
 占星學 astrology 325
 《可愛少女》 *Précieuses ridicules* 207
 《古蘭經》 Koran 32
 《古今奇蹟類編詳錄》 *Icones veterum aliquot et novorum medicorum philosophorumque* 130
 古文學界 philologists 322, 345
 古戎 Goujon, Jean (?1510-1567) 124-125
 古希臘羅馬經典的 classic/classical 182, 187, 194, 278, 334, 345, 350
 《古學錄》 *Antiquité Expliquée* 279
 古森一世 Cousin the Elder, Jean (?1495-1560) 125
 古廷勃 Cullenburg 214
 古斯格夫一世 (瑞典國王) Adolphus, Gustavus (1594-1632) 295
 古魯德 Courcelles 57
 古里川爾 *homo trilinguis* 338
 古爾德 Gulenberg, Johann (1397-1468) 22, 28, 43, 53, 55, 57, 62, 66-67, 69-70, 72, 74-76, 93, 183, 216-217, 219, 231, 250, 270, 312
 同谷杜 Duns Scotus, John (1266?-1308) 159, 183-184, 224-226, 315, 364
 《法學之鏡》 *Speculum Juris* 358
 同徒加 Stuttgart 214
 同覽書版 colporteurs 286, 324, 379, 392, 398, 400
 史瓦巴赫體 Schwabach script 108, 251-252, 256
 史丹利 Strange, John 50
 史托爾 Stoll, Johann 226-227
 《史學寶鏡》 *Miroir historial* 359
 史坦 Stein 52
 史坦納 Steyner (?-1548) 123
 史坦霍普史蘭 Stanhope, Lord (1753-1816) 90
 史威登 Sweynhym, Conrad (?-1477) 105, 118, 217-218, 231, 275, 285, 335
 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 42, 57-58, 69-71, 74-75, 105, 110, 121, 123, 149, 157, 160, 183-184, 212, 216-217, 231, 233, 235-237, 239, 253, 290, 294, 310, 333-334, 337, 351-352, 370-372, 376-378, 380, 389,

- 393, 396, 407
- 史特羅莫 Siroemer, Ulman 52
- 史特羅齊 Strozzi, Ercole 185
- 史波提 Scotti, Jacob 161
- 史密斯 Smith, Thomas 414
- 史塔波恩 Stalboen, Hermann von 225, 285
- 史蒂芬·戴伊 Day, Stephen 265
- 史達奇 Starkey, John 298
- 《史綱》 *Mer des histoires* 324, 359
- 史戴格曼 Stegmann, André 415
- 白夫特 Delft 53, 210, 233, 286
- 《四旬布道本》 *Quadragesimale* 316
- 《四旬期經本》 *Triod Postingia* 254
- 《四聖軼事》 *Four Stories, The* 118
- 《四類書》 *Arba'a Tourim* 342
- 《外地人》 *Provinciales* 198
- 尼可拉·希曼 Higman, Nicholas 144
- 尼可拉·勒讓口 Le Rouge, Nicolas 142
- 尼古拉·杜蘭德 Du Pré, Nicholas 221
- 《尼多斯神廟》 *Temple of Cnidus* 133
- 尼姆 Nimes 281
- 《尼科梅德》 *Nicomède* 278
- 尼韋奈 Nivernais 49
- 尼德利 Nigri, Peter (1434-148?) 340
- 尼寇森 Nicholson 21
- 尼爾梅根 Nimegen 212
- 尼羅 Nifo, Agostino (?1473-15??) 350
- 尼齊佛羅夫 Nikiforov, Vasiuk 260
- 尼德爾 Nider, Johannes 226, 316, 364
- 《尼德蘭史綱》 *Description de tutti i Paesi Bassi* 205
- 《巨人半國都亞傳》(《巨人傳》) *Grandes et hestraïnables Croniques du Grand et Énorme Géant Gargantua* 107, 289, 387
- 世井書刊 sisei literature 300, 302
- 市民同胞 cives nostros (citizens of mine) 384
- 布永 Bouillon 199
- 布瓦洛 Boileau (1636-1711) 205-206, 278
- 布瓦爾 Boyer 281
- 布伊羅 Bouillerot, Joseph 146
- 布列安薩維亞動議 Bréhan-Loudéac, Lord of 220
- 布列塔尼 Brittany 58, 60, 282
- 布列塔尼公國安妮公主 Anne of Brittany 117
- 《布列塔尼年鑑》 *Annales de Bretagne* 360
- 《布列塔尼服飾建築考》 *Costumes et Constitutions de Bretagne* 220
- 布利 Brié 60, 212
- 布世教案 affaire des placards 367, 376, 390
- 布坎南 Buchanan, George (1506-1582) 205
- 布里松尼 Brignonet, Guillaume 367, 373-375
- 布里奎 Briquet, Charles-Moise 45, 48
- 布里寇 Bricot, Thomas 364

- 布里斯托 Bristol 242
 布拉加 Braga 215
 布拉多 Blado 240
 布拉迪斯拉發 Bratislava 253
 布拉格 Prague 67, 70, 212, 238, 250, 252, 256, 340
 布拉班特 Brabant 375, 383
 布拉薩辛 Blagushin, Grigory 261
 布拉維斯 Blavis 233
 布拉赫 Brahe, Tycho (1546-1601) 89, 197
 布林格 Bullinger (1504-1575) 398
 布洛卡 Bullokar, William 414
 布迪境 Bourdichon, Jean (?-1521) 117
 布伦兹 Brenz (1499-1570) 370
 布夏爾德 L'Ille Bouchard 157
 布徐 Busch 160
 布根哈根 Bugenhagen 370
 布格多夫 Burgdorf 212
 布勒 Blaeu, Willem Janszoon (1571-1638) 62, 89, 197, 246
 布勒家族 Blaeus, the 162, 168
 布勞瓦倫 Blaubeuren 212, 222
 布提耶 Buaier, Marie 152
- 布斯赫 Busche, Hermann von dem (1468-1534) 238
 布萊姆 Bremen 50
 布萊莫沃德 Bremervörde 50
 布萊蒙會修士 Premonstrants 222
 布萊德福 Bradford, William 266
 布隆費斯 Brunfels, Otto (1464-1534) 123, 351, 383, 390
 布塞羅 Bucer, Martin (1491-1551) 389, 395
 布歇 Boucher, François 133
 布歇特 Boucher, Jean 360
 《布道集》 Sermons 226
 布達 Buda 120
 布達佩斯 Budapest 160, 212
 布雷西亞 Brescia 212, 232, 336
 布雷斯勞 Breslau 59, 212, 232, 371
- 布雷塞 Blaise, Thomas 300
 布雷達的傑克 Jack of Breida 336
 布爾戈涅 Bourgoigne 189
 布爾戈斯 Burgos 158, 214, 240
 布爾口 Bourges 144
 布爾瓦 Bourgoin 49
 布爾蓋亞體 Bourgeois script 141-
- 142
 布爾諾 Brno 214, 252
 布赫加賽 Büchergasse 291
 布德氏 Boudes, the 57
 布魯瓦 Brunet, Michel 145
 布魯日 Bruges 56, 72, 103, 118, 160, 210, 232
 布魯日的約翰 John of Bruges 102
 布魯尼 Bruni, Leonardo (?1370-1444) 217, 323, 359
 布魯伊賽 Bryset, Jeanne-Marie 281
 布魯克曼 Bruckman 50
 布魯耶利 Brouilly, Jean de 277
 布魯泰因 Brauchin, the 52
 布魯塞爾 Brussels 58, 118, 199, 204, 212, 281, 284
 「布魯塞爾的童貞女」 Virgin of Brussels 64
 布魯諾·阿默巴赫 Bruno 184
 布盧瓦 Blois 157, 376
 布盧瓦的彼得 Blois, Peter of (?1130-?1203) 322
 布盧諾 Brunot, Ferdinand 403-

- 404
 布諾 Banno, Goropius 161
 布豐伯爵 Buffon 133, 209
 布蘭德 Brandt, Sebastian 120,
 184, 345
 《平民讀本暨聖體聖事》 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s
 408
 平奇蘭 Pincio, firm of 235
 弗帖盧庇耶 Ferré-Loupière, La
 122
 弗拉戈納爾 Fragonard 133
 弗林 florins 74, 144-145, 205
 弗洛瑞圖斯 Floretus 320
 弗美爾 Vermeer (1623-1675) 248
 弗朗索瓦·杜布瓦 Du Bois,
 François 188
 弗朗索瓦·安諾維 Frelon,
 François 383
 弗特里 Voltri 45
 弗萊堡 Freiburg 58, 184, 214, 371
 《本草圖鑑》 *Ericones vivae*
herbarum 123
 本博 Bembo, Cardinal Pietro (1470-
 1547) 186-187, 345, 359, 414
 札格拉布 Zagreb 258
 《民刑事務判例》 *Institutes de*
Practique en Matiere Civile et
Criminelle 280
 《民法大全》 *Corpus Juris Civilis*
 278
 《民法全書》 *Corpus of Civil Law*
 357
 《民法總論會共談錄》 *Modus*
Legendi Abbreuiaturas in Uroquo
Jure 358
 民族語匯 national language 343-
 344, 402-403, 405, 408-409, 414,
 416, 418
 《永恆鐘錶》 *Horologium*
Aeternae Sapientiae 316
 永懷由於教會的比爾森 Pilsna
christianissima semperque fidelis
 251
 瓜地馬拉 Guatemala 265
 瓜里尼 Guarini, G. B. 185, 187
 瓜達拉哈拉 Guadaluajara 215
 瓦列奧 Vallean, Antoine 400
 瓦利拉斯 Varillas 206
 瓦希 Vasse, Pierre 281
 瓦杜里斯 Valturus 119
 瓦彼科格 Vaypicola 269
 瓦拉 Valla, Laurentius (1407-1457)
 225, 334
 瓦拉迪一 Varazdin 258
 瓦拉維亞 Wallachia 257
 瓦萊 Valla, Giorgio 350
 瓦威爾 Valverda 130
 瓦倫西亞 Valencia 106, 187, 212,
 276, 286
 瓦西 Wassy 401
 瓦茲堡 Vasberg 178
 瓦連辛 Valenciennes 214
 瓦斯科發家族 Vascosans, the 188,
 345
 瓦隆地區 Walloon 249, 418
 瓦達佛家族 Valdafers, the 233
 瓦達博勒 Variable, Jean 338, 386
 瓦騰徐尼 Wattenesnee 379
 瓦茲特納女修道院 Convent of
Vadlena 214
 《白武士提燈》 *Tirant le Blanch*
 276
 白鐵 pewter 68

- 皮內羅洛 Pinerolo 212
皮科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 185-186, 309
皮耶·杜邦 Du Pont, Pierre 395
皮耶·帕里提耶 Parmentier, Pierre 380
皮耶·勒魯日 Le Rouge, Pierre 155
皮耶·梅特林傑 Metlinger, Pierre 184
皮耶·德文格勒 Vingle, Pierre de 367, 391, 395
皮耶·德維諾諾 Vignolle, Pierre de 396
皮耶弗朗索瓦·迪德 Didot, Pierre-François 203
《皮耶德內森禱詞》 *L'Oraison de Pierre de Nesson* 220
皮耶魯 Roux, Pierre 145
皮迦地 Picardy 53, 395
皮迪耶 Pidier 393
皮埃蒙特 Piedmont 52, 374, 395
皮埃涅洛 Pignerol 52
皮嘉費塔 Pigafetta 355
皮圖 Pithou, Pierre 278
- 皮薩羅 Pizarro (?1475-1541) 263
目錄 catalogues 125, 239, 254, 271, 292-294, 296-298, 300, 330, 375, 383, 387-388, 392, 405
石紋紙 marbled paper 139
石龍尾 marsh weed 51
立陶宛 Lithuania 256, 261
- 六書
仿古體 littera antiqua 102
《伊尼亞德傳》(《埃涅阿斯記》) *Aeneid* 122
伊田忠經 Ichenhausen 340
伊西 Issy 156
伊拉斯謨斯 Erasmus, Desiderius 115, 128, 184, 186, 190, 192, 194, 204, 237, 271, 277, 280, 304, 318, 334, 346, 348, 364, 369, 371, 377-378, 380, 382, 384, 386
伊朗 Iran 99
伊格那芝 Egnazio, Battista 186
伊萊 Aesop 119, 125, 127, 252, 318-320
伊斯哈格 Ibn Ishaq, Mohammed 95
- 伊斯特拉 Istria 259
《伊斯普蘭蒂安的古蹟》 *Sergius de Esplanian* 262
伏爾泰 Voltaire 57, 128, 198, 200-202, 209, 279-281
先知書(預言書) prophets 378
《全本聖經小注》 *Postillae* 226
《全年各周書經通釋譯本》 *Épîtres et Évangiles pour les cinquante-deux semaines de l'an* 374
全開紙、整張紙 sheet 22, 65, 86-87, 89-92, 113, 143, 145-147, 169-170, 176
列日 Liège 153, 199, 279
列日印字社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of Liège, the 279
列奧穆德 Réaumur (1683-1757) 50
施斯伯格 Schönsperger 120, 123, 233, 237
印石印 press stone 85
《印刷工的死亡之舞》 *Printer's Dance of Death* 82
印石公會 *Confréries* (Brotherhoods or Chapels) 171

- 印刷工會會議 Father of the Chapel
 172
 印刷師 printer 40, 76, 77-81, 85-89, 91, 93, 100-101, 103-105, 113, 119, 157-158, 160-161, 165-167, 169, 170-174, 180, 184, 195, 216-217, 219, 221-223, 225, 232-233, 238-240, 255, 258, 260, 264-266, 269, 315, 337, 341, 368, 395, 403, 407
 印刷師業 presswork 43, 85, 87, 92-93, 113, 171
 印刷師 journeyman printer 67, 72, 77, 84, 119, 148, 153-157, 165-166, 168, 171, 174-175, 180, 219-222, 231, 244, 247, 301, 382, 407, 413
 印刷師 printer 57, 76, 78-82, 84, 90-93, 101, 105, 110, 114-115, 117-119, 121, 123-125, 128-129, 132, 135, 140-150, 152-160, 163-165, 167-169, 172-178, 180-184, 186-193, 195-199, 203, 205, 207, 216-218, 220-221, 223, 225-229, 231-235, 238-239, 241-243, 246-248, 251-253, 255-256, 259, 263-264, 266, 267, 269, 275, 277, 279, 282, 284-287, 289, 291-292, 294-296, 302-308, 310-311, 313-315, 322, 327-329, 334-337, 339-340, 343, 345, 350, 358, 361, 369-372, 375-378, 383, 386-387, 389-395, 397-398, 400-402, 407-414
 《印刷製版工藝》 Origines et débuts de l'imprimerie, Les 18
 《印刷術基本常識》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l'imprimerie* 85
 印刷師 printer, printing shop, press 21, 46, 54-55, 58, 75-76, 79-80, 82-84, 89-91, 101, 103, 105-106, 108-110, 119, 121, 137, 140-145, 147, 149-151, 153, 157, 159, 161-162, 165-176, 180-181, 188-190, 193, 195, 200, 202-203, 216-218, 221, 223, 226-228, 230-233, 235-239, 243-248, 251-255, 257, 259, 261, 263-267, 274, 282, 295-296, 303, 305-306, 308-309, 314-315, 318, 328-329, 340, 364, 368-317, 374, 376, 389, 392-393, 397, 401, 402
 印刷師 marks, printers' 82, 89, 108, 109
 《印刷科學》 *La Science pratique de l'imprimerie* 84
 印度 India 95-96, 262, 268-270, 273, 290, 354
 《印度史卷十七》 *Historiarum indicarum libri XVI* 355
 印刷社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200
 印刷· 黎斯敦康 Coustiau, Gillet 155
 印刷· 奧古德蒙 Gournont, Gilles de 189, 334, 336-337, 341
 印刷 Gillet, Nicole 369
 印刷師 Girardengo 233
 印刷· 杜貝萊 Du Bellay, Guillaume 387
 印刷· 維羅瓦 Le Noir, Guillaume 102, 387, 401
 印刷· 塞夫 Scève, Guillaume 191
 印刷· 甘· 雷瓦 Le Bé, Guillaume I 56
 印刷師 | 甘· 雷瓦 Le Bé,

- Guillaume II 56
- 吉羅提耶橋 Guilloière Bridge 287
- 《名人畫像》 *Portraits des homes illustres* 130
- 《聖訓錄》 *Sententiae* 224-226, 315
- 因戈斯塔特 Ingolstadt 214, 222, 371
- 回紇人 Uighurs 99
- 《回憶錄》 *Mémoires* 218, 360
- 押丹維家 bailiffs 166
- 《聖訓錄》 *Summa de Geografia* 353
- 非拉鐵與因 Guicciardini, Francesco (1483-1540) 205, 345, 359
- 非羅德 Guignard, M. R. 93
- 非蘭杜 Guérout, Guillaume 348, 394
- 多明尼哥 Dominici, Banchini (1356-1420) 321
- 多東斯 Dodoens (1512-1585) 277
- 多林 Döring, Christian 243
- 多波甫尼 Dobrič, Dobruško 259
- 《多神亞傳》(《多士亞》) *Tobias* 320
- 多納圖 Donatus, Aelius 72-73, 75-76, 275, 318
- 多勒 Dôle 184, 220, 222
- 多凱馬達(福機王教) Torquemada, Cardinal (1388-1468) 118-119, 217-218, 222, 253
- 多菲尼 Dauphiné 49, 60, 122, 124, 218, 287, 374, 384, 395
- 多雷 Dolé, Etienne (1509-1546) 191-195, 344, 390, 394, 411
- 多羅維 Asceusiani 188
- 多羅德 Dortmund 55
- 《多語本聖經》 *Polyglot Bible* 162
- 多羅 Doré, Pierre 144, 277
- 字母書 ABCs 73, 175, 247, 259, 261, 264, 266, 274, 279, 301, 393
- 《字母書或基督教幼童教本》 *Alphabet ou Instruction chrétienne pour les petits enfants* 393
- 字田其羅 Grosse écritoire 56
- 字田 sort 42, 68, 77-78, 80-81, 83, 86, 88, 98, 142, 146, 230, 237, 336
- 字田高度 type heights 81, 88
- 字田 shank 83
- 字體 quoins 146
- 《字體》 *Cosmographia* 349
- 安田半拉達 Ambacalate 269
- 安布拉斯·迪羅(一冊) Didot I, François-Ambroise (1730-1804) 22, 81, 202-203
- 安世羅 Embrun 214
- 安布羅瑟·霍爾班 Holbein, Ambrosius (1494-1519) 124, 237
- 《安世羅》 *Andromède* 278
- 安世蘭因 Anne, Queen of England 208
- 安世羅 Ancona 44
- 安烈 André, Jean 387
- 安烈與因 Andrelini, Publio Fausto 322, 334
- 安烈與因 Angelini, Evangelista 217
- 安烈與 Angst, Wolfgang 150
- 安烈與 Antwerp 112, 118, 129-130, 158, 160-162, 169-170, 178-179, 192, 229-230, 236, 238, 240-241, 245, 247, 263, 278, 282, 284, 290-291, 293, 307, 341, 348, 376-378, 385, 389-390, 395, 400, 404,

- 413
 安貧修士 friar 368
 安博塞 d'Amboise, George 105
 安斯海 Anshelm, Thomas 121,
 150, 191-192, 337
 安圖瓦尼·勒諾瓦 Lenoir, Antoine
 400
 安德列·魏耶爾 Wechel, André
 402
 安德列亞 Andreae, Hieronymous
 238
 成年領洗派的 Anabaptist 370,
 372
 托利 Tory, Geoffrey (1480-1533)
 124, 127, 138, 156, 189, 202, 229,
 410-412
 托派 Topié, Michel 219
 托倫田 Tolumba 264
 托倫蒂諾 Tolentino, Petrus Justinus
 de 304
 托特依 Tortoia 213
 托馬 Thomas, Marcel 24
 托勒沙諾 Torresano, Andrea (1451-
 1529) 158-159
 托勒沙諾家族 Torresano, the 235
- 托勒保維德 Torrebowichao 213
 托勒密 Ptolemy (85-165) 19, 325,
 349
 托斯半尼文·托斯半尼的 Tuscan
 45, 415
 托斯科拉諾 Toscolano 213
 托雷多 Toledo 215
 托羅提 Tori, Battista 233, 276
 托瑪·科尼利, Thomas (1625-
 1709) 209
 托瑪索·季翁塔 Giunta, Tommaso
 158
- 《托薩佛寶》 *Tossgofth* 341
 《何年錄》 *Decades* 353-354
 曲道符號體 Unlout script 108
 朱文可斯 Juvencus 322
 朱筆師傅 rubricator 37
 朵尼 Domi, Anton Francesco 158
 朵尼家族 Domi, the 240
 朵梅恩 Domène 49
- 《死亡之舞》 *Danses macabres*
 122
 《死亡藝術》 *Ars moriendi* 58, 65,
 106, 317, 324
 《死神幻影》 *Simulacres de la Mort*
- 115
 汝利昂 Jullien, Jean 146
 《百科全書》(法文版)
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85, 133,
 147, 198-200, 279
- 「百科全書朝臣」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199
 米彥德 Michault, Pierre 323
 米茲拉維克 Mstislavec, Petr 261
 米勒 Miller, Johann 238, 337
 米歐·勒諾瓦 Le Noir, Michel
 155
- 米歐列 Michelet, Jules (1798-1874)
 20, 313
 米雷樹瓦 Mileseva, monastery of
 258
 米樹·杜布瓦 Du Bois, Michel
 397
 米樹·帕門提耶 Parmentier,
 Michel 380
 米蘭 Milan 59, 137, 150, 232-235,
 237, 240, 271, 281, 304, 333, 336
 米蘭多拉 Mirandola 185
 羊皮(紙) parchment 25-26, 43-
 45, 75, 86, 134, 137-138

- 羊皮冊 parchmenter 53
- 《羊角羅賓》 *Cornucopia(e)* 114, 334
- 米米拉波 Mirabeau, Comte de (1715-1789) 200
- 米羅羅羅羅 Bercaldus, Filippo, the elder (1453-1505) 187, 322
- 老斯卡利傑 Scaliger, Jules-César (1484-1558) 191
- 《自由思想論》 *Freeman's Oath* 266
- 自由思想論者 Freethinkers 22
- 《自然史》 *Histoire naturelle* 209
- 《哲學鏡》 *Speculum Perfectionis* 316
- 《至親離杖》 *Teuerdank* 123, 238
- 色列斯羅 Slesiat 184
- 母語分 Xenophon 187, 344
- 艾厄 Eck, Jean 343, 371, 388
- 艾利基羅 Erigena, John Scotus (810-?877) 328
- 艾彼柯普 Episcopus, Eusebius 57
- 艾林堡 Ellenburg 243
- 艾金森 Atkinson, G. 356
- 艾利斯塔特 Eichstätt 214
- 艾德里科拉 Agricola, Johann (1494-1566) 370
- 艾格莫何特 Aigues-Mortes 45
- 艾特維爾 Elivil 212
- 艾斯令根 Esslingen 212
- 艾斯托克 Estoc, Jean 198
- 艾斯柯巴 Escobar, Andreas 316
- 艾斯柯里爾 Escorial, the 162
- 艾斯德爾(以斯帖) Esther 117
- 艾塞特 Exeter 242
- 艾爾特維 Elville 75
- 《艾蒙的四個兒子》 *Quatre fils Aymon* 302, 361
- 艾齊維埃家族 Elzeviers, the 59, 162, 196, 227, 246, 294, 300, 413
- 艾德一 Ed-Din, Rashid 99
- 艾霞胡利 Acciajuoli, Andrea 35
- 《行伍論》 *De re militari* 119
- 行會(同業公會) Guild 30, 53, 55, 67, 100, 180-181, 195, 242, 254
- 行會會頭 Master 172, 181
- 《衣索比亞人》 *Aethiopica* 361
- 西古羅 Siculo, Lucio Marinae 360
- 西尼加 Seneca 227, 321
- 西伐利亞的約翰 Westphalia, John of 232
- 《西印度史(西羅羅羅收伏記)》 *Historia de las Indias y conquista de Mexico* 354
- 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262, 353, 356
- 西印度血兒 mestizos 264
- 西多修道院 Citeaux, Abbey of 222
- 西亞里羅羅羅 Roger, King of Sicily 44
- 西里西亞 Silesia 255, 340
- 西里西亞人 Silesians 253
- 西羅羅羅 Cyrillic script 108, 254, 256-257, 259-262
- 西門斯 Simmons, Samuel 208
- 《聖拿》 *Cinna* 206
- 西班牙 Spain 7, 43, 46, 54, 59, 89, 104, 106, 108, 118, 153-154, 162, 179, 192, 230, 232, 234, 240-241, 245-246, 248-249, 262-265, 268, 277, 282-283, 286, 289, 305-306, 308, 339-340, 342, 344-346, 353-354, 356, 359-360, 362, 375, 377, 380, 401, 403-404, 408, 414, 416

- 西班牙征服者 Conquistadors 262-263
- 《西班牙約年史》 *Cronica de España* 360
- 《西班牙記略》 *De rebus Hispaniae memorabilibus* 360
- 西塞羅 Cicero 81, 105-106, 193-194, 217, 224-225, 227, 232, 275, 321-322, 335
- 西塞羅主義 Ciceronianism 404
- 西塞羅體 cicero script 142, 147
- 卜書
- 亨佛利 Humphrey 105
- 亨利·英蒂芬德 (一冊) Estienne, Henri I 156, 189-190, 292, 412
- 《亨利二冊選刊》 *Entrée de Henri II* 124
- 亨利四冊 Navarre, Henry of 198, 343
- 亨利蘇·昆泰爾 Quentell, Heinrich 238
- 亨納保亞田式爾德 Berold of Henneberg (1442-1504) 221
- 佛利 Forli 214
- 佛列斯納 Frissner 160
- 佛拉爾 Vétard, Antoine 101-102, 110, 117, 119, 126, 155, 228, 234, 241
- 佛明·奧薩 Didot, Firmin (1790-1876) 78, 203
- 佛密也斯祖父 Foes, Father, S. J. 356
- 佛朗什瓦泰 Franche-Comté 57
- 佛朗西斯科·吉寧塔, Francesco 158
- 佛朗索瓦·奧薩 Didot, François (1689-1757) 202
- 佛朗都斯 Ferrandus, Thomas 336
- 佛茨路 Pforzheim 157, 337
- 佛斯特 Foster, John 226
- 佛恩特歌 Vorstemann 377, 390
- 《佛羅里特》 *Florimont* 361
- 佛羅德斯 Florence 102, 104, 119, 150-151, 157-158, 160, 185, 222, 232-233, 235, 240, 276, 321, 336
- 回可畏 Hervagen, Johann 349, 377-378, 389
- 伽森迪 Cassendi (1592-1655) 178
- 但一 Dante Alighieri 187, 217, 323, 414
- 丹齊格 Danzig 162, 253, 282
- 特羅華 trouvères 34
- 特羅華 troubadours 34
- 伯萊利 Pellot, Paul (1878-1945) 97, 99
- 伯明罕 Birmingham 242
- 伯華碧 Berkenhaut 160
- 伯爾 Berné 184, 281, 395
- 伯登 Burger, Konrad 233
- 伯德魯·吉寧塔 Giunta, Bernardo (1487-1581) 158
- 伯德魯特雷特瓦 Bernard-Maitre, Henri 268
- 伯德魯 Bernard, Jacques 400
- 伯斯安柏母 Perth Amboy 267
- 伯斯佛羅斯 Perceforest 361
- 《伯魯萊華》 *Pertharite* 278
- 伯魯振家族 Berngens, the 393
- 低地德國 Low Countries, the 45-46, 53-54, 58-59, 89, 102, 108, 120, 182, 230, 232, 236, 245, 249, 282, 290, 325, 329, 340-341, 344, 404, 413, 417

- 伏乞墓園 Cimetière des Innocents
 122
 克卜佛 Kefter, Heinrich 231
 克瓦因爾群島 Kvarner, Island of
 259
 克呂尼 Cluny 151, 222
 克里特島 Candia, Crete 185-186,
 337
 克里斯多·弗洛羅爾 Froschauer,
 Christoph 57, 293
 克拉拉德 Cratander 382
 克拉柯夫 Cracow 232, 253-257,
 340
 克拉納赫父子 Cranachs, the 124,
 378
 克拉瑪 Clamart 156
 克拉莫塞 Cranoisy, Sébastien
 163, 175, 196-197, 245, 280, 284,
 308
 克呂米 Copinger 314
 克洛克斯托 Klopsstock (1724-1803)
 208
 克羅爾 Kerner 109, 124, 127, 156,
 380, 382
 克朗 crowns 285
 克蘭茨 Kranz, Martin 225
 克萊雷 Claret, Jean 153
 克萊蒙 Clermont 157
 克雷貝永 Crébillon (1674-1762)
 209
 克雷沃 Clavel, Robert 298
 克雷沃斯 Cleves 58
 克雷流斯 Crellius 373
 克雷拿 Clénard, Nicolas 278, 338,
 343
 克爾納 Kerner, Conrad 371
 克羅伯格家族 Cronbergers, the
 230, 241
 克羅茲納的帕威爾 Pawel of
 Krozna 255
 利夫 Riff, Hans 70
 利斗多 Ricardo, Antonio 264
 利古利亞 Liguria 45
 利克斯 Rix, Hans 276, 286
 利物浦 Liverpool 242
 利席格 Riessinger 118
 利馬 Lima 263-265
 利普 Lisleux 184
 利普修斯 Lipsius, Justus (1547-
 1606) 416
 利慕森 Limousin 122
 利摩日 Limoges 157, 182, 281
 努里 Nourry, Claude 395
 呂尼翁 Lineburg 58
 呂伊涅 Luynes, Guillaume de 278
 呂貝克 Lübeck 58, 230-232, 234,
 290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137,
 269, 338
 君士坦諾 (英國) Parliament, the
 192-194, 197, 228, 276, 298, 304-
 305, 310, 330, 332, 358, 375-376,
 382, 385-390, 392, 400, 412
 根特 Gent 214
 《日耳曼民族真實基督徒禮》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368-369, 373
 《聖法》 Modus confitentii 316
 《告解錄》 Confessionale 275,
 316
 吠陀經 Vedas 273
 吟游詩人 jongleurs, troubadours
 34, 36
 坎波城 Medina del Campo 158,
 283, 287

- 坎特伯里 *Canterbury* 55, 242
 《坎特伯里故事》 *Canterbury Tales*
 58
 坎普 *Camp* 281
 坎普滕的托瑪斯 *Kempis, Thomas a*
 316, 363
 夾紙框 *frisket* 86
 孚口 *Vosges* 48-49, 58
 宏教印刷社 *Tipografia della*
Propadanda 202
 希托普 *Hitop* 238
 希伯來文 *Hebrew* 55-56, 71, 162,
 278, 338-343, 386
 《希伯來文法》 *Grammatica*
Hebraea 205
 《希伯來語典》 *Thesaurus*
hebraicus 191
 希波克拉底 *Hippocrates* 224, 349
 希奧多勒斯 *Theodolus* 320
 希爾蒙神父 *Simond, Father* 417
 希蒙內塔 *Simonetta, Jean* 304
 希羅尼穆·賀羅德 *Holzziel,*
Hieronymus 138
 希羅多德 *Herodotus* 187, 358
 希羅的安 *Herodian (of Syria)*
 (2170-240) 344
 希臘 *Greece* 22, 143, 224, 269
 希臘文 *Greek* 135, 159, 166, 174,
 185-187, 189, 197, 237, 278, 319,
 333, 335-338, 341, 343, 345, 349,
 386, 397, 404, 408, 410
 《希臘文法則》 *Institutiones*
Linguae Graecae 338
 《希臘文法入門》 *Eκκαταγῆς προῶς*
τῶν προμικτρῶν ἐκκατῶν 337
 希臘新體 *New Greek script* 337
 《希臘羅馬名人傳》 *Lives (by*
Plutarch) 358
 庇古歐 *Pigouchet* 155
 《弄臣之船》 *Ship of Fools* 120,
 345
 《戒律手冊》 *Manual, The* 316
 抄寫員 *scribe, copyist, scrivener*
 26, 30-33, 35-40, 53, 63, 74, 92,
 100-105, 113, 135, 203, 319, 403
 《抗暴論》 *Tractatus contra*
tyrannos 197
 抒情詩人 *minstrel* 34
 投石黨爭 *Fronde, the* 300
 束帶狀壓模 *fillets* 135-136
 李波利 *Ripoli* 144
 李波馬諾 *Lippomano* 287
 李維 *Livy* 321, 335, 358-359
 李德傑 *Lydgate, John* (1370-1446)
 29
 李歐波·德里斯雷 *Delisle,*
Léopold (1826-1910) 38
 李歐瑞·德里斯雷 *Delisle, Léonier*
 51
 杜平 *ducats* 144
 杜布羅夫尼克 (拉古薩)
Dubrovnik 259
 杜皮伊 *Duppy, Pierre* 280, 298
 杜佛斯區 *Trichet du Fresne,*
Raphael (1611-1661) 168
 杜拉親王 *Crnjević, Prince Durad*
 257
 杜林 *Turin* 151, 281
 杜埃 *Douai* 271, 281
 杜朗 *Durand, Guillaume* (1230-
 1296) 35, 159, 194, 209, 364
 杜佩隆 *Du Perron, Cardinal Jacques*
Davy 281
 杜勒 *Dürer, Albrecht* (1471-1528)
 120, 123-124, 129, 160, 184, 238

- 杜歐 Peletier du Mans, Jacques
 (1517-1582) 411
 杜康燕 Du Cange (1610-1688)
 196
 杜堤伊 Du Tillet, Louis 382
 杜普伊 Du Puy, Jacques 291
 杜普萊西 Du Plessy 189, 410
 杜歐德 Douceur, David 299
 杜羅德 Durer, Albrecht 383
 杜羅德 Monet, Raoul du 37
 杜赫德德父 du Halde, Father (1674-
 1743) 272
 杜羅麗回 Tuileries, the 199
 杜羅伊 Dupuis, Nicolas 188
 每口頌禱 - 禮本 breviary 28, 92,
 142-143, 145, 219, 221, 247, 254,
 276, 314, 317, 340, 342
 沙勿聖 Xavier, St. Francis (1506-
 1552) 269, 270
 沙布萊斯 Chablais 398
 沙特萊雅塞 Châtelet 166
 沙特羅 Chartres 221
 沙提尼 Sartines 210
 沙羅尼 Salomon, Bernard (1506-
 1561) 122, 125, 394
 沛林 Perrin 400
 沃伊沃維 vojvoda 257
 沃克 Walker 90
 沃利尼亞 Volhynia 261
 沃亞 Goa 269
 沃格穆特 Wolgemut (1434-1519)
 120
 沃斯特羅 Vostre, Simon 124, 155
 沃爾弗 Wolff, Thomas 378
 沃爾姆斯 Worms 366, 371, 373
 沃熱拉 Vaugelas (1585-1650) 413
 狄卡拉布萊西 di Calabria, Reggio
 339
 《狄安娜》 Diana 363
 狄米卓維克羅士 Dimitrovic, Prince
 Radiša 258
 狄耶里 Thierry, Denis 163, 228,
 232
 狄德羅 Diderot, Denis (1713-1784)
 199-200, 209-210, 279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187
 秀希 Josse, Luc 400
 貝尼雅 Beneda 252
 貝加莫 Bergamo 225
 貝札 Beza, Theodore (1519-1605)
 401
 貝克 Beck, Lonard (1487-1554)
 123
 貝恩 Bacon, Roger (?1220-1292)
 328
 貝森科 Besançon 184, 281
 貝森科羅維克 Besançon missal,
 the 221
 貝德羅 Bénard, Guillaume 146
 貝隆 Belon, Pierre (1517-1564)
 351, 356, 415
 貝塞 Besse 279
 貝里公使 Berry, Jean, Duke of 37,
 39, 121
 貝德格羅 Belgrade 258
 貝德羅德 Belfortis, Andreas 275
 貝德羅德 Berthier, Antoine 307
 貝維拉多 Bevilacqua 235
 貝德 Bade, Joost 106, 110, 143,
 156-157, 168, 175, 187-190, 237,
 276, 280, 304, 318, 334-335, 338
 貝羅萊斯 Beromünster 222
 辛田斯翰 Scinzenzeler, Heinrich
 235, 336
 辛城 Zins 214

- 邦賽拉德 Benserade, Isaac de
(1612-1691) 205
- 那不勒斯 Naples 104-105, 118-119, 137, 162, 200, 232, 271, 276, 285-286
- 里卡 Lizet, Pierre 332, 357, 376, 387
- 里加的彼得 Riga, Peter of 327
- 里布 Ribou 198, 207, 209
- 里米尼和沃圖里諾 Rimini, Vulturio of 326
- 里特 Leers, Rainier 230, 249
- 里特和瓦爾德 Alain de Lille 320, 327
- 里沃夫 Lvov 261
- 里昂 Lyons 49, 54, 58, 78, 80-82, 89-90, 104, 106-107, 115, 118-120, 124-125, 127, 129, 144-145, 150, 154, 156-158, 162, 169-170, 172-173, 177, 179, 182, 187-188, 190-194, 196, 200, 216, 218, 221, 229, 232-235, 239-241, 244-245, 247, 278-283, 286-291, 293-294, 299, 304, 307-308, 329, 334, 336-337, 341, 343, 357, 374-375, 379-381, 383-385, 389-390, 393-396, 398-399, 401
- 里耶卡 Rijeka 259
- 里涅 livres 75, 141-143, 146-147, 154, 158, 170, 206
- 里斯本 Lisbon 162, 201, 269
- 里納萊多·皮奧 Pío, Leonardo 185
- 里奧里奧里奧 Theocritus 186, 336
- 里羅 Trot, Barthélemy 106
- 八
- 《亞里斯提》 *Auctoritates Aristotelis* 325
- 亞貝維爾 Abbevil 215
- 亞爾巴·皮奧 Pío, Alberto 185-186
- 亞爾卑 Alberti, Leone Battista (1404-1472) 104, 326
- 亞里斯多德 Aristophanes 187
-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 《亞里斯多德之書》 *Secretis Secretis d'Aristote* 220
- 亞拉岡 Aragon 137, 404, 414
- 亞里奧 Ariolr 322
- 亞舍 Aser 342
- 《亞舍拉之書》 *Annales d'Aquitaine* 360
- 亞希 Asia 99, 250, 269, 357
- 亞米恩 Amiens 84
- 亞德里亞德里克 Adriatic 257-258
- 亞爾斯特 Aalst 212
- 亞伊克斯-沙佩勒 Aix-la-Chapelle 70
- 亞當·佩里 Peiri, Adam 157, 184, 372, 378
- 亞爾薩斯 Alsace, Alsatian 124, 149, 241, 253, 290, 321, 405
- 亞維農 Avignon 42, 52, 58, 70, 74, 101, 151, 153-154, 231, 277, 281, 376, 380
- 《亞維農之書》 *Statutes of Avignon* 145
- 亞歷山大國王(英皇) Alexander, King of Poland (1461-1506) 254
- 亞內圖 Ancenu, Barthélemy 191
- 亞蘭·聖羅曼 Rome, Alain de 153
- 《亞內圖》 *Libro del Corregiano* 346

- 使徒行傳 (宗徒大事錄) Acts of the Apostles, the 373
- 使徒書信集 (宗徒書信集) Epistles, the 378, 382
- 佩本柏 Pappenburg 179
- 佩皮尼昂 Perpignan 215
- 佩迪 Peddie, R. A. 316-317
- 佩夏 Pesca 214
- 佩特雷士 Petrejus, Johann 238, 351
- 佩培勞 Pepelaw, Jan 254
- 佩脫拉克 Petrarch 102, 104-105, 123, 187, 222, 252, 323, 328, 345, 403
- 佩提 Petit, Jean 156-157, 188, 236, 380, 389, 402
- 佩雷斯卡 Peiresc (1580-1637) 298
- 佩爾西埃 Persius 187, 320, 335
- 佩魯斯 Peyrus 49
- 佩魯嘉 Perugia 45, 218, 285-286
- 佩雷特·巴德 Bade, Perrette 189
- 兩次拉掉印刷機 double action press 90
- 曲龍體 Paragon script 81
- 卑斯齊 Beschi (1680-1746) 273
- 卑爾根 Bergen 162, 282
- 卷首插畫 Frontispiece 112, 132, 365
- 叔沙諾 Sussaneau, Hubert 191
- 《和平的拉歌》 *Complainte de la paix* 385
- 坦布理奇威爾斯 Tunbridge Wells 242
- 坦米爾 Tamil 269, 273
- 《奇人奇事雜古體》 *Faits merveilleux de Virgile* 361
- 《拉特世十世拉歌》 *Magnalia Dei in locis subterraneis* 50
- 奇維羅萊 Cividale 212
- 《奇聞四題》 *Cert nouvelles nouvelles* 324
- 奈歐西 Naitoli, Simone 280
- 里戈費埃氏 Montgolfiers, the 60
-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33
- 季翁塔家族 Giunta, the 157-158, 175, 240
- 季德烈魯 Guidacertus, Agathas 386
- 季德賢耶 Guidacier 338
- 《宗徒書信》 *Symbol des Apôtres*
- 385
-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The 115-116, 192, 238, 241-244, 256, 259, 286, 294-296, 301, 310, 312, 330, 344, 363, 365-366, 369, 371-374, 376, 379-383, 385, 389, 401-403, 405, 407
- 宗教會議教令 synodal decrees 144
- 宗教慶典·宗教節日 Feast Days 171, 173, 180
- 宗教戰爭 Wars of Religion, the 128, 246, 355, 400-402, 405
- 定期目錄 Term Catalogues 298
- 何·米榭 Michel, Jean 323, 397
- 何·杜西萊 Du Bellay, Jean 391
- 何·杜羅雷 Du Pré, Jean 119, 155
- 何·舒特 Schott, Jean 184, 237, 334, 377
- 何·安瑞羅 Frellon, Jean 383
- 何·德文登翰 Virgile, Jean de 395
- 何·德波旁 Bourbon, Jean de 151
- 何·摩雷特斯 Moretus, Jean 294
- 何·歐特瑪 Omar, Jan 157

- 尚高藤 Golein, Jean 35-36
 居業修十會 Brothers of the
 Common Life 187
 居爾圖 Courté, Augustin 308
 岡特尼赫 Guntknecht, Jobst 238
 岡特尼赫 Guntterns, Johannes 351
 岡德圖尺 Gundulic, Trojan 258
 呂 quire, section 26, 31, 92-93, 96,
 113, 144-145
 咕噠 signature 113-114
 咕大發特 Palfroet, Richard 235,
 336
 帕厄努斯 Pagninus, Sanctes (1470-
 1536) 191, 341, 343
 帕布羅 Pablo, Juan 264
 帕采坦 Palissy, Bernard (1510-
 1589) 415
 帕則 Paris, Mathew 328
 《巴黎文獻》 *Palinurus* 277
 帕則安 Palliot, Pierre 197
 帕則安 Parian 270
 帕則亞察爾 Paleario (?1500-1570)
 191
 帕因 Pain 179
 帕迪一 Paradin, Claude 125, 348
 帕拉維西尼 Palavicini 178
 帕拉維希努 Palavicinus, Dionysius
 336
 《巴黎林語》 *Farce de Parthelur*
 106, 324
 帕德維家族 Pachelts, the 233, 235,
 240
 帕戴圖 Padua 45, 193, 233, 256,
 259, 286
 帕戴厄尼家族 Pagnanini, the 240
 帕基斯 Pasquier, Etienne (1529-
 1615) 360
 帕德林 Palmerin 362
 帕薩 Passau 214
 帕提珍 Patisson, Marnert 189
 帕斯德魯 Passetoup 139
 帕西·路維林 Severyn, Pavel 252
 帕雷尼 Paisec 197
 《巴黎文獻雜誌》 *Parnasse*
 satyrique 198
 帕爾馬 Parma 202, 232, 281
 帕爾馬的巴黎變 Bernard of Parma,
 known as Boltonus 227
 帕爾馬的巴黎 Parma, Marguerite
 of (1522-1586) 401
 帕爾馬 Palmart, Lambert 106
 帕爾察尼 Pallasčić, Andrija 259
 帕維亞 Pavia 151, 232
 帕齊法德羅十 Perceval, Sir 361
 帕黎尼弟兄 brothers Paris, the 199
 帕諾米拉諾 Panormitano 227, 276
 帕蘭 Paré, Ambroise (1510-1590)
 415
 帕恩 Payen, Thibault 393
 《法蘭一集》 *Febris Prima* 368
 《法蘭二集》 *Febris Secunda* 368
 佩克讓·圖歐 bills of exchange
 163, 283-284, 288, 297
 拉丁 Latin 22, 27, 32-33, 40,
 53, 70-72, 76, 83, 102-103, 105,
 108, 115, 120, 144, 153, 165-166,
 168, 174, 176, 185-186, 189, 191,
 193-194, 197, 201, 224-225, 233,
 238, 246, 251, 253-255, 259, 270-
 271, 276, 279, 292, 294, 296, 299,
 307, 314, 317-324, 327, 333-338,
 344-351, 353, 355, 359-360, 368,
 370, 375, 377-378, 388-389, 395,
 397-398, 402-405, 407-408, 410,
 412-413, 415-418

- 《拉丁文—法文字典》 *Dictionnaire Latino-Gallicum* 412
- 《拉丁文法入門》 *Rudimenta (Grammaticae)* 227, 334
- 《拉丁文詞類八講》 *De octo partibus linguae Latinae* 318
- 《拉丁文語彙》 *Commentarii linguae Latinae* 191
- 《拉丁文語法叢》 *Emblems* 115, 348
- 《拉丁文體》 *Elegantiae/Elegantiae* 225, 334
- 《拉丁語彙》 *Thesaurus Latinus/Thesaurus Linguae Latinae* 334, 412
- 《拉丁語溯源》 *De causis linguae Latinae* 191
- 拉匝魯會 *Lazarist* 271
- 拉古薩 *Ragusa* 259
- 拉布呂耶爾 *La Bruyère, Jean de* (1645-1696) 205, 278
- 拉瓦一的希德伯 *Hildebert of Lavardin* 328
- 拉瓦拉 *L'Aquila* 214
- 拉伯雷 *Rabelais, François* (149?-1553) 107, 115, 128, 191, 194, 200, 289, 347-348, 362, 380, 387-388
- 拉伯德 *Laborde, Jean Benjamin de* (1734-1794) 133
- 拉克坦提烏斯 *Lactantius* 320, 335
- 拉沃采 *Lavaudo* 400
- 拉佩胡斯 *La Pérouse* 133
- 拉昂的安塞姆 *Anselm, of Laon* 314
- 拉特申 *La Fontaine, Jean de* 128, 133, 200, 205, 210
- 拉秋爾 *Rachol* 269
- 拉特蘭大公會議 *Lateran Council, the* 309
- 拉特維 *Ratoli, Erhard* 233, 237
- 拉寇爾 *La Court* 281
- 拉提斯伯德 *Ratisbon* 144
- 拉斯尼 *Lasne, Michel* 112
- 拉斯平里斯 *Lascaris* (1434-1501) 186, 404
- 拉斯平薩斯神父 *Las Casas, Father* 354, 356
- 拉普蘭 *Lapland* 130
- 拉赫納 *Lachner, Wolfgang* 237
- 拉羅什高夫公爵 *La 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e* Marillac, Duc de 201
- 拉羅謝 *La Rochelle* 54, 131, 245, 402, 416
- 拉申 *rubbing* 67-68, 87, 96
- 《拉維普德記》 *Historia belli adversus Gothos* 217
- 魯代厄 *Elbe, the* 236
- 《阿維諾》 *Humanae salutis monumenta* 130
- 昆平 *Quenca* 265
- 昆泰爾家族 *Quentells, the* 233
- 昂古莫瓦堡 *Angoumois* 48, 51
- 昂古萊姆國 *Angoulême* 52, 54, 58-59
- 昂古萊姆國與萊諾維 *St. Hilaire d'Angoulême* 52
- 昂貝爾 *Ambert* 48, 58
- 昂格萊男爵 *Ungnad, Baron* 259
- 昂格萊 *Ungler, Florian* 255
- 昂熱 *Angers* 231-232, 239, 399
- 明斯特 *Münster, Sebastian* (1489-1552) 338, 343, 354
- 東正教禮祭 *Deacon* 260

- 林布蘭 Rembrandt (1606-1669)
248
- 林納克 Linacre, Thomas (?1460-1524) 334
- 林茨 Linz 200
- 林曼 Rymann, Hans 149-150, 157, 295
- 林塞學會 Accademia dei Lincei 271
- 《武功歌》 *Chansons de Geste* 402
- 武岡維尼 Vuković, Božidar 256-257, 260
- 《注釋集》 *Annotazione* 276, 280
- 波士頓 Boston 266
- 波才爾 Bocard, André 156
- 波厄尼那 Boninis, Bonino 259
- 波尼法·圖蘇巴赫 Amerbach, Boniface 185, 237, 380
- 波伊提奧 Boethius 159, 224, 320
- 波托納黎家族 Poronari, the 289
- 波利比奧斯 Polybius 281, 344
- 波利奇亞諾 Politian (1454-1494) 185, 191
- 波希米亞 Bohemia 232, 250-253, 257-258, 290
- 波希米亞臣民會 Bohemian Brothers, the 252
- 波那西納 Bonacina 178
- 波那斯柏 Bonaspes 188
- 波姆伯格 Bomberg, Daniel 341
- 波松 Bozon, Pierre 170
- 波河谷地 Po Valley 216
- 波度昂 Baudoin, François 191
- 波埃謬斯 Boemius 354, 356
- 波拿赫 Bonnemère, Antoine 144, 157, 277
- 波蒙 Bourbon, Nicolas 191
- 波特 Pot, Philippe 332
- 波特斯 Portess 214
- 波納 Boner, Ulrich 117
- 波納寇塞 Bonacorse 240
- 波納齊 Bonacci 240
- 波斯 Persia 99, 269
- 波斯帖 Postel, Guillaume 356
- 波焦(布拉喬利尼) Poggio (Bracciolini) (1380-1459) 345, 359
- 波隆納 Bologna 102, 104, 151, 187, 232-233, 240, 285, 315, 326
- 波瑞特 Poret, Christophe 300
- 波蒂布拉拉 Podiehrad, Juri 250
- 波謝榮 Bocheron, Claude 400
- 波德魯 Bordeaux 54, 239, 281
- 《波德魯的十翁》 *Huon de Bordeaux* 361
- 波羅尼亞博魯涅 Port-Royal 198
- 波諾姆 Bonhomme, Pasquier 155
- 波納 poin 78
- 波羅的波白 Baltic 19, 54, 59
- 波羅茲科 Polozk 256
- 波蘇伊 Posuel 281
- 波蘭 Poland 120, 232-233, 249, 253-257, 261, 296
- 《法區西婚聖之謠》 *Epithalamia Alexandri Farnesi* 205
- 《法文一詞一文典》 *Dictionnaire Français-Latin* 412
- 《法文版聖經全書》 *Somme de l'Écriture Sainte* 378
- 《法文的捍衛與宣揚》 *Déffence et illustration* 411, 414
- 《法文律師手冊》 *Practicien Français* 278

- 《法文拼字藝術與學理之實用成規概論》 *Trè utile et compedeux traicé de l'art et science dothographique Gallicane* 411
 《法文書寫規則之相關特徵》 *Brievse doctrine pour deument escrire selon la propriété du langage François* 410-411
 《法文書寫通則之相關特徵》 *Traité touchant le commun usage de l'écriture Française* 411
 《法文新約》 *Nouveau Testament* 376
 法彼雅諾 *Fabriano* 44-45, 49
 法拉克圖體 *Fraktur script* 238
 法拉爾 *Faral, Edmond* 34
 法奎斯 *Faques, Guillaume* 241
 法律工作者、法界人士、律師 *Lawyers* 33, 103, 116, 125, 227-229, 265, 330-332, 350, 357, 359, 397, 399
 法登 *Fano* 215
 法耶里家族 *Faelli, the* 240
 法國 *France, French* 5-8, 22, 26-29, 33-35, 37, 39, 45-46, 48, 50-52, 54-55, 57-60, 72, 75, 80, 84-85, 87, 89-90, 95, 97, 102, 104, 106, 108-112, 116, 118, 120-121, 123-124, 126-134, 136-138, 145, 148, 150, 153, 167, 170, 172-174, 178, 181-183, 192, 195, 199-201, 203, 207-210, 216, 219-220, 223-224, 227-228, 230, 232, 234-235, 239-241, 244-249, 253, 272-273, 280, 282, 286-289, 295, 297-302, 304-306, 308, 310-311, 321, 323, 328, 330, 336-345, 353-360, 363, 366, 373-380, 382-384, 387-392, 394, 396-398, 400-401, 403-405, 408-410, 413-418
 法國皇家學院 *Collège Royal* 338
 《法國皇家學院回憶錄》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418
 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 Étude* 2
 《法國教會史》 *Histoire de l'Église de France* 360
 《法國教會特權記實》 *Preuves des Libertés de l'Église Gallicane* 280
 法國國庫 *Facetus* 320
 法蘭德 *Farel, Guillaume* (1489-1565) 376-377, 380-382, 384, 394-396
 法蘭德城 *Falmouth* 268
 《法蘭德書》 *Digest* 358
 《法蘭德書》 *Institutes* 275, 358
 法諾 *Fano* 45
 《法蘭西年鑑》 *Annales et Chroniques de France* 360
 法蘭西國王 卅 *Francis I, King of France* (1494-1547) 193, 337, 343, 367, 387, 391, 401
 《法蘭西路德》 *Guide des chemins de France* 189
 《法蘭西圖書目錄》 *Bibliographie de la France* 297
 法蘭西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196, 300
 《法蘭西學院手冊》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278, 413
 《法蘭西領事書》 *Recherches des Antiquités de la France* 360
 《法蘭克史綱》 *Compendium historie Francorum* 359
 《法蘭克史綱》 *De rebus gestis*

- Francorum 359
 法蘭克尼亞人 Franconians 253-254
 法蘭克福 Frankfurt 107, 149, 158, 160, 162, 169, 173, 178-179, 184, 231, 239, 244, 247, 271, 276, 287, 289-297, 310, 340, 355, 373, 375, 380-381, 383, 396, 398, 402, 405, 416, 418
 法蘭克福的尼古拉斯 Nicholas of Frankfurt 276
 法蘭寇 (特雷維維森總主教) Franco, Niccolò (Archbishop of Treviso) 309
 法蘭德斯 Flanders, Flemish 39-40, 53-54, 89, 106, 130, 132, 136, 167, 174, 177-178, 187, 230, 236, 272, 314, 317, 319, 323, 344, 359, 361, 380, 404, 413, 416-417
 法蘭德斯的包社社 Baudoin of Flanders 361
 牧羊曆 shepherds' calendars 106, 122, 125, 128, 301-302, 324, 363, 395
 《牧詩》 Bucolicae 322
- 《牧圖》 Manipulus curatorum 226-227, 316
 《玫瑰傳奇》 Roman de la Rose 107, 127, 323, 361
 「社會經濟生活圖」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2
 狹紐 Chinon 178
 《新實錄牛地》 Cosmographia Universalis 354
 舍丹 Sedan 246
 色薩諾美 Basanoff 250
 花邊圖冊 lace pattern book 123
 采蒂涅 Cerinje 257, 260
 采爾蒂斯 Celtes, Conrad (1459-1508) 160, 337
 舍尼圖 Trigault, Nicholas (1577-1628) 271
 《牧羊羊類誌》 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e la Toison d'or 122
 「金色太陽」 Le Soleil d'Or 226
 金盾 gold écus 37, 395
 金幣 gulden 173, 256
 金葉 gold leaf 135, 137
 金織品 gold embroiderer 254
 《金屬學》 De re metallica 352
- 《金鑰匙》 Golden Ass; The 361
 長條旗幟 streamer 135
 《長期變故》 Casus longi 227
 《聖徒傳》 Apostol 260-261
 《阿比斯提總主教法典》 Statuta Arnesi 251
 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269
 阿比羅提特 Altkloster 50
 阿比松家族 Anissons, the 196, 247, 278, 281
 阿布拉瓦諾 Abravanel, Judah 346
 阿采因家族 Hardouyns, the 124
 阿米諾 Amyot, Jacques (1513-1593) 344
 阿西亞 Assisi 316
 阿利坎特 Alicante 201
 阿利亞里 Ariaga (?1592-1667) 278, 307
 阿利奧斯托 Ariosto, Ludovico (1474-1533) 345, 363, 408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59, 72, 178, 197, 230, 246, 249, 278, 281, 290-291, 308
 阿拉伯 Arab, Arabian 43-44, 95, 217, 258, 325, 355

- 回拉古券 Allakraw 252
 回林哥(豐樂十條) Aleandro,
 Girolamo 186
 回呂菲 Archetes 57
 回歐菲 Arches 57
 回翁菲 Aquinas, Thomas (1225-
 1274) 159, 224, 315
 回亞非拉烟紐 Ascoli Piceno 212
 回蓮德維 Accursius, Bonus 336
 回朋芬 Alençon 192, 376
 回亞空公儲 Alençon, Duke of
 (1554-1584) 192
 回聖胡安 Agrícola, Rudolf (144?-
 1485) 255
 回聖胡 Agra 273
 回聖維 Haguenau 121, 149-150,
 157, 191, 239, 277, 337, 370
 回德胡 Asola 159
 《回德羅非歐圖卷因臣與聖心卷》
*Traçado de Amores de Arnalte y
 Lucenda* 362
 回聖聖羅 Almagro, Diego de (1475-
 1538) 263
 回歐胡 Amman, Jost (1539-1591)
 124
 回基米德 Archimedes 349
 《回城菲卷》 Astrée 205, 363
 回聖胡安 Apuleius 361
 回森羅德卷德國圖卷 Library of the
 Arsenal 39
 回聖胡 Alexis, Guillaume 324
 回聖胡 Albi 218
 回聖世保羅沃 Albuquerque (1453-
 1515) 354-355
 回聖胡公儲 Alba, Duke of 192
 回聖胡坡司德 Alps 283, 287
 回德胡 Alcuin (773?-804) 314
 回聖胡安 Aicia, Andrea 115, 191,
 348, 380
 回德胡 Aargau 222
 回德羅維 Manutus, Aldus 78,
 106, 109, 114-115, 120, 127, 137,
 140, 159, 168, 185-186, 188-191,
 196, 202, 236-237, 240, 245, 292,
 299, 328, 334-335, 337, 349
 回德羅胡王德 Aldi, the 56, 78
 回德羅胡家德 Manutus family
 78, 109, 111, 114-115, 120, 127,
 137, 140, 158, 188, 190, 196, 202,
 235, 237, 240, 328
 回德羅胡 Aldine Academy, the
 186
 《回聖胡安寶卷》 *Trésor de Amadis*
 413
 回德羅維 Avicenna 188, 325, 349
 回德羅維德紐 Adramytenos,
 Emmanuel 185
 回德胡 Adelkind, Cornelius 341
 回德胡德(父) Amerbach, Jean
 (?-1513) 106, 160, 183-185, 237,
 257, 290, 336, 380
 非洲 Africa, African 50, 269, 355,
 357
 《非洲雜卷》 *De totius Africae
 descriptione* 355
 尺圖
 英卷 varnish 94
 回田德羅 credit transfer 297
 《回聖羅十龍抄雜卷》 *Credo
 avec les Dix Commandemens de la
 Loi, le tout en Français* 386
 聖區·斐德卷(一冊)
 Estienne, Robert I (1503-1559)
 55-56, 106-107, 168, 188-190, 192,

- 291, 293, 334, 341, 387, 390, 393, 397, 412
- 保羅·馬努蒂烏斯 Robert, Louis-Nicolas (1761-1828) 60
- 保羅·馬努蒂烏斯 Hroswia 120
- Paulus (1512-1574) 78, 107, 305
- 《谷坦之鏡》 *Speculum Mundi* 327
- 谷坦世之 Secular Age, the 24-25, 28, 37
- 俄羅斯 Russia 256, 260-262, 269, 296
- 《俄羅斯帝國史》 *Histoire de l'Empire de Russie* 280
- 里德拉一諾 goliardic 327
- 剃頭刀手術師 barber-surgeons 332
- 勃政邦 Burgundy 49, 63, 149, 151, 299, 323, 363, 381
- 勃格麥 Burgkmair (1473-1531) 123
- 勃斯契夫 Burschev, V. F. 261
- 勃魯諾爾 Bruegel 130
- 南特 Nantes 281, 283, 380
- 《南特口譯本》 Nantes breviary, the 143-144
- 南特市 Nanteuil (?1623-1678) 131-132
- 南特效令 Nantes, Edict of 198, 249
- 南斯拉夫 Yugoslavia 257
- 南錫 Nancy 2
- 南錫山 Verbiest, Ferdinand 272
- 《巴黎雜書》 *Characters* 278
- 哈佛 Harvard, John 265
- 哈維德德萊拉城 Havre-de-Grâce 400
- 哈呂特 Hakyut, Richard (?1552-1616) 355
- 哈恰斯 Hackius, Cornelius 178-179
- 哈林頓 Harrington, Sir John (1561-1612) 408
- 哈倫 Harlem 42, 72-73
- 哈爾 Hahn, Ulrich 217, 222, 336
- 哈特 Hart, John 414
- 哈普金斯 Hopkins 408
- 哈塞特 Hasselt 212
- 哈漢 Hanau 231
- 哈爾斯 Hals, Frans (?1582-1666) 248
- 哈爾 Halma, Franz 278
- 哈爾 Haller, Jean 254-255
- 哈羅威 Hanover 268
- 哈里斯 Crespin, Jean 397
- 威尼斯 Venice 45-46, 49, 51, 54, 56, 102, 105-106, 115, 118-121, 126-127, 129, 137, 144, 150, 152, 154, 157-160, 162, 181, 185-186, 188, 190, 200, 221, 232-235, 239-240, 245, 247, 253, 256-259, 275-276, 281, 286-287, 290-292, 304, 307, 309, 315, 326, 329, 333, 336, 341, 349, 351, 353, 357, 359
- 《威尼斯·羅倫多書目分類法》 *Libri venetas Venetis, 觀》 Libri venetas Venetis, Nurembergae et Basilicae* 292
- 威尼斯共和國 Venetian Republic 45, 144
- 威尼斯書販公會 Corporation of Venetian booksellers, the 190
- 威尼斯議會 Venetian Senate, the 49, 304
- 威特 Wieror 255

- 威勒 Willer, Georges 293
 威提 Huete 215
 威斯馬肯 Vissmaken, Guillaume 389
 威斯敏斯特 Westminster 213
 威森布赫 Weissenbruch, Maurice 200
 威森洪的亞歷山大 Weissenhorn, Alexander of 371
 威登堡 Wittenberg 124, 238, 243-244, 291, 294, 337, 366, 368, 370, 372, 375-376, 394
 威瑞克斯 Wierick 130
 威爾德 Wild, Leonard 144, 276
 《**汝蘭之教諭**》 *Instruction des enfans* 396-397
 帝國轉子譯議會 Imperial Commission on Books 295
 帝國議會 (在奧羅羅帝國) Imperial Diet 366, 371
 《**建築十書**》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104, 326
 待出版 forme 80-82, 85-89, 91-92, 117, 129, 144, 168-169
 待臨字帖 lettre d'attente 38
- 思科羅德 Skodar 258
 《**拼字辨正**》 *On Orthography* 225
 連尼致密羅 commitinus, the privilege of 30
 《**故事誌**》 *Comes (of La Fontaine)* 133, 200, 210
 施派爾 Speyer 184, 232, 275-276, 336, 349
 施恩高德 Schongauer, Johann the Elder (147?-1491) 124, 129
 施泰爾馬克 Styria 290
 施密德 Schmidt, Peter 293
 施瑞克·魏士因 Schreck, Johann (1576-1630) 271
 星拱殿 Star Chamber 278
 《**星象占驗**》 *Astronomici veteres* 349
 《**星象占驗**》 *Cosmographicae aliquot descriptiones* 350
 柯大林法讓提 Courlain-Farenoutiers 60
 柯尼德 Cornelius 178
 柯尼格 Koenig, Frederick 21
 柯西莫·德麥迪奇 Medici, di' Cosimo (1389-1464) 158
 柯克 Cook, Jerome (1510-1570) 130
 柯里登 Koberger, Anton (1455-1513) 120, 135, 150, 159-160, 162, 168, 175, 183-184, 231, 286, 290, 295, 336
 柯里格家族 Koberger family 162, 233, 236, 238, 255, 276
 柯洛羅 Corrozet, Gilie 228, 360
 柯提拉茲 Cortez, Fernand (1485-1547) 263-264, 353-354
 柯斯特 (古勞倫斯) Coster, Laurens Janszoon 72, 74
 柯普弗 Kopfel 57
 柯羅樂 Collonges 398
 柯爾德爾 Colbert (1619-1683) 50, 174, 198, 247-248, 298, 311
 《**柯爾德爾大羅年表**》 *Koethoff, the Chronicle of* 221
 查士丁尼大帝 Justinian, Emperor 275
 《**查士丁尼法典**》 *Codex* 276
 查洛提 Zarotti, Antonio 304, 336
 查洛提家族 Zarotti, the 233

- 查理·杜蒲蘭 Du Pré, Charles 221
- 查理·埃蒂安·埃斯提安 Estienne, Charles 189, 415
- 查理·德埃蒂安 (德埃蒂安) Bourbon, Cardinal Charles de 138, 150-151, 218
- 查理八世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53, 55, 359
- 查理五世 (德奧羅曼聖地牙哥) Charles V, Emperor 264, 366
- 查理五世 (英國國王) Charles V, King of France 36
- 《查理五世國慶記》 *Account of the Funeral Ceremonies of Charles V* 161
- 《查理曼大帝傳記》 *Conquests of Charlemagne, The* 323
- 查士提尼 Justinus, Petrus 304
- 查爾斯·凡德博登 Van Bomberghé, Charles 161
- 查爾斯頓 Charleston 267
- 查爾斯頓 Chamalières 48
- 皮爾克萊爾 Pirckheimer (1470-1530) 160
- 皮拉圖 Plato 144, 187, 225, 276, 322, 345
- 柏林 Berlin 249, 280
- 博爾扎諾 Bolzani, Urbano 186
- 邦尼薩 Fontaney, de (1643-1710) 272
- 《佩里格羅之書》 *Libro del Peregrino* 346
- 可移式 movable type, type 18, 42-43, 53, 56, 66-69, 73-74, 76-88, 92-93, 97-99, 102-107, 111-112, 117, 128, 133, 141-143, 146-147, 149, 154, 168, 170, 175, 186, 189, 191-192, 202-203, 237-238, 241, 256-258, 260-262, 264, 269-270, 274-275, 328, 335-337, 341, 347, 394, 413
- 活字工 typographer 165, 190
- 活字排印 - 活字排印 - 活字排印 typography 43, 56, 65-66, 72, 81, 88, 98-99, 158, 202, 216, 234, 239, 414
- 活字架 founts 103, 105, 141-142, 145, 155, 257, 261, 291
- 活字架 case 82-85, 141, 143, 147
- 活字鑄造 letter foundry 56
- 活字鑄 - 活字鑄 galley 82, 87-88, 92, 129, 132, 147
- 佩普斯 Reyus, Friedrich 238, 373
- 洛赫納 Lochner, Christoph 149
- 洛林 Lorraine 57, 149, 382
- 羅科利埃 Roccolle, Pierre 196, 198
- 洛赫納 Lochner, Johann-Georg 281
- 波迪厄 Bodius, Hermann 389
- 普查斯 Purchas, Samuel (?1577-1626) 355
- 《皇家印書》 *Petit Apparat Royal* 279
- 皇家印書院 Royal Publishing Office 162
- 皇家印書院 (英國) Impimerie royale, Paris 112
- 皇家印書院 Palais-Royal, the 199
- 皇家圖書館 (英國) Bibliothèque Royale 134, 343, 376
- 皇家鑄印局 Affair of the royal lecturers, the 386, 391
- 皇家鑄印局 Imperial Chancellery script 238

- 皇關 regais 92-93
 盾 écus 145起
 盾形紋章 coat of arms 135
 《祈禱方法訓略》 Briève
admonition de la maniere de prier
 385
 科木 Como 213
 科布倫茨的約翰 John of Coblence 156
 科托羅 Kotor 259
 科佛羅德 Coverdale, Miles (148?-1569) 408
 科克拉姆城 Cochlaeus 371-372
 科爾亞 Coria 215
 科林城 Corinth 396
 科特羅 Cottereau 194
 科姆塔里 Comester, Pierre 315
 科雷爾 Coqueret 189
 科森察 Cosenza 212
 科欽 Cochin 269
 科羅 Cologne 53, 56, 72, 118, 150, 160, 178-179, 184, 227, 231-233, 235, 238-239, 245, 247, 251, 272, 286, 307, 309, 315, 337, 353, 368, 389
 科羅巴 Columbia 117
 「科羅巴」 Écu de Cologne 379, 383-384
 《科學年史》 Cologne Chronical 72
 科雷 Cres, Jean 220
 科爾貝 Corbell 46, 52-53
 科爾馬 Colmar 225
 科爾霍夫家族 Koelhoff's, the 233
 科學院 (法國) Académie des Sciences 50, 272
 《科里波》 Jostippon 341
 科克羅 York 242
 科拿黎之子羅維 David, son of Jonathan 340
 科羅夫·克魯格 Klug, Joseph 243
 科羅夫城 Josephus, Flavius 344, 358
 科羅·梅特本德 Mellinger, John 222
 萊因茨 Mainz 42, 53, 56, 69, 72-76, 216, 218-219, 221, 230-231, 234, 237, 289, 309, 371
 《萊因茨羅德》 Mainz Psalter, the 75-76
 萊瓦 America 230, 245, 262-266, 268-269, 282, 354, 356-357
 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0, 263, 265-266
 《美羅洛德》 Melusine 128, 302, 323
 耶比羅 Epinal 48
 耶里 Jesi 232
 耶路撒冷 Jerusalem 357
 《耶路撒冷》 Passion, The/Great Passion, The 65, 123
 《耶路撒冷之謎》 Mystère de la Passion 323
 《耶穌基督即天父羅德》 Oraison de Jésus-Christ qui est le Pater Noster 386
 《耶穌基督傳》 Vie de Jésus-Christ 220
 耶穌會士 Jesuits, the 116, 195, 199, 229, 245, 264-265, 270-273, 299, 310, 355-356, 415, 417
 耶穌誕日 Nativity, the 39
 耶里 Juli 265
 耶茶德 Hunnaeus, Augustin 205

- 胡格維爾 Hugueville 281
 胡格諾語教派 (教派) Huguenots
 60, 173, 311, 374
 胡茲 Husz, Matthew 82, 118, 218, 379
 胡斯 Huss, John (1377-1415) 250
 胡斯教派的 Hussite 250, 254, 365
 胡普夫 Hupfuff, Mathias 121
 胡爾斯 Hurus, Paul 184
 《致阿提庫斯書》 *Epistolae ad Atticum* 106
 《致塞朗伯書》 *Lettre à d'Alembert* 209
 范祖德 Van Zuren, Jan 72
 范德安神父 Valignano, Father Alexander (1539-1606) 270
 范崑三坦 (葡國國王) John III, King of Portugal 269
 若瑟 (約瑟) Joseph 117
 若漢諾氏 Johannois, the 60
 若翰·奧斯伯格 Schönsperger, Johann 238
 若翰·佩特利 Petri, Johann 237
 若翰·勞爾 Lauer, Johann 173
 《英格蘭米德蘭語彙編》
 Catalogue of the Most Vendible Books in England, A 298
 英國·英格蘭 England, English
 21, 27, 29, 37, 46, 50-51, 53-54, 58-60, 89, 103-104, 108, 110, 118-119, 155, 207-208, 230, 232-234, 239, 241-242, 245-249, 265-266, 278, 280, 282, 287, 290, 294, 297-300, 306, 325, 329, 340, 344, 355, 362, 375, 391, 404, 407-409, 414, 416-418
 斯里札尼家族 Galliziani, the 58
 迪安杜羅族 di Ambrogio, Lodovico 45
 里昂 Dijon 56, 184, 197, 222, 281
 奧圖羅亞 di Alopa, Alonzo 276
 奧圖羅亞 di Colonna, Guido (?1215-?1290) 251
 奧圖羅亞 di Marchio, Francesco 52
 迪羅家族 Didots, the 22, 57, 60, 78, 90, 202
 重鰲鎮壓 dragonnades 248
 韋格提奧斯 Vegetius 321
 韋特雷 Vitre, Antoine 168, 197
 韋斯普奇 Vespucci, Amerigo (1454-1512) 251, 353
 韋萊特利圖 Vellerti 185
 《風俗論》 *Essai sur les moeurs* 280
 飛字本 Flugschriften 366, 368
 首府地圖 (法國) Ile-de-France 150
 首度武驗 vurbjldung 72
 香檳圖 Champagne 54, 58-59
 十畫
 《浪子》 *Enfani prodigue* 209
 茲外布魯肯 Zweibrücken 214
 修邦 Chopin, René 280
 修埃佛 Schoeffter, Peter 72, 74-75, 77, 152, 165, 216, 219, 225, 231, 237, 285, 290, 295, 335
 修埃佛三坦 Schoeffter (the Younger), Peter 237
 修埃特尼 Monastic Age, the 24-25, 28
 修斯提底斯 Thucydides 143, 187, 190, 276, 344, 358
 《修辭學》(費歐華) *Rhetorique*

- 151, 225
 《穆尼特》(德日德意志人著)
Rhetoric 322
- 修奧 Chouaud, Pierre 281
 修騰 Schotten 123
 倫巴德 Lombard 45, 52, 286
 倫勃勒 Rembol, Berthold 156, 336
 倫敦 London 90, 119, 155, 162, 169, 181, 184, 238, 241-242, 249, 267, 294, 298
 倫敦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the 299
 剛果 Congo 269, 355
 高多華 Cordova 137
 高德比 Columbus, Christopher 352-253
 高茨 Goetze 370
 高勞斯林公爵查理 Gloucester, Humphrey, Duke of 105
 高麗圖二曲 plaquettes gothiques 115, 324
 高麗文體 textura 251-252
 高麗文體 bastard gothic, gothic
 bastarda 102-103, 106, 107
- 高麗文體 gothic script 80, 102-103, 105-108, 114, 128, 141, 190, 234, 264
 高羅比 Colomb, of Milan 281
 《哲學工具》*Organon* 186
 《哲學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159, 320
 《哲學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201
 「哲學彙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299
 哲羅納 Gerona 215
 埃布 Eyb, Albertus de (1420-1475) 227
 《埃皮納勒群像》*Images d'Épinal* 302
 埃米利 Emilii, Paolo 345, 359
 埃松圖 Essomes 46, 52-53, 57, 60, 203
 埃萊維斯 Ecrevisse, Guillaume 60
 埃爾德瓦爾德 Escobar, Andreas 307
 埃格斯坦 Eggestein, Heinrich 231
 埃薩圖拉 Agricola, George (1494-1555) 351
 埃特林根 Etilingen 58
- 《埃特林根》*De Aetna* 186
 埃納里斯德 Alcalá 241, 338, 342
 埃傑諾夫 Egenolf, Christian (1502-1555) 107, 244, 290
 埃斯基爾斯 Aeschines 187
 埃斯特亞德 Estard, Pierre 393
 埃斯普蘭迪 Esplandián 362
 埃斯靈 Essling 340
 埃蒂安塞家族 Estiennes, the 109, 111, 140, 168, 188-189, 196, 337-338, 342, 397, 412
 埃爾多拉多 Eldorado 263
 埃薩克 Isaac, Jean 205
 《埃羅伊茲和亞貝拉》*Letters of Heloise and Abélard* 328
 夏丹德 Scharfenberg, Mark 255
 夏布勒 Schablier, Johann 379-380, 382
 夏托布呂德 Châteaubriant 392
 夏佛 Schäffer 50
 夏朗敦 Charenton 59-60
 夏提埃 Chartier, Alain (?1385-143?) 107, 323
 夏普霍芬 Schapphoven 214

- 夏爾羅 *Chapelain, Jean* (1595-1674)
132, 196-197, 298, 311, 418
- 夏諾 *Janot* 48
- 《家書》 *Epistole ad familiares*
105, 217, 232, 275, 321
- 宮廷書商 *bookseller of the Palais*,
the 182
- 《宮廷廷規》 *Doctrinal de la Cour*
323
- 《宮廷禁語》 *Abuzé en cour* 323
- 席氏 *Schiedam* 214
- 席范·歐萊特 *Oumar, Sylvan* 157,
238, 371
- 席梅匹茲 (圖機主教) *Ximenez*,
Cardinal (1436-1517) 240, 337
- 席爾登茲 *Schirleuz, Nickel* 243
- 席爾維斯 (教堂泥塑工) *Silvius* (*Piccolomini*), *Aeneas*
(1405-1464) 218, 227, 359
- 《強壯靈》 *Imitation of Christ*
316, 363
- 庫尼格 *König* 178
- 庫瓦亞德 *Coignard, Jean-Baptiste*
278-279
- 庫田亞摩德 *Moses of Coucy* 342
- 庫克船政 *Cook, James* 133
- 庫申 *Kuehe* 97
- 庫里翁 *Curion* 382
- 庫其漢姆 *Kuchheim* 214
- 庫爾 *Kuhn, John* 185
- 庫特諾 *Kutno* 252
- 庫斯德列 *Coustelier, Urbain* 201
- 庫爾赫 *Cooihert, Dirk Volkertroon*
72
- 庫爾諾 *Cournot* (1801-1877) 268
- 庫黎努斯 *Courinus* 416
- 庫薩多 *cruzados* 269
- 徐亞諾 *Jouenneaux, Guy* 334
- 徐斯特 *Hyst* 149
- 恐怖的伊凡 (伊凡四世) *Ivan the*
Terrible 255, 260-261
- 《悔罪之鏡》 *Miroir du Pénitent*
393
- 拿普斯 *Knaapps, Hans* 371
- 拿薩 *Nassau* 248
- 《時之舞鏡》 *Fasciculus Temporum*
58, 221
- 《時辰書》 *Hours* 117
- 時辰舞鏡 *Books of Hours* 28, 38,
39, 92, 114, 116, 120, 122, 124, 126,
136, 143, 155, 312, 315, 317, 332,
365, 388-389
- 《時之鏡》 *Philobiblion* 33
- 書中頁 *title page* 108-112, 189,
237, 252, 261, 304, 388
- 書法 *calligraphy* 29, 73-74, 96, 98,
100, 104, 117, 337
- 《書信書》 *Letters* 225
- 《書信書》 (巴黎皇家印刷工於世) *Epistolae* 381
- 書脊 *spine* (of a book) 96, 134,
139
- 書寫 *scrivener, notary* 30, 40, 153,
231, 357
- 書商 *bookseller, bibliopolas* 6, 30-
31, 35-37, 40, 53-55, 57, 101, 103,
109, 122, 124, 126, 128-129, 136,
138, 140, 142-143, 149, 153-154,
156-160, 162-163, 175-183, 186,
189-200, 204-210, 223, 227-229,
235, 237-242, 244, 249, 251, 263,
275-276, 279-287, 289-298, 300-
301, 304-306, 308, 310-311, 313,
324, 327, 331-332, 324, 357, 368,
375-376, 379-380, 382-386, 388-

- 390, 392, 394, 397-401, 404, 418
書葉 (匣面書紙合裝一張書葉)
leaf 26, 92, 109-110, 112
書葉題 foliation, leaf signature 39,
112
書頁 stationers 30-31, 37, 100-
101, 135, 223
書寫體 script 77, 102, 104-105,
107, 238
「書籍匠師的工匠」 *Book in the
Service of History, The* 18
朗格多克 Languedoc 45
朗格勒 Langres 398
根內普 Gemep 58
根特 Ghent 187
根高萊許 Genfleisch, Johann 69-
70
桂母波 Guillebaud, Nicolas 154
桂塔爾 Guetlard, Jean-Étienne
(1715-1786) 50
桑布克 Sambuc, Jean 348
桑利 Senlis 143
桑格諾 Soncino 340
桑塔耶斯 Sant'Orse 213
桑城 Sens 122, 144, 375
桑塔雷利 Santarelli, Father 197
柴德 Zell, Ulrich 72, 118, 231, 251
柴德翰 Zedler, Gottfried 201
格列爾 Gerler, Durant 155-156
格利甫 Gryphe, Sébastien 190-
191, 193, 200, 293, 341, 345, 390,
394
格呂德格 Grüninger, Jean 110,
122-124, 160, 235, 237, 371
格里摩納 Gremona 213
格拉夫頓 Grafton, Richard 242
格拉加尼半 Gracanica 258
格拉哥里半古 Glagolitic 259
格拉納達 Granada 217, 355
格拉茲德 Gorazde 258
《格拉澤安教規集》 *Decretum,
Gratian's* 358
格林 Green, Samuel 157, 266
格林高爾 Gringore, Pierre 323,
388
格蘭維爾 (圓機主教) Granvelle,
Cardinal (1517-1586) 162
《格羅澤語彙集》 *Apparatus in
Clementinas*. 227
格勞秀斯 Grotius (1583-1645)
278, 416
格爾諾 Gesner, Conrad 351
格瑞那達 Grenada 215
格盧澤 Groulleau, Étienne 127,
393
格羅里埃 Grollier, Jean (1479-1565)
137
《格羅澤與米拉貝拉記》 *Historia
de Grisel y Mirabella* 362
殉道聖彼得 Martyr, Peter 350,
353-355, 359
泰倫修斯 Terentius 271
泰倫斯 Terence 321, 334
「泰晤士報」 *Times, The* 90
泰奧弗拉斯圖 Theophrastus 349
浦德萊 Pulci, Luigi (1432-1484)
363
聖德會 Baptist 371
海布勒 Häbler, Konrad (1857-
1946) 62, 276
海因林斯 Heinsius (1641-1720)
197
海恩林 Heynlin (von Stein), Johann
152, 183-184, 225, 318
海爾曼 Heilmann, Andreas 57, 70

- 海德堡 Heidelberg 55, 184, 291
 海水印 waternark, Les Filigranes
 44-45, 53, 55, 58
 浩爾廷家族 Haulin family, the
 402
 烏比諾 Urbino 214
 《烏托邦》 Utopia 345, 348, 362
 烏姆 Ulm 58, 118, 232, 290
 烏拉赫 Urach 259
 烏特列赫 Utrecht 55, 58, 291
 烏提諾 Urino 214
 烏提諾 Worcester 242
 里斯特 Worcester 242
 《特里斯坦》 Tristan 324
 特戈維謝 Tergovische 257
 特列裴洛 Trepperel 155
 特利騰大公會議 Trent, Council of
 145, 162, 245, 305
 特里希諾 Trissino (1478-1550)
 414
 特里希諾 Trithème 184, 188
 特里耶 Trier 214
 《特洛伊史》 History of Troy,
 Kronika Trojanska 127, 251-252
 《特洛伊史》 Recueil des
 Histoires de Troyes 361
 《特洛伊史》 Historica
 destructionis Trojae 324
 特倫諾 Trento 212
 特雷米 Letters Patent 53
 特雷米 Treguier 215
 「特雷米期刊」 Journal de Trévoux
 299
 特雷謝爾 Trechsel 124, 156, 187-
 188, 234-235, 334, 336
 特雷維索 Treviso 45, 49, 232,
 309, 326, 336
 特魯瓦 Troyes 46, 49-55, 58, 122,
 128, 142, 157, 239, 247, 339-342
 特魯瓦的掃羅門 Raahi, Salomon of
 Troyes 339-342
 班貝格 Bamberg 75-76, 117, 222,
 231
 琉森 Lucerne 371
 《琉森集》 Edelstein, The 117
 諾曼底諾曼 Anglo-Norman 103
 《真知學園》 Collège de Sapience
 144, 277
 波瓶 pot cassé 138
 《波中秘》 Secret of Secrets 325
 《神聖記》 Revelations of St. Bridid
 120, 316
 《神學論》 Theology 369
 《神學論》 Disputationes
 Theologicae 278
 神職團體 chapter 29, 222, 376
 祕魯 Peru 264, 268
 紋徽 emblem 109, 134, 138, 151
 《素歌》 Osmoglasnick 254
 素歌集 Plainchant 257-258
 素 sols 27型
 素米爾 Saumur 182, 227-228, 245
 索利堪 Sols, Virgil (1514-1562)
 124
 索邦(書院・校園) Sorbonne, the
 53, 103, 106, 126, 152, 183, 225-
 226, 232, 310, 318, 385-390, 392,
 394, 395-396
 索姆安萊德半體 Somme angélique
 141
 索姆體 Lettre de Somme 141
 索昂 Sorg 233
 索訶德 Souillon 246
 索訶德體 Somnaville, Antoine de
 198

-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187
 純文學 (作品) belles lettres 105
 《純正體詞之書》 *Livre de parfaite oration* 383, 389
 紐伯爾 New Bern 267
 紐波特 Newport 267
 紐芬 New York 266-267
 紐倫堡 Nuremberg 52, 59, 110, 120, 124, 149, 157, 159, 162, 183-185, 217, 222, 231, 233, 235, 238, 252-253, 280-281, 286, 290, 292, 295, 315, 337, 351, 353, 370, 372-373, 407
 《紐倫堡羅丹史》 *Liber Chronicarum* 120, 359
 紐倫敦 New London 267
 紐麥斯特 Neumeister, Johann 217-219, 221, 232, 275
 納布洛克 Knobloch, Jean 110, 123, 149-150, 157, 370
 納布洛哲 Knoblochzer, Henri 236
 納沙泰爾 Neuchâtel 367, 376, 391, 394-397
 納坦庫特 Netancourt 382
 納章爾 Nevers 143
 《納章爾的熱拉爾》 *Gérard de Nevers* 361
 納薩耶 Nasier, Alcofrbas 347
 納維 Nuthad, William 266
 納爾邦 Narbonne 279
 羔織皮 (紙) vellum 18, 26-28, 37, 46, 101, 113, 117, 138, 155
 翁布爾語 Umbrian 217
 龍司 compagnons en conscience 168
 《航海史證》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202
 荷國 cartoon 39, 133
 草體 cursive script 102-103
 《草體誌》 *Fruentorium Historiae* 277
 茨溫利 Zwingli (1484-1531) 372
 財貨復歸法 law of escheat, the 288
 《財貨書》 *Glücksbuch* 123
 《追憶錄》 *Mémoriaux* 73
 配屬貴族 noblesse d'épée 331
 院士 alma mater 196, 300
 馬丁·修特 Schott, Martin 236
 《馬夫與書生》 *Podkoni a žuk* 251
 馬比隆 Mabillon (1632-1707) 196
 《馬比·奧里略的黃金書》 *Libro aureo de Marco Aurelio* 346
 馬尼波羅 Polo, Marco 99, 325, 356
 馬尼拉 Manila 270
 馬可巴 Martin, Sébastien 400
 馬克西米連一世 (書信) Emperor Maximilian 123, 238
 《馬克西米連凱歌》 *Triumphs of Maximilian* 123
 馬克格德 Maximus, Valerius 225, 335, 344, 358
 馬克蘭 Macrin, Salmon 191
 馬利耶托·奧菲尼 Orfini, Marietto 217
 馬里夫雷德的卡爾特參道院 Charterhouse of Mariefred 214
 馬里蘭 Maryland 266-267
 馬姆斯伯里的威廉 William of Malmsbury 328
 馬林桂 Malingre, Thomas 396
 馬波克 Malbork 214

- 馬切希尼 Marchesini, Giovanni
315
- 馬修·戴夫 Day, Matthew 266
- 馬庫爾特 Marcourt 396
- 馬龍瓦沙奈維 Châlons-sur-Marne
382, 400
- 馬耶 Maheu, Didier 141-143
- 馬基維 Machuel, Pierre 281
- 馬勒 Male, Émile (1862-1954)
121
- 馬麗埃 Mariette 132
- 馬基維利 Machiavelli, Niccolò
345, 414, 417
- 馬龍 Mâcon 214
- 馬德拉努 Mammeranus, Nicholas
205
- 馬耶 Marin, Pieter 279
- 馬提亞 Mathiae, Antonius 286
- 馬斯屈 Meuse, the 58
- 馬萊伯 Malherbe (1555-1628) 416
- 馬菲依 Maffei, Father 355
- 馬德·杜貝萊 Du Bellay, Martin
360, 380
- 馬德坦 Martin, Henri-Jean 6-7,
17, 38-39
- 馬尚坦 Marchant, Guy 122, 156,
234
- 馬爾堡 Marburg 291, 350
- 馬爾塞非 Malesherbes (1721-1794)
210, 311
- 馬爾達里 Mardari 258
- 馬林迪 Martin, Edme 197
- 馬德里 Madrid 158, 162, 240-241
- 《馬德里銀行法案》 *Mémoires sur
la Banque de Madrid* 200
- 馬德堡 Magdeburg 309, 368, 371
- 馬諾斯克 Manosque 395
- 馬塞爾 Marseilles 45, 281
- 馬薩尼 (馬塞什奈) Mazarin,
Cardinal 196, 300
- 馬羅 Marot, Clément 115, 191,
194, 344, 385, 387-388, 401
- 馬騰斯 Martens 232
- 馬乃依 Cornelle, Pierre (1606-
1684) 205-206, 209, 278
- 馬文魯·巴耶博登 Van
Bomberghe, Cornelius 161
- 馬高斯 Gautier, Léonard 112
- 馬加德 Godard, Guillaume 332
- 馬德 Gaudé 281
- 《高麗人較論》 *Gallomyomachia*
186
- 《高麗年國概理》 *Annals de Gaule*
128, 263, 346, 362
- 《高麗圖志》 *Bibliographia Gallica*
297
- 《高麗雜錄》 *Illustration des
Gaules* 122
- 《高麗雜錄與特奈伊集註》
*Illustrations de la Gaule et
singularitez de Troye* 360
- 《高麗雜錄》 *Gallie War* 321, 358
- 十一種
- 乾製 blind stamps 68
- 乾製活字印製 stop-cylinder press
21
- 《假發牛牛牛》 *Vitæ Antichristi*
317
- 韋斯伯登 Waesberghe 413
- 勒內·杜·安茹 René d'Anjou, King of
(1409-1480) 323
- 勒卡羅 Le Caron, Pierre 155
- 勒瓦萊 Regnault, François 142
- 勒布魯 Le Bruu, Charles 132

- 勒布雷特 Le Brei 277
 《勒未紀注疏》(《利未記注疏》)
Commentarii in Levitici Librum
 205
 勒皮 Le Puy 151
 勒吉耶 Le Gier 155
 勒克勒格 Le Clerc, Jean 230, 299,
 418
 勒克勒爾 Le Clerc, Louis 52
 勒芒 Le Mans 351
 勒佩提 Le Petit, Pierre 198
 勒朋 Le Bon, Jean 52
 勒法朗克 Le Franc, Martin 323
 勒侯伯 Robert, Jean de 73
 勒勃雷東 Le Breton 200
 勒胡瓦 Le Roy, Louis 356
 勒席內爾 Le Signere 240
 勒普登 Le Preux, Jean 401-402
 勒華 Le Roy, Guillaume 104, 153-
 154, 232
 勒費弗爾 Le Fèvre, Raoul 361
 勒塔萊爾 Le Talleur, Guillaume
 103
 勒維 Levet, Pierre 155
 勒德魯 Le Dru, Pierre 156
- 《勒盧瓦家族亡者與德維約翰的奇幻
 朝聖之旅》 *Les Loys des
 Trépassés avec le Pèlerinage
 Maître Jean de Mung en vision*
 220
 《動物誌》 *De historia animalium*
 349
 曼佐萊斯 Manzoies 233
 曼格萊 Mantegna (1431-1506)
 129
 曼林 Menelin, Jean 184, 216,
 231, 236
 曼圖亞 Mantua 187, 232, 339-340
 曼圖亞派 Mantuanus, Baptista
 (1448-1516) 322, 334, 345
 曼徹斯特 Manchester 242
 曼斯 Mansion, Colard (1425-1484)
 103
 《曼德威爾爵士遊記》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40, 326
 曼寧斯 Menzius 179
 曼爾 Manthen, Jean 286
 《買賣書》 *Livre des Marchands*
 396
 《聖與答解教理》 *Catéchisme par
 demandes et réponses* 398
 唯物論者 Materialists 22
 國民公會(法國) Convention, the
 210
 國家圖書館(法國)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6, 39, 95, 97, 134
 國務會議(法國) Council of
 State, the 210
 其勒差 Kimhi, David (?1160-?1235)
 341
 《基督生平》 *Life of Christ* 224,
 317
 《基督生平靜思錄》 *Meditationes
 vitae Christi* 316
 《基督宗教真諦》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278
 《基督徒發心》 *Cato Christianus*
 194
 《基督教原觀》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stitution
 Chrétienne* 194, 377, 392, 398,
 400
 《基督教義原貌》 *Christianissimi
 Restituis, Christiana Restituito*
 384, 394

- 基督教諸國九聖人 *Nine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 the* 65
- 《基督教騎士十手冊》 *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 194, 377
- 《基督聖訓》 *Holy Writ, The* 365
- 《基督蒙難圖十卷》 *Von der Betrachtung Heiligen Leidens Christi* 369
- 基調 *motifs* 135, 137, 139
- 培里戈 *Pérgueux* 58, 399
- 培爾 *Bayle, Pierre* (1647-1706) 230, 249, 279, 299, 418
- 《婚姻小書》 *Booklet on Marriage* 369
- 《婚姻妙趣十五篇》 *Quinze joies de mariage* 324
- 《婚姻講詞》 *Déclaration des langages de mariage* 385
- 寇伊克 *Coyeque, Ernest* 141
- 寇威努斯 *Corvinus, Mathias* (1443-1495) 105
- 寇科維奇親王 *Khodkevich, Prince* 261
- 寇拿特 *Comat* 339
- 寇拿察諾 *Cornazzano* 317
- 寇格 *Coet, Anémond de* 376, 380-381, 394
- 寇斯提里 *Coustiau* 122, 155, 157
- 寇錫 *Colomb, Joseph* 281
- 寇魯 *Causse, Barthélemy* 398
- 《密坦拿經》 *Mishna* 342
- 密爾頓 *Milton, John* 208
- 《帶罪經論暨補遺》 *De expetendis et fugiendis rebus* 350
- 帶狀紋飾 *headbands* 137, 237
- 《帶罪經論的發錄十》 *Le Miroir d'Or de l'Ame Pecheresse* 220
- 康布雷學院 *Collège de Cambrai* 226
- 康拉德·貝德 *Bade, Conrad* 393, 397-398
- 康城 *Caen* 239
- 康斯坦茨 *Constance* 184, 225
- 《康斯坦茨彌撒經本》 *Missal of Constance* 76, 237
- 康登 *Canden, William* (1551-1623) 416
- 康龐 *Compaing, Nicolas* 193
- 彩飾 *illuminate(d)* 29, 37-39, 101, 117, 119, 126
- 彩飾師 *illuminator* 25, 37-39, 53, 117, 180, 231
- 御用希臘體 *Grecs du Roi* 337
- 捷克 *Czechoslovakia*, *Czechoslovakian* 40, 250-253, 256-257, 314, 317, 319
- 掃尼耶 *Saunier* 395
- 掃德 *Sauer, Johann* 293
- 排字工 *compositor* 82-84, 144, 165-170, 173, 186, 230, 256
- 排字架 *composing stick* 82-83
- 《救贖之鏡》 *Mirror of the Redemption, The, Speculum salvarionis* 65, 125, 363
- 教父 (基督教) *Church Fathers* 105, 116, 163, 183, 185, 195, 224, 246, 305, 316, 320, 364, 385
- 《教令集》 *Decretals* 159, 276, 358
- 教本 *Doctrinale* 72, 161
- 教廷衛道館 (聖職館) *Holy Office, the* 309
- 教宗尼格勞五世 *Nicholas V, Pope* 76

- 教宗亞歷山大六世 Alexander VI, Pope 309
- 教宗恩道四世 (西克斯圖斯四世) Sixtus IV, Pope 218
- 教宗英諾森八世詔書 Bull of Innocent VIII 309
- 教宗格勒哥利七世 Clement VII, Pope 367
- 教宗國瑞 (格列高利) 九世 Gregory IX, Pope 276, 358
- 教宗國瑞 (格列高利) 十二世 Gregory XIII, Pope 161
- 教宗詔書 Papal Bulls, the 367, 375
- 教宗聖良十世 (利奧十世) Leo X, Pope 309, 355
- 教理詔如 catechism 259, 264, 266, 269, 373
- 《教理暨信仰學叢書》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dogmes et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200
- 《教會史》 *Church History* 358
- 《教會法典》 *Corpus of Canon Law* 357
- 教會法典 canon law 103, 116, 159, 226, 237, 380, 417
- 教會法官 Inquisitors 192
- 《教會律法叢書》 *Corps de Droit canon* 278
- 教會總長官 Inquisitor General 309
- 啟蒙 (主義) 時期 - 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the 133, 183, 198, 200
- 啟蒙哲人 philosophes 133, 199-200, 249, 279, 311
- 《救令典》 *Code* 358
- 旋風裝 "whirling book" 95-96
- 旋轉把手 crank 85, 89
- 梵蒂岡 Vatican 162, 240, 245, 394
- 梵蒂岡國務院 Vatican Chancellery 102
- 《梗概》 *Sommaire* 396
- 梭特爾 Soer, Johann 337
- 梭勒 Zwolle 58
- 梭蒂耶 Chaudière, Régnauld 189
- 梅西耶街 Mercière, Rue 194, 289
- 梅利雷實地 Meslay-le-Grenet 122
- 梅明根的區市議會 Memmingen, Albrecht of 292
- 《梅林》 *Merlin* 323
- 梅耶 Maire, Louis 227, 278
- 梅格列 Meigret, Louis 411-412
- 梅納日 Ménage (1613-1692) 413
- 梅納德 Ménard, Jean 122, 155
- 梅茲 Metz 387, 394, 400-401
- 梅斯基諾 Meschinot 323
- 梅爾西埃 Mercier, Sébastien (1740-1814) 279
- 梅爾克辛 Mertsin, monastery of 258
- 梅爾希奧·庫爾登 Koberger, Melchior 280
- 梅爾 Meillet, Antoine (1866-1936) 403
- 梅蘭希頓 Melancthon (1497-1560) 150, 168, 191-192, 194, 256, 369-370, 372, 375
- 梅蘭維赫 Melantrich 256
- 清教徒先民 Pilgrim Fathers, the 265
- 理華敦 Warden 181
- 理查·德行副 Bury, Richard of (1287-1345) 33
- 理申德普 Deisis 22

- 《理論》 *Instituto*. 390
- 《現代音樂論》 *Dissertation sur la musique moderne* 209
- 產業血契會 *Syndicat* 154
- 畢文 *Bilaine, Louis* 300
- 畢維 *Beda, Noël (1470-1537)* 276, 280, 376, 388
- 畢爾匹斯 *Birckx* 150
- 《異端》 *Hérésie* 206
- 《異端輯》 *Unio dissidentium* 386, 389, 395
- 《盛年法典》 *Flores legum* 358
- 《第三卷》 *Tiers Livre* 347
- 《第五卷》 *Cinquième Livre* 348
- 《第四卷》 *Quart Livre* 347
- 符號對 *Würzburg* 222
- 符號印字 *typographic signs* 77, 84
- 細線畫 *miniature* 116-117, 121, 136, 155
- 細線鑿切 *hatching* 126
- 組版 *imposition* 90, 92-93, 147, 168, 176, 412-413
- 《問題》 *Problemata* 349
-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William* 270, 292, 408, 416, 418
- 莫巴巴西亞 *Monembasia* 186
- 莫利尼 *Molinet (1435-1507)* 360
- 莫里哀 *Molière* 205, 207
- 莫里斯·讓夫 *Scève, Maurice (1501-1567)* 191
- 莫里斯親王 *Prince Maurice (1567-1625)* 248
- 莫林 *Morin* 132
- 莫泊爾廣場 *Place Maubert* 194
- 莫納爾 *Munier, Thomas (1475-1537)* 340, 368-369, 371
- 莫勒里 *Moreni (1643-1680)* 279
- 莫斯科 *Moscow* 254, 260-261
- 莫蒂埃家族 *Mortiers, the* 249
- 莫雷爾家族 *Morels, the* 188
- 莫德納 *Modena* 213
- 莫歐 *Meaux* 367, 373-377
- 荷馬 *Homer* 322
- 荷蘭 *Holland* 39, 45, 54, 59-60, 72-74, 89, 131, 162, 170, 178, 181-182, 196-197, 200, 232, 246, 248-249, 278-279, 296-297, 299-300, 308, 311, 346, 362, 413, 418
- 荷蘭十七世紀 *States General, the* 59
- 《荷蘭歷史》 *Holland. Chronicles of 72*
- 《荷蘭歷史》 *Histoire de la Guerre de Hollande* 278, 281
- 《環球歷史叢書》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299
- 連字線 *ligatures* 77, 251
- 標記圖 *notaries* 44-45
- 製紙師 *papernaker, paupereurs* 52-53
- 製紙業 *paper industry* 44-45, 48-52, 54-55, 57-60, 91, 136, 268
- 製紙廠·紙廠 *papermill* 44, 46-60, 91, 203, 244, 254, 266
- 《透視論》 *Treatise on Perspective* 125
- 都鐸王朝 *Tudors, the* 241, 416
- 《都鐸》 *Champfleury* 190, 410
- 羅伊維 *Royer, Jean* 332
- 羅文士頓 *matrix* 42, 68, 71, 73, 77-79, 104, 148, 162, 230, 237, 291
- 羅菲林 *Schäufelin (1490-1540)* 123
- 《魚》 *Poissons* 351
- 《魚》 *Oiseaux* 351

- 鹿特丹 Rotterdam 230, 249
- 麥森 Meissen 214
- 麥瑟堡 Merseburg 212
- 麥蘭 Mar, Jean 241, 364
- 麥爾蘭 Myllan, Adnew 241
- 麻薩諸塞 Massachusetts 265, 267
- 《麻薩諸塞轉本法》 *Capital*
Laws of Massachusetts Bay 266
- 十一畫
- 傅尼爾 Fournier, Pierre-Simon
 (1712-1768) 78, 81
- 傅斯林 Fust, Johann 67, 74-75,
 165, 216, 225, 231, 313
- 傑洛姆·賀羅德 Hölzner, Jerome
 157
- 最虔敬國皇 Most Christian King,
 the 417
- 凱特林·德麥迪奇 Medici,
 Catherine de 401
- 凱勒 Kelller, Gottlieb 51
- 《凱旋車》 *Triumphwagen* 238
- 《凱旋拱門》 *Triumphal Arch* 123
- 凱斯勒 Kessler, Nicolas 315
- 凱德 Kehl 199, 202
- 凱薩 Caesar, Julius 321, 335, 344,
 358
- 勞因根 Laingen 212
- 勞倫 Laurent, Pierre 155
- 勞爾蘭 Rhan-Grünenberg, Johann
 243, 336
- 博列奧 Beaulieux, Charles 411
- 博多尼 Bodoni (1740-1813) 202
- 博亞爾多 Boriardo (144?-1494)
 363
- 博托萊 Beaujolais 54, 58
- 博雷德 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Caronde (1732-1799)
 57, 199, 201-202
- 博塞 Bosse, Abraham (1602-1676)
 131
- 博萊 Baugé 399
- 博羅德(聖幾士教) Borromeo,
 Cardinal Frederico (1538-1584)
 271
- 博日 Kazan 260
- 喀布隆 Kerbriant, Jean 144
- 喀爾文 Calvin, John 194, 244,
 365, 377, 379, 382, 384, 392, 394-
 400
- 喀爾文學說·喀爾文教派
 Calvinism 244, 248, 395
- 單字鑄排機 monotype 82
- 單次拉桿印刷機 single-action press
 203
- 勞拉·勞德 Lauer, Georges 222
- 喬治公爵(薩克遜親王) George,
 Elector of Saxony 296, 370-371
- 喬維歐 Gioivo, Paolo (1483-1552)
 345
- 提坦 Titan (14?-1576) 351
- 提薩德 Tissard, François 336, 341
- 富尼爾 Funius, Adrien 205
- 富克斯 Fuchs, Leonard (1501-1566)
 351
- 富里柏格 Friburger, Michael 225
- 富拉克 Flach 124, 235
- 富奎 Fouquet, Robin 220
- 富凱 Foucault, Eustache 389
- 富羅本 Froben, Johann (1460-1527)
 106, 110, 121, 124, 168, 185, 236-
 237, 277, 293, 337, 341, 375, 378,
 382
- 富蘭克林 Franklin, Benjamin 267
- 《荷里葉》 *Paraboles* 320

- 《**萬世書**》 *Fables (of La Fontaine)*
133, 200, 210
- 萬世圖書** emblems, books of 127
- 《**幾何原本**》 *Elements* 349
- 惠斯頓** Huygens, Constantin (1629-1695) 248
- 插圖** illustration 38-39, 115-130, 132-133, 139, 155, 160, 203, 209, 218, 231-233, 236-238, 252, 255-256, 261, 279, 289, 302, 316-317, 319-320, 348, 351-352, 355, 359-360, 366, 378, 385, 388-389, 393
- 插圖書** illustrator 26, 127, 368
- 提布盧斯** Tibullus 335
- 提耶爾** Thiers 48
- 提奧多西** Theodosius 258
- 教養田莊** peccia, system of the 31, 32, 40, 42
- 斐迪南** Ferdinand, King of Aragon 137
- 斐勒薩** Filescac 417
- 斯卡龍** Scarron (?-1660) 206
- 斯托克爾** Stöckel, Wolfgang 234, 243, 370
- 斯托埃佛勒** Stoeffler, Johann 350
- 斯坎迪亞諾** Scandiano 214
- 斯佩羅尼** Speroni, Sperone 414
- 斯坦因爵士** Stein, Aural (1862-1943) 95
- 斯拉沃尼亞文** Slavonic 256
- 斯波曼努斯** Spolmannus 179
- 斯洛伐克** Slovakia 256
- 斯洛維尼亞** Slovenia 259
- 斯特拉勃** Strabo, Walafrius (?808-849) 314
- 斯科托** Scotto 233
- 斯寇里納** Skorina, Fracisk 256, 260
- 斯堪地那維亞** Scandinavia 234
- 斯騰達爾** Stendhal (1783-1842) 363
- 斯騰戴德** Stendal 214
- 斯登霍德** Sternhold 408
- 斯隆** Slon 214
- 斯塔提德斯** Statius 187, 275
- 斯塔赫** Stahel, Konrad 252
- 斯道布里坦** Stourbridge 287
- 斯圖赫** Stuchs, George 157
- 《**斯福爾札傳**》 *Sforziade* 304
-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200
- 《**猶太語彙**》 *Catholicon* 76, 315
- 普尼加德** Punicale 269
- 普瓦西** Poisy 156, 401
- 普瓦西會議** Poissy Conference, the 401
- 普瓦捷** Poitiers 45, 145, 228, 232, 239, 399, 401
- 普瓦捷伯爵讓** Poitiers, Alphonse of (1220-1271) 45
- 普羅托** Proctor 62
- 普里米** Primi 278, 281
- 普里馬提奧** Primaticcio 129
- 普廷格** Peutingger, Konrad (1465-1547) 238
- 普林尼** Pliny 325, 349
- 普羅佩提烏斯** Propertius 335
- 普羅文斯** Provins 214
- 普勞特** Prault 209
- 普羅蒙休** Promethoux 214
- 普蘭汀** Plantin, Christopher (1514?-1589) 59, 107, 130, 160-162, 168-169, 171-173, 175, 192, 197, 204-205, 227, 229, 236, 245, 255, 263, 277, 282, 293-294, 305, 339, 342, 352, 401, 413

- 普朗坦摩雷諾 *Planin-Moreus*,
firm of 169, 171-172, 204, 263,
352
- 普蒙 *Poussin, Nicolas* (1594-1665)
112, 132
- 普安奈斯 *Portsmouth* 268
- 普捷諾 *Pojano* 213
- 普勞圖斯 *Plautus* 320
- 普雷山札 *Placenza* 213
- 普雷沃神父 *Prévost, Abbé* (1697-
1763) 202
- 普雷奧克納 *Pré-aux-Clercs* 401
- 普魯斯 *Pruss, Jean* 236, 337
- 普魯登提烏斯 *Prudentius* 322
- 普羅塔拉 *Plutarch* 344, 358
- 普羅大奴 *proletariat*, the 21
- 普羅旺斯 *Provence* 323, 361, 374,
402
- 《普羅旺斯史》 *Pierre de
Provence* 323, 361
- 《普羅旺斯歌》 *Ars Brevis* 277
- 《朝聖記》 *Holy Pilgrimages*
251
- 棟布侯國 *Dombes* 299
- 森內敦家族 *Sennelons*, the 394
- 森田斯密 *Sensenschmidt, Johann*
231
- 森回 *Senj* 259
- 《植物誌》 *Historia stirpium* 351
- 《植物誌》 *Historia plantarum* 349
- 神草紙 *carta cantanea* 44
- 《說日本草木圖說》 *Bible*, the
Authorised Version 408
- 欽定版 *king's foot* 81
- 瓦克林 *Waugelin, Jean* 35
- 魏耶特 *Woelter* 51
- 魏格爾斯 *Vaugris, Jean* 380-382,
384
- 魏特 *Worth* 241
- 魏特森 *Thompson, J. W.* (1924-
1993) 27
- 魏采列 *Schall, Adam* 272
- 魏托羅華 *Atheists* 22
- 《猶大律法彙編》 *Mishna Torah*
342
- 《猶德歌》 *Judith* (by Nicolas
Lescaplier) 146
- 珐瑯畫 *enamel* 122
- 琴巴尼 *D'Andrea, Gennini* 129
- 琴巴赫 *Gymnich, Johann* 337
- 《童貞女生平》 *Lives of the Virgin*
65, 123
- 賽德賽 *Cesena* 214
- 塞唱卷 *antiphonary* 28, 162
- 塞特語 *Sogdian* 95
- 塞亞曲 *Chambéry* 214
- 《蒙塔涅與法倫》 *Art de bien
mourir et celui de bien vivre* 125
- 腓力二世 (西班牙國王) *Philip II*,
King of Spain 162
- 腓特烈二世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Frederick II, Emperor 44
- 腓瓦茲 *Schwartz, Hayim* 340
- 腓利德爾 *Choiseul, Duck de*
(1719-1785) 201
- 腓田黎 *Schussenried* 222
- 舒歌 *Schumann, Valentin* 337
- 舒德 *Schürer, Mathias* 121, 334,
337
- 華克 *Walker, John* 90
- 華沙 (波蘭首領) *Warsaw* 160
- 華沃德 *Waldvogel, Procopius* 67,
70-71, 74
- 《華美莊園》 *Très riches heures*
121

- 華爾多教派的 Waldensian, 395
 萊夫拿克 Liefinck, G. I. 39
 萊比錫 Leipzig 58, 160, 201, 208, 229, 234-235, 237-239, 243, 247, 287, 291, 294-297, 299, 310, 315, 337, 370-372, 375, 405, 407
 萊布尼茲 Leibnitz (1646-1716) 272, 418
 萊比錫斯 Rhegius, Urbanus 370
 萊因地區 Rheinland 59, 72, 104, 216-217, 219, 240, 289
 萊因谷地 Rhine Valley 118, 150
 萊因河 Rhine, the 63, 150, 218, 236, 247
 萊因金幣 Rhenish gold piece 256
 萊因科迪 Rheinardi, Johannes 285
 萊因區彌撒經本 Missal, Rhenish 100
 萊登 Leyden 39, 160, 196, 227-228, 246, 278, 281, 300
 萊瑞斯 Leiris 215
 萊維塔 Levita, Elie (1469-1549) 343
 菲內 Finé, Oronce (1494-1555) 124, 127
 菲利波·翁維塔 Giunta, Filippo (1450-1517) 157-158
 菲利浦 Philippe, Gaspard 156
 菲利博·克拉默 Cramer, Philibert 200
 菲里伯 Philbert, Claude 281
 《菲亞美蘭》 *Fiammetta* 361-363
 菲奇諾 Ficino, Marsilio (1433-1499) 144, 223, 345
 菲斯楚 Pfister, Albrecht 76, 117, 231
 菲萊爾福 Fileto, Francesco (1398-1481) 304, 322, 336
 菲鐸 Fedor, monk in the monastery of Miliseva 258
 《蛙鼠之戰》 *Barrachonyomachia* 336-337
 《詠歌仿作裡的教義訓示》 *Precationes christiane ad imitationem psaltnorum composite* 384
 《評注集》 *Commentaries* 225-226
 《評釋集》 *Commentaries* 354
 詞書類書籍 Calepin, the 179
 象形字 pictogram 94
 象徵性宗教肖像 religious iconography 64
 費內 Ferney 201
 費夫賀 Febvre, Lucien 6-7, 17-18
 費列布 Ferrebouc, Jacques 141, 143
 費希爾 Fisher, John (1469-1535) 388
 費拉拿 Ferrara 102, 105, 151, 185, 187, 232, 275, 336
 費城 Philadelphia 266
 費威贊諾 Fivizzano 232
 費耶拉本 Feyerabend, Johann 124, 293
 費迪南王子 Infante Ferdinand 202
 費泰爾 Fernel, Martin Dominique 84
 費茲赫伯 Fitzerbert, Father, S. J. 417
 費勒 Ferret, Émile 191
 費歐 Ficher, Guillaume 151-152, 224-225, 318

- 費威爾 Fiol, Swiatopolk 254, 256-257, 260
- 費諾勒 Fenollar, Bernardo 106
- 費澤洛夫 Fedorov, Ivan 260-261
- 賀拉斯 Horace 335
- 賀波特 Herbot, Jean 233
- 賀倫言 Horunken 238
- 《貴族雜誌》 *Breviaire des Nobles* 220
- 貴諾布爾 Grenoble 239
- 巨紙高度 height to paper 80
- 塞亞諾 Cousinot 357
- 塞德 Court, Benoit 191
- 「通報」 *Les Affiches* 199
- 開本 format 28, 59, 90-93, 112, 114-116, 143, 146, 159, 178-179, 191, 201, 279, 291, 299, 324, 334, 349, 352, 412
- 陽文字體・字體 punch 42, 55, 67-68, 71, 73-74, 79-81, 103-104, 107, 141, 148, 162, 202, 230
- 陽文字範雕刻師 punch-cutters 55, 79, 81
- 隆巴德 Lombard, Peter 106, 224-225, 315
- 隆河 Rhône, the 53, 287
- 隆德萊 Rondelot (1507-1566) 351
- 雅各伯 Jacob 342
- 雅格·布伊爾 Buyer, Jacques 154
- 雅格·季翁塔 Giunta, Jacques 158
- 雅諾 Janot, Denys 44-45, 49, 115, 127, 393
- 讓·爾平 Calcar, Jean Von 351
- 瑪別登巴赫 von Breydenbach, Bernhard 251, 341
- 馮胡騰 von Hutten, Ulrich (1488-91523) 237-238, 334, 368-369, 380, 385
- 馮凱瑟爾 Kayserberg (1445-1510) 238
- 馮懷勒 Wyle, von 160
- 《黃金傳記》 *Golden Legend, The* 125, 226, 317, 363
- 黑里茲 Helicz 340
- 黑根道夫 Hegendorff 390
- 黑斯布隆 Heisbrom 253
- 黑登海姆 Hedderheim 340
- 懷媽 Mère Sotte 388
- 圓體 rotunda script 252
- 塞布利 Chablis 212
- 塞吉耶大法師 Segurier, Pierre (1588-1672) 196
- 塞杜里烏斯 Sedulius 322
- 塞芬拿 Savannah 268
- 塞亞爾 Seizer, Jean 150, 191-192, 370, 377
- 塞納河 Seine, the 53, 55, 230, 282, 299-300
- 《塞萊斯蒂娜》 *Célestine* 346
- 塞爾維亞 Serbia 258
- 塞爾維特 Serretus, Michel (?1511-1553)
- 塞維爾 Seville 216, 230, 241, 263-264
- 《塔木德經》 *Talmud* 341-342
- 塔西圖斯 Tacitus 322, 335, 344, 358
- 塔拉哥納 Tarragona 215
- 塔拉摩納 Talamona 45
- 塔迪夫 Tardif, Guillaume 334
- 塔庫伊尼家 Tacuini, the 235
- 塔特雷 Tateret, Pierre 364

- 塔索 Tasso, Torquato (1544-1595)
345
- 奧一 Audin, Maurice 71, 78
- 奧古斯丁 Augustin 81, 146, 159, 184, 224, 237, 253, 268, 277, 316, 320, 364, 366, 385
- 奧地利 Austria 46, 108
- 奧利瓦 Oliva 362
- 奧坎 Ockham, William of (?-1349)
106, 184, 224, 315, 364
- 奧里維坦 Olivétan 194, 393, 395-396, 411
- 奧里維耶·阿奴諾 Arnoullet, Olivier 389
- 奧姆茲 Olmütz 214
- 奧拉托利會士(俗家修士)
Oratorians 229
- 奧波土 Oporto 215
- 奧芬堡 Offenburg 214
- 奧斯會修士 Augustinian hermits 222
- 奧洛穆茨 Olomuk 252
- 奧倫瑟 Orense 215
- 奧格斯堡 Augsburg 58-59, 110, 117, 120, 123, 149, 157, 222, 231, 233, 235, 237, 290, 293, 295, 315, 337, 340, 348, 353, 370-372
- 奧特利奧斯 Orelius (1527-1598)
356
- 奧特杜 Hotman, François (1524-1590) 191
- 奧特龐 Outrepoint 361
- 奧斯特羅格 Ostrog 261
- 奧菲尼 Orfini, Emiliano 217
- 奧雷姆 Oresme, Nicole (1323-1382)
36
- 奧爾林 Orléans 35, 151, 157, 280, 398
- 奧維耶多伊巴德 Oviedo y Valdes, Fernandez 353
- 奧維涅 Auvergne 48-51, 54, 58, 60
- 奧維德 Ovid 115, 120, 122, 125-126, 187, 320, 344
- 奧熱維 Augereau, Antoine (?-1534)
107, 192, 338, 386, 391, 412
- 奧蘭伯親王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1650-1702) 192, 246
- 《愚人頌》 *In Praise of Folly* 277
- 慈家(教派) Family of Charity
- 161
- 感傷小說 sentimental novels 362-363
- 《愛的牢籠》 *Carcel de Amor* 346, 362
- 《愛神之籠》 *Traité de l'Amour* 346
- 《愛情停屍》 *Arresta amorum* 191
- 愛爾威修 Helvétius (1715-1771)
200, 279
- 愛爾福特 Erfurt 222
- 《愛德尼》 *Emile* 209
- 《愛戀情事》 *Questions d'Amour* 362
- 搖籃本 *incunabula* 53, 58, 62, 79, 93, 100, 103, 125, 135, 233, 252-253, 270, 314, 325, 342
- 擡筒 cylinders 47, 59
- 擡槽 beating troughs 47
- 《新世界》 *Mundus novus* 353
- 《新世界與新識國家》 *New World and Newly Discovered Countries* 251
- 新拉丁語 Neo-Latin 345
- 《新律》 *Novellae* 358

- 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265
 《新婦訓》 *Doctrinal des filles mariées* 324
 《新婚守則》 *Doctrinal des nouveaux mariés* 324
 新堡 Newcastle 242
 《新舊約訓示》 *Precationes biblicae... Veteris et Novi Testamenti* 384
 《新舊約聖經故事》 *Story of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127
 新疆 Sinkiang 97
 楊·克魯登 Krieger, Jan 254
 楊頌 Jenson, Nicolas (1420-1480) 106, 152, 233, 286
 溫特堡 Winterberg 252
 溫菲林 Wimpheing 184
 溫斯勒 Wensler 222, 290
 溫菲林 Wimpfeing (1450-1528) 160, 321
 溫德林 Wendeln 57, 276, 336
 滑動架 carriage 85-87, 89
 《滑稽小說》 *Roman comique* 206
 慈威柯察 Cervicomus, Eucharis 238, 337
 瑟維林 Severyn, Jan 252
 瑟摩內他 Sermonetta 185
 瑟羅臣孫 Serianus 205
 瑞士 Switzerland 45-46, 50, 52, 58, 89, 104, 153, 232, 246, 249, 287, 289-290, 340-341, 371-372, 382
 雷士羅文米拉 Reggio Emilia 213
 雷波里 Ripoli 222, 275
 雷維 Rezé, Jacques 229
 當代人文導師守護者 (合樂) *fautor humanitissimus vivorum doctorum* 255
 《當代奇聞異事史》 *Historia rerum mirabilium sui temporis* 359
 《禁書索引》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309, 347
 《萬卷書》 *Milliaria* 300
 《歷史哲學史》 *Histoire écolaire* 315
 聖路華聖 Schoolmen 32, 103, 184, 224, 317
 義大利 Italy, Italian 5, 7, 30, 43-46, 51-54, 58-60, 69, 91, 104-106, 108, 111, 118-121, 124, 126-127, 129, 132, 137-138, 150, 154, 157, 160, 179, 182, 184-187, 189-190, 193, 196, 202, 217-218, 222, 224-225, 231-235, 240, 245, 249, 251, 253, 255, 259, 271, 278, 280, 283, 285-290, 299, 304, 306, 314, 317-323, 325, 327-328, 333-340, 342-346, 348, 353, 355, 359, 362-363, 366, 375, 380, 397, 403-404, 410, 414-417
 《義大利史》 *Historia d'Italia* 359
 「義大利喜劇誌」 *Comédie Italienne* 131
 《群島初訪簡記》 *Extrait... des Iles Trouvées* 354
 《聖人傳》 *Vite Parum* 27, 125
 《聖女》 *La Piccelle* 132
 聖文德 (聖教會文籍誌) St. Bonaventura 224
 聖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316
 聖加倫的埃克哈德 Ekkehard of St. Gall 328
 聖尼齊耶教士 Saint-Nizier 288
 聖母小殿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119

- 《聖母時辰禱書》 *Heures de Notre Dame* 388-389
- 《聖母哀之類》 *Trépassement de Notre-Dame* 220
- 《聖母傳》 *Vita de Nostra Dama* 317
- 聖安新街 *Neuve-Notre-Dame, Rue de* 155
- 《聖母誌》 *Parthenicae* 322
- 聖地牙哥康波 *Santiago de Compostela* 215
- 聖多美島 *São Tomé* 217
- 聖多瑪斯 *St. Thomas* 224-226
- 聖多瑪斯教會 *St. Thomas, the chapter of* 75
- 聖安東尼努 *St. Antoninus (1389-1459)* 275, 316
- 聖安博 *St. Ambrose (7339-397)* 159, 184
- 聖安博圖書館 *Biblioteca Ambrosiana* 271
- 聖艾蒂安杜桂德士斯樂 *St. Étienne du Gué de l'Isle* 220
- 聖艾德蒙 *St. Edmunds* 29
- 聖伯努瓦樂員士區 *St.-Benoit-le-Bétourné* 382
- 聖伯納 *St. Bernard* 224, 316, 364
- 聖伯羅 (聖彼得) *St. Peter* 222
- 聖克羅 *Saint-Cloud* 46, 52
- 聖狄谷耶 *St.-Dizier* 398
- 聖皮納德 *St. Leonard* 291
- 《聖書論》 *Rational* 35
- 聖亞勿拉 (聖阿萊拉) *St. Afra* 222
- 聖亞波黎納 *St. Apollina* 64
- 聖佳琳·錫耶納的聖凱瑟琳 *Catherine of Sienna* 316
- 聖德博十 *seraphic doctor, the* 316
- 聖德德拉特蘭 *St.-Jean-de-Latran* 56
- 聖尚德博章 *St.-Jean-de-Beauvais* 56
- 聖安德羅斯區 *St.-Jean-de-Lozne* 398
- 聖阿芒 *Saint-Amant (1594-1661)* 207
- 聖保祿宗徒 (使徒聖保羅) *St. Paul* 364
- 聖波 *Saint-Lô* 401
- 聖若美宗徒 (福音作者聖約翰)
- St. John the Evangelist 180
- 聖約翰宗徒 *St. John Porte-Latine, the Feast of* 180
- 聖約翰宗徒 *St. Jean* 151
- 聖莫利德·聖毛利斯 *St. Maurice* 122
- 聖聖 *Saint-Dié* 48
- 聖新羅姆 *St. Jerome (?-401)* 159, 184-185, 307, 318, 385
- 聖庫拉 *San Cuculata* 215
- 《聖徒生平》 *Lives of the Saints* 65
- 《聖書》 *Sainte Bible* 376
- 聖聖聖 *St. Ulrich* 222
- 《聖徒聖伯多祿傳》 *Petit Jean de Sainré* 363
- 聖華多理 *St. Christopher* 64
- 聖康坦 *Saint-Quantin* 55, 400
- 聖樂聖 *Sainte Chapelle* 122
- 《聖經論叢書》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 277
- 《聖經集》 *Psalter, Psalms* 40, 179, 186, 194, 251-252, 314, 341, 374
- 《聖經集》 (詩篇) 懺悔七篇 *Seven*

- Penitential Psalms 40
 《聖徒靈歌》 *Explanatio in Psalterium* 253
 聖雅各日 (聖雅各) St. James 222, 275
 聖雅各 St. Jacques 103, 106, 155, 228
 聖亞古士丁一 St. Augustine (354-430) 146, 159, 184, 224, 237, 253, 268, 364, 385
 聖亞古士丁一體 St. Augustin script 146
 聖奧伯特坎布萊 St. Aubert de Cambrai 73
 聖奧伯特 St. Albans 213
 「聖奧伯特之心」 St. Bartholomew's Eve 377
 「聖奧伯特靈歌」 St. Bartholomew, the Massacre of 383
 《聖歌》 Bible 26, 28, 64, 119-120, 122-123, 144, 159-160, 162, 189, 194, 197, 216, 221, 224, 241, 243, 252, 256, 261, 266, 276-279, 289, 302, 314-317, 323, 339, 341-342, 345, 364-366, 372-378, 383, 385-386, 390, 392-393, 395-398, 406-407, 411-412
 《聖歌人物誌》 *Figures de la Bible* 115, 124
 《聖歌故事》 *Story of the Bible, The* 125
 《聖歌故事四十二卷》 *Quadrins historiques de la Bible* 125
 《聖歌故事集》 *Stories of the Bible, The* 128
 《聖歌會中語》 *Precaiones biblicae* 383, 390
 《聖歌集》 *Scenes from the Bible* 127-128
 《聖歌詠歌》 *Concordance* 341
 《聖歌圖集》 *Images de la Bible* 115
 《聖歌靈歌集》 *Union de plusieurs passages de l'Écriture sainte* 395
 《聖歌靈歌集文獻》 *Prières et Oraisons de la Bible* 383, 390
 《聖歌靈歌集》 *Paraphrases* 382
 聖瑪麗日 St. Mary City 266
 聖瑪麗靈歌集日 Mont Ste. Geneviève 228
 聖羅拔 St. Roch 64
 聖羅拔 I Inter Multiplices 309
 聖羅伯特的木靈歌 Gervaise of Tilbury 328
 聖利佛 Griffo, Francesco (?-1518) 106, 186
 《聖利佛的聖歌集》 *Patience de Grisélidis* 220
 葛拉夫 Graf, Urs 121, 124, 237
 葛林姆 Grim, Sigmund 371
 葛羅羅羅聖歌 Gregoropoulos 186
 葛朗 Gran, Henri 149, 157, 277
 葛萊斯德 Gleismühl 52, 58
 葛納 Gonin, Martin 395
 葛納者 Grisch, Johann 316
 葛羅弗 Glover 265-266
 葛羅莫 Gromors, Pierre 142, 144, 157
 葡領地 Portugal, Portuguese 249, 268-270, 288, 340, 342, 352-354, 356
 《葡屬印度之發現與征服大事記》 *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 Portuguezes 354
 裝幀 bindings 95, 133-134, 137-139
 解剖學 anatomy 130, 189, 351, 415
 《解剖學理》 *Institutiones anatomicae* 351
 《解憂集》 *Anitidorum Melancolicae* 179
 《詩經全書》 *Whole Book of Psalms* 408
 《詩經參同》 *Margarita Poetica* 227
 《欲語集》 *Facetiae* 345
 詹姆斯頓 Jamestown 266
 詹森教派信徒 Jansenists, the 196
 賈洛瓦神父 Gallois, Abbot Jean 299
 路伊耶 Rouillé, Guillaume 393
 路坎托尼歐·朱翁塔 Giunta, Lucantonio 158
 路德九世 St. Louis (1214-1270) 325
 路德十世 Louis XV, King of France 81
 路德十四 Louis XIV, King of France 50, 59, 206, 248, 271-272, 300
 《路德十四的升天》 *Siècle de Louis XIV* 280
 路德 Rusch, Adolf 105, 184, 231, 236
 路德羅 Roussel 377
 路德(即一·路德) Luther, Martin 108, 115, 124, 145, 150, 192-193, 238, 243-244, 277, 365-373, 375-378, 380-383, 385, 389, 391, 405-409, 414-415
 路德派·路德教派 Lutheranism, Lutheran 238, 243, 367, 371-372, 378, 394
 《路德派狂人》 *Lutheran Madman, The* 368-369, 371
 《路德派經文法圖相圖書》 *Grammatica Germanicae linguae... ex bibliis Lutheri Germanicis et aliis eius libris collecta* 407
 《路德派經》 *Lutheranae farinae* 384
 《農工之觀》 *Chasteau de labour*
 323
 《農事書錄》 *Agriculture et maisons rustiques* 189
 《農書總》 *Treatise on Agriculture* 326
 《遊記》(魏因登田遊記) *Peregrinationes* 341
 道明會士·道明會修士·多米尼根會士 Dominican 185, 325, 396
 道家 Taoism 96
 達尼埃 Dancès, Pierre 188, 386
 《達夫尼斯與赫洛提雅》 *Daphnis and Chloé* 279
 戴夫拉科 da Spira, Johannes (?-1469) 105
 戴尼德(即戴) Daniel 117
 戴米安·希曼 Hlgman, Darnain 189
 戴維 d'Arras, Jean 323
 戴明伯 D'Alembert, Jean (1717-1783) 199, 201, 209
 戴維斯一 Dalmatin, Grgur 259
 戴維斯四 Dalmatia 259
 戴維 David, Jacques-Louis 203, 340

- 德文雜米半 pascal lamb 135
 德文 quadrans 146
 《德文》 *Mammetractatus* 315
 德文雜米半 Lescaplier, Nicolas 146
 德文 Renouard, Philippe 239
 德文 Regnault, Jacques 142, 144, 241, 389
 德文 Rey, Marc-Michel 200-201, 249, 281
 德文 Lerico 218
 德文 Le Bé 55-57
 德文 | 杜 Le Bé the elder, Guyot 55
 德文 Lérída 213
 德文 Rheims 122, 281, 400
 德文 Rennes 214
 德文 Legnani 240
 德文 Rhenanus, Beatus (1485-1547) 168, 184, 188, 237, 369
 德文 Resch, Conrad 121, 280, 375, 380-384
 德文 Regionontanus, Johan Müller (1436-1476) 326
 德文 Lepreux, Georges 239
 德文 Reycondes 281
 德文 Révellon, the 60
 德文 Léonard, Frédéric 196, 284
 德文 compagnons à la tâche 168
 德文 retail oulet 274-275, 286
 德文 Saône 49, 53, 287-288
 德文 Chalon-sur-Saône 122
 十四圖
 德文 Gaguin, Robert 188, 321, 359
 德文 Garin, Louis 151
 德文 Thuringia 290, 406
 德文 Tuppo 119
 德文 Libraries 6, 8, 24, 39, 42, 73, 93, 95, 97, 114-116, 134, 141, 151, 196, 222, 224, 226, 271, 300, 324, 329, 343, 347, 376
 《德文》 *Gesamtkatalog* 321
 德文 Toussaint, Jacques 188
 德文 Toul 143
 《德文》 *Tusculan Disputations* 225
 德文 Tullius 49
 德文 Tours 111, 115, 122, 125, 127, 155, 157-158, 182, 192, 200, 215, 343-345, 360, 390, 393-394, 399
 德文 Gregory of Tours 360
 德文 Tournon, Cardinal 158
 德文 Tubingen 150, 184, 191, 214, 238, 259, 291, 337
 德文 Trubar, Primus 259
 德文 Touraine 161
 德文 tympan 86, 141
 《德文》 *Hyperotomachia Poliphili* 120, 124, 127
 德文 Zasius, Ulrich 184
 《德文》 *Colloquies* 277, 347, 385
 《德文》 *Bouclier de la foi mis en dialogue* 398
 《德文》 *Dialogues* 345
 《德文》 *Fierabras* 323, 361
 德文 Chevallon, Claude 385
 德文 Chelcicky 252

- 樹波茲敦 Shepherdstown 268
 樹洛姆·德古爾蒙 Gourmont, Jérôme de 386
 樹斯迪翁 Chaise-Dieu 122
 《歌集》 *Canzoniere* 222, 323
 《歌謠選》 *Chansons* 133
 《演說集》 *Orations* 187
 滾輪狀的壓模 *rouleuses* 135
 漢堡 Hamburg 214, 281, 368, 376
 漢斯·修埃佛 Schoeffer, Hans 371
 漢斯·歐特瑪 Omar, Hans 238
 漢斯·霍爾班 Holbein, Hans (1497-1543) 238
 漢撒同盟 Hansa 290
 《漫談》 *Quodlibeta* 317
 瑪巴夫 Mamef 156, 188, 241
 瑪卡利 Makarii 257, 260
 瑪倫森爾 Marienthal 212
 瑪格麗特 (那瓦爾十四) Navarre, Marguerite de 115, 192, 376, 387
 《瑪格麗特王妃詩集》 *Marguerite des Marguerites des princesses* 125
 瑪寇里尼家族 Marcolini, the 240
 瑪麗女王 Mary I, Queen of England (1542-1587) 242
 《瘋狂的羅蘭》 *Orlando Furioso* 363
 碧姆勒 Beamlers 233
 碧耶佛 Bièvres 156
 畢爾根曼 Bickmann, Franz 236, 238
 斐里尼歐 Foligno 212, 217, 232, 275
 哥斯培 Gospel, the 258, 260, 378
 《福音主義與舊約聖經論叢書》 *Abbrégé de la doctrine évangélique et papistique* 398
 《福音教義略》 *Brief sommaire de la doctrine évangélique* 398
 《福音海峽之聖書》 *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æ* 252
 斐爾 Forez 49
 《醫學叢書》 *Apparatus Elegantiarum* 146
 《醫書》 *Compendium breve* 153, 232
 維也納 Vienna 160, 214, 237, 255, 290, 353
 「維也納的聖羅巴斯」 St. Sebastian of Vienna 64
 維伊歐 Villiedieu, Alexandre de 110, 185, 224, 318
 維列特 Vilette, Marquis of 51
 維托圖斯 Vergesus 337
 維吉爾 Virgil 126, 186, 194, 202, 206, 224, 226, 320-322, 336, 344, 361
 維努爾茲 Vernulz (1583-1649) 416
 維杜森家族 Verdussons, the 245
 維拉蒙 Villamont 356
 維瓦特 Viart, Guyonne 189
 維登維 Verhaeren, M. 271
 維洛隆 Verona 119, 213, 285, 326
 維洛隆的賈斯培 Verona, Jasper of 185
 維埃隆 Vienne 122, 212, 218, 384, 394
 維埃納伯爵維羅士敘 Vienne, Count Archbishop of 218
 維特波 Viterbo 214
 維勒孔德 Vic-le-Comte 122
 維勒斯拉文 Veleislavine, Adam

- 256
 維薩利 Vicenza 336
 維萊 Velay 49
 維萊科特雷教令 Villers-Cotterêts, ordonnances of 343
 維特維塔 Vitruvius 124
 維龍 Vignon, Claude (1593-1670)
 維爾 Villon, François (1431-?1463) 106-107, 120, 323, 402
 維雷特 Viret (1511-1571) 397-398
 維爾維 維納 256
 維德 Vidoue, Pierre 121, 124, 157, 382
 維薩利 Vesalius (1514-1564) 130, 351
 維薩利 Visagier, J. 191
 澤奈 Zainer, Gunther 117, 231, 253
 蒙大努 Montanus, Arias (1527-1598) 130
 蒙古 Mongols 99
 蒙尼耶 Monnier 139
 蒙多內多 Mondonedo 215
 蒙多維 Mondovi 212, 232
 蒙桑古耶街 Montorgueil, Rue 128
- 蒙克雷斯帖 Montcresten 170
 蒙貝利亞爾 Montbéliard 57, 381
 蒙貝利耶 Montpellier 45, 199
 蒙特內格羅 Montenegro 257
 蒙特馬約 Montemayor (?1520-1561) 362
 蒙特雷 Monterey 215
 蒙特維爾 Monteverde 263
 蒙斯特 Münster 214
 蒙塔班 Montalban 340
 蒙塞拉特 Montserrat 215
 蒙福孔 Montfaucon (1655-1741) 279
 蒙澤 Münzer, Jerome 217
 蓋伯 Gaiber 238
 佩羅托 Perotto, Niccolò 227, 334
 佩爾蒂 Perotti, Niccolò 114
 聚 bundle 26, 28
 製書工作 Werk der Bücher 74
 豪華版 - 豪華本 de luxe edition, luxury edition 35-37, 111, 117, 132, 139
 豪華裝璜 luxury binding 133-134, 137-139
 豪瑟 Hauser, Arnold (1892-1978) 165, 172, 365
 豪瑟 Hausser, Henri 365
 豪德 Gouda 118, 120, 212, 232-233
 赫本德 Hopfl, Wolfgang 141-142, 155
 赫利伍的約翰 John of Hollywood 224
 赫利奧多魯 Heliodorus 361
 赫甫的亨利 Heph, Henri of 316
 赫格特 Hergot, Hans 373
 赫恩 Hain 62, 314, 320-321
 赫策爾 Hezzer (?-1529) 371
 赫塞哥維察 Herzegovina 258
 赫羅德 Hérold, Christian 281
 《聖歌集》 Dies Canticularis 281
 銀匠的技藝 ars argentaria, art of the silversmith 70
 《閨女夢》 *Songe de la Pucelle* 220
 《發日蒙神學與神學》 *Adversus furiosum Parisiensium*
theologastrorum decretum 375
 齊爾德 Koeln, Wiegand 396

- 十五歲
- 儀禮體 Civilité script 394
- 劍橋 (英國) Cambridge 242, 265
- 劍橋 (美國) Cambridge, U.S.A. 266
- 寫字語文 literary language 403, 405, 407, 409-410, 415
- 廣茂 Granjon, Robert (1513-1589) 80, 380, 394
- 德區布冊臣 Nebrija, Antonio de 241, 338, 342-343, 414
- 德區班米 Baif, Antoine de (1532-1589) 344
- 德區班民 Balzac, Guez de (1597-1654) 196, 248
- 德區爾齊札 Gasparino da Barzizza (†1360-1431) 225, 322
- 德區羅 Barros, Juan de 269, 354
- 德區馬拉 Lopez de Gomara, Francisco 354-356
- 德加彼安諾 Gabiano, Balhasar de 106
- 德加圖西 Caturce, Jean de 193
- 德卡雅 Cayas, Gabriel de 162
- 德卡羅拉 Gouvern, Antoine de 191
- 德區哥斯 Niccoli, Niccolò de' (1364-1437) 104
- 德布瓦桑 Bussysonne, Jean de 193
- 德布利 Brie, Jean de 389
- 德布冊 Bry, Thomas de 33, 130, 355
- 德布羅薩 Breda, Jacques de 235
- 德布羅加 Brocas, Arnao Guillon de 241
- 德瓦拉坦薩 Voragine, Jacques de 125, 224, 226, 317
- 德瓦勒拉 Valera, Diego de 360
- 德波薩 Pisan, Christine de (1364-†1430) 323
- 德因蘇拉 Insula, Francesco de 317
- 德米包加 Meauegard, Jean de 122
- 德伯次 Berquin, Louis de 188, 194, 377, 386-387, 389
- 德京羅田 Crescens, Pierre de 325-326
- 德利尼亞明 Lignamine, Johannes Philippus de 275, 336
- 德利威 Leau, Gerard de 120, 232
- 德區馬納 Luynes, Guillaume de 281
- 德區塔裡 Guy de Lusignan 76
- 德區塔 de Saci 206, 279
- 德區塔 Sallo, Denis de 298-299
- 德區薩 Savone, Pierre de 205
- 德區德 Wordé, Wynlyn de 241
- 德區德勒 Le Maire de Belges, Jean (1473-1525) 122, 360
- 德區德林 Cyrano de Bergerac, Savinien (1619-1655) 207
- 德區威 Leu, Thomas de (1560-1612) 112
- 德威斯雷 Presles, Raoul de 32
- 德其羅 Cirey, Jean de 222
- 德德伯野 Champagne, Philippe de 132
- 德區黎 Paris, Jean de 286
- 德區佛里 La Forge, Jean de 146
- 德區帕爾 La Paluel, Pierre de 364
- 德區圖德 Imbart de la Tour, P. 393
- 德拉維丹 Laville, Jean de 281
- 德拉羅勒 La Salle, Antoine de

- (71386-71460) 324
- 德拉克羅華 La Roche de 281
- 德旺多姆 Vendôme, Mathieu de 320
- 德波巴 Bogne, Georges de 154
- 德波瓦新歐 Boisgermain, Luneau de (1732-1804) 147, 210
- 德波皮諾 Bossis, Andrea de 304
- 德波特羅 Despautère 304, 334
- 德波塔 Porta, Petrus de 277
- 德波德特羅 d'Argenté, Bertrand 360
- 德區羅約 d'Arande, Michel 377
- 德昂 Dyon, Adam 371
- 德勃羅 der Borchl, Pierre Van 130
- 德威特 Thevet 356
- 德區萊 Colines, Simon de (1480-1546) 107, 111, 115, 168, 188-189, 277, 292, 338, 372
- 德威米 Derôme 139
- 德亞米尼 Comines, Philippe de (71447-1511) 218, 360
- 德埃埃諾維 Espinosa, Antonio de 264
- 德萊亞 d'Ailly, Pierre (1350-1420) 224, 316
- 德萊斯半蘭特 Escalante, Bernardino de 355
- 德萊斯特 d'Este, Ercole 185
- 德區尼泰 Enciso, Martin Fernandez de 353
- 德萊特 Ponte, Petrus de 204
- 德聖 Deniers 26-27, 31, 33, 144-145, 147, 170
- 德聖 Hu, Loys de 400
- 德特瓦諾 Théramo, Jacques de 125
- 德特羅瓦 Trévon, Henri de 35
- 德特羅拉加 Zumárraga, Juan de (1468-1548) 264
- 德曼多羅 Mendoza, Gonzales de 355-356
- 德國 Germany, German 46, 50, 52-54, 58-60, 70, 72, 80, 89, 104, 106, 108, 118-119, 121, 123-124, 126, 129, 132, 134, 150, 153-154, 157, 167, 174, 177, 190, 195, 207, 208, 217, 222, 226, 231-249, 251, 253, 255, 257, 259, 285-297, 300-301, 304, 307, 309, 321, 329, 336-338, 340, 344, 353, 364, 366, 368-371, 374, 376, 383, 392, 398, 404-407, 416-418
- 德區瓦 Médulla, François de 332
- 德區德爾 Keyseren, Martin de (in French, Martin Lempereur) 377-378, 389-390
- 德勞德蘭 Langetière, Antoine de 49
- 德蘭德 Vincent de Beauvais (1190?-1264) 56, 159, 224, 325, 359
- 德區羅羅 Flores, Juan de 362
- 德區羅羅 Tisnova, Martin de 252
- 德斯拉波威家萊 Desbordes, the 182, 227
- 德斯特雷雷杜父 Destrez, Abbot Jean 31
- 德區羅羅 Desmarez 60
- 德區羅羅 Des Préz 304
- 德區羅羅 Desprez, Guillaume 196, 198, 206, 278, 308
- 德區羅羅 des Préz, Nicholas 156
- 《德格萊》 Silvae Morales 187
- 德萊羅 Delassé 39

- 德非利耶 Ferrière, Loup de 328
 德青戈萊 De Gregori, firm of 235
 德塞萊 Seyssel, Claude de (147?-1520) 143, 343-344
 德威林 (法國羅安州) Orléans, Philippe de, Regent of France 139
 德威頓 d'Aulun, Guillaud, Canon 331
 德魏典版 Windis, Matheus Cerdonis de 259
 德威風羅 San Pedro, Diego de 346, 362
 德威米萊 Saint-Gelais, Melin de 344
 德魏區德共 Marnix de Sainte-Aldegonde (1540-1598) 300
 德圖士 Destouches (1680-1754) 209
 德圖德 Tours, Guillaume-Michel de 344
 德圖德陶 Tourmes, Jean de 111, 115, 122, 125, 127, 182, 192, 200, 343, 345, 390, 393-394
 德維奧 Viau, Théophile de (1590-1626) 198, 248
 德羅昂德 Montrocher, Guy de 226, 316
 德羅塔黎 Montauron 206
 德羅拉 Lyra, Nicholas of (?-1349) 106, 224, 226
 德羅佛瓦 Jouffroy, Jean de 52
 德羅布爾黎 Lublina, Biernat de 255
 德羅比何律父 Nobili, Father de 269
 德羅德現 Normandie, Laurent de 397, 399-400
 德羅德 Dritzehn, Andreas 70
 德羅臣 Lemaistre de Saicy 26
 德羅德 Jonghe, Adrien de 72
 德羅昂 Rohan, Jean de 220
 德羅昂城 Rojas, Fernando de (?1465-?1541) 346
 《德米書》 *Prognostication* 347
 《德口文德書》 *Epistola de Miseria Curatorum* 316
 德巴尼 Maubanel, Jean 155
 《德巴尼德》 *Pantateuch, The* 339-340, 342
 德西昂 Murcia 215
 德拉良斯 Moravus, Matthias 276
 德拉維亞 Moravia 250, 252-253
 德摩 Molin, André 279
 德德德律父 Morellet, Abbé 201
 德德維亞 Moldavia 257
 德雷塔城 Moreus 59, 111, 169, 171-172, 182, 204, 245, 247, 263, 280, 282, 284, 294, 252
 德德 More, Sir Thomas (1477-1535) 345, 348, 362
 《德圖十德》 *Morgante* 363
 德德昂 Mortel 18
 德威羅 Momoro, A. F. (1756-1794) 85
 德圖城 carta lustra 39
 《德香川德》 *Tripary* 326
 《暴德風德米德德德德德》
 Comédie du Pape malade et tyrant à sa fin 397
 德德德 Cancelleresca 102, 106
 德或 mould 67-70, 73
 《德威德》 *Convivium* 304
 德德 Délices 201
 德丹·佩埃 Petit, Oudin 401
 德文 Owen, John (?1560-1622)

- 416
歐波林 Oporin 351
歐波德 Obod 257
歐格林 Oeglin, Erhard 157
歐幾里得 Euclid 349
歐斯勒 Oessler, Jacques 310
潘庫柯 Panckouke 201, 297
潘拿茲 Pannartz, Arnold (?-1476)
105, 118, 217-218, 231, 275, 285,
335
潘普羅納 Pamplona 215
帕克斯 Gex 398
帕瓦爾 Gerbert (of Aurillac) (?945-
1003) 328
帕拉爾 Gérard, Jean 396-397
帕諾亞 Genoa 44-45, 48-50, 54,
212, 281, 286
熱爾松 Gerson (1363-1429) 46,
316, 363
熱羅田 hot-stamping 138
《熱羅的羅蘭》 *Orlando*
Innamorato 363
《窮人聖經》 *Biblia pauperum* 65,
121-122, 128
範本 exemplar, exemplaria 31-33,
- 65, 103, 115, 121, 360, 407, 410,
417
《箴言》 *Adages* 115, 187, 271,
347
蓮花 *Flours de lys* 135
蔡倫 Tsai Lun 94, 97
蝴蝶裝 "butterfly book" 96
衛勒 Weiler 405
《諸節慶經》 *Sanctorale* 277
《論人世知識之不同》 *Von*
Menschenlehre zu Meiden 369
《論人類知識起源》 *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 209
《論三角》 *De triangulis* 326
《論不平等之起源》 *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 209
《論友愛》 *De Amicitia* 321-322
《論天主經》(《論主經》) *De*
Oratione Dominica 381
《論孝悌》 *De Senectute* 321
《論自由》 *On Liberty* 369
《論克勞迪與奈維之世》 *Essai sur*
les ré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
200
- 《論事物之性質》 *De proprietatibus*
rerum 325
《論知名女性》 *De claris*
mulieribus 35
《論真正規約與戒律》 *De*
disciplina et institutione puerorum
390
《論基督徒之友愛》 *De Amicitia*
Christiana 322
《論通俗口語》 *De vulgari*
eloquentia 414
《論榮與救贖》 *De amoris remedio*
218
《論發誓》 *De Asse* 348, 415
《論職責》 *De Officiis* 225, 321,
335
《論禮贊俗世》 *De contemptu*
mundi 320
《論贖罪與寬宥》 *Von Ablass und*
Grade 369
轉式蒸氣印刷機 cylinder steam
press 21
鋪工 coucheur 47
魯本斯 Rubens, Peter-Paul (1577-
1640) 111-112, 132

- 魯瓦揚區的聖哲 Saint-Jean-en-Royans 49
- 魯伏特 Luft, Hans 243, 369, 373
- 魯汶 Louvain 53, 58, 118, 187, 212, 232-233, 291, 338, 341, 378, 390
- 魯波 Ruppel, Aloys (1882-1977) 28
- 魯波爾 Ruppel, Berthold 231
- 魯特林根 Reutlingen 59, 183, 190, 212
- 魯傑蒙 Rougemont 214
- 魯揚斯克 Rujansk, monastery of 258
- 魯薩和 Luzac, Elias 281
- 黎凡特 Levant 137, 288
- 黎切爾 Rizhel, Jean 377
- 黎塞留 (红衣主教) Richelieu, Cardinal 282, 417
- 黎赫敦斯坦 Liechtenstein, Pierre 157
- 墨西哥 Mexico 263-264, 268
- 墨種 ink dabber 85
- 十六畫
- 學人共和 Gelehrtenrepublik 208
- 《學人著述誌》 *Histoire des ouvrages des savants* 299
- 《學人誌》 *Journal des Savants* 296-297
- 《學名錄》 *Nomenclator* 205
- 學院教會 collegiate church 154
- 學童讀本 primer 143, 247
- 寰宇全書 universal lexicon 201
- 《導冊》 "La Coche" 125
- 斯卑 guide, the 85
- 曆仁鑄排機 linotype 82
- 曆書 calendars 94, 97, 252, 266, 274, 286, 289, 302, 324, 332, 393, 396
- 《機器論》 *Traite on Machines* 326
- 歷史學會 (英國) Congress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39
- 澳門 Macao 269-270, 354
- 燈籠 lamp black 67
- 鑲金 gold tooling 134, 137-139
- 《獨白集》 *Soliloquies, The* 316
- 獨角獸商標 Unicorn, the House of the 382
- 盧卡 Lucca 150, 158, 212
- 盧布爾雅納 Ljubljana 259
- 盧奇安 Lucian 277, 320
- 盧瓦 Rouen 103-105, 157, 161-162, 228-230, 239, 241, 247, 280-282, 307, 213
- 盧瓦中議會 Rouen Parlement, the 157
- 羅素 Rousseau, Pierre 199-201
- 羅梭 Rousseau, Jean-Jacques 199-201, 209, 279
- 盧森堡 Luxembourg 279
- 盧森貝 Luxeuil 52
- 盧德 Lulle, Raymond (?1235-1316) 277
- 魯澤伯登 Lützelburger (?-1526) 124
- 《薩齊塔尼亞人之歌》 *Lusitads, The* 354
- 穆松橋 Pont-à-Mousson 49
- 穆爾茨 Murrau 378
- 穆賽厄斯 Musaeus 186
- 穆蘇羅 Musuros, Mark 186
- 篤布瓦 Dubois, Simon 192, 376-377, 382, 411-412

- 讓德普 Chauteemps, Jean 395
 諾丁罕 Nottingham 242
 諾夫哥羅德 Novgorod 261
 諾南托拉 Nonantola 213
 諾威治 Norwich 242
 諾訥 Noyon 399
 諾特萊 Norary, Julian 241
 諾曼底 Normandy 58, 157, 239,
 241, 374, 397, 399-400
 諾維 Novi 214
 諾德 Naudé, Gabriel (1600-1653)
 59, 196, 217, 300
 諾德林根 Nordlingen 59, 217
 《諾德詩》 *Satires* 320
 諾維錫 Ramusio (1485-1557) 355
 諾索 Elector 243, 296, 309-310,
 370
 《諾德詩集》 *Grant Testament*
 106-107
 《諾德詩》 *Testaments* 323
 諾德花邊 à la dentelle 139
 諾德字體 staneis typis 78
 諾耶維 Siena 214, 285, 316
 諾斯特龍 Sisteron 400
 諾德版 portable format 114-115,
- 186
 諾德字體 block printing 71, 97,
 118, 122
 諾德書 block-book 65-67, 87, 97-
 98, 121, 125
 諾德 die 141-142, 230
 諾克斯 Hobbes, Thomas (1588-
 1679) 416
 霍金斯公館 Hawkins Court House
 268
 霍爾拜 Holbein 110, 115, 124,
 127, 237
 霍赫菲德 Hochfeder, Gaspard 254
 賴森 Pynson, Richard (?-1530)
 103, 241
 《詩體總論》 *Ars versificatoria*
 334
 鮑德里 Baudry 332
 鮑示錄 (鮑示錄) Apocalypse,
 The 65, 123, 314, 393
 《鮑示錄人物誌》 *Figures de*
l'Apocalypse 393
 鮑東 Mendou 156
 《鮑東錄》 *Meditations, The* 316,
 417
- 默美田德 Mummelius (1480-1517)
 238
 默多德 Meursius 178
 《默多德》 *Meditationes* 118-119,
 218, 222
 龍薩 Ronsard (1524-1585) 413
 十一圖
 歐西古德埃 Eusebius 344, 358
 歐日申 press bar 85-87, 89, 169
 歐及 platen 85-86, 89, 141
 歐德魯本 missal 28, 76, 100, 116,
 119, 145, 218-219, 221, 237, 254,
 257, 314
 歐德爾奈 (亞) liturgical 107,
 162-163
 《歐德爾奈》 *Missae est*
Sacrificium 371
 戴芬特德 Deventer 212, 235-236,
 336
 戴芬特德 d'Elaples, LeReve 184,
 188, 194, 276, 280, 328, 364-365,
 373-374, 376-378, 385, 387, 395
 《戴芬特本圖錄》 *Herbarum*
eicones ad naturae imitationem

- effigiae 351
- 《曙光女神》 *Aurora* 327
- 濕壁畫 fresco painting 119
- 總主教選舉 Archbishop Electors 309
- 總領事館 Chancery 44-45, 102, 198, 305, 311, 370, 403, 405-406, 410, 412
- 薄伽丘 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 35, 118, 187, 323, 345, 361-363
- 螺紋卷 screw thread 89-90, 141
- 《禮讚聖母聖誕》 *Sermones de Laudibus Sanctiorum* 276
- 謝法龍 Céphalon 341
- 謝德爾 Schedel, Hartmann (1440-1514) 120, 359
- 謄本 copy 31-32, 35, 36-38, 40, 42
- 賽倫塞斯特 Cirencester 242
- 賽普勒斯 Cyprus 76
- 邁伊 Maillet 221
- 邁托 Myto, Jonata de Vykohevo 252
- 邁薩根 Meiningen 285
- 邁蒙尼德 Maimonides (1135-1204)
- 342
- 鋅活字 (的) metallographic 67
- 霞阿神父 Jacob, Father Louis 297
- 霞諾 Janot, Jean 332
- 韓國・朝鮮 Korea, Korean 96, 98, 270
- 點數系統 points system, the 81, 203
- 十八釐
- 戳模 die-stamps 68-69, 138
- 織紋紙 (布紋紙) wove 202-203
- 繕寫冊 scriptoria 28, 37, 104-105, 258, 262
- 藏書家 bibliophile 6, 134, 138
- 薩比羅的厄何里尼 Nicolini da Sabio 240
- 薩布魯多夫 Zabludov 261
- 薩伏伊 Savoy 153, 381, 398
- 薩伏那洛拉 Savonarola, Girolamo (1452-1498) 194
- 薩伯洛夫斯基 Zaborovsky 255
- 薩克森 Saxony 50, 224, 243, 296, 310, 317, 370-371, 383, 406
- 薩克森的盧道甫 Ludolphus of Saxony (?-1378) 224, 371
- 薩利內的厄何里尼 Salicet, Nicolas of 255
- 薩貝利科 Sabellico, Antonio (1436-1506) 186
- 薩拉哥薩 Saragossa 158, 184, 213
- 薩拉曼卡 Salamanca 158, 213, 240-241
- 薩拿札路 Samnazar, Jacopo (1458-1530) 345
- 薩莫拉 Zamora 215, 227
- 薩利斯 Salins 214, 221
- 薩瑪蘭 Samaran, Charles 39
- 薩爾斯特 Sallust 224-225, 227, 321, 335
- 薩羅勒 Sadolet (1477-1547) 191, 194
- 豐特奈爾 Fontenelle (1657-1757) 418
- 轉軸 hinge 86
- 《雙心譜》 *Distiche* 40, 319-320
- 雙疊版 double imposition 111, 132
- 題贈書函 Dedicatory epistles 187
- 《騎士與天鵝》・「騎士與天鵝」

- Chevalier au cygne* 226, 361
 魏因加納 Weingartner, Andreas 382
 魏印爾 Wechel, Christian 107,
 124, 277, 338, 341, 347, 382-383,
 386-387, 389-390, 402
 魏節 Vignon, Jean 143
 魏斯 Weiss, Hans 95, 243
 魏斯德敦 Wiesner, Professor J.
 von 95
 魏登 Van der Weyden (1399-1464)
 121
- 十九畫**
 《龐大固塔》 *Pantagruel* 347, 387
 懷卻曲 Whitechurch, Edward 242
 瓊尼神父 Joannes, Father Endeman
 417
 簾帷繡圖 *tapestry* 122, 360
 《簿記方法與格式》 *Instruction et*
manière de tenir livres de compte
 205
 《繪本變形記》 *Illustrated*
Metamorphoses 127
 羅卡萊利 Locatelli 235
- 羅母希林 Reuchlin (1455-1522)
 184, 191, 338, 343
 羅西加斯 Rodriguez, Bishop of
 Zamora 227
 羅西版 de Rohan 38
 羅西圖神父 Ruggieri, Father 270-
 271
 羅西德 Roanne 287
 羅倫·回巴松 Anisson, Laurent
 177, 179, 196
 羅倫佐·德麥迪奇 Medici,
 Lorenzodei (1449-1492) 353
 羅素爾 (福機士敦) Lothaire,
 Cardinal 153, 232
 羅特赫 Lotther, Melchior 234,
 237, 243, 296, 369, 372
 羅特魯 Rotrou, Jean de (1609-1650)
 205
 羅馬 Rome, Roman 22, 24, 26, 34,
 72, 99, 104-105, 118-119, 124, 126,
 194, 197, 202, 217-218, 222, 224,
 231, 233-234, 240, 245, 259, 271,
 275, 285-286, 309, 320-322, 335,
 339, 349, 352-353, 358, 365, 370,
 394, 417
- 羅馬體 roman script, the 80, 102-
 108, 111, 113-114, 142, 146, 190,
 226, 234, 237, 256, 264, 328, 347,
 410
 羅勃文克 Rolevink, Werner 359
 羅發 Il Rosso 129
 羅傑斯維德 Rogersville 268
 羅發 Roffet 124
 羅斯托克 Rosiock 212, 222, 368
 羅塞利 Roselli, Antonio 309
 羅騰堡 Rottenberg 371
 《羅蘭之歌》 *Chanson de Roland*,
 The 328
 藤曼狀花紋 vignette 115
 譚德 Thanner, Jakob 243, 370
 邊框 (由頁面上四圖案花紋所構成)
 frames 110, 111, 119, 122, 124,
 126-127, 138-139, 368
 嫩尖鱗 La Flèche 229
- 二十畫**
 《寶藏箱》 *Schatzbehälter* 120
 謝博節 Shrove Tuesday 173
 《體層形因考》 *De ortu et causis*
subterraneorum 352

蘇 (= 一蘇 = ○ · ○ 五冊裝 = 十一

德型) sous 26型

蘇比亞諾 Subiaco 105, 212, 217,

222, 231, 335

蘇伽 Suze 396

蘇埃托里奧斯 Suetonius 194,

335, 344, 358

蘇格蘭 Scotland 241, 325

蘇米 Suso, Heinrich (?1295-1366)

316, 363

蘇黎世 Zurich 57, 212, 293, 341,

351, 373

《議會史》 *Historia Concilii* 178

《蘇薩》 Casovnik 261

一十一圖

蘭古耶 Languet, Hubert 383

蘭伯特 Lambert (1486-1530) 376,

394

蘭迪甘集 Lendit Fair 27

蘭枯圖 Lambertus 286

蘭古圖 Langlée 51

蘭特瓦河 Lanterne, the 52

蘭茨胡特 Landshut 59

蘭勃 Rambaud, Honorat 411

《蘭斯洛德聖》 *Lancelot* 113,

127, 324

蘭德堡聖 Landsberg, Martin 234,

243

蘭欽黎德 Langelier, Arnoul 411,

412

《麗花聖聖》 *Champion des dames*

323

麗神學 apologetics 307

《麗語法》 *Dialectica* 205

麗維 Thevet, Jean 130

麗天市集 fairground 131

麗瓦拉 Guevara, Antonio de

(?1480-1545) 346

顧伊安 Guiland, Claude 191

顧登明 Guldenrund, Hans 370

顧登刺 Kutenberg 214

《魔鬼之鏡》 *Procès de Bélical* 323

《魔鬼記》 *Bélical* 125

《魔鬼羅伯德》 *Robert le Diable*

323-324

一十一圖

蘭 cahier 26

《蘭羅白》 *Le Lurrin* 278

蘭罪券 indulgences 64, 76, 221,

243, 366, 368

蘭士十四 letter founders 56, 106,

264

蘭模 mould 73-74, 77, 79, 141,

287

蘭國蘭獎 Prix Goncourt 280

一十三圖

《鐵片集》 *Fioretti* 316

《變形記》 *Metamorphoses* 115,

122, 125, 344

變音符號 diacritical signs 251

《變裝雜記》 *Virgile travesti*

206

一十六圖

《驢教宗與牛修十》 *Pope Donkey*
and Cow Monk 368



本書是年鑑學派大師費夫賀與馬爾坦的經典之作，自一九五八年於法國出版以來，已成為西方書籍史與出版史研究人員必讀的基本書目。年鑑學派可說是影響二十世紀史學發展最重要的一支，他們的研究揚棄了以帝王將相為主的政治大事件敘述，而關注長久持續時期的庶民生活，並融合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來呈現歷史。

兩位作者聚焦於一四五〇至一八〇〇年間，活字印刷術發明後的早期圖書史；用嚴謹豐富的史料，深刻地呈現印刷書在歷史上勃興的諸多物質與社會因素，並剖析印刷書為西方文明帶來的重大影響，因此也是所有關切西方文明發展史的讀者，不可錯過的重量之作。雖是公認的學術經典，但筆法親切易讀，任何人讀來都能津津有味。

年鑑學派治學之道的極致範例，盡在書中呈現：什麼樣的時勢背景，讓歐洲造紙廠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出版商如何在書名頁、頁碼、裝幀上大作文章？最早期的暢銷書單反映了什麼？而版權保護、禁書等制度又造成哪些影響？現今全球知名的版權交易盛會——法蘭克福書展，在歷史上如何發展起來？

本書細述了印刷書形貌的歷史演進，從書籍的誕生、成形、問世以至書籍文化圈的種種、與時代文化的互動涵化，透過大師鉅細靡遺的探討，栩栩如生地呈現眼前。這是一本編書人、賣書人、愛書人、嗜書人都會想要一探究竟的珍貴研究！

作者簡介

費夫賀 (Lucien Febvre)，一八七八年生於法國南錫，一九五六年辭世。他與布洛克 (Marc Bloch) 共同創辦了年鑑學派的核心刊物，也就是後來的「年鑑：經濟、社會與文明」。今天，費夫賀已是公認的二十世紀史學大師，其法文作品還包括《土地與人類演進》、《命運：馬丁路德傳》、《拉伯雷與十六世紀的不信神問題》、《為歷史而戰》等。英文著作則有《地理觀的歷史導論》，以及柏克 (Peter Burke) 選編的《歷史新種類：費夫賀選集》。

馬爾坦 (Henri-Jean Martin)，一九二四年生於巴黎，曾任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研究主任。他是富有盛名的印刷史學者，其他作品尚有《十七世紀法國的印刷、權利與人民》與《宗教、專制與閱讀：一五八五到一七一五的法國》。

譯者簡介

李鴻志，高雄市人，政大傳播學院文學士，師大翻譯研究所肄業。譯作包括《真誠以待》(麥田)、《高科技就業聖經》(經濟新潮)。

ISBN 986-7415-72-8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圖書館



00232222

00



CITE
城邦

YK1025C

定價：600元